

11

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 世界文明史

## 拿破仑时代

威尔·杜兰 著

东方出版社

世界  
文明  
史

東方出版社

本书由台湾幼狮文化公司根据美国 Simon & Schuster 1935  
1968 年版翻译。

OUR ORIENTAL HERITAGE 《东方的遗产》 Copyright ©  
1915 by Will Durant. Copyright renewed 1963 by Will Durant.

THE LIFE OF GREECE 《希腊的生活》 Copyright  
© 1939 by Will Durant. Copyright renewed 1966 by Will Durant.

CAESAR AND CHRIST 《凯撒与基督》 Copyright © 1944 by  
Will Durant. Copyright renewed 1971 by Will Durant.

THE AGE OF FAITH 《信仰的时代》 Copyright © 1950 by Will  
Durant.

THE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Copyright © 1953 by Will  
Durant. Copyright renewed 1981 by Will Durant.

THE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Copyright © 1957 by Will  
Durant. Copyright renewed 1985 by Ethel B. Durant.

THE AGE OF REASON BEGINS 《理性开始时代》 Copyright  
© 1961 by Will and Ariel Durant.

THE AGE OF LOUIS XIV 《路易十四时代》 Copyright  
© 1963 by Will and Ariel Durant. Copyright renewed 1991 by  
Monica Mihell.

ROUSSEAU AND THE REVOLUTION 《卢梭与大革命》  
© 1967 by Will and Ariel Durant.

THE AGE OF NAPOLEON 《拿破仑时代》 Copyright  
© 1975 by Will and Ariel Durant.

THE AGE OF VOLTAIRE 《伏尔泰时代》 Copyright  
© 1965 by Will and Ariel Durant. Copyright renewed 1992 by  
Monica Mihell.

THE LESSONS OF HISTORY 《历史的教训》 Copyright  
© 1968 by Will and Ariel Durant.

Copyright renewed 1996 by Monica Ariel Mihell and Will James  
Durant-Easton.

© 1998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明史 (美) 杜兰特著. 幼狮文化公司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10

ISBN 7-5060-1157-3

I. 世… II. ①杜… ②幼

III. 世界史—通史 IV. 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8780 号

## 《世界文明史》

SHI JIE WEN MING SHI

著者: [美] 威尔·杜兰特

译者: 幼狮文化公司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50

印 数: 2001--4000 册

ISBN 7-5060-1157-3 · K · 231 定价: 698.00 元

(凡书有缺页或破损, 请向印刷厂调换)

### 责任编辑

第一卷	张京丽	陈淑博	王寅生
第二卷	杨美艳	李 惠	刘振声
第三卷	陈 光	王 粤	方国根
第四卷	孙兴民	黄金山	史 伟
第五卷	刘振声	李 惠	
第六卷	贾力红		
第七卷	孙 涵	夏 青	柯霖全
第八卷	陈子伶	史 伟	
第九卷	李 锦	魏 华	李兴华
第十卷	李京明	张伟珍	孙兴民
第十一卷	陈 光	洪 霞	张连仲

# 序 言

二十一世纪就要来到我们眼前。在这一个新的世纪中，甚至一个新的千纪中，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化的，仍然处于正在发展中状态的大国，应该抱什么态度呢？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中国古代经典上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我们对待事物应该采取的步骤，总的过程是：从学习到实行。首先是要学习。学习的方法，大体说来，不外两种：一直接，一间接。前者指的是直接接触社会，直接接触万事万物，首先得到感性认识，然后再进而成为理性认识。后者指的是间接通过别人口头的叙述，更多的是通过书本。俗语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秀才”指的是能认字读书的人，他们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指的是读书。这里的“天下”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的“天下”一样，在古代主要限于中国，到了今天，我们必须把它扩大为世界了。

要学习，必先明确要学习什么。天下事物，错综复杂；宇宙万象，头绪万端，我们决不能什么都学，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依我的看法，我们首先必须“术业有专攻”。根据社会分工，我们搞哪一行，首先必须学习这一行，精通这一行，学习得越精，越深入，就越好。但是，我们决不可以此为满足，我们还必须学习本行以外的东西。上面引的古代经书上的话“博学之”中的“博”字，就是指的这一种情况。博，也要有一个界限，决非无边际。这个界限是无法固定的，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我认为，其中也有一个最低限度。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史（也可以叫文明史），其中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等、等等。这些学问对我们待人接物、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和人际（社会）关系，是非常有用的；对于培养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必不可缺的。

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我们也必须学习世界历史、世界文明史，其中包括的学问同上面完全相同。学习这些东西，一方面可以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在国际上待人接物能够掌握恰如其分的态度，以增加国与国、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友谊，为了保卫世界和平贡献我们的力量，有利于培养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

为了达到上面提到的两个方面学习的目的，我们首先必须有适当的书籍，秀才们靠的主要就是书本。关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书，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版了不少。但是，叙述比较全面，比较准确，而文体又生动活

泼的、却不多见。现在东方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博士的《世界文明史》，是一部长达十一卷的巨著，叙述了全世界各地古今文明的情况。本书英文原名是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直译应为《文明的故事》，可见原作者的意图不是想写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而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述全世界各地文明发展的情况，文体轻松活泼，生动有趣，极富可读性，决不是高头讲章，威仪俨然，令人望而生畏。根据原文出版后国外报刊上的评议和反应，本书具有很多优点。我只举几个例子：对卷三“凯撒与基督”一章，《纽约人》的评论是：“这本书不可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注重文章的知识性和情节的戏剧性，它应受到广泛阅读。”对卷五“文艺复兴”一章，《纽约时报》的评论是：“他从语言和形象两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世代相传的文化所形成的一幅壮丽的、广阔的前景，以至于外行也完全能理解。”例子就举这两个，其余的评论都与此差不多，读者举一反三可也。因此，我认为，这是一部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好雨知时节”的春雨。我愿意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能帮助我们了解世界文明发展情况的书。

季羡林

1998年8月

## 出版说明

《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及其夫人,耗40年光阴与心血完成的一部划时代巨著。英文版由美国Simon Schuster公司出版,中文繁体竖排版由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98年初,中国东方出版社斥巨资从前述两家出版公司分别购得翻译权及中文简体横排版之独家版权。

威尔·杜兰特是美国麻省人,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著名哲学家伍伯利和杜威的学生。1926年,他以生动简洁的文笔写成《哲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philosophy)一书,出版后获得意外成功,使他在西方世界一举成名。之后他便偕同夫人,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世界文明史》一书的写作中。为了写成该书,他进行过两次环球旅行,作实地踏勘。

该书英文版是分卷出版的,写成一卷出版一卷,凡11卷,耗时40余年。台湾幼狮文化公司将其译成中文,并出版中文繁体竖排版,也耗费了10多年。为了便于操作,幼狮公司又把英文版的11卷,再细拆为38册刊行,每册依其内容冠以书名。此次本社出版中文简体横排版,又恢复到英文版11卷的体制,不分册刊行。

两岸长期的政治与文化隔离,已经造成两岸语文的不少差异,致使从中文繁体竖排版向中文简体横排版的直接移植,几乎变得不可能。所以此次本社虽已购得中文版权,但还是在繁体竖排版基础上,作许多具体而细致的勘修工作,尤其是人名、地名、物名等。不作这样的工作而直接移植,对大陆读者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读的。现将勘修工作的具体情况,向读者作一说明。

一、此次勘修工作的原则,是在充分尊重台湾繁体竖排版版权的前提下,作一些适合大陆语文环境的更改,决没有章、段、句的删削或增补。

二、本社将台湾版的11卷38册,重新组合为11卷11册,并没有改变台湾版的基本架构,相反,是原原本本回复到该书英文版的原初体例。英文版分11卷11册,此次中文简体横排版亦分为11卷11册,保留了原书的整体风貌。

三、台湾繁体竖排版之中文索引,是按其11卷38册体制编成的,此次出版简体横排版,其中文索引也只能依据原中文索引编制。故简体横排版之中文索引在各卷中是分部(台湾版之一册为一部)排印的,请读者注意。

四、台湾繁体竖排版之中文索引,已对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物名等,大部分作了检索,但仍有相当遗漏。未被检索的人名、地名、物名等,此次出版时仍以台湾译法为准,不作大的改动。理查唐雷(Richard Towneley)未在索引中出现时,一般不改为理查德·唐雷;其余类推。

五、已在台湾繁体竖排版之中文索引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物名等,此次出版时均已被改为大陆习惯用法。如改亚里斯多德为亚里士多德,改纽西兰为新西兰,改休漠为休谟,改哥德式为哥特式等。

六、本书卷帙浩繁,涉及的人名、地名、物名等数以万计,要将其全部或

大部从台湾译法改为大陆习惯用法，没有众多学者的参与，是不行的。而众手并进，就有可能造成各卷间甚至同一卷中各部间的不统一，请读者阅读时务必注意，并予谅解。好在书中出现某人名、地名、物名时，一般都附有英、德、法等外文原字，不会使读者产生误解。

七、某些词汇，两岸有不同用法，此次出版时尽量照顾大陆的习惯，作一些更改。如改气概为气概、改丰功伟迹为丰功伟绩、改凶涌为汹涌等。

八、某些词汇台湾习用，但大陆读者可能视为错别字的，此次出版时依大陆习惯改正。如台湾习用唯妙唯肖、连系、宫廷、安详、膨胀、刻画等，此次出版时分别改为维妙维肖、联系、宫廷、安祥、膨胀、刻画等。

九、台湾繁体竖排版中出现的某些明显错误，此次出版时径自改正，不作说明。如书中有“永达禁止”一语，径改为“永远禁止”。

十、台湾繁体竖排版在每分册前均载有“译序”一篇，说明译制经过及人员。考虑到这与大陆读者关系不大，此次出版时删除。

十一、台湾繁体竖排版在每分册之末，均附有英文索引，此次出版时删除；中文索引保留，且对应外文，并填充简体横排版页码。

十二、本书的“注释”及“参考书目摘要”两部分内容，系直接采自英文原版，与台湾繁体竖排版无涉。

十三、数字、年月日、年龄等，台湾繁体竖排版习用中文大写(如三分之一、一八九八年、五十岁等)表示，此次出版时一律改用阿拉伯数字(如1/3、1898年、50岁等)。但有些习惯用法，如二八年华、年五十四等，不改为28年华、年54。

十四、本社中文简体横排版虽以台湾繁体竖排版为底本，但亦参照英文原版，作了某些修订。凡台湾繁体竖排版之有缺漏、不清楚、不确切或有疑问处，均已依英文原版改正。

以如此短的时间，出版如此浩繁巨制，要做到完全没有错误，是很难的。尽管本社同仁，已经以最大耐心做出了最大努力，但错、漏、乱处，肯定仍不少，请方家指正，请广大读者指正，以利本社再版时改过。

东方出版社

1998年10月

# 总 目 录

## 第一部 法国大革命

<b>第一章 革命的背景(公元 1774—1789 年)</b> .....	( 3 )
第一节 法国人民 .....	( 3 )
第二节 政府 .....	(11)
<b>第二章 国民会议(公元 1789 年 5 月 4 日—1791 年     9 月 30 日)</b> .....	(16)
第一节 三级会议 .....	(16)
第二节 巴士底监狱 .....	(23)
第三节 马拉 .....	(25)
第四节 舍弃 .....	(28)
第五节 赴凡尔赛 .....	(31)
第六节 革命的宪政 .....	(34)
第七节 米拉博偿还债务 .....	(39)
第八节 赴克伦 .....	(41)



## 2 总 目 录

<b>第三章 立法会议(公元 1791 年 10 月 1 日 — 1792 年 9 月 20 日)</b> .....	(44)
第一节 戏剧中的角色 .....	(44)
第二节 战争 .....	(49)
第三节 丹东 .....	(55)
第四节 大屠杀 .....	(58)
<b>第四章 国民公会(公元 1792 年 9 月 21 日—1795 年 10 月 26 日)</b> .....	(64)
第一节 新共和国 .....	(64)
第二节 第二次革命 .....	(72)
第三节 马拉去世 .....	(77)
第四节 “伟大的公安委员会” .....	(80)
第五节 恐怖时代 .....	(84)
(一)观众的渴望	
(二)在各省的恐怖	
(三)反宗教战争	
(四)大革命吞灭它的后代	
第六节 温和派 .....	(112)
<b>第五章 五人执政团(公元 1795 年 11 月 2 日—1799 年 11 月 9 日)</b> .....	(118)
第一节 新政府 .....	(118)
第二节 年轻的拿破仑 .....	(122)
第三节 约瑟芬 .....	(129)
第四节 意大利的旋风 .....	(131)

第五节	共和历 12 月 18 日的政变·····	(144)
第六节	东方的幻想·····	(149)
第七节	五人执政团的没落·····	(157)
第八节	拿破仑之崛起·····	(164)
<b>第六章</b>	<b>大革命下的人生(公元 1789---1799 年) ···</b>	<b>(171)</b>
第一节	新的阶段·····	(171)
第二节	新道德·····	(177)
	(一) 道德与法律	
	(二) 性的道德	
第三节	风俗·····	(184)
第四节	音乐与戏剧·····	(188)
第五节	艺术家·····	(191)
第六节	科学与哲学·····	(195)
第七节	书籍与作者·····	(199)
第八节	斯塔埃尔夫人与大革命·····	(202)
第九节	回想·····	(210)

## 第二部 法国大革命与英国

<b>第一章</b>	<b>英格兰在忙碌 ·····</b>	<b>(217)</b>
第一节	另一型式的革命·····	(218)
第二节	基层·····	(223)
第三节	忧郁的科学·····	(227)
第四节	罗伯特·欧文·····	(228)

## 4 总 目 录

<b>第二章 英国的生活</b> .....	(235)
第一节 阶级 .....	(235)
第二节 政府 .....	(238)
(一) 立法	
(二) 司法	
(三) 行政	
第三节 宗教 .....	(244)
第四节 教育 .....	(248)
第五节 道德 .....	(252)
(一) 男人与女人	
(二) 玛丽·吴史东克莱夫特	
(三) 社会道德	
第六节 礼仪 .....	(260)
第七节 英国的剧场 .....	(263)
第八节 总结 .....	(269)
<b>第三章 英格兰的艺术</b> .....	(271)
第一节 艺术家 .....	(271)
第二节 建筑 .....	(273)
第三节 自卡通到康斯特布尔 .....	(275)
第四节 特纳 .....	(282)
<b>第四章 英格兰的科学</b> .....	(288)
第一节 进步的通衢 .....	(288)
第二节 物理学：拉姆福德和扬 .....	(290)
第三节 化学：多尔顿和大卫 .....	(293)
第四节 生物学：伊拉斯谟·达尔文 .....	(296)

第五节	医学：詹纳·····	(297)
<b>第五章</b>	<b>英国的哲学</b> ·····	(300)
第一节	汤姆佩·因论基督教·····	(300)
第二节	戈德温论正义·····	(306)
第三节	马尔萨斯论人口·····	(310)
第四节	边沁论法律·····	(315)
<b>第六章</b>	<b>文学之转变</b> ·····	(321)
第一节	报纸·····	(321)
第二节	书·····	(323)
第三节	简·奥斯汀·····	(325)
第四节	威廉·布莱克·····	(330)
<b>第七章</b>	<b>湖滨诗人（公元 1770—1805 年）</b> ·····	(337)
第一节	环境·····	(337)
第二节	沃兹沃思·····	(338)
第三节	科尔里奇·····	(345)
第四节	骚塞·····	(348)
第五节	科尔里奇·····	(350)
第六节	三人组合·····	(353)
第七节	抒情民谣·····	(356)
第八节	流浪的学人·····	(362)
第九节	格拉斯米尔的田园生活·····	(364)
第十节	爱情、劳动、鸦片·····	(369)
第十一节	哲学家科尔里奇·····	(374)
第十二节	沃兹沃思的巅峰期·····	(378)
第十三节	高门圣哲·····	(384)

## 6 总 目 录

- 第十四节 论遗世独立派…………… (386)
- 第十五节 骚塞…………… (389)
- 第十六节 沃兹沃思的独白…………… (391)

## 第八章 反叛的诗人 (公元 1788—1824 年) …… (395)

- 第一节 褪色的污点…………… (395)
- 第二节 欧陆大旅行时期之拜伦…………… (400)
- 第三节 伦敦之狮时期的拜伦…………… (404)
- 第四节 婚姻试验时期的拜伦…………… (411)
- 第五节 雪莱的青年时期…………… (417)
- 第六节 雪莱的私奔 (一) …… (421)
- 第七节 雪莱的私奔 (二) …… (425)
- 第八节 拜伦和雪莱的瑞士假期…………… (432)
- 第九节 拜伦在威尼斯衰朽…………… (436)
- 第十节 雪莱家长…………… (439)
- 第十一节 雪莱的巅峰时期…………… (442)
- 第十二节 拜伦的爱情与革命…………… (448)
- 第十三节 对照…………… (454)
- 第十四节 比萨诗篇…………… (460)
- 第十五节 雪莱的祭物…………… (462)
- 第十六节 拜伦的转变…………… (466)
- 第十七节 生存者…………… (470)

## 第九章 英格兰的邻邦 (公元 1789—1815 年) …… (473)

- 第一节 苏格兰人…………… (473)
- 第二节 爱尔兰人…………… (481)

<b>第十章 庇特、纳尔逊和拿破仑 (公元 1789—1812 年)</b>	(487)
第一节 庇特和大革命	(487)
第二节 纳尔逊	(496)
第三节 特拉法尔加角	(502)
第四节 英格兰世纪	(508)

## 第三部 拿破仑与欧陆

<b>第一章 伊比利亚半岛</b>	(513)
第一节 葡萄牙	(513)
第二节 西班牙	(516)
第三节 亚瑟·卫尔斯利	(520)
第四节 半岛战争：三	(522)
第五节 结果	(526)
<b>第二章 意大利及其征服者 (公元 1789—1813 年)</b>	(528)
第一节 1789 年的意大利地图	(528)
第二节 意大利和法国大革命	(532)
第三节 拿破仑治理下的意大利	(535)
第四节 皇帝与教皇	(539)
第五节 战争之后	(543)
第六节 卡诺瓦	(548)
第七节 再见吧！意大利	(551)

<b>第三章 奥地利 (公元 1780—1812 年)</b>	(555)
第一节 开明的专制君主	(555)
第二节 法兰西斯二世	(558)
第三节 梅特涅	(559)
第四节 维也纳	(562)
第五节 艺术	(565)
<b>第四章 贝多芬 (公元 1770—1827 年)</b>	(568)
第一节 在波恩度过的少年时代	(568)
第二节 进步与悲剧	(572)
第三节 英雄的岁月	(579)
第四节 情人	(583)
第五节 贝多芬和歌德	(587)
第六节 最后的胜利	(590)
第七节 剧终	(596)
<b>第五章 日耳曼与拿破仑 (公元 1786—1811 年)</b>	
.....	(599)
第一节 神圣罗马帝国	(599)
第二节 莱茵邦联	(602)
第三节 拿破仑的日耳曼诸省	(605)
第四节 萨克森	(608)
第五节 普鲁士: 弗里德里希的遗产	(609)
第六节 普鲁士的崩溃	(612)
第七节 普鲁士的再生	(614)

<b>第六章 日耳曼民族 (公元 1789—1812 年)</b>	.....	(619)
第一节 经济	.....	(619)
第二节 信仰者和怀疑者	.....	(620)
第三节 日耳曼的犹太人	.....	(623)
第四节 道德	.....	(625)
第五节 教育	.....	(628)
第六节 科学	.....	(630)
第七节 艺术	.....	(635)
第八节 音乐	.....	(638)
第九节 剧院	.....	(641)
第十节 戏剧家	.....	(644)
<b>第七章 日耳曼文学 (公元 1789—1815 年)</b>	.....	(648)
第一节 革命与反响	.....	(648)
第二节 魏玛	.....	(650)
第三节 文学背景	.....	(655)
第四节 浪漫的狂喜	.....	(662)
第五节 情感之声	.....	(665)
第六节 施莱格尔兄弟	.....	(669)
<b>第八章 日耳曼哲学 (公元 1789—1815 年)</b>	.....	(674)
第一节 费希特	.....	(675)
(一) 激进的费希特		
(二) 哲学家费希特		
(三) 爱国的费希特		
第二节 谢林	.....	(685)
第三节 黑格尔	.....	(688)
(一) 怀疑派者的进展		



- (二) 论理学是形而上学
- (三) 精神
- (四) 道德、法律和國家
- (五) 历史
- (六) 逝世与酬报

**第九章 大陆边缘各国 (公元 1789—1812 年) ... (708)**

- 第一节 瑞士..... (708)
- 第二节 瑞典..... (711)
- 第三节 丹麦..... (714)
- 第四节 波兰..... (721)
- 第五节 欧洲的土耳其帝国..... (724)

**第十章 俄国 (公元 1796—1812 年) ..... (728)**

- 第一节 背景..... (728)
- 第二节 保罗一世..... (733)
- 第三节 君主的教育..... (736)
- 第四节 年轻的沙皇..... (738)
- 第五节 亚历山大治下的犹太人..... (741)
- 第六节 俄国的艺术..... (743)
- 第七节 俄国文学..... (748)
- 第八节 亚历山大和拿破仑..... (752)

## 第四部 拿破仑的升沉

<b>第一章 执政官政府</b> .....	(759)
<b>第一节 新宪法</b> .....	(759)
(一) 执政官	
(二) 部长	
(三) 宪法的接受	
<b>第二节 执政官政府的战役</b> .....	(773)
<b>第三节 改造法国</b> .....	(789)
(一) 拿破仑法典	
(二) 1801 年之协定	
<b>第四节 光荣之路</b> .....	(796)
<b>第五节 大阴谋</b> .....	(802)
<b>第六节 拿破仑称帝</b> .....	(807)
<b>第二章 新帝国 (公元 1804—1807 年)</b> .....	(811)
<b>第一节 加冕</b> .....	(811)
<b>第二节 第三同盟</b> .....	(815)
<b>第三节 奥斯特利茨之役</b> .....	(818)
<b>第四节 绘制地图者</b> .....	(822)
<b>第五节 耶拿、埃劳、弗里德兰</b> .....	(826)
<b>第六节 铁耳西特</b> .....	(832)

<b>第三章 庞大之领域（公元 1807—1811 年）</b>	.....	(836)
第一节 波拿巴家族	.....	(836)
第二节 半岛之战	.....	(847)
第三节 冠盖云集爱尔福特	.....	(852)
第四节 半岛之战：第二次	.....	(856)
第五节 富歇、塔列朗和奥国	.....	(859)
第六节 婚姻和政策	.....	(863)
<b>第四章 拿破仑其人</b>	.....	(869)
第一节 外观	.....	(869)
第二节 心智	.....	(873)
第三节 性格	.....	(877)
第四节 将军	.....	(883)
第五节 统治者	.....	(889)
第六节 哲学家	.....	(894)
第七节 他究竟是什么？	.....	(900)
<b>第五章 拿破仑时代的法人（公元 1800—1815 年）</b>	.....	(903)
第一节 经济	.....	(903)
第二节 教师	.....	(909)
第三节 军人	.....	(913)
第四节 道德与风俗	.....	(916)
第五节 雷卡米耶夫人	.....	(921)
第六节 法国的犹太人	.....	(924)

<b>第六章 拿破仑与艺术</b> .....	(929)
第一节 音乐.....	(929)
第二节 建筑及雕刻等.....	(931)
第三节 画家.....	(934)
第四节 舞台界.....	(938)
<b>第七章 反对拿破仑的文学</b> .....	(941)
第一节 检查制度.....	(941)
第二节 斯塔埃尔夫人.....	(944)
(一) 拿破仑的报复	
(二) 作家	
(三) 观光客	
(四) 了解日耳曼	
(五) 不完美的胜利	
第三节 康斯坦.....	(965)
第四节 夏多布里昂.....	(974)
(一) 年轻时代	
(二) 发展	
(三) 基督教精神	
(四) 雷尼	
(五) 夏多布里昂和拿破仑	
<b>第八章 拿破仑时代的科学和哲学</b> .....	(995)
第一节 数学和物理.....	(995)
第二节 医药.....	(999)
第三节 生物学 .....	(1001)
(一) 居维叶	
(二) 拉马克	

第四节	心是什么 .....	(1007)
第五节	保守思想的潮流 .....	(1010)
<b>第九章</b>	<b>远征莫斯科 .....</b>	<b>(1018)</b>
第一节	大陆封锁 .....	(1018)
第二节	法国的不景气 .....	(1020)
第三节	备战 .....	(1022)
第四节	莫斯科之途 .....	(1026)
第五节	火烧莫斯科 .....	(1032)
第六节	归途 .....	(1035)
<b>第十章</b>	<b>厄尔巴岛 (公元 1813—1814 年) .....</b>	<b>(1041)</b>
第一节	柏林 .....	(1041)
第二节	至布拉格 .....	(1045)
第三节	莱茵河 .....	(1048)
第四节	转折点 .....	(1050)
第五节	至巴黎 .....	(1053)
第六节	和平 .....	(1058)
<b>第十一章</b>	<b>滑铁卢 (公元 1814—1815 年) .....</b>	<b>(1062)</b>
第一节	路易十八 .....	(1062)
第二节	维也纳会议 .....	(1065)
第三节	厄尔巴岛 .....	(1069)
第四节	不可思议的旅程 .....	(1071)
第五节	重建 .....	(1076)
第六节	最后之役 .....	(1081)
	(一) 1815 年 6 月 15 日: 比利时	
	(二) 6 月 16 日: 李格尼	

(三) 6月17日：大雨

(四) 6月18日，星期日：滑铁卢

<b>第十二章</b>	<b>圣赫勒拿岛</b> .....	(1089)
第一节	第二次逊位 .....	(1089)
第二节	第二次复辟 .....	(1092)
第三节	投降 .....	(1095)
<b>第十三章</b>	<b>结束</b> .....	(1099)
第一节	圣赫勒拿岛 .....	(1099)
第二节	哈德孙·洛爵士 .....	(1101)
第三节	了不起的伙伴 .....	(1103)
第四节	了不起的独裁者 .....	(1107)
第五节	最后的战斗 .....	(1110)
<b>第十四章</b>	<b>总结</b> .....	(1116)
第一节	家庭 .....	(1116)
第二节	回家、回国 .....	(1120)
第三节	回顾 .....	(1124)

## 结论：历史的教训

<b>第一章</b>	<b>踌躇</b> .....	(1131)
<b>第二章</b>	<b>历史与地球</b> .....	(1134)

第三章	生物学与历史	(1137)
第四章	种族与历史	(1143)
第五章	性格与历史	(1150)
第六章	道德与历史	(1154)
第七章	宗教与历史	(1159)
第八章	经济与历史	(1167)
第九章	社会主义与历史	(1173)
第十章	政府与历史	(1181)
第十一章	历史与战争	(1193)
第十二章	成长与衰退	(1199)
第十三章	真有进步吗?	(1207)
注释		(1215)
参考书目举要		(1239)
中文索引		(1249)
《结论》之中英文名对照表		(1361)

第一部  
法国大革命



2 世界文明史·第十一卷 拿破仑时代

## 第一章 革命的背景

(公元 1774—1789 年)

### 第一节 法国人民

在欧洲，法国是人口最稠密与富裕的国家。1780 年时，俄国居民 2400 万，意大利 1700 万，西班牙 1000 万，大布里颠 900 万，普鲁士 860 万，奥国 790 万，爱尔兰 400 万，比利时 220 万，葡萄牙 210 万，瑞典 200 万，荷兰 190 万，瑞士 140 万，丹麦 80 万，挪威 70 万，法国 2500 万。<sup>①</sup>巴黎是欧洲最大城市，居民约 650 万，也是欧洲教育程度最高且感情最丰富的城市。

法国人民分为三等，或阶级（身份）：教士，约 13 万人；<sup>②</sup>贵族，约 40 万人；平民（the Tiers État），包括其他所有的人在內；法国大革命是经济方面不断好转，但政治上却不利的第三阶级要取得与它增加中的财富相称的政治力量与社会地位的尝试。每一阶级又分为子群或层，以致每一个人均有属于他自己心目的一群人。

最富有的阶级是教会的教阶组织——枢机主教、大主教、主教、与修道院院长；其中以地方上的牧师与副牧师为最穷；这里

经济因素超越教义界限，在法国大革命时，阶级较低的教士与民众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上级。修道院生活已失去其吸引力；圣本笃（Saint Benedict）教团僧侣人数，在法国，由1770年的6434人，减至1790年的4300人；几个“宗教的”修道会，在1780年前被解散，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则早已于1773年时解散。一般说来，宗教在法国城市内衰退了；许多城市的教会一半是空的；并且在农民中，异教徒习惯和古老迷信积极地与教会的教义及仪式发生竞争。<sup>⑧</sup>不过，修女仍然积极献身于教育与看护，并且受到富人与穷人同样赞誉。即使在对基督教疑惑的现实时期，仍有成千成万的女人、小孩与男人，以敬神使其遭受命运打击的生活获得安逸，以圣人的事迹来满足他们的想象，以宗教节日来间隔连续劳苦工作的日子，并且从宗教希望中，找到一种打破并拯救困感与绝望的镇痛剂。

政治支持教会是因为政治家都承认：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牧师能给予他们不可缺少的帮助。依他们的看法，人类禀赋不平等造成不可避免的财富分配不均；因此，为了资产阶级的安全，教士团必须维持著用以给予穷人温和而谦恭的商议与天堂补偿的希望。这对法国意义甚大，因为以宗教为支撑的家庭，继续成为政府兴衰、国家稳定之基础。此外，信徒受到信仰皇帝神圣权力之鼓励——他们的地位与权力的神圣来源；牧师谆谆教诲这种信仰，而皇帝觉得这种神话对他们个人安全与有秩序的统治极有助益。因此，他们几乎将各种公共教育留给天主教教士；当新教在法国的成长威胁到这国家教会的权威与利益时，于格诺教徒（Huguenots）便被无情地驱逐了。

为感谢他们的服务，政府允许教会从每一教区收取什一税及其他所得、以及从事遗嘱的制作——即促使将死的罪人购买在天堂可收集的期票，以交换遗留给教会的世上财产。政府免除教士纳税，并时常从教会收到丰富的自由捐赠来满足它自己。由于被

赋与如此众多的特权，教会在法国积聚了数量很大的土地，总计为 1/5 的国土；<sup>④</sup>并且它将这些当作封建财产来管理，征收封建税。它将信徒的捐献转换为金与银的装饰品，像镶在皇冠上的珠宝，那是对抗历史上根深蒂固通货膨胀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藩篱。

许多教区的教士，被什一税抢去了教区的收入，工作于虔诚的贫穷中，而许多主教却生活得舒适优裕，并且高贵的大主教，远离他们的教区，出入于皇宫中。当法国政府濒临破产之际，而法国教会（按照塔列朗 [Talleyrand] 估计）却享有 1 亿 5000 万 livre 的每年收入，\* 负担纳税的第三阶级，奇怪何以教会没有被迫与政府分享它的财富。当不信仰的文艺散布开来时，数千的中阶层市民与数百贵族就放弃对基督的信仰，并且用哲学上的冷静态度观察大革命侵袭神圣的、防护着的囤积物。

贵族阶级模糊地发觉到它失去了许多一直赖以生的功能。它的最骄傲成分——贵族的剑，曾做为军队的防卫物，经济的指挥者、与农业社会的司法首领；但是大多数这些服务被黎塞留 (Richelieu) 与路易十四 (Louis XIV) 统治下的中央集权的权力与管理所取代；许多领主现在居于皇宫并且忽视他们的领地；在 1789 年，他们的华贵服饰、优雅风度、与寻常亲切，<sup>⑤</sup>拥有四分之一土地与征收封建税似乎是理由不充分。

他们中较古老的家庭自称为贵族阶级，可追溯他们的血统至 5 世纪时征服并重新命名高卢 (Gaul) 的日耳曼法兰克人 (Germanic Franks) 上去；1789 年当德穆兰 (Desmoulins—Camille) 称大革命为迟延已久的种族报复时，他将这种自豪转变来对抗外来的侵略者。实际上，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国贵族是渐增的中产阶级与塞尔特人 (Celtic)，已使他们的土地与头衔与中产阶级新的财富与伶俐的头脑合为一体了。

---

\* livre 或一法郎在 1789 年时大约相等于 1970 年美金 1.25 元。

贵族的增加部分——穿长袍贵族——包括大约四千家族、其家长被指派了司法或行政职位、因而就自动地享有贵族身分。当大多数这种职位被皇帝或他的大臣们出售而为国家增加收益时，许多购买者认为以温和的贿赂手段重新收回他们的支出已有了保证；<sup>①</sup>“当政者贪财”，在“法国十分猖獗”，<sup>②</sup>并且是不利濒于灭亡的政权之成百抱怨中之一种。这些官衔与阶级有些是世袭的，并且当持有者加倍，特别在法务院（Parlement），或各地区的法院中，他们的自傲与权力增加至1787年的顶点时，巴黎的法务院要求对皇帝的敕令有否决权力。以时间而言大革命开始逼近了。

在《什么是第三阶级》中——一本小册子，出版于1789年1月，西哀士（Abbé Emmanuel-Joseph Sieyès）提出并解答了3个问题：什么是第三阶级？最主要者。直到现在它是什情形？无足轻重。什么是它想要成为的？重要人物。<sup>③</sup>或者，在尚福（Chamfort）的修正中，讨论——最主要者。它几乎是最主要者，它包括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跟它的10万户家庭<sup>④</sup>与它的许多阶层——银行家、代理商、企业家、商人、经理、医生、科学家、教师、艺术家、作家、新闻记者、新闻界（第四“阶级”，或力量）与小民（有时称“人民”）；包括城镇的贫民与商人，在陆上或海上的运输工人和农人。

中上阶层掌握并支配一正在增大与扩张中的势力：可流动货币与其他资本的力量，与静态的地产或衰微的宗教信条作积极、扩张的竞争。他们投机于巴黎、伦敦、与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证券交易所，并且，依照内克尔（Necker Jacques）的估计，控制了欧洲一半的货币。<sup>⑤</sup>他们以贷款来资助法国政府，并且如果贷款与费用不能偿付，则以推翻政府作为威胁之手段。他们拥有或经营法国北部迅速成长的矿业与冶矿业；里昂（Lyons）、鲁瓦（Troyes）、阿布维尔（Abbeville）、里尔（Lille）与鲁昂（Rouen）的纺织业，洛林（Lorraine）的铁工厂与盐厂，马赛（Marseilles）

的肥皂工厂，巴黎的制革业。他们经营正在取代过去手工艺工厂与同业公会的资本主义工业；他们欢迎重农主义者<sup>①</sup>的理论，因为自由企业较传统的工业规约与国家的贸易更加刺激与有生产力之故。他们资助并筹划由原料到制成品的转换，并将这些成品由生产者运至消费者，使双方均获得利润。他们得益于欧洲最好的3万英里道路，但是，他们公然抨击征于法国道路与运河的通行税，以及由各省珍惜地维持着的不同重量与度量单位。他们控制商业使波尔多（Bordeaux）、马赛，与南特（Nantes）富足；他们组织如印德斯与伊沃克斯这类庞大的股份公司；他们将市场由城市拓展到世界；并且经过这种贸易，他们为法国发展仅次于英国的海外帝国。他们发觉到他们——并非贵族——是法国渐增财富的创造者，并且他们决定与贵族及教士均等地分享政府的利益与职位，在法律前与皇宫内的地位，所有法国社会上的特权与恩赐之接近途径。当罗兰（Maron Roland）——高尚而有教养但为中产阶级——被邀请造访一有爵位的夫人，而被要求在那里与仆人共餐而不得与贵族宾客同座时，她发出抗议的呼喊，深入中产阶级的内心。<sup>②</sup>当他们接合革命的箴言：“自由、平等，与博爱”时，这种愤慨与热望固植于他们的思想中了；他们并不意谓它向下或向上，但它可作它的宗旨直到它能改变为止。同时，中产阶级成为支持大革命最主要的力量。

他们塞满戏院并且喝采包玛歇（Beaumarchais）讽刺贵族社会。他们加入互助会（Freemason）分会为生活与思想的自由而工作甚至多于贵族；阅读伏尔泰（Voltaire）的作品并且领略到他的腐蚀性才智并且他们赞同吉本（Gibbon Edward）所有宗教对于哲学家同样的虚假而对于政治家为同样地有用的看法。他们秘密地崇拜霍尔巴赫（d' Holbach）与爱尔维修（Helvetius, Claude Adrien，法国哲学家，1715—1771年）的唯物主义；它可能不完全是生活与思想中的神秘，但它是对抗控制大多数人心与一半法国

财富的教会而便于使用的武器；他们同意狄德罗（Diderot, Denis）现存政体的所有一切几乎都是荒谬的看法——虽然他们同意他渴望着的大溪地（Versailles）。他们不喜欢卢梭（Rousseau, Jean Jacques），他有社会主义气味；但是他们，比起法国社会任何其他部分，更要感受与扩大文学及哲学之影响。

通常哲学家在政治上是稳健的，他们接受君主政体，并且不憎恶王室的礼物；他们指望“开明的君主”像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甚至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而不将粗鄙与冲动的劳动阶级，当做改革的政客。他们确信理性，即使他们知道它的极限与适应性。他们推翻由教会和国家控制的思想检查，并且开放与扩大了成百万人的心智；他们为科学在19世纪的胜利作准备，甚至——有拉瓦锡（Lavoisier, Antoine Laurent）、拉普拉斯（Laplace, Pierre Simon Marquis de）与拉马克（Lamarck, Chevalier de）——侧身于大革命和战争的大动乱中。

卢梭使自己脱离哲学。他尊重理性，但是，他高度地屈服于情感，与一种令人鼓舞，且使痛苦缓和的信仰；他的《萨伏衣人教区牧师的宗教职业》提供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 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一个宗教的立场，他的坚决主张统一的国家教条，让公共安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使政治邪说——起码在战时——成为死罪。大革命的雅各宾党人（Jacobins）接受《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的主张：即人类是天生善良的，但受腐败制度与不公平法律之支配而变坏了；人类是天生自由的，却变成了人为的文明之奴隶。在权力方面，大革命的领袖们就采取卢梭观念，即“公民”，因接受政府保障，发誓绝对服从政府。马莱·杜·汎（Mallet du Pan）写着：“1778年，我在街上听到马拉（Marat, Jean Paul）朗读并评论《民约论》，使得热心听众为之喝采。”<sup>⑧</sup>卢梭的人民主权，在大革命时，先变成了

国家主权，继则变成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主权，最后竟变成一人的主权。

“人民”，在大革命的词汇中，意指农人与市镇工人。纵使工厂员工占人口中少数的市镇；那里不是连绵不断的工厂，而是哼着好听调子的屠户、面包师傅、酿造者、杂货商、厨子、小贩、理发师、零售商、旅馆老板、葡萄酒商、木匠、泥水匠、油漆匠、玻璃工人、石膏师、农夫、鞋匠、女裁缝、染匠、清洁工人、成衣匠、铁匠、佣人、家具师、马具师、车匠、金匠、刀匠、织工、制革匠、印刷工人、书商；妓女、与小偷的地方。这些劳动者穿着长及足踝的窄裤而非上流社会的及膝短裤（裙裤）与长袜；因此他们被称为“无裤党”，他们在大革命中因而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从新大陆流入的金银与不断发行的纸币、使欧洲各地物价上升；在法国，1741至1789年间，物价上升65%，而工资则上升22%。<sup>⑨</sup>在里昂有3万人于1787年接受救济；在巴黎有10万户家庭于1791年被列为贫穷户。劳工联盟支持的经济行动受到禁止；罢工也被禁，但罢工却仍不断发生。当大革命快到来时，劳动者处在不断递增的沮丧与反叛的情况中。给予他们枪枝与一位领袖，他们就会攻下巴士底狱（Bastille），侵入图勒里宫（Tuileries），并且废除皇帝。

法国农民，在1789年时，生活境况也许较优于一世纪以前，于其时布吕耶尔（La Bruyère）夸张的指出一篇论文误认他们为野兽。<sup>⑩</sup>也许除意大利北部的农民以外，他们的境况较优裕于欧洲大陆其他各地的农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可耕地由自耕农占有；三分之一则被贵族、教会或资产阶级所有者出租给佃户或者佃农；其余则由农场雇工在所有者或管事人监督下经营。越来越多的所有者——受到成本增加与剧烈的竞争所烦恼——为了耕种或畜牧之故，围绕以前让农民自由放牧家畜或采集木材的“公共用地”（Common lands）。



除少数“自由地的”(无义务地)农民持有者外,一切土地都受制于封建税。他们受契约特许状约束每年给予诸侯——贵族的采邑——几天无报酬的劳务(强迫劳役),帮助他耕作他的用地与修复他的道路;不论何时,他们使用那些道路时,他们得付他通行税。他们每年应付给他适度的产品或现金作为免役税。如果他们出售他们的土地时,他有权得百分之十或十五的购买物收益。<sup>④</sup>如果他们在他的河流捕鱼,或在他的农场放牧时,他们得付费用给他。每次他们使用他的磨坊,他的面包厂,他的葡萄榨汁或榨油器时,他们需支付费用。因为这些费用是受特许状所规定的,并因通货膨胀减少价值时,持有人因价格上升而以日渐严厉的手段来课征感到有了保障。<sup>⑤</sup>

为支持保佑他的作物的教会,养成他的子女服从与信仰,并且以圣礼使他的生命尊荣,农民每年献给它产品之什一税——通常不及十分之一。比什一税或封建税更重的是政府向他们征的税收:人头税,他每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销售税,在他每次购买金或银器具,金属产品、酒、纸、淀粉……,与盐税,这是要求他每年按政府规定价格向政府认购一定量的盐。因为贵族与教士发现以合法与不合法的方法逃避许多税收——像战时的征集,富有的年轻人可购买替身赴死——支持政府与教会的主要担子,无论在平时与战时——均落在农人身上。

这些税收,什一税和封建税,当收成好时,可能靠得住,但是,因战争破坏或气候不定,使收获变差,和一年的辛苦工作眼看着白费时,它们就带来不幸了。于是,许多地主就出售他们的土地或劳工,或二者,给较幸运的土地投机者。

1788年是以不仁慈的“天灾”为特色。一次严重的旱灾阻碍了农作物的生长;一场大冰雹,从诺曼底(Normandy)袭击到香槟(Champagne),蹂躏180英里平素肥沃的地带;冬季(1788—1789年)是8年之中最严寒的一次;成千的果树枯死。1789年水

灾损失惨重；夏季发生的饥荒几乎及于每一省。政府、教会、与私人慈善机构努力争取食物以抵抗饥馑；仅少数人饿死，但成百万的人，他们的生活资源接近终了。从卡昂（Caen）、鲁昂、南锡（Nancy）、奥尔良（Orléans）、里昂，可看到敌对团体像野兽般为玉米争斗；在马赛可看到 8000 饥饿的人们，在城门口威胁着要进占与抢夺城市；在巴黎、圣安托万（St-Antoine）的工人阶级区内，有 3 万贫民受到照顾。<sup>⑨</sup>同时，一项放宽与大不列颠的贸易条约（1786 年），使法国受到工业产品泛滥，以致使本国货物跌价，并促使成千法国工人失业——里昂 2.5000 人，亚眠（Amiens）4.6 万人，巴黎 8 万人。<sup>⑩</sup>1789 年 3 月，农民拒绝缴税，增添了国家破产的厄运。

阿瑟·杨格（Arthur Young），于 1789 年 7 月到法国首都以外各地去旅行，遇见一名农村妇女抱怨税收与封建税使他们永远生活在贫困边缘。但是，她附加道，她知道“有一些伟人愿为这样贫穷的国家做一些事……因为税收与封建税正压榨着我们。”<sup>⑪</sup>他们听说路易十六（Louis XVI）是一位好人，渴望改革弊病与保护穷人。他们满怀希望地遥望着凡尔赛宫，并且为皇帝的长寿祈祷。

## 第二节 政 府

他是一位好人，但称不上是一位好皇帝。他不想统治国家，然而他父亲过早去世（1765 年）使他成为法国皇太子，并且他的祖父路易十五的驾崩（1774 年），使他在 20 岁时就成为法国统治者。他不愿管理人民；他有使用工具的技能，并且是一优秀的锁匠。他宁愿打猎而不愿统治；他算未射中一头雄鹿的那天为损失。1774

至 1789 年间，他打倒 1274 头，并且射杀猎物 18.9251 万头；他仍然不愿下令处死一人；他失去他的皇位，也许是由于他命令他的瑞士御林军在 1792 年 8 月 10 日停止射击之故。打猎回来，他食量大增。他虽胖却很壮，具有一位巨人轻轻一拥抱就怕要把人压扁的力量。安托瓦妮特（Marie Antoinette，路易十六之后，1755—1793 年）认为她的丈夫很好：“皇帝不是一个懦夫，他拥有充分默从的勇气，但他过份羞怯与缺乏自信……。他害怕指挥……。在路易十五眼里，直到 21 岁为止，他仍像一个小孩子，并且总是心神不宁，这种束缚确定了他的胆怯。”<sup>④</sup>

他对皇后的爱情是他失败之部分理由。她美丽而端庄，她以她的魅力与欢笑使他的宫廷生色，她宽恕他迟延他们的完婚。他的包皮太紧使他对性生活没有兴趣；有 7 年之久，他不断尝试，逃避解决他困难的简单手术；1777 年，皇后的哥哥，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说服他以手术处理，不久，一切都很完美了。也许因夜间经常惊醒并使她的配偶失望而感到罪恶，促使他过份容忍她赌博，她奢侈的衣柜，她经常为那些使他烦厌的歌剧到巴黎游玩，她与费尔桑（Fersen）伯爵或者朗巴勒（Lamballe）公爵夫人的柏拉图式或希腊女诗人莎孚（Sapphic）式的友谊。他消遣他的朝臣，并且羞辱他们的祖先，以取悦他的妻子。他给予她名贵的珠宝，但她与法国想要的是一个孩子。当孩子来到时，她证实为一个好母亲，照料他们的疾病、并且几乎减轻她骄傲与不断干预政府事务之外所有她的过失。此处她获得一些谅解，因为路易很少选择或保持行动的目标，并且经常等待皇后为他作决定；一些朝臣希望他有她的迅速判断与敏捷的指挥能力。

国王尽其所能来处理因气候、饥荒、面包之危机、反对税收的骚动、贵族与国会的需索、朝廷与行政部门的支出、和财政部增加的赤字所加诸于他的种种危机。有两年的时间（1774—1776 年），他允许杜尔哥（Turgot, Anne Robert Jacques）应用重农主

义理论：自由的企业与竞争，以及市场的无阻碍垄断——供给与需要——支配劳动者的工资与财货的价格，使法国经济复苏并增加政府收益。巴黎市民，惯认政府为他们的唯一保障，反对市场贪心的操纵者，反对杜尔哥的措施，发动暴动，并喜见他的失势。

几个月踌躇与混乱之后，国王任命内克尔，一位居住在巴黎的瑞士新教徒财政家为财政部部长（1777—1781年）。在这位外国异教徒领导下，路易实施一次有意义的小改革计划。他允许成立民选的地方与省的“议会”，作为他们的选民意见之表达机构，以及人民与政府间的桥梁。他抨击徭役，并公开声明（1780年），“对我们臣民中最穷部分的税收，在比例上，已远过所有其他部分”震惊了贵族；并且他表示他的希望，“富人不要认为自己受到损害，当他们必须支付那些他们早应与其他人共同负担的费用时。”<sup>②</sup>他给予在他自己田地上最后一批农奴自由，但是拒绝内克尔敦促向贵族与教士要求相同的措施。他设立当铺，以百分之三的利息贷款给穷人。他禁止使用严刑来审问证人或罪犯。他建议废止在万塞纳（Vincennes）的地牢与毁去巴士底狱做为监狱改革计划的一部分。不顾及他的虔敬与正教信仰，他允许异教徒与犹太人有相当程度的宗教自由。他不愿惩罚自由思想，并准许巴黎无情的小册子作者讽刺他为一只乌龟，他的妻子为一名妓女，他的孩子为私生子。他禁止他的政府侦查人民的私人通讯。

因包玛歌与法国革命哲学家的热心支持，并且压倒了内克尔之反对（他预测此一冒险行为，将造成法国的破产），路易以物质与财政援助美国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总额达2亿4000万美元；一支法国舰队，以及拉斐德（Lafayette）侯爵与Rochambeau的大军，帮助华盛顿（Washington）击败英国的康沃力斯（Wallis Corn）于约克镇（York Town），逼迫他投降因而导致战争结束。但是民主的观念横越大西洋进入法国，财政部在新债之下拖垮，内克尔被撤职（1781年），并且资产阶级的债券持有者，极力要求控制政府

的财政。

同时，巴黎的法务院坚持要以国王敕令的否决权阻止君主政体；并且路易·菲利浦·约瑟（Louis-Philippe-Joseph），奥尔良（d'Orléans）公爵——他的堂兄，来自路易十四的弟弟之直系血统——几乎公开策划夺取王位。他利用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与其他的工作人员，在政治家、小册子作者、演说家、与妓女之中散布金钱与承诺。他开放他的巴黎皇家之设备、宫院与花园给他的属下；餐馆、酒店、书店与赌博俱乐部崛起，以容纳日夜聚集在那里的群众；来自凡尔赛的新闻由特别信差迅速送达那里；小册子几乎每一小时在那里产生，到处都是议论纷纷；罢黜国王的阴谋筹议完成了。

被折磨到了绝望之际，路易重新召回内克尔为法国财政部长。在内克尔的极力主张下，并作为可能保全或推翻王位之唯一而危险的手段，1788年8月8日，他发布一道命令至法国各社区，选举并且派遣他们有领导地位的贵族、牧师、与平民到凡尔赛，组成（像最近一次完成于1614年者然）国家或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为解决王国难题提供他意见与支持。

关于政府向国民作这种历史性的命令，这有一些著名特征。因为几乎有两世纪，明切地认为民众仅为粮食供应者、纳税者、与对战神（Mars）定期朝贡。第一，国王两度在内克尔敦促下，排斥贵族抗议，宣布第三阶级在三级会议中，应有如其他二阶级相加之相同的代表与选举权。第二，选举用目前实行于法国的成人普遍直接投票的方法：任一年龄在27岁以上之男子，过去一年缴付过每一种政府税收，则有资格参加地方会议之投票，由地方会议再选出至巴黎之代表。第三，国王在他的命令中增加一请求，要所有选举的会议向他提呈报告，并载明每一区域的每一阶层之需要与困难，须附有补救与改革的建议。在法国人记忆中，从未有任何国王曾询及人民之意见。

650份由代表呈递给皇帝的“委托书”(Cahier 1789年,法国三级会议发给代表们的)中,545份幸存。几乎全部表示他们对他的忠心,甚至他们对他的感情也明显地把他当做一位善良的人;但是几乎全都建议用可弥补他的君主立宪政治的民选会议分担他的困难与权势。无一提及皇帝的神圣权力。全体要求有陪审团的审判,信件的秘密,税收的现代化,法律的改革。贵族的“委托书”坚决要求在未来的三级会议中,每一阶级必须各别开会与投票,并且任一措施不得成为法律,除非受到三个阶级全部批准。牧师的“委托书”要求终止信仰异教自由,并且要求教育受教会完全与独占的控制。第三阶级的“委托书”,以不同语势表达,农民需要减税,废除农奴与封建税,普及免费教育,保护农田不受君主狩猎与动物的破坏;并且中等阶级希望事业开放给有才的人而不计其身世,终止过境费,为著对贵族与教士税收的增加;有些建议国王应以没收并出售教会财产以消除财政赤字。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之轮廓已经显示于这些报告中了。

国王对他公民谦逊的要求,有显著的不公平。巴黎以外任何缴过税的人有投票资格,在巴黎仅那些缴过通行税六livres以上者可投票。也许国王与其朝臣不愿让50万名无裤党选民代表最有知识的首都出席三级会议;关于质对量,与以人数多寡决定所获的智力之民主政治的质与量的论题,出现在1793年宣布民主政治的大革命前夕。因此无裤党人离开合法的政治舞台,并且受到引诱,感觉只有经过他们伙伴的暴力,他们才能够表现出他们完整的愿望。人们已经知道,他们将复仇。1789年他们占领巴士底狱;1792年他们废除皇帝;1793年他们组织法国的政府。

## 第二章 国民会议

(公元 1789 年 5 月 4 日—1791 年 9 月 30 日)

### 第一节 三级会议

5 月 4 日，第三阶级的 621 位代表，穿着资产阶级的黑色服装，后边跟着 285 位贵族，戴着羽饰的帽子和穿着镶边与金色的服装，接着为 308 位教士——职位高的教士着紫色袍子以区别他们的身份——然后为国王的阁员与他的家属，最后为路易十六与安托瓦妮特，全部由军队护随并以旗帜与乐队开道，走向指定的会议地点，距凡尔赛皇宫不远处的 Hôtel des Menus Plaisirs 大厦 (Minor Diversions 的会堂)。一群欢欣鼓舞的群众立于行列两侧，有些因高兴与希望而流泪了，<sup>①</sup>在那敌对阶层团结中看到仁慈的国王领导下的和谐与公正的保证。

路易向集合的代表演讲有关濒临破产的情形，他归因于“花钱而光荣的战争”；他要求他们设计并批准增加国家收入的新方法。内克尔继续作 3 小时的统计说明，这甚至使革命无光彩。次日，这个联合消失了；教士聚集在毗邻的较小厅堂内，贵族则在另一处，他们觉得，每一阶级，像在 175 年以前召开的最近一次

三级会议一样，应分开讨论与投票；并且未经每一阶级与国王同意，任何提案不应变成法律。让集合代表个别投票来决定，结果是将所有一切权利让与第三阶级；很明显有许多较穷的教士愿意袒护平民，有些贵族——拉斐德、奥尔良与赖古德（de La Rochefoucauld-Liancourt）公爵——危险地怀着自由主义的情操。

一场长期神经战因之发生。第三阶级可以延缓需由他们核准以获得大众同意之新税收，然而国王却焦急地等待着新税收。人民所具有的是年轻、活力、雄辩、与决心。黎奎狄（Riqueti）、米拉博（Mirabeau）伯爵，带给他们他的经验与勇气，以及他的思想与声音之力量；内穆尔（Nemours）提供他的重农主义的经济学知识；穆尼耶（Mounier）与巴纳（Antoine Barnave）带给他们法律知识与策略；巴伊（Jean Bailly），已经是一位成名天文学家，以他的冷静判断缓和他们激动之商议；并且罗伯斯比尔用永续的热情表示一个人将不缄默，直到他随心所欲为止。

1758年出生在阿拉斯（Arras）的罗伯斯比尔，现在只有5年可活，但是大部分时间，他在事件中心点或附近行动。他的母亲在他7岁时去世；他的父亲在德国失踪；剩下的4个孤儿由亲戚扶养长大。罗伯斯比尔赢得巴黎路易（Louis-le-Grand）学院的奖学金，取到他的法律学位，在阿拉斯开业，并且因为他鼓吹改革博得美名，以致使他成为那些从Artois省派至三级会议其中之一人。

他的容貌不利于他的演说术。他仅有5英尺3英寸高——他的唯一优点是精干。他的面孔宽阔而扁平，并留有天花的麻子；他的眼睛视力差，戴着浅蓝色的眼镜，以致给予卡莱尔（Carlyle, Thomas）一些理由称他为“海绿色的罗伯斯比尔。”他拥护民主政治，并保护男性投票权，不顾及警告此举会使最低层的人成为统治者和一切之标准。他生活像低层社会的平民一样简单，但是他不模仿穿裤子的无裤党；他穿着整洁的深蓝色燕尾服，及膝的马



裤，与丝制的裤子；在他盛装与擦发粉前，他很少外出。他与木匠迪普莱（Maurice Duplay）同住在 St. Honore 街上；他在家中用膳，并且靠他 18 法郎一天之代表的报酬过活。不久他从那尘世最低处迁至巴黎最高级处，随后至法国最高级处。他很多次谈论道德，但是，他也实行了它；公开的他是严肃而冷酷，而在私人关系上却是慷慨、热情，并且极愿为人服务；博纳罗蒂（Filippo Buonarrotti）十分了解他。<sup>④</sup>他似乎很能控制自己，不受女人的魅力所诱惑；他将他的感情放在他的弟弟奥古斯丁（Augustin）与圣朱斯特（Saint-Just）身上；无人会指责他的性道德；金钱的礼物不能收买他。在 1791 年的巴黎沙龙画展中，一位艺术家展出一幅他的画像，简单地标上“不能收买的”几个字，<sup>⑤</sup>似乎也无人批评过这个名词。他以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观念，视道德为一个成功的共和国不可缺少的基础；没有不能收买的投票者与官员的民主政治将是废品。他赞同卢梭认为人生而善良，以及“民众的意愿应是国家的法律，任何人固执地反对大众的意志无疑应判死罪”。他赞同卢梭的看法，某些宗教信仰对心境的平静、社会秩序、以及国家的安全和生存是不可缺少的。

一直到他生命接近终点时，他似乎并不怀疑他对民众意志判断之正确性。他的精神比他的意志薄弱；大多数他的想法来自他的阅读，或来自充满革命气氛的标语；他死得太早，因而未获得足够的人生经验或历史知识，未以耐心的观察或公正的见解遏止他的抽象或凡俗观念。他严重地忍受着我们共同的失败——他不能将他的自大从他的眼中除去。他表现的热诚使他自己信服；他过分自信和虚荣。“那个人，”米拉博说道，“将来大有希望；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切。”<sup>⑥</sup>他走向断头台。

在国民会议的 2 年半时间中，罗伯斯比尔作了大约 500 次演讲，<sup>⑦</sup>一般都太长而不能令人信服，并且过于诡辩而不够典雅；但是巴黎的群众，了解它们的要旨，因为它们而喜欢了他。他反对

宗教或种族歧视，建议解放黑奴，<sup>⑥</sup>并且成为人民的护民官与保护者，直到他最后的1个月。他接受私有财产制度，但希望普及小规模企业成为坚强民主政治之经济基石。他称财富不均等为“必然与无法医治的疾病”，<sup>⑦</sup>根源于人类之天赋不平等。在这期间，他支持适当约束的君主政治；企图推翻路易十六，他认为将导致混乱与流血，以致终于比国王更专横的独裁政治。<sup>⑧</sup>

几乎所有的代表都不耐烦听这位年轻的演讲家演讲，但米拉博例外，他注意罗伯斯比尔论证的仔细准备与说明。在另一方面，<sup>⑨</sup>我们观察到米拉博生长在显赫而残酷的父亲之下的痛苦，贪婪地吸取在旅行、冒险、与罪恶中每一可用之人生经验；了解人类的弱点、不公平、贫穷，并且在十几个城市中遭到困苦；他的父亲要求国王将他关入监狱，由于他诽谤的小册子或热烈呼吁使他的政敌受辱。最后，以压倒性的胜利，被马赛与艾克斯昂（Aix-en）省的第三阶层选入三级会议之时，来到巴黎成为最著名、出色、与受猜疑的人物之一；并且在国家的危机正在唤起智者为历史上少有。所有巴黎知识分子欢迎他；人们站在窗边看到他的马车通过；女人因他的桃色事件而为之兴奋，因他脸上的疤痕与变形吓得不愉快。代表被他的演讲迷住了，虽然他们怀疑他的阶级、他的道德、他的理想。他们听说他生活超越规范，喝酒无节制，而且并未超过以出售口才抵销他债务的阶段，但是，他们了解他为保护老百姓而严责他的阶层，他们佩服他的勇气，并且怀疑他们在今后能否见到如此像火山般的精力。

在那些狂热的日子中有更多演讲，与更多从事政治运用的人超过巴黎 des Menus 旅馆所能容纳，并且它们充斥于杂志、小册子、以及会社上。一些来自布里塔尼（Brittany）的代表组成不列颠会社（Club Breton）；不久它开放它的会员资格给其他代表，与其他有口才者与善用笔者；西哀士、罗伯斯比尔、与米拉博使它成为他们理想与计划的探测板与试验处；此处是那强有力组织的

第一种形态，其后被称为雅各宾党。互助会之分会是积极的，通常也袒护君主立宪政治；但是无秘密互助会阴谋的证据。<sup>19</sup>

也许是在布里顿会社中，西宸士与其他人士计划一项策略使贵族与教士参与第三阶级的联合行动。西宸士提醒民众，它包括法国 2500 万人中的 2400 万；为何它必须长久地迟疑才为法国说话？6 月 16 日他建议在 des Menus Plaisirs 旅馆的代表应该肯定地邀请其他阶级参加，如果，他们拒绝，第三阶级的代表应宣布他们自己为法国的代表，并且着手制定法律。米拉博反对三级会议受国王召唤，在法律上受制于他，并且可合法地随意被他解散；第一次他被大声喝倒彩。经过一晚的辩论与有形的争斗，这论题被提出表决：“这会议将宣布它自己为国民会议吗？”490 票赞成，90 票反对。代表们自己宣誓完成立宪政体。政治上，大革命开始于 1789 年 6 月 17 日。

两天之后，教士阶级单独集会，149 对 137 票同意与第三阶级合并；较低层的教士与它相识和服务过的平民共患难。受到这一背弃的震惊，教士们联合贵族请求国王阻止阶级合并，如有必要解散三级会议。路易答应要求，6 月 19 日晚上，即命令 des Menus Plaisirs 旅馆立刻关闭，以容许它为 3 个阶级在 6 月 22 日举行的“皇室会议”准备座位。当第三阶级代表于 20 日到达时，他们发现门锁着。相信国王有意要解散他们，他们聚集在附近的一个网球场 (Salle du Jeu de Paume)；穆尼耶建议集合在那里的 557 位代表，每一位应该签一项誓约，“永远不分散，并且在情况可能需要的任何地方集会，一直到宪法被牢固地建立为止。”除其中一位以外，代表们全部在这一历史性场合宣誓，不久雅克·路易大卫 (Jacques-Louis David) 将其描述于一幅代表那时代的重要绘画之中。从那时起国民会议 (National Assembly) 也是立宪会议 (Constituent Assembly)。

延搁 1 天，皇室会议于 6 月 23 日召开。国王令一名助理，代

表他向联合会议宣读一项声明，表示他确信如无贵族与教会的保护，他将陷于政治无能。他以不合法为由拒绝第三阶级代表国家的声明。他答应终止徭役、逮捕令、内陆运输通行税、与所有法国农奴的形迹；但是他否决任何有损于“财产之……古代与宪法的权力，或者前两个阶级之荣誉特权”的建议。如较高阶级同意，他保证税收相等。有关宗教或教会事务必须获得教士的批准，并且他以重申绝对君主政治作结语：

如果，因为一个绝非我预料到的致命事件，你们将会弃我于此伟大而艰难工作，我将独自给予人民福利。我应独自视我自己为他们真正代表。……诸位先生，想想看，任何你们的计划没有我特别许可不能获得法律力量……诸位先生，我命令你们，立刻解散，并且明天早晨各按自己的阶级分开集会。<sup>①</sup>

国王，大部分贵族，与少数教士离开会堂。布雷泽侯爵（de Bréze），宣布国王的命令，会议室必须予以清理。巴伊，会议的主席，回答道，集会的人民不能接受如此一项命令，并且米拉博责备布雷泽“去告诉那些派你们来的人，我们顺着人民意愿来到这里，并且仅受军队逼迫才离开我们的地方。”<sup>②</sup>这不是绝对真实的，因他们受国王邀请而来，但是代表高喊“那是国民会议的意见”表示他们对此事的见识。当凡尔赛守卫部队企图进入会堂时，一群自由主义贵族，包括拉斐德，用他们已拔出的剑封住入口，国王询问应该做些什么，并且不耐烦地说道，“让他们留下。”

6月25日奥尔良公爵率领47位贵族加入国民会议；他们受到皇宫内外之狂热群众的欢迎，法国的卫兵在那里与革命群众友善地交往。同一天，首都本身发生一次和平的革命。巴黎区域选出的407人来为巴黎选举代表，聚集在市政厅并且任命一个新的

市政会议。皇室的会议缺少军队支持，和平的退位。6月27日，国王要内克尔对实际情况让步，命令较高阶级与胜利的国民会议合并。贵族听从，但拒绝参加投票，不久，他们之中有许多退出。

7月1日路易召集10个团，大多数为德国或瑞士人，前来援助他。7月10日，布国伊(Broglie)公爵率领6000人的军队占领凡尔赛，并且贝桑瓦尔男爵(Baron de Besenval)的1万人已掌握巴黎四周情势。在扰乱与恐怖之中，国民会议继续研究7月9日提出的新宪政报告。米拉博恳求代表保留国王做为对抗社会混乱与暴动的屏障。他描述路易十六为一位好心而有高洁观念的人，有时被浅见的顾问迷惑；并且他问道：

这些人研究过历史上任何人物，知道革命是如何开始并如何实行吗？他们发现何种致命的环境束缚，使最聪明的人逾越温和的界限，并且什么恐怖的刺激，使一些愤怒人民因过份注意他们一想到就战栗不安的事物吗？<sup>⑨</sup>

代表们遵照他的忠告，因为他们也感觉到来自巴黎人行道上的群众力量。但是路易不对第三阶级以实质上让步报答适度的忠贞，却再度免职内克尔(7月11日)，以皇后顽固的朋友布勒特伊男爵(Breteuil)替换他，并且任命军人布罗伊为陆军部长，因而激怒激进派与自由派。危机将来临。

## 第二节 巴士底监狱

7月12日，德穆兰，耶稣会派的毕业生，跳上皇宫附近 de Foy 咖啡馆外的桌子，公然批评内克尔的免职与召进外国军队。“今晚德国人将进入巴黎屠杀居民”，他高喊着，并且要求他的听众武装他们自己。他们做到了，因为当他们闯入并控制藏置武器的市政厅时，新市政会议作很少的抵抗。武装的叛徒现在举着内克尔与奥尔良公爵的半身像，并以绿色帽章装饰他们的帽子，游行于街上；当这是可恨的阿图瓦 (d' Artois) 伯爵 (国王的弟弟) 的仆人与卫队所穿制服的颜色为大家所知悉时，绿色的帽章被用红、白与蓝——国家的颜色取代之。

畏惧紊乱的暴动、财产的破坏与财政的恐慌，银行家关闭了证券交易所，中产阶级组成他们自己的义勇军，成为拉斐德国家卫队的核心。然而一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为保护目前受害的中产阶级议会，以金钱资助民众反对君主政体，与成功地促成法国卫队转移贵族的情操至民主政治上。<sup>①</sup>7月13日群众改组；因新加入社会低层与贫民而扩大，它攻入 des Invalides 旅馆 (退役军人医院)，并且掳获 2.8 万枝步枪与一些大炮。贝桑瓦尔疑惧他的军队向人民射击，使他们闲散在郊区。武装的民众现在控制了首都。

它应该用它的武力做些什么？许多人建议攻击巴士底监狱。这个古老城堡，在巴黎东面，建于 1370 年，每年监禁令王室或贵族忿怒的重要受害者，通常由逮捕令 (Lettre de cachet) ——国王的秘密命令收监。在路易十六时极少数的罪犯被关在那里，现在仅剩 7 名；路易自己很少发布逮捕令，并且在 1784 年，他要求 1 名

建筑师提出毁掉此阴暗城堡的计划。<sup>⑤</sup>但是百姓们不了解这些；他们当它为扣留残忍专制政治受难者的地牢。

叛徒明显地无意在那个时候摧毁它；经一晚的体息后，他们在那将成为法国国庆日的7月14日向它集中。他们的目的是向典狱长要求准许他们进入，并占用传说堆集在那些城墙后的弹药与武器。到现在为止，他们仅有少量弹药，但是如没有更多的供应，他们的步枪与少数大炮就无法保护他们，免受贝桑瓦尔军队的攻击。然而，那些围墙——30英尺厚，100英尺高；塔内隐藏着大炮，并且有80英尺宽的城壕环绕——严密警戒着。加入群众的新市政会议，向要塞司令官提供寻求和平处理方案。

洛奈侯爵（Bernard-René Jordan, Marquis de Launay），我们敢说他是位有温和个性与受过高尚教育的人。<sup>⑥</sup>他有礼貌的接见代表。他们提出反叛者和平行动的保证，如果他能将大炮移离射击位置并命令他的114位士兵停止他们的射击。他同意了，并用午餐款待他的访客。另一委员收到相同请求，但是包围者高喊他们要军火，而非言辞。

当双方谈判时，一些聪明的工人爬进控制塔，并且放下两座吊桥。急切的进攻者越过那些吊桥冲入庭院；洛奈命令他们后退；他们拒绝；他的军队向他们射击。当法国卫队提出5门大炮开始摧毁城墙时，入侵者情况很惨。在此掩护下群众涌入监狱，并与军队作肉搏战；98名进攻者与1名卫兵被射死，但是群众的愤怒与数目俱增。洛奈试图投降，如果他的部下准许携带他们的武器安全离开的话。群众领袖予以拒绝。他因而屈服。胜利者又多杀6名士兵，释放7名罪犯，夺取弹药与武器，俘虏洛奈，并且胜利地游行至市政厅。在途中，一些群众恼怒于遭受的意外灾害，而将这位手足无措的贵族打死，割下他的头，并以长矛举着。Jacques de Flesselles，一位商人，带领选举人至错误的武器所在地，被杀于de Greve广场，他的头被割下加入游行队伍。

7月15日，各地区选举人选巴伊为巴黎市长，并且选拉斐德率领新的国家卫队，与高兴的无裤党人开始彻底摧毁巴士底狱。国王既害怕而又震惊，到国民会议宣布他已解散侵入凡尔赛与巴黎之军队。7月16日，贵族的会议劝告他由正离境的团队保护下离去，并向若干省的省会或外国宫廷寻求庇护。安托瓦妮特热烈的支持这项建议，并为旅行收拾她的珠宝与其他可携带之财物。<sup>⑧</sup>路易则在17日，重新召回内克尔，使得金融界与民众均为之喜悦。18日，国王抵达巴黎，在市政厅作短暂逗留，并且以大革命红—白—与蓝的帽章加在他的帽上表示他接受新市政会议与政治系统。回凡尔赛后，他拥抱他的妻子、他的妹妹、与孩子们，并告诉他们，“很高兴，可以不（再）流血了，我发誓绝不由我的命令再流一滴法国人的血。”<sup>⑨</sup>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带着他的妻妾，<sup>⑩</sup>并率领第一批移民离开法国。

### 第三节 马 拉

（公元1789年）

巴士底狱之占领不只是象征性行动与打击专制主义；它使国民会议不隶属国王在凡尔赛的军队，并且它使新的巴黎政府不受敌军支配，它十分不愿意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但它给予首都人民军火与武器，允许无产阶级力量作进一步发展。

它将新生的勇气与更多的读者给予更进一步鼓舞巴黎居民之杂志。《法国公报》(The Gazette de France)，《水星报》(Mercure de France)，与《巴黎杂志》(Journal de Paris)是旧有的报纸，并且具有同样水准；目前又出现卢斯塔洛(Loustalot)的《巴黎大革



命》(Les Révolutions de Paris) (1789年,7月17日)、布里索(Brisot)的《法国爱国者》(Le Patriote Français) (7月28日),马拉的《民众的友谊》(L' Ami du Peuple) (9月12日),德穆兰的《法国大革命》(Révolutions de France) (11月28日)……除了这些,每天还有成打小册子出版,乱用出版自由,增添新偶像,损毁旧名望,从毁谤(libel)这个字出自他们的小册子名称上(Libelles)我们可想像出他们的内容。

马拉是最极端、鲁莽、无情与有力的新人物。1743年5月24日,出生在瑞士的纳沙泰尔(Neuchâtel),他的母亲是瑞士人,而父亲则为萨丁尼亚人。他从未停止崇拜卢梭。他在波尔多与巴黎念医学,并在伦敦营业获得适度的成就(1765—1777年)。有关他在那里犯罪与荒唐之事,可能是受他的敌人捏造于新闻业者的放纵时期。<sup>②</sup>他接受由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授予的名誉学位——而这个,如约翰逊(Johnson)所说的,是“藉学位变得较为富有”。<sup>③</sup>马拉以英文写《奴隶的鍊子》(The Chain of Slavery),并在伦敦出版(1774年),激烈的指责欧洲政府与国王、贵族、以及教士共谋欺骗人民并使他们服从。1777年,他回到巴黎,在阿图瓦伯爵的马房做兽医工作,并升为伯爵卫队的内科医生。他赚取肺科与眼科专家的美名。他发表电、光、光学与火方面的论文;其中有些被翻译成德文;马拉认为它们将赋予他科学院会员资格。但是他对牛顿(Newton)的抨击使他受院士怀疑。

他是一个极为骄傲的人,因受连续疾病的困累而易感受刺激至极端忿怒情况。他的皮肤迸发难以治疗的皮肤炎,但他发现在温水浴盆中坐着或写字可暂时解除痛苦。<sup>④</sup>就他五英尺身高而言,他的头是太大了,并且一只眼睛高于另一只;一般人了解他喜独居。医生经常放他的血以减轻他的痛苦;在较稳静期间,他榨取他人金钱。他做事具有强烈毁灭的野心。“我仅用24小时中的2小时于睡眠……在3年中我未曾有过15分钟娱乐。”<sup>⑤</sup>1793年,也许

由于太多室内生活，他罹患肺部疾病。他觉得，科黛（Charlotte Corday）不知道他不久将离开人世。

他的个性因他的疾病受到损害。他虚荣之补偿，他脾气之发作，他伟大之幻想，他对内克尔、拉斐德与拉瓦锡之严厉批评，他发怒所招惹之群众暴动，掩盖他很多的勇气、勤勉与奉献。他的刊物之成功不仅是由于他的风格过份夸张，而且他对无选举权的无产阶级者仍有更多热心、坚毅与无报酬的支持。

他仍然不高估民众的才智。他见到暴动升高，就加入它。但是至少在目前，他不商讨民主政治，而是易遭罢免、暴动与暗杀的独裁政治，如同罗马共和时代一般。他暗示他自己将成为一个好的独裁者。<sup>④</sup>有时他认为政府应受有财产的人驾驭，因其与公共福利有最大利害关系。<sup>⑤</sup>他认财富集中为自然，但他建议用倡导侈奢的罪恶与饥饿及需要的神权抵消它。“只要还有人缺乏民主必需品，无任何剩余可合法属于他们……大多数教会财富应分配给穷人，并在各地设立免费公共学校。”<sup>⑥</sup>“社会亏欠它份子中那些没有财产者，以及其工作简直没满足他们的瞻养，固定维持生活之物，适当喂养、住宿与穿衣必需之金钱，照料疾病及年老者与抚养孩童之设备。那些财富者必须供给那些缺乏生活必需品者的需要”；否则穷人有权有武力取得任何他们所需的。<sup>⑦</sup>

大多数会议代表不信任并且害怕马拉，但是与他共同生活的无裤党人，因他的哲理而宽恕他的过失，并且当他被警察搜捕时，他们冒险隐藏他。他必然有一些可爱的德行，以致他的姘头挚爱地伴随他至他去世。

## 第四节 舍 弃

(公元 1789 年 8 月 4—5 日)

“这个国家”，Morris 省长于 1789 年 7 月 31 日在法国表示，“目前接近无政府状态正像社会可能接近瓦解边缘。”<sup>⑧</sup>控制市场的商人藉提高谷物价格获得利润。携带粮食的驳船于运送至城镇途中遭到攻击与抢夺；无秩序与不安全造成运输混乱。巴黎犯罪猖獗。乡村受制于掠夺的强盗，以致有几省的农民因他们“恐惧”这些不法的掠夺者而武装起来了；惊惶的老百姓在 6 个月内获得 40 万枝枪械。当大恐惧平息后，农民决定使用他们的武器反抗收税者、独占者与封建的地主。配备着毛瑟枪、草耙、大镰刀，他们攻击城堡，要求出示确实认可之领主权利与税收的地契或契约书；如果出示给他们，他们予以烧掉；如果被拒绝，他们烧毁城堡；好几个地方的堡主被当场杀死。这程序，开始于 1789 年 7 月，蔓延至法国每一部分。有些地方暴徒持着标语牌要求国王让他们有充分权力代表他们的区域。<sup>⑨</sup>愤怒中的破坏经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因此在莫巴赤 (Murbach) 修道院的田地上，农民烧掉房舍，带走餐具与亚麻布制品，拨开酒桶塞子，尽他们可能地喝，并让喝剩的流入沟中。有 8 个公社的居民侵入修道院，拿走地契，并且向修道士说明教士现在是受制于老百姓，在 Franche-Comté 省，一份给国民会议的报告中提到，“将近 40 个城堡与领主的邸宅被抢掠或烧毁，3/5 在朗格勒 (Langres)；27 个在多芬 (Dauphine)；所有维也诺斯 (Viennois) 区域的修道院；无数的贵族或富商被暗杀”。<sup>⑩</sup>尝试阻止这些“农民暴动”的城镇官员被免

职，也有些被斩首。贵族放弃他们的家园寻求其他安全处所。但是他们几乎到处都遭遇到相似的“自发性叛乱。”第二次移民浪潮开始。

1789年8月4日晚上，一位代表向在凡尔赛的国民会议报告：“来自各省的函件指出，各种财产却是大多数罪恶暴乱的牺牲品；在各地城堡被烧毁，修道院被摧毁，并且农场受到抢掠而荒废。税捐、封建税已不存在，法律没有权威，并且地方政府无权力。”<sup>⑧</sup>剩下的贵族觉察出大革命，他们希望限制于巴黎并藉少数派退让得以平静；现在已是全国性的了；并且封建税不能再被维持。诺瓦耶（Noailles）子爵建议：“所有的封建税是可赎回的……以货币支付或以公平价值折偿……徭役、奴隶制以及其他私人形式的劳役将被废除而无补偿”；并且，终止阶级豁免，“税捐应由每一在王国的人民按他所得比例缴付。”

诺瓦耶（Noailles）是贫穷的；并将受到这些十分痛苦措施的折磨，但是艾吉永（d' Aiguillon）公爵，最富有男爵之一，赞成这建议，并做了一项惊人的自白：“人民终于摆脱束缚他们好几世纪的枷锁了；我们必须承认虽然这个暴乱一定要谴责……在此暴乱中受害的老百姓是值得原谅的。”<sup>⑨</sup>此声言鼓动自由主义的贵族报以热烈支持；他们相互聚集提议放弃他们有疑问的特权。并且在数小时热心讨论之后，国民会议在8月5日清晨2时宣布解放农民。若干慎重的条款随后被加上，要求农民，用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费用以偿还定额的封建税；但是拒缴这些费用使他们募集之款不能实现，并且真正影响封建制度结束。至于“伟大舍弃”之国王签字，则订于第16条款中，宣布他今后为“法国自由之恢复者。”<sup>⑩</sup>

人道主义情操之浪潮长久持续足以产生另一次历史性的文件——人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1789年8月27日）。这是由拉斐德提议的，他们仍然热衷于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与美国几个州宣布的权利法案给他的概念。国民会议中较年青的贵族支持平等观念，因为他们苦于长子继承特权，而且有些像米拉博等人，含恨任意的监禁。资产阶级代表愤恨社会上贵族的唯我独尊，以及贵族垄断市政与军政之较高职位。几乎所有的议员已读过有关卢梭的全意志 (general will) 的理论，并且接受哲学家的哲理，按照自然定律基本权利属于每一个人。因此用一似乎是结束大革命的宣言冠于新宪法之前就毫不抗拒了。一些条款适于重述：

第 1 条 人天生具有自由与平等的权利……

第 2 条 所有政治结合的目标是人民、自然与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对压迫……

第 4 条 自由在于磊落地做不伤害他人的任何一切。因此除那些保证社会其他份子享有相同权利的人之外，每一个人之天赋权利的行使没有限制。这些限制仅为法律决定……

第 6 条 法律是民众意愿的表示。每一公民有权，个别的，或透过他的代表，参加它的组织，……所有公民，从法律观点来看是平等的，并且按照他们的能力均等地适于所有显爵以及所有公共职务与地位。

第 7 条 除了按照法律规定的情況与程序，无人将受到控告、逮捕、与监禁……

第 9 条 所有的人是无罪的，直到他们被宣判有罪为止，如果逮捕为不可缺少时，所有对拘束犯人不重要的严厉措施，将受法律严格禁止。

第 10 条 无人将因他的意见，包括他的宗教看法，受到骚扰，但他们的政见发表应不干扰到法律建立的公

共秩序。

第 11 条 思想与见解之自由交流是最珍贵人权之一。因而每一公民可自由地说话、写作、与出版。但是对按照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因此滥用应负责任。

第 17 条 因为财产是不可侵犯与神圣的权利，今后除了法律上决定的公共需要之情况，以及所有者已经预先与公平地得到赔偿之条件下，无人将受到剥夺。<sup>④</sup>

甚至在这民主理想的主张中，一些缺点依然存在。奴隶制度允许留在法国加勒比海殖民地，一直到 1794 年的国民公会才予以废止。新宪法限制最低定额付税者之投票权，与公职适任资格。公民权利仍然不肯给予演员、新教徒、与犹太人。路易十六拒绝同意这宣言乃基于它可能惹起更多动荡局面与无秩序之故。这有待巴黎民众强迫他同意了。

## 第五节 赴凡尔赛

(公元 1789 年 10 月 5 日)

在 8、9 两个月，巴黎仍有暴动。面包的供应再度缺乏，主妇们在面包店为它而争斗。在一次暴动中，一位面包师傅与一位市府官员被愤怒的民众杀死。马拉要求向国民会议与凡尔赛皇宫进发：

当公共安全处于危险时，人民必须将它的权力从那些被托付人的手中取回……将那奥地利女人（皇后）与

她的内弟阿图瓦关入监狱……逮捕部长与他的属员并加以监禁……查清市长（可怜、和蔼、耽于幻想的巴伊）与他的助理……不让这位将军（拉斐德）远离，并且逮捕他的部下……王位的继承人无法供应你们所需的面包。组织已武装的人民。前进到国民会议并且逮捕他的部下……王位的继承人无法供应你们所要的面包。组织武装的人民团体。前进至国民会议并且立即要求给予食物……要求这国家的穷人有一个保证他们受国家的捐献之外的将来。如果你们拒绝加入军队，取得土地与黄金，那些恶棍想藉严重的饥饿强迫你们获致协议，并且与你们分享它；割下部长与他们部下的头，现在正是时候。 ⑤

由于畏惧在巴黎的新闻与混乱与凡尔赛的群众示威，路易再采纳他的部长建议——士兵尚未接触革命思想者应召入保护他、他的家庭与皇后。9月下旬，他派人到杜埃（Douai）召回佛兰德（Flanders）军团。它来了，并于10月11日，国王的卫队在皇宫歌剧院以盛宴欢迎。当路易与玛丽·安托瓦妮特出现时，军队在半醉半醒之际，突然发出狂热的欢呼。随即将他们制服上的三色国家徽章以皇后色——白与黑的帽章取代；一份报告说到这些被抛弃的颜色，当时是大革命所珍视的颜色，随即被践踏在舞动的双脚下。⑥（Campan夫人，内宫的第一夫人，并且是一位目击者，否认这一事实。⑦）

这则故事传到巴黎后被夸大，一项报导特别指出一支军队在梅斯（Metz）附近聚集，企图进军凡尔赛并解散国民会议。米拉博与其他代表公开批评这个新的军事威胁。马拉、卢斯塔洛与其他新闻记者要求人民应该将皇室的家族与国民会议移至巴黎，在那里他们可能就置于民众小心的监视之下。10月5日，市镇市场中

的妇女，首先知道食物缺乏，领先组队向 40 英里外的凡尔赛进军。当他们继续进行时，他们召请上千的男女加入。这不是一次悲剧或悲伤的行列；一则轻松的法国幽默加添了一些趣味：“我们将召回面包师傅与面包师傅的妻子，”他们喊道：“听从米拉博，将是我们的荣誉。”<sup>④</sup>

在大雨倾盆之下到达凡尔赛，他们聚集 8000 多人，整齐的站在皇宫的高门与铁栅前，要求晋见国王。一组代表到国民会议要求代表为群众找到足够粮食。Moanier，当时为主席。由一位美丽的代表 Louison Chabry，相随晋见路易。见到他时，她激动得以致噎住了，仅能叫出一声“痛”就昏了过去。当她醒来后，路易保证替既湿又饿的群众找到面包。在离去时，她想吻他的手，但他却像父亲般的拥抱她；此外，许多媚人的巴黎女人与法兰米斯（Flemish）军队混在一起，并且使他们确信坤士不向无武装女人射击；几名士兵带着饥饿的妇女进入他们的军营，并给予她们食物与温暖。拉斐德带领 1.5 万名国家卫队于那天晚上 11 点到达。他受到国王接见，并要求他的保护，但是他却加入内克尔，劝告国王接受人民的要求，他与皇后应该住在巴黎。然后，他筋疲力竭地回到诺艾（de Noailles）旅馆。

10 月 6 日清晨，疲倦而饥饿的群众藉着一个机会涌入皇宫的庭院，一些持械的人民闯至通往皇后寝宫的楼梯上。她穿着衬裙，抱着皇太子，逃入国王的卧室。皇宫的卫队抗拒侵入，他们之中 3 名被射杀。拉法埃脱迟到但很有帮助，以温和的保证使暴动得以平息。国王走上阳台，保证迁回巴黎。群众高呼“国王万岁！”但是要求皇后露面。她做到了，站立在一旁，这时有一人用滑膛枪瞄准她；他的枪被那些接近他的人打落。拉法埃脱趋近玛丽·安托瓦妮特，并且吻她的手以示忠贞；软化的暴徒发誓敬爱皇后，如果她愿到首都居住的话。

将近中午，一个史无前例的行列组成了：最前面为国家卫队



与皇室的卫队；接着为载着国王，他的姊姊伊丽莎白夫人、皇后与她的两个孩子的马车；接着为一长列装载或带面粉的二轮货运马车；接着为胜利的巴黎人，有些妇女坐在大炮上，有些男人用长矛高举被杀的皇宫卫士之头颅；在塞夫尔（Sèvres），他们停下将这些头予以粉饰与卷发。<sup>9</sup>皇后怀疑她是否可活着回到巴黎，那晚她与其他皇室家族睡在图勒里宫，草率准备就寝。几天后国民会议的代表随后来，并且也住在图勒里宫的戏院里。

巴黎的民众迫使国王采取行动再度掌握大革命。现在，国王受制于他的人民，他接受人权宣言为既成事实。第三次移民浪潮因而开始。

## 第六节 革命的宪政

（公元 1790 年）

虽未遭皇室的反对，但对这个城市充满着密探而机陞不安的国民会议，即着手撰写宪法，载明并认可大革命的成就。

首先，王位应予保留吗？那是当然的；并且允许它是世袭的，因为它担心直到合法与忠贞的情操从君主政体转移至国家为止，这股令人神往的王者之气仍将是维系社会秩序所不可少的；并且继承权将防止继位战争与当时酝酿在王宫的某些阴谋。但是国王的权力被严格地限制了。国民议会为他的支出每年表决他的“公民名册”（Civil list）；任何过度支出须向立法机关申请。如他未获国民会议准许而离开王国，他可能被罢黜，这点他不久就体会到了。他可任免他的部长，每位部长须遵照要求提呈一份处置他所分配到的金钱之月报，并且随时接受高等法院传讯。国王统率陆

军与海军，但是，无立法机构事先同意，他不能对外宣战，或签订条约。他有权否决任一向他提呈的法案；但是如果被否决的法案经立法机构连续三读通过，该法案即可成为法律。

立法机构，如此崇高，像英国与美国的一样应有两个议院吗？“上院”（Upper Chamber）可能是仓促行动的遏制者，但是也可能成为君主政治或老年的棱堡。国民会议，未接受它，并为防患未然，除国王的以外，宣布终止所有继承权与爵位。选举立法机构的是“积极公民”——付过相当于3天工作报酬所得税之成年男性财产持有人；这包括富有的农民，但不包括受雇用的劳工、演员与无产阶级者；这些人被归类为“消极公民，”因为他们可能容易被他们的主人或他们的记者操纵而变成反动或暴动的工具。照此安排，到了1791年，（在2500万人口中）有429.86万人在法国享有投票权；有300万成年男子无投票权。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害怕城市的民众，就证明此为资产阶级的大革命。

为了选举与行政上的目的，宪法划分法国成为85省（départments），每一省又分成若干区（4,336万）。这是法国首次成为统一的国家，无特权的省或内陆过境费，并且全部使用一种度量衡与法律制度。惩罚标准由法律决定，而不再受法官随意决定。拷问、上颈手枷示众与打火印被废止，但死刑仍保留，以适应罗伯斯比尔目前的不满与将来的便利。受控诉之罪犯可以选择抽签选出的“积极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审判。12人中只要3人通过就可以定罪。民事案件由法官判决。旧的法务院（Parlement），因其产生第二个君主政治，被民选的国民会议指定以新的司法部代替。每省两位高等法官是从下级法院的法官中抽签选定的。

两个重大与有关连的论题保留着：如何避免破产与如何调整教会与政府的关系。税收无法提供政府足够资金，并且教会持有令人羡慕而不必付税的财富。它采取最近任命的奥坦（Autun）主教，达雷杭提出（1789年10月11日）之办法：让教会财产用于

支付国家债务。

塔列朗是历史上加倍迷人的人物之一。他出身于一军事杰出的旧式家庭，如果他不是在4岁时因跌倒而永远使他一脚脱臼，他可能会从事相同的事业；他必须一生跛行。而且要设法克服每一障碍。他的父母将他交给教会。在神学校他阅读伏尔泰与孟德斯鸠的作品，并且在附近养了一位情妇。(1775年)他显然遭到逐门，但在那年(他21岁)他从路易十六获得入赖姆斯(Reims)的St. Denis修道院。1779年他被任命为牧师，随即他成为他伯父赖姆斯大主教的代理主教。他继续取悦出身名门的妇女；由她们中的一位他获得一子，日后成为拿破仑(Napoleon)麾下的一名军官。1788年，达雷杭被任命为奥坦主教，未受他虔诚母亲的反对，她了解他是一个少有信仰的人。然而他替国民会议拟定改革计划，深深地打动他的教士们，以致使他成为他们的代表。<sup>⑥</sup>

不顾牧师们极力反对。国民会议(1789年11月2日)以508对346票，议决使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当时估计为30亿法郎(francs)。<sup>⑦</sup>它请求政府“为民众的礼拜支出、部长的生活费用、穷人的救济提供适当的办法。”12月19日，国民会议授权Caisse de l'Extraordinaire出售4亿法郎价值的“信用券”(assignats)——指定持有者有权得到一定金额教会财产的纸币，并且附有百分之五的利息，直到销售有效为止。藉着这些“信用券”之所得，政府偿还更多紧急的债务，因而确保金融界对新政权的支持。但是“信用券”的购买者发现难以得到满意的购买；它们被当做通货使用，并且因政府发行越来越多，而使通货膨胀继续下去。它们除付税外失去价值，而财政部被迫接受它们的面值。因此财政部发现亏损每年超过所得。

国民会议(1790年2月13日)采取断然的手段禁止修道院活动，给予无依靠修士生活津贴；<sup>⑧</sup>修女因执行教育与慈善方面有价值任务未受到伤害。7月12日“教士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 颁布实施, 规定教士为政府的官员, 并且承认天主教为国教。新教徒与犹太人可自由地在他们私人的教堂做礼拜, 但是无政府的资助。天主教的主教由各省民选的“议会”选出; 在此选举中非天主教选举人——新教徒、犹太人或不可知论者是自由地参加。<sup>⑧</sup>所有的教士, 接受政府薪金前, 必须发誓完全服从新宪法。在法国的 134 位主教中, 130 位拒绝宣誓; 在教区的 7 万教士中, 4.6 万名予以拒绝。<sup>⑨</sup>绝大多数民众站在不宣誓立场, 且联合抵制宣誓的教士之劳务。人民支持的保守教会, 与中上阶级支持的不可知论者间的冲突增加, 成为大革命衰微的主要因素。国王始终拒绝签署新宪法, 主要由于此立法失去民心。

其他人有拒绝的理由。罗伯斯比尔领导一强有力的少数党, 抗议限制财产持有者之选举权违背人权宣言, 而且侮辱一再保全国民会议免受国王军队压制之巴黎无产阶级。农民与市民一致愤慨废弃若干政府法规: 规定保护“自由市场”生产者与消费者不受分配者操纵的措施。

然而国民会议感到, 宪法是不平常的文件, 给予胜利的大革命合法与确定的形式, 是有些道理的。目前崇高的中阶层代表, 认为民众——大多数仍为无知的——是不愿按人数比例参与政府的审议与决定的。此外, 贵族已逃亡, 现在不是轮到资产阶级乘管理一个逐渐依赖智慧处理与经济有力进步的国家的时机吗? 因此, 国民会议不顾国王的踌躇, 宣布法国为一君主立宪的政体; 并且, 在 1790 年 6 月 5 日, 它邀请 83 省派遣他们联邦的卫队参加巴黎人民与法国政府在练兵场庆祝占领巴士底狱周年纪念——大革命的成就。当邀请与热诚散布后, 30 名外国人, 由一被称为克洛茨 (Anacharsis Cloots) \* 的富有德国人率领, 于 6 月 19 日进入国民

---

\* Jean-Baptiste du Val-de-Grace 男爵的绰号得自当时 Barthelemy 修道院附近的著名浪漫史中的人物。

会议，并且要求给予法国公民荣誉，与允许进入这如同“人类种族的大使馆”（embassy of the human race）的联合庆典。它是如此地命令的。

为了此场合，这多丘的练兵场必须加以修饰：一块 30 英尺宽 10 英尺长的地方需要弄平坦与构筑台地，以容纳 30 万男人、女人与小孩；并且一个中央土墩需要提高，成为一座圣坛，可让国王、王妃、高级教士、国民会议代表与民众登上表达他们效忠目前合法再生的国家。然而只剩 15 天来从事修饰工作了。现在谁能媲美卡莱尔的第 14 页<sup>⑥</sup>描写巴黎人民、男女老幼如何携带锄头与铲子以及手推车，并高唱“它将要去！”（Caira）——整平那片广阔的地带，建立那些台地与那祖国的祭坛吗？当今我们之中有那些人敢如此大胆的写作关于词藻华美的称赞与先知者的狂喜——特别如果有半数的手稿被草率的仆人烧掉，同时我们必需再度收集与擦亮散乱的珠宝吗？在那位冷酷的苏格兰人心中潜伏着何等热情，才能幸存于如此大规模破坏！

因此，在此新节日前 1 星期，士兵们由法国各地来到巴黎，并且有时候巴黎的国家卫队行进到数英里外去迎接他们。1790 年 7 月 14 日，他们都以骄傲的行列进入练兵广场，总数达到 5 万，<sup>⑦</sup>他们的旗帜飘扬，他们的乐队演奏着，他们的喉咙唱出有力的歌声，并且有 30 万高尚的巴黎人加入。主教塔列朗，尚未被逐出教会，主持弥撒仪式；200 名高职位的教士与牧师登上祭坛并接受誓约；国王自己发誓尽其可能遵从新法律，并且所有的集会的群众高呼“国王万岁！”当礼炮声起，成千未能参加的巴黎人举手向着练兵场，并且宣誓。每一城镇都有类似的活动，并以酒与食物分给人民，而且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牧师拥抱就像他们都是基督徒。一个法国人如何能怀疑到辉煌的新世纪已经没落呢？

## 第七节 米拉博偿还债务

一个男人，至少，会怀疑，况且一个女人。对于路易与皇后，图勒里宫似乎是一暖房，在该处他们的每一行动受制于民众的默许或责难。1790年8月31日，国王在南锡的瑞士团队因薪饷迟误与官员暴虐而叛变。一些叛徒被国家卫队射杀；一些被处罚作划船苦工；一些被处绞刑。得知这消息，4万巴黎群众气势汹汹地向皇宫聚集，抨击拉斐德，谴责国王的“南锡屠杀”，并且要求他的部长辞职。(1790年9月18日)内克尔静静地离去，与其家属住在科佩(Coppet)，接近日内瓦湖(Lake Geneva)。拉法埃脱建议国王接受宪法使巴黎平静。<sup>①</sup>然而，皇后怀疑这位将军策划取代他的王权，因此非常明显地表示她的反感，以致使他离宫并委托米拉博挽救君主政体。<sup>②</sup>

米拉博十分愿意。他需要金钱支持他无节制的生活方式；他觉得国王与国民会议的联合是唯一可供选择控制暴民的方法；并且他看出采取这项政策与补充他的财源并无抵触。远至1789年9月28日，他曾写给他的朋友 La Marck \*：“一切将失去。国王与皇后将被除去，而你将看到民众在他们无望的躯体前显露着狂喜。”<sup>③</sup>10月7日，他写给同一位朋友：“如果你对国王与皇后有任何影响力，说服他们，如果皇室的家族不住在巴黎他们法国将失败。我正忙于计划让他们逃走。”<sup>④</sup>路易拒绝这个计划，但他同意给

---

\* Auguste de la Marck 伯爵 (1753—1833)，并非生物学家拉马克 (Jean-Baptiste de Monet, Chevalier de Lamarck) (1744—1829)。

予米拉博金钱保卫这个君主政体。1790年，5月初，他同意付这位伟大冒险者债务，给予他美金1000元1个月，并且奖赏他美金19.2万元，如他能使国王与国民会议和解。<sup>⑤</sup>八月皇后在圣克劳德(St. Cloud)花园单独接见他。皇后仪态万千，雍容华贵，当这位叛变的魔王吻她的手时，他因虔敬而战栗。写给他知己的信上他更是心醉神迷地描述她：“你不了解皇后，她内心的力量是无比巨大。她是属于一个有勇气的女人。”<sup>⑥</sup>

他认为他自己是“支付而非获得”；按照 La Marck 看法，“他接受报酬是为他自己的信念。”<sup>⑦</sup>他无意保护专制主义；相反地，在他1790年12月23日向国王的部长提呈声明书，是一项使民众自由与皇室权力和谐的计划：“直接打击大革命将无法射中目标，因这使许多人有一较好法律的行动值得支持……革命的精神与宪法中许多的要素必须加以接受……我关切所有大革命的影响……因为有如此不易变动的胜利以致除了分割王国以外无动乱可摧毁他们。”<sup>⑧</sup>

他藉热诚与贿赂挽救残余的王权。国民会议怀疑他唯利是图，但却佩服他的天才。1791年1月4日，国民会议选他为通常以两周为期的会议之主席。他有条理的管理与公平的决定使他们都惊奇。他整天工作，整晚吃喝，并藉女人使他自己精疲力竭。3月25日，他又与两名歌剧院的舞女作乐。次日清晨他患了剧烈的腹部绞痛。27日他出席国民会议，但却疲惫而颤抖的回到他的房间。他生病的消息立刻传遍巴黎；戏院关闭以示对他尊敬；民众包围他的住处想知道他的情况；一位年青人志愿输血。<sup>⑨</sup>塔列朗告诉他：“见到你真不容易；一半的巴黎都永远在你的门外。”<sup>⑩</sup>许多痛苦折磨后，米拉博死于1791年4月2日。

4月3日，一些巴黎选举人的代表要求国民会议将 St.-Geneviève 教堂改成为法国英雄的祠堂与坟墓，并且在这不久即被称为万神庙(Panthéon) (“属于众神的”)之前安置“一位被祖国

感恩的伟大人物”的碑文。这被做到。并于4月4日在米舍莱(Michelet Jules)所称的“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大与最著名的送殡行列”之后，米拉博埋葬在那里；<sup>⑧</sup>一位历史学家估计群众在30万至40万之间——在街上与树上；在窗边与屋顶上；整个国民会议除了佩蒂翁(Pétion)。(他有米拉博接受国王金钱的秘密证据)；所有雅各宾党人；2万名国家卫队；“有人会以为他们在移送伏尔泰的遗骨——一位永生不死的人。”<sup>⑨</sup>1792年8月10日，从被推翻的国王之文件中找到给米拉博金钱的证据，并在1794年9月22日，国民会议命令将失去光辉的英雄之遗体移出万神庙。

## 第八节 赴克伦

(公元1791年6月20日)

国王，不愿让贵族、教士，与君主政体屈服在他们腐蚀的古老权威上，并且确信民众如此个人主义与轻举妄动的以致法国人将无法规可遵从，无可约束的限制，无法迎合时代，乐观地固守着仅有的萎缩权力，并且拒绝贵族与皇后每日敦促逃离巴黎或许法国，然后带回一支军队，本国或外国的，其壮大足以重建他有力的君权。(1791年1月11日)他签署“教士法”，但是他感觉他出卖了他的信心，那是他生命中遭受挫折后之珍贵的避难处。他震惊于(1791年5月30日)议会的决定让伏尔泰的遗体移入万神庙；他似乎无法忍受这世纪中最无宗教信仰的人被洋洋得意地抬入并光荣地置于曾是一神圣的教堂。他拒绝同意皇后逃离边界。她的忠实朋友，Axel Von Ferson伯爵，为她逃亡筹款，并安排细节；国王，无疑为一位正人君子，而不可能为一懦夫，热诚地向他致



谢。<sup>⑨</sup>

全世界都知道那则故事；国王与皇后如何假扮 Korff 先生与太太，带着他们的孩子与仆人，于 1791 年 6 月 20 日—21 日的午夜，静悄悄离开图勒里宫，并且怀着欢欣而害怕的心情，于次日行进 150 英里到达瓦雷纳（Varennes），接近现在比利时（当时奥地利的荷兰）的边境；他们被阻止在那里，并且被 Ste-Menehould 的邮政局长，德鲁埃（Jean-Baptiste Drouet）率领的农民以草耙与棍棒武器予以逮捕。他派人至议会请求处理；巴纳与佩蒂翁立刻前来处理：带着你的俘虏，不得加以伤害，回到巴黎。现在这是 5 天车路，由 6000 名国民卫队缓慢引导。在途中巴纳与皇后相对坐在王家的驿车中；他具有旧时政治制度残留的骑士精神；他觉得这位皇室美人是在灾难中。他不知道她的命运将如何。在到达巴黎前他是她的奴隶。

经过他的努力与其他仔细的考虑，国民会议拒绝无人要求立刻加以处置。在无政府情况下，谁能知道什么事接着会发生呢？资产阶级的议会，与所有的财产，能受无选举权的巴黎民众掌握吗？因此话传了出去，国王未曾逃亡而是被拐走；他的性命至少可保留一会儿，可能新的法律留给他较多的王权。雅各宾党的领袖抗议；会社与报纸号召民众聚集在练兵广场；1791 年 7 月 17 日，5 万人来到，并且 6000 人签名要求国王退位。<sup>⑩</sup>国民会议要求拉法埃脱国家卫队驱散暴徒；这些被拒绝，并且其中一些暴徒用石头投向国家卫队；愤怒的兵士开枪射击，射杀 50 名男女；因而终止 1 年前保证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马拉被警察逮捕并剥夺人权，生活在一阴湿的地窖里，并且计划一个新的革命。拉斐德，他的名声毁灭，并且回到前线，耐心地等候机会逃离混乱日增的法国。

国王，非常感激缓刑，并于 1791 年 9 月 30 日，以被征服的姿态到国民会议正式签署新宪法。回到他凄凉的王宫后，他瘫痪

了且泪流满面，并且恳求皇后宽恕他将她幸福的维也纳生活转为失败的耻辱，而且还加上监禁的恐怖。

接近这个月底时，国民会议准备结束他的工作。也许代表们已疲倦，并且觉得他们在一生中已做了许多事情。实在地，从他们的立场来说，他们有许多成就。他们承担封建制度的崩溃；他们废除继承的特权；他们将人民由君主的专制主义与懒惰、自大的贵族社会中拯救出来；他们建立法律前的平等，并且终止不审判而加监禁。他们再组织地方与省的行政部门。他们藉没收财富与宣布信仰与思想自由惩戒曾经独立自主与受批评的教会；他们报复卡拉斯 (Jean Calas) 与伏尔泰。他们愿意让保守派的贵族向外移民，并将中上阶层由政府控制。他们在宪法中具体表现这些变动，并赢得国王同意，以及民众的绝大多数，作为国家统一与和平的保证。

国民会议 (或立法会议 Constituent Assembly) 藉安排选举一个立法的会议，使宪法成为特别法，与深思考虑将来的问题，完成它的记录。罗伯斯比尔，希望新的投票带来较多权力上有代表性的人，说服其他代表取消新立法机构的选举。然后，在 1791 年 9 月 30 日，“所有政治性会议中最值得纪念的”<sup>69</sup> 宣布它解散了。

## 第三章 立法会议

(公元 1791 年 10 月 1 日—1792 年 9 月 20 日)

### 第一节 戏剧中的角色

第二个革命的国会之选举受到新闻业者热烈的旁听与会社有力的监督。因为新闻审查几乎已不存在，新闻业者获得对公共政策新的影响力。布里索、卢斯塔洛、马拉、德穆兰、弗雷罗(Féron)、拉克洛——每一个人有一份定期刊物。在 1790 年，仅巴黎一地已有 133 份杂志，并且还有成百的散布在各省。这些杂志几乎都走激进派路线。米拉博告诉国王如果他想保住他的王位或者他的性命，他必须收买一些有名的新闻记者。“老的贵族，”拿破仑说：“如其充分领悟而成为印刷工具的专家则能长远幸存……大炮的到来毁灭了封建制度；油墨将毁灭近代制度。”<sup>①</sup>

这些会社差不多有杂志同样的效用，随同国王与国民会议去巴黎的不列颠会社，改名为“宪法赞助者的学会”，并且将雅各宾党以前靠近图勒里宫的修道院餐厅作为聚会场所；不久扩大成为图书馆，甚至成为教堂。<sup>②</sup>雅各宾党分子，最初全是会议代表，但没多久即允许政治、文学、科学或商业方面杰出人士参加因而使

他们的会员增加；有些代表像罗伯斯比尔，自我排拒于新的会议之外，并且找寻另外的权力支点。会费很高，但是到1793年时大多数会员来自中阶层。<sup>③</sup>

雅各宾党的势力被附属会所的组织扩大至许多法国的最小地方行政区（Commune），并且母社的学说与教义最能被大众接受。1794年大约有6800个激进派会社，会员总数达到50万。<sup>④</sup>他们在无组织的群众中组成一个有组织的少数党。当他们的政策受到新闻界支持时，他们的势力仅次于最小地方行政区——经由他们市政会议与有选举权的团体，控制国家卫队的地方联队。当这些力量融合时，国民会议必须照他们意思来做，否则将面临武装起义或难以控制的场面。

1791年，一位在巴黎的英国人报导：“每一条街上都有很多会社”。<sup>⑤</sup>这些是文艺协会，体育协会，互助会的支会，工人集会。一些雅各宾党人发现他们的会社过分浪费与资产阶级化，因而在1790年组成“人类与公民支持者的会社，”不久巴黎人称其为科底尼（Cordelier）会社，因为它聚会于圣芳济修会早先的修道院中；这给予马拉、赫伯特（Hébert）、德穆兰、与丹东（Danton）的演讲坛。由于雅各宾党太过偏激，拉斐德、巴伊、塔列朗、拉瓦锡、谢尼埃（Cénier, Andre Marie-Joseph de, 法国诗人，1762—1794年），与内穆尔（Du Pont de Nemours）于1790年组成“1789年协会”，1790年开始在王宫召开会议，支持动摇的君主政体。另一君政团体，由巴纳与拉梅特（Alexandre de Lameth）领导，因聚会地点是西妥教团（Cistercian Order）的僧人修道院而定名为Feuillant 会社，几个废弃的修道院，现在成为政治运动中心。这是巴黎人迅速世俗主义化的讯号。

会社敌对的倾向指示出，在1791年6月至9月，收获不景气的期间，投票选举新的“议会”。勤王者，由于教育与安逸而变得柔弱，又依赖说服与行贿获得选票；市场与街道使雅各宾党人与

科底尼会社分子独立增强，他们藉武力增加行贿。他们利用法律禁止任何拒绝宣誓效忠新宪法的人投票；因此经验丰富的天主教徒，大多数都自动被排除。群众有组织的捣乱与驱散勤王者的集会，像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有些城市，像波尔多，市政当局禁止雅各宾党人以外其他所有会社集会；在某一城市，雅各宾党与他们的党羽烧毁一投票柜，因怀疑其隐匿大多数保守派的选票。<sup>⑧</sup>

尽管有些民主作风的整顿，此选举使立法会议（Legislative Assembly）获得一个赤诚保护君主政治的有势力的少数党。这264位保守派分子（Feuillants）占着大厅右面部分。136位代表，承认他们自己是雅各宾党人或科底尼会社分子，坐在左面高起部分被称为山岳党（the Mountain）。在议场中央的355位代表拒绝被标示，他们被称为平原党（the Plain）。755位中355位是律师，以致适合构成一立法团体；现在律师继承教士控制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议员都是中等阶级；革命仍然是一资产阶级的宴会。

1792年6月20日以前，立法机构中大多数的有力团体是以后所称的吉伦特党（Gironde）。他们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党（也不是山岳党），但是他们几乎全来自工业或商业活动的区域——卡昂、南特、里昂、里摩日（Limoges）、马赛、波尔多。这些工业与商业兴盛中心区的居民惯于自治；他们控制大多数财富、商业、王国的对外贸易；并且波尔多、吉伦特（Gironde）县之县府，骄傲地想到它曾培养出孟德斯鸠与蒙田（Montaigne）。几乎所有高位的吉伦特党人也是雅各宾党人，并且赞同其他大多数的雅各宾党人反对君主政体与教会；但是他们愤恨整个法国被巴黎及其民众管理，并且建议以自治省的联邦共和国代替之。

孔多塞（Condorcet）侯爵是他们的理论家、哲学家、教育、财

政与理想国的专家；我们一直有负于他。<sup>\*</sup>他们伟大的演讲家是韦尼奥（Pierre Vergniaud）；出生于里摩日，其父为一商人；离开一所神学校后，即专攻法律，并就业于波尔多，然后被派至立法会议。除此，有更多影响的是布里索，生长在沙特尔（Chartres），有些地方像冒险家，抽样调查欧洲与美国之职业、气候与道德规范样本，短期间被监禁于巴士底狱（1784年），黑奴协会（des Noirs Amis）的成立者（1788年），并且是热心的奴隶解放工作者。身为巴黎派至立法会议的代表，他负责外交政策，并引导国家走向战争之路。孔多塞介绍他与威格尼奥给斯塔埃尔夫人（de Stael）；他们变成她沙龙的忠诚随从，并帮助她的情人，纳尔博内（de Narbonne-Lara）伯爵，被路易十六任命为陆军部长。<sup>①</sup>有一段很长时期吉伦特党人被称为 Brissotins。

历史对罗兰（Jean-Marie Roland de La Platière）记载得较多，主要因为他娶了一位声名显赫的女人，她给予他思想与风格，蒙骗他，赞美他的记忆力，并且以一著名与传奇的判决使她走上断头台而为之尊贵。当25岁的玛农（Jeanne-Manon, Philipon），于1779年在鲁昂认识罗兰时，他已45岁，头发微秃，并因事业上的操劳及哲学上的深思而疲乏不堪。他有像父亲般的亲切微笑，并且倡导高贵的斯多噶哲学而迷住了玛农，她熟悉古代的文豪与英雄；她在8岁时即念过普鲁塔克（Plutarch）的作品，有时候在教堂里她以祈祷书取代了他：“普鲁塔克使我成为一共和主义者。”<sup>②</sup>

她是一个高傲的孩子。“有两三次当我父亲鞭打我时，我咬他压在我身上的大腿，”<sup>③</sup>并且她从未失利过。但是她读过圣人的传记，并仰望殉道者；她深感天主教仪式的美丽与庄严，并保留她对宗教的尊敬，以及少许基督徒的信念，甚至欣赏伏尔泰、狄德

\* 《世界文明史》（三三）：《卢梭时代的英国》第九章四、五节。

罗、奥尔巴克，与达朗伯 (d' Alembert)。她不喜欢卢梭；她很难接受他的观点。她向往布吕蒂斯 (Brutus)，并且沉醉于加图兄弟 (Catos) 与格拉胡斯兄弟 (Gracchi) 的作品；她与吉伦特派人是 从他们获得政治理想。她也读塞维尼夫人 (Mme. de Sévigné) 的书信，因为她渴望写十全十美的散文。

她有不少向她求婚的人，但是她太注意她的成就而不能接受普通的情人。也许到 25 岁时，她认为最好让步。她找到罗兰 “一位意志坚强，极为忠实，有学问与有趣味……他的庄重使我以为他好像无性欲。”<sup>①</sup>在他们结婚后 (1780 年)，他们居住于里昂，她描述它为 “一个宏伟建筑与座落的城市，工商业繁荣，……以富有著名甚至连约瑟夫皇帝都为之忌妒。”<sup>②</sup>1791 年 2 月，罗兰被派至巴黎并在立宪会议的委员会中保护里昂商业利益。他参加雅各宾党人会议，并与布里索有深厚的友谊。1791 年他说服他的妻子迁至巴黎。

在那里她由他的秘书升为他的顾问；她不但以高雅的智慧与才能草拟他的报告，而且她似乎已指导他的政治策略。1792 年 3 月 10 日，透过布里索的影响，他成为国王的内政部长。于此际罗兰设立一间沙龙 (salon) 做为布里索、佩蒂翁、比佐 (Buzot)、孔多塞与其他吉伦特党人聚会以及讨论计划之处。<sup>③</sup>她给予他们食物与建议，却将她的爱情秘密给予比佐；并且她不顾性命的追随他们。

## 第二节 战 争

(公元 1792 年)

这是大革命的一段危险期间。到了 1791 年时，国外的移民已在德国科不林士 (Coblenz) 聚集 2 万军队，并且进行请求援助。普鲁士的威廉二世 (Frederick Willam I) 觉得他可利用此机会沿着莱茵河扩张他的王国。罗马帝国的约瑟夫二世 (Joseph I) 皇帝已向他的姊姊求援，他的人民也骚动不安，他本人有些像革命者，并且他接近死亡。他的弟弟利奥波德二世 (Leopold I)，于 1790 年继承他的王位，却不喜欢战争，与普鲁士皇帝发布《皮尔尼兹宣言》(Declaration of Pillnitz)，(1791 年 8 月 27 日)，并且邀请其他统治者共同在法国恢复“一个可立即调和君主权利与促进法国福利之君主形式的政府”。

奇怪的，君主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都赞同战争。皇后不断促使她英国的哥哥给予援助；并且国王明白的要求普鲁士、俄国、西班牙、瑞典、与奥匈帝国的统治者集合军队恢复在法国的王权。<sup>13</sup> 奥地利渴望法兰德斯 (Flanders)，普鲁士想获得阿尔萨斯 (Alsace)。1792 年 2 月 7 日，奥地利与普鲁士签定一项与法国敌对的军事联盟。3 月 1 日莱奥波德二世驾崩，并由他的儿子弗兰西斯二世 (Francis I) 继位，他渴望战争与个人荣誉。在法国拉斐德赞成战争以期他能成为统帅，并且能够同时掌握立法会议与国王。迪穆里埃 (Dumouriez) 将军，外交部长，赞成战争为着他们从奥地利得胜后，会受到荷兰欢迎，并可能以较小的王位奖励他。因为尚未涉及征兵，农人与劳动阶级以为目前的战争为必然的罪恶，



因为亡命者可不受阻挠地回到法国，恢复或者可能增加更多旧王权时代的不公正。吉伦特党人赞成战争是因为他们预期奥地利与普鲁士将攻击法国，因而反攻是最好的防御。罗伯斯比尔反对战争乃基于劳动阶级将为此流血，而中阶层将获利的理由，布里索公开宣布：“时机已来到，”他呼喊道，“为着新的圣战，为着全人类自由的圣战。”<sup>①</sup>1792年4月20日，立法会议，在仅7票反对之下，正式对奥地利宣战，希望分割此联盟，因此开始23年的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战争。4月26日，鲁日·德·李尔（Rouget de Lisle，法国军人及作曲家，1760—1836年），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作“马赛进行曲。”（the Marseillaise）。

但是吉伦特党人未曾估计法国军队的状况。在东线有10万人，相对的奥国军队只有4.5万人；但他们由旧政权训练的军官统帅。当迪穆里埃将军命令这些军官率领他们的士兵采取行动时，他们回答道，他们未经训练的义勇军尚未装备武器，而且正在受军事训练。然而，当前进命令重复下达时，几个军官辞职，3个骑兵部队投降敌军。拉法埃脱给予在布鲁塞尔（Brussels）的奥地利统帅一项建议让他率领国民卫队到巴黎，并且恢复皇帝的权力，如果奥国答应不进入法国领土的话。除了拉斐德随后的责问（1792年8月20日）与他逃向敌方外，此建议无任何结果。

当立法会议将议案送给占优势的吉伦特内阁，要求国王签署设立一围绕着巴黎的护围军营，并且停止将政府薪水付给拒绝立誓臣从的牧师与修女时，事务达到危机。国王草率的决定，不但拒绝签署，而且将迪穆里埃以外所有的部长辞职，而这位将军不久即辞去比利时前线统帅职务。当否决议案的消息传遍巴黎时，路易正期待一支军队，法国或外国的，来到巴黎并立刻结束大革命。民众计划由巴黎撤出并在卢瓦尔河（Loire）更远处组成新的革命军队。吉伦特党的领袖要求在图勒里宫前举行群众示威。

1792年6月20日，一群激动的男女——爱国者、歹徒、冒险

家、罗伯斯比尔、布里索、或马拉的热诚信徒——冲进图勒里宫的庭院，高声的要求与辱骂，并且坚持要见“否决权先生与夫人。”国王命令他的守卫准许他们其中几位进来。50人进来了，并挥舞着他们各式各样的武器。路易站在一张桌子旁边，并听取他们的要求——取消他的否决。他回答这很难有适当的地方与环境考虑如此复杂事务。他听取辩论、请求、与威胁有3小时之久。一名暴徒叫道，“我需要法令许可打击教士，……批准，否则你将死亡！”另一暴徒以剑指着路易，但他保持镇定。有人给他一顶红色无边帽；他高兴地戴在头上；这些入侵者叫道，“国家万岁！自由万岁！”最后“国王万岁！”这些请愿者离去了，并且报导他们曾给予国王很大的惊恐；群众，并不满意但却很疲乏，退至城市中。不顾及国王的否决，这不利于不肯宣誓效忠教士的法令被实施；但是立法会议，忧虑其与王宫断绝关系，而给予国王一个热烈的欢迎会，由它的邀请，他接受它继续勤王的要求。<sup>⑨</sup>

急进派不喜欢资产阶级与君主政府的正式和解；他们怀疑国王的诚意，并且愤恨立法会议准备阻止现在已为中阶层巩固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大革命。罗伯斯比尔与马拉逐渐使雅各宾党会社摆脱资产阶级的情操并转向争取较广泛民众的同情。在工业化都市中劳动阶级趋向与巴黎工人合作。当立法会议要求每一省派遣一联邦国家卫队的支队参加庆祝巴士底狱陷落3周年之时，这些“加入联邦的”(Fédérés)大多数由各城市的地方行政区选出，并赞成雅各宾党政策。一个特别的反叛团体，拥有516名群众，7月5日由马赛出发，立誓废弃皇帝，在他们行进中，他们唱鲁日·德·李尔作的新歌，并且由他们获得非他意欲的歌名“马赛进行

曲。”\*

马赛人与其他参加联邦代表们于7月14日后到达巴黎，但是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要求他们延迟回去。巴黎公社——由此城48个“区域”（Section）代表组成的中央机构——现在已被激进派领袖掌握，并且逐日由其设在市政厅（Hôtel de Ville）的办公处，取代市政府官员成为首都的政府。

7月28日，此城得知布伦瑞克（Brunswick）公爵从科布林士发布的宣言而再度惊骇与震怒。

奥地利与普鲁士国王两位陛下托付我统率他们已聚集在法国边界的联军，我要对这帝国的居民宣布，这2位君主决定此政策的动机，以及他们的目的。

任意侵犯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法国东北部一区，包括阿尔萨斯与洛林，1871—1917年与1940—1944年间一度属于德国，此区常为德法争占之地）德国皇族权力，干扰与破坏王国内良好秩序与合法政府，……这些霸占政府统治权者至少已对国王陛下宣布不义战争与完成攻击他北海的低地国（Low Countries，今荷、比、卢三国）各省的工作。

对一些重要利益应慎重处理，……此即，终止法国内部的无政府状态，阻止对王权与神坛的攻击，……恢复国王安全与已被剥夺的自由，并让其执行属于他的合法权利。

确信法国健全部分厌2恶过多的少党派掌握法国，

---

\* “马赛进行曲”于1795年7月14日，被国民公会接受为国歌，它被拿破仑与路易十八拒绝，恢复于1830年，遭拿破仑三世禁止，最后于1879年被采用。

并且大多数人民耐心期待机会可让他们公开宣布反抗他们压制者的可怕企图，皇帝陛下与普鲁士国王陛下请求他们立即回到合理、正义与和平之处。依照此目的，我……宣布：

1. ……这二联盟的朝廷不接受法国福利以外的目标，并且不愿以征服使他们富有……

7. 城镇与乡村居民凡是敢反抗皇帝与国王陛下军队并攻击他们的……将依照战时最严厉法律立刻受到惩戒，他们的房子将被……摧毁……

8. 巴黎与所有的居民必需立刻向皇帝投降……，两位陛下宣布……如果图勒里宫被闯入或被攻击，如有最轻微暴动波及……国王、皇后与皇室家族，并且他们的安全与自由不能被迅速加以保证，他们会将巴黎交给军队处理并完全摧毁……

由于这些原因，我要求也劝告所有帝国的居民，不反对我所统率的军队之行动与任务，相反地，让他们在各处可自由通行，并全力协助他们……1792年7月25日于科不林士总部。

查理士·威廉·斐迪南 (Charles William Ferdinand)，  
布伦瑞克——吕内堡公爵。<sup>⑥</sup>

宣言第8段（也许由报复的移民提呈给这位温和的公爵<sup>⑥</sup>）要求立法会议，巴黎公社，与巴黎人民放弃大革命或者不择手段与不计代价的抵抗侵略者。7月29日，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会社演讲，要求反抗布伦瑞克，立刻推翻君主政体，并且建立具有成人选举权的共和国。7月30日马赛的代表，仍然在巴黎，加入其他各省的代表要求废除国王。8月4日及次日巴黎一区接一区的通知立法会议，他们不再承认一位国王；8月6日正式请愿立

法会议废除国王。立法会议并未采取行动。8月9日马拉请求人民攻击图勒里宫，逮捕国王及其家属，与所有亲君主政体的官员，“作为国家叛徒……必须先为国家的利益牺牲。”<sup>⑧</sup>当夜巴黎公社与各区敲打警钟要求人民于次晨在图勒里宫附近聚集。

有些在清晨3点就来了；7点以前25区已派出应分摊的人数并配备步枪、矛、与剑；有些带着大炮；800名联盟代表参加；群众人数立即到达9000名。王宫被900名瑞士与200名其他的卫队防守着。为着平息暴动，路易领着他的家族由会议室到王宫戏院，立法会议在该处呈混乱状况；“我来到这里，”他说：“为防止一项重大罪恶。”<sup>⑨</sup>

暴徒被允许进入庭院，但瑞士卫队守住通往国王寝室楼梯之最下层，阻止暴徒进一步向里前进；群众推挤他们；瑞士卫队于是开枪射击，杀死超过100名男女。国王命令瑞士卫队停火并且撤退；他们遵命不再射击，但是由马赛人率领的群众又击溃他们；大多数的瑞士卫队被杀死；不少被逮捕；50名被送至市政厅并予以处死。<sup>⑩</sup>仆人们，包括厨房工作人员，均被杀死。马赛人唱着“马赛进行曲”并用皇后的大钢琴伴奏；一名疲倦的妓女睡在皇后的床上。家具被烧毁，酒窖被抢夺并且藏酒被喝光。在王宫附近快乐的群众放火烧了900栋建筑，并射杀一名消防队员。<sup>⑪</sup>一些胜利者持着已死卫队红色制服做成的旗帜游行——第一个用红旗作为革命象征之著名的例子。<sup>⑫</sup>

立法会议企图挽救皇室的家族，但是几位代表被闯入的群众谋杀，迫使其他代表将皇室的避难者交给巴黎公社处置。他们被严密地看守在神庙，它为圣堂武士团（Knights Templar）的旧式而坚固的修道院。路易投降并无任何反抗，向着白发的妻子与生病的儿子悲叹着，并且耐心等候着末日来临。

### 第三节 丹 东

在这几个动乱的星期中，右派的代表几乎都不参加立法会议；8月10日后，只剩285名代表。这个残余的立法机构，现在投票通过以省的行政会议（Executive Council）替换国王与他的参谋；以压倒性的票数选举丹东为司法部长掌握暂时行使国王权力的行政会议，罗兰为内政部长，塞尔旺（Servan-Joseph）为陆军部长，选举丹东的部分原因是想平息巴黎人；除了他有名气外，他是当时革命行动中最有才能与最得力的人物。

他那时35岁，并愿为革命在35岁牺牲；革命是年轻人的一项特权。他出生于香槟的阿尔西（Arcis-sur-Aube），并追随他父亲进入法律界；他在巴黎为一成功的律师，但是他选择与他的朋友德穆兰同住在科底尼会社的工人区域，不久他在该会社变得极为杰出。他的嘴唇与鼻子在幼年时因一次意外事故而毁形，他的皮肤生有天花；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他高尚的身材与宽大的头，或感觉出他明智与果断思想之力量，或者在一革命的聚会里，雅各宾会社，或劳动阶级群众中，听他粗暴如雷常常是亵渎的演讲。

他的性格不像他的脸或他的声音那样残忍或高傲。他对他的判决可能草率并且十分无情——象同意9月的大屠杀——但是他有些潜在的软弱，并且无恶意；他愿意很快宽恕别人。他的助手时常惊奇他取消他自己发出的严峻指令，或者保护他过严命令下的牺牲者；不久他将失去他的性命，因为他胆敢提出恐怖时代（the Terror）持续太久的时间，并且慈悲的时期已来到。不像冷静的罗伯斯比尔，他喜欢法国讽刺滑稽作家的幽默，世上的乐趣、赌

博、美丽的女人。他以赚来与借到的金钱在阿尔西买了一栋理想的住所，以及大批的教会财产。人民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多的金钱；许多人怀疑他因保护国王而获得贿款。不利他的证据压倒了他；<sup>⑧</sup>于是他承认他采用了最有利的革命措施，并且从未违背任何一项革命主要的利益。他拿国王的钱并且替劳动阶层人士工作。他知道劳动阶级的独裁权是一个矛盾名词，只能在政治上存在一很短时期。

他受过很多教育，以致使他不致于成为乌托邦主义者。他图书馆的藏书中，法文的有 571 册，英文的有 72 册，意大利文的有 55 册；他的英文与意大利文都念得很好。他有伏尔泰的著作 91 册，卢梭的 16 册，以及所有狄德罗的《百科全书》。<sup>⑨</sup>他是一位无神论者，但是他赞成穷人对宗教的信仰。在许多方面他像是缪塞 (Musseau)：<sup>⑩</sup>

以我个人而言，我只承认一个神——整个世界与正义之神……田间劳动者更有此概念……因为他的年轻，他的刚毅，与他晚年受恩于牧师给他的少许幸运……留给他一些幻想。如你愿意的话教育他，……但是别让穷人害怕会失去与他们一生相关连的东西。<sup>⑪</sup>

身为领导者，他牺牲一切保护革命不受别国的攻击与国内的骚扰。由于这些缘故，他愿与任何人——罗伯斯比尔、马拉、国王、吉伦特党人合作；但是罗伯斯比尔忌妒他，马拉批评他，国王不信任他，吉伦特党人害怕他的脸孔与声音，并因他的指责而发抖。无人可使他出国；他发起战争并且为和平谈判；他大声怒吼像头狮子，但却言及仁义；他为革命而战，却帮助一些贵族逃出法国。<sup>⑫</sup>

身为司法部长，他努力致力于联合所有革命的团体来阻止攻

击。他也负责处理8月10日的民众暴动；革命战争需要一些强烈精神上的支持；他们可成为热爱革命的士兵。但是他阻止一项支持大革命反对外国君主之不成熟的企图；这将联合所有君主与法国敌对。他反对吉伦特党之建议；撤消政府与卢瓦尔河旁的立法会议，此一撤消将打击人民的士气。讨论的时间已过去；采取行动的时间已来到，建立新的军队并加强他们的精神与信心。1792年9月2日，他在一项热烈演讲中发表一段名言鼓舞法国也响彻了一个骚乱的世纪。普鲁士——奥地利的军队已进入法国并节节胜利。巴黎彷徨于果断的反应态度与沮丧的害怕之间。丹东，为着行政会议，来到立法会议激励他们为国奋战。

由一自由国家的部长对他们宣布他们的国家已获得安全是很满意的。他们全都激动、热忱、与兴奋地加入这个战争……我们的人一部分将守卫前线，另一部分将挖掘并且以武器守卫壕沟，第三部分将以长矛保卫市区……我们将任何拒绝提供个人劳务或武器的人处以死刑……

我们敲响的警钟并非是危险的警告信号；它命令攻击法国的敌人。为了胜利我们必需冒险、再冒险，永远在冒险中——法国是得救了。

这是有力而具历史性的演讲，但是在同一天发生大革命最悲惨的插曲。



## 第四节 大屠杀

(公元 1792 年 9 月 2 日—6 日)

9 月 2 日，民众情绪的狂热由于宗教与政府冲突，以及努力将崇拜从宗教转移到政府而升到顶点。宪政会议已接受天主教为公认的宗教，并付教士与政府公务人员相同的薪资。但是巴黎公社认为政府无理由必需补助传道所需的金钱，这种看法为社会接受，最后也为立法会议接受。结果造成教会的敌对与对大革命反覆的威胁。

皇帝被废位几小时后，巴黎公社送给各教区一张涉嫌有反革命意见与企图的教士名单；这些教士大多被拘捕送入监狱，并且不久成为大屠杀中主要部分。8 月 11 日立法会议终止教会对教育的控制。8 月 12 日，巴黎公社禁止公开穿着宗教的法衣。8 月 18 日，立法会议修改一项全国性法令，因而删除所有宗教法规。8 月 28 日，逐放所有未向《教士法》宣誓效忠的教士；他们给予 2 星期的期限离开法国；大约有 2.5 万名教士逃到其他的国家，并且加强对那里的移民传道。由于教士一直是掌管出生、结婚与死亡的登记，立法会议必须将此职能移给俗人的机构。当大多数的民众坚持以正式仪式举行圣礼之际，放弃古代典礼的企图会使民众的虔诚与政府的世俗主义间的裂隙加宽。<sup>⑨</sup>巴黎公社、雅各宾党、吉伦特党、与山岳党一致希望对新共和国的奉献能成为民众的宗教，也即以自由、平等、博爱代替上帝、圣子、圣礼，并且这新的三位一体的促进能成为社会秩序与道德最终考验的首要目标。

新共和国正式成立被延至 9 月 22 日，新年的第一天。同时一

些未来派请求立法会议将此做为趋向他们梦想的全世民主政治之轮廓。“法国公民权应授给凡有勇气支持自由主义与有助于人道的外国哲学家。”8月26日立法会议同意赠予法国公民权给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边沁（Jeremy Bentham，英国法学与哲学家，1748—1832年）、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克洛茨、裴斯泰洛齐（Johann Pestalozzi）、科希丘什科（Thaddeus Kosciusko）、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华盛顿、佩因（Thomas Paine）、麦迪逊（James Madison）、与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sup>⑧</sup>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来到法国，他说“为呼吸自由空气，为救取腐败专制政府。”<sup>⑨</sup>新的宗教分枝在生根后延伸迅速。

9月2日，民众穿上星期天的服装，并且以不同方式表现他们的忠诚，青年与中年人聚集在募兵站自愿投入陆军。妇女亲切地替他们缝制外衣，并为将来的伤患准备绷带。男人、女人与孩童将武器、珠宝、与金钱提供给各区的中心部门以为战备之需。母亲们收养那些已赴前线的军人与护士的孩子。一些男人谋害监狱里教士与新信仰的敌人。

自从布伦瑞克发布7月25日宣言后，革命领袖已成为人们遭受威胁时想模仿的人物。8月11日，在市政府馆的行政长官发给桑泰尔（Antoine Santerre），当时地方的军事统帅，一奇特的短笺：“我们接到通知，一些暴徒计划绕至巴黎监狱并且抢夺所有人犯，以便能迅速审判他们。我们请求你的监管伸展至沙特莱（Châtelet）、康西格里（Conciergerie）与拉福尔斯（La Force）——三个巴黎主要拘留中心”，<sup>⑩</sup>我们不知桑泰尔如何阐明这消息。8月14日，立法会议指定一个“特别法庭”审判所有革命的敌人；但是马拉却不满公布的判决。在他8月19日的《民众的友谊》中他告诉读者：拖出那些叛徒，特别是瑞士官员（属于皇家卫队）与他们的同谋，然后全部处死。审判他们是多么愚笨啊！<sup>⑪</sup>藉此热忱，

巴黎公社任命马拉为主笔，在它的会议室中分配他一个位子，并且将他加入监督委员会。<sup>⑤</sup>

如果民众听取马拉并尽可能服从他，那是因为他们也处于害怕与愤怒中。8月19日，由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与布伦瑞克公爵率领的普鲁士人越过边界，并且跟随一队移民誓言对所有革命者报复。8月23日，侵入者占领隆维（fortress of Longwy），9月2日，他们到达凡尔登（Verdun），该日早晨一件快报送至巴黎，这牢固无法攻破的堡垒业已陷落（它在下午陷落）；现在通往巴黎的路已陷于敌人，因无任何法军在此路上可阻止他们。首都似乎可随意任他们处置；布伦瑞克公爵预计很快就可进占巴黎。<sup>⑥</sup>

同时反对大革命的革命队伍已经占有法国两个区域——旺代（Vendée）与多芬；而且巴黎本身容有成千成万同情国王的民众。由于9月1日发行的一本小册子，警告有一项阴谋试图释放所有犯人，并让他们屠杀所有的革命者。<sup>⑦</sup>立法会议与巴黎公社召请所有男人加入军队，出发抵抗进犯的敌军；这些男人如何离开家园并且让他们的妻子儿女任由巴黎监狱逃出的贵族、教士与常习犯随意处置呢？一些地区投票决定所有的教士与嫌疑犯应该在义勇军未离开前予以处死。<sup>⑧</sup>

9月2日，星期日，大约下午两点，6辆马车装载不肯宣誓效忠的教士接近亚伯叶（Abbaye）监狱。群众嘲骂他们；1名男子跳上1辆马车的踏级；1位教士用木棍打他；群众，咒骂着并且人数增加，在犯人于监狱门口下车时予以袭击；监狱的守卫加入攻击；30人均被杀死。群众受到流血场面与不具名谋杀的狂喜之刺激而冲向 Carmelite 修道院，并且杀死被监禁在那里的教士。夜间，经过一番休息，群众因罪犯与歹徒以及由马赛、阿维尼翁（Avignon）与布里塔尼来的雄壮联盟代表的军队回到亚伯叶而扩大，强迫带走所有的人犯，给予他们一个迅速而非正式审判，然后将他们大多数——每一瑞士卫队或教士、或贵族、或国王及皇

后的以前仆人——交给戴铁手套的人以剑、刀、矛或棍棒处死。

起初，这些刽子手是惩戒性的；在那里并无偷窃——从受害者得到之贵重物品则移交给巴黎公社当局；以后这些辛苦的工作者，将获得的战利品作为他们应得之报酬。每个人每天工作报酬是6法郎、三餐与所有他们要喝的酒。他们之中有些显示怜悯；他们恭贺那些无罪释放者，并且护送若干有名望的回家。<sup>⑧</sup>他们之中有些特别凶狠；他们将定罪者作为观众嬉弄的对象来延长他们的痛苦；并且有一位狂热者，将他的剑从拉留（Laleu）将军的胸前拔出后，以手伸入受伤部分，拿出心脏，并放在嘴边似乎在吃它<sup>⑨</sup>——这是野蛮时代流行的风俗。这些屠杀者，劳累之后，略作休息、喝酒，立即又恢复工作，一直到亚伯叶所有的囚犯均被路边法庭审判为自由或死刑为止。

9月3日法官与刽子手转移到拉福尔斯与康西格里二处监狱；在那里又有新的受难者，并且大规模的毁灭继续着。此地有一位著名的妇人，朗巴勒公爵夫人，以前非常富有与美丽，并且是安托瓦妮特心爱的朋友；她曾参与援救皇族计划；现在已43岁，她被斩首与切断手足；她的心脏被拿出并被一名凶恶的共和党徒吃掉；<sup>⑩</sup>她的头被用一矛举起，游行经过唐普勒（Temple）皇后居住密室的窗下。<sup>⑪</sup>

9月4日，屠杀者转移到托尔·圣贝尔纳（Tour St-Bernard）、圣菲尔曼（St-Firmin）、沙特莱（Châtelet）、沙尔佩特（Salpêtrière）各地的监狱；在那里对女犯是以强奸代替死刑。在比士特（Bicêtre）入狱者中有43名年轻人，年纪由17至19岁，被他们的父母置于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全遭屠杀。<sup>⑫</sup>

大屠杀又在巴黎持续两天，因而使受难者总数达到1247人<sup>⑬</sup>与1368人<sup>⑭</sup>之间。天主教徒与皇族遭受恐怖，革命者以为暴动的发生是由于布伦瑞克的威胁与战争的危险。佩蒂翁（Petion），巴黎新任市长，将刽子手当作辛苦工作的爱国志士，并且接见他们，

同时以酒款待他们，<sup>④</sup>立法会议派了一些代表到达亚伯叶现场；他们回来后指出大屠杀无法遏制；最后立法会议的领袖们——吉伦特党人与山岳党人——认为最安全方法是他们的一项批准。<sup>⑤</sup>巴黎公社派代表参加临时审判。比兰—瓦伦（Billout-Varenne），巴黎公社的代理律师，到达亚伯叶现场，向屠杀者祝贺：“同胞们，你们正烧死你们的敌人；你们正执行你们的任务。”<sup>⑥</sup>马拉骄傲的将整个任务归功于他。一年之后在科黛受审判时被问及为何杀死马拉，她回答道，“因为他造成9月大屠杀。”当问及证据，她答道，“我不能给你证据；这是整个法国的判决。”<sup>⑦</sup>

当要求丹东阻止屠杀进行时，他耸耸肩膀：“这将是是不可能的，”他回答道；并且他反问道，“我难道应让我自己受困于那些正在等待外国人来屠杀我们的教士与贵族？……我们必需使我们的敌人胆战心惊。”<sup>⑧</sup>他暗中将他的力量由监狱撤回。<sup>⑨</sup>当一位行政会议的官员抗议这个屠杀时，丹东告诉他，“平静下来；这是必需的。”<sup>⑩</sup>一位年轻人曾问道，“你为什么助长此恐怖行动？”他回答道：“你是太年轻而不了解这些事务……巴黎人与移民间必定会发生战争并且流血成河。”<sup>⑪</sup>他认为巴黎人，现在是向大革命表示友善。而且那些正赴前线抵抗侵略者的义勇军，明了他们的投降将得不到仁慈的宽恕。他们将为他们的生存作殊死战。

9月2日这天，立法会议也觉得事件的转变，造成这已被选定实施的宪法之毁灭，因而决定举办全国性选举以产生国民公会，草拟适合法国新情况与升高战争需要之新宪法。并且因为农民、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都同样受征召保卫他们的国家，他们其中任何人，不论缴税与否如被排拒不得参加投票似乎是无法忍耐的。因此罗伯斯比尔得到他第一个主要的胜利：他占重要角色的国民公会是经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

9月20日，立法会议结束它最后一次会期（session），却不知在那一天一支由迪穆里埃与克勒曼（Francois-Christophe

Kellerm)率领的法国军队遭遇到布伦瑞克率领的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正规军队,并与他们激战未分胜负——事实上是一场胜利,因为在此战役后,普鲁士国王命令他战败的部队撤退——放弃凡尔登与隆维——法国领土,威廉二世不能持久与遥远的法国纠缠,因现在他正与他的邻国俄国与奥地利竞争,以期能从分裂的波兰得到最大收获;此外香槟的葡萄使他的军队遭受痢疾的痛苦。<sup>⑧</sup>

在那次战役之后,歌德(Goethe)对萨克森—威玛(Saxe-Weimar)公爵的幕僚讲了一句名言:“从今天并从此地开始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纪元。”<sup>⑨</sup>

## 第四章 国民公会

(公元 1792 年 9 月 21 日—1795 年 10 月 26 日)

### 第一节 新共和国

第三次国民会议的选举，可看出大革命的顶峰与衰退，雅各宾党巧妙操纵之技巧甚至超过 1791 年的选举。这过程是间接的：投票者选出选举人，组成选举人的委员会，并且选出“议员”代表该区参加国民公会。两次的选举均以口头与公开方式；在每一阶段，如果投票者侵犯当地领袖，他将冒伤害的危险。<sup>①</sup>在城市的保守派拒绝投票；“缺席的数目很大”；<sup>②</sup>700 万有投票资格的人中，630 万不参加。<sup>③</sup>巴黎从 9 月 2 日开始投票，并连续好几天，而在监狱门口的大屠杀给予如何投票与生存的启示。在许多区域，虔诚的天主教徒拒绝投票；因此极力勤王的旺代选出的 9 名代表中的 6 名同意处决国王。<sup>④</sup>在巴黎，选举人聚会于雅各宾社；结果选出代表首都的 24 名相信都是共和党人，并且是巴黎公社的支持者：丹东、罗伯斯比尔、马拉、德穆兰、比兰—瓦伦、赫波斯 (Herbois)、弗雷罗、大卫……在各省吉伦特党人都为他们自己作了准备；因此选出布里索、罗兰、孔多塞、佩蒂翁、戈代 (Gaudet)、巴尔巴

鲁 (Barbarnux) 与比佐。外国人中被选出的是普里斯特利、英国神学与化学家, 1733—1804 年)、佩因与克洛茨。新命名为公民艾加里特 (Citizen Philippe Égalité) 的奥尔良公爵; 被选为巴黎激进派区域之代表。

当国民公会于 1792 年 9 月 21 日在图勒里宫集会时, 它已有 750 名代表。所有的代表除两名为中阶层分子, 两名为工人, 几乎都是中阶层的律师。180 名有组织, 受过教育, 与口齿伶俐的吉伦特党人, 占立法的主要部分。基于目前无外侵危险为由, 他们获得一项法律的宽纵, 用以打击嫌疑犯、移民、与教士, 以及战时的经济管制; 自由企业重新恢复; 民众随即抱怨投机图利与价格操纵。吉伦特党, 为压制激进派之没收不大动产的行动与他们在民众之间的分歧, 在国民公会的第一天实施一项措施, 宣称私有财产的神圣。1792 年 9 月 22 日, 吉伦特党、山岳党、与平原党共同宣布第一个法国共和国。

在同一天, 国民公会宣布, 法国及它的属地之基督历法, 应以大革命的历法代替, 年份将定为 I (由 1792 年 9 月 22 日, 至 1793 年 9 月 21 日), II、III……月份将以他们独特的气候定名: 葡萄月 (葡萄收获期), 雾月 (雾), 霜月 (霜) 为秋季; 雪月 (雪), 雨月 (雨) 与风月 (风) 为冬季; 芽月 (芽), 花月 (花), 与草月 (草) 为春季; 以及收获月 (收获), 热月 (温暖), 果月 (水果) 为夏季。每个月份分为 3 个 10 日称为 3 个旬 (décades); 每一旬以 *décade* 終了, 替代星期日为休息日。剩下的 5 天, 称之为 *sans-culottides*, 将是国庆的节日。国民公会希望这个日历提醒法国人, 使他们收成丰富的并非宗教的圣者与四季, 而为大地与工作; 大自然将代替上帝。新历将于 1793 年 11 月 24 日开始实施, 并在公元 1805 年底终止。

吉伦特党与山岳党赞成私有财产, 共和政体, 与对基督教的战争; 但是在其他几个论题上, 他们对死亡的看法有歧见。吉伦



特党愤恨巴黎地理上不成比例的影响——它的代表与它的民众——在措施上影响整个法国；山岳党憎恨商人的影响与大富豪决定吉伦特党人的投票。丹东（在他选区可能的 700 张选票中得到 658 张）辞去他司法部长的职位，并从事于联合吉伦特党与山岳党的工作，其目的在寻求与普鲁士及奥地利的和平。但是吉伦特党人不相信他为巴黎激进派的偶像，并且要求他提出在任部长期间经费收支纪录；他不能说明他曾经支出的总数来使他们满意，也不能解释出他购买巴黎与近郊 3 栋房子所需金钱的来源；毫无疑问的，他过着豪华的生活方式。他责备质询者为忘恩负义的人，放弃努力于对内及对外的调停，并且加入罗伯斯比尔的派系。

罗伯斯比尔在各区中的声望仅次于丹东，他在代表中仍是第 2 号人物。在国民公会选举主席投票中，罗兰获得 235 票，他得 6 票，对大多数的代表来说，他是一个独断主义的哲学家，有很多关于道德的陈腔滥调通论；也是谨慎的机会主义者，有耐心地等待每一机会增加权力。他基本上无矛盾的建议使他的权力缓慢上升。他避免直接牵涉攻击图勒里宫与 9 月大屠杀，但是他已将民众的恐怖加入资产阶级的政策中。从一开始，他即提倡成年男子的选举权——虽然他实际上曾示意禁止皇族与天主教徒投票。他维护私有财产制度，并且不同意一些穷人之没收与重分配财产的请求；但是他提议征收遗产税及其他若干税收，因这将“藉温和与有效的措施减少财富过度不平等。”<sup>⑤</sup>同时他等待着，并且让他的对手因兴奋与极端而疲乏不堪。他确信有一天他将统治国家——并预测有一天他将被杀害。<sup>⑥</sup>“他知道，这些人全了解，他的性命几乎时时刻刻都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sup>⑦</sup>

既不是罗伯斯比尔也非丹东，而是马拉全力支持劳动阶层。9 月 25 日，为庆祝新共和国成立，他将他的期刊名称改为《法兰西共和国报刊》(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他现在是 49 岁（罗伯斯比尔仅 34 岁，丹东 33 岁）；他只剩下不到 1 年的寿命，但

是他忙碌于不妥协的政治运动，打击被他视为民众敌人的吉伦特党，增加商业化的资产阶级之中间人，使大革命成为“自由企业”经济的政治力量。他粗暴的批评传遍整个巴黎，煽动各区发生叛乱，并且几乎造成国民公会的一致反对。吉伦特党批评他们所称之丹东、罗伯斯比尔、与马拉的“三人同盟”，但是丹东否认与他有关，而且罗伯斯比尔也回避；他与山岳党来往，但经常孤独且少有朋友。1792年9月25日，韦尼奥与其他几位阅读国民公会文件后指出，马拉独裁并参予大屠杀。当这位生病的“护民官”站起为自己辩护时，他受到大喊“坐下！”的侮辱，他说，“在国民公会中，我似乎有许多敌人。”“我们都是！”吉伦特党人高喊着。马拉继续要求有限度罗马式的独裁，并承认他曾煽动暴动。但是他宣布丹东与罗伯斯比尔与此计划无关联。一位代表建议逮捕他，以谋反罪审判；此行动被取消了。马拉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对准他的头部并宣布道，“如果我的起诉被判决，我将在护民官脚前把我的头打开花。”<sup>⑧</sup>

吉伦特党人——引导法国进入战争——在这几个月内，因法国军队的胜利及法国政权与革命理想的扩张而为之强大。1792年9月21日，Anne-Pierre de Montesquiou-Fezensac 将军率领他的军队顺利地征服萨伏衣 (Savoy)；“我军队的前进，”他向国民公会报告，“是一项胜利；2个国家的人民都出来迎接我们；3色的帽章为各党派佩戴。”<sup>⑨</sup>9月27日，另一支法国军队进入尼斯 (Nice) 并未遭受任何反抗；9月29日它进占维勒弗朗什 (villefranche)。11月27日，萨伏衣在当地政治领袖的要求下合并到法国。

莱茵省 (Rhineland) 的占领比较困难。9月25日，屈斯蒂纳 (Adam-Philippe de Custine) 将军领着他的义勇军进占施派尔 (Speyer)，俘虏3000名战俘；10月5日，他进入沃尔斯姆 (Worms)；10月19日，迈因茨 (Mainz)；10月21日，法兰克福 (Frankfurt-am-Wain)。为使大革命赢得比利时 (奥地利的属

地)，迪穆里埃必须攻取热马普（Jemappes），这是一场主要战役；奥地利在长久抵抗后退却了，留下 4000 具尸体在战场上。布鲁塞尔陷落于 11 月 14 日，列日（Liège）于 24 日，安特卫普（Antwerp）于 30 日；在这些城市中，法国人被当作解放者般受到欢迎。迪穆里埃不服从国民公会的命令向南移动与屈斯蒂纳的军队会合，反而停留在比利时与投机商交易军需品。在受到当局指责后，他以辞职威胁。派丹东去向他劝解；他成功了。但是当迪穆里埃（1792 年 4 月 5 日）向敌军投降时，他因牵连而获罪。

被这些胜利所陶醉，国民公会的领袖采取二项辅助政策：伸展法国的势力到地理上的“天然边界”——莱茵河（the Rhine）、阿尔卑斯山（the Alps）、比利牛斯山（the Pyrenees），与海洋——并且为争取边界的人民，他们请求用军事支援达成经济与政治的自由。1792 年 12 月 15 日，发布一项醒目的法令：

从此刻起，法国宣布对（所有合作地区）人民有统治权利，管制目前仍统辖你们的所有民事与军事当局，以及任何形式的各项税收；废止什一税、封建制度、奴隶制；它也宣布废止你们所有的贵族与教会团体，以及所有与平等相对的特权。你们，由此时起，都是兄弟与朋友，有相同权利的公民，并且都有管理、服务、与保卫你们的国家之权利和义务。<sup>⑨</sup>

这个“博爱的布告”（Edict of Fraternity）带给这年轻的共和国许多困难。当对这些占领的区域课征税赋用以支持法国的占领时，他们抱怨这是他们统治者与他们的税收名称之替换。在比利时、列日与莱茵省教会的教士们，习惯于持有全部或部分的统治权，看出他们在神学与权力方面受到怀疑，他们超越了国界与教义团结起来反驳，结果可能，摧毁法国大革命。1792 年 11 月 16 日，为

让法国获得安特卫普商业的利益，国民公会宣布开放斯海尔德河（River Scheldt）——《西发里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禁止荷兰以外的船只通行——荷兰准备对抗。欧洲的君主将国民公会的请求视为向所有的国王与封建贵族挑战的宣告。这是反对法国的第一个联盟之具体形式的开始。

国民公会决定将路易十六以叛国罪审判。自8月10日起大多数的皇室家族都被软禁：国王，38岁；皇后，37岁；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夫人”，28岁；他女儿，玛丽-泰雷兹（Marie-Thérèse），14岁；以及他的儿子，皇太子，路易·查理（Louis-Charles），7岁。吉伦特党尽其可能延迟审判，因为他们知道证据可使国王家族被判罪并处死的，并且将增加对法国的攻击力量。丹东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圣朱斯特25岁，一位新人物，因激烈地呼吁弑君而受到国民公会的注意：“路易与民众争斗并且战败。他是一个野蛮人，一个外国战犯；你们已看到他背信的阴谋……他是巴士底狱，南锡，练兵场（Champ-de-Mars）……，图勒里宫的凶手。还有什么敌人，什么外国人给你们这更多的伤害？”<sup>①</sup>11月20日，一只铁箱子被发现于图勒里宫的寝室中，被罗兰送交国民公会，这构成谋反罪为有力的证明。它装有625份秘密文件，证明国王与拉斐德、米拉博、塔列朗、巴纳、移民、与保守派新闻业者之间的交易；很明显地，路易忽略他对宪法应有的忠实立场，并策划破坏大革命。国民公会命令用一面纱掩盖米拉博的半身像；雅各宾党在他们的会社里捣碎一纪念米拉博的雕像。巴纳被捕于格勒诺布尔；拉斐德逃回他的部队；塔列朗，永远是在逃亡中。12月2日，一些由城市各区来的代表到达国民公会，并且要求立刻审判国王；不久巴黎公社为相同的意旨作强烈的建议。12月3日，罗伯斯比尔参与此请求。马拉主张所有审判的表决必须是口头与公开的方式——这将使迟疑的吉伦特党人受到走廊与街道上无裤党人的任意支配。

审判开始于1792年12月11日。梅西耶(Sébastien Mercier),一位代表说到,“国民公会大厅的后面被改成为像戏院的包厢,穿着迷人服装的妇女,喝着饮料……。带位者……带领奥尔良公爵情妇进入。”<sup>⑧</sup>国王被要求解释一些由盒中发现的文件;他否认他的签字以及所有与盒中有关的文件。”他以记忆错误或将责任推诿给部长们的方法来应付询问。他要求宽延4天以便让他有一位辩护律师。马勒泽布(Chrétien de Malesherbes),他在路易十五时保护过“哲学家”(philosophes)与《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愿为国王辩护;路易悲伤地接受了,并说:“你牺牲太大,因为你将有性命危险,却仍然不能保全我。”<sup>⑨</sup>(马勒泽布被斩首于1794年4月。)同时,外国的官员建议为国王收买选票;丹东同意为收买的代理;但是所需的费用总数超过他们的陛下愿投资的数目。<sup>⑩</sup>

12月26日,塞兹(Romain de Séze)也到场为此案辩护。国民公会,他反驳道,是无权让代表审判国王的;他在他的人权范围以内争取他的生存。他是最仁慈与最有人性的人之一,并且是法国王座上最公平统治者中的一位。难道代表忘了他的许多改革吗?他不是以召集三级会议而使大革命开始,并且听取所有法国人民的过失与愿望吗?起诉人回答道,国王与外国军队联合打击大革命。为什么因为继承王位的人犯叛国罪应该获得例外?只要他继续活下去,就会有阴谋使他恢复到大革命以前的力量。这将是所有企图出卖他们人民希望的君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投票决定国王的罪行开始于1793年1月15日。749位中的683位代表,包括他的堂兄奥尔良在内宣布定罪。<sup>⑪</sup>此判决交由法国人民的主要会议批准或撤消的行动,受到罗伯斯比尔、马拉、与圣朱斯特的反对,并且被424票对287票否决了。“向民众求助,”圣朱斯特说:“将不能恢复君主政体”。罗伯斯比尔一直是拥护民主政治与男子普选的,但是现在他迟疑不前;“道德,”他说(意谓共和主义者的热忱),“永远是世上的少数党。”<sup>⑫</sup>

1月16日,当最后问道——“法国国王路易应受到什么样的判决?”时,有两个党派突然在街道上发生暴动。走廊上的群众高呼处死刑,并对任何赞成其他判决的人之性命加以威胁。那晚以前,发誓永不要求将国王处以死刑的代表,现在因考虑他们自己的生命,而投票决定处死刑。丹东屈服了。佩因立场坚定。奥尔良准备接替他的堂兄,投票赞成他的死刑。马拉赞成“24小时以内处死”;罗伯斯比尔,极刑的反对者,现在认为一位活着的国王对共和国将有危险;<sup>⑧</sup>孔多塞请求从今以后废止极刑。布里索警告死刑将使所有的欧洲君主对法国发动战争。一些代表对他们的投票加上评论:帕加内尔(Paganel)说:“死刑!对皇帝只有死刑才有用”;米约(Millaud)说:“今天,如果死刑不存在,就必须予以设立”,迪沙泰尔(Duchatél),已经奄奄一息,投票反对路易的死刑,然后去逝。<sup>⑨</sup>最后的投票总数是361票赞成死刑,334票赞成缓刑。

1月20日,一名国王以前的卫队杀死圣法尔若(Louis-Michel Lepeletier de Saint-Fargeau),他是赞成死刑的。1月21日,一辆马车,被一列武装卫队环绕着,通过由国民卫队所排列的街道,载着路易十六驶向大革命广场(现在的dela Concorde广场)。在斩首机前他向群众说:“法国人民,我无罪而死;从断头台我将接近上帝,我宽恕我的敌人。我愿法国——”但是就在那时,桑泰尔(Santerre),巴黎国民卫队队长,高喊“鼓手!”的声音掩盖了其他一切。当沉重的利刃下落时骨肉断裂,群众表情阴沉。“那天,”一位围观者想到,“每一个人步伐缓慢,并且不敢彼此相望。”<sup>⑩</sup>

## 第二节 第二次革命

(公元 1793 年)

国王被处死刑是“山岳党”，巴黎公社，与战争政策的胜利。它促使“弑君者”为大革命作悲惨的献身，因为他们是波旁皇族(Bourbon)复辟的精选牺牲者，它让吉伦特党分裂并处于绝望；他们在投票上有歧见；他们害怕失去生命而迁至巴黎，并且渴望相对的和平与各省的法治。罗兰，失望而且梦醒了，于国王处死的当天即向行政会议辞职。和平，曾因奥地利与普鲁士进入分裂的波兰使之可能，现在因欧洲的君主愤怒他们有兄弟关系的一位国王被斩首而使之不可能。

英国首相皮特(William Pitt)，他曾想对法国发动战争，发现“国会”(Parliament)与人民震惊于皇族本身躺在断头台之消息，以致几乎全部反对那项政策——如同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祖先，从未以刀斧对付查理一世，皮特的真正理由，当然法国的安特卫普统治权是英国旧敌进入莱茵河的枢纽——是大英帝国与中欧贸易的主要利益。而且在 1792 年 12 月 15 日，国民公会宣布将比利时合并到法国，危机更加严重。现在荷兰与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已在法国掌握中；这整个富有与人口稠密的流域接近依赖工业产品出口维持生存的大布里颠。1793 年 1 月 24 日，皮特将法国大使免职；2 月 1 日国民公会同时向英国与荷兰宣战。3 月 7 日西班牙加入他们，并且这第一联盟——普鲁士、萨丁尼亚(Sardinia)、英国、荷兰、西班牙——对大革命作第二阶段极力的阻挠。

一连串的不幸使得国民公会迟于了解它所面临的困难。大革

命的军队在最后胜利之后即已松懈；成千的义勇军在他们服役期满后纷纷离去；东线部队总数由40万降至22.5万；并且由于承包商受迪穆里埃保护与榨取而无能与贪财，这些军队是衣著破烂与臃肿不堪的。这位将军一再忽略政府所发出的指示。2月24日国民公会依靠募兵方法增加新的军队，但是这让富人有机会购买替身的机会。有好几个省反对募兵制。在旺代的民众，不满募兵与食物昂贵与稀少，因而愤怒的加入反天主教之立法行动，并且造成普遍的反叛以致军队不得不由前线调回予以镇压。2月16日迪穆里埃率领2万军队进犯荷兰；他所留下当做比利时驻军的部队遭受突击并且被萨克斯—科堡(Saxe-Coburg)王子率领的奥国军队歼灭；迪穆里埃本人(3月18日)被击溃于内尔温登(Neer Winden)；并且在4月5日他率领一千人向奥地利人投降。该月英国、普鲁士、与奥地利的代表聚集并且安排计划征服法国。

对内的困难，加上对外的挫折，威胁法国政府的存亡。由于没收教会与移民的财产，新发行以土地担保的信用券几乎隔夜贬值；1793年4月，他们是面值的47%，3个月后下跌33%。<sup>⑨</sup>新的税收普遍被民众拒绝以致他们的征收费用几乎等于他们的收益。强制性的贷款(到1793年5月20—25日止)剥夺资产阶级不断增加的财产；当此阶层利用吉伦特党来保护他们在政府中的利益时，这加深吉伦特党与山岳党在国民公会中之冲突。丹东、罗伯斯比尔、马拉劝诱雅各宾会社从最初的资产阶级的政策转为较激进的观点。巴黎公社，现在为肖梅特(Pierre Chaumette)与赫伯特领导，利用后者的杂志Père Duchesne，鼓动市民包围国民公会要求强征财富。接连许多天马拉将吉伦特党人当作富人之庇护者而加以攻击。1793年2月，鲁克斯(Jacques Roux)与瓦尔莱(Jean Varlet)领著一群劳动阶级的“疯狂者”抢夺高价面包，并且坚持国民公会对民生必需品订定最高价格。遭到这许多难题困扰，国民公会将1793年的工作交给委员会以极少讨论做成决定。



大多数的委员被指定特别活动与管理的范围：农业、工商业、会计、财政、教育、福利、或殖民地事务。他们通常都有专家协助，即使在危机升高时仍然有许多优异表现；他们准备新的宪法，并且留下推断的（constructive）立法之世袭遗产，这为拿破仑发现有助于构成《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

为防备外国的间谍，内部的分裂，与政治的冲突，国民公会（1793年3月10日）设置一般安全委员会做为国家的警察机构，其有独特权力对住宅实施突击检查以及逮捕任一叛逆或有罪的嫌疑犯。巴黎公社与各区设置附加的监督委员会。

3月10日，国民公会成立革命法庭审判嫌疑犯；他们准许有辩护律师，但是陪审委员的判决不接受上诉或覆审，4月5日国民公会任命富基坦维尔（Antoine—Quentin Fouquier—Tinville），一位著名于搜索、不仁慈检查与偶有人性观点的律师为首席检查官；<sup>⑨</sup>他给我们的深刻印象是他的脸像一只鹰，他的鼻子像一把剑。革命法庭于4月6日开庭。战争期间被送去审判的人数变得十分庞大，革命法庭将它必要的法律程序省去的越来越多，并且将所有由公共安全委员会送来的案件提早宣布犯罪的裁决。

公共救助委员会，成立于1793年4月6日，取代行政会议，并且成为政府的主要力量。它是一个战争内阁；它不得被视为受宪法约束的公民政府，而应被视为领导与统率一个为生存而战的国家之合法政体。它的权力仅受限于它对国民公会的责任；它的决定必须提呈给国民公会。它控制外交政策，军队与他们的将领，文职的公务员，宗教与艺术委员会，政府秘密的职务。它有权拆阅私人与公共信件；它处理秘密的资金；并且经过它的“代表”它在控制各省与生存有关的一切。它聚会于佛洛勒（de Flore）大厦，位于图勒里宫与塞纳河（Seine）之间，并且围绕一张“覆盖绿布的桌子”开会讨论，此处变成法国政府所在地有一年之久。

丹东现在又二度被选为这国家处于危机时的领袖。他开始说

服他的同志,以及国民公会,政府应公开地拒绝任何有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企图。<sup>②</sup>因为受到他的鼓动以及克服罗伯斯比尔的反对,国民公会将和平的提案送给联盟的每一会员国。他说服布伦瑞克公爵停止他的攻击,又成功地与瑞典结为同盟。<sup>③</sup>他再度想为山岳党与吉伦特党谋求和平,但是他们之间的隔阂太深。

马拉加强对吉伦特党人的攻击,然而以此暴力的增加使他们获得(1793年4月14日)国民公会的一项法令,使他以拥护谋杀与独裁的罪名受大革命法庭的审判。当他受审时,一大群无裤党人聚集于法庭及附近街上,誓言对“任何加置于他们最喜爱的保护人的暴行予以报复。”在害怕的陪审团委员释放他后,他的同党将他置于他们的肩上胜利地走向国民公会。在那里他扬言他将对他们的控诉者予以报复。然后他被一些欢呼的群众举着走向雅各宾会社,在该处他被推崇为会长。<sup>④</sup>他恢复他的政治运动,要求将吉伦特党以大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背叛者之名义,排拒于国民公会之外。

当国民公会克服了吉伦特党的抗议与警告,他赢得一项宝贵的胜利,宣布谷物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每一阶段的最高价格,并且要求政府机构向生产者征收所有必须满足民众需要的产品。<sup>⑤</sup>9月29日,这些措施被推广成为“普遍的限价”(general maximum)用以设定所有基本的产品之价格。<sup>⑥</sup>生产者与消费者间无限期的竞争现在变为剧烈;农民反抗征收他们的作物;<sup>⑦</sup>当利润动机受到新法律阻止时生产下降;“黑市”发达,以高价供给那些够买得起之消费者。设立最高价格的市场缺乏谷物与面包;饥饿者再度在全城的街道上发生暴动。

吉伦特党人,极度憎恨巴黎低阶层置于国民公会的压力,请求他们在各省的中阶层选举人营救他们免受暴民的虐待。韦尼奥于1793年5月4日,写信给他在波尔多的选举人,“我代表民众的保护人召请你们来保护我们,如果时间许可,消灭专制政体并对自由意志予以报复”;<sup>⑧</sup>并且巴尔巴鲁也同样地写信给他在马赛的支持

者。在里昂，资产阶级的少数党与以前的贵族联合排除他们激进派的市长。

5月18日，吉伦特党人的代表说服国民公会指定一委员会调查巴黎公社企图影响立法之活动。此委员会所有的委员都是吉伦特党人。5月24日，国民公会命令逮捕煽动者赫伯特与瓦尔莱；巴黎公社共有16区的同意，要求释放他们；国民公会拒绝了。5月26日，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会社，鼓动市民反叛：“当民众被压迫时，除了它自己外别无其他财富留下时，他不起来反抗，那必定是一个真正的懦夫。当所有法律被破坏时，当专制政府独裁达到顶点时，当优良的教义与礼节被践踏于脚下时，民众必须揭竿起义。此刻已来临。”<sup>⑧</sup>5月27日，马拉在国民公会要求整顿此委员会，“由于你们疏忽使物价过度上升，因而侵害自由并且触怒起义的民众。”当夜山岳党通过一项措施撤消此委员会；但是在5月28日，吉伦特党人以279票对238票通过再度设立此委员会。5月30日，丹东加入罗伯斯比尔与马拉为获得“革命的力量”。

5月31日，各区响起警钟唤醒市民。聚集在市政厅组成一“革命会议”(insurrectionary council)，并且获得激进派领袖昂里奥(Hanriot)率领的巴黎国民卫队支持。在他们与大批群众的保护下，新的“革命会议”进入国民公会的大厅，并且要求在大革命法庭控制吉伦特党人；整个法国的面包价格是固定于3铜币一磅；任何将造成的赤字，可藉向富人征税以抵消之；无裤党人暂时可保有投票权。<sup>⑨</sup>国民公会最后不得不放弃对这受人憎恨的委员会作第二次整顿行动。相互斗争的党派于该晚退让。

“革命会议”的委员于6月1日回到国民公会之后，要求逮捕罗兰，他被无裤党人认为完全为着资产阶级利益。他闻风逃向南方。罗兰夫人准备向国民公会求情因而延迟离去；她被拘留在亚伯叶监狱；她再也见不到她的丈夫，6月2日大约有8000名男女，多数武装着，包围国民公会大厅，并且卫队以大炮对准国民公会大

楼。“革命会议”通知所有代表不得离去，一直到它全部的需要被满足为止。马拉控制讲坛并大声喊着他所要逮捕的吉伦特党人的名字，其中一些逃过守卫与群众，逃到其他各省，22名被软禁于巴黎。从那天起一直到1794年7月26日，国民公会都是山岳党，公共安全委员会，与巴黎人民的忠仆。第二次大革命已打败资产阶级，并已建立临时的劳动阶级之独裁政府。

胜利者授权塞克尔(Hérault de Séchells)与圣朱斯特依照1792年10月11日的规定制定新宪法，并藉此发布新的命令。它恢复成年男子选举权，并且增加每一国民生存、教育、与革命的权力。它为顾及公共利益而限制财产权，它宣布宗教信仰自由，仁慈地承认上帝，与道德为社会不可缺少的信仰。卡莱尔，不能承受民主政治，称此为“所曾写下的最民主的宪法。”<sup>⑨</sup>它被国民公会(1793年6月4日)接受，并以180.1918万对1.161万票为全体选民之1/4承认。1783年的宪法只是一项文件，因为7月14日国民公会重订公共安全委员会，为统治权高于一切的机构，直到和平来临为止。

### 第三节 马拉去世

(公元1793年7月13日)

吉伦特党的3个亡名者——佩蒂翁、巴尔巴鲁、比佐(Buzot)——获得庇护于卡昂(Caen)；反对巴黎人掌握政府的“联邦主义者”之北部据点。他们演讲，抨击无神党，特别是马拉，发动游行来抗议，并且计划进军到首都。

科黛(Charlotte Corday)是他们之中最热忱的听众。她是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的后裔，出生于一有爵位、穷困、与有力的保皇

党家族，她在修道院受过教育并且做过两年的修女，她设法获得机会念普鲁塔克、卢梭、甚至伏尔泰的作品；她被古代罗马英雄激励并为之心悦诚服。当知道国王被处死刑，她为之震惊，并且对于马拉怒骂吉伦特党人为之愤怒。6月20日，她访问了巴尔巴鲁，他年方26岁，并且十分英俊，以致罗兰夫人将他比喻为哈德良皇帝(Emperor Hadrian)的情人安提诺斯(Antinous)。科黛已快到她25岁生日，但是她的心中却有爱情以外的事情。那是她要求有一位代表的介绍信以便她被准许进入国民公会。巴尔巴鲁给了她一张见迪佩雷(Lauze Duperret)的短筒。7月9日她搭乘马车直赴巴黎。7月11日，她到巴黎买了一把六英寸长的菜刀。她计划进入国民公会会议室，刺杀马拉于其坐椅上，但马拉却生病在家。她找到他的住址，到了那里，但被拒绝进入；因为先生正在洗澡。她回到她自己住处。

洗澡现在成为马拉最喜爱的事务。他的疾病，明显的是一种腺病，并已恶化；他发觉浸在掺入矿物与药物剂的温水中可使痛苦减轻，并且用湿毛巾覆盖在他肩上，与浸过醋的大手帕包住他的头。在与澡盆相连的木板上，他放置纸、笔、与墨水，并且日复一日，他在那上面写着他的定期刊物。<sup>⑧</sup>他的姊姊阿尔贝蒂娜(Albertine)义务地照顾他，从1790年起，西莫内·埃夫拉尔(Simonne Évrard)，开始做为他的仆人，到了1792年，成为他不成文法的妻子。他们的结婚并未经过教士的盛典，而是在“上帝前面……在大自然的大教堂中。”<sup>⑨</sup>

科黛由她的住室写了一张短笺给马拉请求正式谒见。“我来自卡昂，热爱国家的你们应该很迫切的想知道在那里发生的阴谋。我恭候你的回信。”<sup>⑩</sup>但是她却不能等待。7月13日的晚上，她再度登门造访。她又再次被拒绝进入，但是马拉，听见她的话声，并请她进入。他礼貌地接见她。“卡昂方面情况如何？”他问道(不久她报告了他们特别谈话)。“来自国民公会的18名代表，”她答道，“与省府

官员腐化地统治该处”。“他们是那些人？”她说出他们的名字；他逐一记下，并且批准对他们的判决：“他们很快将被斩首。”就在那时她抽出她的利刃刺入他的胸中，但是因用力过猛而刺穿大动脉；血由伤口涌出。他向西莫内·埃夫拉尔高喊，“救我呀，我亲爱的朋友，救我呀！”西莫内·埃夫拉尔赶到时，他已死在她的手臂中。科黛，由房中冲出，但被一名男子用椅子将她击倒。警察接到通知后随即来到，并将她带走。“我已完成我的任务，”她说道：“让他们做他们应做的。”<sup>⑧</sup>

马拉必然有其优点，才能赢得二敌对女人联合的爱。他的姊姊奉献她有生之年，使他死后的名声为之尊贵。他一度是一位著名的内科医生，死后所留下只不过是一些科学方面的稿卷及 25 个铜币。<sup>⑨</sup>他是一位宗教狂热者；而且狂热地献身于已为大自然和历史所遗忘的劳动阶级。科底尼会社将他的心视为神圣的遗物加以保存，并有成千的人们以“摒息的崇拜”观赏它。<sup>⑩</sup>7 月 16 日，所有的代表，以及来自各革命党派的男女，参加了在科底尼会社的花园所举行的葬礼。他的雕像，由大卫雕刻，被安置在国民公会的大厅中；1794 年 9 月 21 日，他的遗体被运至万神庙。

科黛的审判过程很短。她承认所做的，但是认为无罪的；她说她仅仅是为 9 月大屠杀的受难者复仇，“我杀死 1 人却救了 1 万人。”<sup>⑪</sup>在给巴尔巴鲁的信中，她坦白地表示“为达到目的，她不择手段。”<sup>⑫</sup>在宣判后的几小时，她被处决于大革命广场。她受到群众咒骂，并且拒绝一位教士替她做宗教仪式。<sup>⑬</sup>她到死前还不了解她曾给予吉伦特党人的致命打击。韦尼奥了解此道理，并宽恕她，还向他们解释：“她虽置我们于死地，但教我们如何光荣牺牲。”<sup>⑭</sup>

## 第四节 “伟大的公安委员会”

(公元 1793 年)

国民公会保留每月改变公共安全委员会会员资格的权利。7月10日——它免职丹东，因他和平的外交与内政政策失败；但为着继续与他保持关系，它选他为双周期会议的主席。他的第一个太太死于2月，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6月17日，他娶了一个16岁女子；7月10日前，他已再度定居。

7月27日，罗伯斯比尔受职于公安委员会，但是丹东从未喜欢过他；“那个人，”他说，“甚至笨到不会煮一个鸡蛋。”<sup>⑧</sup>8月1日，他敦促国民公会给予公安委员会无限的权力，也许因他的忠告被拒绝，他对德穆兰述及，当他们看到夕阳照红塞纳河(Seine)，以为此河“血流成渠。”9月6日国民公会建议他重新回到公安委员会；他拒绝了。<sup>⑨</sup>由于疾病和劳累，他不得不于10月12日离开巴黎，并且寻求在马恩河谷，他的故乡阿尔西，他所购置的住宅中休养。当他于11月21日回来时，塞纳河“血流成渠。”

在那个夏季，“伟大的公安委员会”，如同它开始所称呼的，采用它历史的形式。现在它包括12人：全部是中阶层份子，全都有良好教育与收入，全都熟悉法国革命哲学家与卢梭；他们之中8位是律师，2位是工程师；只有1位，赫波斯，做过劳力的工作；劳动阶级的独裁者之职位绝非属于劳动阶级。我们逐一予以介绍。

一、巴雷尔(Bertrand Barère)，38岁，增加若干职务于其份内工作；出席国民公会为公安委员会达成的决议辩护，并获得法令的认可；他是和蔼的并善于游说，能转变死刑判决文为雄辩术，以及

统计学成为诗词。他使若干敌人得以伴成,改变政治局势,并活到86岁;这足以使其了解政府的是非与理想。

二、比兰—瓦伦,57岁,认为天主教会是大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必须予以摧毁。他与各党派以及巴黎公社保持关系,并坚持他不妥协的政策,使其他委员为之恐惧。他负责各省协调与连系,领导新的行政机构,并且一度成为“公安委员会中最有权力的委员。”<sup>④</sup>

三、卡诺(Lazare Carnot),知名的数学家与军事工程师,负责掌握法国军队,策划运动,教导与训练将领,他的能力与忠诚获得普遍的尊敬。在今天他是公安委员会中唯一受到整个法国赞誉的人。

四、赫波斯,43岁,曾为演员,他忍受大革命前戏剧职业所受的压迫;他永不会宽恕资产阶级停止他的演员生活,或者教会约束他,并由于他不妥当的职业将他逐出教会。他成为12人中最严厉处理“贵族政治的商人”,并且提议,炸毁巴黎监狱——充满嫌疑犯,囤积者,与奸商。<sup>⑤</sup>

五、库车(Georges Couthon),38岁,因得过脑膜炎而残废,以致他不论到何处都必须乘坐轮椅;他却归罪于年轻时过度的性行为,然而他仍受到他妻子的崇拜。他是一个心肠仁慈与意志坚定的人,其以恐怖时代对中枢各省的仁政与众不同。

六、塞克尔,34岁,似乎是不得其所才成为12人执政团(Duolecemvirs)之一;他是律师行业中的贵族,一位富有的律师,著名于高尚风度与伏尔泰学派的才智。受革命浪潮影响,他参加攻击巴士底狱,写了1793年宪法的大部份,并且在阿尔萨斯担任公安委员会之严酷执行者。他生活舒适,并有一位贵族情妇,一直到1794年4月5日被斩首为止。

七、兰代(Robert Lindet),47岁,在逐渐由政府控制的经济中掌管粮食生产与分配,并且在军队、粮食与服装的补给上完成后勤



支援的奇迹。

八、普里厄(Claude—Antoine Prieur—Duvernois),被称为“黄金河岸的普里厄”(Prieur of the Côte d'Or),30岁,在军队弹药与物质供给完成相同奇迹。

九、路易(Pierre—Louis)“马恩河的普里厄”(Prieur of the Marne),37岁,耗费许多精力试图赢得布里塔尼的天主教徒与保皇党人加入大革命。

十、安德烈(André—Jeanbon Saint—André),44岁,属于新教徒系统,并受过耶稣会教育;成为商船船长,并为新教徒的牧师;他掌管布雷斯特(Brest)法国海军,并领导它与英国舰队作战。

十一、圣朱斯特,26岁,是12人中最年轻也最强壮的,他是恐怖时代最独断、热心与肆无忌惮的人。在皮卡第(Picardy)由他的寡母抚养长大,骄纵与爱羡慕,他热爱圣朱斯特(Saint—Just),不顾及各种法规,带着他母亲的银器逃到巴黎,但却花费到妓女身上,<sup>④</sup>因而遭到逮捕与短斯监禁,之后他学习法律,并写了20篇色情的诗,赞美暴行并称颂放荡为一神圣的权利。<sup>⑤</sup>在大革命时期,他首先发现他的快乐主义是明切地合法,但是它的理想鼓舞他捧高其个人主义成为罗马人的美德,以致要牺牲一切来达成那些理想。<sup>⑥</sup>他将他自己由享乐主义转变成禁欲主义,但保持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局。“当这天来到,”他写道,“我不能给予法国人民温和、有活力、理性的方法,却屈服于暴政与不公正,到那一天我将会杀死我自己。”<sup>⑦</sup>在《共和政体的制度》(Republican Institution, 1791年)一书中他认为财富的集中使得政治与法律的平等以及自由成为笑柄。私人财富必须加以限制;政府应以小农及独立技工为基础;教育与普遍的宗教必须由政府准备。法律应该是简要、清晰,并且不繁杂;“冗长的法律是民众的不幸。”<sup>⑧</sup>所有的男孩出生以后均由政府以斯巴达方式抚养,以蔬菜维生并训练他们作战。民主政治是好的,但在战时必需采取专制。<sup>⑨</sup>1793年5月10日,选出为公安委

员,圣朱斯特极力让自己辛苦地工作;他以工作繁忙到无娱乐时间来驳斥他有情妇的谣言。这位固执并且性急的年轻人变成一位严格的训练者;一位能干的创立人,一位大胆而常胜的将领。胜利地回到巴黎后,他被选为国民公会的主席(1794年2月19日)。他骄傲而有信心地凌驾他人,却谦恭地接受罗伯斯比尔的领导,为自己的失败辩护,并且在26岁11个月去世。

十二、罗伯斯比尔并未取代丹东成为12人之首脑或他们的意向;卡诺、比兰-瓦伦、赫波斯,过于固执而不能被领导;罗伯斯比尔从未成为独裁者。他工作原则是耐心学习与采取迂回策略,但非公开领导。他以简朴生活,夸奖劳工阶级与维护他们利益来维持在无裤党中的声望。1793年4月4日,他提呈国民公会“公民与人权之建议的宣言”:

社会有义务提供所有它的份子的生计;帮助他们获得工作或者替那些不能工作的人获得生存的方法……给予每一个缺少民生必需品的人必要的援助是每一个有盈余的人之债务……所有不假设人民是善良的,政府官吏是腐败的法规,是邪恶的……各国人民都是兄弟。<sup>⑤</sup>

按照一般人对这12人的粗浅认识,他们不完全只是杀人者。他们确实十分迅速地遵循由宗教战争与圣巴托罗缪(St. Bartholomew)夜晚大屠杀(1572年)留下的传统暴力。他们之中大多学会处死他们的敌人而无任何良心谴责,有时还俱有做善事的满足;但是他们宣称为战争的传统与需要。他们自己易遭到这些灾祸;他们之中任一人可能受到挑战、免职、与斩首;有几位是如此结束的。任何时刻,他们都可能遭到巴黎民众、或国民卫队、或野心将领的叛变;任一项前线失败或一省的反叛,都可能使他们为之动摇。同时他们日夜辛苦于不同的工作:从早晨8点到中午是在他们

的办公室或小组委员会；下午1点参加国民公会的会议；晚上8点到深夜聚集于他们会议室的绿桌旁商量或讨论。他们掌管里昂迅速资本主义化，吉伦特党在南部起义，与天主教与保皇党在西部起义所造成法国分裂的局面；此时它受到东北，西南与东面外国军队的威胁；它在陆地与海上遭到挫败，并且每一港都被加以封锁。当这伟大的公安委员会瓦解后，法国籍独裁与恐怖的力量达成政治的统一；一批新的将领，受过新的训练，常常由卡诺与圣朱斯特率领，发动战役，以决定性胜利挫折敌人；并且，法国，几乎独自与整个欧洲为敌，却显现了除她自己内部外各方面的胜利。

## 第五节 恐怖时代

(公元1793年9月17日—1794年7月28日)

### (一) 观众的渴望

恐怖时代是一种周期性的闹情绪与一段特殊的时间。严格地说，它应从1793年9月17日，颁布“嫌疑犯法”(Law of Suspect)，至1794年7月28日，罗伯斯比尔被处死刑为止。但是，这曾经有过1792年9月的恐怖与1795年5月的“白色恐怖”(White Terror；1795年，保皇党员对革命派实行的猛烈报复)；另一次恐怖是在拿破仑崩溃之后。

这些著名的恐怖时代发生原因是外来的危难与内部的不稳，导致民众恐惧与骚动，与戒严法的实施。第一联盟国(7月23日)

夺回迈因茨,进占阿尔萨斯,并且攻入距巴黎 100 英里的瓦朗谢纳(Valenciennes);西班牙军队也占领佩皮尼昂(Perpignan)与巴约纳(Bayonne)。法国军队处于混乱状态,法国将领不服从他们政府的命令。8月29日保皇党人将一个法国舰队与土伦(Toulon)的重要海军基地和一兵工厂交给英国。大布里颠统治了海洋,并且能随时占领在3个洲的殖民地。得胜的联盟国讨论瓜分法国,并且当他们有进一步胜利时恢复封建权。<sup>⑤</sup>

事实上大革命是支离破碎。旺代燃烧着反革命的火焰。天主教的起义者已打败在维耶(Vihiers)的政府军队(7月18日)。贵族,在国内的或移民在外的,都积极策划复辟。里昂、布尔日(Bourges)、尼姆(Nimes)、马赛、波尔多、南特、布雷斯特已陷于起义的吉伦特党。富人与穷人间之阶级斗争变为剧烈。

法国经济本身是一个战场。5月4日与9月29日设立的价格管制已被贪心者的机智破坏。乡下的穷人同意最高价格;农民与商人却反对,并且不断拒绝生产与分配限价的粮食;从批发市场和农场送到城市商店的货品越来越少,以致只能满足最早在店门前排队的几位购买者,饥饿的恐惧已传遍巴黎及乡镇。在巴黎、桑利(Senlis)、亚眠、鲁昂,民众抗议食物不足并准备推翻政府。6月25日,鲁克斯率领他恩蓝格(Enragés)的队伍到国民公会要求将所有投机商——其中包括一些代表——逮捕并迫使他们交出最近获得之财富。

你们的不是民主政治,因为你们允许富有。在最近四年内,富人收获了大革命的果实;商业的贵族,比贵族更可怕的压迫着我们。他们的榨取是无限的,并且我们可看出商品的价格惊人地在上升。投机商与工人间恶烈的斗争应该到了结束的时候……恶人的财富是比人类的生命更神圣吗?行政机构供应于分配生活的必需品,正像军队

管理他们自己一样。(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变,这就未具备向富人征收资本的必要条件,因为)资本家与商人将由无裤党措筹相同的款项……如果独占与横征暴敛不能予以消除。<sup>⑥</sup>

赫伯特公开抨击资产阶级是大革命的背叛者,并且促使工人夺取这懦弱政府的权力。8月31日,一位代表做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演说:让恐怖时代成为法治的全盛时代。<sup>⑦</sup>9月5日,来自巴黎各区的群众要求“斗争暴君、囤积者、与贵族,”并游行至巴黎公社在市政厅的总部。市长帕什(Jean-Geillaume Pache),与检查官肖梅特,以及他们的代表到国民公会,要求大革命的军队携带手提式的斩首机巡视法国,逮捕吉伦特党人,迫使每一农民交出他们储存的产品,否则将被就地处死刑。<sup>⑧</sup>

在外国侵略与国内处于大革命的革命情况下,公安委员会成立了,并且领导了使法国走向胜利的法国军队,以及融合纷乱的国家成为统一的恐怖份子的机构。

8月23日,按照卡诺与巴雷尔(Barère)提出的大胆计划,国民公会发出法国史无前例的征集令:

从现在起到敌人被驱逐于法国领土之外为止,所有法国人受征召长期服役于军队。年轻人赴战场,已婚的人打造武器与运送粮食,女人将制作帐篷与服装,并服务于医院,老人到公共场所提高战士的勇气,并传播国王们可恶与国家之统一。

所有未婚的人,从18岁到25岁,在“法国人民对抗暴君!”旗帜下应征入营。

不久巴黎变成一座兵工厂。图勒里宫,与卢森堡

(Luxembourg)的花园以生产其他物资为掩护,每日制造大约 650 枝步枪。失业消除了。私人所有的武器、金属、过剩的衣服全部征用;成千的工厂被接管。资本与劳工均被募集;从富人榨取了 10 亿法朗之贷款;价格由政府决定。一夜之间,法国成为一极权主义国家。铜、铁、硝石以前部份依赖进口,现在必需来自被封锁法国的每一边境国土与每一港口。幸运的,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不久却被处死刑)在 1775 年将火药的品质改良,并且增加其生产量;法国军队有比他们敌人较好的火药。科学家们像蒙日(Monge)、贝托莱(Berthollet)、与富克鲁瓦(Fourcroy)都请求寻找必要物质的供给,或发明代替品;在那时他们是各工作场所的主管,并为他们的国家热忱服务。

到了 9 月底,法国已有 50 万武装人员。他们的装备仍然不足,他们的训练不良,他们的士气消沉。宣传首次成为国家的事业,几乎是独占事业,布绍特(Jean-Baptiste Bourchotte),陆军部长,付给报章杂志费用以介绍国家实况,并且发行报纸到很少阅报的军营。公安委员会的委员或代表向前线军队演说并慰问将领们,新战役的第一次交战——对抗美国与奥地利的军队,发生在 9 月 6—8 日——于翁斯科特(Hondschoote)——这是德布勒(Debrél),公安委员会委员,乌沙尔(Houchard)将军建议退却后再度反败为胜。由于这次与其他几次的失误,这位将军于 1793 年 11 月 14 日被送上断头台,22 位其他将领,几乎全属于大革命以前的,因为过失,或漠不关心,或忽略公安委员会命令而被监禁,较年青的男人,受过革命训练,接替他们的位置——像奥什(Hoche)、皮舍格吕(Pichegru)、茹尔丹(Jourdan)、莫罗(Moreau),勇敢地采用卡诺的持续攻击政策。10 月 16 日,在瓦蒂尼(Wattignies),当 5 万法国新兵遭遇 6.5 万奥地利军队时,40 岁的卡诺持着一枝毛瑟枪与茹尔丹的部队加入战斗。这不是一项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却提高了大革命军队的士气并且增加公安委员会的权利。

9月17日,温和的国民公会通过“嫌疑犯法”,授权公安委员会或它的密探,得以逮捕任一回国移民,任一移民亲属,任一停职而未复职的公务员,任一反对革命或战争的人。这是苛刻的法律,除了革命党人——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徒与资产阶级被迫生活于遭受逮捕甚至死亡的恐惧中;公安委员会的正当理由是至少需维持战时的对外统一以求国家的生存。一些移民赞成公安委员会的理由是危急的情况下害怕与恐怖是合法的统治工具。蒙摩利(Montmorin)伯爵,路易十六的外交部长,于1792年表示:“我认为用恐怖主义处分巴黎人是必需的。”法兰克朗(Flachsländer)伯爵认为法国与联盟国的敌对将“一直继续到国民公会瓦解”。普鲁士国王的一位大臣谈论移民:“他们的国家是在恐怖中。如果我们放弃他们的国民并任他们被报复,法国立刻将成为一很大的公墓。”<sup>⑥</sup>

至于皇后她将面临国民公会之恐怖或仁慈的决定。撇开她早期的奢侈,她干涉政府事务,她厌恶巴黎民众为众人所知,这是毫无疑问地她曾与移民及外国政府联络阻挠大革命并且恢复法国君主传统的权力。在这些行动中,她觉得她是利用自卫的人权;她的控诉者认为她违犯国家选出代表通过的法律。很明显地,她向法国敌人泄露皇室会议的秘密计划,甚至大革命军队的战役计划。

她为路易十六生了4个孩子:一个女儿,玛丽·泰雷兹(Marie-Thérès),现已15岁;一个儿子在摇篮时期去世;第二个儿子死于1789年,第三个儿子,查理(Louis-Charles),现已8岁,他被考虑成为路易十七。在她的女儿与她的小姑伊丽莎白帮助下,她热切地照顾他,然而连续的监禁损坏了男孩的健康与精神,使她为之绝望。1793年3月,她为她提供逃亡计划;她拒绝了,因她必须留下她的孩子。<sup>⑦</sup>当政府知道此一遗弃的计划时,它不顾他母亲的反对将皇太子移往他处,并将他与他的亲戚隔绝。1793年8月2日,皇后、她的女儿、她的小姑,于监禁在祠堂内一年后又被移至Conciergerie——法院的一部份,为该建筑管理人占有。在该处她

被称为“寡妇卡普特”(Widow Capet),受到比以前较好的待遇,甚至让教士到她房中做弥撒。不久她又尝试另一次逃亡;但却失败。因此她被移送到另一室,并予更严密的看守。

9月2日,公安委员会决定她的命运。一些委员赞成保全她的性命做为与奥地利交换和平的人质。巴雷尔(Barère)与安德烈(Saint Andre)要求将她处死,当做以鲜血结合判决签署者的方法。来自革命自治团体的赫伯特告诉12位陪审:“我已经以你们的名义答应将安托瓦妮特的头送给迫切想获得它的无裤党,并且缺少他们的支持你们将无法生存……如果我必须等待很久才能得到它,那我将亲自割下它。”<sup>⑨</sup>

10月12日,皇后接受长久的初步审问;并在10月14日与15日,富基坦维尔为首席检查官在大革命法庭审判她。第一天的审问是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与下午5点至11点,第二天是从上午9点至下午3点。她被控将数百万法郎从法国财政部移至她奥地利的哥哥约瑟夫二世处,并邀请外国军队进入法国;还让她的儿子堕落。只有最后一项控告使它丧失勇气;她回答道,“天性使我拒绝回答如此不利于母亲的控诉。我向在此的所有母亲请求帮助。”听众被这位女人的目前处境所感动。她年轻时的美丽与华服早已盛传欧洲;现在38岁,已有许多白发,并穿着孝服,以勇气与尊严反抗那些明显地用延长精神与肉体痛苦来折磨她的人。当对她的迫害结束,她也因屡经打击而失明。她在牢房中已知道她的判决是死刑。

现在受到单独囚禁的她,写了一封诀别信给伊丽莎白夫人,请求她将国王留给他们的指引转给她的儿子与女儿。“我的儿子,”她写着,“必需永远不能忘记他的父亲的遗言。”<sup>⑩</sup>这封信并未送给伊丽莎白夫人;它被富基坦维尔扣留,交给罗伯斯比尔,成为她死后所发现的秘密文件之一。

1793年10月16日早晨,死刑执行者桑松(Henri Sanson),到



她的牢房，反缚她双手，并且把她的头发齐颈割掉。她乘坐一辆马车经过站满士兵的街道，穿过仇恨并辱骂她的群众，到达大革命广场。中午桑松向群众举起她被割下的头。

在大革命法庭大步行动后，它现在宣布每天判决7人死刑。<sup>⑥</sup>所有的贵族都被逮捕，许多已被处死刑。自6月2日起被收押的21名吉伦特党人，于10月24日受审。韦尼奥与布里索的雄辩对他们完全无用；全部给予迅速与提前处死刑。其中一位一法拉索(Valazé)一离开法院前就举刀自尽；他的尸体与其他被判死刑的一起运至断头台。“大革命，”韦尼奥说，“像农神(Saturn)，它正在吞噬它的后代。”<sup>⑦</sup>

由于人民的愤怒与害怕这种事件发生到正在康西格里等待她命运的梅萨身上，该处也将成为她走上断头台的踏脚石。她的监禁还有些趣事；若干朋友送给她许多书籍与鲜花；她收集许多普鲁塔克与泰西塔斯(Tacitus)的作品而使她的牢房成为一小型图书馆。她埋头苦写她的往事，作为一强烈的止痛剂，并定名为《求助于公正的后代》(Appel à l'impartiale postérité)。当她描写她的年轻时代愉快的回忆时，使她目前的期待更为苦痛。因此她于1793年8月28日写道：

我感觉到我已尽失追寻这些回忆的决心，我国家的悲惨境况折磨着我；一种不知不觉的意气消沉刺穿我的心灵，冻结我的想像力。法国已变成一屠宰的坟场，恐怖的竞技场，与她的子孙彼此争夺及破坏的处所……历史绝不能掩饰这可怕的时期，或这些穷凶极恶的野蛮行为……这是否就是罗马或巴比伦比得上巴黎之处？<sup>⑧</sup>

预料她的死刑时间快要来到，她写了一些诀别的话给她的丈夫与仍然为他们做逃亡准备的情人：

我的朋友，愿好运能使你到达美国，这是自由唯一的避难所\*……而你，我的丈夫与伴侣，老的太早使你衰弱，艰难的逃避着暗杀，我还能再见到你吗？……我还有多久可做为我祖国的凄惨与同胞堕落的证人？<sup>⑧</sup>

没有多久。1793年11月8日，她被大革命法庭控告与罗兰共谋滥用公款，并且由她的牢房写怂恿信给巴尔巴鲁与比佐，让他们煽动暴徒反抗雅各宾党控制国民公会。当她为自己辩护时，那些经过仔细挑选出的旁观者驳斥她是女叛国者。她被宣判有罪并于同日在大革命广场处以死刑。她注视着由大卫设在这庄严广场的自由雕像，大喊着，“自由啊，以你的名义犯了何等罪孽啊！”<sup>⑨</sup>

一列革命份子跟随着她。11月10日轮到巴伊(Bailly)市长——天文学家，他给过国王红色帽章，并命令国家卫队向练兵场的请愿者射击。11月12日，吉伦特党人艾加里特(Philippe Egalité)被捕；他不能了解山岳党何以要如此迅速处死一位忠心的党羽；但是在他的血管里流着国王的血液，并渴望获得王位；谁能知道这个愿望会在何时使他再度疯狂？接着在11月29日，是巴纳，他曾想保护与左右国王。然后将将领屈斯蒂纳、乌沙尔、比龙(Biron)……。

罗兰，感谢冒他们生命危险保护他的朋友，于11月16日，单独步行外出，倚靠在一树下，写了一封永别的短笺：“得知我的妻子已被谋杀，这恐惧与愤怒使我放弃隐藏。我不想以罪犯之名久活于世上。”<sup>⑩</sup>然后他以剑刺进自己的胸膛。孔多塞，写了一首胜利的赞美歌之后，服毒自尽(1794年3月28日)。巴尔巴鲁，举枪自杀，未能成功，被斩首于6月15日。佩蒂翁与比佐，在政府的特务追缉

\* 5年之后国会通过“外国人与暴动法”，严格的禁止公开批评政府。

下,自杀于波尔多附近的田野中,他们的尸体于6月18日发现时,有一半已被狼吃掉。

## (二)在各省的恐怖

吉伦特党人中仍有若干保住了脑袋的。在有些城镇,像波尔多与里昂,他们获有较高的职位;雅各宾党认为必须将他们排除;如果他们对各省的自治行动被压制,雅各宾党将可控制整个法国。由于此与其他目的,公安委员会派它的代表到法国各处,并给予他们在各指派的区域有绝对的权力。他们能免职民选的官吏并且任命其他的,逮捕嫌疑犯,替陆军征兵,征收税捐,实施价格管制,强制贷款,索取农产品、衣服、原料,并且设立或认可地方的公安委员会做为巴黎伟大公安委员会的地方机构。代表常常在无情与敌对情况下完成革命与军事组织的奇迹。他们对反叛的镇压毫不仁慈,有时还过度激烈。

他们之中最成功的是圣朱斯特,1793年10月17日,他与勒巴(Joseph Lebas)(他高兴地让他领导)被派去拯救在语言、文学、与习惯上与毗邻的德国相同,而不愿接受奥地利军事侵略的阿尔萨斯。在克莱茵河区的法国军队受挫于斯特拉斯堡,并有失败主义与兵变的情绪。圣朱斯特了解军队遭受到虐待,缺乏领导,也许有叛变之虞,因为军官们对大革命认识不够;他将他们中的7名处死刑。他听取牢骚,并以果断方法加以整治,他从富有阶层征收所有过剩的鞋子、外套、与帽子,并从193名最富有的市民那里征收900万法朗银币。无能与迟钝的官员被免职;已被判决的贿赂者均处死刑。当法国军队再度与奥地利军队遭遇于阿尔萨斯时,入侵者被打退了,该省恢复由法国管辖。圣朱斯特回到巴黎,渴望做些其他的事,几乎忘记他与勒巴姊姊的婚事。

李·邦(Joseph Le Bon)并未过着公安委员会代表的生活。受

到他的雇主警告小心“虚伪与错误的人道”之后，这位蓝眼的前任教区牧师，想在6星期内“减少”康布雷(Cambrai)的知名之士150名，阿拉斯的392名；他的秘书报导他死于“一种特别的热病”，并且，在送进家门时以垂死之脸部表情来作弄他的妻子。<sup>⑧</sup>他自己是于1795年被逮捕入狱。

1793年7月卡里尔(Jean-Baptiste Carrier)被派至旺代区镇压天主教的叛变，并且维持南特的安全以防更多的叛乱。公安委员会的塞克尔，向他表明，“当我们获有确定性的胜利时，我们能变得慈悲些。”<sup>⑨</sup>卡里尔受到鼓励。他宣布法国无法供应其人口迅速增加所需粮食，因此以减少贵族、教士、商人、与行政官员的措施将是合于人民意愿的。在南特他反对审判因为浪费时间；所有的嫌疑犯(他命令法官)“必须在几小时内予以除去，否则我将杀死你与你的同党。”<sup>⑩</sup>因为在南特的监狱已关满嫌疑犯与已定罪的犯人，并且还缺少粮食，他命令他的随从以驳船、木筏、与其他船舶装载1500名男女老幼——让教士优先——并凿沉这些船只于卢瓦尔河。他以此种及其他方法在4个月内处理4000名不良份子。<sup>⑪</sup>他以此合于战时法治来说明他所作的正确；旺代居民发生暴动，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大革命的敌人一直到死为止。“我们将使法国成为一坟场，”他发誓，“而且并不以我们自己的方法使它再获新生。”<sup>⑫</sup>公安委员会必须威胁要逮捕他才可抑制他的热忱。他却不恐惧；无论如何，他说，“我们将一个接一个的送上断头台。”1795年11月，他被传到大革命法庭，并且在12月16日证实他的预言。

弗雷罗(Stanislas Fréron)与公安委员会其他官方工作人员在残酷地罗纳河(the Rhone)与瓦尔河(the Var)区域施用暴力；受害者在马赛有120名，土伦有282名，奥朗日(Orange)有362名。<sup>⑬</sup>相对的库车，在他任务中最仁爱的表现是在多姆山(Puy-de-Dôme)省为陆军招募新兵。在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他重组工商事业来生产新团队所需的物质。当市民看见他以正义与人

道方式运用他的权力时,他们十分喜欢他,并且轮流扶持他到坐椅上。他任职期间从未有人被“革命的法官”处死刑。<sup>⑤</sup>

富歇(Joseph Fouché),曾为拉丁语与物理学的教授,现年34岁,尚未成为巴尔扎克(Balzac)所谓“我所见过最有能力的人。”<sup>⑥</sup>他看起来似乎很阴险:瘦长,尖刻,双唇紧闭,眼睛与鼻子尖锐、冷静、神秘、固执;他与塔列朗善长于迅速改变形貌以及用不当方法求生存。从外表观察他是一个忠厚的人,有谦虚的习惯与豪放的个性。1792年,他被南特市选入国民公会,首先他倾向吉伦特党;后来他看出它的没落以及巴黎的最高权位,他转向山岳党并发布一本小册子要求从资产阶级到劳动阶级都支持大革命。为了战争,政府应“收取任何超过人民需要的东西;奢侈品是明显与无理由地违反人民的权利。”所有的黄金与白银都应没收,一直到战争结束。“我们将以强硬态度充份地行使委派给我们的权利。姑息措施的时期……已经过去……帮助我们贯彻实行。”<sup>⑦</sup>当代表到达卢瓦尔河下游各省,特别是在讷韦尔(Nevers)与穆兰(Moulins),富歇对私有财产全面加以斗争。他所榨取的金钱、珍贵金属、武器、衣服、与食物,足够装备他征召的1万名新兵。他从教堂抢到金或银的圣体匣,船舶,大烛台,并转送给国民公会。公安委员会发现阻止他这种热忱是不利的,并认为他正是有助于赫波斯恢复里昂对革命的信心。

里昂几乎是资本主义法国的首府。在它13万的居民中的资本家与整个法国其他各地相连系,商人的销路遍及全欧洲,工业界巨头控制了100家工厂,并且许多劳动阶层人民很高兴地知道他们在巴黎的相同阶层已差不多控制了政府。1793年的年初,在沙利耶(Marie-Joseph Chalier)领导下也获得相同的胜利。但是宗教比各阶层力量都大。至少有半数的工人仍是天主教徒,并愤恨雅各宾党反基督徒的政策;当资产阶级动员它不同的力量反对劳动阶级专制时,劳动阶层分裂了,并且一个商人、贵族、与吉伦特党的联盟

排除激进派政府，并杀死查尔与他的 200 名部下（1793 年 7 月 16 日）。成千的工人离开城市，暂居于郊外，并且等待下次革命的机会。

公安委员会派出一支推翻胜利资本家的军队，并且由来自克莱蒙费朗，双腿残废的库车率领；10 月 9 日，它以武力推进并重建雅各宾党的权力。库车认为仁慈的政策适合于一个依赖工厂与商店不停操作与营业的城市，但是巴黎公安委员会有其他看法。10 月 12 日，它通过国民公会，派给库车一道由罗伯斯比尔策定的训令，愤怒地为查尔与 200 名激进派份子报复。它的部份内容是：“里昂这个城市将被摧毁。每一富人的住宅将毁掉……里昂这个名字将从共和国城市的名单中除去，所剩下住宅的整体名称是 Ville Affranchisée（自由市）。里昂的废墟上将用以处理罪犯后代与惩治保皇党人。”<sup>⑨</sup>

库车不喜欢被派定这项任务。他责怪这些较高价值住宅的摧毁，然后在克莱蒙费朗施用更多同性性质劳工。（11 月 4 日）他在里昂被赫波斯接替。他们以一嘲弄性宗教典礼纪念查尔“为人民牺牲的救世神”；引导行列的是一匹戴着主教法冠的驴子，并在尾上系着十字架与一本《圣经》；在一公众聚集的广场上用赞美词以及《圣经》，木制圣人偶像与祈祷书及圣礼薄饼所作的营火对烈士们表示拯救。<sup>⑩</sup>为让里昂受到革命净化，赫波斯与富歇设立 1 个 20 人的“临时委员会”与 1 个 7 人法庭审判嫌疑犯。这委员会公布一项被称为“第一次共产党宣言”（First Communist Manifesto）的主义之宣言。<sup>⑪</sup>它建议“广大的穷人阶层”与大革命联盟；它公开批评贵族与资产阶级，并且告诉工人们：你们受到压迫；你们必须打倒你们的暴君！”法国领土上所有的产品都属于法国；所有的私有财产必须由共和国处理；并且社会公平的第一步是从每一个每年所得一万法朗的人征税 3000 法朗。大量的金钱得自监禁的贵族、教士、及他们被没收的财产。

这个宣言不能完全为里昂人民接受,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成为中等阶级,11月11日,1万名妇女签名请愿应以仁慈方式对待被囚禁在监狱中的成千男女。委员们冷酷的回答道,“安静地做你们的家务……让我们不再看到让你们受耻辱的眼泪。”<sup>⑧</sup>12月4日,也许让事务清楚地处理,60名犯人,被新法庭判决死刑,并被带至罗讷河附近一处空地,以机枪或大炮射杀。第二天,在同一地点,209名囚犯被以相同方式处死刑;12月7日又多杀死200名。至此以后屠杀改以斩首机缓慢进行,但是尸体的臭气散布至城市。1794年3月,在里昂被处死的达到1667名——三分之二是中上阶层。<sup>⑨</sup>成百的昂贵住宅被吃力地摧毁。<sup>⑩</sup>

1793年12月20日,一群里昂市民代表来到国民公会请求终止报复;赫波斯被驱至巴黎,并且他成功地维持他的政策。富歇控制里昂,并使恐怖持续着。他获悉土伦再度被占领后,写信给赫波斯:“我们只有一种方法庆祝胜利。今晚我们在闪电般炮火下打发213名叛徒。”<sup>⑪</sup>1794年4月3日,富歇被召至国民公会表白他自己。他逃避惩罚,但永不忘记罗伯斯比尔控告他暴虐残酷;有朝一日他将报此仇恨。

公共公安委员会慢慢觉察到各省的恐怖已被实施到十分无节制的程度。为此事,罗伯斯比尔召开见卡里尔、弗雷罗、塔利安(Tallien),并且要他们的工作报告,各省的恐怖于1794年5月终止,但却在巴黎激烈的进行。至此(1794年7月27—28日)它已夺取2700巴黎人的性命,整个法国受害者达1.8万人;罗伯斯比尔也成为受难者。<sup>⑫</sup>其他的猜测将总数增加到4万人。<sup>⑬</sup>那些被囚禁的嫌疑犯总计约30万人。当被处死刑的人之财产归属到政府时,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恐怖政策。

### (三)反宗教战争

现在最深的分歧是处于那些在世界变得难以理会、无意义、与悲惨之时，以宗教信仰作为最后依赖的人与那些生来认为宗教为阻碍通往合理与自由道路的一种受人支配与浪费金钱的迷信之间。这种分歧程度在旺代是最深——卢瓦尔河与拉罗谢尔(La Rochelle)间法国临海的区域——酷冷的天气，多岩而不毛的土地，出生与死亡反覆不定，使得人口几乎少到像伏尔泰的智慧与欧洲18世纪思想的启蒙运动的影响。城市的人与农人欢迎大革命；但是立宪会议颁布“教士法”——没收教会的财产，使所有教士成为政府的公务人员，并且要求他们宣誓效忠这曾剥削他们的政权——农人支持他们的教士拒绝附和。年轻人被召为义勇军或被征入陆军来向暴徒开火；为何这些青年一定要舍命保护一个异教徒政府，而非他们的教士与圣坛及家庭的守护神？

因而在1793年3月4日，旺代发生暴动；9天以后，它波及到整个区域；5月1日以前3万名暴徒已被武装；几名保皇党的贵族联合地方领袖，并将他们的新兵加入到受过训练的军队；国民公会了解他们的力量时他们已占领图阿尔(Thouars)、丰特奈(Fontenay)、索米尔(Saumur)、昂热(Angers)。8月，公共公安委员会派了一支军队由克莱贝尔(Kléber)率领入旺代，受命摧毁农民武力并且蹂躏所有支持他们的区域。克莱贝尔于10月17日击溃天主教在绍莱(Cholet)的军队，并于12月23日在萨沃奈(Savenay)将其完全瓦解。巴黎派出的军事委员被安置在昂热、南特、雷恩(Rennes)与图尔(Tours)，持有命令处死任何有武器的旺代居民；昂热一带有463人在20天内被处死刑。在旺代居民被奥什(1796年7月)征服前，已有50万人丧失性命于此新的宗教战争。

在巴黎大多数的居民已不关心宗教。在此方面，山岳党与吉伦



特党间有一薄弱的协定；他们联合起来削弱教士的权力，并设立异教的历法。他们鼓励教士结婚，甚至逐放任何曾阻挠它的主教。在大革命的保护下，有 2000 名教士与 500 名修女选择配偶。<sup>④</sup>

公安委员会的代表通常使教士失去基督教的特质成为他们任务过程中一项特别的要素。他们将一名教士监禁直到他结婚为止。在讷韦尔，富歇发布了严格规则；教士必须结婚；必须生活简单像一名使徒（基督 12 弟子之一），必须不得穿着教士服装，或执行宗教典礼于教堂以外的地方；基督教徒的葬礼仪式被废除，墓地必须设置碑文让民众知道“死亡是永久的睡眠。”他劝导一名总主教与 30 名教士丢弃他们的修道服并戴上革命的红色小帽。在穆兰他骑乘于一行列前头，沿途他击碎所有的十字架，耶稣受难像，宗教的偶像。<sup>⑤</sup>在克莱蒙费朗、库车宣称对基督的信仰已变成为财务的欺诈。他雇用一名内科医生当众证实在一瓶由奇迹产生的“基督的血”，只不过是染色的松节油。他终止政府对教士支付报酬，没收教堂的金银器皿；并且宣布不能转变成学校的教堂将被他拆毁改建成成为穷人住宅。他公开一种大自然是上帝的神学，并且天堂是地上的乌托邦，因而它的人民都是善良的。<sup>⑥</sup>

反基督教信仰运动的领袖是巴黎“市议会”（City Council）的赫伯特与巴黎公社的肖梅特（Chaumette）。受到肖梅特演说与赫伯特新闻的鼓动，一群无裤党人于 1793 年 10 月 6 日侵入圣但尼（St. Denis）修道院，把埋葬在那里的贵族棺材翻空，并融化金属制品以备战争之需。11 月 6 日，国民公会授权法国各地方行政区（Commune）正式舍弃基督教的教会。11 月 10 日，巴黎劳工阶层与下等社会的男女以模仿宗教的服装与行列游行穿过市区；他们进入国民公会大厅，并向代表要求参加在圣母院（Notre-Dame）的夜晚庆祝典礼。在一歌剧院中康德莱（Mlle. Candeille）穿着有三色旗的服装并戴红色小帽，像自由女神般的站着，并且由参加的女士唱谢尼埃著的“赞美自由”。礼拜者在礼拜堂中央跳舞与唱歌，而敌

对的新闻记者与自由的暴利者在会堂附属的礼拜堂举行爱的仪式。<sup>⑧</sup>11月17日,戈贝尔(Jean-Baptiste Gobel),巴黎的主教,屈服民众的要求,出席国民公会,发誓放弃他的办公室,将他的主教牧杖与戒指交给主席,并且戴上表示自由的红色小帽。<sup>⑨</sup>11月23日,巴黎公社命令巴黎所有基督教的礼拜堂关闭。<sup>⑩</sup>

国民公会的第二个考虑,是想知道它并未重复它的反基督教的行动。代表几乎都是不可知论者,泛神论者,或无神论者,但是他们其中几位想到受激怒的虔诚天主教徒的智慧,他们仍然处于过半数的优势地位,并且有许多准备以武力反对大革命。有些,像罗伯斯比尔与卡诺,觉得宗教是唯一力量能防止社会不断发生的骚动、反抗根深蒂固而无法被法律消除的不平等的。罗伯斯比尔相信天主教的教条是迷信有组织的探究,<sup>⑪</sup>但是他认为无神论是一种不可能智识的不谨慎假设而不予接受。1793年5月8日,他曾责备哲学家为藐视人民并贪图国王奖金的伪君子。11月21日,在丧失基督教特质庆典的高潮,他告诉国民公会:

每一个哲学家与每一个人,可以采取任何一种他所满意的无神论主张。任何人想有如此的主张而构成犯罪是不合理的,但是采用如此制度的政府官员或立法者将更为愚笨……。

无神论是贵族政治的。一位全能的上帝照顾受压迫善良的人,并惩罚得意洋洋的罪犯乃是人民的基本观念,这是欧洲与世界人民的观点;这是法国人民的观点,这种观念是不属于宗教或迷信或礼节;它仅仅是属于难以了解的权能,罪犯的恐怖,美德的持久与慰藉。<sup>⑫</sup>

丹东同意罗伯斯比尔:“我们永远不为了设立无神论的权势而绝灭迷信的势力……我要求终止在国民公会中那些宗教的假面戏。”<sup>⑬</sup>

1793年12月6日，国民公会再度准许信仰的自由，并且保证对忠贞教士主持的宗教仪式予以保护。赫伯特抗议他极端不喜好无神论，但是他加入削减罗伯斯比尔的声望一派。罗伯斯比尔视其为主要敌人并伺机消灭他。<sup>\*</sup>

#### (四)大革命吞灭它的后代

赫伯特的势力是在无裤党，也许伸展至各党派，并且利用激进派力量进入国民公会而且恢复巴黎对全国的统治。罗伯斯比尔的势力，以前建立于巴黎民众，现在为公安委员会，他藉较优的情报、决策、与行动的机构掌握国民公会。

1793年11月，公安委员会的名望达到最高峰，部份由于成功的国家总动员，但主要由于几处前线的军事胜利。新的将领——茹尔当、克勒曼、克莱贝尔、贺克、皮舍格吕——为大革命后辈人物，但受到旧法规与战术或没落保皇党的束缚；他们统率的100万人仍无适当装备与训练，但是有一种思想鼓舞他们的勇气；如果敌军攻破法国防线，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可能得到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受挫于凯撒斯劳滕(Kaiserslautern)，但是他们收复并占领兰道(Landau)与施派尔。他们将西班牙人驱至比利牛斯(Pyrenees)。并且，在年轻的拿破仑协助下，他们再度占领土伦。

8月26日，一支英国、西班牙与意大利混合军队，受到英、西舰队保护与地方保守派的鼓动，获得在地中海战略性的港口与军

---

\* 参看莫莱(John Morley)1880年左右之作品：“在赫伯特、肖梅特、与巴黎市议会一面，与公安委员会与罗伯斯比尔另一面之间争端，是当今社会最刺激争论的具体形式。在无上帝信仰情况下，社会和谐是否能存在？肖梅特答案是肯定的，罗伯斯比尔答案是否定的……罗伯斯比尔遵循卢梭……肖梅特遵循狄德罗。”<sup>⑥</sup>

械库。一支革命军队围攻它3个月之久却徒劳无功。岬角(Capl'Aiguillette)分割此港。并且俯视着军械库;这个据点之获得将是整个形势的掌握;但是英国人已用一非常坚固的要塞堡垒称之为小直布罗陀(Little Gibraltar),是封锁接近该岬角的陆地。拿破仑,24岁,立刻看出如果敌人的舰队能被迫离开港口,则其驻军,将丧失来自海上的补给,因此不得不放弃该城。勇敢而冒险的侦察之后,他发现有一处丛林,可让他的炮兵安全地轰击该要塞。当他的火炮摧毁它的墙壁后,一营法国军队攻入要塞,杀死防御的军队,掳获或替换它的大炮。这对敌人舰队构成威胁;领主胡德(Hood)命令驻军放弃该城,以及舰队离开港口;1793年12月19日,法国军队收复土伦。奥古斯丁,公安委员会的地方代表,写信给他的哥哥称赞这位年轻炮兵之“卓越的功绩”。一个新的英雄事迹由此开始。

这些胜利,与克莱贝尔在旺代的那些人,使公安委员会能自由的处理内政事务。此时有一明确的“外国阴谋”要暗杀革命的领袖,但却未发现确实证据。贪污遍布于陆军补给品的生产与交货方面:“在南方的陆军要求三万条马裤——一个最无耻的要求。”<sup>⑥</sup>投机正助长市场价格操纵并使商品价格提高。一项政府的限价措施已被设置于重要的产品,但是生产者抱怨如果对工资不做同样的控制,他们不能固定其价格,通货膨胀被抑止了一段时期,但农民、制造业、与商人削减生产,并且失业随着物价上升而增加。因为供给缺乏,主妇们必须排队才能购得面包、牛奶、肉类、牛油、油、肥皂、蜡烛、与木材。排队有时自午夜开始;许多男女躺在门阶或人行道上等待着商店开门与行列的移动。饥饿的妓女到处找寻生意。<sup>⑦</sup>许多地方暴徒冲进商店并抢走商品。市政的劳务已经停顿;犯罪盛行;警察稀少;垃圾散布并污秽了街道。类似的情形发生在鲁昂、里昂、马赛、波尔多……。

这些表示公安委员会对整个经济处理失当,并且投机商获得

曾为罗伯斯比尔生存主要依靠的巴黎无裤党，与政府的财富，然后改变为支持赫伯特与肖梅特，而且热诚的听取所有财产，所有财富，或至少所有土地国有化的建议。有一党派的领袖建议将所有的富人处死刑以为解决经济穷困的办法。<sup>⑧</sup>1794年前，工人有一共同的不满，那是资产阶级已暗中获取了大革命。

1793年底，公安委员会受到一有力的革命领袖与一著名新闻业者新的挑战。纵使丹东表面上极为残忍，他内在的仁慈性格使他逃避皇后的死刑与恐怖时期的暴乱。当他由阿尔西回来后，他主张将入侵者驱逐于法国领土以外，并将大革命最主要的敌人予以处死，如此就无太多理由要继续恐怖与战争了。当英国提议和平，他建议应该接受。罗伯斯比尔则拒绝，并且基于政府仍然受困于不忠，阴谋与腐败的理由，更加强恐怖手段。德穆兰，一度曾为丹东的秘书，期望他所钦佩的朋友，像他一样，获得幸福的婚姻，他出版一份刊物，《旧式的考狄李尔》(Le Vieux Cordelier)，并且要求结束恐怖政策。

自由既不是歌剧中半神半人的少女，也不是红色的无边帽，更不是脏的衬衫与破布。自由是快乐、合理、平等、正义、人权宣言，你们庄严的宪法(仍然在冬眠)。你们是否愿让我认识自由，让我倒在她的脚前，并让我为她流干血液？并释放你们称为嫌疑犯的20万市民……不要认为此将成为一般民众的致命措施。相反的，它是你们能采取的最具革命性的措施。你们能以断头台消灭所有你们的敌人？但却有更大的狂乱呢？你们难道能以断头台毁灭一个敌人而不在他的家庭与朋友中多毁灭其他二个？

我与其他主张必须实施恐怖的人有很大的歧见。我确信当你们有一仁慈公安委员会时，自由将可获得，并且欧洲也可被征服。<sup>⑨</sup>

直到目前仍对德穆兰友善的罗伯斯比尔惊恐于开放监狱之请求。那些劳动阶级、教士、投机商、与资产阶级——如果被释放他们是否更有信心重新开始他们开创或毁灭此共和国的计划？他确信逮捕的恐惧，加速的定罪，与可怕的死亡是唯一使大革命敌人不敢以阴谋推翻它的力量。他怀疑丹东之突然变为仁慈是用来救助一些最近由于不法行为被捕的伙伴不被送上断头台之策略，并且让丹东自己不曝露出他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之中——埃格朗蒂纳(Fabre d'Églantine)与沙博特(Francois Chabot)受审于1794年1月17日，并被判有罪。罗伯斯比尔断定丹东与德穆兰将被罢免并且此委员会将为之结束。他断定只要这些老朋友活着他将永不安全。

他继续让他的敌人分裂，并且参加他们的党派使其相互斗争；他怂恿丹东与德穆兰攻击赫伯特，并且欢迎他们援助对抗反宗教战争。赫伯特支持镇民暴动和反抗食物昂贵与稀少；他谴责政府与放任者，并于1794年3月4日，激烈地批评罗伯斯比尔，并且于3月11日，他在科底尼会社的同志有公开起义之势。绝大多数的委员赞同罗伯斯比尔已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之意见。赫伯特、克洛茨，与其他几位被捕，并被控告在分配人民粮食时有不法的行为。这是一个机智的控告，因它让无裤党怀疑他们的新领袖；并且在他们决定叛乱前予以定罪，然后很快送他们上断头台(3月24日)。赫伯特崩溃并悲叹；克洛茨以日耳曼人的平静等待他的死期来临，他对群众说，“我的朋友，不应将我与这些恶棍搞混。”<sup>⑨</sup>

丹东一定了解他被用做为对抗赫伯特的工具，并且他现在对公安委员会仅剩少许价值。既是如此，他继续藉主张仁爱与和平疏远公安委员会——这些主张要求委员弃绝维持他们生存之恐怖措施与宽恕他们独裁之战争。他敦促终止屠杀；“让我们，”他说：“留若干给断头台来处理”；他仍然筹划教育与司法改革。并且他

保持目中无人的作风。有人告诉他罗伯斯比尔计划逮捕他：“如果我知道他确有此念头，”他答道，“我将吃掉他的心。”<sup>⑧</sup>他的朋友催他先攻击公安委员会。但他的勇气与意志都很薄弱而使他不能鼓起他以往大胆进取之精神；他在四年大革命浪潮中奋勇前进已疲乏不堪；现在他毫无抵抗地沉迷于逆流中。“我宁愿被斩首而不送他人上断头台，”他说：“除此，我厌恶人类。”<sup>⑨</sup>

很明显的比兰—瓦伦首先建议处死丹东。许多公安委员会同意他的看法，如让宽容运动继续下去，无异让大革命向国内与国外的敌人投降。罗伯斯比尔暂时不肯决定立即缩短丹东的寿命。他与其他委员相信丹东已持有一些政府金钱，但是他确知丹东对大革命所提供的劳务，他深恐对它其中一位最伟大人物处以死刑将导致某些党派与国民卫队的叛变。

在罗伯斯比尔犹豫不决的期间，丹东拜访了他好几次，不仅是为他的财务记录予以辩护，而且为转变他忧郁的爱国精神成为终止恐怖与寻求和平的政策。罗伯斯比尔仍旧怀疑，并变得更为敌对。他帮助圣朱斯特（时常受到丹东的嘲笑）预备一份对他最大敌手不利的诉讼案件。3月30日，他与公共安全委员会及一般安全委员会联合决定从大革命法庭获得丹东、德穆兰、与12名最近被判挪用公款罪犯的死刑判决。他的一位极有权力的朋友将此消息传给他，并催促他躲藏到巴黎以外的各地。他未接受。次晨警察逮捕他与德穆兰并予以监禁。他批评道，“……革命的权势毕竟属于最恶劣之人。”<sup>⑩</sup>

4月1日，勒让德尔（Louis Legendre），建议代表从牢中提出丹东并允许他在国民公会中为自己辩护。罗伯斯比尔恶狠狠瞪了一眼阻止了他。“丹东，”他高声说，“是无特权的……。我们将等待这天，国民公会是否能毁去这个早已腐朽的偶像。”<sup>⑪</sup>然后，圣朱斯特念着他准备好的起诉书。考虑本身安全，代表命令立即审判丹东与德穆兰。

4月2日，他们被带至革命法庭。可能是法律论点上的错误，他们牵连另一批人包括埃格朗蒂纳，其他的“阴谋者”或挪用公款者，以及——使一般民众及他自己都惊奇的——塞克尔；公安委员会中温和派份子，现在受控与赫伯特主义者（Hébertist）以及外国阴谋有关连。丹东以权威及讽刺性的辩才为他自己辩护，并且给予陪审团与旁观者十分深刻的影响，<sup>④</sup>以致富基坦维尔向公安委员会要求禁止辩护者发言。公安委员会给予国民公会另一项控诉，依他们所知，德穆兰与丹东的党徒策划以武力援救他们；国民公会藉此控诉宣布这二人不受法律保护——换言之，“被置于法律保障之外，”他们现在可不经法律程序即处死。陪审员得到这项控诉后，宣布他们获得充份证据并准备宣判。犯人被送回他们的监牢；旁观者被解散。4月5日宣布全体通过的判决：所有的被告均判死刑。得到宣判后，丹东预言道，“在这几个月完了之前，人民将会把我的敌人撕成碎片。”<sup>⑤</sup>还有：“卑鄙的罗伯斯比尔——断头台也将要你的性命。你将随我而去。”<sup>⑥</sup>德穆兰在监狱中写信给他的妻子：“我心爱的露西尔（Lucile）！我是天生命运不好……我亲爱的，为我的贺拉斯（Horace）活下去……我被绑住的双手拥抱着你。”<sup>⑦</sup>

4月5日下午，已定罪的人被送至大革命广场。在途中丹东再预言道：“我将他们置于一可怕混乱的局面。他们中无一人有政府观念。罗伯斯比尔将随我而去；他被我拖垮。啊！最好做一个不干预政事的渔夫。”<sup>⑧</sup>在断头台上，德穆兰，几乎精神完全崩溃，等待第三个被处决，丹东是最后一位。他十分思念他年轻的妻子，并默默地为她祝福着，然后，控制住自己：“来吧，丹东，不要怯懦。”当他走到断头台上时，他告诉刽子手，将我的头出示给民众，这是很值得的。”<sup>⑨</sup>他是34岁，与德穆兰相同；但自卡米耶唤起巴黎人占领巴士底监狱后，他们已享受许多人生。在他们死后8天，露西尔，与赫伯特的寡妇及肖梅特，跟随他们走上断头台。

整个局面似乎已明了了；所有反对公安委员会的党派都已被



铲除或整肃。吉伦特党人被处死或驱退；无裤党被分割并且受到压制，会社——除雅各宾外——都被关闭；报纸与戏院遭到严格检查；国民公会，受到恐吓，将所有的主要议决交给公安委员会。在后者之保障与其他委员会指导下，国民公会通过不利于囤积者与投机者的法律，实施免费与普遍的初等教育，废除法国殖民地区的奴隶制度，并且建立一个有社会安全，失业救济，穷人医疗援助，与老人救助的幸福国家。这些措施大部份都因战争与动乱而失败，但仍被保留成为鼓舞下一代的理想。

罗伯斯比尔，他的双手污染了血腥，但未受束缚，现在着手于归还上帝给法国。以理性主义代替基督教教义的企图，使这个国家转向反对大革命。在巴黎，天主教徒反抗关闭教会与骚扰教士，越来越多的中低阶层人民参加礼拜天弥撒。罗伯斯比尔在他一次优雅的演说中（1794年5月7日），表示联合大革命与它精神上政治前辈卢梭的时间已经来到（他的遗体已于1794年5月7日移至万神庙）；这个国家原支持一个纯正而平易的宗教——本质上属于艾米尔（Émile）的萨伏依人的教皇（Savoyard Vicar）——基于对上帝的信仰，并且宣传公民与社会道德为共和国必要的基石。国民公会，希望此行动将平息宗教的热忱并缓和恐怖，因而同意；并在6月4日它任命罗伯斯比尔为主席。

1794年6月8日，他以官方身份，为10万名聚集在练兵场的男女老幼主持一项“上帝的节日”。在一长列怀疑论代表前头是持着花与麦穗的廉洁之士，并以音乐与圣歌伴奏着。一辆乳白色公牛拖的车子装载着成捆金黄色的玉米；在它之后牧羊人与牧羊女以大自然代表一种上帝的形态与声音。在一装饰战神的浅盆中，大卫，最知名的法国艺术家，雕刻一座装饰罪恶并冠以疯狂象征之无神论的木头雕像，面对着这些，他建立一座象征全胜智慧之雕像。罗伯斯比尔，美德的化身，放一火把在无神论雕像上，但是逆风转移火焰至智慧雕像上。一篇大体上高洁的题献显示：“法国人民承

认上帝，与不朽的灵魂。”<sup>⑩</sup>类似的典礼在全法国进行。罗伯斯比尔很高兴，但是比兰——瓦伦告诉他，“你开始用你的上帝烦扰我。”

两天以后，罗伯斯比尔劝使国民公会宣布加强恐怖；他曾藉宗教节期(Feast)遣责赫伯特如同他在应付并且反抗丹东时一样。“22 Prairial 之条例”(1794年6月10日)认可死刑适用于拥护民主政治或毁谤共和国；违反道德；散布谣言；偷窃公共财物；投机获利或挪用公款；阻挠食物运输；以任何一种方法干预战争之人。此外，这法令授权法院决定被告是否允许辩护，什么证人应加审问，何时证据审查应予终止。<sup>⑪</sup>“至于我自己，”一位陪审员说，“我是永远确信。在一次革命中所有被带至革命法庭的人必须加以定罪。”<sup>⑫</sup>

恐怖的加强获得一些谅解。5月22日，一项计划要谋害赫波斯；5月23日逮获一名企图暗杀罗伯斯比尔的年轻人。国民公会相信有外国阴谋计划刺杀大革命领袖，因而宣布不分配住所给英国或汉诺威(Honoverian)的战俘。巴黎监狱扣压大约8000名可能暴动或逃亡的嫌疑犯；他们必须以恐怖镇压。

因此开始了“大恐怖”，从6月10日延续到7月27日。不到七个星期，有1376名男女被斩首——比自1793年3月到1794年6月10日期间的61周之总数多155名。<sup>⑬</sup>富基坦维尔描写掉落的人头“如同屋顶落瓦。”<sup>⑭</sup>人民不再按计划做事，而愿呆在家里并且留意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社交生活几乎停顿；酒店与妓院几乎无人问津。国民公会本身形同虚设；从原来的750名代表减为117名，并且许多代表禁止自己投票，唯恐做出有损他们名誉之事。即使公安委员会之委员，也恐惧他们将处于新的三头马车政治——罗伯斯比尔、库车、与圣朱斯特的斧下。

可能这是战争导致有权势的人屈服于强烈的权力集中。1794年4月，柯布哥亲王率领另一支军队进入法国，并且，任何一个法国防卫者的失败都可导致巴黎的恐惧与混乱。英国舰队的海上封

锁,使法国无法得美国的补给。但是一支英国舰队(6月1日)被法国护航船队击败,才能让珍贵货物运至布雷斯特。(6月25日)一支法国陆军阻挡入侵者于查力瓦(Charleroi),隔日,圣朱斯特率领的法国军队在弗勒吕斯(Fleurus)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柯布哥撤离法国,茹尔当与皮舍格吕于7月27日越过边界在安特卫普与列日建立法国势力。

胜利的击退外国君主之入侵可能减轻罗伯斯比尔遭到毁灭的压力;他强大的敌人可能觉察到这个国家与它的军队将幸存于其政府遭受攻心与致死的打击。一般安全委员会与公共安全委员会互相争夺政治权力,并在后一团体中,比兰一瓦伦、赫波斯、与卡诺使用暴力反抗罗伯斯比尔与圣朱斯特。感觉出他们的敌对,罗伯斯比尔避免参加7月1日至23日的会期,以期能缓和对他领导权的憎恨;但是它给予他们更多策划他灭亡的机会。此外,他的战略犹疑不定:7月23日,他屈服于商人的申诉,签署了一项设定最高工资的法令,因而取恨于以前的支持者;事实上,由于通货的贬值,这道法令使他们现有的工资仅及以前价值的一半。<sup>⑥</sup>

从各省回到巴黎的恐怖主义份子——富歌、弗雷罗、塔利安、卡里尔——表示,他们的性命决定于能否除掉罗伯斯比尔。召他们回巴黎的罗伯斯比尔要求他们说明他们的任务。“富歌,告诉我们,”他问道,“谁派你告诉人民世上无上帝?”<sup>⑦</sup>在雅各宾会社他建议富歌接受质问有关他在土伦与里昂的任务,否则将丧失会员资格。富歌拒绝接受审问,并且公布一张名单列出将被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的新候选人作为报复手段。至于塔利安,他不需作如此刺激;他迷人的情妇,卡巴吕(Thérèse Cabarrus),于5月22日遭到罗伯斯比尔下令逮捕;谣言传出她送给塔利安一把匕首。塔利安发誓不计任何代价使她获释。

7月26日,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做了他最后的演讲。代表是对他有敌意的,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反对他迅速处死丹东,并且

责备罗伯斯比尔使国民公会无能。他尝试答复这些质问：

同胞们……我必须公开心中的秘密，而你们必须了解事实……我来到这里是为消除严重的错误。我是来阻止某些人想将此自由神殿充塞可怕而不调和的誓约……这个恐怖与耻辱的制度是依据何种基础？……我们必须向谁表示我们的恐怖？……害怕我的人是谁？是暴君与恶棍或是善良百姓与爱国志士？……我们应将恐怖打入国民公会吗？没有国民公会我们将成为什么？我们曾冒生命危险来保卫国民公会，世上的人都看到当可恶的党派策划摧毁它时，我们奉献自己以维护它的存在……谁是阴谋者首先打击的对象？我们正是他们所要暗杀的，我们正是他们所称的法国苦恼……不久之前他们向公安委员会公开挑战。他们最后的目的地是在消灭某一个人……他们称我为暴君……他们想迅速证明大革命法庭是一流血的法庭，由我一手造成的，并且由我全权掌握为着杀害所有善良的人民……。

在此地与此时，我不敢指出（这些控诉者）姓名。我不能亲自撕下覆盖罪恶的神秘面罩。但我可确切断定：阴谋策划者之中，有些是外国人用金钱收买的间谍，有计划的毁灭共和国……这些虚伪的卖国贼，在虚伪外表掩护下，控诉原告人并加倍运用策略……来隐密事实。这是阴谋的一部份。

我的结论是……暴政控制我们；但并非让我必须保持沉默。人们如何能责备一个真理在他那一边，并知如何为国牺牲的人。<sup>⑩</sup>

这历史性演讲中有些谬误——使人惊异，这是一位至今仍在

政治陷井边缘选择道路的人；权势可使人疯狂与腐化，降低深谋远虑的能力，与增加行动的仓促。演讲的内容——无知的骄傲推定与，“真理站在他一边的人”——可能是明智地不过仅及于苏格拉底(Socrates)接近死亡的状况。以死来威胁他的敌人，这是很不聪明的。更不聪明的是过份相信国民公会却不畏惧恐怖政治。更糟的是，由于拒绝提出他所要控诉人的姓名，他使更多的代表认为他们会在将来成为他愤怒的受害者。国民公会冷静地接受他的建议。罗伯斯比尔于该夜在雅各宾会社重复他的演讲受到很大喝彩；在那里他公开攻击比兰——瓦伦与赫波斯。他们回到公安委员会后发现圣朱斯特正为他们写诉状。<sup>⑩</sup>

次晨，7月27日(大革命历11月9日)，圣朱斯特以敌对的态度与恐怖的心情将诉状呈给国民公会。罗伯斯比尔面对演讲台坐着。他挚爱的主人，迪普莱，警告他会有麻烦发生，但是罗伯斯比尔有信心地向这位预言者再度保证，“国民公会是公正的；所有的民众也是公正的。”<sup>⑪</sup>很不幸，那天主持的官员是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的赫波斯。当圣朱斯特开始念起诉书时，塔利安跳上讲台，将年轻的原告推置于一边，并高喊道，“我请求撕掉那诉状！”勒巴，忠于圣朱斯特，企图帮助他，但是他的话为成百的声音掩盖。罗伯斯比尔，请求有受审的机会，但也被大声喝倒。塔利安高举着武器，宣布道：“如果国民公会没有勇气宣判对他的控诉，我将用武装我自己的短剑刺穿他的胸膛。”<sup>⑫</sup>

赫波斯将他的椅子让给瑟黎欧(Thuriot)，因他曾是丹东的盟友。罗伯斯比尔走近讲台并高声说话；但是瑟黎欧的铃声将大多数罗伯斯比尔的话掩盖，但是部份他所说的话仍然压倒喧哗：“这是最后一次请你们给予我说话的机会！”国民公会代表大声吼叫，反对这种形式的演讲，并有一位代表说出使他致命的话：“我请求逮捕罗伯斯比尔。”奥古斯丁像罗马人般地大声说：“我与我的兄弟有相同的罪过；我分享他的美德；我请求我的逮捕令与他的一致。”勒

巴恩求，也获得同样优待。判决以投票方式通过。警察将两位罗伯斯比尔、圣朱斯特、勒巴、与库车带至卢森堡监狱。

巴黎市长莱斯科(Fleuriot-Lescot)，命令将犯人移至市政厅，在那里他们受到贵宾的款待，并给予他们保护。巴黎公社的领袖命令首都国民卫队长昂里奥，率领军队至图勒里宫，并且占领国民公会一直到它的逮捕令撤销为止；但是昂里奥喝得酩酊大醉而不能执行他的任务。代表们指派巴拉斯(Barras)召集一队宪兵到市政厅，将犯人再次予以逮捕。市长再度向昂里奥求助；他仍然不能将巴黎的国民卫队集合起来，却将无裤党作临时的组合；但是他们对这位降低他们工资并且杀死丹东、德穆兰、赫伯特、与肖梅特的人现已少有敬爱；除外，天空开始下雨，因而他们解散回到他们的工作单位或他们的家里。巴拉斯与他的宪兵很容易控制市政府。罗伯斯比尔企图自杀，但是他持枪的手控制不稳以致子弹仅射穿他的脸颊，打碎了他的下巴。<sup>⑩</sup>勒巴，较为镇定的用枪射穿他的头颅。奥古斯丁由窗子跳出时摔断一条腿。库车，由于双腿失去知觉，跌落至楼下，一直躺在那里，最后宪兵将他与二位罗伯斯比尔及圣朱斯特带至监狱。

第二天下午(1794年7月28日)，四辆死刑犯护送车运送这四人，与莱斯科、昂里奥，以及其他16人送至孔科尔德(La Concorde)广场断头台。在途中他们听到了旁观者喊道：“打倒极权！”<sup>⑪</sup>并且他们发现有上流社会的观众在等候；俯视广场的窗户都以高价出租；女人们打扮整齐如同参加宴会。当罗伯斯比尔的头被高举时，群众发出一阵满足的欢呼。增加一个人的死亡可能并不表示什么，但是巴黎人觉得此人之死表示恐怖即将结束。

## 第六节 温和派

(公元1794年7月20日—1795年10月26日)

7月29日,大革命历11月9日的胜利者处决70名巴黎公社的社员。暴虐的“22 Prairal之条例”被废止于8月1日;囚禁的罗伯斯比尔反叛者获得释放;一些他的党徒取代他们的位置。<sup>④</sup>大革命法庭被整顿并准许公平审判;富基坦维尔被要求为他的记录辩护,但是他的机智保住他的性命至1795年5月7日。公共安全委员会与一般安全委员会幸存,但是他们的势力已被削弱。保守派的定期刊物盛起;激进派的杂志因无民众支持而停刊。塔利安、富歇,与弗雷罗发觉到只要国民公会不注意他们在恐怖政治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仍可获得新的领导地位。雅各宾会社全部关闭(11月12日)。“山岳党”权势减弱;并在12月8日幸存的73名吉伦特党的代表重新获得他们的席位。资产阶级再捕获大革命。

政府的宽纵使宗教为之复兴。除了较小部份人民接受过大学教育,与中上阶层受到启蒙运动(Enlightment)影响外,多数的法国人民,几乎所有的法国妇女,喜爱圣人与天主教历的节庆超过罗伯斯比尔无根据的庆典与无定形的上帝。1795年2月15日,一项和平条约与旺代的反叛者签定,以保证他们的信仰自由;一星期之后,它被推及到整个法国;并且政府请求与教会隔离。

较为困难的是同时满足那些长久相峙的敌人:生产者与消费者。生产者激烈要求取消最高价格;消费者要求终止最高工资。国民公会,现在受制于自由企业、竞争,与贸易的热心崇拜者,并听取不能相容的起诉,以及最高价格限制之废除(1794年12月24

日)；现在工人可自由寻求较高的工资，农人与商人对所有的交易可自由索价。物价波动剧烈。政府发行以土地担保的新信用券代替一般的纸币，但是他们价值下跌之速度超过以前；一蒲式尔的面粉在1790年花费巴黎人2个assignat，在1795年却花费225；一双鞋子的价钱由5涨到200，一打鸡蛋由67涨至2500。<sup>⑧</sup>

1795年4月1日，巴黎几个区域两度发生面包价格暴动。一些无武装的群众冲入国民公会，要求获得食物并且终止对激进派的迫害；几名来自“山岳党”的代表支持他们。国民公会答应予以迅速救助，但它召集了国民卫队驱散暴徒。是夜它放逐激进派的领袖——比兰—瓦伦、赫波斯、瓦底尔(Vadier)——至圭亚那(Guiana)。巴雷尔与瓦底尔逃走；比兰—瓦伦与赫波斯被送至南美殖民地过着艰苦日子。在那里两位反对教权的人病倒，但受到修女照顾。比兰—瓦伦幸存，娶了一位黑白混血的奴隶为妻子，甘心过着农夫的生活，并于1819年死于海地(Haiti)。<sup>⑨</sup>

民众的示威演变成暴动。招贴出现于街头，要求民众起义。5月21日，一群妇女与武装的男子冲进国民公会，高喊要求面包，要求被逮捕的激进派份子，最后要求政府放弃权位。一名代表被射杀，他的头被割下，用一矛杆举起，置于国民公会之前，主席安格拉(Boissy d'Anglas)，给予它正式的礼遇，最后大雨与军队驱散请愿者。5月22日皮舍格吕将军率领的军队包围工人阶级的圣安托万郊区(Faubourg St-Antoine)，并且命令剩余的叛徒投降。11名“山岳党”的代表被捕并受控共谋叛乱；2名逃亡，4名自尽，5名打伤自己者奄奄一息立即被送上断头台。1名保皇党的代表鼓动逮捕卡诺；有人反对，“他创造我们的胜利，”因此卡诺得以保全性命。

1795年5月与6月，“白色的恐怖”激烈地进行着。此时期的受难者是雅各宾党，审叛者是资产阶级的“温和派”与宗教团体：“耶稣派”、“耶和派”、“太阳派”。在里昂(5月5日)有97名以前的恐怖份子被屠杀于监狱中；在法国东南部艾克斯昂省又有30名以



“残酷之极”的罪名被斩首(5月17日);同样的情形发生于阿尔勒(Arles)、阿维尼翁与马赛。在塔拉斯孔(Tarascon),有200蒙面人于5月25日夺取城砦,捆绑犯人,并将他们丢进罗讷河。在土伦,工人们奋起反抗新的恐怖;伊斯纳(Isnard),一名被释放的吉伦特党员,率领军队反抗他们并将他们消灭(5月31日)。<sup>④</sup>恐怖并未结束,只是形式上改变。

胜利的资产阶级不再需要劳动阶级的联合,因为它已赢取一般民众的支持,并且这些胜利使他们连同无裤党都提高了威望。1795年1月19日皮舍格吕占领阿姆斯特丹;威廉四世(Stadtholder William IV)逃亡到英国;荷兰变成法国保护下“巴达维亚人的共和国”有十年之久。另外的法国军队再度占有莱茵河下游左岸区域。同盟国,溃败并且失和,使法国轻易取得波兰。普鲁士,全力防阻苏俄从第三次分割中(Third Partition 1795年)获取任何一切,并派密使先到巴黎,然后至巴塞尔(Basel)谈判,为获得与法国之间的和平。国民公会接受苛刻的要求,因为它觉得胆怯而不敢趋向和平,将使巴黎或其他各处许多如同野兽般的军队,牺牲占领地利益维持生存,并且使一些需要面包与工作的城市增加罪恶、疾病、与骚动。而且一些好动的将领——如皮舍格吕、茹尔当、奥什、莫罗是否能抗拒诱惑不以武力夺取政权?因而国民公会派遣贝泰勒米(Marguis Francis de Barthélemy)至巴塞尔,传送命令继续法国对莱茵河下游左岸区域的控制。普鲁士抗议但却让步了;萨克森(Saxony)、汉诺威与赫斯—卡斯(Hesse—Cassel)照样行事。6月22日,西班牙割让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东部的多明戈(Santo Domingo)给法国。法国与奥地利及英国的战争仍持续着——正好使它的士兵停留在前线。

6月27日,3600名移民,由朴次茅斯(Portsmouth)塔乘英国船只,登陆布里塔尼的奇布伦(Quiberon),并参加“法国西部起义者”(Chouan)努力鼓动旺代叛乱。奥什以一次辉煌的战役击败他

们(7月21日),并藉塔利安的提议,国民公会处决了俘虏的748名移民。

1795年6月8日,十岁的皇太子死于狱中,很明显地,并非是因疾病的亏损而致,而是因腺病与意气消沉,保皇党因此承认路易十六幸存的二位兄弟中较长,并移居在外国的罗旺斯(de Provence)伯爵,为路易十八,并决心拥护他的法国王位。非改革派的波旁皇族宣布(1795年7月1日),如君位能予恢复,他愿重建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并具有至高的君主与封建权力。因此法国的资产阶级、农民、与无裤党始终联合支持拿破仑对外的许多场战争。

然而法国已厌倦大革命,并且开始接受一些出现于刊物上,巴黎上流妇女招待会中,与事业兴旺家庭的君主主义者的意见:只有传统与合法继承的国王能够使受到三年政治与经济动乱、宗教分裂、持续战争,与无稳定工作及生活变得恐惧,而忧愁的人民重新获得法治与安全。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法国南部疏远巴黎及其政治家。在巴黎曾为无裤党掌握的地方性会议,现在逐渐为商人控制,并且有些已被保皇党掳获。在戏院中那些提到1789年前“美好往日”的台词受到热烈的喝彩。本质上具有叛意的年轻人,现已反抗大革命;他们称自己组成的一群人为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奇特的(畸形的人)、或喜好打扮的人(堕落的人);以他们的富有、奇怪的装束,他们蓄或卷曲头发为傲,他们闲逛街头,参与危险的俱乐部,并大胆地公开保皇党的思想。支持革命政府变得不十分普遍,以致当新闻谣传国民公会即将解散时,民众为之欢呼,并且一些巴黎人在街上跳舞。

但是,国民公会接近灭亡的时候。1795年6月,它开始起草另一与民主有关而且从未实施的1793年宪法大为不同的宪法。现在,它采用两院制的议会,任何一项由下议院采取较为直接影响民众行动与新观念的法律之创制措施,必须经上议院资深而有经验

的议员同意。民众表示安格拉的智慧与稳定不足以决定一国的政策。<sup>⑭</sup>因此这“第三年的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III)(即由1794年9月22日开始的一年)修订人权宣言以防止产生道德与权力常见的谬误;它省略一项“人是生来俱有自由与平等权利,”的主张,并且解释平等仅表示“法律对任何人都是一样。”选举是间接的:投票者选出代表他们那省的“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并且这些选举人将选出国家立法机构、司法部、与行政机构的组成份子。选举人资格限于财产所有人,以致只有3万法国人民有资格选举政府。妇女投票权被一名代表的国民公会提出,但由于另一代表询及“坚持丈夫的意愿不是她自己的意愿之妻子,在那一点是好妻子?”而被放弃。<sup>⑮</sup>政府管制经济被认为不合实际,遏阻商业发展,与迟缓国家经济成长。

新的宪法包括一些自由主义成份:它确定宗教自由,与“安全界限”内的出版自由(当时大部份为中阶层所控制)。\* 此外,宪法的批准,是付托于成年男子的选举权,并附带一项惊人条件:新议会中2/3的议员必须为现存的国民公会代表,并且如此数目不能被选出,现有其他的代表则互选出议员弥补这2/3的数目;这主张辩称有生命危险的代表必须保留,是为着经验与政策的持续。投票者是善良而和顺的:95.8226万张投票总数中,94.1853万张接受此宪法;并且对2/3条件投票的总数为26.3131万张,其中有16.7758万张赞同。<sup>⑯</sup>1795年9月26日,国民公会使新宪法成为法国法律,并准备有秩序的解散。

不顾及它数个月的无法治与恐怖,屈服于它的公安委员会,与无裤党统治下受到排除它代表资格的威胁,它仍然赢得一些成就。它维持法律规则于某些失去法律灵气与根基的城市中。它融和资

---

\* “自由主义的”(Liberal),应用到经济学与政治学时,意谓最小政府权力下的自由经济。

产阶级被赋予的权力，并且它企图控制商人的贪婪而使动乱社会中的民众免于饥饿。它组织并训练军队，提拔能干而有热诚的将领，排拒权势的联盟，并且赢得和平而使法国受它的天然疆界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与大海的屏障。它设立十进制制度，它成立自然历史的博物馆、工科大学、与医学院；它设立法国研究所。现在它觉得，经过三年如奇迹般的幸存，它应得到和平的終了。

但是它却得到一场流血的结局。劳动阶层与保皇党，占领了巴黎证券交易所附近的兰皮莱狄(Lepelletière)区，发起暴动反对立法的复醒。其他的党派，基于他们不同的理由，参加了他们的暴乱。总共他们凑合了2.5万人，前进到可控制图勒里宫与国民公会的位置(革命历1月13日，1795年10月5日)。惊恐的代表们任命巴拉斯临时负起防御任务，他指派当时闲居于巴黎26岁的拿破仑，集聚人员、补给、与更重要的大炮。这位土伦的英雄知道大炮被藏于何处，派缪拉(Murat)与一支军队取得它们，并被安置在俯视暴徒的位置上。解散的命令被大声传播过去；但却不被重视。拿破仑命令他的炮兵射击；大约200到300名围攻者被射倒，其余的逃之夭夭。国民公会幸存于最后的严酷考验，并且拿破仑，断然而无情地，开始他在近代历史上最壮观的事业。

10月26日，国民公会宣布解散，并在1795年11月2日开始大革命的最后阶段。

## 第五章 五人执政团

(公元 1795 年 11 月 2 日—1799 年 11 月 9 日)

### 第一节 新政府

这是由 5 个部门组成。第一,五百人院(Council of Five Hundred),授权提出与讨论议案,但不能使其成为法律。第二,长老院(Council of Ancients),他们必须已婚并且年纪在 40 岁以上;他们不得创制法律但可驳回或批准由五百人院所提呈的“决议”。由这两院(译注:上院称为长老院,下院称为五百人院)组成的立法机关之全体议员,每年由选举团投票替换其中 1/3。政府的行政部门是五人执政团(Directory),由 5 人组成,至少年满 40 岁,五百人院提出 50 名候选人,然后由长老院选出其中 5 人,其任期为 5 年。每年都要新选出一位督政(director)以替换其中之一。除此 3 部门外,尚有彼此独立之司法与财政 2 个部门,是由各县选举团选出。这是政府的一种内部制衡,使得胜利的资产阶级不会受制于难以驾驭的民众。

五人执政团,设在卢森堡宫,不久即成为政府最有力的部门。它掌握陆军与海军,并且决定外交政策;它监督内政、外交、海事与殖民地,陆军与财政等各部的部长,由于领导权力的自然向心移动

的倾向，五人执政团成为一独裁执政者，其独立不羁几乎如同公共安全委员会。

首先被选为督政的5人是巴拉斯、来波克斯(Louis-Mariede Larevellière-Lépaux)、鲁贝尔(Jean-Francois Rewbell)、勒图尔纳(Charles Letourneur)、与卡诺。他们都是弑君者，4人属于雅各宾党，巴拉斯曾为子爵；现在他们使自己能适合于资产阶级的制度。他们都很精明能干，但是，除了卡诺外，他们都因过分正直而不出名。如果侥幸生存才是价值的考验，那么巴拉斯是最得力于辅佐路易十六与罗伯斯比尔，并且帮助他们到死为止；用计策安全地渡过一个接一个的危机，替每一个统治者聚敛财富与权力，给予拿破仑军队与一位妻子，寿命比他们都长，并在悠闲情况下死于巴黎，享年74岁(1829年)；他有九条命也难免一死。<sup>①</sup>

1795年，五人执政团所遭遇的困难，可被善变的民众解释为他们政府失败的某些理由。巴黎的民众老是面临着穷困；英国的封锁增加内部经济的混乱，因而阻碍粮食与财货的市场活动。通货膨胀使通货贬值；在1795年需用5000“信用券”(Assignat)方可买到1790年时仅值100的物品。当财政部按“信用券”面值支付公债利息时，那些曾投资政府“债券”做为晚年养老的利息收入者，发现他们自己成为反叛的贫民。<sup>②</sup>成千的法国人，狂热的购买股票以逃避通货膨胀；当价值上涨到顶端时，投机者抛出所有的股票；于是他们竞相出售价格惨跌的股票；无知的民众发现他们的储蓄被少数的聪明人所赚去。财政部，已丧失人民的信心，宣布于1795年破产。从富人所获的贷款造成商品价格的上升与奢侈品交易的衰退；失业增加；战争与通货膨胀持续着。

在动乱与贫穷的包围下，共产主义的梦想曾鼓舞马布利(Mably)于1748年，莫雷利(Morelly)于1755年，兰盖(Linguot)于

1777年,\* 并继续使绝望的穷人内心感到温暖;在1793年它获得鲁克斯(Jacquex Roux)的共鸣。1796年4月11日,巴黎劳动阶层的住宅区张贴布告建议“分析巴贝夫(Babeuf)的教义”。其中一些条款为:

1. 大自然赋予每一个人平等的权利于享用所有的财货。……

3. 大自然使每一个人负有劳动的义务;无人,在不犯罪情况下,可免于工作。……

7. 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是既无富人也无穷人。

8. 不能分割过剩财物济助穷人的富人,将是民众的敌人……。

10. 大革命的目的是消灭不平等,并建立共同的幸福。

11. 大革命未到结束时候,因为富人榨取财货,独占权势,穷困的劳工事实上却是奴隶,……对国家无足轻重。

12. 1793年的宪法是法国真正的法律。……国民公会打倒要求实施法治的人民。……1793年宪法准许每一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是行使政权、聚敛、需要他认为有用的,让自己受教育,并使自己不死于饥饿—1795年反革命的法令(宪法)完全而且公开地违背这些权利。②

巴贝夫,出生于1760年,首次为历史记载的是1785年他为地主所雇用,并对农民强制实施他们的封建权。1789年他改变立场,并要求废除封建税。1794年他定居巴黎,因攻击大革命的制度而

---

\* 《卢梭与法国大革命》。

被逮捕，并于 1795 年逃脱后成为一名热忱的共产党员。随即他组织平等协会(Société des Égaux)。他以“公共安全起义委员会”所签署的“起义法规”的宣言贯彻他的“分析”。其中的几项条款是：

10. 议会与五人执政团，为人民权利的掠夺者，应予解散。他们应即受人民审判……。

18. 公有与私有财产由人民监管。

19. 结束大革命，并将自由、平等、与 1793 年宪法赋予共和国的任务，委托给一个国民所组织的“议会”；这由起义民众所提名的起义委员会所任命的各县民主党员组成。

公共安全起义委员会直到起义完全成功为止。<sup>④</sup>

这似乎是另一独裁政治出现的不祥预兆，统治者将由罗伯斯比尔转换为巴贝夫。在他的《民众论坛》(Tribune du Peuple)中他扩大他的幻想：

那些拥有社会财货超过他们应有比例者，其财富是得自偷窃与盗取；因此从他们之处取回是为合理的。一个人能证明以他自己的力量可赚取或可做的，相当于 4 个人的能力，他依然有害于社会，因为他破坏了均衡与……珍贵的平等。社会教育必须进步到可剥夺每一个富人、权势者，或以他的开明与智慧成为杰出者之希望。不和谐好过于由饥饿所扼杀成的可怕和谐。让我们重回到混乱，再由混乱中产生一革新的世界。<sup>⑤</sup>

一名密探向五人执政团密报巴黎劳动阶级阅读巴贝夫的海报与刊物的人数不断增加，并且计划在 1796 年 5 月 11 日，发动武装



暴动。5月10日，一项命令发布，逮捕他及其主要党羽：博纳罗蒂、达塞(A. Darthé)、瓦底尔与德鲁埃。一年监禁期间，若干使他们逃脱的计划都为之失败，他们于1797年5月27日受审于旺多姆(Vendôme)。博纳罗蒂被判监禁，德鲁埃逃亡。巴贝夫与达塞被判死刑；企图自杀，但却在自尽前就被迅速送上断头台。他们的计划，当然非常不切合实际，非常无人性，以致连巴黎的劳动阶级都不曾认真的予以接受。此外，1797年以前，在法国的穷人与富人们，已发现一位新的英雄人物，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魔力的梦想家与实行家。

## 第二节 年轻的拿破仑

(公元1769—1795年)

“任何智慧的运用，”阿克顿(Lord Acton,英国史学家,1834—1902年)说道，“是不能比看拿破仑的智力工作更可使人心神爽快，他是历史上最著名而且最有才能的人。”<sup>①</sup>但在今天谁能认为他是真正与完全的认识这一位人物——虽有大约20万本书与小册子描写过——他曾被100位知名的历史家视为努力奋斗以求欧洲统一与法治的英雄，并且被100位知名的历史家视为流干法国鲜血，及蹂躏欧洲，以满足权力与战争贪欲的食人魔？“法国大革命，”尼采(Nietzsche)说道，“使拿破仑能成功；那是最主要的理由，”<sup>②</sup>拿破仑，沉思于卢梭的墓前，并低声默语，“如我们两人都未出生于此世上，也许国家会有较好的境况。”<sup>③</sup>

他于1769年8月15日，出生在阿雅克肖(Ajaccio)。但是在15个月前，热那亚(Genoa)已将科西嘉(Corsica)出让给法国；并且

早在2个月前法国军队就以镇压保利(Paoli)的暴乱使此项交易为之有效；如此琐碎之事却使历史因而改变。25年之后，拿破仑写信给保利：“我出生于国家濒临灭亡之时。3万名法国人不自愿的放弃我们的海岸，并将自由的王位沉于血海中；如此可恨的情景刺伤了我年幼的心灵。”<sup>⑧</sup>

李维(Livy)说道：“科西嘉是一崎岖，多山，几乎是无人居住的小岛。岛上的居民就象这个地方，如同野兽般凶猛无法管理。”<sup>⑨</sup>与意大利的交往已减轻其野蛮的程度，但是这高低不平的台地，艰苦而且近于原始的生活，深深的家族仇恨，激烈的反抗侵略者，使得保利时期的科西嘉人仅适合于游击作战或佣兵事业。文明成长于都市中。但在大部分莱蒂齐亚(Letizia Ramolino Buonaparte)身怀拿破仑的期间中，她跟随她的丈夫与保利到处流浪，居住在帐篷或山上小木屋中，呼吸战争的空气。她的孩子似乎在娘胎时就记住这一切。他永远是一科西嘉人，并且除了出生日期与教育外，他是一意大利人。当他为法国征服意大利时，意大利人欣然迎接他；他是占领法国的意大利人。

他的父亲，卡洛(Carlo Buonaparte)，可追溯其家系至意大利历史上一强壮种族上，大多数时间居住在托斯卡纳(Tuscany)，后来迁到热那亚，到了16世纪时移民至科西嘉。这个家族所蕴藏的高贵血统已为法国政府承认；但是，这个家族没落于大革命时期，因一个贵族的名位是走上断头台的前提。卡洛是一个具有适应新环境才能的人；他在保利领导下为科西嘉人的自由而战；此行动失败后，他谋求与法国之间的和平，服务于佛朗哥(Franco-Corsican)政府的行政部门，获得他两个儿子进入法国军校的入学许可，并为科西嘉的贵族选为“国会议员”。拿破仑的灰色眼睛与使他致命的胃癌可能得自他的父亲。<sup>⑩</sup>

他有更多得自他的母亲。“我的成功与所有我所做的善行都归功于我的母亲与她卓越的原则。我毫无犹疑的敢断言孩子的将来

要决定于其母亲。”<sup>⑧</sup>他有她的精力、勇气、坚定的决心，与对拿破仑家族的忠诚。莱蒂齐亚出生于1750年，14岁结婚，35岁就做了寡妇；1764年到1784年间，她生了13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其他的子女予以严格的管教，分享他们的骄傲，也承受他们的失败。

拿破仑是她的第4个孩子，第2个撑过了年幼时期。长子约瑟夫(Joseph Bonaparte, 1768—1844年)，和蔼而有修养的享乐主义者；做过那不勒斯(Naples)与西班牙的国王，他想成为法国第二位皇帝。在拿破仑之后是吕西安(Lucien, 1775—1840年)，助他于1799年夺取法国政府之后，变成他的劲敌，与他同列为“百日天下”〔译注：自拿破仑由厄尔巴岛(Elba)逃出，恢复法国帝位至其失败退位止；日期为1815年3月20日至6月28日〕英雄的琐事。然后是巴西奚(Maria Anna Elisa Bacciocch, 1777—1820年)，骄傲、能干、而高贵的托斯卡纳公爵夫人，她于1813年反抗她的哥哥，但却比他早死。然后是路易(Louis, 1778—1846年)，他娶了博阿尔纳(Hortense de Beauharnais)，成为荷兰的国王，并且生了拿破仑三世。然后是保琳(Pauline, 1780—1825年)，美丽而令人发生反感的放荡，嫁给博尔盖塞(Camillo Borghese)皇太子。“保琳与我，”拿破仑回忆到，“是母亲最宠爱的；因为保琳是我姊妹中最美丽而有洁癖的人，并且她的本能觉察出我将使这个家庭宏伟壮大。”然后是卡罗琳(Maria Carolina, 1782—1839年)<sup>⑨</sup>，她嫁给缪拉并成为那不勒斯的皇后。最后是热罗姆(Jérôme, 1784—1860年)，他建立拿氏家族于巴尔的摩(Baltimore)，并高升为西发里亚(Westphalia)的国王。

1779年卡洛由法国政府获得一项特权，将拿破仑送进在布里安(Brienne)的一所军事学校，该校在巴黎东南方约90英里之处。在一男孩的生命中这是一件大事，由此认定了他的军人生涯，并以战争决定了他的生活与命运。布里安对这位年轻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远离家庭到一陌生而严格的环境，其他的学生不能忍受他

的骄傲与脾气,这似乎是非常不适合他隐含的高贵的。“我尽量忍受同学的嘲笑,他们挖苦我是一个外国人。”这位年轻的不随俗者专心致力于他的研究、书本、与梦想。他沉默寡言的脾气为之加深;他甚少讲话,不轻易相信任何人,并且与这个企图要折磨他的世界隔绝。但有一例外;他于1769年与布列纳(Louis—Antoine Fauvelet de Bourrienne)结为朋友;他们相互保护,彼此攻击;在长期的分离后,布列纳成为他的秘书(1797年),并与他保持密切关系一直到1805年。

隔离使这位年轻的科西嘉人努力学习以求上进。他逃避对拉丁语的研读,因视其为死亡之文字;他不喜欢弗吉尔(Virgil,罗马诗人,70B. C.—19) 诗的优雅或泰西塔斯简洁的文体。他在文学与艺术方面所获师教不多,那是因教师大多不能使他产生兴趣。但是他非常喜欢数学;这门学科可训练他的脑筋清楚与正确判断,无偏见与争论,而且对一军事工程师有持久的用途;在这门课程上他名列前茅。他也喜好地理;研究不同地形的土地、人民、与食物。如同卡莱尔,他认为历史是英雄的崇拜与金玉集,特别是教导国民或塑造帝国者。他喜爱普鲁塔克甚于欧几里德(Euclid);他沉醉于那些古代爱国志士的热忱,以及那些历史性的战争;“你无任何新思想,”保利告诉他;“你整个属于普鲁塔克。”<sup>⑧</sup>他了解海涅(Heine)所说的,当他念过普鲁塔克作品,他渴望骑乘战马征服巴黎。拿破仑擅长侧面攻击,经由意大利与埃及达成这个目的。

在布里安渡过五年的光阴,拿破仑现已15岁,并且是法国12所军校学生中被保送巴黎军校深造者中之一。1785年10月,他被任命为La Fée联队炮兵少尉,驻守在罗讷河边的瓦朗斯(Valence)。他的年薪是1,120法郎;<sup>⑨</sup>很显然,他必须将其中一部份寄给母亲以助其抚养其他子女。由于他的父亲死于2月,而且约瑟夫仍然非常贫穷,拿破仑变成这个家庭临时的家长。在他休假期间,他曾回科西嘉若干次,他说,这是为“闻到它泥土的气息,”及它

的“绝壁、高山与峡谷。”<sup>⑧</sup>

在瓦朗斯与欧克索讷 (Auxonne, 1788 年), 他以其军事科学与技术方面迅速的进步, 敏捷的学习能力, 具体建议的成果, 与其能随时参与炮兵管理的辛苦工作, 赢得同僚的尊敬。他仔细的阅读过莱斯皮纳斯 (Julie de Lespinasse) 的潇洒爱人, 基伯特 (Jacques-Antoine-Hippolyte de Guibert) 所作的《一般战术评论》(Essai de tactique générale, 1772 年) 与其他军事性的文章。拿破仑不再是一个流浪者; 他结交朋友, 上戏院, 听歌剧, 学舞蹈, 并且找寻风骚的女人。1787 年 1 月 22 日, 当他在巴黎渡假时, 他极力怂恿自己向一名妓女作了一次未事先准备的冒险; “那晚,” 他对我们保证, “乃是我第一次了解一个女人。”<sup>⑨</sup> 然而却使他心境忧郁。当他寂寞于屋内时, 他时时向自己问道, 为何他应继续活着。“虽然我有一天必须死去, 我如能自尽那将更好不过。”<sup>⑩</sup> 他不能想到任何愉快之处。

他利用空闲时间自修文学与历史。雷米萨 (de Rémusat) 夫人, 后来成为约瑟芬 (Josephine, 拿破仑一世最初的皇后, 1763—1814 年) 的宫女, 认为他是“愚昧、懒惰、草率”;<sup>⑪</sup> 但是我们发现他在瓦朗斯与欧克索讷时就念过高乃依、莫里哀 (Molière)、拉辛 (Racine) 与伏尔泰所作的戏剧,<sup>⑫</sup> 并能背出其中若干片段, 重读阿米约 (Amyot) 所翻译普鲁塔克的作品, 并且阅读马基亚维利 (Machiavelli) 的《君王论》(Prince), 孟德斯鸠的《法意》(Esprit des Lois), 雷纳尔 (Raynal) 的《两个印度群岛的哲学故事》(Histoire Philosophique des deux Indes), 马里尼 (Marigny) 的《阿拉伯史》(Histoire des arabes), 乌赛 (Houssaye) 的《威尼斯人的政府史》(Histoire du gouvernement de Venise), 巴罗 (Barrow) 的《英格兰史》(Histoire d'Angleterre) 等等。当他阅读时, 他作笔记并加摘要; 他年轻时所作的笔记被保存下来多达 368 页。<sup>⑬</sup> 他在个性上受影响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在思想上接受法国的启蒙思想。他浪漫

的气质符合于卢梭热情的散文与苏格兰传说中的诗人莪相(Ossian)的诗,他所以喜爱他们的作品“是因我也喜欢风与浪之呢喃声。”<sup>②</sup>

他欢迎大革命的来临,并在1790年利用另一次休假时间策划新政的完全接受。1891年他向里昂军官学校提出一篇论文——为赢取雷纳尔提供的奖赏,他的题目是“什么是更能增加人类幸福的真理?”也许被卢梭的《尤利·新爱洛伊斯》(Julie—ou La Nouvelle Héloïse)所迷住,并“影响他的思想,”<sup>③</sup>这位年轻的陆军军官答道:让他们了解简单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父母带着子女耕作田地,享用其收获,并且不受都市的繁荣与堕落的影响。一个人要获得幸福最主要是有食物与衣着、茅舍与贤妻;让他工作,饮食,生子,睡眠,他将比王子还幸福。斯巴达的人生与哲学才是最好的。“美德包含着勇气与力量;……精力是生命的要素……强壮者都是善良的,只有虚弱者才是邪恶的。”<sup>④</sup>在这方面年轻的拿破仑附和斯来西纳(Thrasymachus)<sup>⑤</sup>并接近尼采,其将拿破仑塑造成为一达成权势愿望的英雄以示致敬。<sup>⑥</sup>在这些议论中,他有意谴责君主专制政体,阶级的特权,与教会的虚假。里昂军官学校认为这篇论文不成熟而予排除。

1793年9月,拿破仑再度返乡。他很高兴立宪会议通过法令让科西嘉成为法国的一省,并且将所有法国公民的特权赋予它的人民。他收回要向这个国家报复的誓言,极端的使他成为一名法国人,并觉得大革命正在创造新而辉煌的法国。1792年的秋季,他自费出版他的作品《博凯尔的晚餐》(Le Souper de Beaucaire),他认为大革命是“爱国志士与欧洲暴君间的殊死战,”<sup>⑦</sup>并鼓励所有被压迫的人加入为人权奋斗的行列。但是,老英雄保利表示,只有他可获有此岛的充分权势,它的财源由法国提供,和严格限制法国军队踏上科西嘉土地的情况下,他才接受科西嘉成为法国一员。拿破仑以为他的条件过份苛刻;他不再对他崇拜,并反对保利于1792年

4月1日在科西嘉首府阿维克肖市的选举。保利获胜，拿破仑返回法国。

6月20日，他在巴黎目睹暴民侵入图勒里宫，他惊奇国王居然不命令他的瑞士卫队以排枪射击驱散“食人者”。8月10日，他看见无裤党员与联盟代表（Fédérés）将皇室家族驱出皇宫；他将群众比喻为“最低级的渣滓；……他们绝对不属于劳动阶级。”<sup>⑧</sup>由于他目前是一名陆军军官，他对大革命的支持就必须作更多保留。1793年12月8日，当土伦被占领时，他因预先有过联击而表明他的身份。罗伯斯比尔的奖励是指派拿破仑为陆军准将，当时他才24岁；在罗伯斯比尔失势后，他被视为罗伯斯比尔手下的雅各宾党人并且于1794年8月6日被捕。他被监禁于昂蒂布（Antibes），原定要受审判并可能处以死刑；但是两周后他被释放，并让其服非役军人劳务。1795年春天（他告诉我们）他徘徊于塞纳河，企图自杀，无意间邂逅一位朋友，赠予他3万法郎，使他精神振作；<sup>⑨</sup>拿破仑不久以后将总数加倍奉还。6月安格拉描写他为“一苍白而瘦小的意大利人，但他的作风却勇敢而无畏。”<sup>⑩</sup>他曾一度想回到土耳其，重组苏丹（Sultan）的军队，并且在这个东方的王国创立他的事业。他也曾为陆军部拟定一份将奥地利人逐出意大利的战略计划。

1795年10月5日，国民公会被保皇党员与其他人士包围，他们派定巴拉斯担任防御。他判断以排炮可以奏效，但无大炮可就近使用。他曾被提及拿破仑所做的工作，因而他指派在土伦的拿破仑去夺取大炮并加使用；这些他都做到了，拿破仑立刻为之成名，但却声名恶劣。当陆军部长需要一位勇敢而有进取心的统率来领导意大利陆军时，卡诺（或是巴拉斯<sup>⑪</sup>）取得对拿破仑的任用（1796年3月2日）。7天以后这位愉快的将军娶了美丽的约瑟芬。

### 第三节 约瑟芬

她是 Creole——即法国或西班牙的后裔生长于热带的殖民地上——人。地中海的马丁尼克 (Martinique) 岛, 当巴基里 (Marie-Joséphe-Rose Tascher de la Pagerie) 于 1763 年出生在该岛奥尔良家族时, 它已为法国统治 128 年了。她的伯父塔舍 (de Tascher) 男爵是港口司令官; 她的父亲, 曾是路易十六母亲玛利-约瑟 (Marie-Jonéphe) 王妃家中的侍从。她受教于殖民政府所在地罗亚尔 (Fort-Royal, 现在的 Fort-de-France) 的 Ladies of Providence 修道院。课程包括教义问答, 写作, 图画, 刺绣, 舞蹈, 音乐; 修女们相信这些比拉丁语, 希腊语, 历史, 与哲学更可以让一个女人进步; 约瑟芬证明他们是对的。她要变成像蓬帕杜尔夫人 (de Pompadour) 所说过的“国王的宠物。”

16 岁时, 她被带至法国并嫁给博阿尔内 (Alexandre de Beauharnais) 子爵, 时仅 19 岁, 但已经历到法国贵族政治上调戏女子的生活。不久由于他经常长久的外出而有外遇, 并且使敏感的约瑟芬觉悟第六戒律 (Sixth Commandment), 并非为较高阶层而设。她将自己的爱奉献给她的 2 个儿子博阿尔内 (Eugène) 与博阿尔纳 (Hortense), 他们也以一生的忠实报答她。

当大革命来临, 博阿尔内顺应新的政权, 因而又使他多活了 5 年。但当恐怖政治实施后, 任何贵族的头衔都可能成为逮捕的理由。1794 年, 博阿尔内与约瑟芬均被收押, 并分别监禁; 他被处死于 7 月 24 日, 然而在等待相同命运的约瑟芬却接受胡车将军热情的追求。<sup>⑨</sup>她是在罗伯斯比尔倒下后许多获得释放的贵族之一。



她丈夫的财产遭到没收，这使她变得贫穷不堪，并且她还得抚养与教育她的孩子，约瑟芬就利用她深蓝色的眼睛与具有忧郁的美结交塔利安，并成为日渐高升的巴拉斯的爱人。<sup>⑧</sup>大多数从博阿尔内所没收来的财富都归还给她，包括一辆雅致的马车与几匹黑马；<sup>⑨</sup>这使她仅次于塔利安夫人，并且成为执政团社交界的领导人物。拿破仑形容她的客厅为“巴黎最杰出的。”<sup>⑩</sup>

他参加过几次她的宴会，迷恋她成熟的妩媚，她从容自如的举止，以及她宽纵的父亲所谓的“非常温和的性格。”<sup>⑪</sup>她却未动情于拿破仑，在她看来他是一个面黄肌瘦收入微薄的年轻人。她遣使她的儿子，现已14岁，请求他帮助收回她丈夫被没收的剑。博阿尔内是如此的谦虚与令人喜爱，使得拿破仑立刻答应。这件事情办成了；约瑟芬拜访他以示谢意；并邀请他在10月29日共进午餐。他应约而来，并征服了她。1795年，12月的上旬，她答应与他共寝，<sup>⑫</sup>但他们却不愿结婚。他在圣海伦娜(St Helena)谈及往事：“巴拉斯建议我娶约瑟芬，这算帮了我一次忙。他向我保证她适应于新旧两种社会，这个事实带给我更多的鼓励；她的住宅是巴黎最好的，并且她还可除去我科西嘉的名字；最后经由这次婚姻我将成为完全的法国人。”<sup>⑬</sup>巴拉斯对她作同样的建议，但为着某些缘故她仍作考虑；<sup>⑭</sup>他向她表示，他是一个能利用各种迹象为他自己在此世上铸造很高职位的人。拿破仑不计较她以前的桃色事件：“你的一切都可使我欢喜，”随即他写信给她，“甚至于你曾犯的过错仍在你记忆中的……我都视为美德。”<sup>⑮</sup>

1796年3月9日他们举行完全平民化的结婚仪式；证人是塔利安与巴拉斯；并未邀请任何亲友。为缓和他们年龄上的悬殊——他27岁，她33岁——拿破仑登记为28岁，约瑟芬更改她的年龄为29岁。<sup>⑯</sup>他们在她的屋中渡过新婚夜。但却被她的爱犬弄得极为难堪。“那位绅士，”他告诉我们，“占据夫人的床铺……。我要他让开，但完全无效；我被劝说与他同睡一床或者睡到别处；我必须

接受否则就得离去。这位宠物比我还难以顺应”，最糟的是那只狗咬了他的腿，非常严重，以致使他疤痕长久不消。<sup>④</sup>

3月11日，在他的新欢与他对权势与荣华的热忱支配之间有了裂隙，拿破仑离去，统率了意大利陆军打了一次历史上辉煌的胜战。

#### 第四节 意大利的旋风

(公元1796年3月27日—1797年12月5日)

普鲁士与西班牙间的条约使军事形势为之明朗化，但是奥地利表示，只要法国固守他在荷兰与莱茵河所占领部分，它就不接受和平。英国持续其海上的战争，并津贴奥地利60万英镑以支持它在陆上的战争。奥地利自1713年起统治伦巴底(Lombardy)。现在她和萨丁尼亚与皮德蒙特的国王(King of Sardinia and Piedmont)伊曼纽耳(Charles Emmanuel IV)联盟，希望收复1792年被法国占领的萨伏衣与尼斯。

五人执政团中的卡诺负责处理这项事务，并计划于1796年向奥地利作一项三叉式攻击的军事行动。一支由茹尔当(Jourdan)统率的法国军队，沿着桑布尔河(Sambre)与梅尔塞河(Meuse)攻击奥地利的西北防线；另一支，莫罗率领，将沿着摩塞河(Moselle)与莱茵河袭击奥地利人；第三支，由拿破仑统率试图将奥地利人与萨丁尼亚人(Sardinians)逐出意大利。茹尔当，经过数次胜利后，被奥国太子路德维格(Karl Ludwig)以优势军力击败于安贝格(Amberg)与符兹堡(Würzburg)，并退却到莱茵河的西岸。摩里奥进入巴伐利亚(Bavaria)，几乎到达慕尼黑(Munich)，当知道得胜

的奥国太子可能切断他的通讯路线或攻击他的后路时，他撤退到阿尔萨斯。五人执政团，最后的期望，寄托于拿破仑。

3月27日，到达威尼斯后，他发现“意大利的军队”无力攻击那些封锁由地中海与高耸阿尔卑斯山之间进入意大利的狭窄通道的奥地利与萨丁尼亚的军队。他军队的总数约为4.3万人，勇敢而习惯于山地战，但服装粗劣，皮鞋破烂，伙食极差，使他们必需以偷窃维持生存；<sup>⑧</sup>他们之中有3万人几乎不能参与艰苦的战役。他们的骑兵不够而又几乎无炮兵。受这位27岁统帅指挥的将领有奥热罗（Augereau）、马塞纳（Masséna）、拉阿尔普（Laharpe）与塞苏里尔（Sésurier）——他们的服役期间都比拿破仑久；他们怨恨对他的任用，并决意要让他领教他们卓越的经验；但经过第一次会议，他们被他有信心与透澈的解释他的计划后，都为之心悦诚服并授与他军权。

他能使他的将领们畏缩，但不能逃出约瑟芬的魔力，到达尼斯4天以后，他搁置地图与传令兵于一边，并且以一个年轻人在他美丽梦想下刚发现爱情奥妙的强烈感情，写给她一封热情的信：

我无日不是在想念着你，我每夜也无不是想拥抱你。甚至喝杯茶都苦恼。我的军事抱负隔离我与我生命中的灵魂。不论我是在拼命的经营事业，或统率我的军队，或检查军营，我都挂念着可爱的约瑟芬……

我的心是在悲伤着，我的心情是在纠缠中，并且我想像着使我恐怖的事情。你不是像过去一样的爱我；你将在别处获得慰藉……

再见，我的妻子，我的折磨者，我的幸福……我所爱的人，我所恐惧的人，与使我情绪像大自然的温和，与像受到大灾难冲动的源泉。我并不要求你永远爱我，或者忠于我……而是仅要求你告诉我事实……造物主使我灵魂

坚强而不屈，而使你的镶有花边与披挂薄纱……我的意向虽在于浩大的计划策略，我的心最后将归属于你……

再见吧！噢！如果你不深爱我，你将永远会不再爱我。那样我将为之非常可怜。

拿破仑<sup>⑧</sup>

1796年3月31日，尼斯

在战云汇集之下，他于4月3日与7日再度写信给她。他研判所有他所获得的敌军情报：一支博利厄（Beaulieu）统率的奥地利军队在热那亚附近的沃尔特里（Voltre）；另一支阿根陶（Argentaui）率领的军队在蒙特诺特（Montenotte）较远的西部；还有一支科利（Colli）的萨丁尼亚军队在切瓦（Ceva）较远的北部；博利厄假设他的通信路线能使他的军队获得迅速支援。并且他的联军在数量上二比一胜过法国。因此，他合理的估计可击败法国的进攻，拿破仑的战略是秘密的，而且迅速的调动他大部份的军队对抗敌军中的一部份，并且在其他两支敌军援助来到前，予以击败，这个计划牵涉到法军迅速步行越过崎岖不平而多山的路径；它需要能吃苦耐劳与不屈不挠的战士。拿破仑用以鼓舞他们士气的第一个著名的宣言，影响其军力至大：

士兵们！你们既饥饿又贫穷。共和国亏欠你们太多，但她也无力偿付她的债务。我是来领导你们进入阳光普照下最丰饶的平原的。富有的省份，富裕的城镇，都将任你们处置。士兵们！如此一个远景，你们怎能失去勇气与信心？<sup>⑨</sup>

这是公开准许他们掠夺，但他如何能使这些无薪水的士兵忍耐长途行军后再作殊死战？拿破仑，像多数的统治者与革命家，永

远不让道德挡住胜利，并且相信成功将洗刷他的罪恶。意大利不应对她的解放付出代价吗？

他战略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击溃萨丁尼亚的军队，并且劝萨丁尼亚的国王退出都灵(Turin)，至皮德蒙特首府。一连串有决定性与成功的交战——蒙特诺特(4月11日)、米莱西莫(Millesimo, 4月13日)、代戈(Dego, 4月15日)、与蒙多维(Mondovi, 4月22日)——粉碎了萨丁尼亚的军队，并迫使伊曼纽耳在凯拉斯科(Cherasco, 4月28日)签定休战和约，割让萨伏衣与尼斯给法国，并且，实际的退出战争，这些战役中年轻的统率给他部属的深刻影响，是他敏锐而迅速的了解局势、困境、与机会，他的聪明与果断的命令，他完成深谋远虑的战略，经常由侧面或后面攫取敌人之战术的逻辑与成功。年老的将领对他的看法与判断有信心并学会服从他：年轻的军官朱诺、拉梅特(Lannes)、缪拉、马尔蒙(Marmont)、贝尔蒂尔(Berthier)——显示有不断为他的主义效命的热诚。这些胜利之后，当疲劳而幸存的战士到达蒙特·塞摩托(Monte Zemoto)高地——从那里他们能俯览阳光照耀下的伦巴底平原——许多战士突然向这位英明领导他们的年轻人发出自然的欢呼。

现在他们不需以抢劫维生；任何可设立法国法令之处，拿破仑就向富人与教会的教士团征税，并且说服或命令城镇人民资助他的军队生活费，以促成其有纪律的行为。4月26日，在凯拉斯科，他以聪敏的赞词向他的军队演讲，警告他们不得抢劫：

战士们：

你们在两星期内赢得六场胜利，夺到21面军旗，55门大炮，并且征服皮德蒙特最富裕部份……在无任何资源情况下，你们完成一切应该做的。你们没有大炮却赢取了許多场战役，没有靴子也可急行军，渡过没有桥梁的河流，过着没有白兰地酒与经常没有面包的帐篷生活……

感恩于你们的国家，它的兴隆依靠着你们……

但是，战士们，就那些留待要办的事来说，你们迄今丝毫未做。所刺给你们的既非都灵也非米兰(Milan)……你们之中有什么人缺乏勇气？有什么人宁愿回头翻过亚平宁山与阿尔卑斯山的山顶，痛苦地忍受卑屈士兵的耻辱？不，在蒙特诺特，代戈，蒙多维的征服者之中，没有这样的人，你们都应积极地宣扬法国人民的荣耀……

朋友们，我保证你们的胜利，但是你们必须发誓遵守一个条件。那就是尊敬你们所拯救的人民，并且制止由我们敌人鼓动一些恶人所犯的可怕抢劫。否则你们将不是他们的拯救者，而是他们的灾难……你们的胜利，你们的勇敢，你们战死弟兄的鲜血——都将丧失，甚至于名誉与光荣的成就。至于我与获有你们信赖的将领，都将羞于统率一个无纪律与无约束的军队……任何参与抢劫的人，都不被宽恕并予以处死。

意大利的人民，法国军队是来打开你们的镣铐的；法国人是全世界人民的朋友。你们可大胆的宽待他们。你们的财产，你们的宗教，与你们的习惯将受到重视……我们除了打倒压迫你们的暴君之外，并无不利你们的企图。

不顾这些请求与威胁，在此后的第一次战役，仍有许多抢劫。拿破仑处决一些抢劫者，其他则予以赦免。“这些可怜的人，”他说，“值得原谅的；他们渴望这久已想往之地有3年了，……现在他们来到此地，他们希望占有它。”<sup>①</sup>他让他们分享由“被拯救的”城镇中所抽取的奉献与物质以得到满足。

在行军、战斗、与外交的动乱中，他几乎每小时都想到他新婚夜后不久即离开的妻子。现在她可能安全的越过塞文山(Cévennes)，在4月17日的信中，他请求她，回到他身边。“快些

来，”在1796年4月24日的信上，他写着：“我警告你，如果再迟延，你将发现我病了。这些劳累与你的不在两者合在一起是超过我所能忍受的……迅速来此，并且放……一个吻在你的心上，另一个稍低些，另一个又更低些！”<sup>④</sup>

她忠实吗？她能够，十分习惯于她的生活乐趣，让她自己满足书信上的奉承吗？同年4月，一位24岁年轻英俊的军官查理士(Hippolyte Charles)接近了她，5月她请塔列朗去会晤他。“你将被他迷住，雷卡米耶(Récamier)，塔利安，与阿默兰(Hamelin)的夫人都因他失去理智。”<sup>⑤</sup>她变得十分迷恋于他，以致当缪拉携带拿破仑的赠金要她到意大利与他会合时，她以生病为由予以拖延，并且让缪拉传话给他的长官，她有怀孕的迹象！拿破仑于5月13日写信给她：“这是真的，你已怀孕了！缪拉……说你觉得不舒服，并且他不认为你做如此漫长的旅行是聪明的。因此我仍有一段较长的时间，不能获得紧抱你的欢乐！……我将否认见到你怀孕小腹的喜悦是可能吗？”<sup>⑥</sup>他高兴过早；她将永不给他生一个孩子。

同时，他率领他的部队经过12场战役，获得伦巴底——富有而文明的米兰市。在罗地，阿达河(Adda)西岸，他的主力挡住博利厄率领的奥地利主力部队。博利厄退却，过了一座200公尺的木桥，然后，将其大炮放在可阻止法国军队作同样渡河的位置。拿破仑命令他的骑兵向北前进，一直到他们找到渡河的浅滩为止，然后向南转进，并攻击奥地利的背后。他的步兵隐蔽于城镇的房子与围墙之后，他亲自指挥他的炮兵轰击护桥的奥地利人的大炮。当他的骑兵突然出现于河的西岸，并突击奥地利人时，他命令他的掷弹兵引路渡过木桥。他们尝试了，但为奥地利人的大炮所阻止。拿破仑向前猛冲并与拉纳及贝尔蒂尔共同领导他们前进。奥地利遭到决定性的战败(1796年5月10日)，损失2000名俘虏。博利厄撤至曼图亚(Mantua)；法国军队，经过一天的休息，进军到米兰。法国军队被拿破仑鲁莽但勇敢的暴露在敌人炮火下的行动所感动，授

与他一个挚爱的头衔“小班长”。

在此胜利不久后，他收到执政团一项使他十分难堪的建议，以致他不得不以他一生前途的危险来做他的答覆。那五位执政，对巴黎得到拿破仑成功的消息所作的庆祝甚为高兴，并在5月7日通知他现在他的军队被分为两个部份；一部份由克勒曼(Francois-étienne Kellermann)统率，并且保护意大利北部的法国不受奥地利人的攻击；另一部份，由拿破仑统率，向南推进并将罗马教皇国(Papal States)与拿不勒斯王国收归法国控制。拿破仑认为这不仅是对他个人侮辱，甚至是战略上严重的错误；不仅是因攻击罗马教皇权力(Papacy)会激怒欧洲所有的天主教徒，包括法国在内，反抗大革命，而且天主教的奥地利已准备派出一支强有力的军队，由经验丰富的陆军元帅武姆泽(Dagobert Von Wurmser)伯爵统率，将他驱回法国。他回答道意大利军队必须联合并且补充它的兵力以维持它所获的利益；在一位统帅领导之下这才能成功；因此他的位置将让予克勒曼将军，并且提出他的辞呈。

五人执政团获悉此消息，以及拿破仑最近军事与外交成功的报告。这位年轻的将军——对他的胜利引以为傲，觉得那些不明了实际的政客是不能使他按照敌军的策略与法军情况胜任于条约的谈判——僭取和谈或战争的权利，并且决定让每一意大利城市或州获得他军队保护而不受损于其贪婪所应支付的代价。因此，在胜利的进入米兰后(1796年5月15日)，他与巴马(Parma)公爵，莫代纳(Modena)公爵，及那不勒斯国王休战，他保证他们与法国间和平，并且不受奥地利的攻击，并且载明每一侯国的捐赠，用以支付这仁慈友好的代价。他们支出为数甚大的款项，并且极度厌恶从他们的画廊、王宫、与公共广场偷窃艺术珍品。

米兰欢迎他，因为它渴望由奥地利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已有一世纪之久，并且这位年轻的军阀表现出胜利者少有的仁慈。他适合意大利的语言与生活方式，欣赏意大利的女人，音乐与艺术；他们



不能立刻了解他喜爱意大利艺术的程度。无论如何,除了一个月左右以外,他不是意大利人吗?明显的,他聚集在周围一批意大利的艺术家、诗人、历史家、哲学家、科学家,并且和他们亲切地谈天;有时他似乎是斯福尔扎(Lodovico Sforza)与达芬奇(Vinci, Leonardo da,意大利画家与雕刻家,1452—1519年)的重生与融合。什么还能比他给天文学家奥里亚尼(Barnaba Oriani)的信更迷人?

在米兰有智识的人往往不能获得他们应得之报酬。他们躲藏在实验室中,他们暗自高兴,如果国王与教士不妨碍到他们的话。现在已非那样。在意大利已有思想自由,没有宗教裁判所,没有不能忍受之事,没有暴君。我邀请所有有学识的人聚集在一起,并且告诉我什么措施应当采取,什么需要应当供给,因而可给予科学与精美艺术一个新的生命……祈求让我表现这些情操给住在米兰杰出而有学问的人。<sup>⑤</sup>

拿破仑将米兰与伦巴底共和国予以合并,他们的人民享有法国相同的自由、平等、博爱、与税赋。在对新公民的宣言中(1796年5月19日),他解释到为使伦巴底自由,拯救它的军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获得自由的人们应捐献大约2000万法郎作为他军队的生活费;对如此一个富裕国家,这当然是一个小小的奉献;此外,“税收应征于富人……及教会团体”,并可分享于穷人。<sup>⑥</sup>先前的常规有不很好的声名,“一名密探应跟随在意大利的法国军队到各占领的城镇,寻找所有的艺术、科学等物品,并且转送至法国。”<sup>⑦</sup>意大利人仅能以一句双关语回报:“并非所有的法国人都是抢盗者,但有很多是的。”拿破仑仍然仿效国民公会与五人执政团所订的前例。

这次占领地的艺术掠夺是以前少有的。它在法国以外各地产

生愤怒,并为以后的军人定出了一种模式。大多数的掠夺品被送至执政团,它欣悦地接受,并送至卢浮宫(Louvre),在那里抢夺来的蒙娜丽莎(Mona Lisa)从未失去她的微笑。拿破仑为他自己保留少许意大利的财产收入;<sup>⑧</sup>一些被用于得宜的贿赂,大多数付给军队,因而缓和了他们偷窃的狂热。

为他的新娘安排住处后,他(在5月18日)强烈要求她来会合。“米兰……使你不得不高兴,因这是一个极美丽的地方,至于我,我将极为欣喜……我好奇得要死,想见到你如何怀着你的孩子……再见,我亲爱的……快些来听这美好的音乐,看这美丽的意大利。”<sup>⑨</sup>当他的信在路途中,他继续地在驱逐奥地利人于意大利之外,5月20日,他再度聚集他的军队;并且知道他们很快又要遭遇许多障碍与敌军,他发表另一动人的文告:

战士们!

你们的猛攻,如亚平宁山冲下的山洪;你们打败并击败每一阻碍你们前进的敌军……波河(Po),提契诺河(Ticino),阿达河(Adda)无一能阻止你们前进……是的,战士们,你们已立了许多功劳,但就无任何可再让你们表现的了么?不是!我看出你们得迅速备战;因懒散的睡眠使你们疲倦;你们的荣耀与快乐逐日失去了,让我们继续前进!我们仍需作急行军,克服敌人,打击邪恶,赢得胜利……

让人民不为我们的前进所干扰;我们是所有人民的朋友……你们将获得使欧洲最美部份的外观改善之不朽荣誉。自由的法国……将给予欧洲一份光荣的和平……然后你们将回到你们的家园,并且,你们的同胞,挑选出你们来夸奖,“他与意大利陆军在一起。”<sup>⑩</sup>

5月27日,他们通过伦巴底继续前进。不理睬布雷西亚(Brescia)是威尼斯(Venetian)人的地方,拿破仑占领了它,并使它成为新战役最重要的据点。当威尼斯派公使抗议,拿破仑,以他一个假装的激怒,严责为何威尼斯已准许奥地利人使用威尼斯城(Venice)的城镇与道路作为恐吓;公使表示歉意,并也同意他使用威尼斯城的地方。<sup>⑨</sup>一次急速行军将法军带至佩斯基耶拉(Peschiera);留驻那里的奥地利分遣部队逃散;拿破仑增强战略要塞抵抗力以保护其通讯,并且推进到曼图亚,在那里博利厄的3个残余部队躲避在难以攻陷的防御物之后。拿破仑留下他一部份兵力包围城堡。他派遣另一部份将英国人驱逐于来航(Leghorn)之外;并且民众的反叛逼使他们离开科西嘉。缪拉发现很容易将奥地利公使逐出热那亚,并且并入那个地中海基地成为一个法国控制的利古里亚(Liguria)共和国。意大利很少见过在如此短的期间有如此多的权力变动。

拿破仑回到米兰,等候约瑟芬。7月13日,她来了,这位胜利者拥抱他的征服者。次日这城市在拉斯卡拉(La Scala)以一项特别的演出表示对她尊敬,那是在一场球戏之后,所有的地方名士都与她会面。3天狂喜之后,这位将军回到他在马尔米罗洛(Marmirolo)的部队,他向她表示出青年崇拜的赞美:

自从我们分别后,我无时无刻都在悲伤。当我与你相处时,我不知如何保存幸福……我举世无双的约瑟芬的魔力所点起的火焰,不断透过我的感觉,燃烧着我的心房。究竟何时我可摆脱焦虑与责任,毫无拘束地用我所有时间与你相处,除了爱你以外不做任何事情……

几天前我认为我深爱着你,但再度见到后,我爱你甚于以前1000倍……

呀,我恳求你,让我发现你的缺点。你不很美丽,不很

亲切，不很仁慈，不很温柔。毕竟，你从不妒忌，从不哭泣。

你的眼泪夺走了我的理智，使我的血液燃烧着……

……快些来与我会合，最起码我们在死以前我们可说出：“我们曾有许多欢乐相处的时光。”……<sup>⑥</sup>

她十分顺从而且不顾途中有敌人狙击兵的危险，在布雷西亚追上了他，并且伴随他至维罗纳（Verona）。在那里有一名密探向他报告武姆泽伯爵率领一支新的奥地利军队准备进入意大利，他最近曾将法国人逐出曼海姆（Mannheim）。这支军队的人数据估计为拿破仑军队的2倍。可能的灾难是可预期得到的，他将约瑟芬送回佩斯基耶拉，并安排由那里护送至佛罗伦萨（Florence）。同时他命令他以前留在曼图亚的分遣队放弃包围并且绕一安全的远路与他的主力部队会合。他们及时赶到并参与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战役（1796年8月5日）。武尔塞，未预料到有如此早来的攻击，正领着他的部队以非常松散的行列向南移动。拿破仑突然扑击毫无准备的奥地利人，使他们混乱溃逃，并且捕获1.5万名俘虏。武姆泽退却至罗韦雷托（Rovereto）；法国人追击到那里并将其击败，并且再度在巴萨诺（Bassano）奏捷；这位沮丧的老将军与他的残余部队逃走，并躲入曼图亚城堡之后。拿破仑留下一些联队将他困住在那里。

但是现在又有6万名奥地利人，在奥尔温齐（Alvinczy）男爵统率下，翻过阿尔卑斯山峰拥而来，迎战拿破仑的4.5万人。他在阿科莱（Arcole）与他们相遇，但是他们却在阿迪杰河（River Adige）的另一面，要获取他们只有通过炮火封锁下的桥梁。再度，象由

洛迪渡过阿达河，拿破仑又是首先过桥。<sup>\*</sup>“当我在战斗的极度混乱中，”他随后回忆到，“我的副官，木维伦（Muiron）上校，冲向我的身边，用他的身体掩护着我，并且接受向我射来的子弹，他倒在我的脚下。”<sup>⑨</sup>3天持续的战争（1796年，11月15—17日），奥地利人，勇敢作战，战败了，并有秩序的退却。奥尔温齐在里沃利（Rivoli）整编他们，但他们再次被击败，奥尔温齐损失3万人，领着幸存者退回奥地利。武姆译，失去获援的希望，并同情他快饿死的军队，于1797年2月2日投降了，法国对伦巴底的征服是彻底的。

无庸的拿破仑，转移他的兵力到南面指向罗马教皇的国家，并且礼貌地要求庇护六世（Pius VI）给予他博洛尼亚（Bologna）、费拉拉（Ferrara）、拉文纳（Ravenna）、安科纳（Ancona）及他们的属地。依《托伦蒂诺条约》（Treaty of Tolentino, 1797），罗马教皇交出这些古希腊的城市国家（city-states），并且付1500万法郎“赔款”作为法国军队的开销。然后，掌握皮德蒙特与威尼斯以外的整个意大利北部，拿破仑重组他的军队，加入一些意大利组成的团与贝纳多特（Bernadotte, Jean Baptiste—Jules, 1763—1844年，拿破仑手下的大将）统率的一师来自法国的强壮兵力，领着7.5万人翻过积雪三英尺的阿尔卑斯山，并且打算强力的攻击维也纳，因这是反对法国大革命各帝国的中心。

弗兰西斯二世派刚从莱茵河旁得胜回来的路德维格大公爵，率领4万人抵抗他。路德维格惊异向前推进法军的人数，并敬佩拿破仑的名誉，他采用退却的战略，拿破仑尾随至距奥地利首都60

---

\* 格罗（Gros, Antoine Jean, 法国画家，1771—1835年）的这位年轻统帅的著名画像—眼光闪烁，头发随风波动—军旗执在一手，剑在另一手—越过在阿科莱的桥梁到达米兰，不久之后即被画成，并且成为巴黎沙龙1801年的主要作品。

英里处,用或者不用一场战争他都可能占领此域,因而他忙碌于酬酢在老海登(Haydn, Franz Joseph, 奥国作曲家, 1732—1809年)以及年轻的贝多芬之间(Beethoven, Ludwig van, 德国大作曲家, 1770—1827年)。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退却至匈牙利,战争可能在时间与空间上延伸,并且,冬季将来临,法国陆军发现它们将留在有敌意而不熟悉的国土内,和受制于突然的侧翼攻击。拿破仑以罕见的谦虚,和日后对他甚为有益的谨慎心,邀请大公爵谈判停火。大公爵拒绝了,拿破仑在诺伊马克(Neumarkt)与马札克(Umzmarkt)给予了他的军队严厉打击,路德维格才愿谈判。在莱奥本(Leoben), 1797年4月18日,这几位年轻的统帅签定一项初步的和谈条约,呈请他们政府的批准。

批准的路程受阻于奥地利拒绝投降以及——拿破仑的决心保有——他占领的伦巴底。一个非常次要的事件给了他一个解脱此僵局的机会。他占领几个属于威尼斯的城市;其中的几个城镇发生暴动,反抗法国驻军。拿破仑抨击威尼斯的参议院(Venctian Senate)煽动这些暴动,因而废去它并在其原址设立一个受制于法国管理的市政机构,而且剥夺它本土的财产。1797年10月17日莱奥本的初步和约被转换成为《坎波福尔米欧条约》(Treaty of Campoformio),拿破仑让奥地利无拘无束地并吞威尼斯,以交换割让伦巴底与比利时,并且承认法国在莱茵河左岸的权利。几乎整个欧洲,忘却了1000项条约,极度憎恶的反应这以其他国家人民的财产作为外交的慈善事业。

新的马基亚维利理论坚持,无论如何,要为法国保有威尼斯人在亚得里亚海(Adriatic)各岛——科孚(Corfu)、桑特(Zante)、凯法利尼亚(Cephalonia)。“这些,”拿破仑于1797年8月16日写信给五人执政团,“对我们的重要超过意大利其他各部份的总和。他们是使我们商业获有财富与繁荣的最重要条件。如果我们要有效的摧毁英国,我们必须取得埃及。强大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 日渐衰微,迫使我们得事先准备重要事件,并且采取早期措施,保护我们在黎凡特(Levant,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的国家和岛屿)的商业。<sup>⑨</sup>这位 28 岁的年轻人很少让外交界老人指正。

他冷静地使用外交权力,将征服的地方重组为以米兰为中心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Cisalpine Republic),以及热那亚为重点的利古里亚共和国,二者都由于法国保护势力下之本地的民主政体来管辖。报复并且扭转凯撒(Caesar, Gaius Julius, 公元前 102 或 100—44)领导下罗马人对高卢人(Gaul)的征服之后,这位“小班长”怀着光荣与战利品回到巴黎,并将他的条约带给他协助曾整顿却已变质的执政团予以批准。

## 第五节 共和历 12 月 18 日的政变

(公元 1797 年 9 月 4 日)

巴黎不像在 1792 与 93 年时他了解的群众统治的时期了。自从罗伯斯比尔于 1794 年失势之后,首都的市民已仿效乡村居民,在宗教与政治上强烈的反对大革命。天主教,由不肯宣誓效忠的教士领导,再度掌握民众,他们失去信仰而以凡俗的事务取代超自然的慰藉,以及圣事、圣礼、与有游行的圣日。décadi,或十日休息制逐渐淡忘了;基督教的礼拜日很明显的受到尊敬与欢迎。法国支持上帝。

对一位国王而言,民众无论在家中与在文艺沙龙,在公开的舆论或在街道上,甚至在曾由无裤党掌握的地方性“议会”中,都表示对路易十六的悼惜,为波旁皇族的过失辩护,并且请求有权威的君主政体以外的任一政府,使法国脱离混乱、罪恶、腐败、与战争的蹂

躡,并获得法治、繁荣、与和平。回来的移民之数目众多,以致智者称他们最常去巴黎的地方为小科不林士(Le Petit Coblenz)(来自在德国的有爵位的国外流亡者之避难所);并且在那里人们可以听到博纳尔德(Bonald)与迈斯特(de Maistre)在外国宣扬的君主政体的哲学。民选的“议会”里,势不可挡的资产阶级,正派了许多准备表现忠心的“议员”给元老院与五百人院,如果它能提供财产作抵押物的话。1797年前,两院中的君主主义者已强大到足以将贝泰勒米(Barthélemy)侯爵选入五人执政团。卡诺,自1795年起就是执政,转向右派攻击巴贝夫的宣传,并且自豪的认为宗教是抵挡共产主义的疫苗。

强烈赞成共和的督政巴拉斯、来波克斯、与鲁贝尔感觉到趋向君主政治会使他们的任期与生命受到危险,并且决定冒一切危险发动一次政变,除掉两院与执政团领袖。他们由激进派的雅各宾党获得民众支持,在保守派复兴期间该党躲藏在难受的黑暗处。他们为获得军事力量支持而向拿破仑请求意大利派遣一位能组织巴黎军队的将领。他愿意帮助他们;但是波旁皇族的兴起将使他的计划无法得逞;然而让他自己政治权力提高的通路必须敞开着,并且冒险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派出强有力的奥热罗,多次战役的老将;并在共和历12月18日攻入立法机构的议事厅,逮捕53名议员,许多保皇党的密探,以及贝泰勒米与卡诺两位执政。卡诺随后逃至瑞士;剩下的大多数被驱逐出境,辛苦工作并衰老于南美的圭亚那。在1797年的选举中,激进派赢得对两院的控制,他们加入杜埃的梅兰(Merlin)与特雷亚尔(Jean-Baptiste Treilhard)成为胜利的“三人执政”(triumvirs),并且给予这变动后的执政团有无限的权力。<sup>⑥</sup>

当拿破仑于1797年12月5日到达巴黎时,他发现一项新发生的恐怖,正针对着所有保守派的份子,并且以放逐至圭亚那取代断头台。虽然如此,所有的阶层似乎一致赞扬这位所向无敌的年青



将军将半个意大利并入法国的壮举。他暂时收敛起他严肃统治的外表。他衣着端庄,并且采用不同的取悦方法:对保守派他褒奖牧师的地位;对雅各宾党则表示已使意大利从隶属地上建立自由;对知识分子则以书写表达“真正的胜利,唯一无遗憾的,是那些无知的消除。”<sup>④</sup>12月10日,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以官式欢迎向他致敬。斯塔埃尔夫人(法国女作家,1766—1817年)曾在那里,并在她的回忆录中记下当时的情景:

执政团给予拿破仑将军一个庄严的欢迎会,在某些方面显示出这是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时期。他们选择卢森堡王宫的庭院举行此仪式;没有足够宽敞的大厅容纳下被吸引的群众;窗子旁与屋顶上都是观众。五位执政,身着罗马式的服装,被安置在宫廷的礼坛上;他们的近旁是长老院与五百人院的议员,以及知名之士。……

拿破仑衣着朴素,到达时身后跟随着他的副官或是助理官员;他们都高于他,但他们都屈身向他表示尊敬。聚集在那里的法国社会名流,以欢呼笼罩这位将军。他是每一个人的希望——共和主义者或保皇党——;他们都看见掌握在他手里的现在与将来。<sup>⑤</sup>

就在那个场合,他将完成的《坎波福尔米欧条约》交给执政团。它被正式批准,拿破仑暂时满足于在外交与战争方面的胜利。

由参加由难以毁灭的塔列朗(当时是外交部长)所举办向他致敬的宴会后,他回到他在成德理路(Rue Chantierine)的家园。在那里他与约瑟芬及她的孩子过着悠闲的日子,并且有时候他过份让自己避开民众的注意,以致他的崇拜者谈论到他的谦虚,并且他的毁谤者高兴于他的没落。然而,他拜访知名之士;他与拉格朗

日 (Lagrange, Joseph Louis) 谈数学,与拉普拉斯谈天文学,与西哀士谈论政府,与谢尼埃谈文学,并与大卫谈艺术。他可能已在策划突击埃及,并想带一批学者与科学家和他同行。

五人执政团看出像如此过份的谦让是有些值得怀疑的;这位年轻人,在意大利与奥地利表现出他就是政府,他可能决定不在巴黎有同样的行动吗?希望他能在遥远地方忙碌,他们让他统率正聚集在布雷斯特的5万名战士与水手进攻英国。拿破仑研究此计划,却予以拒绝,并且在1798年2月23日的一封信中警告五人执政团:

我们应放弃任何要进攻英国的尝试,并且使我们自己满意它的外观,同时致力所有精神与资源于莱茵河……我们不应使大批军队远离德国……或者我们应远征黎凡特,威胁英国与印度的商业。<sup>⑥</sup>

这是他的梦想。甚至在意大利战役中,他考虑到突击亚洲的可能性。在奥斯曼王国逐渐衰退中,一位英勇之士,拥有勇敢与饥饿的人们,可能创造一些事业,可能缔造一个帝国。英国控制了海洋,但是攻取马耳他 (Malta) 可能使她失去在地中海所占有的;攻取埃及可能使她在印度的占领地为之薄弱。在那些地方,劳力便宜,天才与法郎可建立起一支舰队,勇气与想像使她渡过遥远的海洋到达印度,并由英国殖民地组织获得它的最富有财产。1803年拿破仑向雷米萨 (de Rémusat) 夫人表明:

如果我不表示出要去埃及的兴奋意向,我真不知会发生什么意外。我不知何时着手,而且那可能要我永远离开法国;不过,我有些怀疑地将召我回国。使我离开欧洲而想去征服亚洲国家的魔力,超过我的信心。<sup>⑥</sup>

五人执政团同意他的建议,有几分是因为它认为如果他在远地那将较为安全。塔列朗同意的理由仍受到争辩;他的情妇格朗(Grand)夫人宣称,他如此做是为“讨好他的英国朋友”,也许可将进攻英国的军队转向埃及。<sup>⑥</sup>五人执政团延缓答应,因为这项远征将花费金钱,消耗需要用来抵抗英国与奥地利的人员与物质,将促成土耳其(埃及的懒散统治者)有一个对抗法国的新联盟,但是法军在意大利迅速推进征服了罗马教皇的国家—意大利中部与那不勒斯王国一带给执政团丰富的战利品;并在1798年4月,在拿破仑同意之下,另一支法国军队攻入瑞士,建立瑞士共和国(Helvetic Republic),要求“赔偿,”并将赔款送至巴黎,如今这个埃及梦想已有了财源。

拿破仑立刻着手作舰队的详细部署。13艘战舰,7艘快速战舰,35艘其他的战舰,130艘运输舰,1.6万名海员,3.8万名军队(多数来自意大利的军队),配有必须的装备与物质,以及287本藏书,聚集在土伦、热那亚、阿维克肖、或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并且科学家、学者、与艺术家都乐于接受邀请且允诺作一有刺激与有历史性的冒险与探索。他们之中有数学家蒙日,物理学家傅立叶(Fourier),化学家贝托莱,生物学家圣伊莱尔(Geoffroy Saint-Hilaire);以及塔利安,将他的妻子让予巴拉斯,在著名学者中找到出路。他们骄傲地表示,拿破仑现在签署他的证书“拿破仑,法兰西学院团会员与统帅。”<sup>⑦</sup>布列纳,于1797年在坎波福尔米欧投效拿破仑并成为他的秘书,航行中陪伴着他,并且为他的吉凶作详细的说明。约瑟芬也要随同前往;拿破仑允许她同行至土伦,但是他禁止她上船。然而,他却带着她的儿子博阿尔内,他的礼貌与能力很讨拿破仑的欢喜,并且他的忠贞变成一种不气馁的热爱。约瑟芬忧伤这种双重的分离,不知她是否能再看到她的儿子与丈夫。她从土伦到普隆比耶尔(Plombières)获取“有生殖力的水,”因

现在,她与拿破仑,都想要有一个孩子。

1798年5月19日,主力舰队驶离土伦,将中古的冒险事迹带入近代历史。

## 第六节 东方的幻想

(公元1798年5月19日—1799年10月8日)

这支舰队的意向十分保密,以致5.4万人几乎都不知他们的目的地。在对新“东方的军队”独特的宣言中,拿破仑仅称它为一支“英国军队的侧翼,”并且要求他的水手与战士相信他,纵使他尚不能确定他们的任务。这项保密有益于若干用途:英国政府显然误认这支舰队准备奋战通过直布罗陀(Gibraltar),然后参予对英国的攻击。在地中海的纳尔逊(Nelson, Viscount Horatio,英国海军上将,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以战胜拿破仑而享盛誉,1758—1805年)的战舰警戒松懈,使法国的商船队逃过他们的监视。

6月9日,接近马耳他。五人执政团已贿赂马耳他的总督及其他显贵的骑士,\*使其仅作象征性的抵抗;®结果法国只损失三人就占领这表面上难以攻取的堡垒。拿破仑在那里耽搁了一星期,改组哥瓦德(Gaulward)岛的行政。未来的诗人维尼(Vigny, Alfred Victor de,法国诗人,1797—1863年),当时才两岁,被介绍给这位征服者,他举起他并亲吻他;“当他小心地将我放到甲板时,他又获得了一名奴隶。”®然而,往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途中,这位

---

\* 因此,中古的耶路撒冷的慈善组织之骑士团(the order of Hospital of St. John of Jerusalem)为人熟悉,乃得自他们长期占据马耳他。

似神的人物几乎都在晕船中。同时，他研读《可兰经》(Koran)。

这支舰队于1798年7月1日到达亚历山德里亚。这个港口由卫戍部队防守着，登陆将花费很大代价；早而有秩序的登陆还是必须的，如果这支分遣舰队不被纳尔逊舰队突袭的话。附近的波浪十分汹涌，但拿破仑亲自率领一支5000人的登陆队伍，踏上此一未加防护的海岸。这些人，无骑兵或大炮，于夜间接近卫戍部队，并以200名法国人伤亡的代价克服了它，占据了这座城市，并且在舰只提供的保护下，将士兵与他们的军备卸置于埃及的国土上。

以这场胜利及一些阿拉伯语作武器，拿破仑说服当地领袖坐下来与他会谈。他谈笑取乐，然后以他对《可兰经》的了解与巧妙的使用它的惯用语与概念留给他们深刻影响。他让自己与他的军队尊敬他们的宗教、法律与财产，他保证——如果他们愿以劳力与军需品支援他——为他们赢回马麦卢克(Mameluke, 1220—1517年，统治埃及军人之一)佣兵夺取的土地，他们在埃及衰微时统治了埃及。阿拉伯人半信半疑地同意了，7月7日，拿破仑命令他好奇的军队穿过150英里沙漠到达开罗(Cairo)。

他们从未遭遇过如此酷热，如此干燥，如此眩目的沙漠，如此不懈息的昆虫，如此使人无能的赤痢。拿破仑沉默着分担了他们的辛苦工作，使他们的抱怨因而为之平息。7月10日，他们到达尼罗河(Nile)，尽情地唱着，并且恢复他们肉体的疲劳。又经过五天的行军，他们的前锋，接近一座有3,000名马麦卢克军队之科布拉启塔(Kobrakit)的村庄：“华丽的骑兵”(拿破仑回忆起他们)，个个都是金银闪烁，配备了最好的伦敦卡宾枪与手枪，与东方最好的军刀，骑乘也可能是欧洲大陆最好的马匹。”<sup>⑧</sup>不久马麦卢克的骑兵攻击法国防线的前线与侧翼，却被法国人的毛瑟枪与火炮射倒。肉体与自尊都受到伤害，马麦卢克的军队掉头逃走。

7月20日，距开罗仍有18英里时，胜利者突然看到埃及金字塔。该夜，拿破仑得知有6000名马麦卢克的骑兵，在23地区省长

率领下,聚集在艾布巴(Embaba),准备向异教的入侵者挑战。次日下午,他们在埃及金字塔的决定性战役中倾力狙击法国军队。在那里,如果我们相信拿破仑的记忆,他告诉他的士兵,“他们注视你们已有40个世纪之久了。”<sup>99</sup>法国军队再度以大炮、毛瑟枪、枪上刺刀抵抗猛攻;他们之中有70名战死在那里,马麦卢克军队死亡1500人;大多数战败的,仓皇而逃,跳入尼罗河被淹死了。7月22日,土耳其在开罗的当局,将市钥送给拿破仑以示投降。7月23日,他进入这如画般的首都,未遭到任何攻击行动。

从那个中心,他用他所控制的阿拉伯国务会议,发布了埃及政府的命令。他用他的军队防御并阻止抢夺,保护现存的财产权利,但是为补给他的军队,他继续占用习惯上由马麦卢克征服者征收的税收。他与土著领袖会商,声明尊敬伊斯兰教的(Islamic)宗教与艺术,承认阿拉(Allah)为唯一的神,并且要求回教徒援助埃及获得新的繁荣。他召集他的科学家,设计消除瘟疫的方法,引进新的生产事业,改进埃及的教育与法律体系,设立邮政与交通公营事业,修筑运河,调节灌溉,并且使尼罗河与红海会合。1799年7月,他以法国与当地的博学之士组成了埃及研究所,并且为它在开罗设置宽敞的工作场所。这些学者准备了24大册《埃及的叙述》(Description de l'égypte)由法国政府资助与出版(1809—1828年)。这些人中的其中一位,我们得知为布沙(Bouchard),于1799年,距亚历山德里亚23英里的一个城镇上,发现罗塞达石板(Rosetta Stone),它的碑铭,为两种语言及三种字母刻成(古埃及象形文字,简化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希腊文字),使得由托马斯·扬(Thomas Young, 1814年)开始,并且由商博良(Champollion, Jean-Francois, 法国研究埃及风俗与制度学家,1790—1832年)设定(1821年)一种古埃及象形文字原文翻译法,因此向“近代的”欧洲吐露出古埃及文明的惊人复杂与成熟。这是主要并且是唯一有意义的拿破仑远征之成果。

暂时他可享有战胜的荣耀与施政的乐趣。在他稍后的回忆中，他告诉雷米萨夫人：

在埃及渡过的时光，是我生命中最为喜悦的……在埃及我发现自己丝毫未受到使人厌倦的文明之拘束。我梦想到各种事物，并且我看出我所梦想的一切如何能成为事实。我创造了一个宗教。我想像着自己正迈向亚洲的路途上，骑着一匹白象，覆着头巾，并且持着一本新的《可兰经》，这乃依照我自己的计划所构成……我预计要攻击在印度的英国军队，并且以我的战胜恢复我与古老欧洲的关系……命运却不利于我的梦想。<sup>①</sup>

命运的第一个打击是由一名副官朱诺（Andoche Junot）传递给他的情报，约瑟芬在巴黎有了情人。这位伟大的梦想家，以他极聪明的才能，却疏于考虑到约瑟芬如此热情的一朵花，数月得不到对她的魔力的激赏会是如何艰苦。他忧伤和激怒了若干日子。然后，在1798年7月26日，他寄给他的哥哥约瑟夫一封沮丧的信：

我可能在两个月内再度回到法国……家里有很多令我烦恼的事……你的友情对我非常重要；如果我失去它，并且见到你背弃我，我必将是一个十足的厌世者……

我要你在我回来之时，为我安排妥善一个乡村地方，在勃艮第（Burgundy）或靠近巴黎都好。我想在那里渡过冬天，并且不接见任何人。我厌倦社交，我需要孤独与隔离。我的情感颓丧，并且厌倦于公开的炫耀。年方29，我却已厌烦荣华富贵；它已失去了它的魔力；除了完全的自我主义无任何东西留给我。……

再见，我唯一的朋友……将我的爱给你的妻子与杰

罗姆 (Jérôme)。

他从一名跟随她丈夫到埃及的法国女人处得到一些乐趣。波利娜·富雷斯 (Pauline Fourès) 不能抗拒拿破仑接受她淫佚美丽之乐趣；她回报他的眷顾，当他藉一次任务将富雷斯送回巴黎以为解决途径时，她未做不可克服的抗拒；当这位丈夫了解为着他的名声时，他就回开罗与波利娜离婚。拿破仑也想到离婚，并且愿娶波利娜，生一嗣子的想法自娱；也不考虑约瑟芬的悲哀。波利娜以丰富的礼物得到慰藉，并且度过了不幸的 69 个年头。

朱诺泄露了秘闻后一星期，一个较大的灾难困住了这支胜利的东方军队。拿破仑舰队离开亚历山德里亚，他亲自命令海军中将布吕埃斯 (Francois—Paul Brueys) 为军队卸下全部有用的物质，并且尽速驶往法国控制的科孚 (Corfu)；为避免英国军舰拦截，每一项措施都被采用了。恶劣的气候延迟布吕埃斯的启程；同时将分遣舰队停泊于邻近的阿布刻湾 (Bay of Abukir)。1798 年 7 月 31 日，纳尔逊在那里发现了他们，并且立即予以攻击。双方的军力似乎相等：英国有 14 艘战舰及一艘双桅帆船，法国有 13 艘战舰及 4 艘木造快速帆船。但是法国水手沾染了很难治的思乡病，并且训练不良；英国的水手将海作为他们的第二故乡；现在他们优良的训练，船舶操纵术，与勇气赢得了白天与夜间的胜利，因为这场浴血战争一直持续到 8 月 1 日的黎明。7 月 31 日晚上十点，布吕埃斯的 125 门炮的旗舰爆炸了，几乎炸死所有在舰上的人，包括 45 岁的海军中将自己在内。法国的军舰只有 2 艘逃脱。法国人总共损失：战死的 1750 名，受伤的 1500 名；英国人损失：战死的 218 名，受伤的 672 名 (包括纳尔逊)。这次与特拉法尔加角 1805 年的战役，是拿破仑一世的法国怀疑英国对海洋控制的最后尝试。

当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开罗时，拿破仑了解他对埃及的征服是毫无意义的。他疲惫的冒险，现在却受阻于海路与陆路的法国援



助之影响,并且立即任具有敌意的人民与不适合的环境处置了。在悲伤中他还找到时间安慰他的海军中将的遗孀,这是他们的年轻统帅的荣誉:

你的丈夫在他战舰的甲板上作战时被一颗炮弹杀害,他光荣战死,并无任何痛苦,就像每一位战士都愿牺牲生命一般。

你的悲哀深深的感动着我,当我们离开一位我们所爱的人时,那是一个恐怖的时刻……如果没有活下去的理由,那最好便是一死。但是当你经过仔细考虑,同时将自己的孩子紧抱在胸前时,你的本性会被眼泪与爱意复醒,你要为你的下一代活下去。是的,夫人,你将与他们一同哀悼,你将养育他们于幼稚时期,你将教育他们于成长时期,你将对他们谈及他们的父亲以及你的悲伤,他们的喜爱与这个共和国的忧患。并且经过母亲与子女的共同感情交流,而使你的灵魂再度与这个世界连接时,我要你计算到我的友谊价值,以及我对朋友妻子的关心。你应相信,有人……能转悲伤为希望,因为他们很仔细的探索到内心的苦恼。<sup>②</sup>

灾情加倍增多。法国殖民地几乎每日受到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或者马麦卢克不愿顺从他们新主人而发起的攻击。10月16日,开罗当地的人民掀起暴动,法国人镇压住了,却也损失一些他们的士气;拿破仑暂时放弃扮演和藹征服者的角色,命令将所有武装叛徒斩首。<sup>③</sup>

闻知土耳其正准备一支军队来此拯救埃及,他决定率领他的1.3万人进入叙利亚对抗挑战。他们于1799年2月10日出发,占领阿里什(EArish),并且越过西奈(Sinai)沙漠。拿破仑2月27日

的信描述这次痛苦经验的某些方面：酷热、干燥，“混有盐味的水，经常一点都没有；我们吃狗、猴子、与骆驼”。很高兴，他们在加沙（Gaza），经过一场硬仗，找到繁茂的农业与世上独一无二的水果园。

在雅法（Jaffa），他们受阻于一有围墙的城市，有敌意的居民，以及一个由 2700 名雄赳赳土耳其人守卫的城堡。拿破仑派了一位密使向他们提出条件，这被拒绝了。3 月 7 日，法国的挖壕工兵将城墙挖了一个洞；法国军队冲入，杀死抵抗的居民，并掠夺城市。拿破仑派博阿尔内恢复秩序；他给所有愿投降者一条安全出路，守城堡军队为使此城不遭受更多摧毁，放下他们的武器，使他们成为拿破仑的俘虏。他惊慌地举起双手，“我能利用他们做什么？”他问道。他们在行军中不能带着这 2700 名俘虏；他的部队已尽全力为他们自己找寻食物与饮料。他不能派出一足够人数的卫队将这些土耳其人带至开罗监禁，如他释放他们，将无法阻止他们再攻击法国军队，拿破仑召集部下开会，并且要求他们提出意见。他们决定最好的做法是杀死俘虏。其中的 300 名被赦免；2441 名（包括所有年纪的男女百姓）都被射杀，或节省弹药用刺刀戳死。<sup>⑨</sup>

入侵者向前挺进，3 月 18 日，他们到达严密防守的阿卡（Acre）镇。土耳其人的抵抗部队是由巴夏（Djezzar Pasha）率领，并受助于菲利波（Antoine de Phélippeaux）——他是拿破仑在布里安的同学。法国军队予以围攻，但缺少亚历山德里亚由海路运给他们的大炮；一支史密斯（William Sidney Smith）统率的分遣舰队捕获这些武器，运送他们至城堡，并且在围困期间不断以食物与物质补给驻军。5 月 20 日，在两个月的努力与巨大损失之后，拿破仑命令退却至埃及。“菲利波，”他悲伤道，“在阿卡之前挡住了我。假如不是因为他，我已经掌握往亚洲之钥。我已经继续前进到君士坦丁坦（Constantinople），并且我已收复东罗马帝国（Eastern Empire）。”<sup>⑩</sup>1803 年时，并未预测 1812 年，他告诉雷米萨夫人，“我的

幻想消逝在阿卡。我将永远不让它再妨碍我。”<sup>⑧</sup>

沿着海岸撤退是一连串的恐怖日子，有时在水源之间步行 11 小时，找到几乎是不能喝的水，有损身体并且难以消除口渴。受伤与患有瘟疫者的沉重担子，减缓行军速度。拿破仑要求医生对不治之病人配给致命的鸦片药剂；他们不接受，因而拿破仑收回他的建议。<sup>⑨</sup>他命令所有马匹改为运送伤患，又以徒步行军做为他的军官们的表率。<sup>⑩</sup>6 月 14 日，从阿卡步行 26 天 300 英里路以后，疲乏的军队以胜利者的行列进入开罗，并展示 17 面敌军军旗及 16 名土耳其被俘的军官，以证明远征是光荣的胜利。

7 月 11 日，100 艘船舰在阿布刻（Abukir）放下一支受命将法国军队逐出埃及的土耳其军队，拿破仑以他最优越的军队向北前进，将土耳其人打击的溃不成军（7 月 25 日）以致他们中有许多宁愿冲入海中淹死而不愿面对猛冲的法国骑兵。从史密斯写给他的英国报纸上的报导，拿破仑惊异地知道第二个联合政权迫使法国军队离开德国，并重新占领由阿尔卑斯山到卡拉布里（Calabria），几乎是整个意大利。<sup>⑪</sup>并且从莱茵河与波河到阿布刻与阿卡的一连串的灾难，使他象征胜利的大厦倒塌；现在，处在受辱惨败之中，他发现他自己与他大部份受毁的军队隐藏在一有敌意的死巷中，只要少许时间即可消灭他们。

大约在 7 月中，他接到执政团一项命令，要他在 5 月 26 日，立刻回到巴黎。<sup>⑫</sup>他决意不顾包围的英军并用某种方法回法国；设计了一条夺权的路径；替换做事笨手笨脚，而使他在意大利的所有收获很快化为乌有的领袖们。回到开罗，他即处理军政事务，并任命顽抗的克莱贝尔，统辖埃及梦想的战斗生还者。军队的财库是空了，还有 600 万法郎负债；士兵的薪饷拖欠了 400 万，他们的人数，他们的士气，日渐下降，但他们统帅顽固增加，因而以平静的耐心等待另一反叛机会。土耳其与大布里颠的政府随时可派出一支军队，藉本土的支持，能不多久就可使法国军队无条件投降。拿破仑

完全了解这些,声明他必须留在巴黎,而且奉命回国作为他离去的唯一理由。当他向军队告别(他保证过每一个人在胜利返乡后有六公顷的土地)他誓言,“如果我运气好回到法国,那些胡说的人的统治将为之结束。”<sup>⑧</sup>这句话就从来没有兑现。

两艘快速战舰——缪尔伦号(Muiron)与喀瑞尔号(Carrère)幸存于阿布刻的大毁灭。拿破仑下令他们准备回法国去。1799年8月23日,他与布列纳、贝托莱、及蒙日登上缪尔伦号;将领拉纳、缪拉、德农(Denon),与其他的人跟随在喀瑞尔号上。<sup>⑨</sup>靠着雾与上帝的幸运,他们逃过所有纳尔逊舰队严密的监视与斥埃。他们不能停泊马耳他,因胜利的英国舰队于2月9日攫取那个要塞。10月9日快舰停泊在弗雷瑞斯(Fréjus)外海,拿破仑与他的副官划船到圣拉斐尔(St-Raphaél)上岸。这将决定他是凯撒或是无名小卒的时候。

## 第七节 五人执政团的没落

(公元1797年9月4日—1799年11月9日)

法国军队的胜利——于1795年在巴塞尔降服普鲁士,于1797年在坎波福尔米欧降服奥地利并且于1798年降服那不勒斯与瑞士时达到最高潮——使法国政府软弱并有着东方的懒散。立法机构的两院向五人执政团权威屈服,五位执政承认巴拉斯、鲁贝尔、与来波克斯的领导地位。这些人似乎已采纳罗马教皇莱奥十世(Pope Leo X)传奇的格言:“因为上帝给我们这个职位,让我们享有它。”由于一段时期和平所造福的明显安稳,以及政府职位在大革命时特别不稳定的经验,他们为他们的失势用羽毛覆盖他们巢

窟。1797年7月,当孤立的英国提议和谈时,它被告知这能以支付50万英镑给鲁贝尔与巴拉斯处理之;显然地,为能答应它在该年8月的和平,40万英镑贿款是得自葡萄牙。<sup>⑤</sup>鲁贝尔贪得无厌,巴拉斯需要有弹性的收入以维持塔利安夫人与他的伙伴有好的心境,以及他在卢森堡的华丽大厦中豪华公寓。<sup>⑥</sup>塔列朗虽为外交部长,却很少失去每一利用大革命资助他贵族化嗜好的机会;巴拉斯计算塔列朗一年的小费常常超过10万livres。<sup>⑦</sup>1797年10月,3位美国专员来到巴黎为解决美国船被法国私探船(Privater)虏获的纷争;依照亚当斯总统(Adams, John, 美国第二任总统,1735—1826年)的意思,他们可达成一项协议,即以3200万英国银币付给执政,并将私人贿款五万英镑付给塔列朗。<sup>⑧</sup>

“执政的三位督政”(ruling triumvirate)面临许多难题,以致大多数他们的过失能被宽恕——至少一个夜晚美丽女人微笑的提神。他们紧急征收惯例的税收以避免另一次财政的崩溃,恢复非现存的税收像运输通行税,并且对执照,邮票,窗户与门征收新税。他们以战斗的目标管理一个在实体与灵魂上,在身份与阶级上分裂的国家:贵族与富豪,旺代的天主教徒,雅各宾党的无神论者, Babeuvian 的社会主义者,商人要求自由,人民梦想平等,并且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幸运地,1796年与1798年的丰收缩短等候分发救济的队伍。

1797年,“自由主义者”藉着激进派支助在政治上战胜君主政治的督政。因此在偏激的报复情况下,3位督政检查倾向资产阶级的报纸与戏院,选举舞弊,未先警告即予逮捕,并且重新恢复赫伯特主义反宗教运动。由修女承担的年轻人的教育为之减少,并且委托于凡俗的教师,他们受命将所有超自然的观念排除在他们的教学之外。<sup>⑨</sup>1797—1798年的12个月中,总数1448名教士被逐出法国,8235名被逐出比利时。其中193名教士被放逐于德卡底(Décade)号船上,二年后只有31人活着。<sup>⑩</sup>

内在纷争蔓延,外来危机增加。在比利时、荷兰、与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五人执政团的贪婪使新朋友成为新敌人;税收极高,年轻人抗拒征兵,强迫的公债激怒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从教会夺取金银与艺术品因而疏远教士与人民。三年间五人执政团从这些地方与意大利获取2亿法郎,<sup>⑤</sup>在拿破仑去埃及之后,“五人执政团继续征服政策,或宁愿抢夺,为金钱占领土地,抢劫人民,向当地政府要求赔款,使法国成为咒诅的对象。”<sup>⑥</sup>“法兰西共和国,”君主主义的马莱·杜·汎说道,“正在蚕食欧洲,像吃着朝鲜蓟的头”。它使一些国家发生革命以便它可掠夺他们,并且它掠夺他们以便它可生存。”<sup>⑦</sup>战争变得有利可图,和平将是毁灭的。事先料到这个国家正驶进暴风圈内,塔列朗(1798年7月20日)辞去他的部长职务,隐退并且享受他的战利品。<sup>⑧</sup>

拿破仑给予的激发性实例如何使战争能够获得报偿,并且他草率的行动对于五人执政团衰亡时期降临法国的战争灾难负部份责任。他十分草率与肤浅的使意大利成为法国属地,并且将他的胜利交给一些缺乏他稳定、智慧与外交技巧的僚属。他太过份乐观地认为新意大利共和国愿意支付由奥地利得到自由的代价。他低估英国抵抗法国占据马耳他与埃及的力量。受轻视的土耳其能多久拒绝它古代敌人苏俄与奥地利,邀请他们参与训练这些暴富的革命份子?瓜分的波兰能多久维持苏俄、普鲁士、与奥地利在东方十分忙碌而不能恢复在西方的神圣王权?

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等待机会再度攻击法国。当拿破仑亲自率领3.5万名最优秀法国军队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了它;当那支军队被纳尔逊在阿布刻的胜利予以安全禁锢时,他们获取它。沙皇保罗一世(Czar Paul I)接受被选为马耳他骑士团(Knights of Malta)的大师,并且他自己誓言将法国人逐出关键性的岛屿。他援助斐迪南四世(Ferdinand IV),以重新占领那不勒斯。他梦想为苏俄在那不勒斯、马耳他、与亚历山德里亚找到有利的港口,因而使

苏俄成为地中海的强国。1798年12月29日,他与英国签署一项联盟。当弗兰西斯二世让一支苏俄军队自由的通过奥国的领土进向莱茵河,法国(1799年3月12日)对奥地利宣战。奥地利因此加入苏俄、土耳其、那不勒斯,与英国的第二联盟反抗法国。

五人执政团的弱点暴露在它激起与可预见的战争中。它缓于准备,战争财源缺乏,并且征兵制笨拙。它征召20万人,却发现他们之中仅14.3万人适合服役;他们中仅9.7万人服从征召;在途中有成千人逃亡,以致只有7.4万人到达他们被分配的团,在那里他们发现杂乱无章并缺乏服装、装备、与武器。曾经使共和国军队有活力的热诚已从那些经历若干年国家的无法治与幻想的人身上消失。公共安全委员会计划与进行的1793年战争的无情决定与方法,失去了在1798年领导法国的五人执政团。

当时有一些初步与虚假的胜利。皮德蒙特与托斯卡纳被征服、占领、与抽税。斐迪南四世的胜仗迫使法国军队离开罗马,却为尚皮奥内(Jean-Étienne Championnet)统率的法国军队于12月15日进入罗马所阻止。斐迪南与他的朝臣,以及哈密尔顿(Hamilton)夫人与2000万金币(ducat),在纳尔逊舰队的保护下,退却至巴勒莫(Palermo),并且以法国的保护关系建立巴萨诺比恩共和国(Parthenopean Republic)。当战争继续进行,新的团加入苏俄—奥地利—英国军队,法国军队自知在人数上以32万比17万而屈于劣势。法国将领,虽有杰出的马塞纳在瑞士的军事行动,缺少拿破仑的能力优越的战略、战术、与训练。茹尔当战败于施托卡赫(Stockach)(1799年3月25日),退却到斯特拉斯堡,然后辞职。谢雷(Schéerer)败于马格那诺(Magnano)(4月5日),无秩序的退却,几乎丧失他整个军队,并且将他的统率权移交给莫罗。继之一位十足“残酷的人,”苏沃罗夫(Aleksandr Suvorov),带了1.8万名俄军来到,并且率领他们与一些奥地利的师在猛烈的战役中逐一夺取法军在1796—1797年拿破仑赢得的地方;4月27

日，他胜利地进入米兰。莫罗败至热那亚；拿破仑在阿尔卑斯山南面的共和国即将结束。危险地将他少数军队单独留在瑞士马塞纳（Masséna），放弃他在那里略取的土地，退却至莱茵河。

十分容易地将伦巴底归还奥地利，苏韦罗夫由米兰进军迎战来自那不勒斯与罗马的法军；在特雷比亚（Trebbia, 1799年6月17—19日）他击溃了它以致仅剩破碎残部到达热那亚。巴萨诺比恩共和国即将结束；斐迪南恢复他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王位，又建立恐怖时代，成百的民主主义者因而被处死。儒贝尔（Joubert）统率所有在意大利幸存的法国军队，领导他们攻击在诺维（Novi）的苏韦罗夫的军队（8月15）；他卤莽的暴露他自己，因而在战斗一开始时就被射死，法国军队勇敢作战，但是无效；他们之中1.2万人伤亡在战场上；法国，得知达到大灾祸顶点，了解它的难以攻破的前线即将粉碎，并且苏韦罗夫的苏俄军队很快踏上法国领土。当残酷的斯拉夫人涌入法国的城市与乡村时，阿尔萨斯与普罗旺斯的人民，想像他与他的军队如“巨大的野蛮人。”

这个国家，不久前很骄傲它的力量与胜利，现今处于一个混乱状态，并且害怕1792年导致9月大屠杀的骚乱。旺代再度处于暴动状态；比利时反对它的法国君主；法国86个县中有45个的政府与民心接近完全崩溃的程度。武装的年轻人攻击派往征召他们的官员；市府官员与租税征收人被谋杀；成百的盗匪在城市街道与乡村路上恐吓商人与旅客；罪犯击倒了骑兵，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并且增加他们的地位；每一社会阶层，大修道院，家庭都遭到抢劫；1794年的“大恐怖”再度重演。这国家满怀希望的期待由它派往巴黎人得到保护；但是两院已屈让五人执政团，五人执政团似乎只是一次篡夺的寡头政治，其以贿赂、诡计、与武力统治。

1799年5月，曾为修道院长的西哀士——他在10年以前，提出“什么是第三阶级？”因而闪烁出大革命的火光，并且回答它是，而且应称自己为，国家——得自他的谨慎费解的话，并且被选入五



人执政团；因为，就一位宪法的创造者，他被视为相同于法律与秩序。他同意服务，如果鲁贝尔愿意辞职；鲁贝尔辞职得到10万法郎抚慰的遣散费。<sup>⑥</sup>6月18日在立法的两院中雅各宾党人有势力的少数派迫使督政来波克斯特雷亚尔，与梅兰（Merlin）将他们的职位让给戈耶（Louis - Jérôme Gohier），穆兰（Jean - François Moulin），与迪科（Roger Ducos）。富歇成为警察部长，兰代成为财政部部长；二位的恢复任用得自公共安全委员会。在巴黎的雅各宾会社再度开放，并且听到赞美罗伯斯比尔与巴贝夫的言论。<sup>⑦</sup>

6月28日，立法机构在雅各宾党人的影响下，向高于中等收入者征收30%~70%税收形式的义务公债。商业兴隆的市民雇用律师找到法律漏洞，并且友善地听从推翻政府的图谋。7月12日，雅各宾党人获得“人质条例”（Law of Hostage）的通过：法国每一地方行政区受命列出一张与被放逐贵族有关连本地人民的名单，并且监视他们；每犯一件盗案这些人质将被罚款；每一“爱国志士”（任一忠于现存政权者）谋杀案的四名人质将被驱逐出境。这个法令适合于来自较高阶层的恐怖的要求，并未得到人民补偿的欢迎。

经过10年的骚动，争斗，对外战争，政治颠覆，非法判决，暴君掠夺，斩首刑，与大屠杀，几乎整个法国厌恶大革命，那些悲伤地回忆路易十六“美好往日”的人觉得只有一位国王能使法国恢复法治与公正。那些珍爱天主教的基督教义的人，祈求他们将有脱离无神论者统治的时机。甚至一些摆脱所有超自然信仰的有学位的宗教怀疑者重新疑虑不为宗教信仰支持的道德礼仪是否能抵挡住源于几世纪不安全、搜索、与野蛮之无拘束的热情与反社会制度的冲动，许多信教的父母送他们的子女到教堂，祈祷，忏悔，行第一圣餐礼（First Communion）做为谦虚，家庭规律，与心理平静之有希望的来源。农民与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者感激大革命给予他们土地，并且想保有他们，憎恨政府经常对他们的作物征收税收或征召他们的子女。城市的工人激烈的要求面包甚至严重过于巴士底狱陷

落之前；他们看到商人、制造业者、投机商、政客、督政生活奢侈；他们开始认为大革命只是用资产阶级取代贵族成为国家的主人与投机者。但是他们资产阶级的主人也是不满意。不安全与荒废的道路使得旅行与商业为之艰苦与危险；义务公债与高税收妨碍投资与从事企业；在里昂 1500 家商店中 1300 家因无利可得而关门，增加成千失业的男女。阿夫尔（Le Havre）、波尔多，与马赛被战争与来自英国的封锁破坏。逐渐萎缩的少数派仍谈论自由，难以与大革命结合。大革命毁灭很多的自由，通过很多恐怖的法律，并且送很多男女进入监狱或上断头台。女人除了怀孕的妻子，情妇，老年人的女儿与新近富有者之外，焦虑地由一购物行列移至另一个，想知道是否商品存货将耗尽，她们的儿子、兄弟、或丈夫将从战地回来；战争将结束。惯于暴力、偷窃、与憎恨的战士，受苦于战败以及补给品的粗劣与短少，被他们的领导，或供养或供给衣着的人所不断显露的腐败变为乖戾；当他们回到家或巴黎后他们发现在社会、商业、工业、财政、与政府中有相同的不诚实；为什么他们让他们自己为如此暗晦的梦想而丧失生命？当大革命继续进行时，灿烂新世界的幻想变为模糊而且消失。

有些人暂时受着新闻的鼓舞：协约国的失和与分裂以及挫败于瑞士与荷兰；马塞纳再度采取攻势，在苏黎世（Zurich）将俄军截为两断（1799 年 8 月 26 日），可怕的斯拉夫人退却，而且苏俄舍弃联盟。法国人想知道一些能干将领像马塞纳、莫罗、贝纳多特，或者最优秀的拿破仑安全从埃及返回后，是否愿意率领一营军队进入巴黎，排斥政客甚至牺牲自由吗？以求得法国法治与安全，多数法国人得到的结论是只有一个在权威领袖领导下中央集权政府始能终止革命的混乱，并且给予这个国家法治与安全的文明生活。

## 第八节 拿破仑之崛起

〔法国革命历 1799 年 2 月 18 日(11 月 9 日)〕

西哀士同意了。仔细察阅与他同事的执政后,他看出他们之中无一人——即使狡猾的巴拉斯——有他那种能使法国明达与统一的智慧、观察力、与意志的结合。他有一个宪法构想,但是在它诞生时,他需要一位将领辅佐他。他想到儒贝尔,但儒贝尔现已去世。他延请莫罗,并且几乎相信他将是“在马背上的人”;但是当得知拿破仑正由埃及返回,莫罗告诉西哀士:“那是你要的人;他将比我有功有益于你的武力夺取政权。”<sup>①</sup>西哀士沉思;拿破仑可能是个人才,但是他愿接受西哀士并充当他新宪法的指导者吗?

10 月 13 日执政团通知两院拿破仑在弗雷瑞斯附近登岸;代表们热烈欢迎。有三昼夜,巴黎人民在酒店饮酒并且在街上唱歌庆祝这项消息。从海岸到首都路上的每一城镇的人民与主人都出来迎接这位人物,他似乎是他们胜利的象征与保证;他们尚未得知在埃及的惨败。在几个中心点,《普及报》(Moniteur)报导,“群众竟使商业几乎不能进行。”<sup>②</sup>在里昂上演一场戏剧表示对他敬意,并且一位拥护者告诉他,“去与敌人作战,击败他,并将使你成为皇帝。”<sup>③</sup>但是,这位年轻的将领,沉默而忧伤,正思考应如何对付约瑟芬。

当他抵达巴黎(10 月 16 日),他直接到了他购置的住所,街道已被改名为胜利女神路以表示对他致敬。在那里他希望找到他漂泊的妻子,并从他的生命中摒除她。她不在那里,其因有二:第一,1799 年 4 月 21 日,当他围攻阿卡时,她购置了 300 英亩的地产

——Malmaison,从巴黎顺塞纳河向下大约十英里。巴拉斯为她垫付5万法郎作为30万法郎费用的最初付款;并且查理士是她宽敞别墅的第一位来宾。<sup>⑧</sup>第二,她与她的女儿4日前离开巴黎,希望在驶向里昂途中遇见拿破仑。当约瑟芬与博阿尔纳发现拿破仑选择另一路线,她们折返,虽然实在厌倦了旅行,却折回200英里到达首都。在其时她年老的博阿尔内侯爵(Marquis de Beauharnais),找到拿破仑并为她辩护:“任何她的错误,忘却他们;不得为我的一头白发,以及持有你名誉的家庭铸造不名誉。”<sup>⑨</sup>拿破仑的兄弟力劝他与他的妻子离婚,因为他的家庭憎恨她的权力高于他;但是巴拉斯提醒他公开的丑闻将损伤他的政治生涯。

当疲乏母亲与女儿到达胜利女神路(10月18),博阿尔纳在楼梯顶端走廊遇见他们,并且警告他们将要有一场风暴。准许他照料他的妹妹之后,约瑟芬爬上楼梯并且敲拿破仑房间的门。他回答他决意不再见她。她沮丧于楼梯上哭泣一直到博阿尔内与博阿尔纳使她振作,并且允许她再作一次联合的恳求。拿破仑随后讲到:“我问我自己,他们应当成为他们母亲过失的牺牲者吗?我伸手,抓住博阿尔内的手臂并拉至我身边。然后是博阿尔纳……与她的母亲……在那里还能说些什么呢?一个不继承人类弱点的人不能成为人类。”<sup>⑩</sup>

在那些忧愁笼罩的日子,他不接触公开场合;他知道一位政府官员必然不得过份公开。在家与外出他穿着平民的服装,阻止关于军队正策划攫取政府的谣言。他做了两次访问:一次到欧特伊(Auteuil)拜谒80岁的爱尔维修(Helvétius 法国哲学家,1715—1771年)夫人表示敬意,一次到军事学院。在那里他谈到远征埃及主要是为科学兴趣;贝托莱与蒙日支持他;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卡巴尼斯(Cabanis)与许多其他的人当他为一位科学家与一位哲学家听从他。<sup>⑪</sup>在这集会上,他遇见西宸士,并且获得他一句短评:“我们没有政府因我们没有宪法,或至少不是我们需要的;你的天

才必可给我们一个。”<sup>⑧</sup>

不久他的家变成秘密磋商的中心。他接见左派与右派的访客，他答应支持共和国并且卫护民众利益；而且，他随即坦白的宣布，“我收留波旁皇族的工作人员。”<sup>⑨</sup>但是，他让他自己与任何派系隔离，特别与军队。贝纳多特将军，有意领导政府，忠告他停止政治活动并且满足另一军事统率权。拿破仑比较满意于听从平民像西哀士的建议，接管政府并创造新宪法。这可能需要滥用或违犯一或两条法律；但是长老院，受到雅各宾党人再度的警告，将假装没有看见这小的非法行为；并且五百人院，不顾及它有力的雅各宾党少数派，选举吕西安为它的主席。五位督政中，西哀士与迪科保证他们自己属于拿破仑；塔列朗担任说服巴拉斯让他获取金钱与胜利后隐退；戈耶，五人执政团的主席，几乎爱上约瑟芬，却能不动心于她的微笑。<sup>⑩</sup>可能一些银行家已给予赞助的法朗之保证。<sup>⑪</sup>

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个谣言传遍整个巴黎，雅各宾党人正准备一项民众暴动。斯塔埃尔夫人认为这个报导严重的足够准备迅速的退路，如果这暴动会发生的话。<sup>⑫</sup>11月9日（此后著名的法国革命历2月18日）长老院，使用它的宪法权力，命令它自己与五百人院，将他们的会议于次日改在圣克劳德郊区的皇宫召开。为伸展它的宪法权力，它任命拿破仑统率巴黎卫戍部队，并且他立刻前往在图勒里宫的长老院宣誓就职。他到了那里，被60名官员护卫着，并让他自己的誓辞十分的笼统，以允许他稍后所说的话有些伸缩的余地：“我们需要国家建立于自由、平等、与国家象征的神圣原则。我们将获有它，我发誓！”<sup>⑬</sup>

从会堂走出后，他告诉聚集的部队，“军队再与我结合，并且我再与勒吉斯拉（Législatif）的兵团结合。”此时，波图特（Bottot），巴拉斯的一位秘书，从一度有权力的督政带给拿破仑一个口信，要求给予离开巴黎的安全通行证。在一个他希望兵士与民众愿听取的声明中，拿破仑予以严厉责备，那几乎是五人执政团的死刑判决，

因而击溃可怜的波图特：“对于这个法国，我将它的整个荣耀委托于你，然而什么是你做的？我留给你和平，我却得到战争；我让你胜利，我却得到溃败！我由意大利交给你百万金钱，我得到各处的掠夺与穷困。至于我光荣战役中熟识的十几万法国人，你是如何处置的？他们是如死人一般。”

拿破仑的听众不知道他的台词有些得自格勒诺布尔一位雅各宾党人；他们探寻到他们的意义，并且长久的珍藏于他们的记忆中做为紧接而来政变的理由。接着，害怕他的话会增加巴拉斯的敌对，他将波图特拉到一边并且向他保证他对督政的个人观点保持不变。<sup>④</sup>他骑上他的马，检阅军队，并且回到约瑟芬处，她对他成功地为一演说家十分惊喜。

11月10日勒菲弗将军率领五百名巴黎卫戍部队至圣克劳德，并将他们安置在皇宫附近。拿破仑以及他的亲信跟随着；他们之后出现了西哀士、迪科、塔列朗、布列纳。他们监视在战神陈列馆（Gallery of Mars）集会的长老院，与在奥兰治里邻近（Orangerie）的五百人院。当吕西安命五百人院守秩序，他即刻遭到之抗议皇宫附近出现士兵；他们大声叫喊“反对独裁政府！打倒独裁者！在此我们是自由人民；刺刀威胁不了我们！”一项动议被提出，要求每一位代表走到演讲台，并且高声的重复他维护宪法的誓言。它是如此命令的，并且投票从容地进行一直到下午4点。

长老院也消磨他们时间，乃基于它必须等待五百人院提出建议。拿破仑在附近一个房间中忧愁烦躁着；如果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不能被立刻采取，他的理想将失去。他与贝尔蒂尔与布列纳共同往长老院的演讲坛，并且鼓动这些老人行动。但是他，在宣布文告时是非常的动人，在谈话时是非常的果断，在感情与思想上却是过份抑制幽闭以致未对立法机构作一有条理的演讲。他说话粗率、激动、几乎不连贯：

你们在火山上！……让我以一个军人的自由说些话……当你们请求我担任你们的统帅时我是安宁的在巴黎……我集合我的同志；我们飞奔援救你们……人民的诽谤淹没了我；他们谈论凯撒，克伦威尔（Cromwell），或军事政府……此事非常着急；那是很紧要，因此你们得采取迅速的措施……共和国已无政府，只有长老院。让它采取措施，让它发言；我将是你们行动的力量。让我们保全自由！让我们保全平等！<sup>⑩</sup>

一位代表打断他的演说：“还有宪法呢？”拿破仑激怒的回答道，“宪法？你们自己已毁灭了它；共和历12月18日你们违反了它；共和历8月22日你们违反了它，共和历9月30日你们违反了它。它不再握有任何人的尊敬。”当被要求提名涉嫌雅各宾党人阴谋幕后人物时，他提及巴拉斯与穆兰；要求证据时，他言语支吾，除了求助于站在门口的士兵并不能想到任何令人信服之事：“你们，我的勇敢同志，伴随着我，勇敢的榴弹兵，……如果任何一位外国人带来的演说者，胆敢宣称不受法律保护（Hors la Loi），让战争的闪电立刻击倒他。”<sup>⑪</sup>质问与反对压倒这位演说者；他的话变得更加混乱；他的副官出现援救他，并护送他离开议事厅。<sup>⑫</sup>他似乎已破坏他的计划。

他决意再度尝试，并且这次将直接对付敌人——雅各宾党人——使五百人院变色。在4名榴弹兵护卫之下，他前进至奥兰治里（Orangerie）。代表们愤怒于军事炫耀，大厅充满着呼喊“卑鄙的独裁者！卑鄙的暴君！使他受不到法律保护！”；这是使得罗伯斯比尔失势与死亡的呼喊。一项动议宣布拿破仑失去法律保护；主持会议的吕西安，拒绝将它提出表决；将五百人院的席拉托付给一位朋友，他登上讲坛，并发言为他哥哥辩护。激动的代表们包围拿破仑。“是否因如此使你赢得你的胜利？”一位代表问道；其他非常紧紧的

压迫着他以致他几乎晕厥；榴弹兵闯入，靠近他并且引导他出了大厅。户外使他清醒，他骑上一匹马并向军队求助，他们为他扯裂的衣服与蓬乱的头发惊愕的呆立着。“士兵们，我可指望你们吗？”他问道。“是的，”有许多说道，但是其他的犹疑着。拿破仑再度迷惑；他远大的计划似乎再次被粉碎。

他获得他哥哥的援救。吕西安，从奥兰治里急速赶至，跳上最近旁的马匹，骑乘到拿破仑的身边，并以权威、雄辩的口才，与重要而使人心服的真理向混乱的士兵演说：

我为五百人院主席，我向你们宣布此院的多数党此刻受到一些短剑武装代表的恐吓，他们包围讲坛并威胁他们同事的性命……我宣布这些无耻的盗贼，无疑为英国雇用，已反叛长老院，并且要让负责执行长老院法令的将领不受法律保护……我将拯救多数党不受他们代表恐吓的责任托付给战士。将领、士兵、老百姓，你们必须认识只有那些前未帮助我的才是法国制定法律者。至于那些坚持留在奥兰治里的，让暴力驱散他们。⑩

吕西安紧握一把剑，对着拿破仑的胸膛，并且发誓如他的哥哥要是侵犯法国人民的自由，他将亲手杀死他。

因此拿破仑下令鼓手击鼓，军队进攻奥兰治里并且驱散不服从的代表。马拉与勒菲弗引路，高喊着，榴弹兵跟随在后，“好啊！打倒雅各宾党！打倒1793年！这是鲁比肯河的通道！”当代表们看见步兵向他们进攻，大多数逃走，有些从窗子跳出；少数围绕着吕西安。那位胜利的征服者有礼地行进至长老院，并向他们解释五百人院已遭到整肃。长老院，得庆幸存，通过一项法令以三位“临时执政”（Prorisional Consuls）替换五人执政团。五百人院中大约有拿破仑、西哀士、与迪科等一百位代表组成第二议院。两院自那时休



会至 1800 年 2 月 20 日,并且让临时执政写新宪法和统治法国。  
“明天,”拿破仑对布列纳说道,“我们将睡在卢森堡。”<sup>⑧</sup>

## 第六章 大革命下的人生

(公元 1789—1799 年)

### 第一节 新的阶段

在此我们停止时光的飞驰，并且注视民众受难的浓缩历史。从凯撒渡过鲁比肯河至奥古斯都（Augustus）即位的 20 年期间（公元前 49—29 年），与巴士底监狱陷落至拿破仑最后逊位的 26 年期间（1789—1815 年）是比较不骚动及改塑期——的几世纪中一样充满着难忘的事件。虽然，处于政府的惊恐，人物的变迁，与天才擢升情况下，文明的要素与优美持续着：粮食与财货的生产与分配，知识的寻求与传播，品格与才能的训练，情感的交流，辛劳的减轻，以及竞争于艺术、书信、慈善、游戏、歌唱；幻想、信仰、与希望的变质。除了这政府与英雄外表上动摇是偶发与短暂之梦想的轮廓外，这些的确不是现实以及历史的连续吗？

1. 农民。他们之中有许多，在 1789 年仍然是按件计酬的散工或佃户，工作于他人土地上；但是到 1793 年前农民拥有一半的法国土地，他们之中大多数以便宜价格从没收的教会财产购取他们的耕地；并且除少数农民外全部获得封建税的免除。所有权的激励

使劳工从贱役的收入转变为有能力奉献,不断增加盈余,因此建立了家庭、教会、与学校的——如果能取悦或欺骗税务员就更好了。并且税收可以信用券——政府的纸币——面值支付,同时产品能被出售换取信用券——乘以100等于他们的票面价值。法国土地从未被如此勤勉与有效的耕种过。

在现今无社会阶级的社会最大阶级的解除束缚是大革命最显明与最持久的影响。这些不屈的供给者成为大革命最强大的防御者,因为大革命给予他们土地,那是波旁皇族复兴后可能夺取的。为着同样理由他们支持拿破仑,并在15年间奉献半数他们的儿子。作为财产所有者,他们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联合,并且在整个19世纪期间,在国家不断的剧动时,成为保守派政治稳定之物。

国民公会为要求权利平等而于1793年废除长子继承权,并且规定财产必须设有遗嘱并以均等比例分配给遗嘱人的儿女,包括那些私生但为父亲承认的。这项立法在法律与经济上有重要效果:法国人民不愿定期的分配世袭财产给许多子女而使他们的继承人变为贫穷,因此培养受家庭环境限制的古老作风。农业仍然是兴旺的,但是法国人口在19世纪期间增加缓慢——从1800年的2800万增至1914年的3900万,而德国人口从2100万增至6700万。<sup>①</sup>农业兴隆后,法国农民迟缓移向都市与工厂;因此法国继续维持卓越的农业,而英国与德国趋于工业与科技的发展,善于战争,并且掌握整个欧洲。

2. 劳动阶级在无土地的农民、矿工,与城市的工人及商人中,是最贫穷的。人们挖掘土地寻求工业与战争所必需的金属与矿物;硝石是火药必需的,并且煤炭逐渐取代木材成为发电机的动力。城镇是白天光明生动,晚上则黑暗柔和,一直到1793年,巴黎公社才在巴黎装设路灯。工匠在他们点蜡烛的工厂中工作;商人在市场中心的公开市场,在山顶巅的堡垒与教堂附近,或在市郊的,两家代理店销售他们的产品。公会被废除于1791年,并且国民公会宣布

此后每一个人可以“自由经营某种事业，履行某种由他意愿选择的职务、艺术、或交易。”<sup>②</sup>“教堂条例”（Law of le Chapel）禁止工人采取联合一致的经济行动（1791年）；此禁令持续生效至1884年。罢工被禁止却经常在各地发生。<sup>③</sup>工人努力让他们的工资不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一般来说，他们维持他们工资与物价作同比例的上升。<sup>④</sup>罗伯斯比尔失势后，雇主增加对他们的控制，因而劳动阶级的情况为之更差。1795年之前无裤党人是贫穷而窘困如同大革命以前的情况。他们对大革命失去信心，并且在1800年时他们满怀希望的向拿破仑的独裁屈服。

3. 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中获得胜利，因为它的金钱与智力超过贵族阶级或平民。它购买政府所没收教会的财产中最获利的部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是冻结在不可移动的土地；它是可被移转的，一地到另一地，一目的到另一目的，一人到另一人，与任何一人到任一立法者。资产阶级能够支付金钱给军队与政府以及暴动的民众，它获得政府的行政经验；并且它利用贷款影响财政部。它实际上受的教育超过贵族或教士，并且更适于统治一个金钱是循环血液的社会。它认为贫穷是愚钝的惩罚，并以它自己作为勤奋与智慧的公正报偿。它藉无裤党力量视政府不重要；它将劳动阶级的暴动当做不可忍受的错误，公然地抨击政府的挫折，这是可决定的在革命狂热与骚动平息之后，资产阶级将是政府的控制者。

在法国，那是一个商业而非工业的资产阶级。在那里并未以畜牧业取代农场；英国则迫使农民离开他们的田地到城镇为工厂造成便宜的劳动力；并且英国的封锁对于可用为支持法国工业发展之输出贸易是一项打击。因此工厂制度在法国发展较英国的缓慢。在巴黎、里昂、里尔、图卢兹（Toulouse）有真正资本主义的组织，但是大多数法国的工业仍然是在手工艺与小工厂阶段，甚至资本家将许多手工艺品委托乡村或其他的家庭。除了战时独裁主义的扰乱，以及一些雅各宾党人与社会主义的挑逗，大革命政府用自由企

业的重农主义理论作为最刺激与有生产力的经济制度。1795年与普鲁士以及1795年与奥地利订定的和约免除经济上的束缚,并且法国的资本主义如同英国与法国的,在最少政府支配的保护下进入19世纪。

4. 贵族政治失去所有在经济或政府方面的权势。大多数它的份子,仍是移民,在国外靠着屈辱的职业过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他们的收入中止。留下或回国的贵族中有许多被斩首,一些参加大革命,其余的,一直到1794年,仍躲藏在危险的黑暗处,并且他们的财产不断受到侵占与骚扰。在五人执政团统治下这些无能为之减少;许多民众私下表示,只有受到有能力的贵族政治的支持与牵制,法治与安全始能归还法国人。拿破仑赞同他们,但依照他自己的方式,并在他自己时间内。

5. 宗教。在法国大革命接近它尽头时,宗教渐渐可在无政府支持下生存。新教徒,占那时人口的5%,是无一般民众的缺点;1791年的宪法完成路易十六在1787年赋予他们有限度崇拜上帝的自由。1791年9月28日的一项法令,赋予法国的犹太人所有的公民权利,并与其他所有公民同享法律上平等。

天主教的教士,从前的第一阶级,现在受苦于伏尔泰学派之反教士的政府的敌对。较高阶级失去对教会的教义之信仰,中等阶级获得大多数它土地的财富;1793年前教会的财富,曾估价为20.5亿法郎,<sup>⑥</sup>被出售给它的敌人。在意大利,罗马教皇(Papacy),它的地位与他们财富已被剥夺,并且庇护六世成为囚犯。成千的法国教士逃到其他国家,并且他们中有许多靠着新教徒施舍过活。<sup>⑦</sup>成百的教堂被关闭,或者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教堂的钟已沉寂或被溶化。伏尔泰与狄德罗,爱尔维修与奥尔巴克明显的赢取他们反教会的战争。

这场胜利是不明朗。教会失去它的财富与政治势力,但是它生命的根源留存在教士的忠贞与人民的需要与希望上。在大城市中

许多男人失去信仰，但是在圣诞节与复活节那天几乎所有的人全变成经常上教堂做礼拜的人；并且在大革命顶点（1793年5月），当一位教士沿着巴黎街道上喊着奉为神圣的圣体时，所有的旁观者（一位目击者报导）——“男人、女人、小孩跪着崇拜。”<sup>⑦</sup>即使怀疑基督教真理的人都感受到这仪式的引人入胜与故事的永远美丽；并且他们可能深思帕斯卡尔（Pascal-Blaise）的“赌注”（Wager）——一个人将懂得信仰宗教，因为宗教信仰者最后将不失去一切，反之，无宗教信仰者将失去一切。

在五人执政团期间，法国内部的分裂发生于缓慢恢复传统信仰的人民与决定以法律及教育建立的纯粹世俗文明的政府之间。1798年10月8日，肃清过的新的激进派五人执政团将以下的指示发给所有县立学校的教师：

你们必须将所有与任一宗教或任何教派关连的教义或礼仪排除于你们的教学之外。宪法一定宽容他们，但是教导他们并不是，也永远不是公共教育的一部份。宪法建立在人类全体的道德基础上，并且这个道德是适于各时、各处、与各宗教——这法律被刻在人类住所的匾额上——它必须是你们教学的精华，你们教导的目标，与你们学问连结之链环，如同它是社会有束缚力的结节。<sup>⑧</sup>

此处，很明显的，在与宗教信仰无关的道德制度上建立社会秩序，是大革命最艰难的计划，如同属于我们这个时期的一个难题。拿破仑谴责此不能实行的建议；美国固守着它一直到我们这个时期。

6. 教育。政府从教会获得对学校的控制，并且努力使他们成为智慧、道德、与爱国心的培养所。1792年4月21日，公共教育的负责人孔多塞，向立法会议提出一份历史性报告请求重整教育，以

便“欧洲 18 世纪之启蒙运动所增加的进步对于我们需要的援助，我们疾病的救药，并且对个人幸福与公共繁荣方法打开一无穷尽的来源。”<sup>⑧</sup>战争延迟这理想的实施，但是在 1793 年 5 月 4 日，孔多塞从一较窄狭的观点更新这个请求。“国家”，他说到，“有义务抚养它的子女；它不能将此责任托付家庭的自傲或个人的成见……教育（应该是）普遍的并且平等的及于所有的法国人民……我们表示出它的伟大特性，类似于我们政府的特征与我们共和国最高的原则。”<sup>⑨</sup>这个规划似乎将思想灌注的形式以另一种取代——国家主义的而非天主教的；国家主义将是公认的信仰。1793 年 10 月 28 日，国民公会规定教士不能被指派为公立学校的教师。12 月 19 日它宣布所有的小学是免费的，并且所有的男孩被迫参加，女孩将从他们的母亲，或从修道院或家庭教师得到教育。

中学的改组必须等待到和平；即使如此，1794 年 2 月 25 日，国民公会开始设立那些将成为县立学校，或高级中学的“中央高级工业学校”（Écoles Centrales）。专门学校开放给矿场，公共工程；天文学，艺术与工艺；并在 1794 年 9 月 28 日，巴黎工艺学校开始它有声誉的发展。法国军事学校，如同老保守派份子的收容所，被关闭于 1793 年 8 月 8 日，但在 1795 年 10 月 25 日，国民公会为激励与管制所有的科学与艺术而设立研究各种专门学术的法国国立军校（Institut National de France）。此处的科学家与学者仍维持启蒙运动之理智与传统，并且对拿破仑侵入埃及给予最深远的意义。

7. “第四阶级”——新闻工作者与新闻界——在这沸腾的若干年对法国精神与情绪的影响是甚于学校能产生的。巴黎的人民——与少数的法国人——每日贪婪的吞食白报纸。喜爱讽刺的报纸成功于刺伤政客及学者，因而博得民众之欢喜。在人权宣言方面，大革命保证自己维护出版的自由；它藉着控制立宪与国民会议（1789—1791 年）予以达成。但是当党派之倾轧之热高升，每一党派以限制它敌人的出版表明它的胜利；实际上出版的自由在皇帝

被处死刑时 1793 年 1 月 21 日)同时埋葬。3 月 18 日国民公会对“任何人将策划土地地区分法(agrarian law),或破坏土地、商业、或工业财产法律”判予死刑;并且在 3 月 29 日,得胜的弑逆者说服国民公会对“任何人其著作或印刷的作品被判定将可能激起……王权的再建,或任何其他伤及人民主权的力量”判予死刑。<sup>⑩</sup>罗伯斯比尔久已维护出版自由,但是在送赫伯特、丹东、与德穆兰上断头台之后他结束曾支持过他们的杂志。大恐怖期间,甚至在国民公会时候,所有的言论自由消失。五人执政团在 1790 年恢复出版的自由,但是一年之后,在共和历 12 月 18 日的政变,与驱逐 42 家杂志的编辑之后废止了它。<sup>⑪</sup>言论与出版的自由并未被拿破仑摧毁,但在他得权后遭到禁止。<sup>⑫</sup>

## 第二节 新道德

### (一)道德与法律

舍弃道德的宗教基础——敬爱与恐惧一位警觉、记录善恶、奖赏、与惩罚人的上帝,并且服从属于他的法律与圣训——得救的法国人民发现他们自己没有保护,因而只有用他们已放弃的教条之伦理反响,对抗那些由于中古世纪的饥饿、贪婪、不安全、斗争根深蒂固在他们身上之最老、最强、最个人主义的本性。他们把基督教的伦理托付于他们的妻子与儿女,并且在畏惧暴力的动乱社会中寻求可作为道德铁锚的新观念。他们希望发现此于公德心(civisme),从接受属于有组织及有保护的社会之义务与特权的意



义上来说的公民职责与权利；在每一道德选择上，个人为偿付保护与许多社会的劳务，必须认识社会的完善是占最重要地位的法律——人民利益至上(*salus populi suprema lex*)。建立天赋的个人道德的规范是宏大的计划。溯及整个基督教的世纪，哲学家的代表——米兰博、孔多塞、罗伯斯比尔、韦尼奥、罗兰、圣朱斯特在正统派的历史或传说中发掘他们寻找的典型：李奥尼大(Leonidas)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布吕蒂斯、加图、与西庇阿(Scipio)；因此，视爱国为至上职责的人可能为国家的利益而正义的杀死他的儿女或者他的父母。

大革命的第一回合适当而顺利地经历新道德。第二回合开始于1792年8月10日：巴黎民众废除路易十六，并掌握无责任感的专制主义权力。在旧政体下，一些受到哲学家与圣者鼓吹的贵族社会的体面与人道主义的特性，减少人类相互掠夺与攻击的天赋癖性；但现在接着的是，阴惨的行列，9月大屠杀，皇帝与皇后的死刑，以及恐怖时代与所有断头台牺牲之延伸，罗兰夫人描述为“各各他(Golgotha，在耶路撒冷附近，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地)的巨大屠杀。”<sup>⑩</sup>大革命的领袖成为战争的投机者，并且使解除束缚地区慷慨地支付人权的代价；法国军队被吩咐依靠战领区过活；被解除束缚者或战败者的艺术珍宝归属于得胜的法国。此外，立法者与军官私通补给者以欺骗政府与军队。在放任主义的经济中，生产者、分配者、与消费者彼此竞相诈取，或规避最大可接受的价格与工资。这些或类似恶劣行为当然早在大革命前几千年已存在；但是在对他们控制的尝试中，新道德实行下的“公德心”似乎是对神恐惧一样毫无助益。

在大革命增加生命不安全与社会秩序不稳之时，民众表现他们的不安于犯罪，并且在赌博中寻求乐趣。决斗继续着，但比以前较不频繁。1791年与1792年曾宣布禁止赌博，但是秘密的赌场加倍，并且在1794年前巴黎已有赌场3000家。<sup>⑪</sup>五人执政团期间，富

裕的上流社会人士下注金额庞大,以致许多家庭毁灭于命运的转变。1796年五人执政团恢复“国家的抽彩”(Loterie Nationale)。巴黎公社的图勒里派(Tuileries section)向国民公会请愿,请求用法律废止所有的赌场与妓院。“没有道德”,它表示,“那可能是无法律与秩序,没有个人安全,也没有自由。”<sup>10</sup>

大革命政府费力地给予易怒、暴力的民众一个新的法律制度,但是信仰衰落与皇帝的死亡让他们在道德与法律上解缆。伏尔泰要求法国的法律之全面修订,并将360项省或县的法规结合成为整个法国有条理的法律。这个请求在革命骚动时期未被准许;它必须等候拿破仑的处置。1780年,Châlons-sur-Marne学院提供奖金给有关“不危及公共安全之下减缓法国刑罚最好方法”的最佳论文。<sup>11</sup>路易十六(1780年)则以废除严刑拷问回应之,并且在1788年他宣布愿意将所有的法国刑法修订成为前后一贯的法国法律;此外,“我们将寻求各种方法缓减惩罚的严酷而不损及良好的法治。当时掌握巴黎的国务院的保守派律师梅斯(Metz)与贝桑松(Besançon)反对这个计划,并且,皇帝,也为他的生存而战,将其搁置。

提呈至1789年三级会议的委托书(Cahiers)建议几项法律的改革;审判应予公开,被告人应允许有法律顾问的协助。皇帝逮捕反叛者的密令应加禁止,有陪审团的审判应予建立。6月,皇帝宣布逮捕反叛者的密令之终止,并且其他改革立即被立宪会议制成法律。陪审团制度,曾存在中世纪的法国,已恢复。立法者现在可以不受教会影响,并且留心于商业需要,1789年10月3日宣布,索取利息不是犯罪行为。1794年的两项法律释放所有法国与她殖民地的奴隶,并且将法国公民权给予黑人。基于“一个绝对自由的国家不能允许任何社团在它的核心内”的理由,1792—1794年的种种法律禁止所有兄弟会、学会、文艺协会、学教机构与商业社团。足以奇怪的,雅各宾会社不受损伤,但劳工联盟受到禁止。大革命

迅速以万能政府取代君主专政。

旧法律的繁杂,新法律的树立,与商业关系的逐渐复杂,促成律师的倍增,因而律师现在取代教士成为第一阶级。自从国务院解散后他们并未被正式组织起来,但是他们了解所有法律上的漏洞,与所有法律上程序的诡计与延搁,因而给予他们权势并且使得政府——律师集团——发现对它难以控制。人民开始抗议法律的耽误,律师的阴险,与高价的立法,因为是使所有人民在法官前平等有令人不生气的不实在。<sup>⑧</sup>一连串的会议试作不同措施以减少律师的数目与权力。在反律师法猛烈进行时,他们(1791年9月23日)禁止所有公证人的活动,关闭所有法律学校(1793年9月15日),并且(1793年10月24日)宣布:“律师事务所予以撤消,但是诉讼当事人仅可授权代理人代表他们。”<sup>⑨</sup>这些法规,常常被规避并留有记录,一直到1800年3月18日拿破仑复原律师为止。

大革命在刑法的修正上有较好的改进。过程是较为公开;那将(暂时)结束秘密审查及匿名的证据。监狱停止成为苛责主要的手段;在许多监狱,入狱者被准许携带书籍与家具;并且偿付由外送进的食物;<sup>⑩</sup>并且做有限的相爱;我们听到一些温情的恋爱事件,像囚犯约瑟芬与囚犯奥什将军,国民公会,其批准过成百的死刑执行,于它最后会期宣布(1795年10月26日):“从和平公告之日起法兰西共和国各处的死刑将废止。”

同时大革命宣称它能改善死刑方法。1789年吉约坦(Joseph-Ignace Guillotin)博士,三级会议的代表,建议以重机刀刃代替绞刑吏与用斧者,因它的下落可在个人有任何肉体痛苦感觉前分割他的头。这个想法不是新的;13世纪以来它被用于意大利与德国。<sup>⑪</sup>在医生手术刀对尸体作若干试验用途后,“斩首机”(guillotine)(1792年4月25日)被竖立在 de Grève 广场(现在的市政府广场),然后在别处,并且死刑为之加速。暂时他们吸引许多的群众,他们中一些包括嬉戏的妇女与孩童,并且;<sup>⑫</sup>但是他们是如此

的频繁以致他们成为可以忽视的常事；“民众”，同时代一家杂志报导，“当暴动发生时仍继续在他们的店铺中工作，甚至不因搅扰而抬起他们的头。”<sup>⑧</sup>谦恭者活得最久。

## (二)性的道德

在囚车之间，在废墟之中，爱与性交幸存。大革命已忘记医院，但是在那里，在战场以及在贫民窟，慈善减轻了痛苦与悲伤，美德阻遏邪恶，并且父母的情爱残存于子女的自主。许多孩子看到父母的无能因而造成他们惊服大革命的热情与新风尚；他们之中一些抛弃旧道德限制，并且变成无忧无虑的享乐主义者。男女乱交盛行，性病蔓延，弃儿倍增，性变态深陷。

萨德 (Donatien — Alphonse — François de Sade) 伯爵 (1740—1814 年) 出身于东、南古州 (Provencal) 之一地位很高的家族，高升为布雷西亚 (Bresse) 与比热 (Bugey) 区的总督，并且似乎注定终身为省的行政官。但是他激荡与沸腾于性的心象与愿望，并且寻求可使他们成为正当的哲学。涉及 4 名女子风流韵事后，他在艾克斯昂省 (1772 年) 以“毒害与兽奸之罪”被判死刑。<sup>⑨</sup>他逃亡，被捕，再逃亡，犯了更大的罪，逃至意大利，回到法国后，被捕于巴黎，监禁在万塞讷 (Vincennes, 1778—1784 年)，巴士底狱，以及沙朗东 (Charenton, 1789 年)。获释于 1790 年，他支持大革命；1792 年他是皮克派 (Section des Piques) 的书记大。恐怖期间由于他被误认成为一名回来的移民而被逮捕。一年之后他被释放，1801 年，在拿破仑统治下，他因出版《朱斯汀》 (Justine, 1791 年) 与《朱丽叶》 (Juliette, 1792 年) 而再度入狱。这些是性经验的小说，正常与不正常的；作者偏好不正常的，并且使用相当的文学手腕替他辩护；所有的性欲，他主张，是自然的，并且应无愧内心的纵情着，甚至从传染病毒的痛苦获得性欲的欢乐；在这最后看法他以一字声名永垂

不朽。他在不同监狱度过他生命最后若干年，写作风采优雅的剧本，并且死于沙朗东精神病院。

我们得知在大革命期间大学生之间的同性恋，<sup>⑧</sup>并且可推测它已普及于监狱。妓女与妓院在皇宫附近，在图勒里宫的花园，在圣希拉尔（St. -Hilaire）街与白蒂·沙普（Petits Champs）街上是极多的；她们也可在戏院与歌剧院中发现，甚至立宪议会与国民公会的走廊上。记载着住宅与女人的住址与费用的小册子散布着。1793年4月24日，谭普尔派（Temple Section）发布一项命令：“全会（General Assembly）……愿意终止由公共道德毁灭，以及女性润滑与猥亵所引起无数的不幸，并且藉此指派警察局长”，等等。<sup>⑨</sup>其他派系从事运动；私人的巡查被组成，一些不留意的罪犯遭到逮捕。罗伯斯比尔支持这个措施，但是在他死后监护人的勤勉为之松懈，娼妓再度出现于五人执政团期间，并且在有广泛性经验女人成为上流人士与社会领导人物时为之盛行。

邪恶可能被早婚增加的便利减轻。教士是不必要的；1792年9月20日以后，只有公证结婚是合法的；并且这只需要在官方作证下签共同的誓约。在较低的阶层有许多夫妇作未婚与无苦恼的同居。私生子是大量的。1796年法国登记4.4万名弃儿。<sup>⑩</sup>1789至1839年间，所有在默朗（Meulan）这典型城镇的新娘在她们结婚之时24%是怀孕的。<sup>⑪</sup>法国大革命前丈夫通奸常被赦免；富有的人可能有情妇，并且在五人执政团期间这些如同妻子般公开被夸耀。1792年9月20日的一项法令使离婚合法，此后它可从市政官员得到相互的协约。父系的权威受女人合法权力适度增加以及更多不为习俗约束年轻人逞强而减少。普伦普特里（Anne Plumtre），1802年旅游法国，并且报导一位园丁所告诉她的：

在大革命期间我们不敢责怪我们孩子的过错。那些自称为爱国者的视惩罚孩子为违背自由基本原则。这些

变得十分难以控制，以致常常当一位父亲责骂他的孩子，后者会告诉他应照料他自己的事业，附言“我们是自由与平等的；共和国是我们唯一的父亲，并无其他的。”……那将需许多年使他们服从。<sup>⑧</sup>

色情文学盛行，并且（按照一份同时代的报纸）是年轻人最喜爱的读物。<sup>⑨</sup>一些以前过激的父母，在1795年前（同样在1871年时）开始将他们的儿子送进教士管理的学校，为着免脱一般放荡的道德与作风，<sup>⑩</sup>家庭暂时似乎是法国大革命的受害者，但是在拿破仑期间风纪的恢复暂缓对它处理一直到工业革命才以较缓慢而较一致及基本的力量给予攻击。

在旧政体（Old Regime）期间妇女由于她们优雅与高尚风度影响以及她们思想的教化而获得很高的地位，但是这些发展大多受限于贵族与中上阶级。可是1789年前，妇女团体显然在政治中脱颖而出。他们前进至凡尔赛，并将皇帝与皇后送回巴黎做为突然得权的公社之俘虏后，几乎赢得大革命。<sup>\*</sup> 1790年，7月，孔多塞发表一篇文章“准许妇女有政权”。12月艾德（Aelders）夫人尝试成立会社献身于女权运动。<sup>⑪</sup> 妇女将她们意见表示在“议会”（Assemblies）旁听席上，而且试图组织她们自己，以补偿她们在奋激战争，愤怒恐怖，与共和历11月后保守的反作用所造成政治权力的损失。他们获得若干利益：妻子，像丈夫一样，能请求离婚，并且母亲的许可，如同父亲的，对她未达限定年纪儿女的婚姻是必要的。<sup>⑫</sup> 五人执政团期间，无选举权的妇女，成为政治上公开的力量，支持部长与将军，并且骄傲地展示她们在风度、道德、与服装上的新自由。拿破仑，26岁，于1795年时描述她们：

---

\* 传说可能夸张这有活力而专侍朝臣贵族或富豪的高等妓女 Thérèse de Méricourt 在这些事件所扮演的角色（1762—1817年）。

妇女是在各处——在游戏场所，在公共散步之处，在图书馆。你们在学者研究室看到非常美丽的妇女。世界各地，只有此处（巴黎），女人的确具有值得男人为她们疯狂的影响力，而且男人不考虑其他，仅为着她们度过一生。一个女人，为了知道什么是应给予她的，以及什么是她有的权力，必须居住在巴黎6个月。<sup>⑧</sup>

### 第三节 风 俗

几乎像舆论等其他一切事物，风俗觉察出自暴动至报答之极端的变化。在贵族逃避平等运动风暴之前，他们获有自己的头衔，谦恭的谈吐，熏香的措辞，似花的签字，有信心的安逸，与悠闲的风度。不久，沙龙的温柔，舞蹈的合宜，与柏拉图（Plato）哲学的用语成为贵族的耻辱，并且这可能使他们的开业者因涉嫌为逃避时代大洪水的旧式之人而招致监禁。<sup>⑨</sup>1792年底所有在法国的法国男人已变成公民，所有法国女人为女公民。在切实平等上，无人是先生或夫人；并且个别谈话中谦恭的“您”（Vous）被家庭与街道上的“你”（tu）与“你”（toi）取代。虽然如此，早在1795年，这个“你”（tutoiement）已不流行，“您”回到时髦，先生与夫人替代男女公民。<sup>⑩</sup>在拿破仑统率下，爵位再度出现；1810年前他们的确是比以前都多。

服装改变较为缓慢。富有男仕久已采用，并且现在拒绝抛弃昔时高贵的、三棱角高帽顶的帽子，丝绸衬衫，平滑的领结，彩色与刺绣的背心，及膝的礼服的外套，膝盖以下长短不同的宫廷仪裤，丝

袜，与方头有带扣的皮鞋。1793年公共安全委员会尝试“变更目前全国的服装，以致使它适合于共和国的习惯与大革命的特性”；<sup>⑧</sup>但是只有中上阶层采用工人与商人的长裤。罗伯斯比尔他自己继续穿着像一位贵族，然而在华丽上胜不过巴拉斯前导的督政的正式服装。一直到1830年，马裤尚未赢得反宫廷仪式裤（裙裤）的战争。只有无裤党人穿戴着革命的红色苏格兰帽，与卡曼纽装（carmagnole）。\*

妇女的服装受大革命信仰的影响以致它遵循共和政体的罗马与伯里克利（Pericles）的希腊之足迹。大卫，其掌握法国艺术从1789至1815年，将有名的英雄作为他早期的对象，并且用古典的风格装饰他们。因此巴黎时髦的女人，在清教徒罗伯斯比尔没落后，丢弃裙子与衬衫，并且采用一种轻便飘拂而且透明的足以暴露大部份光滑外形的长服作为他们主要的外出服，以致吸引从未吃饱的男性。腰线是非常的高，支撑着乳房；领口是低的足以提供广阔的样本；并且袖子是短的足以展露出诱人的手臂。无边帽被束发带替换，并且高跟鞋取代轻便的浅帮鞋。医生报导死于戏院或舞会的华美衣着的女人，其曾暴露在巴黎夜晚迅速下降气温之下。<sup>⑨</sup>同时异常之人（the Incroyables）与绝妙之人（the Merveilleuses）——令人难以置信的男性与不可思议服装时髦的女性——努力以放肆的服装赢得注目。一群妇女，于1792年以男性打扮出现在巴黎公社的会议，受到它的检查长肖梅特温和的谴责：“你们性急而想做男人的女人，你们是不满意你们实际的命运吗？你们还要什么？你们左右我们的判断力；立法者与行政官是在你们的脚下，你们的专横是唯一我们力量不能抗争的，因为它是爱的专横，而且为本性的

---

\* carmagnole 表示两种意义的实物：它是流行于法国南方工人的歌与舞曲，并且也为意大利移入的劳工穿着的短羊毛夹克。Carmagnola 是在皮德蒙特的一个城镇。



所为。为了那个真正的本性，你们保留随意所欲的本性。”<sup>⑧</sup>

可是女人确信，她们能改进人的特征。在1792年8月15日的《普及报》中一项公告，布罗坎（Broquin）夫人宣布她尚未用完她的“在一次施用，染为红或白发，栗褐或黑色的著名粉末。”<sup>⑨</sup>如果必要，不满意的头发，覆以假发——许多情况由被斩首年轻女人的卷发做成。<sup>⑩</sup>1796年留长发与发辫的中上阶层社会人士是普通的。<sup>⑪</sup>

大革命的前两年期间，巴黎的80万民众继续过它平日的生  
活，并且仅偶尔注意立法会议或监狱所发生的事情。较高阶层生活是十分愉快：家庭继续相互拜访与邀宴，参加舞会、宴会、音乐会、与玩耍。即使巴黎在1792年9月大屠杀与1794年7月罗伯斯比尔失势的凶暴期间，有2800次死刑的执行，所有幸存者的生活是它习惯循环的工作与游戏，性的追求与父母的爱。1794年梅西耶（Sébastien Mercier）报导：

阅读我们报纸的外国人想像着我们全为鲜血覆盖，穿着破衣服，并且过着悲惨生活。估量他们的惊奇，当他们到达香榭里舍（Champs Élysées）的堂皇大道，其每一边是高雅的二马四轮马车和诱人的、可爱的女人；然后……那个遍布图勒里宫窗外不可思议的远景以及……那些华丽的花园，现在更加华美并且比以前有更好的照料！<sup>⑫</sup>

在那里有比赛——球赛、网球、骑马、体育竞赛……在那里有露天游艺场像蒂沃利（Tivoli）花园，在该处——一个晴朗日子宜于1.2万人——你能够听到你的命运，在小商店购买不重要之物，欣赏烟火、走绳索的人、或者气球上升，听音乐会，或者将你们的儿童放在旋转木马上玩指环游戏（抓指环）。你们可坐在露天的咖啡

馆,或在 de Foy 咖啡馆的大帐篷下,或在高级咖啡馆像 Tortoni's 或 Frascati's,或跟观光客进入夜总会像 Caveau (酒窖),或 Sauvage,或 Les Aveugles (该处为盲人音乐家表演娱乐节目)。你们可到俱乐部阅读或闲谈或听取政治争论。你们可参加其中一个政府办的并且被著名艺术家像大卫修饰的综合而精采节目。如果你们愿尝试新舞蹈——华尔兹——刚从德国输入,你们可在巴黎人名地址簿上 300 多公共舞厅其中一家找到舞伴。<sup>④</sup>

现在(1795 年),大革命平息后几年,一些移民被允许回国,隐藏的贵族大胆地显现于他们有保护的兽穴之外,并且资产阶级显示它的财富于昂贵的住处与家具,宝石装饰的女人,以及耗费金钱的娱乐。巴黎人民走出他们的公寓与住宅,到图勒里宫或卢森堡皇宫的花园,或者在香榭里舍宫殿附近晒太阳或呼吸夜晚空气。女人展示她们粗俗迷人的服装,她们超过言语可形容的如画般扇子,与隐蔽她们诱人双脚的高雅定型的鞋子。社会复苏了。

但是现在这社会中许多学派的组成分子不是于大革命前夕在沙龙中表露才智的有来历上等人士与世界著名哲学家;他们大多数是从教会不动产,军队合约,商人独占,财政策略,与政治上朋友获取 livre 的新近富人。一些波旁皇族时代溃散幸存者来到让利斯(Genlis)夫人或者孔多塞与爱尔维修寡妇家中,但是大多数在罗伯斯比尔死后开张的沙龙(斯塔埃尔夫人圈子例外)没有才气焕发的交际本领,并且缺少较古老时期由于土地财富长久的安全所获的安乐。目前最高级沙龙是一个存于巴拉斯督政在卢森堡皇宫的舒适房间,或者在他的 de Grosbois 堡;并且它的诱惑并不是在哲学家智识而在塔利安与博阿尔内夫人的美丽与微笑。

约瑟芬还不属于拿破仑,并且塔利安夫人不再是塔利安的妻子。她于 1794 年 12 月 26 日嫁给他,并且暂时承认为“共和历 11 月的圣母”,她离开衰败恐怖政治主义者不久之后,变成巴拉斯情妇。一些新闻业者嘲弄她的道德,但多数报以微笑,因为她的美貌

中不带有任何傲慢，并且她对许多女人与男人的仁慈是著名的。过后，德勃朗德 (d'Abrantès) 公爵夫人形容她为“坎匹托莱的维纳斯 (Capitoline Venus)，甚至比菲迪亚斯 (Pheidias) 的作品更可爱；因为你可看出她有同样完美容貌，同样匀称手臂、手、与脚，而这整个由于仁爱表情为之生气蓬勃。”<sup>⑧</sup> 这是巴拉斯的优点；他慷慨地对待她与约瑟芬，不仅注意她们性方面的美丽，在欢迎会中他与成百的潜在竞争者共同享受它，并且祝福拿破仑虏获约瑟芬。

#### 第四节 音乐与戏剧

各等级音乐盛行。你能用一个硬币要求街上歌唱者再唱一次，或者你可加入群众以“卡曼纽拉歌”或“这将……”威胁资产阶级，或者你可用鲁日·德·李尔所作的“马赛进行曲”使前线为之震颤。在 Eeydeau 音乐会，你会惊异加拉 (Dominique Garat)，当时的卡鲁素 (Caruso)，他的声音能引起内心兴奋以及唤醒筏夫，并且就那个音域来说，他的名声遍及整个欧洲。在 1793 年恐怖期间国民公会成立国家音乐学院，二年之后它将其扩大成为音乐院并且每年赠 24 万 livre 给 600 名免学费的学生。在罗伯斯比尔倒下的那晚，一个巴黎人可在歌剧院听“阿米狄” (Armide)，或者在喜歌剧院 (Opéra - Comique) 听“保罗和维尔吉妮” (Paul et Virginie)。<sup>⑨</sup>

歌剧盛行于大革命期间。此外在 1794 年贝尔纳丁 (Bernardin

---

\* 1805 年，她嫁给卡拉曼 (Caraman) 伯爵——未来的希迈 (Chimay) 王子——并且死于 1835 年。

de Saint-Pierre), 其将简单美妙情景之诗歌或散文做成音乐, 同年勒絮尔 (Jean-François Lesueur, 1760—1837 年) 以费奈隆 (Fénelon) 的《泰来马魁》(Télémaque) 获得另一次胜利; 他以《盗匪的巢窟》(La Caverne) 的扰乱与恐怖唤醒整个法国, 并获得 700 场演出; 在拿破仑有权势期间他继续制作, 并且活得很久足以指导柏辽兹 (Berlioz) 与古诺 (Gounod)。寿命较短的梅于尔 (Étienne Méhul, 1763—1817 年) 为喜歌剧写了 40 部以上歌剧曲谱, 同时他令人有深刻印象的赞美诗——《理智的赞美歌》(Hymne à la raison, 1793 年) 与《离别歌》(Chant du départ, 1794 年)——使他成为大革命音乐偶像。\*

法国大革命期间, 伟大乐曲作者是凯鲁比尼 (Maria Luigi Carlo Salvatore Cherubini)。1760 年出生于佛罗伦萨, “我 6 岁开始学音乐, 9 岁学作曲。”<sup>⑥</sup> 16 岁以前他已撰述 3 首弥撒曲, 一首圣母颂, 一首赞美歌, 一部神剧, 与 3 部清唱剧。1777 年利奥波德, 仁爱的托斯卡纳 (Tuscany) 大公爵, 赠予他一项津贴在博洛尼亚与萨德共同研究; 3 年时间凯鲁比尼成为对位乐曲的能手, 1784 年他被邀请至伦敦, 但是他表现不优, 1786 年他迁至巴黎, 除了短时期, 他留在家中一直到他死于 1842 年。他在那里的第一部歌剧 (1788 年), 放弃使情节与管弦乐附属于曲调的轻松那不勒斯作风, 并且跟随格鲁克深入“大喜剧”, 其曲调是附属主旋律的开展, 以及合唱与管弦乐曲。大革命时他在巴黎最大成功是 *Lodoïska* (1791 年) 与 *Médée* (1797 年)。以他至今更著名的 *Les Deux Journées* (1800

---

\* 在大革命期间喜歌剧不再意谓喜剧, 并且被应用到任一 (其包括口头对话的) 歌剧, 悲剧或喜剧,<sup>⑥</sup> 此后喜歌剧院被允许与音乐院竞争于“严肃”歌剧的制作。这个时期前后, 也有一些作曲家, 像梅于尔在亚里丹 (*Ariodant*, 1799 年), 着手将一些循环的管弦乐队演奏的乐节与相对应角色或场面结合, 因而开始了主乐旨。

年),他开始了拿破仑统治下的困苦生涯。在那流星之下我们可与他再结合。

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有 30 家以上的剧院,并且全是每夜客满,甚至在恐怖期间。大革命免除教会老早加诸于演员的无能;演员会欣慰被逐出教会,以及他们的尸体被排拒基督教徒墓地之外。但是(1790—1795 年)他们受制于更仔细的检查:国民公会要求喜剧不得包含着任何贵族政治的英雄与情趣;戏院成为政府宣传工具。喜剧败落至低水准,并且新悲剧沿循大革命路线与古典的调和。

像以往一样,第一流的演员是比政治家更有名气,并且有些,像泰尔马(François-Joseph Talma),是更惹人喜爱。他的父亲曾是侍仆,转业成为牙医,赴伦敦后事业为之兴隆,并且送他的儿子到法国受教育。毕业后泰尔马回去做他父亲的助手。他学习英语,阅读莎士比亚作品,学会演奏乐器,并且加入在英国表演的一个法国演员团。回法国后,他获准进入音乐院,并且使他在 1787 年首次演出成为伏尔泰的 Mahomet 中的塞狄(Séide)。他均匀的身材,他轮廓显明的古典型容貌,与他粗黑的头发与黑亮的眼睛,助他高升,但是他对大革命的支持疏远大多数他的伙伴,因他们的生存归功于皇帝的恩惠。

1785 年泰尔马看到大卫的戏“贺拉提的誓约”(The Oath of the Horatii);使他受感动的不仅是它的戏剧本领而且为它对古代服装的十分忠实。他决意将同样的真实性介绍到他登台的服装。当呈现古代希腊和罗马人所穿的长袍与草鞋,以及赤裸的双臂与双脚,来扮演伏尔泰的《布鲁特斯》(Brutus)时,他的同行为之惊讶。

他成为大卫的朋友,并且吸收一些他的革命热情。当他演出谢尼埃(Marie-Joseph de Chénier)的《查理九世》(Charles IX, 1789 年 11 月 4 日),他将这热情置于反君主政体一节——描写年轻的皇帝下达圣巴托罗缪夜晚大屠杀的命令——他震惊大多数他的观众,与许多他的朋友,而他们仍有几分忠于路易十六。当大革命激

烈进行时，“赤色份子”（Reds）与“黑色份子”（Blacks）在演员与观众间的冲突变得十分激烈——导致决斗——以致泰尔马、韦斯特里（Vestris）夫人（第一流悲剧演员），与其他演员背弃高贵有特权的法国国家剧院，而在皇宫附近的法兰西共和国戏院培植他们自己演员。在那里泰尔马以研究历史、品格、与他戏剧节目中每个人与每段期间的服装来改进他的艺术。他训练控制他的容貌来伴随每一情绪与思想的变动；他减少他说话朗诵的音调与感情的戏剧表情，结果他成为他艺术界内公认的能手。

1793年较老的演员，重新定名国家戏院，并且制作带有讽刺与嘲笑大革命领袖的剧本 *L'Ami des lois*。9月3—4日晚上整团的演员被逮捕。泰尔马的演员接受了严厉的审查，莫里哀的喜剧受到剪辑与更改，贵族的尊称——甚至先生与夫人——被排除在可接受的剧本之外并且类似的纯化被要求实施于所有的法国戏院。<sup>④</sup>罗伯斯比尔没落后，被捕的演员获得释放。1799年5月31日，当大革命接近它的尾声，新旧两派演员在法国国家剧院结合，并且将靠近皇宫的法兰西共和国戏院作为他们集会之处，而此处至今留存着并且商业繁荣。

## 第五节 艺术家

大革命时法国艺术受到3种外来事件的影响：贵族的废除与迁移，在意大利西南古城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及庞培（Pompeii，1738年及其后）挖掘古代的遗物，拿破仑抢劫意大利艺术。大多数阶层的移民携带着足够金钱与购买艺术品的嗜好离开法国，并且有些艺术家，像维热勒布伦（Vigée-Lebrun）夫人，随

移民离境。弗拉戈纳尔 (Fragonard) 完全依赖休闲阶级的钱包维持生活,却仍然支持大革命,因此几乎饿死。其他的艺术家支持大革命是由于他们记得贵族如何地将他们当作仆人与佣工看待,并且美术专门学校如何地仅允许他们自己会员在它的沙龙展览。1791年立法会议开放美术专门学校给任一够资格的法国或外国的艺术家来竞争。国民公会禁止美术专门学校成为实质上贵族化的学校;1795年,五人执政团以一新的美术专门学校替换它,并且在罗马设立办公处。1792年,这所学校已成为博物馆。在那里,法国的艺术家被允许研究模仿拉斐尔 (Raphael),焦尔焦内 (Giorgione)、柯勒乔 (Correggio)、达芬奇、韦罗内塞 (Veronese) 的作品,……甚至圣·马克 (St·Mark) 的马;赃物从未被如此良好地予以使用。1793年国民公会恢复政府资助的罗马奖 (Prix de Rome) 与在罗马的法国文艺协会 (French Academy)。逐渐地日渐高升的中等阶级取代贵族成为艺术品的购买者;1795年的沙龙 (Salon of 1795年) 所展览的 535 张画吸引无数的观赏者,艺术品价格上升。

说也奇怪,大革命并未在艺术上产生任何激进的波动。相反地,那不勒斯附近的古代雕刻与建筑的发掘,以及 1755 年及其后的温克尔曼 (Winckelmann Johann Joachim) 与 1766 年的莱辛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之作品所产生的新古典主义灵感,以它整个贵族政治的内涵,刺激古典型态的复醒,并且这作用判明是强烈的足以抗拒大革命之浪漫与民主的影响。这同时代的艺术家 (普吕东 [Prud'hon] 不赞同) 在理论与实际上完全接受古典与贵族的法律准绳、风纪、礼节、智能、理性、与逻辑作为扼阻激情、盛怒、热忱、骚动、放纵,与伤感的警卫。路易十四时期法国艺术遵循昆体良 (Quintilian Marcus Fahius) 与维特鲁维亚 (Vitruvius Marcus)、高乃依、波瓦洛 (Boileau Nicolas) 的古老法式;但是在路易十五与路易十六时,它趋向于新异奇怪的样式。借卢梭稳定情绪,并且以狄德罗支持情操,浪漫主义的时代似乎是接近。它是在政治与文学,

但不在艺术方面。

1774年维安(Vien, Joseph-Marie)受到在赫库兰尼姆与庞培挖掘报告的激发。带着他的学生大卫动身前往意大利。这位完全为着大革命的年轻人发誓,他将永远不受古典制度中保守与贵族艺术的诱惑。<sup>69</sup>但是在希腊与罗马艺术方面他表现出他是精于高贵的轮廓,理论的结构,与线条之笔力与纯净。他起先抗拒它男性的寓意,渐渐地向它屈服,并且将它带回巴黎。它使大革命排除基督教,并且使加图与西庇阿的理想化为之调和;它甚至使塔利安夫人的希腊晚礼服与它一致。现在这似乎是适当时期搁置像哥德式(Gothic)神圣抱负,巴洛克式(baroque)之少年不成熟事物,洛可可式(rococo, 17、18世纪欧洲流行一种纤巧华丽的建筑和音乐形式)放荡的娇饰,布歇(Boucher, François)的玫瑰色的裸体画,弗拉戈纳尔的跳跃的女孩。现在古典的线条与理论,冷静的思考力,贵族的约束,与斯多噶的(Stoic)轮廓,必须是富有色彩的、情感的、民主的、浪漫的,法国的大革命之艺术目标与原则。

大卫其在大革命与帝国期间支配法国艺术,1748年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兴旺的资产阶级家庭,其永远不使他穷困。16岁时,他进入艺术专门学校,在维安之下学习,两次尝试得到罗马奖,失败两次,禁闭他自己,并且想饿死自己。一位邻近的诗人怀念他,寻找他,并在找到了他之后,请求他不再绝食。1774年大卫再度参与竞争,并且以一洛可可式的画——“安条克渴望斯特拉托尼的爱”(Antiochus Dying for the Love of Stratonice)获胜。在罗马他爱上拉斐尔,然后又搁置他的作品,因为在方式与线条上他是过于女性的柔和;他发现较有力的滋养于达芬奇,以及思想与轮廓严谨的控制于普桑(Poussin Nicolas)。他从文艺复兴的“圣母画像”(Madonnas)之中接受古代英雄的哲学、格言,与战争,并且在基督教的首都他放弃他的基督教的信仰。

他于1780年回到巴黎,获得一位富有妻子,并且提供美术展



览所(Académie Salons)一连串古典题材——贝利萨留斯(Belisarius), 昂德罗马什(Andromache)与一些爱国志士。1784年他到罗马为路易十六绘制一幅以反对罗马为背景的画——“贺拉提的誓约”。当他在罗马展览此画时,一位年老的意大利画家巴托尼(Pompeo Batoni)告诉他,“你与我只是画家;至于其他的人,他们可跳河”。<sup>⑧</sup>到巴黎后,他在1785年的沙龙画展中展出他的作品“贺拉提的誓言”。由李维传奇历史,<sup>⑨</sup>大卫发现爱国精神是古罗马的真正宗教;贺拉提家族的3位兄弟发誓将与古里提(Curiatii)部落的3位兄弟作殊死战以解决罗马与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公元前7世纪)之间战争。大卫画贺拉提宣誓,并接受他们父亲的剑,而他们的姊妹悲伤着;她们其中之一已与古里提部落中一位订过婚。从高乃依的《贺拉斯》知道这个故事的法国人,感受到这画所描写的国家地位高于个人亦高于家庭。一位真诚致力于改革的皇帝,与一个已蓬勃显现革命的城市,共同称赞这位艺术家,同时他的竞争者承认他显露英雄的勇气,仁慈的牺牲,与女子的悲伤之技巧。“贺拉提的誓约”是艺术的历史记载中最圆满与有意义的作品之一,因为它意谓古典风格的胜利。

受他的方法与他选择的主题之鼓励,大卫转至希腊并于(1787年)提出“苏格拉底的死亡”(The Death of Socrates),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在巴黎观赏此画,宣称它“为米开朗琪罗与拉斐尔后艺术上最伟大成就;在伯里克利时代它是雅典的光荣。”<sup>⑩</sup>两年后大卫以回复到罗马人的传奇“古罗马小吏使布吕蒂斯认出他儿子的”;这是李维的罗马行政官的故事(公元前509年)——他判决他儿子死刑为着图谋恢复君主政体。这幅画受委托绘制于巴士底狱陷落之前,明显的未预料到即将发生的暴动。皇帝的艺术部长禁止它的展出,但是民众扰嚷使它获得1789年沙龙画展入场许可。来看它的群众向它致敬如同它为大革命一部分,并且大卫他自己自然成为他的时代之艺术发言人。

其后他致力于大革命之政治与艺术的罕有的结合。他接受它的原则,说明它的枝节,组织与装饰它的庆典,并且表扬它的烈士。激进派代表圣法尔若(Lepeletier de Saint-Fargeau,1793年1月20日)被一名保皇党暗杀后,大卫开始积极表扬这情景;两个月之内他将这幅画呈献给国民公会,并且被它挂在议室厅的墙上。马拉(1793年7月13日)被杀后,一群哀悼者进入国民公会走廊,随即他们之中喊出一声,“大卫,你在那里?你已将圣法尔若为国捐躯的容貌传播给子孙;在那里为你保留另一幅待绘制的画。”大卫起立并回答道,“我愿意画它。”10月11日他将完成的画呈献给国民公会。它显现马拉半身在他的浴室内,他的头无生命地向后垂下,一手紧握一份原稿,一只手无力地落在地上。浴盆旁的一块木头刻有光荣的碑文“给马拉·大卫。”这是违反大卫特有风格;革命的热诚使现实主义取代新古典主义。这幅画与圣法尔若采用最近的事为主题并弃绝古典的惯例;他们使艺术参与大革命。

1794年前大卫在政治上变得那么杰出,以致他被选入一般安全委员会他追随罗伯斯比尔的领导,并为上帝的节目安排游行与艺术装饰。罗伯斯比尔失势之后,大卫被当做他的信徒之一而遭到逮捕;在监狱服刑3个月后他由他学生的抗辩而被释放。1795年他隐退到他画室的个人小天地,但在1799年他以一精巧的全景,“萨比聂的欺凌”(The Rape of the Sabines)回复声誉。11月10日,拿破仑得权,51岁的大卫开始新而成功的生涯。

## 第六节 科学与哲学

大革命不偏爱理论科学,但他们激励应用科学以配合社会为

自由而战的需要。因此,拉瓦锡(化学家——金融家)改进火药品质、与生产,因而有助于美国与法国的革命;贝托莱(Berthollet)与其他化学家,受英国封锁刺激,找到进口的糖、苏打,与靛青的代替品。拉瓦锡被当做投机商斩首(1794),<sup>⑥</sup>但是,一年后,大革命政府否认这项行动并尊敬他死后名誉。国民公会以隶属于它的委员会保护这位科学家,并且接受他们的计划赞成10进位制度;五人执政团给予新法兰西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很高的地位;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勒让德尔(Legendre, Adrien-Marie)、居伟叶(Cuvier)、德朗布尔(Delambre)、贝托莱、拉马克——这些名字仍然闪耀于科学历史上——是它最早的会员。科学暂时取代宗教成为法国教育主要部分;波旁皇族的复归中断这项行动,但是他们的没落(1830年)兼带着科学的精炼于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哲学”。

拉格朗日与勒让德尔在数学上留下他们永恒的符号。拉格朗日有系统地陈述“微积分的变数法”,而其方程式仍然是机械科学的一部分。勒让德尔从1786年至1827年致力于椭圆积分,并且发表他的结果在《函数专论》(Traité des fonctions)。蒙日,一位贩者的儿子,发明图形几何学——在二次元平面上描绘三次元物体的方法;他创立铜与锡全国性的开发,写了一篇关于制造大炮的优良技术的著名论文,并且做为大革命政府与拿破仑的数学家与行政官渡过漫长生涯。拉普拉斯以他《天文学史话》(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激发欧洲知识分子(1796年),因为这是有系统地陈述星云的假设并且尝试解释宇宙为单纯的机构;当拿破仑问他“谁创造这整个”机构,拉普拉斯答道,“我不需要那个假设。”拉瓦锡,现代化学创设者,作为该公制设计委员会主席(1790年)。贝托莱推展理论与实际的化学,协助拉瓦锡设立新的化学有系统命名法,并且以他的改变原矿为铁与铁变为钢的方法帮助他的整军备战的法国。比沙(Xavier Bichat)用他组织的显微镜的研究开拓他的工艺学。1797年他在生理学与外科手术上开始一连串演讲;他

摘要他的结论于《普通解剖学》(Anatomie Générale, 1801年)。1799年,他年方28岁,被指派为Hôtel-Dieu的医生,当跌倒(1802年)结束他31岁的生命时,他正着手研究由疾病产生有机物的变动。

甘巴尼兹(Cabanis)可看做哲学的变迁,因为他的时代了解他主要为一名医生,后代则发现他为一位哲学家。1791年他看顾濒死米拉博的最后疾病。他在医学校演讲有关卫生学,合法的医学,与医学历史;暂时他是所有巴黎医院的首长。他是许多杰出人物之一,而且他用心很深的恋爱着永远可爱的哲学家爱尔维修的寡妇。所集结的人中他接触狄德罗、达朗伯、奥尔巴克(d'Holbach)、孔多塞、孔狄亚克(Condillac)、富兰克林、杰斐逊。作为一名医学研究者他特别爱好孔狄亚克,其在当时以他的学理,所有智识来自感觉,支配法国哲学舞台。这个感觉论的现实主义之含意引起甘巴尼兹的兴趣;他们将他发现的精神与物质作用之间的相关配合的很好。甚至以他的名言震惊他时代高深思想家:“正确观念运作结果是构成思想,因而这是必须视头脑为特别器官而其特别功能是产生思想,正如同胃与肠有担任消化工作的特别功能,肝过滤胆汁,等等。”<sup>⑤</sup>

不过甘巴尼兹坚持〔如同康德(Kant, Immanuel),最近在他《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所完成的〕感觉先进入一个在出生时已一半形成的组织,其后受每一经验的影响,并且运送它的往事至它的细胞与记忆中形成变动的格性之一部分,包括内部感觉,反射作用,直觉、感情,与愿望,因此他修改孔狄亚克的分析。精神物理的全体因而按照它收到的感觉之结构与意向制成模型。在这意义上甘巴尼兹同意康德,思想不是用为记下感觉的白板(tabula rasa 没写过的书版)它是转换感觉成为理解、观念、与行动的组织。但是(甘巴尼兹坚持),康德如此尊重的思想不是从组织与神经生理器官的实体中得到。

这个明显唯物主义的系统说明在 12 份论文报告的第一份 (1796 年) 而且甘本尼兹在 1802 年用《人类精神与物质的相互关系》(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 之主题合并出版。他们透露急切地活跃于好奇与思索领域上之有力的思想(或者头脑)。第一篇论文研究心理状态的不定相关。并且是生理心理学的纵览。第三篇分析“无意识的”: 我们累积的记忆(或神经中枢的记入)可结合外在与内在的感觉而产生了梦, 或者可不知不觉影响我们的观念, 甚至是在最警觉的醒着状态。第四篇认为思想的年纪是于身体的一致, 以致同一人的观念与性格在他 20 岁年代与在他 70 岁年代可能是完全地不同。第五篇是成功地讨论有关腺的分泌——特别为性的——可能影响我们感觉与思想。第十篇主张人类经由成为遗传的偶然变化与突变而进化。

在一本据称为卡巴尼斯死后 16 年出版的《关于第一原因的文学》中(Lettres sur les causes Prmières, 1824 年), 他似乎收回他的唯物主义, 并且承认上帝(First Cause)赋予智力与意志。<sup>⑩</sup>唯物主义者可能使我们想起优异外科医生提醒过我们防备上年纪的身体影响相关的思想。怀疑论者可能假设意识的神秘导致卡巴尼斯怀疑唯物主义简化这非常复杂和目前相关的现实。无论如何一位有道德的哲学家应使他自己想起, 有时, 他是在无限大的空间中执行教宗职务的一份子。

哲学时代幸存的两人, 亲身接触这受到十分热烈需要的大革命。雷纳尔, 以《哲学史》成名于 1770 年, 见到民众的无节制使启蒙运动的光明变为阴沉, 因此他在 1791 年 5 月 31 日, 寄给宪政会议一封抗议与预言的信。“我久以尝试让君主知道他们的职责; 今天让我告诉人民他们的过失。”他警告群众的专横是可能有如君主专制的残酷与不公正。只要宗教或教士策略的反对者无拘无束的表示他们见解, 他即保护教士传教的权利。同样的他谴责政府资助任一宗教(政府在当时付给教士薪金)并用反对教权的暴徒打击教

士。罗伯斯比尔说服恼怒的立宪会议让 78 岁的哲学家逃脱逮捕，但是雷纳尔的财产被没收，因而他死于贫困与失望(1796 年)。

沃尔内(Constantin Chasseboeuf de Volney)渡过大革命，并且了解从奥尔巴克到拿破仑每一在巴黎的知名之士。在数年旅行于埃及与叙利亚之后，他被选入三级会议，他服务于立宪会议一直到它在 1791 年解散为止。在那年他发表他的漫游之哲学上共鸣的《在废墟那里默想帝国之大革命》(Les Ruines, ou Méditations sur les révolutions des empires)。什么致使如此多的古代文明崩溃？沃尔内回答道他们的衰落是因为与专制政府有关连的超自然的宗教，和以代代之间传递知识的困难招致他们人民的无知。既然神话学的信念失去他们的支持物，并且印刷品加速知识保存与文明移转，人类可能希望设立以道德法规所支持的永久的文化，其成长与散布智识，将伸展人类对他的不合群趋势之控制并且将促进合作与和谐。1793 年他被当做吉伦特党人逮捕，并且留在狱中有 9 个月之久。获释后，他乘船至美国，受华盛顿欢迎，被亚当斯总统抨击为法国间谍(1798 年)，并且匆忙回到法国。在拿破仑统治下他做为一名参议员，反对从执政官政府(Consulate)变为帝国，并且隐退至适于做学者的僻远地方，一直到路易十八让他在 1814 年成为一名贵族为止。他死于 1820 年，经历波旁皇族的罢黜与复位。

## 第七节 书籍与作者

不顾及断头台，出版者保存一些易于消逝的，诗人作诗并按韵律吟诗，演讲者用美丽的辞藻演说，戏剧家混合历史与爱情，历史家修订往事，哲学家批评目前，并且两位女作家在感情的奥妙，政

治的胆量，与智慧的力量上与男作家们竞争。其中一位，罗兰夫人，我们在监狱与断头台上见到。

迪多(Didot)家族，最著名的法国出版者，继续在改进铅字的铸造与书籍的装订。迪多(François Didot)1713年在巴黎成立印刷与图书公司；他的儿子安布鲁瓦兹(François-Ambroise)与弗朗索瓦(Pierre-François)继续作活字印刷术试验，并受路易十六委托发行法国古典文学搜集；安布鲁瓦兹的儿子皮埃尔(Pierre)出版弗吉尔(1798年)、贺拉斯(Horace)(1799年)与拉辛(1801年)的版本，而这是如此精美以致富有购买者并未阅读他们却喜爱他们；弗尔曼(Firmin Didot, 1764—1836年)，安布鲁瓦兹的另一个儿子，以铸造新铅字获得美名，并且铅版印刷术发明应该归功于他；1884年弗尔曼的公司出版拉克鲁瓦(Paul Lacroix)的《五人执政团，领事馆，与帝国》(Directoire, Consulat, et Empire)的豪华版，但许多其中有关条款被窃取；在这方面，譬如，我们得知整个大革命期间，伏尔泰与卢梭作品的销售到达数十万册。国民公会的一项法令(1793年7月19日)担保一个作者他有著作权的出版物之所有权一直到他死后10年为止。<sup>⑥</sup>

大革命10年中最著名的两位诗人开始在装饰与风格上远离，并且以同样的小刀结束于1794年。埃格朗蒂纳著作美丽的诗与成功的戏剧；他成为科底尼会社的会长，丹东的秘书，以及国民公会的代表，在该处他投票驱逐吉伦特党人，和处死皇帝。他被派至委员会设计新日历，并且为它的月份发明许多栩栩如生的季节名称。1794年1月12日，他被控贪污、伪造，以及与外国间谍及投机商交易而被捕。在他受审时他唱着他迷人的歌谣，《下雨了，下雨了，牧羊人！牵回你们的白绵羊》(Il Pleut, il Pleut, bergère; rentre tes blancs moutons)；但是没有一名陪审团员懂得田园诗，在他至断头台途中(1794年4月5日)他分送他的诗稿给民众。

谢尼埃(André-Marie de Chénier)是一位较佳的诗人，他有

较好的道德,但无较好的命运。他出生在君士坦丁堡,有一位法国父亲与一位希腊母亲,,并且平均分配他的文学爱好在希腊诗与法国哲学上。他是在纳瓦尔(Navarre)受的教育,1784年到巴黎,与大卫及拉瓦锡交友,并且有条件的接受大革命。他反对以天主教的教会束缚政府的“教士法”,他建议国民会议彻底隔开教会与政府,每一宗教之充分信仰的自由;他谴责9月大屠杀,称赞科黛杀死马拉,并为路易十六写了一封信给国民公会准许求助人民免于死刑;此项劳务使他受嫌统治雅各宾党人。被当做吉伦特党人监禁时,他爱上一名美丽的犯人,夸尼(Coigny)小姐,并且称呼她“被俘的小姐,”而拉马丁(Lamartine, Alphonse Marie Louis de)称之为“曾经从地牢缝隙发出的最悦耳叹息。”<sup>⑧</sup>同时他拒绝为自己辩护,并将他的受死当作从野蛮与暴虐获得解脱。在他有生之日他仅公两首诗,但是他的朋友,在他被处死刑后25年,发行一版他的诗集,使他成为法国文学的济慈(Keats, John)。在“年轻的俘虏”之最后诗节,所表达的必定是他与她的抱怨。

哦!死亡,你不需匆忙!走开!走开!  
去安慰羞耻与害怕熟识的心,  
以及为无望悲哀包围着的。  
渴望我的 Pales(羊群的女神)仍有她多草的路。  
爱情有它的吻,并且诗神(Muse)有她短抒情诗。  
我至今还不愿死。<sup>⑨</sup>

安德烈(Andre)的弟弟谢尼埃(Joseph de Chénier, 1764—1811年),是一位成功的戏剧家;当泰尔马表演“查理九世”时使人想起曾发生的骚乱。他为“理性的节日”(Feast of Reason)中演唱的威武的“出发曲”与“自由的国歌”写歌词。他用熟练的翻译向法国人介绍格雷(Gray Thomas, 英国诗人, 1716—1771年)的《乡下基地的



哀诗》(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被选入国民公会之后,在某一方面来说他成为大革命公认的诗人。在他更后的年岁他受法兰西学院团委托作《自1789年起法国文学的状态与进步的历史图表》(Tableau historique de l'état et du progrè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puis 1789)。他在完成它之前去世;即使如此它是一度著名而目前甚至为大多数有知识法国人淡忘的作者之影响深远的记录。这位不朽的人物死后即刻消失。

文学在国民公会期间受政治克制与吞噬,但在五人执政团期间复原,成百的文艺协会成立,阅读俱乐部倍增,读书的民众增加。他们大多数喜欢小说;浪漫小说与诗开始取代古典悲剧。麦克弗森(Macpherson, James)的“奥西安”(Ossian),被翻译成法文,而且成为广泛读者从清理卧室的女仆到拿破仑的爱物。

## 第八节 斯塔埃尔夫人与大革命

一位借声音与文字力量从文学织工中突出的女人,她在成功的小说与接连的爱人当中,接受大革命,公开抨击暴动与恐怖,用各种手段打击拿破仑,并且在他受折磨于阴惨生活时她仍胜利地幸存着。杰曼·内克尔(Germaine Necker)具有天生杰出与幸运的优势;她的父亲,较早为百万富翁,变成法国财政部长;她的母亲,一度为吉本追求过,在她的沙龙聚集巴黎及其他各处的著名才子,却无意中或勉强教育她的孩子。

1776年4月22日她出生于巴黎。内克尔夫人坚持做她的首席家庭教师,并且灌注她大量的历史、文学、哲学、拉辛、理查森、加路文、与卢梭的混合,吉尔梅以时髦的敏感忧虑哈罗(Clarissa Har-

low)的分析方法有一比死更差的结局,以青年的热诚怀疑卢梭的自由理论,但是她费力的证实对加尔文教义之强烈反感,并且抗拒每日有助益于她的不可缺的神学与宗教戒律,她更加躲避她生病、独裁的母亲,并且爱上她善良但却放任和节俭的父亲。这是使她维持长久孝顺的唯一结合;这使她在其他方面的感情不深入与不稳固。“我们的命运,”她写着,“将永远地结合我们,如果命运使我们成为同时代的人。”<sup>⑧</sup>同时,由于超越的智慧搞乱她的情绪,她被允许,从早熟的发情期起,参加她母亲之有才华人的定期聚会;在那里她以敏捷的领悟与巧妙的应答取悦学者。此时她才17岁就已成为沙龙的名角。

依目前情况便是不易为她找寻一位配得上她的智慧与她未来幸运的丈夫。她的双亲建议皮特,英国政界之蒸蒸日上的显赫人物;杰曼用她母亲反对吉本同样理由予以拒绝——在英国没有足够的阳光,并且在那里的女人是美丽但却不为人所知的。已经破产的施特尔(Eric Magnus Stael von Holstein)男爵,向她求婚;内克尔夫妇阻止了她接近,一直到他成为瑞典驻法国大使为止。这事发生后,杰曼同意嫁给他因为她期望更加独立自主像一个妻子而非像一个女儿。1786年1月14日,她成为斯塔尔·施特尔夫夫人;她年方20,而男爵是27岁。我们确信“她到结婚时才了解性爱”,<sup>⑨</sup>但是对于每样事物她都是聪明的学习者。主持婚礼的布夫莱尔(de Boufflers)伯爵夫人,描写新娘“受到钦佩她才智的宠坏以致她难以了解她的缺点。她是过份的傲慢与顽固,并且她自信配得上任何像她年纪的人是我从未见的。”<sup>⑩</sup>她不很美丽,并具有男性的体格与思想;但是,她的黑眼睛闪烁着生命力,并且在谈话中她没对手。

她居住在巴考大道(Rue du Bac)的瑞典大使馆,不久她在那里设立她自己的沙龙;而且——她的母亲正生着病——她在她父亲银行上面的公寓中监管她的沙龙。内克尔在1786年被财政部革职,但在1788年他复职并帮助架开大革命的威胁。现在他虽有百

万财富，仍然是巴黎人的理想，并且热心的以文章与口才支持他的杰曼，有她值得夸耀的理由。政治，次于无节制的爱，成为她的饮食。

由于内克尔的建议路易召集三级会议；克服了内克尔的反对，他命令3个阶级分开坐着，以维持阶级的区别。1789年7月12日，他二度撤职内克尔，并命令他立刻离开法国。他与内克尔夫人驾车至布鲁塞尔，杰曼愤怒地跟随他们，施特尔忘却他的公职，伴随着她的幸运。7月14日巴黎民众袭击巴士底狱并威胁君主政体。惊恐的皇帝派了一名朝臣追及内克尔，并且召他回到巴黎办公处；内克尔来到，人民欢呼他。杰曼赶至巴黎，其后，一直到9月大屠杀，每日感受着大革命的热风。

由于她的早期与她的父亲，以及她的政治与她的收入之间的关联，她支持三级会议，但是要求一个在君主立宪下的两院制的立法，以确保代议政府，人民的自由，与财产的安全。当大革命持续着，她用她所有的影响力节制雅各宾党人并且鼓励吉伦特党人。

然而，她用她的道德哲学超越雅各宾党人，几乎所有遇见她的人合理地认为他们的婚姻是财产而非内心的结合，应该有一或二位情妇给予他们刺激与艳事，但是他们相信相同的特权不能给予妻子，因为她的不贞将惹起财产继承之分裂性的不确定。杰曼未受此论据影响，因在她的情况——仅仅是个孩子——现在谈论的以及将来的财产几乎全是她自己的。她决定她应无拘无束地寻求浪漫史，甚至尝试其他的床铺。

她不久即失去对她丈夫的尊敬。他是太顺从而不令人有趣，并且太拙劣而无偿付能力。她不反对他收克莱龙小姐(Mlle Clairon)为情妇，但他花费他官方收入在一个70岁的女演员身上，忽略他所担任的大使职责，赌博并输钱，并不断累积他妻子与岳父不愿支付的债务。因此她结交过几个爱人。虽然，她在Delphine中表示，“上帝与爱之间我承认除了我的良心外并无媒介者”；然而良心能

被支配。她的第一个的合作者是塔列朗——奥坦(Auton)的前任主教——在誓言之易曲性上其赞同她。在他之后为基伯特伯爵,最后为十全十美的莱斯皮纳斯(Lespinasse);但是,他死于1790年,年方47岁。早在一年前杰曼已与纳尔博内(Louis de Narbonne-Lara)有着较深与较耐久的情感。他是不合法婚姻产生的儿子,并且他自己,33岁,是几个私生子的父亲;并且俱有无门第年轻人很少能学到的安闲与优雅的风度。由于社会的遗传性他是完全支持贵族政治反对“突然发迹的”资产阶级,但是杰曼使他了解她的君主立宪政体之观念——资产阶级将与贵族及皇帝分享权势。如果我们能相信她所说的,纳尔博内“为着我改变他的命运。他断绝他的爱慕并且奉献她的生命给我。总而言之,他使我确信……他以拥有我的心做他自己的幸福,如果他无法挽救的失去它,他可能活不下去。”<sup>⑥</sup>

1790年9月4日,内克尔,他的自由政策受皇帝周围贵族的破坏,因而辞职,并与他的妻子隐退至他在科佩的别墅过暂时平静的生活。杰曼于10月加入他们,但是她很快即厌倦瑞士的宁静,又匆忙回到她称之为比较令人愉快的“巴考大道的贫民窟。”<sup>⑦</sup>在那里她的沙龙不断传出拉斐德、孔多塞、塔列朗、布里索、巴纳、纳尔博内与她自己的声音,她不愿意为才气焕发的谈话立下榜样;她渴望在政治活动中扮演一角色,她耽迷于导引法国从天主教教义到基督新教义的美梦中,但是她希望,借她沙龙中的著名人士,使大革命在君主立宪政体中获得一和平的休止处。得到拉法埃脱与巴纳协助,她获得纳尔博内为陆军部长的派命(1791年12月6日)。安托瓦妮特不情愿赞同此派命。“斯塔埃尔夫人有什么荣耀,”她评论道:“何种乐事为她所有以致整个军队听其支配!”<sup>⑧</sup>

纳尔博内作的太快。1792年2月24日,他呈递路易十六一份备忘录,建议皇帝与贵族断绝关系,并且将他的信赖与支持给予有财产的中产阶级,因其保证维持法律与秩序及有限的君主政治。其

他的部长愤怒地抗议；路易屈服于他们，并撤职纳尔博内。因此杰曼不实在的计划失败；并且她的敌手，罗兰夫人，经由布里索获得她丈夫为内政部长的派命，因而让她受到有如盐置于伤口之痛苦。

杰曼在巴黎过它恐怖的1792年的大部分。1792年6月20日，她证实由群众率直态度所产生图勒里宫的暴风雨使她骇怕（如渡过塞纳河就好了）。“他们可怕的誓言与喊叫，他们威胁的姿态，与他们杀人的武器，呈现出恐怖情景而这能永远毁灭人类应当激发的尊敬。”<sup>⑧</sup>然而那个大事变的日子（虽然法国人称为民众的暴乱）是一温和的预演，受到皇帝头上大革命的无边帽的表彰为之平息。但是，在8月10日，她证实，根据她的安全隅石来看，流血的占领图勒里宫的暴徒并未静止，一直到皇帝与皇后逃亡，并得到立法会议时刻的保护为止。胜利的暴徒开始拘留每一可利用的贵族；杰曼用她幸运大方的保护她有爵位的朋友。她将纳尔博内藏在瑞典大使馆的隐密处；她顽强的抗拒，终于转移搜索巡逻的目标；并且于8月20日前纳尔博内是安全的在英国。

9月2日更恶劣之事仍然发生，极端愤怒无裤党人领着被逮捕的贵族与他们支持者走出监狱，并且当他们现出时谋杀他们。斯塔埃尔夫人几乎不能逃避那个毁灭。帮助许多她的朋友逃出巴黎与法国之后，她在那晴朗的9月2日乘坐一部六匹马与穿着制服仆人的华丽马车，并准备驶向城门；她有意穿着时髦和佩戴大使夫人的勋章并希望借此获得外交礼仪。她在出发时，马车被“一群从地狱冒出的老妇人”阻止。粗鲁的女工命令前排左马骑手驶向公社的总部；一名法国骑兵从那里引导这伙人穿过怀敌意的群众到达市政厅。在那里“我走出为武装暴徒包围的马车，并且前进通过长矛的墙篱。当我踏上那也是长矛竖立的楼梯时，一个男人用长矛对着我的心脏。保护我的警察用他的军刀挡开它。如果我在那时摔倒，我的性命将结束。”<sup>⑨</sup>在公社总部她找到一位朋友因而获释；他护送她至大使馆，并且给她一份护照，那使她在次晨安全的离开巴

黎,并经过长途旅行至科佩。那天,群众举着插在长矛上的拉伯尔公爵夫人的头,游行经过皇后的囚禁处。

杰曼于9月7日得到他双亲的军械。10日他们得知日内瓦发生革命,只得向东移至较接近洛桑(Lausanne)的洛雷(Rolle)。1792年11月20日,这位26岁的母亲生了一个儿子阿尔伯特(Albert),而且在她死亡冒险中一直被他携带着。可能他为纳尔博内所生的,但她的丈夫被骗相信,或假装,他是父亲。在洛雷,与在科佩,她使许多在恐怖时代来临前逃走的男子与妇女——有或无爵位的,获得短暂避难处。“既非她也非她的父亲在灾祸面前担心舆论。”<sup>①</sup>

杰曼得知纳尔博内提议离开他在英国的避难处并来法国表明护卫路易十六,她不能忍受他有如此危害他自己的想法;她必须到英国劝住他。她从法国渡过英吉利海峡,并于1793年1月20日在接近伦敦之米克勒姆(Mickelham)的朱尼珀会堂(Juniper Hall)与纳尔博内会合——路易被斩首的那天。她以前的情人震惊此消息以致未给予她太多的欢迎;他贵族的血统再使他固持己见,并且由于他对他情妇的爱护,他不再有为皇帝哀伤的诚心。塔列朗经常从伦敦附近来拜访她,并且用他的幽默带给他们愉快。伯尼(Fanny Burney,英国小说家,1752—1840年)加入他们,并且摘录麦考利(Macaulay Dame, Rose,英国小说家,1889—1958年)的批论“以前从未听过此类的谈话。他兼备最灵巧的口才,最敏锐的观察,最有才气的隽智,最谦恭的风度,以致使她心醉神迷。”她拒绝相信纳尔博内与杰曼通奸的闲言,她写信给她的父亲,一位著名的音乐历史家:

这通告……对我而言完全是新的,并且断然相信它为粗鄙的毁谤。他爱她更加温柔,但却如此公开,如此率直,如此真挚,并且具有毫无保留之奔放骄态。她是非常平凡,而他是非常英俊;她的天资必然能使她独特的魅力

与他相配……我想你不能与他们相处一日，并且察看得出他们的交往不是属于纯洁而高贵的……友谊。<sup>⑥</sup>

当伯尼确信这显赫的一对正生活在无耻的罪恶中，她悔恨的放弃访问朱尼珀会堂。

这个小团体也逃避较早期的移民，其控诉他们长久卫护大革命。1793年5月25日，杰曼到达奥斯坦德(Ostend)；当时，她仍是瑞典大使夫人，因而她安全地抵达伯恩(Bern)，在该处她遇见她临时的丈夫，并伴随他至科佩。她出版《一名女子对审判皇后的反映》(Reflection on the Trail of the Queen by a Woman)，激烈地请求宽恕玛丽·安托瓦妮特。但是，皇后被斩首于1793年10月16日。

内克尔夫人死于1794年5月。她的丈夫用那只有长期结合方可产生之深奥情感哀悼她。杰曼，未被击溃，迁至在洛桑附近的梅泽雷(Mézerey)住宅，设立一新的沙龙，并用黎丙(Ribbing)伯爵力量忘却其他所有一切。纳尔博内，迟迟地来到，发现他自己被替换，因而回到他以前的情妇。1794年的秋天，一位高身材，满脸雀斑，红发，瑞典籍的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其年约27岁，在里昂遇见杰曼，并与她开始文学与爱情之有堆堞的结合。

于其时罗伯斯比尔已失势；温和主义者得权；现在她可回到巴黎，她在1795年5月，与她的丈夫和好，并且重新启用她在瑞典大使馆的沙龙。在那里她聚集濒于灭亡的国民公会之新领导者——巴拉斯、塔利安、安格拉，与文艺界名人像谢尼埃。她如此热烈的投入政治以致一位代表，借国民公会策划君主主义的阴谋，以及她的丈夫与她人之妻通奸的理由抨击她。新的公安委员会命令她离开巴黎；1796年1月1日之前她回到科佩。在该处，于康斯坦和她的书本之间，她写了一篇使人伤感的文章《情欲的影响》(De l'influence des Passion)；充满着卢梭的论调，附和《少年维特的烦

恼》(The Sorrow of Werther),并且赞美自杀。她在巴黎的朋友准备着狂喜的轻松歌剧,五人执政团通知她可以回巴黎,但是她不得近于首都20英里以内。她与康斯坦定居于赫里瓦克斯(Hérivaux)的一所从前的修道院。1797年春天,她获准在巴黎与她的丈夫会合。6月8日,她在那里生了一个女儿——阿尔贝蒂娜(Albertine),但是她的父系是不明。在这些复杂过程里,她经由巴拉斯,让塔列朗从放逐中召回,并且获得他为外交部长的派命(1797年7月18日)。1789年施特爾男爵失去他的大使职位。他给予杰曼亲切的分离作为宽容的报答,并且隐居在一所公寓,那是现在的Concorde阅兵场,并且在1802年去世。

1796年12月6日,在塔列朗为一些从意大利回国的胜利者所开的庆祝会上,她第一次遇见拿破仑。他向她说了赞美她父亲的话。在她生命中她首次不愿回话:“我有点为难,开始时有些钦佩,接着有些害怕。”<sup>⑧</sup>她愚蠢地问他:“在活着或已故的女人中最伟大的女人是谁?”他顽皮地回答:“一位生过最多孩子的女人。”<sup>⑨</sup>四天之后当他在卢森堡王宫的戏院接受督政欢呼时他再度见到她。她被他谦虚与高傲的气质所迷惑;现在,她感觉,他是携带法国命运的人。她渴望成为他的心腹,与他共同承担伟大事业,或者把他算成为她的胜利之一。1799年11月10日,当吕西安告诉她拿破仑在圣克劳德获得胜利并被提名为首席执政(First Consul)——实际的法国统治者,她高兴的像秘密的情人。她觉得骚乱与暗晦的时代已终了,并且出现另一个英雄与光辉的时代。



## 第九节 回 想

虽然法国大革命的故事被叙述得像古代历史一样不偏不私，它在相同界限内仍面临哲学上的论题：大革命是由它的原因或结果证明为正当吗？它留给法国人民或人类任何意味深长的利益吗？没有他们在纷乱与苦难中的牺牲，它的利益能被达成吗？一般说来，它的记录显示任何有关革命的终止吗？它有任何助益于阐扬人类本性吗？在此我们仅说到政治革命——政府在人员与政策方面迅速与剧烈的变动。无暴力的发展我们应称为进化，不变动政府形式却快速与激烈或不合法的变动人员将是一场政变，任何公开地抗拒现存的权势是反叛。

法国大革命的原因，简言之，是(1)法务院的反叛因而削弱皇帝权力与贵族的忠诚；(2)奥尔良替代路易十六王位的野心；(3)资产阶级反抗国家在财政上的不负责任，政府干预经济，国家面临破产时教会不合作的财富，和贵族的金融、社会，与任命之特权；(4)农民反抗封建的税收与特许状，政府税收，与教会什一税；(5)巴黎民众反对阶级压迫，法律的无能，经济的不足，高物价，与军事威胁。资产阶级与奥尔良以金钱支持杂志与演讲者的宣传，群众的管理，与第三阶级重组成为指挥革命宪政之国民会议。民众提供勇气、臂力、鲜血、与暴力；胁迫皇帝接受国民会议与宪法，并且恐吓贵族与教会放弃他们的封建税与什一税。也许我们应将仁慈与优柔寡断的皇帝反对流血列为次要原因。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如此众多，如此复杂、不同、与持久，以致人们必须以公平立场写 19 世纪的历史。

1. 政治的成败是明显的：自由与部分有产阶级的农民取代封建制度；民事的法庭取代封建制度的；财产有限的民主政体取代君主专制政体；适合商业的资产阶级取代有爵位的贵族成为最有力的管理的阶层。随着民主政治产生的是——至少在简短的警句(Phrase)与希望中——法律前与机会上的平等，以及言论、信仰、与出版的自由。这些自由即因人类能力的天生不平等，与他们在住所、学校、财富上的不平等为之减少。几乎与这些政治、经济、法律的解脱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大革命的群众扩张他们的影响力至意大利北部、莱茵地区、比利时、与荷兰；在那些地区，封建制度也为之瓦解，并且在拿破仑崩溃后它并未恢复。在这方面来说胜利者是束缚的解除者，其以他们统治所榨取之钱财玷污他们的天才。

大革命——借他们封建制度之男爵领地与通行税，他们不同的出身，传统、金钱、与法律——统一半独立的省成为一个有国家军队与国家法律之中央统辖的法国。这个变动，如同托克维尔(Tocqueville, Alexis Henri Maurice Clérel de, 法国政治家及作家, 1805—1859年)提出的，在波旁皇族统治时期发生；没有大革命，它可能依赖逐渐超越省界的全国性商业统一的影响予以达成——非常像在美国全国性的经济迫使“州的权力”腐蚀而使联邦政府为之强大。

同样地，没有大革命，这可能经由农民的解脱，以及增加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势与政治力量缓慢的达成。在国民会议期间(1789—1791年)的大革命被广泛地证明有它长远的影响。但是在1792—1795年间的大革命是野蛮谋杀的插曲、恐怖行为、与道德崩溃，而这些却不适当地以外国阴谋与攻击作为辩驳的理由。1830年，于君主立宪政体建立之前的另一次革命所产生的效果是近乎1791年所达成的。

大革命从统一法国所获利益被国家主义造成新的集团仇恨抵销掉。18世纪，知识份子阶层趋向于弄淡国家之间文化、语言、与

服装的差别；军队拥有外国的将领与士兵。大革命以征集入伍的士兵取代这些通晓数种语言的战士，并以国家取代王朝成为效忠的目标与战争的源泉。军队的将领们接替贵族官员的社会地位。爱国军队的势力压倒旧政权的懒散受雇者。当法国军队进步于戒律与荣誉时，它是国家混乱时法治的唯一来源，也是由政府无能与民众暴动所引起混乱时的唯一避难处。

无可置疑的，大革命促进法国与更远地方的自由；暂时它延伸新的自由至法国殖民地，并且解放他们的奴隶。但是个人的自由包含它自己的公正惩罚(nemesis)；它趋向于增加直到它超过社会秩序与团体生存的必需界限为止；不受限制的自由是绝对的混乱。此外，为大革命工作所需能力的性质与建立新秩序所需的性质是十分地不同：前者的工作俱有愤恨、热诚、勇气，并且忽视法律，后者需要忍耐、理智，合乎实际的判断，并且尊重法律。因为新的法律不受传统与习惯的支持，他们通常依赖武力作为他们的制裁与支持；自由的提倡者，成为或屈服，权势的支配者；并且这些人不再是暴徒的领袖，而为军事政府保护与监督下有纪律建设者之领导者。大革命是幸运的以致能逃避或缩短独裁政治并为后代保存自由的利益。

2. 大革命经济的成效是自耕农制与资本主义，而且各产生它自己循环不息的影响。有财产的农民成为有权势的保守派，而且这使无财产的劳动阶级之社会主义运动徒劳无功，并在大革命与它余震的动乱之一世纪期间做为国家基础稳定之锚。资本主义在乡村受到障碍以致向都市发展；可自由流动的货币替代土地财富成为经济与政治的力量；自由企业逃避政府控制。劳动阶级借“市场”中的竞争——不为法律阻止的经济活动的力量，赢得他们决定价格、工资、产品、成功，与失败的战争。财货在各省间的移动不受内陆通行税的阻碍与延搁。工业财富增加，并且逐渐集中在最高阶段。

大革命——或者立法——不断重分配集中的财富，但是能力不等或特权使它再度集中。不同的个人才能必需有不同的报酬。天生的优越条件产生环境或机会的优势。大革命尝试减少这些人为的不平等，但是他们很快恢复，并且最快处于自由政权之下。自由与平等是敌对的：人类享有的自由越多，他们越易获取他们天生或环境优越的成果；因而在政府偏袒自由企业与支持财产权情况下不平等为之增加。平等是不稳定的均衡，而且任何继承，健康、智慧、或性格上的重要改变将使其迅速结束。大多数的革命发现他们，如同在独裁国家，仅能用限制自由方法抑止不平等。在民主政治的法国不平等是无拘束地增加。至于博爱，它被断头台摧毁，并且终于成为穿马裤的一项协议。

3. 大革命文化的成效仍影响我们的生活。它颂扬言论、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它却苛刻的削减这些自由，在战争的沉重压力下，拿破仑结束了它，但是这原则幸存并在19世纪中历经许多战斗，并且成为20世纪民主政治值得接受的实施与要求。大革命计划而且创始全国性学校制度。它激励科学成为可替换神学的世界观。1791年大革命，政府指派一委员会受拉格朗日率领，为新近统一的法国发明，重量与尺寸的新制度；这合成的公制于1792年正式采用，并于1799年成为法律；它必须通过各省打开一条生路，并且到了1840年它才获胜；现在它困难地取代大不里颠的12进位制。

大革命开始隔离教会与政府，但在势不可挡天主教的法国以及传统地依靠教会给予它人民道德教育的情况，这显得十分困难。这隔离到1905年才完成。现今在生命持久的神话压力下它再度削弱。为尝试进行隔离，大革命努力传布自然道德规范；我们觉察到这已失败。从某方面来说19世纪的法国历史是长久的并且仍痉挛般定期的企图从大革命的道德崩溃中复苏。20世纪接近它的目标，却未发现可转变人类兽性成为道德之宗教的自然代替物。

大革命为政治哲学留下一些课程。它使扩张的少数派了解人

性在各阶层是相同的；那些革命家，增加权势，举止像他们的祖先，并且在有些情况更为粗鲁；将罗伯斯比尔与路易十六比较。民众在觉察到人类强烈的野蛮本性不断地对文明的克制施以压力后，变成大革命宣言的怀疑论者，不再期待清廉的政治家与神圣的“上议院议员”，并且了解大革命仅能达成如进化已准备的与人类天性将许可的。

即使有它的短处——可能因为它的无节制——大革命在回忆、感情、希望、文学，与艺术方面留给法国与其他的国家——从苏俄到巴西的深刻影响。甚至到了 1848 年，老人经常告诉孩子们关于动乱时期的英雄与恐怖以及那所有传统价值受到粗鲁、无情的怀疑。幻想与热情很少像以前那样鼓动，并且那种重现美景的较快乐状态刺激男人与女人不断尝试了解那历史性 10 年的高贵幻想，这是令人惊异吗？它的残忍故事使人变得悲观并且丧失各种信仰；在下一代将是叔本华 (Schopenhauer, Arthur) 与莱奥帕尔迪 (Leopardi, Giacomo)，拜伦 (Byrons) 与缪塞，以及舒伯特 (Schubert) 与济慈那样的人。而且这包括有希望与鼓舞勇气之士，像雨果 (Hugo, Victor Marie)、巴尔扎克 (Balzac, Honoré de) 戈蒂埃 (Gautier)、德拉克鲁瓦 (Delacroix, Ferdinand Victor Eugène)、柏辽兹、布拉克 (Blake William)、雪莱 (Shelley, Percy Bysshe)、席勒、贝多芬 (Beethoven, Ludwig van)，其在古典派的谨慎、传统、禁律，与抑止之背景中表现浪漫派的情绪、幻想，与欲望之高升。有 26 年之久，法国通常在大革命与拿破仑——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与他最伟大的浪漫史——的魔力下惊叹与犹疑；并且半个世界常常受到这个充满事件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恐惧与鼓舞，然而这一高尚与困苦国家表现如此卓越与深刻为历史以前极少经历并且以后永不尝受。

第二部  
**法国大革命与英国**



## 第一章 英格兰在忙碌

处于 1792 年后反革命之首的——当拿破仑(Napoleon)的其他敌人,因不愿联盟,或于节节崩溃之际,处于抵抗拿破仑之首的——是英格兰的政府和人民,正蓬勃中的工商业,海军和纳尔逊(Nelson),以及心智和意志。不徐不疾,水到渠成;在战事爆发之初,领袖们和舆论是犹豫不决,恐怖惶惑,或激愤奋发的;诗人和哲学家们对革命的理念、革命军的热心和勇气;常报之以热情;但是,不久,他们却因伯克(Edmund Burke)的愤怒雄辩,和理想的社会制度中大屠杀和恐怖的新闻而变得痛苦了;当解放军变成征服者,置半个欧洲于法兰西的野心之下时,英格兰见到了几世纪来这个岛国的安全和自由赖以维系的欧陆列强的势力均衡,要维系于这次冲突之结果上了。

渐渐地,这个国家开始团结了。纵使她的盟邦一个一个地投降,她的贸易横遭阻扰,工商和财政濒临破产,她的劳动者们筋疲力竭,接受正雄踞欧陆、威吓着要以 50 万不败之师跨过英伦海峡的那位集卓越和恐怖于一身的科西嘉人的条件,是每天所听到的诱惑——自 1066 年起,英格兰纵然未曾有过这么大的挑衅,国王和国会却立场坚定,贵族和商人愿意付出重税,孑然一身的人甘愿征召入陆军或海军中服役,英格兰天下无敌的水手们,由溃不成军而进入胜利之境,不到半个世纪,这块可爱的土地,从 1810 年—1811 年的赤贫和濒临饥荒的边缘上脱颖而出,建立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最有声威和文明的一个帝国。



我们必须暂时放下这出戏剧和冲突,先去衡量一下使这次胜利、这次转变成为事实的土地和劳动资源,科学、文学和艺术,心智、教条和特质诸因素上去。

## 第一节 另一型式的革命

地理因素发生了某种作用。气候不很理想:由墨西哥湾流的北大西洋大海流带来的暖气团,与来自北极圈的强风不断地狂吹,这种冲突带给爱尔兰和英格兰充沛的湿度和雨水,使得土壤肥沃,公园常绿,森林茂密,街道潮湿;所以,一位怪杰曾喟叹道:虽然太阳从不曾照到过大英国协,它也从不在英格兰升起。拿破仑也深信那种夸张的说法:“你们英格兰没有太阳,”他告诉他的英国医生阿诺特博士(Dr. Arnott),他却纠正拿破仑说:“啊,有啊,我们有太阳;……7、8月中,英格兰阳光普照。”<sup>①</sup>他们住所的潮湿空气隐蔽了布莱克(Blake)的诗情,使特纳(Turner)的画才不得舒展,同时也许也造成了英国人的独特个性和制度。他们的岛屿使他们与世隔绝;但是,也保护了她抵御瞬息万变的各种风潮、艺术时尚、革命狂飙以及经常在海峡对岸的大陆上肆虐的战争大屠杀。他们纹风不动地站稳了脚跟。

倘若他们的岛屿是渺小的;但冲激或轻抚着海岸的海洋却唤起他们从事远洋冒险的意念;上千条流动的道路,前后左右地摇摆着,正诱惑着总是傲然屹立着的人们。上百块遥远的陆地,以其丰富的产品和市场,正等待着帮助英格兰从农业国家转变成工、商业国家和世界性的经济大国。无数海岸深沟提供了在海洋中寻求和平的出口,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船舶的安全港。在岛上,有

十几条可供航行的河流，和上百条与那些河流相连的运河。没有一位英国人的住处距他们入海的河流超过 75 英里之远的。

不列颠因工业革命而克服了地理上的障碍。她建造了当时号称空前的巨型商船，有些命名为“东印度”巨人号，航行半年即可抵达印度和中国。她酷爱海洋，视为是英格兰领土的延长，为控制那延长的领土，先与西班牙，接着与荷兰，而此时则与法国，战至濒临崩溃的边缘。她开辟通往各大陆和各大陆沿岸，通往非洲、印度、远东、澳洲、南太平洋，和南、北美洲的新水路；虽时顺时叛，但他们也渴望着贸易。唯有西北部的水路蔑视了这群永不满足的不列颠人，令他们徒手而回，却并不令他们屈服。

不过，那批商船队和保护它们的巡洋海军军舰大部分必须用进口的木材来建造；那些殖民地和贸易国的原料、金银、香料、食物和异果，必须以不列颠的工业成品来换取；那种类繁多的商品，必须靠工业革命来运送或资助。渐渐地，英格兰——特别是中部和北部两地——和苏格兰——特别是南部地方——从田野和农村，吸收了大量民众至市镇和工厂，从缓慢的家庭手工业或基尔特中吸收许多男女老幼，施以使用机械的训练，重组他们的经济生活，并为全世界生产大规模的成品。

一方方的园地帮助了这种转变。远在 12 世纪时，善变的英国人已计算到，他们使用大块土地比小块土地要有利可图。他们购下私有农地和公有地——农民们习惯上用来放牧和砍伐采薪的那些公有地和森林地区；他们雇佣的工人在一人监督之下在这批大规模产业上从事工作。15 世纪中，他们认为饲养家禽比耕耘收获更多，饲养羊群，尤为有利；因为此时，他们需要较少的人口，并且发现在凄寒而喜好肉食的不列颠和国外，有大量供应兽肉和羊毛的市场。愈来愈多的农地所有主出售或荒废了他们的农地，流向城市；体力充沛的自由民慢慢地消失了，同时也带去了英国性格中的旺盛和骄傲的素质。至 1800 年时，不列颠只剩下 1500 万头羊；据

一则笑话说,这群羊会吞噬人们。直至今今天,旅行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州郡中,就有农地和农作物寥落的印象,唯可见到有人居住的一些绿野和篱笆围起的土地上,羊群正懒洋洋地在啃着青草,以供羊毛滋长的养料;这就是这块富饶的土地的最后产品了。

我们毋需夸张;在这一时期中(除了1811年中,拿破仑的大陆围堵政策带来的几近饥荒的危机外)英国的农业,渐渐进入资本化和机械化,可不假外援而优裕地喂饱英格兰人民了。<sup>②</sup>栽培者们都深具信心,他们说服国会,通过“五谷法”(Corn Laws),以严峻的关税,阻止进口谷类的竞争。(译注: Corn 当时指任何谷类;在英格兰,通常指小麦;苏格兰,指燕麦。)纵然如此,迨至1790年时,迁往城市的农民,在从苏格兰和爱尔兰迁入的贫困移民的协助下,提供了使工业化成为可能的劳动力。

工业大部分仍停留在家庭中和工艺制作所中,但是大部分工业仍由地区性产销所左右;它没有组织成可供应分布在边远地区的各种市场的大规模生产作业。家庭或制作所的工人则在销给他原料和买卖成品的居间人的摆布之下;他的收入则因供需关系和竞争者的欲望而改变;通常妻子和孩子必须自早到晚与他一起工作,才能免于饥饿。<sup>③</sup>如果要符合城市人口激增的需要,或满足寻求国外物质或黄金的商人之要求,就要找出一些更有效的方法补充财政和组织工业了。

除了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警告鼓舞外,受到利润动机之刺激,英国的工业转向私人企业的方向发展,大多免于政府的支配。它从盈余中,从赚钱的商人手中,从征收田赋和房屋租金的地主手中,和从知道如何使金钱生息,并且以较法国同业要低的利润贷款的银行家手中募集资金,所以,个人和组合将资金供给提议以大规模机械、劳动者和有技巧的男女和儿童的努力,而结合农地和牧场的产品,以增加英格兰前所未闻的收益之企业家来使用。资金提供者监督资金的运用,并且以资金提供者的姓名冠于促使西

方世界改变的经济制度上。

这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计划。一次投资也许因经营方法麻劣，价格或市场波动，款式之改变，消费者无力购买而使生产过剩，或竞争者的新发明而毁于一旦。恐惧损失刺激起贪婪的欲望。工资必须要维持在最低水准上；对新发明一定要提供奖励；尽可能用机器取代人力。开采或输入铁砂以制造机器、装甲舰、桥梁和枪械。煤（所幸英格兰蕴藏丰富）必须开采以供炼制厂用作燃料，熔炼铁砂和锻钢。尽可能使许多机械结合成一种强大的力源；那种力源也许是风、或水、或拉磨粉机，或旋转螺丝的动力；但是，最好的电力厂便是如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设在伯明翰（Birmingham）附近的马太鲍尔顿发电厂（Matthew Boulton's Plant）所装置的一具蒸汽引擎（1774年）。若有足够的资金和周密的组织，任何一类机器都可由一两具引擎来操作，而每一具机器都可由赚取维持生活工资的一名男人或女人或儿童每天照顾12到14小时。工厂制度就此诞生了。

不久，林林总总的大烟囱在勃兴的工业中心——曼彻斯特（Manchester）、伯明翰、设菲尔德（Sheffield）、利兹（Leeds）、格拉斯哥（Glasgow）和爱丁堡（Edinburgh）——上空冒出浓烟。1750年时的不列颠，有两座城市拥有5万居民；1801年时，有8座城市；1851年时，可能增至29座。便于运输原料、燃料和成品到工厂，市场和港口的道路也铺设完成。一次可载客8位，每小时可行驶10英里的公共定期马车开始大量生产使用。<sup>④</sup>大约1808年时，托马斯·特尔福德（Thomas Telford），1811年时，约翰·麦克亚当（John McAdam）（两人均为苏格兰工程师），设计如今日的简易铺设的高速公路一般的新道路路面。1801年时，乔治·特里维西克（George Trevithick）制造了第一具蒸汽火车头，在铁轨上拖运一节车厢。1813年时，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制造了改良的火车头；1825年，斯蒂芬森开始首次定期蒸汽火车旅运——

只限于斯托克顿(Stockton)和达灵顿(Darlington)之间。1801年时,一艘小型的蒸汽船开始在一-条苏格兰的运河上航行;1807年时,博尔顿(Boulton)和瓦特工厂仿造由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建造、同年8月航行在纽约至奥尔巴尼(Albany)间的克勒蒙特(Clermont)的蒸汽船模型,制造了一艘客运蒸汽船。同时,伦敦、哈里奇(Harwich)、纽卡斯尔(Newcastle)、布里斯托尔(Bristol)、利物浦(Liverpool)和格拉斯哥正在发展为海洋通商所需要之海港和设备;纳尔逊则在阿布刻(Abukir)和特拉法尔加(Trafalgar)为英格兰争取到了制海权。

1801年时,英国政府对大不列颠(含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作了首次科学调查,以了解愤于私权受侵之公民的恐惧,作为步入组织化的先声。<sup>⑤</sup>当时的人口总数为1094.2646万人(美国当时只有600万人)。至1811年时,人口已增加到1255.2144万人。<sup>⑥</sup>也许,这种增加正反映了粮食供应的增加,医疗之改良,和婴儿和老年死亡率依次下降的结果。伦敦在1811年时,人口增至100.9546万人,但是,最大和扩张最速的则在工业化的北部和西部。1811年时,不列颠从事农牧的家庭,约为89.5998万户;在贸易或工厂方面,有112.8049万家,其他职业方面有51.9168万家。<sup>⑦</sup>政府用批准私有土地的方法去抑制农业;并且用示惠自由企业和保护关税、和禁止劳工联盟谋取较好工资以鼓励工业发展(1800年)。政府藉改良道路和运河及建造一支无敌舰队以示惠商业。商人、工厂主和财政家们获得大量财富,有些人甚至用钱买到了国会中的席次。

1800年时,不列颠的经济蓝图上显示,在最上层的,仍然是一群贵族阶级,但是,却是正在逐渐式微的土地所有权的一群经济上主宰者;与他们合作的是一个全部是贵族或士绅组成的国会。在他们之下和周围,是一群正在扩展中的态度粗鲁的企业中产阶级之商人和工厂主,以他们的新财富和卑劣的礼貌,要求取得更多的政

治权利,在他们的下面是一群包括学养湛深的物理学家,以至剽悍、恶毒的新闻记者;最下面的一群是失去所有、依靠救济为生的农民,和从事挖掘、终日不见太阳的矿工,一群到各处去铺设路面和开辟运河的工人,和一群将他们的悲惨命运描绘在污染天空中的饥饿、散乱、士气低落的工厂中劳工大众。

## 第二节 基 层

如果我们现在回顾一下 1800 年时不列颠工厂工人的状况,我们就不一定会夸张这个时期他们的卓越成就之情形了。或许“愉快的英格兰”(Merrie England)有许多美丽的风景。工厂劳动本身并不是当时不列颠工业之主要特征,大多数工业制品仍然在农村或都市家庭中的纺织机或旋盘上、或由工匠自己的制作所中生产,工厂则大部分仍限于棉花、亚麻布或羊毛的生产。纵使有这些限制,工厂在这一世纪中所扮演的角色却是英国史上最悲惨的一出插曲。

工厂本身就设立在贫民窟和覆裹在由工厂自己喷出的恶臭与浓烟之中,工厂内部通常都布满了尘垢和脏乱,通风设备麻陋,光线暗淡——直至 1805 年,各处装置了煤气灯时才有所改善。机器装备达到要求照顾它的人随时留心警觉、并且在一天工作的 12 到 14 小时中不停地忙碌的速度;因日后的一些新发明的机器节省了劳动和人力,中午有一小时可供休息午餐之用,<sup>④</sup>然后苦工就继续开始,大多数情形一直要工作到晚上 8 时才止,劳动力则随时由流离失所的农民或不注意节制生育的妇女来补充。

在雇佣工人上,妇女优先于男人,而童工又优先于妇女,盖要

求较低工资之故；1816年，41家苏格兰工厂共雇佣的1万工人中，男人为3,146人，妇女为6,854人，18岁以下之童工占4,581人。<sup>⑧</sup>工资更低廉、而普遍受到欢迎的，则是由穷人救济所各级主管送到工厂去的孤儿或穷人家的孩子；1802年的《工厂法》(the Factory Act of 1802)制定使用这些“学徒工”的最低工资给付标准，禁止他们每日的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但是国会拒绝给付指定强制实施该法案的委员们薪津。<sup>⑨</sup>一般而言，童工在不列颠的工厂中继续到1842年才停止。<sup>⑩</sup>

1800年时，一位伦敦的成年男性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周18先令(相当于1960年时的美金23元)，在乡村中，大约不到此数的1/3。<sup>⑪</sup>就一般而言，一个家庭的收入决定于维持工作所需劳力的总和；但是这却意味着包括参加工厂劳动的妻子和小孩在内。<sup>⑫</sup>雇主辩称，工资一定要降低，才能使工人们上工，有些劳动者周末要玩上两三天，当他们再上工时，仍然沉醉在血液内流着的酒精中，<sup>⑬</sup>只有饥饿才能把他们带到机器房去。

当然也有些改进，有些雇主替他们雇佣的人给付房租和燃料费用。消费品价格低廉——平均大约为1960年大不列颠价格的1/3。<sup>⑭</sup>直至1793年，与法兰西开战时，工资大抵与物价同时涨落；那时，各个阶层在收入上都受到伤害；但是，当工人人们的工资压低到生活所需以下时，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就更大了。

他们居住在空气中充满了毒素的市镇上，滋生细菌的犹太人街，拥挤的住宅区——有时是潮湿的地窖——经常见不到阳光，灯光暗淡，清洁如海市蜃楼，家庭争吵令神经疲惫，私生活如空中楼阁，妇女唯一的避难所是信神，而男人则是公共场所。酗酒是每天的常事，家庭从水井或公共抽水机中取水；当这些地方的水位不够时，妇女就从最近的河流或运河中去汲水，这些河水或运河中充满了因工业、家庭或人类排泄的污秽。<sup>⑮</sup>如同废水一般，卫生也十分简陋，排水沟稀少。“我深信，”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

当时是牛津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在1890年时写着：“就可资征信的现存资料,英国史上没有一个时期,人力劳动的状况,要比1782至1821年的40年间更糟糕了;在这段时期中,工厂迅速地累积财富,在这一段时期中,地价增加了一倍;”<sup>⑧</sup>这种情况一直延长到1840年代。1795年和1840年间在苏格兰和英格兰长大的卡莱尔(Carlyle)总结不列颠工厂工人在那一段时期中的状况,认为是英国人比他们中世纪的农奴时期的状况为优裕。工业进步使无产阶级分享到一点成长中的财富,在举止、服装、娱乐和语言上却仍留下粗俗的痕迹,“文明创造了奇迹,”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于访问曼彻斯特时写着:“受文明熏陶的人几乎又回到野蛮上去了。”<sup>⑨</sup>荣耀归于曼彻斯特及其同类城市从它苦难的日子起所作的巨大进步。

最先于1601年时制订的《穷人法》(the Poor Law),对穷人提供了一些帮助,该法由通常集合接受救济者到工厂去工作的教区官员所执行,它是用加于户长的特别税来资助的,户长们抱怨他们的税赋一无所成,却鼓励了无限制增加的生育率,他们提议将税款移作防止社会紊乱的保险金。1795年后,在许多地区,救济金的比率是以补助认为不敷维持生活所需之工资而调整的;有些雇主即利用此种利益而维持低工资给付政策。

尽管有这些中间补助救济办法,当19世纪开始时,工人们不满的情绪达于危险点。直到1824年,虽有防止改善给付的禁令,他们却仍秘密地组织了;虽禁止罢工,他们却仍罢工;解散之后,他们重新再罢工。<sup>⑩</sup>如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等这些改革者警告国会的,除非工厂状况改善,损失不费的暴动将有增无已,不满的情绪因与法兰西重启争端而受到扼制(1803年),当战争拖延下去时,不满的情绪却又增加了,到1811年,竟演变成公开的叛乱。叛乱并非由工厂的工人领导的,而是由诺丁汉(Nottingham)城内或附近的家庭和小规模制作所的制鞋带和袜子的组织所领导的,这



群男人和妇女，依然记得农村空气清新的生活，也许他们与忙碌在织布机边的工作对照之下，对那种生活更向往之故吧！他们愤慨屈服于租给他们纺织机，供给他们原料和以他或他的股份及资本供应者决定的比例买走他们产品的针织机商人，尤其是，他们恐惧，即使目前的工作，不久也将因繁荣的工厂和许多功能强大的纺织机而失去，在他们的盛怒之下，他们决定捣毁他们可能碰到的象征他们的奴隶制度的一切机器。

一位名叫奈德或内德路特(Ned or King Ludd)的小人物，也许是一位神秘人物，组织起这群愤怒的编织工人，并为他们的暴动拟订了计划。1811年秋，属于“路特派”(Luddites)的各个小队侵入各地区，捣毁了他们所发现的每一具织布机。这一运动经诺丁汉蔓延到兰开夏(Lancashire)、德比郡(Derbyshire)、曼彻斯特郡，并且继续了1年(1812年)。这群捣毁机器者，除了在雇主命令他的工人向他们开火的情形下，不伤及任何人；罢工者把雇主揪出来就地杀死。半个英格兰战栗在恐怖中，会令人想到法国大革命的情形。“当此之时，”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写着：“除了陆军以外，没有别的力量能保护我们不受到这场大灾难的恐怖所威胁，一场穷人反抗富人的叛乱，能依赖陆军多久，是一个我不敢自问的问题……。这个国家在我们的脚底下颤栗。”<sup>⑨</sup>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一位精力旺盛的自由派新闻记者，在下院替暴民辩护，诗人拜伦(Byron)在上院发表有利于他们的一篇热情生动的演说。首相利物浦爵士(Lord Liverpool)，在国会中通过了一些严峻的法律，并且派遣一个团的兵力去压制叛乱。叛党领袖遭到围捕，在约克郡(York)的群众审判上简单地定了罪(1813年)；有些被驱逐出境，有些当众吊死。机器加倍增加。直到1824年，没有立法救济以纾解不列颠的劳工。

### 第三节 忧郁的科学

经济学家给予工人极少慰藉。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1798年一篇“论人口原则”的文章中(*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解释提高工资是无用的,因为这样会导致大家庭制度,增加依赖粮食供应的人口压力,不久将会回复到人类自然不平等所产生的永久结果之贫穷上去。<sup>④</sup>在他这篇著名文章的补遗中(1803年),马尔萨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工资铁则》”(iron law of wages):“劳工的工资永远受到需要劳工的比例所节制。”<sup>⑤</sup>在《政治经济原则》(*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0年)一书中,他警告节俭不能太过份,因为节俭会缩减投资和生产;他辩护“收益”(从财产投资上的回报)为“目前的勇气和智慧,和过去的精力和机诈的报酬。”<sup>⑥</sup>他同意伏尔泰(Voltaire)富人的奢侈为有技巧的工匠提供良好就业机会的说法。在自由盛行的时期,他建议公共工程为生产缩减时期中增加就业的方法。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接受了他的朋友马尔萨斯的一般原理,并在它们上面建立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与税赋的原则》(*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17年),而成为卡莱尔所谓的“忧郁的科学”之经典著作达半个世纪之久。<sup>⑦</sup>李嘉图是一位在伦敦交易所发迹的荷兰犹太人的儿子,他皈依唯一神教,娶了一位贵格派(Quaker)的女子做妻子,设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赚了一大笔钱,从事业上退休下来(1815年),写了几篇深奥难解的论文:主要是论财政的。1819年时,他被选入下院,他在下院抨击国会的腐败,辩护集会自由、言论自由、贸易自由、组织工会;

并警告资本家，避免不列颠的地主凭藉他们提高租金的权力，不久将吞并他们在工业上的收益。在他的划时代的论文中，他声辩提高工资决不是真实的，因为由于生产成本增加，随之而来的涨价，不久就将增加的工资抵销；劳工的正当工资是维持他生存和繁衍子孙（不增加人口）所需之总和。李嘉图藉生产所需之劳动总和来辩护商品的价值（不是价格），留给了马克思（Marx）一点借口。

他并不如他的科学一样的忧郁。他和马尔萨斯终生成为莫逆之交；不过，在私底下和文字上时常不尽苟同。当他们两人都作古时（李嘉图死于 1823 年，马尔萨斯死于 1834 年），詹姆士·麦金托什爵士（Sir James Mackintosh，苏格兰启蒙运动仅存的一点灵光）提到他和他们的共同资源时说：“我与亚当·史密斯仅有一面之缘，与李嘉图相知甚深，与马尔萨斯堪称莫逆。就一门学问的 3 位大师，是我平生所知的 3 位顶好的好人而言，能不值得一记么？”<sup>⑥</sup>

## 第四节 罗伯特·欧文

（公元 1771—1858 年）

我以愉快的心情转向罗伯特·欧文，这位有意使不列颠的经济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一次苟合的成功厂商。

他生于威尔士的纽敦（Newtown），父亲是那里一位成功的马具商、铁器制造商和邮局局长。罗伯特童年时身体孱弱，但是他知道注意自己的健康，而活到 87 岁的高龄。他于 9 岁时就开始工作；10 岁时，他去斯坦福（Stanford）的一位布料商处当学徒；14 岁时，他成为曼彻斯特一位布料商的助手；19 岁时，他担任了兰开夏一家工厂的经理，年薪为 300 镑（约 7500 美金）。他在那里待了 8 年，

赢得才智双全的美誉。他贪婪地储蓄、研究和阅读,并制造了刺激性的友谊:和约翰·多尔顿(John Dalton)及其原子化学,罗伯特·富尔顿和他的蒸汽船,塞缪尔·科尔里奇(Samuel Coleridge)和他的激进观念及令人难忘的诗篇。1799年,年方28岁,他替自己及两名合伙人,买下大卫·戴尔(David Dale)设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新拉那克(New Lanark)的纺织厂,并娶了岱尔的女儿做娇妻,当作这次买卖的红利。她替他生了7个孩子。

新拉那克是一座约有2000居民的市镇,包括500名经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贫民救济院送来的孩子。欧文后来回忆说:“百姓们过着游手好闲和贫穷的生活,几乎无恶不作;自然就债台高筑,健康欠佳,和忧愁愤懑了。这群人的无知和缺乏训练,养成了他们酗酒、偷窃、说谎和肮脏的习惯;加上在政治和宗教两者的全国性强烈偏见下,反对一位陌生人要改良他们的状况的各种意图。”<sup>⑧</sup>这么微不足道的小镇,几乎没有公共卫生可言;住宅污黑而脏乱,犯罪被看做是一种从沉闷的劳动中的刺激解脱剂,公共会堂是解脱吵闹的家庭的一个温馨和愉快的避难所。欧文已失去一切超自然的信念;但是,却更专心致力于基督的伦理理论上去了;他受到新工业奴隶制和旧基督神学结合的反驳。他决定在成功的资本主义和基督教道德间寻找出一些调和。

他对5%的转投资的想法颇为自得——他的合伙人却大为惊讶。他提高工资,禁止雇佣10岁以下的童工。他拒斥马尔萨斯提高工资会增加人口所赋予粮食供应上的压力,会提高物价,而使实际的工资并未改变的论点;他辩称从海中可得到无限制的可食性食物,增加的人口可因大事培植,和新发明之倍增以及劳动生产力普及,可使人人有饭吃,生生不息地繁荣下去——但是政府须采取他所提议的改革为前提。<sup>⑨</sup>他在新拉那克开了一家商店,以便宜的价钱供应生活中必需品。他不但在生产技术上,同时也在生活艺术上不厌其烦地告诫职员们;他对他们保证,倘使他们能互助合作,

他们将享受到前所未曾体验到的和平与满足。他在守秩序的习惯、清洁和清醒上似乎争取了许多工人的合作。当他的合伙人抱怨他把用来赚取较高利润的钱花在慈善和救济上时，他就解散了合伙，另组一家新公司（1813年），新公司的股东（其中一人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大为赞扬他的实验，并同意他5%转投资的观念。

设在新拉那克的工厂获得了举国——乃至是国际性的——声誉。该镇远离主要干道——从格拉斯哥，穿过山峦和浓雾，约有一天的驿程；不过，仍然有好几千访客前来证验一所依照基督教原理所经营的工厂之杰出现象，1815年至1825年间，有2万人在访客簿上签名。他们包括作家、改革家、殷实商人，如奥地利的约翰（Johann）和马克斯米利安大公等王子；1815年时，赞同这种经营和结果、并邀请欧文到苏俄去经营类似工厂的尼古拉（Nicholas）大公（不久即位为沙皇）来访问。<sup>⑧</sup>

积14年之体验，欧文感到可以向世界公开此一经验了，因为他深信，如蒙普遍采用，将会“带给未来每一世代每一人类的幸福。”<sup>⑨</sup>所以，在1813年中，他发表了4篇总题目为“社会新观点”（A New View of Society）论文、成为改革文献中主要经典中的第一篇。他温和地提出他的主张；他向不列颠的统治者和厂商们保证，他没有任何剧烈改革的欲望——也没有这种信心；他的计划不会使任何人有损失的威胁，事实上，那样会增加雇主的收益；并使英格兰免于革命的厄运。

他提出一个几乎可作为任何改革基础的前提——即人的本质，假设具有陈旧和不变的竞争和冲突的特质，事实上是从童年的经验和信念所陶铸而成的。“最大的错误是个体塑造其自己特质的观念。”<sup>⑩</sup>相反的，每一个体的特质是由他们（出生之前）和自出生至死亡的无数侵蚀他们的影响力所形成的。欧文以不加掩饰的热情在结论中说：“任何特质，自最好乃至最坏，自最无知乃至最具启

蒙的,都可适用于任何社团,在应用某些方法上,甚至可适用到全世界;在指挥、控制之下的大范围内,可适用到各国政府的统治者身上。”<sup>66</sup>欧文从这一原则上提出两个前提:第一、目前的统治阶级不应因他们的作法和信念而受到责难,盖他们也是过去和现实环境之产物;其次,改革须自教育开始,并从改良学校和增加学校着手。每一种努力都必须教导儿童了解,因为没有任何个人因他的个性,或社会和工业环境而受到责难;每一个人必须要考虑到其他的人;必需心甘情愿地去合作,必须毫不犹豫地示人以慈爱。故当英格兰还没有因应一般儿童所需之足够学校时,欧文倡议“每一个乡村的统治者应筹划全国性的教育大计,和塑造他们子民的共同个性的模式;……并毫无例外地,由种族,而党派而乡村。”<sup>67</sup>

大卫·戴尔在新拉那克已经为儿童教育贡献良多。欧文则更进一步,在他的一栋大厦中设立了他的“新托儿所”(1816年),以便使天使和歹徒都转变为毋须神学的基督徒。他要求“在他们几乎能行走时就开始”;<sup>68</sup>他如柏拉图(Plato)一般,害怕他们已经定了型或变了质的父母们,传给他们的孩子既存集团的侵略和竞争的精神。他向坚持孩子在早年需要母爱和关怀的母亲们恳求。通常,他教导3岁大的孩子,如气候许可,就让他们在外面游戏和学习。女孩和男孩一样,都接受三R制的训练(译注:三R为读、写、算。即 Reading, Writing and Arithmetic),不过,它们却合并持家的艺术中一并教导。男孩则要施以军事训练,但是,如女孩一样,他们也要接受唱歌、舞蹈和演奏乐器的训练。这种种都属于德育的养成课程,加强在谦让、仁慈和合作的课程上的。体罚是不准许的。<sup>69</sup>每天功课结束时,孩子就回到父母身边。在10岁以前,孩子是禁止到工厂去工作的。

显然,在欧文的学校中是没有宗教课程的,在晚间成人补习教育中也没有。作为一名启蒙时期的儿童,他深信宗教会使孩子的头脑中充满迷信而不智;智慧是至高无上的品德,普及教育是应付社

会问题的唯一方案；进步在这种协助下，是真实而无限制的。<sup>⑧</sup>在他的工厂中和学校里，没有种族、教义的区别；“慈善和仁慈一体公认。”<sup>⑨</sup>他相信他所辩护的方法是朝基督伦理观方向迈进的一种尝试，他热烈地期待他所期望的原则所带来的道德上的乌托邦之实现。

他的第四篇短论（1816年）是贡献给摄政王的，他提出了一些立法上的意见。他要求国会迅速减少含酒精饮料的进口，提高消费税，最后停止批准迪松子酒店和麦酒店之设立，那样酗酒就成了有钱傻瓜的奢侈品了。他建议为了改良未来子子孙孙的道德，应普及和资助国民学校。他呼吁订立“工厂法”以禁止雇用10岁以下的儿童，和18岁未滿者从事夜间工作；调节劳工的工作时数和环境，和维持定期工厂检查制度。劳工部应定期搜集当地劳工供需变动的统计数字，和利用这种资料以疏导失业。<sup>⑩</sup>他呼吁废除国营彩券制度，盖此为“陷害不谨慎和掠夺无知”的一套可耻的计划。<sup>⑪</sup>

他赞同马尔萨斯的济贫法案——此为维持失业者和穷人仅免于饥饿的一个步骤——降低接受救济的标准，和免于他们流于饥饿和犯罪边缘的见解。取代由此一制度所维持的劳工介绍所的，便是欧文提议（1817年）国家应设置公社，每一公社应维持在500到1500人之间，由可自给自足的劳工部门生产可自给自足的衣食、和维持其自己教育的劳工所组成。<sup>⑫</sup>

除了向国会请愿毫无结果外，欧文发表了一篇演说（1818年）：“致不列颠各厂商”，<sup>⑬</sup>描述他在新拉那克的组织之成功，督促他们免除雇佣12岁以下的童工。他们找不出要这么做的方法，他们愤慨欧文将经济不景气归咎于投资超过人们购买力的分析。他们指责他为一位不真正了解雇主必需要面对的问题，或只有宗教才能满足人类需要的无神论的想像。

最后，欧文转向劳动者，在一次“致劳动者们”的演讲中寻求他们的支持（1819年）。他以“体力劳动者，在适当的指导下”，为“一

切财富和国家繁荣之源”来取悦他们。<sup>④</sup>但是他提醒他们，英格兰及其劳工阶级们，尚未到准备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他抵制不列颠政府目前应就其所有劳动大众直接雇佣的任何提议意图。<sup>⑤</sup>他反对任何拔苗助长的方法，他拒斥革命为“预计产生和唤起一切仇恨和报复的邪恶感情的祸根”。<sup>⑥</sup>不过，在他的 1820 年的告“拉那克郡”(Report to the County of Lanark)(一个地主组织)中，他公开宣布，目前英格兰所需要的不是零星的改革，而是一个社会秩序的基本制度。<sup>⑦</sup>

在英格兰遭到了挫折之后，他满怀希望地寄望于美国，那里的几个教派做过几次共产主义的实验。1814 年，一个德裔美籍人士组织的虔信派团体，沿沃巴希(Wabash)河的印第安那保留区西南方购置了 3 万英亩土地，在那里创立了一座号称“和谐”(Harmonic)的小镇。至 1825 年时，他们面临了破产的危机。欧文伸出援手，给了这片土地和这座小镇 4 万英镑，重新命名小镇为“新和谐”(New Harmony)，而竟使他自己毁于一旦。他邀请仁慈的男女人士，和他携手合作在那里建设一个互助合作的公社。除了那里的学校由威廉·麦克卢尔(William Maclure)资助的外，他负担了一切开销。上千热心人士涌了去，白吃了欧文一年，使自己慢慢地去适应有规律的工作，对宗教和政治却迭起争论。1827 年，于赔尽了 4 万英镑时，<sup>⑧</sup>欧文就将此社区交给了麦克卢尔，而回到了不列颠。

他并不就此罢休。他领导了一次使工会发展成与生产性工业中的私人企业竞争的基尔特运动。全国建筑业者联盟(The National Operative Builders Union)接受建筑契约。其他的联合则接踵而至，而于 1833 年时，欧文将它们组织成为一个全国总工会(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Union)，他希望它逐步取代不列颠的资本主义，而最后取国家而代之。国会制订抑制性的法案实施干涉，并正式付诸实施；银行也拒绝借款；而至 1834 年时，欧



文接受了失败的事实。

他的一生，在工业上有如此成就的一生，此时似乎已到达一败涂地的境地。因信仰不同也摧毁了他的婚姻；他的妻子是一名热衷的加尔文派教徒（Calvinist）；当她发现他是一位不可知论者时，她就天天担忧他不能避免的谴责。后来，她督促他们的儿子罗伯特承担起乃父皈依加尔文教的责任；结果，儿子的宗教信仰遭受到相当大的挫折。<sup>⑨</sup>自美返英后，欧文与妻子分居了；不过，仍维持着极为友善的关系。他并不忌惮离婚，但却不追求离婚；他专心在自己的使命中。

他积极地支持有意要践履他的原则的几个公社；在苏格兰的奥必斯顿（Orbiston）、爱尔兰的勒拉辛镇（Ralahine）和在英格兰的昆吾镇（Queenwood）。第一个公社在两年中解散，第二个在3年中，第三个则在六年中，他继续用讲演和文字发表他的理念，并亲眼见到了不列颠岛屿上许多消费合作社的成立。他不停地忙着写作，向学术团体、政府人事部门和维多利亚女皇（Queen Victoria）进言改革。最后，于1853年他转向唯心论，变成各种媒介的中间人，与富兰克林（Franklin）、杰佛逊（Jefferson）、莎士比亚（Shakespeare）、雪莱（Shelley）、拿破仑和先知丹尼尔（Daniel）举行知心的晤谈。<sup>⑩</sup>1858年，前尘往事成了泡影之后，他回到故乡纽敦，以88岁高龄在那里谢世。

他是一个好人，就如任何一位自诩为十全十美的人一样，是一位迹近大公无私的人。他不能完全超越自我，他在权力、成功和知识上暗自怀着一份自负感；他的事业表现在他的个人规范上；但是，他主张竞争性的合作需要纪律和权威是对的。一个人可能作得最好的是扩大自我而包容他的亲人、国家、同类，并因此而在较大的利益上找到满足。这毕竟就是罗伯特·欧文在一种率真而进取的程度上所做到的，将他列名于为改善人类生活的先知之列中是绰有余裕的。

## 第二章 英国的生活

### 第一节 阶 级

一个文明是由政府、法律、宗教、道德、习俗和教育所给予一个民族的社会秩序，并且有足够的自由从事发明和实验、发展友谊、慈善、爱情、和创造艺术、文学、科学、与哲学。这些秩序和自由的型式如何在1789年至1815年的英格兰运作？它们产生了些什么呢？

首先，人类自然秉赋——在遗产、机会和技巧上——使他们产生了不同的阶级，每一阶级贡献合群生活的一份应有的支持。英格兰没有阶级制度，因为一个在财富或才艺上有卓越成就的个人，可以从一个阶级晋入另一个阶级中去，甚至可晋入贵族阶层的行列；而贵族对农民的关系是一种友善的关系，鲜有如知识阶级对贱民的那种关系存在。虽然只有小部分的农民拥有他们的耕种土地，农奴制度却已经不存在。贵族与其他阶级一样要纳税，有时（不像他们的法国同辈）从事商业或工业。只有贵族的长子继承贵族的头衔，其他诸子都是法律上（不是社会上）的平民。

有许多人为的不平等存在。财富非常集中。法律之前的平等因诉讼费用而抵销得一干二净。受指控的贵族们只有上院（贵族组

成的陪审团)受理;这种“贵族的特权”一直到1801年才终止。出生不好的一般民众被强制征入海军服役。一般民众在海军、陆军、政府机关、大学或法律界鲜有晋入高级职位的机会。贵族和仕绅的统治阶层绝少准许一般默默无闻的群众在政府人事或政策上享有任何决定的权利。

也许阶级意识在中层阶级中非常敏感,他们傲然地卓立于农民和无产阶级之上,梦想成为贵族。在中层阶级之间也有嫉妒的阶层:工业资本家轻视附近的小商人;从事投机而获巨利的大商人则傲视工业家;以爱国主义和宗教来粉饰他们在殖民地上收刮的财富的富豪们,正在形成自己的阶级。在法兰西是如此,在英格兰也不例外,似乎没有人对命运、才能或机遇指定给他们的地位有任何满足了;每一个人都忙碌于使自己升降的任务上;近代的骚动就因此而开始了。基本的斗争是资本家要取代掌理国家和贵族阶级;在法国,完成这一举动只需一世代就成了,在英国却需要几世纪之久。

所以,直到1832年,贵族身份是至高无上的,对挑衅者,仅以一笑置之。从严格的意识上看,贵族身份于1801年时共有287位“世俗的”男女贵族,和26位国教主教,他们以“神职贵族”的头衔成为上院的议员。世俗贵族的顺序,以递降排列法,有皇族血统的王子、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除了王子和公爵外,“贵族”(Lord)一字的称呼对他们都可适用,他们的头衔可以一代一代地传给长子。他们的财富根据他们的所有权,而由农民或长工耕种的大片土地,和一年的租金之收入而定,如纽卡斯尔(Newcastle)公爵的年金为12万英镑,或帕墨斯顿(Palmerston)子爵一年的年金则通常为1.2万英镑。<sup>②</sup>贝德福德(Bedford)、诺福克(Norfolk)和

---

• 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于1798年称英格兰为“一个小商人创造的国家”;<sup>①</sup>拿破仑接受此一说法;这几乎并不真实。

德文希尔(Devonshire)公爵们的地产总和可与一个郡的收入相等。<sup>③</sup>居于这群世俗和神职贵族之下,英格兰尚有540位男爵及他们的妻子,在他们的名字之前可冠以“爵士”(Sir)或“夫人”(Lady)的头衔,并且将这些头衔转用到他们的家人们身上去。其次是550位武士及他们的妻子,赋予相同的头衔,但是却不能转用到家族身上。下面是6000余乡绅或绅士——出身在古旧和有身份的家庭中的地主,和有权穿戴有纹章制服的人。这些位在“贵族”之下的团体,组成比较低一阶的贵族阶层,不过,他们通常都包括在统治英格兰的贵族阶级之中。

这似乎不像会对少数统治有什么不妥之处。它的成员对于农民的贫穷、工厂工人的低贱和爱尔兰的强取掠夺都安之若素。他们相信,贫穷是无能或怠惰者的自然和必要的处罚;优柔寡断的理论家们必然不被允许将不列颠转变成建立在堕落的赈济上的民主。尽管有如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和雪莱等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梦幻家存在,某种政府形式仍然是必要的,无此形式,人民就变成一群暴众,将危及个人和自由。拿破仑喜欢英格兰并不是偶然的,他去圣赫勒拿(St. Helena)时曾说:“如果英格兰的贵族政治消失了,如果将英格兰的政权交给伦敦的群众。那将是欧洲人的不幸。”<sup>④</sup>每一个政府都是一个由少数的专制者统治的政府,统治的少数不是出生贵族,就是出生自豪门。当然,民主政治属于后者,因为只有财富才能资助竞选,或付得出说服人民去投有钱的少数派候选人的开销。民主方式选出来的人,不论就出生和训练,鲜有具备能成功地处理国内问题的才干,对国际关系更是无能为力。一个贵族家庭是一所政治才具的养成所,有些从那里出来的人也许变成了一无用途的饭桶,但是,仍有一些,由于长期与问题和统治人员接触之故,具有处理重大问题时不因他们拙劣的手法而危及国家利益的才能。尤其,一种具有正当功能的贵族政治,会赢得人民的服从,和对权威的敬重,这就是对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利益。

这些措辞尖刻却不易令人体会的辩论,似乎说服了英国的大多数群众。但是,他们不相信那愤慨于世袭财富,控制部会和国会的蒸蒸日上之中产阶级;他们被叛乱的劳工愤怒地遗弃了;他们感到心中恐惧,而决心承认一位自认贵族政府之统治英格兰的方法的智识份子之严厉诘责。

## 第二节 政 府

### (一)立 法

英格兰的宪法是国会有效的制定法和法院未撤销的判决之总和。凭藉这些惯例,政府的全部权威就操纵在君权手里(国王或皇后),国会在和谐中从事立法;通常,自1681年起,君权接受国会所制定的立法。没有书面文件限制国会通过其为两院所愿意制订的法律之权力。上院,又称贵族院,由依照出生的权利和传统、毋须经过选举的世俗和神职贵族所组成,具有否决经下院投票通过的任何议案之权,有处理司法判决提起之上诉,弹劾政府人员,和对受重刑控诉之世俗人员提起一切司法诉讼之最高法院之性质。它是贵族政体对激进的中产阶级斗争中从事防卫行动的一座棱堡。

下院共有558名议员,牛津和剑桥两大学各两名,都柏林的三一学院1名,苏格兰45名,其余分别由40个郡和20个区,由具有有限制的选举权的选举人选出,其详情十分复杂,不宜在此细述。<sup>⑤</sup>妇女、贫民、罗马天主教、贵格派、犹太人、不可知论者,以及一般来说任何不能宣示对英国主教的权威和教义忠顺的人没有选

举权。总而言之，英格兰的 900 万人口中，有 24.5 万位合法的选民。因为选举是公开的，除了大地主提名的候选人外，很少人愿意去支持其他的候选人；许多合法公民都愿意去投票，有些选举是由领袖间安排而决定的，毕竟没有任何投票选举之可言。每一区中分配的国会代表人数是依照传统所固定的，很少去注意到选区中人口的消长的；有些区中选民无几，却要选出一位或数位议员，而有 6000 选民的伦敦，只准选出四位议员。新工业中心，在国会中有时竟没有代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设菲尔德就没有一位议员，而康沃尔(Cornwall)古郡却有 42 位。不过，我们应该补充一下，在地区性事务上，许多城镇和村落拥有相当的自治权；所以，伦敦市，由财产限制的选举权，选择其自己的政府，和维持一个足以自傲而独立的国会。

下院中约有一半的席位，由这些半公开的选举所产生的议员所拥有，另一半则由地方或区的大财主不经竞选而提名的议员所占有；这些提名在许多情形中，都由区提供给最有提名权的人去提名。“在区中，换句话说，在下院中的席次，如商业中的任何货物一般，是公开买卖的，国王本人有时是区的最大主顾。”<sup>⑥</sup>

被选的人员大概分成两派——保王派和民权派。这些人早已忘却一度区分他们的问题了；两派中的领袖都是旧贵族家庭出生；不过，民权派比保王派更愿意倾听工商界中正在崛起和有势力的贵族的意见，而保王派则旨在维护——民权派则在拒斥——王权的传统特权。争论的中心不是原则而是权力；两派都想改革当权的部会，分裂温和的官署和监督分赃的官僚机构。

尽管有贵族政体的基础，不列颠政府在其立法上比大多数大陆国家要民主；而在某些国家(包括 1804 年后的法兰西在内)，最高权力是由一位皇帝或国王来操纵的，在不列颠，自 1688 年后，实际的统治者不是国王，而是国会；在两院制的国会中，权力主要是在控制“荷包权”的下院；没有它的同意，不可能对公款作任何支

配。理论上,国王可以否决由国会通过的任何决议;实际上,乔治三世(George III)从不曾利用其特权而去碰过这一点。不过;国王可解散国会,要求全国重新选举;在那种情形中,他所宠幸和资助的候选人有一次获得席次的好机会,因而这位土生土长的国王(追随着两位外来的乔治之后)再度成为国家的象征,爱国心和光荣的中心目标。

## (二)司 法

英国的司法如其立法一样的随和、混乱而又适得其所。首先,它必须执行一个几百年来几乎每日在成长、却一直缺乏系统、和依然传统化的法学观点:即法官要不断修正或忽视而又十分残忍的法律体系。法律上有浓厚的封建思想和基督教干涉的痕迹:受指控的贵族仍然要求贵族来审理,教会的仪式(benefit of clergy)仍然(直到1827年)免除国教牧师受到世俗法庭的管辖。好几百种法律如反对公开赌博,夜间娱乐,非经核准之集会,虽绝少实施,仍以成文法形式存在。这时期虽有过某些修改;在1800年时规定死刑,犯罪种类约有200种,正不断地在减少,资产和负债的实际报告可避免因债务而坐牢。但是,破产法仍不十分方便,商人们可以规避而作二次破产宣告。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目的在终止审判前的不当监禁,却时常遭到搁置,以致使它在如法国大革命战争一般的危机中失去其效力。不列颠法律上的这种混乱、矛盾和野蛮一直继续到边沁以持久和详细的要求改革而作大力攻击时始止。

由于市镇警察稀少,和乡下的几乎完全绝迹,逮捕刑事犯就变得日趋困难;公民们不得不去组织志愿团体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纵使捕到了罪犯,罪犯使得律师找到捏造上诉的理由,就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拖延或逃避监禁:“律师们吹嘘说,没有一部制定法,他们不能驾着一辆六人马车开过去的。”<sup>①</sup>

法律职业中的最下一级便是小律师职务，他们担任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或为大律师调查和准备资料，大律师才准许上法庭辩护。通常在大法官的推荐下，国王从他们中挑选法官。

一年有两次普通法院的法官去审理各郡对本地民事、刑事案件的诉讼，因为他们在一地逗留的时间都很短暂，在每一郡或区中的司法行政，有些是新创的，都留给当地的“治安推事”去承理。这群治安推事是由中央政府从当地富有的地主中选出来的；他们是无薪给的，但是，他们的财富可以不使他们腐化。他们不是没有阶级偏见，有些因对激进派判处严峻的刑罚而成了名人；但是，总而言之，他们对当地的行政处理得十分公正允当，几乎可与拿破仑法兰西的地方行政相侔。

英国法律的最主要特点是受控的人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显然地，这种加罗林的法兰肯人(Carolingian Franks)的制度，随着诺曼征服者，以其原初形式传入英格兰。1367年前，陪审人员的人数并不固定为12人；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是要求全体一致的判决的。陪审团的人数是从一个由48人到72人——通常都是中产阶级——的陪审员名单中，经过反方行使诘责权后选出来的。治安推事定期在每一郡中得到一个大陪审团的帮助，依照大陪审团的推荐，才能期望法庭进行审判。在审判中，陪审员们聆听证供，反方辩护人的辩护，和推事的结论；之后，他们退入议事室，在那里，“为了避免无缘无故地拖延，他们不食、不饮、不供给火或蜡烛”（除非得推事的准许），“直到他们一致同意时为止。”<sup>⑧</sup>

### （三）行 政

理论上，行政权是授予君权的，实际上，行政权则操在他的内阁各部长的手中；而部长必须是国会的议员，就他们的行为向国会负责，他们的经费依靠国会拨付。理论上，国王任命这些部长，实际



上,他只指定最近一次选举获胜的政党领袖为他们的首脑,这位首相和他党内的其他杰出人才,经国王的正式任命,就被任命为各部会的秘书。威廉·庇特(William Pitt)在他第一任内(1783—1801年),担任财政大臣和首席财务大臣两个职位;那就是他控制了由国会批准征收和支付国库收入的两个位置。在内阁中,就如整个政府一般,控制荷包的权力是惩戒和统治的主要方法。

乔治三世不准许他的属员入国会。当他以22岁英年,于1760年登基时起,他就寻求行施皇家特权的机会。但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他的领导权受到大事斫伤,和间歇性的精神错乱(1765年,1788年,1804年和1810年至1820年),耗弱了他的体力、精神和意志,以及1788年后,除了3个例外的情形:对奴隶制度不得作最后的谴责,不列颠的天主教徒,不得准许投票,和直到路易十八(Louis XVIII)安全恢复他的合法王位,不得与法兰西谋和外,他已经完全委诸威廉·庇特去治理了。

乔治三世是属于他自己的意见和信仰中的一位好人。拿破仑在俘虏后的回忆中,称他为“在他的领土内最诚实的人。”<sup>⑧</sup>除了十诫中的第五诫外,他以尊崇十诫中的所有其他诫律而使自己优于汉诺威王朝的每一前任皇帝,同时,对《利未记》(Leviticus)中“爱你的邻居如自己”的告诫则就不能实现其万一;但是,他爱护英国人民。尽管他错误不少,因为他的不幸命运,他们都报之以爱戴——因为爱他因袭的宗教,因为爱他的妻子和女儿,因为给予国家一张简朴和虔诚的朴素生活蓝图。纵使有他这样的范例,每当他的许多儿子以婚姻不如意、过度赌博、任意浪费、身体和性格愈形衰弱而污蔑了王子的头衔时,他们的心却仍向着他,威林顿则形容他们为“任何政府中居于继承地位,而可以想像到的最可指责的顽石。”<sup>⑨</sup>

长子——乔治,威尔斯王子(George, Prince of Wales)——是最惹是生非和颠倒众生的一位。他知道自己英俊潇洒。他受过良

好教育,能讲流利的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歌唱得不错,拉得一手大提琴,会写诗,熟悉当代英国文学,在他的知己朋友中有理查德·谢里登(Richard Sheridan)和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等人,并且是一位艺术的知音。他在卡尔顿宫(Carlton House)建筑起豪华的官舍,以国库的花费装潢得美轮美奂,喜好政治,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的饥渴抗衡,令他父亲恐惧不安,竟变成了民权派的偶像。他也喜欢和将财富花在奇装异服、女人、骏马和狗身上的年轻纨绔子弟在一起。<sup>⑩</sup>他伴同这群英国人去参加各种竞赛,而在挥霍和负债上却远超过他们。国会一再地投票通过几万英镑以恢复他偿付债务的能力,<sup>⑪</sup>没有人知道这位心地善良的浪子在什么时候,如国王一般,成为乐善好施的慷慨捐助者。

年方 17,他就坦然“颇好女色和醇酒”。他早年的情妇中有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其人,她在“冬天的故事”(A Winter's Tale)一剧中饰演普蒂泰(Perdita)一角而令他神魂颠倒;有 3 年的时间,他供应她朝不保夕的奢华生活。然后,他与两度遗孀、罗马天主教徒、长他 6 岁和任性不羁的玛丽亚·安·菲茨赫伯特(Maria Anne Fitzherbert)熟悉;她拒绝做他的情妇,但却同意嫁给他。但是将英格兰王位传给汉诺威家族的王位继承法中规定丈夫或妻子为罗马天主教徒者不得有继承权,和 1772 年的法律禁止 25 岁未及之皇家人员未经统治者同意不得结婚。不过,这位皇子仍娶了菲茨赫伯特夫人(1785 年),付给一位年轻的国教助理牧师 500 英镑,以履行这次不法的仪式;这次违法行为保存了王子的继承权。他在 1788 年僭取这一权利;正当他的父亲进入疯癫状态时,他不耐烦地等着父亲过世,但是父子却几乎没有合意过。

不过,他们同意,如果国王(实际是国会)愿意付清王子的新债务(11 万英镑),继承人愿意放弃他的平民妻子而娶父亲的外甥女、不伦瑞克的卡罗琳公主(Princess Caroline of Brunswick)。他发

现她奇丑无比,她发现他臃肿肥胖;但是,他们于1795年4月8日结婚了。卡罗琳后来说,他在结婚那晚烂醉如泥;<sup>⑨</sup>不过,她于1796年1月7日替他生下一女,夏洛特(Charlotte)公主。此后不久,他离开了她。有一度,又回到了显然是他所深爱的唯一女人菲茨赫伯特夫人的身边。(当他死时,从他脖子上找到了有她画像的小型饰物。)<sup>⑩</sup>

1810年11月间,乔治三世——因他的儿子而感到羞耻,因他死去的女儿阿米莉亚(Amelia)而悲伤过度,和在国会的反对下精神崩溃——最后终于发疯了,此后几年,这位英格兰的国王是一个胡言乱语、受到人民怜悯和爱戴的精神错乱者,承继一切皇家的奢华和权力的摄政王是一位堕落、败坏、肥胖、年近花甲、因秽闻满朝廷而受到鄙弃的人。

### 第三节 宗 教

英格兰的政府和知识阶级此时已就宗教获得了一项君子协定,当时怀疑论者认识到他们没有什么东西放到宗教的位置上作为对个人道德和大众和平的一项帮助时,自然神论对正统教义的攻击就归于寂静了。威廉·戈德温、罗伯特·欧文、杰里米·边沁和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便是没有信仰的活生生例子,但是,他们却不因之而大事宣传;托马斯·佩因(Tom Paine)是一个例外。在年轻的伏尔泰身上发现了一些可爱之处的英国贵族,现在已就安息日的仪式小心地去注意了。“全英格兰各地,对下层阶级有了一种好奇感。”1798年的年鉴(Annual Register)上指出,在星期天“看到通向教堂的大道上停满了车子。”<sup>⑪</sup>约翰·斯图尔特·米

尔(John Stuart Mill)在 1838 年时指出：

在英国人的心智上，就思考和实际两方面来说，有一种从各种极端中退缩的崇高礼赞存在……不要骚扰清静(Quiet a non mover)是那时候所欢迎的教义……因此，在对宗教不要太过份骚扰或过份热心的条件上，教会甚至得到哲学家们的支持，当做反对狂信者的堡垒；认宗教精神为阻止骚扰社会和谐或国家安宁的一帖镇定剂。国教教士认为他们就这些措辞上有一次合算的交易，而深具信心地信守着其条件。<sup>⑩</sup>

国教的正式名称为“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联合教会”，虽然它接受加尔文派教义的 39 条条款，它仍保留了天主教仪式的许多特征。它有天主教和主教的职称，但是，他们通常都是结过婚的，并且他们是由英王任命的。地区性的牧师通常由当地的乡绅们选举，并协助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国教的牧师认国王为他们的领袖和统治者，并依靠国家从英格兰各家庭抽取支持教会的什一税。伯克形容不列颠为一个基督教共和国，其国内教会和国家“为二而一的同一体，是组成全体中不可少的另一部分。”而约翰·威尔逊·克罗克(John Wilson Croker)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为“不列颠宪法的一部分。”<sup>⑪</sup>除了没有迫害异端之外，其关系就如天主教和路易十四(Louis XIV)治下的法兰西政府之间的情形。<sup>\*</sup>

异端派——美以美会、长老会、浸信会、组合会、公理会、贵格会和唯一神会——在一个条件下得准许传布他们的教义：即他们

---

\* 在法律条文中，一位无神论者是一名不法之徒，得如罪犯般加以搜查追捕。亵渎——以语言、文字或符号对神的任何不敬——可处以 82 小时戴枷罚站的责罚，这些法律罕有付诸执行者。

须宣布自己为基督徒。<sup>⑨</sup>有些非国教派人士坐在上院的席次上。美以美会传教士用他们惊世骇俗的雄辩聚拢了一大批听众。市镇中受压迫的工人们,丧失了世俗的希望,回返到他们童年的信仰上去,因这种热诚,当革命的观念从法兰西渡过英伦海峡吹袭来时,他们抗拒了使他们反叛的一切努力。1792年,韦斯利美以美派的领袖们要求每一位虔诚的信徒作效忠国王的宣誓。<sup>⑩</sup>

在国教教会本身,美以美的影响力激起了一次“福音派运动”:许多年轻的教士和俗人决定用熟记福音的方法,以复兴国教教义,和使自己致力于简朴的生活、虔诚、仁慈和教会的改革上,其中一人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领导英国人反对奴隶制的运动;另一人汉娜·穆尔(Hannah More),利用她的布道、书籍和主日学校大事传播了一阵子清醒的基督教狂热。

两个宗教团体——天主教和犹太教却仍然得不到全部容忍。英国新教徒不能忘情于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和他要炸毁国会的意图(1605年),也不能忘怀斯图尔特(Stuart)族诸王——查尔斯一世(Charles I)和二世(Charles II)、詹姆士二世(James II)——和天主教的权力、情妇与理念的苟且情形;他们视一名天主教徒为效忠于一个外国统治者的人(教廷是教皇领地统治者的俗世主权),他们怀疑在罗马教皇和不列颠国王冲突中会有何种行为。

1800年时,英格兰约有6万天主教徒,大多是爱尔兰籍,但是,有些是不列颠天主教改革前当地居民的后裔。对付他们的法律此时已大为松弛。1774年和1793年间的许多制定法已经恢复他们拥有土地的权利,和主持他们自己的宗教仪式,以及在他们自己的学校中可以传布他们自己的信仰了;以一篇特别措词的宣誓,令他们宣誓效忠国王和政府而同时也不背弃教皇。然而,他们不能投票和被选入国会。

直到18世纪末叶,英国天主教的全部解放运动已经显出成功

的迹象。卓越的新教徒——韦斯利(Wesley)、坎宁(Canning)、威尔伯福斯和格雷爵士(Lord Grey)——都支持这一运动。法国大革命在英格兰引起了一阵对伏尔泰和启蒙运动的反动,有些人同情被革命政府反对的宗教。1792年后,法国移民,包括天主教神父和僧侣在内,从不列颠受到一份温暖的欢迎和经济援助;流亡人士准许设立修道院和神学院。一个如此式微和频遭蹂躏的教会观念可能是英格兰的一次危机的说法,至此似乎已成为荒谬之论了;在对法兰西的战争中,那种教会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联盟。1800年中,庇特提出了一项解放英格兰天主教徒的法案。保皇党和高层国教会(High Church Anglicans)却反对此一法案,乔治三世也决心与他们采取一致立场。庇特撤回了他的提案而辞职。英格兰的天主教解放运动必须要等到1829年时才实行。

较此更要缓慢的(1858年)便是解除英格兰的犹太人的公民资格。他们在1800年时约有2.6万人;大多住在伦敦,有些则在省城,几乎没有人住在乡下。长期战争阻止了更多移民,和让英国的犹太人适应不列颠的生活方式,和冲破某些种族的障碍。法律仍然阻止他们取得参政权,和担任重要公职的机会,需要经过“成为一位忠诚基督徒”的宣誓,并接受依照国教的圣礼仪式。不然,他们可以自由地在他们的家中,和犹太教会堂中举行他们的膜拜。几位杰出的犹太人改皈基督——如银行家桑普森·吉迪恩·纪塘(Sampson Gideon)、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作家伊萨克·迪斯雷利(Issac Disraeli)便是。除了卓越的先驱本杰明(Benjamin)外,最后一人在1791年和1834年间,以匿名方式发表了《文学奇谭》(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一书,该书一直受到有学养而生活闲适人士所欢迎。

犹太人在银行业务中的长期经验,和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家族联系,使得他们能在七年战争和对法兰西的长期决战中对不列颠政府有所帮助。本杰明和亚伯拉罕·戈德斯未德兄弟(Abraham

Goldsmid)协助庇特击退垄断财政事务交易上的不法经济人。1810年,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在伦敦设立了他的父亲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Meyer Amschel Rothschild)在美因河旁的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所创立的公司之分公司。那桑算是一位不世出的理财天才,他使他的家族在许多国家独占鳌头达数世纪之久。他成了不列颠政府与国外强权的财政关系上最得宠的中间人;即他或英格兰转入奥地利和普鲁士分公司的代理人,与拿破仑从事战斗;他在1815年后的英格兰工商发展上居于领导地位。<sup>④</sup>

#### 第四节 教 育

英格兰似乎决定要表现一个政府如何不送子弟入学之下而运作下去。贵族阶级除了对其自己的子弟外,对教育缺乏兴趣。维持农民、无产阶级,也许还包括中产阶级在内不能阅读的现状好像要较为有利一些;特别是目前,戈德温、欧文、科贝特、佩恩、科尔里奇和雪莱正在印行关于剥削的贵族、农业公社(agricultural communes)、工厂奴隶和无神论之必要等无聊手册的时候。“对旧制度的毅然辩护”,戈德温约于1793年时写下:“没有卑视的意见,反对知识的交换为一最惊人的革新。”在他们著名的观察中——“一位接受读写训练的仆人就不再是他们所要求的被动机器了”——包含了容纳说明整个欧洲社会哲学所自出的胚苞在内。<sup>⑤</sup>此外(上层梯次辩称),较低阶级就不能以智慧和谨慎去判断讲演、看报或书籍所提供给他们要点;观念会爆炸;倘教育普及化,如梦似幻的“魔鬼集团”就会设法摧毁唯一能保持社会秩序和文明的各阶级必

须的特权和权力。制造商行、在竞争者不择手段的竞争中、发明者的压力、和寻找廉价劳工的要求下,看不出在教导童工人权和空想的意义。“这些原则,”戈德温引述一位隐名的保守人士说的话:“将不可避免地粗人脑筋中发酵,……或者使它们付诸执行的意图将会受到各种灾难所折磨……。知识和兴趣、知能的改良、贤哲的发现、诗和艺术之美将会在野蛮人的脚下践踏而磨灭”。<sup>⑧</sup>

1806年,据派垂克·柯古洪(Patrick Colquhoun),前伦敦市警察总监的估计,英格兰和威尔士有200万名儿童没有接受教育;1810年,语言学家亚历山大·默里(Alexander Murray),统计有3/4的农业劳动者是文盲;1819年,官方统计报告,67.4883万名儿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接受学校教育——占总人口的1/15。<sup>⑨</sup>1796年,当庇特提案,政府设置工业教育学校时,他的提案没有付诸表决;1806年,当塞缪尔·惠特布雷德(Samuel Whitbread)提出政府在每一教区设置一所国民小学的提案时(在苏格兰早已成为事实)在下院通过了;但是,上院基于应置教育于宗教基础上的理由而驳回了。

宗教团体自筹税赋为他们一些儿童提供某种教育。促进基督知识的会社仍维持着“慈善学校”,但是,儿童入学的总数不超过15万人。<sup>⑩</sup>汉娜·摩尔的学校几乎限制在宗教课程的范围内。贫民法律署开办了“工业学校”,授给19.4914万名儿童中的2.16万人适于他们就业的教育。儿童在宗教学校中学得的一件事——便是圣经;它变成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文学和他们的政府,是不幸、不义的迷惘的生活中一项可贵的资产。

1797年,安德鲁·贝尔博士(Dr. Andrew Bell),于遇到教师不足时,便创立了“级长制度”(Monetorial System),利用年长的学生到与国教信仰有关的国民学校中充任助理讲师。一年后,约瑟夫·兰开斯特(Joseph Lancaster)介绍一种以每一位基督徒都接受的原则的类似制度。教会人士拒绝实施这种不区别教派意识的制度,兰



开斯特被指责为一位自然神教的信徒，一名叛教者，是一件魔鬼的工具，科尔里奇也加入此一叫骂的行列。<sup>⑨</sup>1810年，詹姆士·米尔、布鲁厄姆爵士(Lord Brougham)、法兰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和塞缪尔·罗杰斯(Samuel Rogers)创立皇家蓝卡斯协会(Royal Lancastrian Association)，推广不分教派的学校。震于此计划之进步，国教教会便组织了“依据国教教义的贫民教育社”与之颉颃。直到1870年，不分教派的国民学校的全国性教育制度才在英格兰创立。

高等教育则是由那些能供应较高等教育的家庭教师、公立学校、讲师和两所大学所提供。公立学校——伊顿(Eton)、哈罗(Harrow)、拉格比(Rugby)、温切斯特(Winchester)、威斯敏斯特和查特豪斯(Charterhouse)——在收费政策下为贵族和士绅所开办，偶尔招收有势力的中产阶级的子弟。研修课程主要是古典经籍——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语言和文学。旁及一些科学教育，但是，父母们期望他们的儿子接受有关政府的教育，而他们深信，一位青年人研修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学和口才训练，较物理学、化学和英诗，对这些目标有较好的准备；不过，密尔顿(Milton, John)则被誉之为一位写拉丁文如同英文一样成竹在胸的罗马人。

公立学校中的训导是一种打骂和苦役混合的教育。违犯重大校规者则受到教师责打；另外有低年级孩子为高年级孩子服贱役的规定：受他们差遣，擦鞋、泡茶、拿曲棍球棒和球，并默默地容忍他们的恐吓；其理论为一个人必须要在学会指挥之前先学会服从。（与陆军和海军中通行的理论相似，它们也在打骂、苦役和服从的基础上组成的，在此一意识上，特拉法尔加和滑铁卢(Waterloo)的胜利不只是在伊顿和哈罗的操场上赢来的，也是在公立学校的教堂和礼堂中赢得的）。一旦一名苦役者到达高年级时，他就已准备要护卫此一制度了。在这些贵族养成所中，有一些民主政治的内涵在内：每一罚苦役者是平等的，不论他们的财富和门第，每一毕业

生(如果他们不从事商业)也是平等的——而所有其他人士,不管他们的天赋如何,都要较他们低一等。

这些学校中的毕业生——通常在 18 岁——继续成为牛津或剑桥的学生。这两所大学从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的成就中渐趋没落;担忧在牛津的日子大多数浪费在不相关的研究上,吉本(Gibbon)并非是唯一的一人(虽然他从拉丁和希腊文上获益匪浅),学生在赌博、酗酒、嫖妓和决斗上争妍斗胜。入学许可需要得到国教会的承认,授课由“唐”(Don)担任,每一位“唐”指导一名到数名学生,以公开讲授或私下指导来传授他们的学识。那里古典经籍也是课程的主修内容,但是数学、法律、哲学和近代史已列入课程,对天文学、植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讲授也很盛行——但学生却寥寥无几。

牛津是保王派的堡垒,剑桥是民权派的大本营。后者中,接受 39 条教规作为入学的条件已被取消;但是,只有国教会的会员才能取得学位。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自 1785 年起曾在此发生。科学在剑桥要比在牛津——就教师和学生两方面来说——都要多,但是,两所大学都要比德国和法国落后。牛津教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哲学;剑桥加上洛克(Locke),哈特利(Hartley)和休谟(Hume)的。剑桥培植国际知名的学者;牛津颇着重在国会中的雄辩术和谋略人才的培养,然后,经过试验和磨炼后,加上正当的联系,就可在不列颠政府中扮演一个角色。

## 第五节 道 德

### (一) 男人与女人

从这种政府,这种变动的经济,这种政教联合政体,这种在内容和推广上如此有限制的教育,这种一度采取孤立政策,目前正受到交通、革命和战争挑激的国家遗产上会展现出什么类型的道德生活呢?

男人和女人不是生来就有道德的,因为他们偏向合作的社会本性并不如他们自发的个体冲动一般健全;所以,这些冲动必定要予以扼制,而那些本能得藉法律来表彰团体的意志和权力,借道德规范、透过家庭、教会、学校、舆论、习惯和禁忌的传达而加强。然而,不可避免地,在1789年至1815年的英格兰,诈欺和婚前性交的犯罪数量相当惊人。如果我们根据霍格思(Hogarth)和博斯韦尔(Boswell)的说法,娼妓和阻街女郎在伦敦和工厂林立的小镇上十分猖獗。埃格雷蒙特爵士(Lord Egremont),是特纳(Turner)及其他艺术家们的出手大方的主顾,“据说有一大群情妇,替他生了许多孩子……可是,街谈巷议只增加朋友对他的好感。”<sup>⑧</sup>我们也许可从上层社会以和蔼的态度去使自己适应威尔士王子(Prince of Wales)的那些行为上判断他们的道德。“王子在英格兰自中世纪起即已名传遐迩而放荡不羁的贵族社会中长大。”<sup>⑨</sup>农民也许还敬重旧道德规范,因农业化的家庭组织要求一种强固的家长权威,和使最不可缺少的年老人对青年人监护权之存在。然而,从这种控制中

解放出来的众多无产阶级,随着其收入之所允许,渐渐向其剥削者仿效了,“在没有节制的劳动工业中的低廉工资,强烈地诱惑”着女性工人以致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求得在她们的最低工资上增加些微的收入。<sup>⑧</sup>

直到1929年,法定适婚年龄规定男性为14岁,女性为12岁。寻常结婚是为了金钱。男人或女人的婚姻欲望,依据他或她的实际或期望所得而定;母亲们日夜筹划(如简·奥斯汀(Jane Austin)的小说上所述)把女儿嫁给金龟婿。为爱情的婚姻仍然是稀罕的。虽然,文学作品上却在大事宣扬。普通法上的婚姻是法律所承认的;正当的婚姻需要一位牧师主持。实行大家庭制度,因为孩子就是经济资产,在工厂区和农业区的差别十分微小。避孕的方法十分简陋。人口成长率在增加,但是,因婴儿和老年死亡率、营养、医药和公共卫生之不适当而抵销了一些。通奸之风盛行。离婚权则由丈夫或(1801年后)由妻子取得,但是,只能由国会立法始可,此一费用不貲,在该法于1859年放宽之前,只有317件离婚案件获得批准。直到1859年,妇女的动产在婚姻中是属于丈夫的,他自动取得于结婚后所归属于她的任何此类财产。她保留她在土地上的财产权,但是,从土地上的收入则属于丈夫。如果她先他而死亡,她的一切财产则全部遗留给给他。<sup>⑨</sup>

我们听说过富有妇女的事,但她们的的人数寥寥无几,依据继承的习俗,一位没有儿子的父亲——这样的例子很多——可将其产业遗赠给一位男性亲戚,使得女儿们去依靠友谊和怜悯生活。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

## (二) 玛丽·吴史东克莱夫特

习惯已锻炼了大多数不列颠妇女习于这些不公平的事情了,但是,此时从革命的法兰西吹袭来的风潮引起一些受难者起而抗

议。玛丽·吴史东克莱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有感于她们的遭遇,在一次为历来妇女解放运动所作的最有力的呼吁中大声疾呼。

她的父亲是一位决定要从事农业的伦敦市民;他失败了,也失去了幸福和爱妻,终日耽于饮酒,使他的3个女儿自己去谋生,她们办了一所学校,赢得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赞许。最后却破产了。玛丽去充任女管家,但是,一年后被解雇了,因为“孩子们爱他们的母亲甚于爱他们的女管家”之故。<sup>⑤</sup>同时,她写了几本书,其中一本为1792年以33岁的年纪所写的:《妇女权利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an)。

她将此书献给“故欧坦的主教”,塔莱朗先生(M. Talleyrand—Perigord, Late Bishop of Autun),并暗示由于制宪议会公布了“男人的权利”宣言,宣布妇女的权利宣言为义不容辞之举。也许为了进行顺利起见,她提高了道德的调子,宣称忠于国家、道德和上帝。她绝少谈到妇女参政,因为“目前这个国家所实施的整个代表制度只是专制政治的一种权宜措施,她们(指女人)就毋须抱怨;因为她们正如每当孩子们的嘴里不缺少面包吃时,就会忠诚地支持的机械修理工一般的有人代表着的。”然而,“我确实认为妇女应该在‘国会’有代表,而不是在政府的决议中没有她们任何直接参与的被治者。”<sup>⑥</sup>就以有关性别为基础的立法来说,她指出长子继承和指定继承的一个例子。而习惯甚至比法律更要严苛,因为它因一个女人须臾间错误而在她的生命上烙上不贞的名誉和处罚,“虽然,当男人纵容在邪恶中时,仍保持住他们的地位。”<sup>⑦</sup>

也许有些读者会因玛丽的女权宣言所感受和所供认的是有关性媾上的肉体满足而震惊。<sup>⑧</sup>但是,她警告两性称“视爱情为一种兽欲其本身就已失去了立场”;<sup>⑨</sup>事实上,在那种意义上,“爱情是一切感情中最易消失的一种。”<sup>⑩</sup>就以肉体关系来说,爱情应逐渐地由友谊来取代。这就要求互相尊敬,而尊敬要求每一位玩伴应从对方找出各自的和发展的特性。<sup>⑪</sup>因此,妇女解放的最好开端便在

承认她的错误,和认识她的自由将依赖她在心智和行为上的教育。

这份《辩护》,进而胪列那时的一些妇女的错误:假装孱弱和胆怯,逗乐男性优越感的意识;恣纵在牌桌,闲扯,占星术和感伤以及文艺杂萃方面;沉溺在服饰和自娱上等等。

本性、音乐、诗情和殷勤都有意使得女人成为感情的动物,……而这种过份夸张的感受就自然地松弛了心智的其他功能,和阻止了去获得其应获得的权威和知识,……为了习练了解,每当生命进展时,便是本性所指示要抚平感情的唯一方法。<sup>⑧</sup>

玛丽感到,几乎所有这一切错误,都是由于教育上的不平等,和男人在使女人认为(如一位女作家所告诉他们的),“你最好,最甜蜜的帝国便是取悦”一词上的成功。<sup>⑨</sup>

玛丽气愤这些俗气的装束和手段,并以羡慕的眼光注视着坚持要接受教育,和学习写出列入法国人心智中最佳文学作品的法国妇女。“在法兰西,可以想见知识的传播比欧洲任何一地都要普遍,部分原因,我归功于那里两性间长久来所存在的社交活动之故”。<sup>⑩</sup>在巴尔扎克前的一世代,玛丽·吴史东克莱夫特指出:

法国人,在美上表现了许多智慧,偏爱 30 岁的女人……。当欢愉而不失去理性时,他们准许女人共享他们最完美的境界,和刻划成熟的那种庄严的性格。青年时期,直到 20 岁,身体开始发育;直到 30 岁,容光渐趋焕发,和(面部的)肌肉日趋韧性,在面部表现了个性——即它们在脸上刻划出智慧和痕迹,不仅告诉了我们它们所内蕴的力量是什么,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它们是如何运用的。<sup>⑪</sup>

玛丽相信,女人的缺点几乎完全在于否认了教育的机会,和男性在使女人自认婚前是性的玩具,和婚后是装饰品、奴隶和母性的机器之成功。让两性在发展心智和身体上有平等机会,男孩和女孩——一直到从事技术职业的时间为止——应在一起受教育,用相同的课程,可能时,相同或相似的运动。若有需要,每一位妇女应具有同样健壮的身体和心智活动去谋得她自己和生活之所需。<sup>⑧</sup>但是,“能有什么方法使母性的性格将女人从她的范畴中解脱出来呢。”<sup>⑨</sup>不久,生物功能和生理上的差异就会表明。母性的照顾为母性的健康是有益的,也可以使家庭变小和坚强。<sup>⑩</sup>妇女解放的观念应是受过教育的母亲和一位受过教育的男性建立在平等的联合上。<sup>⑪</sup>

看到她的书在报上发表后,这位光芒熠熠的青年作家,惑于大革命的创造性,就渡过英伦海峡去到法兰西,但是却赶上了大屠杀和恐怖的一幕。她在巴黎和一名美国人,吉尔伯特·伊姆利船长(Captain Gilbert Imlay)堕入爱河,并同意在不受约束下和他同居。她怀孕后,伊姆利以业务或其他原因,时常一去数月,她求他回来的信,几乎封封词藻洋溢,如一代前莱斯皮纳斯(Julie de Lespinasse)的那些信不相上下,而其无效亦如一辙。<sup>⑫</sup>1794年中,她生下孩子;但孩子也没有留住父亲。他供给她一份赡养费以支持她的生活;她拒绝了,回到了英格兰(1795年)。她企图投入泰晤士河自尽,但是,却被热诚的水手救了起来。

一年后,她遇见了威廉·戈德温,成了他的普通法上的妻子;两人都不相信国家有规范婚姻的权利。然而,为了他们将出世的孩子之缘故,他们决定举行一次宗教仪式(1797年3月29日)。耻于他们的合法性,他们在激进的朋友前面隐瞒了他们不再过有罪生活的事实。有一个时候,她出现在聚集在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周围的反叛人物的圈子中;戈德温、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Thomas Holcroft)、托马斯·佩因、威廉·沃兹沃思

(william Wordsworth)和威廉·布莱克(他为她的作品作插图)。1797年8月30日那天,在痛苦的煎熬中,她生下了雪莱未来的妻子。10天后,她与世长辞了。

### (三)社会道德

渐渐地,纵然有那些没有被历史记载的安定、优雅的生活,这一时期中,英国的每一阶级共同有一种寻常的道德上退化现象。赌风盛行;政府本身(直到1826年)就以发行国民彩券在推波助澜,酗酒是地方性的,当作一种逃避寒湿阴雨、残酷的贫穷、家族争吵、政治紧张、观念上绝望的方法;庇特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在其他方面风马牛不相及,却一致同意此种瘫痪现象。酒店准许星期六通宵一直开市到周日上午11点钟,<sup>⑧</sup>因为周六是休息日,必须让酒店有时间去收刮大部分周薪。中产阶级饮得较为温和,上层阶级饮得很凶,但是却懂得如何把酒杯稳稳地抓紧,活像一只漏水的盒子。

一种特殊的奢靡风气在政府的每一阶层造成政治上的腐败。有许多情形,如前面已指出的投票、选举区、提名、官署——在有些例子中,甚至是贵族的身份——如股票交易所公开卖买股票一样地在卖买。乔治三世,他的治绩是内政方面的,不认为用金钱替国会或在国会内获得选票,或分配官职给政治上的支持者有什么不对。1809年,有76位国会议员拥有这份闲差事。“少数得宠者借关系或利害与富贾、权贵保持连系,不劳而获得巨额薪水;而实际从事工作的人,仅得微薄报酬的却偏偏皆是。”<sup>⑨</sup>法官出卖他们辖区内的附属职位,并从他们的主持者手中抽取公家付给他们职务上酬劳的佣金。

政府既残酷又腐败。我们已提到过其刑法典的严峻了。强押路人入海军是薪俸低廉,食物恶劣和无情训练的前奏。<sup>⑩</sup>有好几次



水手们叛变了；如这样的一次罢工封锁了伦敦港近一月。然而，英国的水手是历史上最好的海员和海上战士。

就道德改革作过许多次努力。1787年，乔治三世公布对破坏安息日、冒渎（诅咒）、酗酒、淫秽文学和不道德娱乐的谴责；其效果并无记录传下来。杰里米·边沁，以他的《国会改革问答》（Parliamentary Reform Catechism, 1809年），领导十几位能干的门徒暴露政治上的腐败和无能。美以美会和福音派的布道有一些效果；当法国大革命引起了在道德上如此混乱的国家，如何可能成功地击退法国人的入侵或救平国内叛乱的恐惧时，其效果自然就扩大，而变成一股为压制社会的邪恶而掀起了对抗决斗、娼妓和淫秽的逆流。其他的改革者则攻击童工，利用孩子去扫烟囱，监狱中的恐怖，刑法典的残酷等等。一阵人道主义的浪潮，部份溯源自宗教，部份溯源自启蒙运动，推广了博爱和慈善的工作。

威廉·威尔伯福斯，是英国改革者中最不眠不休的一人。出生（1759年）于郝尔镇（Hall）的一户在土地和商业两者上都很富有的人家，读毕剑桥，成为威廉·庇特的同志，他于庇特任首相后一年（1774年），毫不困难地选入国会。体认到福音派运动的影响，他协助创立了礼貌改革社（the 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1787年）。尤其，他抗议一个由官方承认的基督教国家却依然容忍在非洲的贩奴举动。

英格兰此时在这种贩奴勾当上居领导地位。1790年，不列颠的船只运送3.8万名奴隶至美国，法人的船舶运送2万，葡萄牙1万人，荷兰4000人，丹麦2000人；每一个国家依照其能力贡献了也许是历史上最大的犯罪行为一臂之助力。从利物浦到布里斯托尔，一艘艘船泊载着酒、军火、棉织品和形形色色的精小装饰品，到非洲的“奴隶海岸”去。在那里，时常受到买通的土著酋长的协助，基督徒船长们用他们的货物来交换黑人，然后再运到西印度和北美洲的南部各殖民地去。俘虏们紧紧地关在船舱里，有时，用铁链

锁起来,以防止叛乱或自杀。食物和饮水只够他们维持不死,通风设备简陋,卫生设施几近于零。为减少在狂风暴雨中的载重量,病奴也许就丢出舷外去;有时,没有病的也遭到同样命运,因为每一位奴隶都是保过险的,也许死的比活的更要有价值。据统计,运送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大约 2000 万名黑人,只有 25% 在航行中生存下来。<sup>⑨</sup>在回程时,船舶装载了糖蜜;在不列颠,这些糖蜜制成兰酒,这是用作下一次购买奴隶的。

在两大陆上的贵格派教徒,率先攻击这种贸易作为废除奴隶制的第一步。有 20 多位作家参与在英国的这一运动:洛克、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詹姆士·汤姆森(James Thomson)、理查德·萨维奇(Richard Savage)、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还有,其小说 Oroonoro (1678 年)对西印度经济作过叛乱性指述的阿芙拉·贝恩夫人(Mrs. Aphra Behn)。1772 年,贵格派教徒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从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Mansfield)伯爵处取得一份禁止奴隶输入不列颠的命令;任何奴隶于其踏上不列颠领土时起自然就获得自由。1786 年,另一位贵格派教徒,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发表一篇《论奴隶制和人种买卖》的短论(an Essay on the Slavery and Commerce of the Human Species),提出了几乎穷毕生之力研究的全部感人的结果。1787 年,克拉克森、夏普、威尔伯福斯、乔塞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和扎卡里·麦考利(Zachary Macaulay,史家之父)组成了废止奴隶买卖的会社(The Society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1789 年,威尔伯福斯向平民院提出终止这种邪恶的结果;法案被商业基金会挫败。1792 年,庇特又作了一次伟大的演说以辩护类似的提案;这一次也失败了。威尔伯福斯又于 1798 年,1802 年、1804 年和 1805 年一再尝试,而都遭到失败。直等到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出任短暂的部长时(1806 年至 1807 年),才迫使这件案子通过;国会屈服了,禁止了不列颠商人参与奴隶买卖的行

为。威尔伯福斯及支持他的“圣哲们”知道这次胜利还只是一个开端；他们掀起了一个解放此时仍然在不列颠领土上的每一个奴隶的运动。威尔伯福斯死于1833年；1月后，8月28日，奴隶制度在不列颠统治下的每一领土内全部废止。

## 第六节 礼 仪

1797年，最惊人的事件之一便是丝质高帽子的第一次出现。显然，这种帽子是由一位声称英国人天生具有特殊权利的伦敦男子服饰销售商戴着。群众聚集在他的周围；据说，有些妇女见到这种古怪的模样时昏阙了。但是，女装裁缝师和男子服饰经销商不能使这种帽子成为一种流行的款式是不值得惊奇的；没多久，所有上层阶级的伦敦男性在他们的头上都戴了一顶高顶窄边的大礼帽。

臀部挂剑，和头戴假发的风尚消失了。胡须刮得精光。大多数男性都让头发长到肩头；但是，一些年轻人借修头发来表达他们个人的轻蔑。<sup>⑥</sup>马裤(pantaloon)也穿到男人的双腿上；到1785年时，裤管长及小腿；到1793年时，它们已长到脚踝。鞋带已取代鞋扣，开始它们令人厌烦的统治。外套很长，此时已免去滚绣，但是背心却都精心制作，花费不赀。

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执政内阁下的当代法兰西一样，贵族和平民的混杂产生了“讲究修饰的人物”——“说大话的人”或“花花公子”。乔治·布鲁梅尔·“花花公子”拜访(George Bryan “Beau” Brummel)擅长于打扮自己，在穿戴装饰上要花去半天时间。在伊顿(Eton)，学生们称他为“吹牛大王”，他成了威尔斯王子的密友，王子感到，服装是一半的统治艺术。继承了3万英镑遗产，布鲁梅

尔就雇了不同的裁缝师裁制身体各部份的服装,使他自己成为伦敦男性的优雅服饰仲裁人。他风趣、温文、干净得仅次于三角崩带;但是,他爱好赌博更甚于整洁,债台高筑,渡过英伦海峡逃避债主讨债,过了20年贫苦潦倒的生活,以62岁的年纪,死在法兰西一家精神病收容所中。

妇女们放弃了衬裙摆的藤环,但是,她们仍然穿着紧腰衣以保持胸部平衡和丰满。腰围提高,一件大胆露胸的衣服遮盖着其他部位。当摄政时期(1811年至1820年),服装剧烈改变:紧身衣丢弃了,衬裙弃而不用,长上衣透明到足可显露两条玉腿的线条。拜伦认为这种暴露使追求者神迷目眩,他以罕见的道德口吻,抱怨道:“如夏娃祖宗一般,我们的闺女已没有羞耻感且迷失了,因为她们赤裸着,而毫不感到羞耻。”<sup>⑧</sup>

不过,穿着比起饮食来要节俭多了。餐食很精致,并不完全是因为气候关系需要皮下脂肪来保持身体热度而需要大量食物。穷人基本上可吃面包、乳酪、麦酒或茶过活;但是,在有钱阶级,主餐——有时从9点延长到午夜——可能有好几道菜:汤、鱼、鸡鸭、肉类、鹿肉、甜点,外加调制的酒类。甜点过后,女仕们退席,那样男人们就可自由自在地谈论政治,赛马和女人。斯塔埃尔(Mme. de Staël)夫人抗议道,这种色情的二分法是将主要的刺激总分为社会的礼仪和享乐两类。餐桌礼貌还不如法国那样优雅。

礼貌大致分为热情和粗陋两种。话中常带点猥亵;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枢机主教抱怨说:“每天滔滔不绝的猥亵话进步得很神速”。<sup>⑨</sup>毆斗在下层阶级中经常发生。拳击是一种大众爱好的运动。职业性拳击比赛吸引了各行各业的爱慕者。罗伯特·骚塞(1807年)留给我们一段描写当时情形的精彩文字:

当两位职业拳击选手间举行一场比赛时,消息顷刻间从报纸披露给读者;间或有一段文字记载双方训练的

生活情形,如他们采取何种练习,吃些什么——因为他们中有些人吃生牛肉作为准备。同时,观众和赌徒挑选他们的对象,而赌况也披露在报纸上,全部赛程时常是为大家所关心的;否则,少数无赖就会利用来愚弄许多无知的观众了。<sup>⑨</sup>

大群观众——有时达 2 万人之谱——聚拢来看这种发泄暴乱的场面。奥尔索普爵士(Lord Althorp)认为这种运动是人类侵略性本能的净化,但是,经纪人则视其为荷包的洗涤剂。

较穷苦的人藉将一条公牛或一只熊绑到柱子上,用棍子和狗来挑激它——有时一连两三天——直到一时怜悯心涌现时为止,他们才将作弄的动物处死,或送到屠宰场,以寻求发泄。<sup>⑩</sup>斗鸡直到 1822 年禁止时为止,一直是一项消遣活动。斗蟋蟀在英格兰可追溯到 1550 年,到 18 世纪时才有正式的比赛规则,有大群观众从事豪赌和广泛的合伙,在运动中提供了最大的刺激和竞赛。赛马供给赌徒另一项发泄情绪的机会,但是,赛马也含有古代对马的爱好和饲养与训练的照顾作用在里边。狩猎是各种运动中顶时髦的户外活动,狩猎者乘着华丽的马车到达狩猎地点,骑着骏马,跟在运动中欢欣跃腾的猎狗后面,疾驰在原野、庄稼、树篱、围篱和溪涧间。

每一阶级有其自己的社交场合,自咖啡店——在那里,简朴的人们喝啤酒、抽烟斗、看报和谈论政治与哲学——到布瑞顿(Brighton)的豪华皇家园榭(Royal Pavilion);在那里,有钱的人“几乎一年四季都欢欣鼓舞地沉浸在热闹中”。<sup>⑪</sup>在家庭聚会上,人们玩玩牌或别的游戏,听音乐或跳舞。“华尔兹舞”(Waltz)已经从德国传入,并且从德文 Walzen 变为 Waltz,并增加了旋转的动作。道德家们指责此种舞为原罪之渊藪。科尔里奇大约于 1798 年时断然抱怨说:“每一次舞会我都受到邀请跳舞的骚扰,这些邀请我都一

一婉谢。他们跳一种叫做 Walzen(华尔兹)的那种最不名誉的舞。约有 20 对舞伴——男人和他的舞伴彼此拥抱着,手臂、腰和膝盖几乎贴在一起,随着淫荡的音乐,在舞池中旋转,旋转……。”<sup>⑥</sup>

上层阶级在最称得上时髦的俱乐部——阿尔马克俱乐部(Almark's),怀特俱乐部(White's)、布鲁克俱乐部(Brook's)——之一安排舞会和其他派对;他们也在那里豪赌,和讨论西登斯夫人(Mrs. Siddons)的最近演出,威尔斯王子的放荡,简·奥斯汀的小说,布莱克的雕刻,特纳的《风暴》,和康斯特布尔(Constable)的风景。民权派中,社交盛事是在荷兰宫(Holland House),荷兰夫人(Holland)在那里举行晚会;在那种场合,经常可以碰到如布鲁厄姆爵士、奥尔良公爵非利浦(Philippe Ducd' Orleans)、塔莱朗、梅特涅(Metternich)、格拉顿(Grattan)、斯塔埃尔夫人、拜伦、托马斯·穆尔,或民权派的顶尖人物,也是与会者中的要人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等显要。<sup>⑦</sup>18 世纪末叶时,还没有一家法兰西的沙龙可与荷兰宫比拟的。

## 第七节 英国的剧场

除了这样多彩多姿的生活以外,还有到今天仍然很蓬勃的英国剧场的情形。纵使在目前,戏剧作家仍无甚价值,而演员也只不过是演演剧而已。不可避免的莎士比亚的竞争似乎斫伤了悲剧作品;自谢里登和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高潮之后,最佳新喜剧如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的“毁灭之路”(The Road to Ruin, 1792 年),和伊利莎白·英奇博尔德的“情人的誓言”(Elizabeth Inchbald's Lovers' Vows, 1798 年)都是一些垂死的挣扎。这两剧都

属于脆弱的中产阶级的感伤剧,与约翰生的令人捧腹大笑,或莎士比亚具有哲学上隽永的剧力万钧之戏剧不可同日而语。只有演员仍然居于剧格的领导地位上。

他们初看之下似乎是一个家族,他们从罗杰·肯布尔(Roger Kemble,死于1802年)的舞台,演到亨利·肯布尔(Henry Kemble,死于1907年)的舞台。罗吉生萨拉·肯布尔(Sarah Kemble),就是后来的西登斯夫人;约翰·菲利浦·肯布尔(John Philip Kemble),他于1783年参加Drury Lane剧团(译注:伦敦的著名剧团),于1788年成为该剧团之经纪人;和斯蒂芬·肯布尔(Stephen Kemble),他自1793年至1800年经理爱丁堡剧院。

萨拉生于1755年,出生于威尔斯的布雷肯(Brecon)的Shoulder-of-Mutton旅馆,当他父亲的旅行剧团在旅行演出中因早产而出生的。当她能演戏时,不久就替她安排了一个角色;10岁时,她就成了一位女配角。在她光辉灿烂的生命上,她设法接受相当的教育;她变成一位具有成熟和教养的头脑以及职业上都很卓越和永远妩媚的妇女。18岁时,她嫁给威廉·西登斯(William Siddons),她的剧团中的一名小演员。两年后,加里克(Garrick)听到她在地方上演戏的成功,就派一名代理人去看她表演。报告受到了重视,加里克提出要她在Drury Lane剧团演出的合约,她于1775年12月29日在那里主演宝夏一角(Portia)。她演的不很成功,部份是由于紧张,部分原因,也许是因为她才生产不久。她身材消瘦,高细而沉郁;容貌古典而拘谨了点,而她的声音,习惯在小剧场中,不能到达大剧场的观众耳中。经过了一段失望的时光后,她又回到了地方巡回剧团,有7年时间,她耐性地改良她的艺术。1782年,继承加里克为经理人的谢里登劝她重返伦敦。1782年10月10日,她担任托马斯·萨瑟恩(Thomas Southerne)的历史名剧“致命的婚姻”(The Fatal Marriage)一剧的名角;她的成功几臻十全十美之境,自那晚开始,她成了不列颠史上最炉火纯青的悲剧女演员。有21年

之久，她成了 Drury Lane 剧团的台柱，有 10 年多时间，她是 Covent Garden（译注：伦敦中心地区之广场，有青果市场和歌剧院等）风头最健的皇后。看她在那里演麦克贝思夫人（Lady Macbeth）是一名看戏者一生中弥足珍贵的经验。1812 年 6 月 29 日，以 57 岁的年纪，她扮演那个角色，她所演的梦游一景，令观众深为感动，这一场戏比当晚其余的戏目更要赢得喝彩和掌声。<sup>⑨</sup>之后 19 年的时间，她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她的忠诚的婚姻生活，令街谈巷议者有些怅然。盖恩斯伯勒（Gainsborough）的画艺令她倾心，直到今天，她的画像仍然是国家人像画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中令人注目的一幅。

她的弟弟约翰·菲利浦·肯布尔，跟她一样出生在乡村客栈中，因双亲之故，是一位天生的天主教徒；也许，依然流行的理论，一位授圣职的人员为全家带来进入天国的机会，他被送到杜埃（Douai）的天主教学院和修道院去进修；他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古典教育，他在那里获得了神职人员的庄严态度，那种态度几乎后来出现在他的每一种角色中。但是，在那种恬静的环境里，他父亲的演艺事业却对他具有一种神秘的魔力。18 岁时（1775 年），他离开杜埃，回到了英格兰；一年后，他加入一个旅行剧团；1781 年时，他在都柏林（Dublin）饰演哈姆里德（Hamlet）一角。在那里，他的姊姊萨拉也参加了一段时间，此后，她带他一道加入 Drury Lane 剧团。<sup>⑩</sup>他在那里初次登台时（1783 年）饰演的哈姆里德一角只成就平平；伦敦的大众发现他演此一角色太镇定，剧评家批评他不仅节缩并且修改了莎士比亚的脚本。不过，当他加入西登斯夫人在“马克思”一剧中演出时（1785 年），他们的演出被称之为英国剧史上的一件盛事。

1788 年，谢里登，当时 Drury Lane 剧团的主要所有人，指定肯布尔（即约翰·菲利普）为剧团经理。他继续担任主角，但是，雪瑞丹的喜好独裁，和财务不稳定使得这位多感的演员不很惬意。



1803年,他接受了 Covent Garden 剧院的经纪业务,购下这份 2.3 万英镑事业的 1/6 的股权。1808年,剧院大厦毁于一旦。过了一段奢侈的优闲生活后,肯布尔重掌新建剧院的经理事务;但是,当他设法提高票价以抵销新建筑意想不到的昂贵费用时,听众们不断喊叫“老票价!”而阻了他的下一剧演出,直到他承诺恢复原价,他们才准他继续演下去。<sup>⑧</sup>因诺森伯兰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赠予 1 万英镑而挽救了这个剧团的命运。肯布尔继续奋斗下去,年轻演员对他的挑衅不断地在增加。在 *Cariolanus* 一剧中获得最后胜利后;当曾在 1809 年中表示反对的同一批观众的喝彩声震动了剧院时,他离开了不列颠的舞台,将他的皇冠交给埃德蒙·基恩(Edmund Kean)。古典派演技也随他而一同从英格兰消失就如随他的朋友塔尔玛(Talma)一同从法兰西消失一般;浪漫运动在剧院中抬头,一如在绘画、音乐、诗和散文上一样。

基恩的一生包括他的敏感职业,一切幽默和悲剧的兴衰。他于 1787 年出生于伦敦的一处贫民窟,是阿隆(或埃德蒙)基恩(Aaron or “Edmund” Kean),一名舞台管理,和安·凯里(Ann Carey),在舞台和街头争取一点糊口钱的女演员,两人一夜春宵的结果。在幼年时被双亲遗弃,他由父亲的兄弟摩西·基恩(Moses Kean),一位大众化的演艺人员扶养长大;而更正确地说,由摩西的情妇,夏洛特·梯慈威尔(Charlotte Tidswell),Drury Lane 戏团的一名小演员抚养长大的,她训练他演剧的艺术和诀窍,而摩西则使他去研究莎剧中的各种角色;这孩子学到了可以掌握住乡下观众的每一种技巧,从杂耍、腹语术和拳击,一直到哈姆里德和马克思。但是,他具有刚愎自用的个性,不断地离家出去,最后,夏洛特在他的脖子上套了一个狗领箍,刻着“Drury Lane Theatre”三字。到 15 岁时,他才取下这支领箍,以演任何角色的演员身份,去追求一份独立的事业,赚取每周 15 先令的报酬。

有 10 年时间,他过着一位漫游演员的光辉、忙碌的生活;几乎

经常一贫如洗,遍遭屈辱,但是却怀着一腔他可超越英国舞台上任何人的灼热自信。不久,为忘却他的艰辛和痛苦。他借着酒精作为梦想他高贵的出身和即将来临的辉煌胜利时刻之到来。1808年,他娶了玛丽·钱伯斯(Mary Chambers),一名旅行剧团的随员,她替他生了两个儿子,并使他放弃他的爱好:威士忌和女人。最后,经过许多年在莎翁的脚本和扮演一只年老的黑猩猩之间每况愈下的徘徊后,他接到 Drury Lane 试演的邀请。

就他在那里初次登台来说(1814年1月26日),他挑选了难演的夏洛克这一角色。他将生命中体验的轻蔑注入角色的某些情节中去。当夏洛克以轻蔑、讥讽的口吻,向基督徒的威尼斯商人讨回一笔债务时说,

一只狗有钱吗? 一只杂种狗  
可能借出 3000 ducats 吗?

基恩好像已经忘记了他是夏洛克以外的任何一人了;他注入到这一剧中去的感情和过份狂暴,几乎以两句话,终止了英国演剧的古典世纪,并在伦敦舞台上打开了感受、想象和罗曼史的世纪。渐渐地,观众原本疏落的掌声和怀疑的神情,被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演员带到另一境界,而这位演员自己也被剧里的气氛所迷住了。一景接着一景,欢呼和喝彩越来越高,直到落幕时,半数观众狂欢得对他折服了。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当时最权威的批评家,匆忙离去赶写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基恩,赶返家中,拥抱着妻子和孩子,对妻子说:“啊!好!玛丽,你有马车可坐了。”而对孩子则说,“孩子,你们要到伊顿去读书了。”<sup>69</sup>

在基恩参加《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的第二度演出时,剧院客满。于第三度演出时,剧场经理塞缪尔·惠特布雷德给予基恩他们同意为期3年,周薪8镑的契约,基恩签了字;

惠特布雷德接过契约,并改8镑为20镑。基恩的契约索酬每晚50镑的时间不久也到来了。他几乎演过每一个著名的莎翁笔下的角色——哈姆里德、理查德三世、理查德二世、亨利五世、马克思、奥西洛、依阿哥、罗密欧。除了最后一个角色外,他全部演成功;罗密欧的贵族特有的优雅气质,对一个饱经风霜的演员是很难把握得住的。

当轮到他去看渴望着他的位置的年轻演员演出时,他却将赚来的钱挥霍在饮酒上,大请酒店中的偶像崇拜者,<sup>⑧</sup>加入“谴责一切贵族和绅士”的一个秘密社团,并受到与一名市议员的太太通奸的控告(1825年)。<sup>⑨</sup>他付出讼费,并尽力争回在剧院中的地位;但是,他的头脑却记不起他扮演过的角色的台词了,不止一次,他忘掉了台词。观众的无情一如当年的偶像崇拜一样;大家朝他侮蔑,责问他为什么饮酒如此过度。他离开了英格兰,胜利地游历美国,制造了另一次的财富,随之又挥霍殆尽。他返回伦敦,同意在Covent Garden(1833年)扮演奥西洛,他的儿子扮演依阿哥。观众称赞依阿哥,并无一词称赞奥西洛,没有掌声支持的演出对基恩是太过份了;他的体力耗尽,他几乎瘫痪。于说完“再见!奥西洛的风头已消逝了”这一句后,他跌入儿子的臂弯里,轻声对他说:“查尔斯,我要死了,替我说给他们听。”<sup>⑩</sup>他被抬到家里;他曾一度遗弃的妻子小心翼翼地照顾他。二月后,1833年5月15日,他去世了,才46岁。英国史上——除加里克外,英年早逝的一位最伟大的演员。

## 第八节 总 结

总而而之,这是一个蓬勃而多产的英格兰。在这幅蓝图上有许多弱点,就如每一幅生命的真实图画一般:自由农消失了,无产阶级受到奴役,饮酒和赌博毁掉幸福和弄得家庭破碎;政府毫不隐饰阶级特权;法律是由少数男人为其他的男人和全体妇女所定的。不过,隐藏在这些缺点和罪恶之中的科学却正在发展,哲学正在反刍,康斯特布尔正在揭发英国的风景,特纳正在扣住太阳和扼止暴风雨,沃兹沃思、科尔里奇、拜伦、雪莱正给予英格兰自伊利莎白一世(Elizabeth I)起,任何地方都无以匹敌的一次盛大的诗会。在这一切惊天动地的情况下,正有一次准许更多自由的秩序和安定在酝酿——除了法兰西外——那里过多的自由正在自毁——比欧洲任何国家多要多的自由。除了战争时而外,有迁徙和旅行的自由,崇敬和礼拜的自由,新闻发表的自由,和依据先例,为辩护涉及腐败和目无法纪以及不安定的暴乱之革命的自由。

它不是高水准的誉论;它时常发表一些无关宏旨的迂论,和高揭起古旧的禁忌;但是,它有勇气去轻蔑一位堕落的王子,和赞扬被他残酷地遗弃的妻子。<sup>⑥</sup>它也经常在上百种致力于教育、科学、哲学和改革的社团和会社中表白自己。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它在公共集会中表白自己在法律保护下运用请愿的权利;当它感到寡头政治的手段太沉重时,它采取了如一位耐性的英国人采取的最后立场般起而抵抗;不止一次,经常有暴动在乡间和街道上进行。

政府是贵族政体,但它至少还表现得很文明;它推广礼貌,阻止反覆无常,抗拒艺术中的粗野作风,和信仰上的迷信,以维持第

永的水准；它支持好几种良好的运动，和不让它的伟大诗人受饥挨饿。偶尔有一位疯癫的国王当权，但是他的爪牙却被剪除，使他变得无可奈何，他成了国家团结的一个象征，国家的热诚和骄傲的一个焦点；没有为了要驱逐一位有用的司仪而杀害上 100 万人民的意识存在。于谦让了一两回合后，一位英国人就可自顾自地走他自己的路；但是，他不坚持在立法上擦鞋童和男爵有相等权利的主张。“在英格兰，”斯塔埃尔夫人指出：“每一个人都有创制的权利；群众都十分有节制。”<sup>①</sup>它是让自由萌芽的另一种秩序。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种结合在艺术、科学、哲学、文学和政治才能各方面的作用吧。只有如此，公元 1800 年时英国生活蓝图，才公正和完整地在我们的了解之内。

## 第三章 英格兰的艺术

### 第一节 艺术家

艺术(art)和艺术家(artist)两字,在基尔特时代(guild days)指的是手艺(craft)或手艺人(craftsman),到18世纪时,当手艺和基尔特由工业和工人取代了时,就改变了它们的意义;现在,它们指的是音乐、装潢、制陶业、素描、雕刻、绘画、雕塑和建筑之经营和工作者。又天赋(genius)这个字,指的是某种与生俱来和特异的性质,或某种超自然的精神,现在,是指某一种超自然能力或具有此种能力之人的性向;如奇迹(miracle)和神迹(act of God)一般,它已变成一种用来对一个异常人或一件异常事的自然和特殊说明的便宜措辞了。

因工业、商业和都市生活之转变,使艺术的贵族气息有更进一步的衰退;不过,我们必须指出的,有钱人支持了沃兹沃思和科尔里奇两人,而埃格雷蒙特爵士将在佩特沃思(Petworth)的庄园宅邸供来自伦敦的特纳隐居。乔治三世以5000英镑的赠赐和在萨默塞特(Somerset House)的宽敞房舍以协助创立了皇家艺术学院(the Royal Academy of Art, 1768年)。它的40位学员并不如他们

的法国同侪般自动地成为不朽,但是,他们却晋入具有乡绅头衔的士绅阶级,虽然他们的新尊荣不能传给子孙,它却有助于改善了大多数艺术家在不列颠的社会地位。该学院设有解剖、素描、绘画、雕塑和建筑各科,无可避免地,一所由一个保守的君主支持的机构变成了一所传统和社会地位的堡垒。具有革新头脑的艺术家贬斥它,这群艺术家人数越来越多,并且赢得喝彩,于1805年,某些贵族和银行家斥资创立了不列颠美术发展研究所(the British Institu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e Arts),举行定期展览、颁奖并提供与皇家学院竞争的蓬勃风气。在这些竞争势力的指导、激励和滋养下,不列颠的艺术在各方面都创造出优异的作品。

不,音乐是一个例外;音乐在这一时期中没有难忘的作品出现。英格兰十分清楚这方面的贫乏,却用对来自大陆的作曲家慷慨的赞助作为补偿;所以,她在1790年给予海顿(Franz Joseph Haydn)衷心的欢迎,于1794年再度盛大欢迎。皇家交响乐团(the Royal Philharmonic Society)创立于1813年,历经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两朝拿破仑王朝,和两次世界大战,而迄今仍如一个永恒的音符般屹立在变动无常的潮流中。

二流的艺术品仍如平常一样地在滋长。它们继续在创造优雅却笨重的家具,精制的钢制品,和线条优美的陶器。本杰明·史密斯(Benjamin Smith)替伦敦市用铁熔铸了一支华丽的烛台,作为对威林顿公爵(the Duke of Wellington)的赠礼。<sup>①</sup>约翰·弗拉克斯曼(John Flaxman)除了替韦奇伍德(Wedgwood)的陶器厂制作古典设计外,并制造著名的特拉法尔加银杯(Trafalgar Cup)以纪念纳尔逊的胜利,<sup>②</sup>他是在圣保罗教堂中建造巍峨的纳尔逊纪念碑的雕刻家和建筑师。

不这,雕刻在英格兰几乎是一种不重要的艺术,也许是因为雕刻偏好裸体像,不适合这个国家的风气和道德之故吧。1801年时,托马斯·布鲁斯(Thomas Bruce),第7代埃尔金伯爵(Seventh

Lord of Elgin), 于出任驻土耳其宫廷的不列颠使节时, 说服在雅典的土耳其当局, 让他从阿可洛波里斯(Acropolis), 将“那里一些有古代刻文的石块或人像”搬走。费了一番口舌, 埃尔金伯爵将万神殿上的大部分带状雕刻、和许多大理石半身雕像, 于 1803 年—1812 年间, 一船一船地运到英格兰。他被拜伦和其他人士贬斥为一位贪婪的艺术破坏者, 但是, 他受到国会一个委员会的庇护, 而这批“埃尔金大理石”(Elgin marbles) 以 3.5 万英镑代价由国家收购了去(比埃尔金所付的代价相差甚巨), 从此就存放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中。

## 第二节 建 筑

在古典浪潮与哥特式(Gothic)微波对抗下的建筑形式之争中, 大理石占着重要的地位; 上千根圆柱——多丽斯式的(Doric), 伊奥尼亚式(Ionic)的, 或者科林斯式的(Corinthian)——进而阻止了回复中世纪的武士和圣哲们喜爱的尖弧形和楼塔牒型的建筑之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和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的业余努力。纵使在世俗的建筑中, 圆柱也占了上风; 威廉·钱伯斯(Sir William Chambers)的萨默塞特便是一座广袤的万神殿, 许多村舍看上去就像护卫着一座罗马宫殿的希腊式列柱走廊; 且让詹姆士·怀亚特的阿希利奇公园宅邸(James Wyatt's Ashridge Park mansion, 1806—1813 年)作为这种形式的一个范例吧。1792 年, 这位未来的约翰·索恩爵士(Sir John Soane), 一名砖匠的儿子, 开始重建座落在—座科林斯式圆柱门廊后面的英格兰银行, 它是融合康斯坦丁式拱门(the Arch of Constantine)与太阳庙或月亮



庙为一体的一种建筑。

因霍勒斯·沃波尔的斯屈贝瑞丘陵(Strawberry Hill)而开始复活的哥特式建筑(1748—1773年)不能使其抗衡列柱、圆顶和山形墙之大量涌现。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是这种浪漫气息的中世纪梦幻之英雄。父亲是曾两度出任伦敦市长的有钱人,他接受了超过他天资的过多教育:他从年轻的莫扎特(Mozart)接受钢琴课程,从威廉·钱伯斯爵士接受建筑训练,从修业旅行中接受历史知识。在洛桑(Lausanne),他买下吉本的图书馆。于谣传了一阵子绯闻后,他娶了玛格丽特·戈登(Margaret Gordon);她在生产中去世。同时他写了 *Vathek* 一书,是最具吸引力的东方神秘小说之一,浪漫气氛从此就蓬勃兴盛起来;此一小说以英、法两种文字发行(1786—1787年),赢得拜伦的极高赞扬。在怀亚特的协助下,贝克福德于1796年在威尔特(Wiltshire)的方特希尔(Fonthill)邸第上盖起一座哥特式的修道院,里边收藏着艺术品和书籍;并且自1807年至1822年间在那里过着隐居的生活。接着他卖掉了它。之后不久,因该建筑倒塌泄露了此建筑在结构和设计上的基本缺点。他于1804年死于巴斯(Bath),享年85岁。约翰·霍普纳(John Hoppner)替他画的画像(约绘于1800年)替他保持了一份诗人的、神秘的和亲切的神韵。

约翰·纳什(John Nash)借加上少许洛可可式(rococo)的活泼情调改变了不列颠建筑的传统形式。在庭园设计师汉弗莱·雷普顿(Humphry Repton)的善意赞助下,他以点缀茅舍、凉亭、牛棚设计了法国、印度和中国式的乡村景色。它们取悦了性情苦闷的贵族和仕绅;纳什变成了有钱人,并赢得“奢侈之子”的雅号。1811年时,他受命重建从摄政的卡尔顿宫起通至乡间的1英里长的摄政街上一个急转弯,纳什以新月形和坡形的不同形状来建筑,并在建筑物的空地上种植青草或树丛,并且利用伊奥尼亚式圆柱来美化通衢的转弯处。(大多数被推倒的建筑则准许建造大厦而少种青

草)。它是市镇计划上一篇杰出的作品,但是,其花费之昂使得一个正在和拿破仑交战而几近饥饿的国家震惊。

然而,愉快的摄政王却要求纳什重建在布赖顿(Brighton)的皇家园榭(The Royal Pavilion),即是王子及其朋友们的一处游览胜地。纳什在1815年至1823年间完成了这一任务,一共花去16万英镑。他将这座凉亭重建成印度—穆尔人的式样(Hindu-Moorish Style),有帐形圆顶和侧伸的尖塔。它的招待室重新用椭圆形天花顶和中国式装潢来装饰,连同莲花形和盘龙形吊灯在内,一共耗资4,290英镑。<sup>④</sup>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奇妙绝伦,最后验收时却指责在装饰和花费上太过浪费。

1820年,乔治四世成为摄政。不久,他委任纳什重建白金汉宫成为一座皇宫。随着战胜拿破仑而来的贫穷和濒于破产边缘的情况下,纳什仍勤奋不辍,出钱出力,直到这位皇家浪子去世为止(1830年)。然而,这位精力充沛的建筑师却奉新政府之召唤去说明他的开支和在这座建构上的某些想当然的瑕疵。英格兰弄得如此美轮美奂,或者说是如此贫穷是空前所未有的。

### 第三节 自卡通到康斯特布尔

当20年战争期间,上千名不列颠艺术家,在养活家人和实现他们的梦想上挣扎。在报酬和名誉上,用漫画来表达过去情形而发表在报章上的漫画家并不是最卑微的一群。对这群恶作剧的天才们而言,拿破仑是一份恩惠,因为他们每日的“小邦拿”讽刺画(Satires of “Little Boney”)——或者“地中海的混血儿”(the Mediterranean mulatto),如《晨报》(the Morning Post)就这样称呼

他<sup>⑤</sup>——是送到一位筋疲力竭的战争英雄手中去的子弹，和那位愤怒皇帝自尊心上的一根芒刺。

这群讽刺画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便是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父亲是一名富有的投机商人；他在素描天才上得到充分的鼓励。于皇家学院研修结束后，他到巴黎的皇家艺术学院去就读(The École de l'Académie Royale)，再返回伦敦后，不久，因他的素描而赢得了喝彩。父亲因在赌博上输得倾家荡产而突然变得一贫如洗，他却因得到一位在法国的姑妈济助 3.5 万英镑而重新恢复生气。讽刺他那个时代的荒谬和虚伪是自由的，他画出一位女公爵为了争取屠夫的一票而去吻屠夫，一位胖嘟嘟的教区牧师从一名面有菜色的农夫手中接过一只猪作为什一税，和一群海军军官到码头上去猎取妓女等的讽刺画。他不断素描情节错综复杂的漫画——“沃克斯霍尔花园”(Vauxhall Gardens)，“巴斯风光”(Comforts of Bath)和举国知名的开怀连环画“辛塔克斯博士游历记”(The Tours of Dr. Syntax)。他对政客、喝酒喧闹的人和傻瓜们的愤怒导致他用夸张的手笔去画出值得原谅的夸张漫画。他的许多素描过份夸张了猥亵的一面；他的讽刺失去了一切有益的怜悯；他的后期作品表现出鄙视人类的气息，就好像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位受爱戴的母亲或一位慷慨好施的人物值得去赞扬似的。

甚至更要通俗的便是詹姆士·吉尔雷(James Gillray)的漫画了；读者争着在书摊上抢购他的初版漫画书。<sup>⑥</sup>如罗兰森一样，他读过皇家学院，成为一名卓越的艺术家的想象生动，线条稳健。他的艺术几乎都着重在战争方面：他把拿破仑画成一名侏儒，约瑟芬为一位卖鱼婆，他画出福克斯、谢里登和霍勒斯·图克(Horne Tooke；以上诸人都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匍伏在一家伦敦的俱乐部里，静候着大革命胜利的详情。他的讽刺画重刊本——观念粗俗，形式精美——在全欧各地发行，连正在垂败中的拿破仑都看到了。<sup>⑦</sup>他死于滑铁卢之役前 17 天。

在那个世代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版画家,但是,威廉·布莱克在保存时代的错误上刻划得最深刻。他塑造出自己的风格,甚至尝试用蚀刻将课文和插图雕在铜版上以取代印刷。但是,他的文笔超过他的雕刻工具,最后,他透过诗来表达他的感受。

他是一位反叛者,因为他痛恨贫穷;因为皇家学院认雕刻家为工匠而不是艺术家,不准许他们的作品在皇家学院陈列,因为他激烈地攻击皇家学院干涉法令、传统和艺术资源的命令。“英格兰所要的,”他宣布(约在1808年);“不是一个人是否有天才和天赋,而是他是否肯任人摆布、圆滑熟练和在艺术上是否服从贵族们意见的奴才和保守分子。如果是,他便是一位神人。如不是,他就得挨饿。”<sup>⑧</sup>他有时几乎挨饿,因为他的素描和雕刻只能得到微薄的报酬;而在1918年时的伦敦,这些作品却可卖到1.1万美元。<sup>⑨</sup>他为《约伯书》(The Book of Job)一书作了22幅插图,使他自1823年到1825年间每周有2镑的待遇过活;这些插图以5600镑的代价卖给了皮尔庞特·摩根(J. Pierpont Morgan, 1907年);它们是历史上最精美的一批雕刻中的一部份。

布莱克是介于异端和清教徒、古典和浪漫气息间的一位复杂人物。他受到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雕像和西斯丁教堂(Sistine Chapel)天花板上的雕刻所陶醉。他也感受到健美人体的优雅线条;他将此种优美表现在名为“愉快的一天”(Glad Day, 1780年)一画上——一位穿着透明衣服的青年,怡然自得的愉快神情。性在他的艺术品中只占轻微的部份;在他的诗中却有过多的描述,但是,在他的生活中却并不十分重视;他有一位忠贞、自持、能干而可爱的妻子,他的素描起初是偏向古典的,线条胜过色彩,形象超过想象;但是,当他年龄渐长,而又深爱着《旧约》时,他就让画笔任意地画出穿着袍子的想象中人物,脸上刻划出生命的迷惘。<sup>⑩</sup>

在他的晚年,他为但丁(Dante)的一本书作了7幅版画;在病榻上(1827年),他又印刷了关于创世纪的一本“古老的日子”一书

(The Ancient of Days)。这是一本集他超自然的想象力和艺术达于纯清之境的一本集子,于他去世后一世代,他成了拉斐尔学派(Raphaelite)的先驱。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他。

在画家中,除了面包和牛油以外,主要的问题是:他们究竟该与学院派的意见和趣味迎合到何种程度?有些教授们对历史题材给予了极高的赞许,如绘制值得记忆事件中的著名人物便是。另一些教授们则称许能刻划特性的肖像画法——作为取悦希望保存在油画里的名人的方法。少数学院兄弟会的会员注意风俗画,因为这种画有大众化的气息。得到最少赞许的便是风景画了;一名醉心于风景画的画家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 1776—1837年,英国风景画家),直到53岁,在得到皇家学院准许他成为会员之前,一直默默地独自工作着。

1792年,约书亚·雷诺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去世,学院选出一位居在英格兰的美国人充任院长。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于1738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春田镇(Springfield)。他在青年时期就表现了在艺术方面的天才,慷慨的邻居送他到费列得尔菲亚(Philadelphia)去进修,接着再到意大利。吸取了那里的艺廊和废墟上的古典真传之后,他就去到伦敦(1763年),绘制一些有利润的肖像画,取得乔治三世的欢心,同时也走上了历史题材方面的路子。他作了“渥尔夫之死”(The Death of Wolfe, 1771年)——一画,渥尔夫是从蒙卡尔姆(Louis Joseph, Marquis de Montcalm)和法兰西手中夺取了加拿大的英雄,以现代服饰绘制的现代人物画震惊了皇家学院;不过,长老们则认为,大半欧陆上的人士则对穿着古代服饰的人物画较为敬重。

另一名美国人,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John Singleton Copley), 1738年生于波士顿近郊,以他的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塞缪尔·亚当斯和柯普莱家族等肖像而赢得声名。1775年,他迁入伦敦。不久,以“查禅之死”(The Death of Chathan,

1779年)一画达到巅峰。为逃避新古典派的历史人物画法,他以一种创新的写实主义手法来描绘事物——显然,这种手法令学院派不耐——却引发了英国在绘画上的一次革命。

皇家学院的教育在苏黎世(Zurich)的约翰·亨利·菲斯利(Johann Heinrich Füssli)的领导下仍继续不辍,他于1764年,年方23岁,就摇身一变成为伦敦的亨利·富泽利(Henry Fuseli)。在雷诺的鼓励下,他于1770年前往意大利去研修8年。他的天马行空的天才却并没有完全由古典范本和正规模式所治愈。当他重回到伦敦时,他以“梦魇”一画(The Nightmare)去骚扰一些睡美人(1781年),在此画中,一位可爱的妇人梦到她被一群狰狞的妖魔亲近。(这幅画的一幅复制品挂在西格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研究室里)。不去管他本人和他的嘲笑机智,富泽利毕竟成了皇家学院的一名教授,他在那里的讲座很容易转入浪漫气氛和拉斐尔前期的风格上去。

靠画风景来谋得一份生计的困难情形则由约翰·霍普纳和约翰·克罗姆(John Crome)的一生来作证明。霍普纳因爱好风景画而挨饿,然后,因画肖像而发达,在绘画的数量和报酬上几乎与劳伦斯(Lawrence)争雄。纳尔逊坐下来供他画;威林顿、沃尔特·司各脱(Walter Scott)以及不计其数的贵族们也供他画过;圣·詹姆斯(St. James)的皇宫藏有许多霍普纳的遗作——克罗姆在他53年的生命上,几乎没有离开故乡诺威奇(Norwich)一步。他有一个时期画标志;研究霍贝玛(Hobbema)和其他一些荷兰大师的画;从他们那里学到从简单的生命中去吸取琼浆的方法。穷得不能去游历,他就从诺威奇的穷乡僻壤中寻找题材。他从那里找到他画出他的杰出风景画 Mousehoed Heath 中的风光。艺术和哲学至此已臻化境了。

劳伦斯爵士步上肖像法的坦途。他是一家客栈老板的儿子,所受教育不多,接受艺术熏陶更少;在没有学院的影响下,说他有如

何成就,一定会使学院派不开心。他具有一种瞬即抓住人物特征而绘下来的那种属于先天性的秉赋。童年时,在布里斯托尔,用铅笔;青年时,去巴斯,用粉腊笔作画;一直到他迁入伦敦(1786年),他才用油漆颜料。也许是他的健美身体和愉快神情使大家都乐意打开心扉和大门欢迎他吧?还只20岁时,他受委任到温莎宫(Windsor)去,为夏洛特·苏菲亚皇后(Queen Charlotte Sophia)画肖像。他竟画得非常成功(因为她并不漂亮),他在22岁时被选为皇家学院的副会员,25岁时成为正式会员,上百贵族争相坐在他的画板前面。他拒绝克伦威尔(Cromwell)要他画下缺点和优点的忠告。缺点里没有黄金。他改良坐在他画板前面的人物特征,他们都毫不抗议;他画出仕女们所没有的美貌,他在画上让她们穿着飘逸的薄纱袍子,画出纤细修长的手指和含情脉脉的眼波,让她们在画上摆出优雅的姿态。他的一幅代表作是他于1815年画的英俊和生动的摄政王子的肖像画。有时候,如收藏在亨廷顿艺廊(Huntington Gallery)的Pinkie一画中所表现的,他表现出令人难解的愉快神情,但是,在他的男性肖像画中,我们看不到由雷诺的创造,由他的姊妹的传习的那份刚毅的个性。劳伦斯赚了不少钱,施舍得也很慷慨,成了他那个时代的偶像。当他死时,一队杰出人物组成的执绋行列,护送他到圣保罗教堂墓地。

康斯特布尔坚持画风景画,直到40岁竟娶不到一个老婆。他的父亲是一位萨塞克斯(Sussex)的磨粉厂厂主,很欣赏儿子的素描和绘画天才,资助他在伦敦研究两年。但是,康斯特布尔的发展很慢;到1797年时,他感觉他得不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就回到萨塞克斯在父亲的磨粉厂中工作。在休闲时,他则继续绘画。他将他的一些作品送到皇家学院,获得了入学许可。所以,在1799年,他再度回到伦敦,得到父亲一份津贴支持,和本杰明·韦斯特的鼓励。另一位艺术家,理查德·雷纳格(Richard Reinagle)在那一年画了他的一幅动人的肖像。

也许是他读了沃兹沃思关于温得米尔湖(The Lake Windermere)周围风景的诗篇吧,因为他也从每一片树叶上发现了上帝。1806年,他游历中西部湖区(The Lake District),引起他去研究被雾水笼罩的群山,和在细雨纷飞下愉快的原野风光。他回到了伦敦,决心将他的艺术致力于自然。他谈到他的风景画时,他希望“用短暂的一瞬间,从绵密不尽的时光中,抓到永恒和清醒的存在。”<sup>①</sup>同时,他接受一些临时差使,以维持食宿。1811年时,他终于创造了他第一次被誉为杰作的作品——Dedham Vale,日正当中时一幅埃塞克斯(Essex)的风景画。

好像就在那一年,他与正等候着他去注意的玛丽亚·比克尔(Maria Bickell)堕入爱河;但是,她的父亲却禁止她与像康斯特布尔那样收入微薄的人来往。直到5年后,他的父亲去世,留给他一笔可贵的遗产,他才敢表示他的爱意。她的父亲怜悯了这份情意,康斯特布尔才娶了他花钱得来的新娘,喜孜孜地画下了目前光耀在泰特艺廊(Tate Gallery)一面墙壁上的她的画像。之后,他绘出英国艺术上空前的优美风景画——虽并不如特纳的那样有刺激性,但是,以一份爱心,表达了英国乡间每一片叶子宁静和碧绿的朝气。在那一段愉快的时光中,他呈给皇家学院 Flatfort Mill(1718年)——“白马”(The White Horse, 1819年), The Hay Wain (Wagon, 1821年),“索尔兹伯里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 1823年),和“麦田”(The Cornfield, 1826年)等画。每一幅画都是杰作,却赢得极少的赞扬。

1824年,他将 The Hay Wain 一画送到巴黎沙龙去展览,1825年,“白马”一画到里尔(Lille)公诸于世。每一幅画都赢得一面金牌,而法国评论誉康斯特布尔为一位大师。伦敦的皇家学院,不久,终于承认他为正式会员(1829年)。

这份光荣来得太晚,对他已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在那一年他的妻子去世了,也许是因伦敦的煤烟恶化了她的肺结核之故吧!康斯



特布尔继续创作如“山谷农场”(Valley Farm)和“滑铁卢”(Waterloo Bridge)这种气势雄伟的风景画,但是他的后期作品几乎都反映出一份持久不去的忧愁。直到他突然死去,他一直怀着哀伤的神情。

## 第四节 特 纳

(公元 1775—1851 年)

约瑟夫·莫洛德·威廉·特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就如他的名字一样自负,决不允许一份敌对的评论和一段破碎的爱情去扰乱他朝杰出艺林迈进的步伐。

他生于 1775 年 4 月 23 日,也许与莎士比亚是同月同日生的。父亲是 Covent Garden 后面处女巷(Maiden Lane)一家理发店的老板,那里几乎不可能是一位风景画大师生长的地方。依照一位早期传记作者的说法,<sup>①</sup>处女巷是一处“阴暗污秽”的地方。污泥路,人声嘈杂,小贩叫卖声喧嚷嚷。理发店正对面是一家客栈 The Cider Cellar,游客经常唱出一些预言式的歌谣。此外,威廉的姊姊出生不久即死去,母亲变成疯子。自然和环境给予这孩子一副坚强的身体和意志,一个现实的头脑,和 76 年历经危机、批评和淬砺奋发和不能动摇的自信心。

他的父亲从他身上看出与处女巷不甚协调的一份天才的讯息。他将 10 岁的威廉送去与在 Brentwood, Middlesex 的一位叔伯同住,威廉就在那里上学。两年中,这名男孩已经画了一些素描,令他自负的父亲挂在理发店内外出售。一位牧师顾客推荐其中一些给学院的朋友。不久,威廉就去学院接受一次测验,他表现得很好,

他在 14 岁时就成了那里的一名学生，一年后，并准许他在展览会上展出一幅水彩画。

当 1789 至 1792 年的假期中，他带着素描本子游历乡间，远至如牛津、布里斯托尔和威尔斯等地方的野外；那些关于土地、太阳和大海的热情素描草图至今仍可在大英博物馆中见到。十几岁时，他将他的素描卖给杂志社；21 岁时，他开始在皇家学院展出油画；24 岁时，他被选为副会员，27 岁成为正式会员。借卖画维持经济独立，他在赫尔利街(Hurly Street)64 号开了一间宽敞的画室(1800 年)；他的父亲前来和他同住，并充当他的伴护和业务经纪人。这份亲情与这位艺术家的不愿娶妻的念头颇为融洽。他并不是身体上或容貌上不具吸引力；态度上倒不太具有魔力。他是一位专心于事业的人。因为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他主宰着英国的艺术，以他繁多而卓越的作品傲视于世。

传记家们将他的一生分为 3 个时期，以便于他们去了解他。在第一期中(1787 至 1820 年)，他倾心于历史题材，但是，将它们转变为对太阳和大海的研究上去。1799 年中，他跻身在皇家学院展览会中，展出庆祝纳尔逊在阿布刻(Abukir)摧毁拿破仑舰队的四画家的行列。1820 年中，他初度游历国外。当邮船靠近加来港(Calais)时，邮船因浪高势猛不能泊岸。特纳和其他乘客设法乘一条拖船登岸。他就地取出草稿簿，勾勒出这艘船与暴风浪搏斗的伟观；一年后，他去伦敦展出他的巨幅油画“加来码头”(Calais Pier)，在这幅画中，他充分表现了他喜欢乌云，怒海和勇敢的人们的倾向。从法兰西，他匆忙去到瑞士，画了 400 多幅崇山高插天空的素描。他的草稿本成了他的第二记忆。

当他回到伦敦时，他发现学院的评论抱怨他用的彩色太厚，太无情和太混乱，总而言之，就是破坏了一切清醒的先例；他的方法漠视了故约书亚·雷诺爵士教导要追随先前大师和遵守传统规范的常模。特纳尊敬这位仁慈的独裁者，但是，他却服从自己性格的

主宰。因此，他在艺术上是浪漫派、反抗古老、晦涩的规则，和借习惯和写实来窒息经验和想象力的清醒呼声。他在画室中展出一幅“沉船”(The Shipwreck, 1809年)来答复他的批评者们——一幅无情的大自然凌驾人类的表现。此画得到了喝彩。一年后，他以纪念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的胜利一画得到英国人的欢心。这幅画是船舶、风景和人性混成一团的一幅画，但是，战争本来就是如此。不过，批评者们却大叫迷惘，特纳全部用颜料，没有线条；即使是颜料似乎乱洒一阵，毫无形状，令主题去自我表现；画布上的建筑物和人物是一些模糊不清的点子，点子不具任何意义，这位艺术家似乎被人类不能均衡的大自然之无助感激怒了一般。也有一些令人心旷神怡的异样感受，如“雾中日出”(The Sun Rising through Mist, 1807年)便是；但是，在“汉尼巴尔越过阿尔卑斯峰”(Hannibal Crossing the Alps, 1813年)一画中，人类的英雄主义意识似乎失落在正抖缩在恐惧中的兵士们肩头上旋动的乌云中了。这位狂野的艺术家是人类的敌人吗？

特纳继续以气魄和神韵挥舞者画笔朝自己的路子前进，显然是决定要从地球上抹去一切人类和生命的痕迹，只留下太阳、云层、山脉和怒海在画布上。他不完全是一位厌恶人类的人；他有表达温情的能力，他与托马斯·劳伦斯爵士之间培养了一份恬静的友谊，在实践和理论上两人是相左的。但是，除了天才以外，他不承认贵族身份，对一般人有一些误会，他喜欢自己的作品和自己的私生活，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一般，认为“只有在孤独中，你才是真正的自己。”<sup>⑩</sup>他对自然世界没有十分清晰的信仰。他的神就是自然，他用自己的方式去膜拜自然——不是对它的智慧和美。如沃兹沃思的诗篇一般——而是它的倔强和力量；他知道自然在忧郁的时间，也会吞噬掉他自己和人类。他不太过份去操心道德。他有一两位情妇，但是，却绝对是秘密的。他画过一些某一位色情人物的裸体素描，落到拉斯金(Ruskin)的手里，不旋踵就毁掉

了。他爱钱,要求高一点的润资,他留下了一笔财富。他是一颗未经琢磨的钻石。

他的中期(1820年至1833年)开始于他到意大利去追逐太阳的一次旅行。在那6个月当中,他作了1500幅素描;于他返回英格兰后,他将其中一些素描转变成有颜色、光度和阴暗的新奇小品,如《巴伊斯》(The Bay of Baise, 1823年)一画便是,画中纵使是阴影也都能表现些什么。再度到法兰西时(1821年),他画了塞纳(Seine)河上几幅轻逸的水彩画。1825至1826年间,他漫游比利时和荷兰,带了一些草图回家,其中一些变成了Cologne和Dieppe这两幅画,目前收藏在纽约的弗瑞克收藏所(Frick Collection)。偶尔,于1830年,他受到在佩特沃思的埃格雷蒙特爵士的招待;如寻常一般,他埋首在自己的作品中,但是,他以“落日湖滨”(The Lake at Sunset)一画使它的主人永垂不朽。

在他多产的一生之末期(1834至1845年),他越来越被光迷惑了,可辨认的标的物几乎已全部不见;其余的时间便致力于对色彩、光度和阴影的钻研。偶尔,为不列颠作了许多次惊人之举后,他让标的物在画布上显得较突出一点,如在The Fighting Téméraire Towed to Her Last Berth(1839年)一画便是;或如在“雨、蒸汽和速度”(Rain, Steam, and Speed, 1844年)一画中让自负的火车头宣布铁马世纪的到来一般。当国会上下两院于1834年遭回禄时,特纳就坐在附近,为这种景观的后期绘画作一些草图。他在哈里奇渡海时,乘坐的船遇到大风雪;这位已上了年纪的艺术家就任桅墙吹打4小时;以便使自己烙下清晰的记忆和恐怖的情景;<sup>⑨</sup>后来,他将这种混乱的情景融汇成一幅题名“暴风雪”(The Snowstorm, 1842年)的白色巨幅,接着(1843年),他绘出The Sun of Venice Going out to Sea一画,成为他最后一幅杰作。

他的晚年因来自各方面的责难而失色,却因一位英国散文大师的赞美而稍予缓和。一位批评家谴责“暴风雪”一画为“肥皂泡沫

和白色涂料”；<sup>⑨</sup>另一位批评家则总称这位艺术家的末期作品为“一只病眼和无情的手”；而庞奇(Punch)替特纳的一切绘画提出一句总评：“一阵台风吹进挪威飓风涡上空的热风中，和一艘正在燃烧中的船，一轮半明不灭的月亮，以及一道阴阳怪气的彩虹”。<sup>⑩</sup>经过半世纪的努力，这些伟大杰出的作品似乎受到保守派的蔑视和抛弃了。

接着，于1843年5月中，拉斯金，年方24岁时，出版了《近代画家》集(Modern Painters)第一卷，其不变的主题便是威廉·特纳较之任何一位近代风景画家为卓越，和特纳的作品的活泼生动犹如对外在世界的一份记录。特纳发现自己被捧为超越青年时期的鼓舞者克劳德·罗兰(Claude Lorrain)时却并不以为忤；但是，当他继续看下去时；他开始感到这种赞扬文字的冗长和过份会伤害到自己。有一度却是如此；批评家们赞扬拉斯金的文章，但是，却怀疑他的判断，并且主张采用更为折衷的观点。拉斯金却并不受到抑制；他一卷接着一卷，一而再地辩护和阐释特纳的成就，一直到他将一本2000余页的画册，以将近1/3的篇幅用在对这位艺术家的辩护上为止。最后，他赢得了这次笔战，眼见到他的偶像被誉为近代艺术的一位发扬光大之先驱而后已。

其间，特纳死于1851年12月19日，葬在圣保罗教堂墓地里。他的遗嘱将他的艺术遗著留给国人——计300幅油画，300幅水彩画、1.9万幅素描——并且留下未用尽的所得14万镑给一个救济贫困艺术家的基金会。(他的亲属打赢废止这份遗嘱的官司，他们和律师瓜分了这笔遗产)。

也许，他最伟大的遗产是他发现光在绘画上的意义，在同一世代中，听到托马斯·扬(Thomas Young)完成光波理论。特纳将他发光的油画推广至欧洲，宣称光是一种物体同时也是一种媒介，光从不同的形式、颜色、成份和效果上表现。这是先于印象派画家之前的印象主义；也许马内(Manet)和皮萨罗(Pissarro)当他们于

1870年访问伦敦时，看到过特纳的一些皇皇巨制。<sup>⑧</sup>7年后，德加(Degas)、马内、皮萨罗和勒努瓦(Renoir)送给一位伦敦艺术商的一封信上说，在他们的“光的无常现象”的研究上，他们不能忘掉“在这条路上，他们受到英国学派的一位伟大的大师，光辉灿烂的特纳的引导”之事实。<sup>⑨</sup>

## 第四章 英格兰的科学

### 第一节 进步的通衢

曾领导着自农业走上工业路子的英格兰,偏爱提供实用之可能性的科学,而将理论研究留给法国人是很自然的;她在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伯克、马尔萨斯、戈德温、边沁、佩恩是属于世界性的风云人物,面对道德、宗教、人口、革命和政府等实际问题,而让德国的教授们去空谈逻辑、形而上学和心智现象学也是可以想见的。

“为促进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院”(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于1660年时组成,宣布其“创设一所增进物理——数学经验知识的学院之蓝图”(designs of founding a Colledge for the Promotion of Physico-Mathematical Experimentall Learning)。但是,就中学教师组织的观点来说,它还不能成为一所学院;它却发展成为一个只属于55位大科学家参加的俱乐部,定期聚会切磋,成立一个有关科学和哲学的图书馆,为讲演和实验提供了一群学有专长的听众,颁发科学奖章,和定期发行《哲学汇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当科学一个接一个从哲学中萌芽,并以其定性形式和可以证明的实验取代逻辑和理论时,

“哲学”仍然包容科学在内。皇家学院通常在政府的补助下安排各种形式的科学研究或实验。1780年时,政府在萨默塞特分配给皇家学院优雅宽敞的学舍,皇家学院在那里一直维持到1857年,直到迁至毕卡底里街(Piccadilly)上伯灵顿宫(Burlington)的现址时为止。自1778—1820年,任学会主席的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花去他的大部分财富去促进科学和对科学家的照顾。

只是在名气上次于皇家学院,而却有更多教育设计的便是“伦敦皇家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London),由拉姆福德(Count Rumford)于1800年时创设,“依照哲学讲座和实验的有系统课程,作为将科学上的新发现应用到艺术和制造之改良上去的指导。”它在阿尔伯马尔街(Albemarle Street)上提供了一间宽敞的讲堂,约翰·多尔顿和汉弗莱·戴维爵士(Sir Humphry Davy)就在那里讲演化学,托马斯·扬讲演自然和光的扩散,科尔里奇讲文学,埃德温·兰西尔爵士(Sir Edwin Landseer)讲艺术……更要专门的有林奈学会(Linnaean Society),1802年时研究植物学的一个组织;地理学会(Geographical Society,1807年),之后不久,还有研究动物学、园艺学、动物化学和天文学等学会。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两地,乐于将科学应用到工业上去,创设了他们自己的各种“学术性”学会,布里斯托尔地方创设了“气体研究所”(Pneumatic Institute)供研究各种气体之用。各学院也纷纷组织起来将科学阐释给一般大众;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于25岁时(1816年)在其中一处举行一系列讲演,鼓动了半个世纪对电学研究的兴趣。一般而言,在科学教育上,商业社团领先于各大学,许多在科学上的划时代贡献,都是由自掏腰包或经朋友资助的个人所完成的。

将数学留给法国人去研究,不列颠的科学则集中在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物理学和化学上。天文学置于皇家及其辅助的机构保护之下,因其为航海和控制海洋的主要因素之故。格林威治天文



台(Greenwich Observatory)用国会的钱购置各种最精良的设备,一般都承认它是天文界的翘楚。詹姆士·赫顿(James Hutton),在死前两年,1795年发表了《地球论》(Theory of the Earth)一书,是地质学的一部经典之作;书中摘述我们这颗行星的公开生命为一种等速的环状旋转,藉着这种运行,雨水渗入陆地表面,河流因侵蚀而堵塞,或使河水流入海洋,地球上的水和水蒸气蒸发而成云,压缩而成雨水……。这一世纪的末期(1815年),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绰号“地层”史密斯(“Strata”Smith)——以他的15巨幅“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质图”(The Geological Map of England and Wales)赢得了不朽的声名。它们显示地层有规律地微向东方升起,直到到达地球的表面时方止;依照其有规律的堆积来认证地层,它们促进了古生物学的发展。为了酬谢他发现地层下的秘密,不列颠政府于1831年,颁赠给他年俸100英镑的终生俸。他死于1839年。

不列颠的航海家们继续去摸索陆地和海洋的各个角落。在1791年—1794年中,乔治·温哥华(George Vancouver)绘制了澳洲、纽西兰、夏威夷和美洲的太平洋西北部海岸,他在那里绕航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迷人岛屿。

## 第二节 物理学:拉姆福德和扬

本杰明·汤普森(Benjamin Thompson),出生(1753年)和成长于美国,在英格兰接受骑士爵位,成为巴伐利亚(Bavaria)拉姆福德,而死于法兰西(1814年)。要确定他的国籍是很难的,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站在不列颠一边,并且迁入伦敦(1776年)。以不列

颠的秘书身份回到殖民地乔治亚(Georgia)服务,他的兴趣从政治转入科学,他经由各种研究,来取得皇家学院的会员资格。1784年,得不列颠政府之准许,他在马克斯米利安·约瑟夫王子(Prince Maximilian Joseph)领导下进入巴伐里亚服务。之后11年间,充任巴伐里亚的战争和警察部部长,他改组陆军,改良工人阶级的状况,阻止乞讨,并找出时间替皇家学院的《哲学汇报》撰写论文。宽大的马克斯米利安使他成为(1791年)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一位伯爵,他采用妻子的出生地,即现在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康科德(Concord)作为他的头衔的称呼,在不列颠的一年中(1795年),他努力改良人们取暖和烹饪的设施,目的在减少室内的空气污染。在巴伐里亚又服务了一年后,他返回英格兰,与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创设了皇家研究所。他创立——并且也是第一个接受者——皇家学院的拉姆福德金牌。他提供给巴伐里亚和美国的艺术和科学学院的同类金牌奖的基金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拉姆福德讲座。于他的妻子死后,他迁到巴黎(1802年)。住在Auteuil的一栋房子里,并娶了拉瓦西耶的遗孀做妻子,尽管英、法重启战端,他一直留在法兰西,积极工作直到最后。在他的最后一年,当拿破仑征召每一位青年子弟,作困兽之斗时,他努力用“拉姆福德汤”(Rumford Soup)去救济濒于饥饿边缘的法国民众。

拉姆福德对科学的贡献太杂繁而难有特殊之成就,不过,总而言之,对一位忙于行政工作的人而言,它们却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当他在慕尼黑(Munich)参观运作中的大炮口径时,他却深切地体味到大炮在运作时所产生的热气。为了测量这份热度,他用一具金属唧筒,让该唧筒之前端靠着钢锥一起旋转,将此装置放在一具容水 $18\frac{3}{4}$ 磅的防水箱中。不到2小时3刻钟的时间,水温从华氏60度升高到212度,这是水的沸点。拉姆福德后来回忆说:“要描写看

到如此多的水,在没有火的情形下加热,到达沸点的旁观者面部所表现的惊讶神情是很困难的。”<sup>①</sup>这次实验证明热并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分子运动的表现方式,大致与产生热的工作总量是成正比的。这种信念很久以前就已经主张过了,但是,伦福特的设计提供了第一次的实验证明,并且提供了一种测量的方法——即是工作总量要求每加热 1 磅水需增加热度 1 度。

托马斯·扬正如拉姆福德和蒙田(Montaigne)一样多彩多姿。出生于苏墨赛地方的贵格派家庭(1773年),他开始从事宗教活动,然后以不眠不休的工作精神,从事科学研究。据说,在 4 岁时,他已经从头至尾读过圣经两遍,14 岁时,他能用 14 种语言写作。<sup>②</sup>21 岁时,他被选为皇家学院的研究员,26 岁时,他是伦敦的一名开业医生;28 岁时,他去皇家研究所教授物理学;1801 年时,他开始去那里实验,确立并发展了惠更斯(Christian Huyghens)的光学观念为假设的以太之一种波动。经过无数次的辩论后,这种观念大致——不是普遍——取代了牛顿认光为物质微粒扩散的理论。扬氏也提出了后来由赫尔姆霍兹(Hermann Ludwing Ferdinand von Helmholtz)发扬光大的假设,他认为颜色的认知作用依靠视网膜上 3 种神经纤维之存在,依次对红、紫和绿色的反应所致。加上他首度就散光、血压、毛细管引力和潮汐提出的描述,和积极地参与(1814 年)罗塞达石(Rosetta Stone)的翻译工作。据一位博学的医学史家说,他是“他们时代受过最高教育的医生。”而赫尔姆霍兹更补充说:“他是有史以来最有眼光的人之一。”<sup>③</sup>

### 第三节 化学：多尔顿和大卫

在同一个 10 年中，也是在皇家研究所内，多尔顿以他的《原子论》(1804 年)大事改革了化学研究。他是一位贵格派织工的儿子，出生于多雾的湖区西北端，靠近科克茅斯(Cockermouth)的依格菲尔德(Eaglerfield)镇，该地区不久孕育了如沃兹沃思、科尔里奇等大文豪。后来，他以第三人称的写作法，和单调的纪年史方法，简述了他早年的经历，写出了他步上成功之路的灼热雄心：

本文作者……读过乡村小学……直到 11 岁时为止，在那段时间中，他修完测量、调查和航海等课程；大约于 12 岁时，开始在乡村小学执教；……偶然从事过一两年农事；15 岁时，进入肯德尔(Kendal)的一所寄宿学校当助理，在那个职位待了 3、4 年，然后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大约有 8 年之久；在肯德尔时，利用休闲时间，研修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数学以及物理学，1793 年，迁至曼彻斯特，在新学院(New College)担任数学和物理学的导师。<sup>④</sup>

每当时间和经济允许，尽管他患有色盲，且研究设备粗陋——许多是他自制的——他就从事观察和实验。举例来说，自 21 岁起，直到死前一天为止，<sup>⑤</sup>他每天总要找出时间做一份气象记录，他的假期通常都花在若干年后沃兹沃思漫游的同一些山丘间收集资料，不过，沃兹沃思是寻找和倾听上帝的讯息，多尔顿则测量不同

高度的大气状况——大抵与一个半世纪前帕斯卡尔(Pascal)所做的相同。

在他的实验中,他接受留基伯(Leucippus)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理论:即一切物质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所组成:他并着手研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的假设:即一切原子属于某一最后不可分割的原素之一,如氢、氧、钙等。在《化学的新系统》(A New System of Chemical Philosophy)一书中,多尔顿主张,一元素之任何原子的重量,与另一元素之任何原子之比,必定与第一元素的一物质的重量,与另一元素同重量物质之比相同。以一氢原子之重量为一单位,经过许多次的实验和计算后,多尔顿就依照其他元素的一原子,与氢元素的原子比较所得之相对重量排出了另一元素原子的秩序;所以,他就他所知道的30种元素,排出了一张原子量表。到1967年时,化学家们已认定96种元素了。多尔顿的结论也因后来的研究而予以修正,但是,他们——和他的一切元素混合的复杂“倍数律”(Law of Multiple Proportions)——确实在19世纪的科学进步上提供无穷大的帮助。

较为复杂和刺激的便是汉弗莱·戴维爵士的生活、教育和发现了。出生(1778年)于彭赞斯(Penzance)地方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受过良好教育,并从事地质学、钓鱼、素描和诗篇等研究的活动。他愉快的天性赢得科尔里奇、骚塞、彼德·罗热博士(Dr. Peter Roget)——《英文单字和成语辞典》(The 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不眠不休的编纂人——和拿破仑等许许多多朋友。有一位朋友准许他自由使用一间化学实验室,他的唠叨却诱使大卫专心致力于此一工作。他筹设了自己的实验室,用吸入法采集各种气体标本,且说服科尔里奇和骚塞加入他的吸气队,因吸瓦斯——一种剧毒的气体——几乎送掉自己的性命。

22岁时,他出版了他实验的一本报告书:《化学和哲学的研究》(Researches Chemical and Philosophical, 1800年)。在拉姆福德

公爵和约瑟夫·彭克斯的邀请下,他来到伦敦,就蓄电池(沃尔塔的电堆:Volta's "Pile")的神奇效果发表讲演和示范,给皇家研究所带来了一阵新的声誉。以一具有 250 对金属片的电池作为电解的作用物,他使许多物质还原成元素;因此,他发现并分解了钠和钾的方法;不久,他继续将分离的钡、硼、钙和镁加在他的元素表上。他的成就建立了电解化学在理论和实际上无穷尽的证据。他不凡的成就之消息传到了拿破仑的耳朵里,拿氏于 1806 年,从前线送给大卫由国立研究所颁赠的一份奖励。贝托莱(Berthollet)于 1786 年对詹姆士·瓦特解释过氯的漂白效果,英格兰却迟迟不使用此种建议;大卫重新大力主张。从他的身上,科学和工业发展出一份共同刺激,在大不列颠的经济转型上,扮演着一种领导的角色。

1810 年,在皇家研究所的一群听众面前,戴维亲自示范电流强度的实验,从一条碳丝传入另一条上去时产生光和热的情形。他形容这种运作为:

当大约 1 英寸长和 1 英寸的  $\frac{1}{6}$  宽的碳片,彼此慢慢在接近时(接近至 1 英寸的  $\frac{1}{30}$ ,或  $\frac{1}{40}$  的距离内),就会产生一点闪亮的火花,可以见到一半以上的木炭着火燃烧;将接近点拉开时,至少在相等于 4 英寸的热空气中发生放电现象,产生一阵闪亮的光弧……。当任何实体导入此弧内,该实体就会燃烧发光;白金就如一支普通蜡烛一样立刻熔解;石英、蓝宝石、苦土、石灰也都会熔解。<sup>⑥</sup>

这种发光和发热的潜力,直到产生电流的便宜方法发明之后,一直没有发展;但是,在那次优异的实验中已有电熔炉之存在,并为地球上有一半的人口将夜晚转变成了白天。

1813年,在他的青年助手迈克尔·法拉第的陪同下,用拿破仑发给他的安全通行证,当整个欧洲几乎都笼罩在战火中时,戴维旅行法兰西和意大利,参观各种实验室,从事各种实验,探查碘的性质,并证明钻石是碳的一种。回到英格兰,他研究矿坑爆炸的原因,并替矿工们发明了一盏安全灯。1818年,摄政王封他为从男爵。1820年,他继班克斯为皇家学院主席。1827年,他的健康开始衰退,放弃了科学,从事钓鱼,还写了一本书,并附上自己所作的素描插图。1829年,在局部瘫痪状态下,他去到罗马,希望变成“废墟上的一堆废物。”<sup>⑦</sup>但是,不及一年,他就去世了,他活了51岁,不过,在这半世纪长的生命中,他活得多彩多姿,他是一位善良的伟人,是挽回不得不抗衡我们的无知和原罪的男女中的一人。

#### 第四节 生物学:伊拉斯谟·达尔文

生物学尚未如物理学、化学和地理学一般,在英格兰有良好的成就;这些科学对工商业较为接近和有用;不过,生物学却宣泄了生命的悲惨和壮丽,并扰乱了宗教信仰。

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查尔斯的祖父,却早已受到我们的礼敬,不过,他只是这一绚烂世纪中的一点火花吧了;因为他在那时出版了《植物园》(Botanic Garden, 1792年),Zoonomia(1794—1796年)和《自然的殿堂》(The Temple of Nature)三书。这些书都是从进化论的观点写的。其理论建立在适应的习惯和官能上,藉数世代不衰的欲望和努力,便能有传送到神经和团体上去的希望,它们与拉马克(Lamarck)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位和蔼的医生,他的姓和名都采用一个伟人的名字,以提出每一种动物的

生命由“一条有生命的单纤维”开始，“而这种有生命的单纤维最大的使命，已浸润在动物中”，它使自己“藉本能活动来证明其存在，并且将这些改良的因素藉发生而传至后代，如此世界就永无尽期，目的在寻求进化和宗教之调和”。<sup>⑧</sup>

宗教与科学间的不断辩论，虽然在这一世纪中已经偃旗息鼓，而当哈特利和普里斯特列(Priestley)就观念的协调准备了一份生物学上的说明，并且当解剖学家们不断宣示身体和心智的相互关系时，却又一度进入受到保护的生理学之范围之内。1811年，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发表《解剖脑子的新观念》(A New Idea of the Anatomy of the Brain)一文，他在文中提出证明，神经系统的某特定部位将意识传达至脑的特殊部位上去，和神经的特殊部位将运动刺激带到特定的反应官能上去。而日趋繁荣的催眠现象则要指出，生理上的感觉先传递至观念，而再至动作，鸦片和其他药物则在引起睡眠，影响作梦，刺激想像，和减弱意志(如科尔里奇和德[De Quincey]所遭遇的一般)，进而引起对意志自由的疑问。这种日渐升高的地位——科学争论和医学的社会立场——与国教牧师较低的地位和收敛的活力相较之下，似乎反映出宗教受到冷漠，或怀疑或不信的神秘因素正在逐渐扩大。

## 第五节 医学：詹纳

医学兄弟会几乎名不符实，因为它完全反映出不列颠的阶级或门第区分之倾向。皇家医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因亨利八世(Henry VIII)首创于1518年而欣然自得，只准许在牛津或剑桥取得学位的50左右才够资格成为“准”会员，



和大约 50 位左右的杰出开业医生为其“执业”会员。这百许人士，对英格兰医学来说，居于元老地位。他们赚到大笔收入，有时一年高达 2 万英镑之谱。他们不可能变成贵族，但却可能获颁武士爵位，并且可望获得从男爵爵位。地位显著地较低者，则是创立于 1800 年的皇家外科医学院。在这些之下的则有妇产科医生，男性助产士，长于将胚胎从温暖安全的处所拖至竞争的世界中来。而医护人员中，居于最低一级的则是药剂师，他们几乎分布到所有可能从事医护工作的农村地区去服务。

除了偶尔有著名的医生发表讲演外，几乎没有一所大学提供医学教育。牛津或剑桥都没有设医学院；渴望在大学的接受医学训练的学生，就需要到苏格兰去追求，不然，英国医生的训练就留待由私人慈善团体创立的大医院附设的私立学校去培养了。托马斯·伯纳德爵士(Sir Thomas Bernard)花去大半财富在改进位于伦敦北部著名的叶婴医院(Foundlings' Hospital)上，并且也与其他有钱人士分担在伦敦及其他地方免费治疗癌症、眼疾和疝气的诊疗所之财务。但是，城市的脏乱，在传播疾病或酝酿新病菌上，比医药治疗还要迅速。

1806 年，伦敦发生了一件怪事：那里整整一个礼拜没有死于天花的病人——那种一度曾在英格兰蔓延，并随时会再度蔓延成致人于死的灾难的起疱、发热和伤害面容和传染的疾病。

一位温和的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沉迷于狩猎、植物学、赋诗、吹笛和拉小提琴上——最后克服了不列颠社会的保守作风，以 10 年预防接种，终于使这一周的奇迹成为可能。从患天花传染的病人身上取下的弱质病毒接种来预防天花，中国古代曾实行过；这是玛丽·沃思利·孟塔古女士(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于 1717 年道经康斯坦丁(Constantine)时意外发现的；于她返回英格兰时，将那种方法带了回去。先在犯人身上试验，再在孤儿身上，都有相当的成效。1760 年，罗伯特和丹尼尔

· 萨顿两位医生(Drs. Robert and Daniel Sutton)报告说,在3万名接种天花预防的病例中,只有1200名病人死亡。可能会因此而找到预防天花的病例吗?

詹纳注意到故乡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许多挤牛奶的妇女,从患有传染病的乳牛的乳头上得了牛痘(Cowpox),而这些妇女此后对天花却具有免疫作用,因而发现了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他因此就想到接种采自染有水疹的母牛身上病毒的牛痘苗(Vaccine),也许会得到相同的免疫效果,于179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詹纳详述了奠定实验医学和免疫学基础的大胆冒险过程:

我挑选了一名健康的男童,约8岁大,作为接种牛痘的实验。这东西采自一位从牛身上传染到手上的挤牛乳妇女的脓疱上的,在1796年6月5日那天,将这种病毒注入这名男童的手臂上……。到第7天时,他抱怨不舒服,……第9天时,他有些发抖,食欲不振,和微感头痛……。次日他就完全复原了……。为了确定这位男童于接种牛痘病毒后,有这些轻微反应,是否能免于天花传染起见,就于同年7月1日,用直接采自脓疱的天花菌来接种……。没有疾病发生……。兹后数月,他再度接种天花菌,但是,身体上仍没有疾病的迹象产生。⑥

詹纳继续描写具有完全满意结果的其他22个病例。他遭遇到所谓将人类活解剖的非难。为了补偿他对这位不懂事的小孩的利用,就为他建了一栋小屋,并亲手替他造了一座玫瑰花园。在1802年和1807年中,国会通过补助詹纳3万英镑,以改良和推广他的方法。在19世纪中,天花几乎在欧、美两洲上绝迹,即使有,也都发生在没有接种的人身上。接种方法适用到其他疾病者的身上,使免疫这门科学,与其他的医学进步和公共卫生,带给近代的社会,比贫穷、无知、贪婪、疾病等所能带来的公害更要多的健康。

## 第五章 英国的哲学

科学在1789年—1815年间的英国极少影响到哲学。“自然科学”——即物理学——可能已与自由神学调和，甚至进化的观念也可能因阐释创世的六“日”为发展的无限长时间而驯顺了。上层阶级，此时他们与伏尔泰和《百科全书》的编纂人(Encyclopedists)间的挑逗，因大革命而停止，且视观念为一种青年人的传染病而不予置信了；他们认为每周的礼拜为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一种明智的投资，他们埋怨首相庇特找不出时间上教堂。有几位私衷持怀疑态度的司教；但是，他们却是因虔诚而享名于世。不过，旧冲突仍旧存在。在1794年这一年中，两种水火不容的呼声；托马斯·佩因在《理性世纪》(The Age of Reason)一书中，和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在《基督教证据便览》(A View of the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中同时声明。稍一浏览这两本书，就能窥知这个时代的风气。

### 第一节 汤姆佩·因论基督教

“汤姆”·佩因(“Tom” Paine)，两大陆都以此称呼他，是一位英国人，1737年出生于诺福克(Norfolk)的赛特福镇(Thetford)上

的一个贵格派教徒的家庭,但是,听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忠告,他于1774年移民到美国,在美国革命中采取一种积极的立场。华盛顿(Washington)将军誉佩恩氏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 1776年元月)在“许多人的心智上”具有“决定性的改变力量。”<sup>①</sup>当革命战争期间,以纳撒内尔·格林将军(General Nathanael Greene)的侍从武官身份,他发表一系列短论——《危机》(The Crisis)——以维持叛军和市民的精神;其中的一篇短论,以一句名言做开始——“这是个考验人类灵魂的时代”。自1787年至1802年,他大部分时间住在欧洲,在法兰西和英格兰两地为法国大革命而努力。我们见到他冒着砍头的危险投票为路易十六(Louis X VI)从死刑减刑为放逐而奔波。1793年12月中,显然是在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教唆下,<sup>②</sup>国民议会颁布驱逐所有外国人为其会员的命令。议会中只有两名外国人:阿纳卡西斯·克洛茨(Anacharsis Cloots)和托马斯·佩因。等待着就逮时,佩因匆忙地写下就是今天《理性世纪》的第一部分文字。他将手稿送到美洲,附着如下的献词:

致我美利坚合众国同胞:我将附列之作品交付你们保护。它包容我对宗教的意见。记住,我时常不遗余力地支持每一个人有其自己意见的权利,不论与我的意见有如何不同;你们会给我作一决定。否定别人的权利,使自己成为目前意见的奴隶,因为他排除了自己改变意见的权利。

对抗每一种错误之最可怕的武器便是理性,我从未使用过任何别的武器,我深信我决不会去使用的。

你深爱着的朋友和同胞们。

托马斯·佩因

1794年元月27日巴黎

一开始,佩因就他何故要写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理由:不是要摧毁宗教,而是要从斫伤社会秩序的非理性形式中阻止其腐败,“免得在一般迷信邪风,政府的虚假制度和虚假的神学理论中破灭;我们失去了真正的道德、人性和神学的视野。”同时他自信地补充说:“我信仰一个上帝,别无其他,我希望死后的安乐。”<sup>③</sup>

接着,他拿出奥卡姆的锐利笔锋(Occam or Ockam, William of, 1300? —1349? 英国哲学家)。

我不信仰由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新教教会公然宣示的教义,也不信仰任何我所知道的教会的教义。我自己的心智就是我自己的教会。一切国立的教会机构……在我看来不过是人类的发明物,设置来恐吓和奴役人类,来垄断权力和利益的。<sup>④</sup>

他称赞基督为“一位有德行和和蔼的人”,而“他所谆谆劝诫和笃实践履的道德便是最仁慈的德行”;但是,他受到上帝眷顾的故事,只是盛行在异端中的神话之一种变形。

几乎所有生活在异端神话中的异人,都誉之为上帝们的儿子……。上帝们与妇人们的媾合是那时一种通行的意见。依据他们的叙述,他们的朱匹特(Jupiter)与几百妇女同居。因此,这则故事没有什么新鲜、奇特或猥亵之处;这种意见是盛行在当时称做“非犹太人”(Gentiles)间的共同看法,……并且也只有那群人相信不疑。严格地只相信一种,并不断地驳斥异端神话的犹太人,从不信任这则故事。<sup>⑤</sup>

因此,基督教神话仅仅是异端神话的一种新型态。

那时所追随的三位一体说,只是大约以前两三千年来  
的多神论的一种缩影;马利亚(Mary)的地位是继承以  
弗所城(Ephesus)的戴安娜(Diane)的地位;英雄们的神  
格化变为圣哲们的圣徒吧了。神话学家们使诸神化为万  
物;基督神话学家们则使圣哲化为万物;教堂就如万神殿  
一般拥满了同一信仰的群众……。基督教理论比起古代  
神话学家们的偶像崇拜并无多少差异,适应在权力和岁  
入的目的上;而它尚未到涤除模棱两可的错误而保留理  
性和哲学的时期。<sup>⑥</sup>

佩因接着摇动他的理性探照灯到《创世纪》一书上去;不能忍  
受那些寓言,就专注到夏娃和苹果上面。他和密尔顿一样,被人类  
的第一位叛徒撒旦迷住了。此地是一位想要废止一位君主而被投  
进地狱中的天使,在那里忍受无尽止的折磨。但是,他必须不时要  
躲避那些永不熄灭的火焰,因为他已找到进入伊登园(The Garden  
of Eden)之路,和可能是最迷人的诱惑;他可能向夏娃许诺知识,  
和向基督许诺半个世界,佩因惊奇,基督教神话给予撒旦不可思议  
的荣耀;它假设他可能迫使全能之神(the Almighty)把他的独子送  
到裘第阿(Judea,古代罗马所统治的 Palestine 南部)和被钉上十  
字架,以为她收回显然爱着撒旦的几近一半的行星;纵然有那种钉  
上十字架的事,魔王(the Devil 指撒旦)仍然保持了一切非基督教  
的领域,而在基督教国度里也有几百万仆人。

这一切,我们的怀疑心很重的人说,是依据从摩西(Moses)到  
圣保罗(Saint Paul)这一系列纪录员记下的全能的神自己的话,提  
供给我们最严肃的证据。佩因认为这种说法只适于育婴室,和忙于  
面包和牛油,衰老病死,无暇去怀疑神学家们卖给他们期票的成人

们的故事。对意志较强的人,也提出上帝的形状并不像人类,而应理解为宇宙的生命。

只有在《创世纪》(The Creation)中,我们的所有诸神……的观念才能结合成一体。《创世纪》说出了一种人类全体的语言;……而上帝的这种道的启示,是全人类为人类了解上帝所不可少的。

我们要默察它的权力吗?我们从无限大的创世中见到它。我们要默察它的智慧吗?我们从主宰着无限的整体不变秩序中见到它。我们要默察它的宽宏大量吗?我们从它充塞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中见到它;我们要默察它的慈悲吗?我们从它的民胞物与的胸襟中见到它。总而言之,我们要知道上帝是什么吗?不要从所谓的《圣经》(Scripture)一书上去探究……而是从称做《创世纪》的圣经上去了解。<sup>②</sup>

他自1793年12月28日起受监禁,直到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垮台为止。11月4日,“国民会议,尽他们的权力之所及补偿了我所遭受的不正当行为,全体一致通过邀请我重回国民会议,……而我接受了。”<sup>③</sup>在动乱不安的革命第11个月的反动中,他写出了《理性世纪》的第二部份;这一部份致力于对《圣经》(The Bible)的刻意批评,对早已提供较为学术性的研究——许多是由牧师们从事的——则绝少增益。在英、美两地,他对上帝信仰的主张,则因人民重视和政府珍惜《圣经》之故,因而他对《圣经》的狂热驳斥得不到重视,他发现自己出生在出生地和归化地得不到尊敬。1802年中,当他回到纽约(New York)时(那里曾赠给他在纽洛契尔(New Rochelle)的300英亩产业,答谢他以前对美国大众的贡献),他受到了冷淡的接待,只有部份则因杰佛逊的忠诚友谊而抵

制住了。他的最后7年，因耽于饮酒而变得黯淡无光。他于1809年死于纽约。10年后，威廉·科贝特才将佩因的遗骸移到英格兰。在那里，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透过他的书籍，在产生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案(The Reform Act)的长期奋斗中，扮演着一种角色。

虽然，佩因可称得上是一位自然神论的信仰者，而非无神论者，许多基督教的信仰者感到，他的自然神论只是他不相信一位人格化上帝的一种文雅的掩饰。威廉·佩利，维尔茅斯(Wearmouth)的教区牧师，在《基督教证据便览》一书中，就他的信仰提出了十分有力的一次辩护，直到1900年，此一读物仍然是进入剑桥大学的优先读物。不过，更要有名的是他的《自然神论》(Natural Theology, 1802年)一书，该书从科学自身，累积在自然界中设计的证据，证明至高智者(Supreme Intelligence)之存在。他辩称，如果一个没有见过表的人遇到一只表，并检查了它的机器，他会不承认是某些智慧者设计的吗？但是，在自然界中，岂没有数千种运作指出对一种期望的效果之有意的安排吗？

在一方面，我们见到智者之力安排行星的组织；……  
在另一方面，……供给一只蜂鸟的细毛用作歛合的一种适当机器……。每一种有组织的自然体，在它含蕴的生存和繁衍的粮食中，在创世主方面说，正证明了表白导向这些目标的一份谨慎。<sup>⑩</sup>

英格兰的半数有学问的人，开始讨论起佩利的著作和表了；科尔里奇、沃兹沃思和黑兹利特在克吉刻(Keswick)开始生动地辩论了。自然神论有很长的一段生命；伟大的达尔文本人在形成他的反对论——官能对所期望的目的上之适应是经过自然淘汰而发生的——之前，曾很仔细地研究过它。<sup>⑪</sup>佩利之后一世纪，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进步的创造》(L'Evolution créatrice, 1906



年)上雄辩滔滔地重写了“设计的论辩”一文。这场辩论一直继续着。

## 第二节 戈德温论正义

今天几乎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威廉·戈德温是他那一世代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哲学家。“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没有作品,”黑兹利特在1823年将开始时写着:“给予这个国家的哲学见解如著名的《政治正义质疑》(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一书如此一阵骚动了。”<sup>①</sup>“丢开你的化学书本,”沃兹沃思告诉一位年轻学生:“去读一读戈德温《论必然》(on Necessity)”;<sup>②</sup>而在戈德温的晚年,当他怀疑起自己时,他看到他的观念由他的女婿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用诗歌来传播。若非他为他的书索偿过高,他也许就不会被置诸牢狱之中了。

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献身于在戈德温身上变成决定论的命运注定论上。他的父亲是一位非国教派(Nonconformist)的牧师;他本人接受了圣职者的教育,并且以牧师身份在若干小镇上讲过道。当他在斯托马基特(Stowmarket)发挥功能时,他被一位年轻的共和主义分子介绍给一群法国哲学家,他们不久倾覆了他的信仰。他从霍尔巴赫(d' Holbach)接受了无神论,在稍后的年头中,他仁慈地在他拥挤的卷帙中替上帝找到了一个位置。他从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接受教育和理性为空想的渊源之信仰。他追随卢梭(Rousseau),而接受人性本善的主张,但是,他喜欢无政府主义甚于卢梭的万能政府。他放弃基督教牧师的职位,开始用笔和墨去赚取糊口的面包。他加入“革命家”俱乐部,与斯坦厄普

爵士(Lord Stanhope)和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为伍,但是,大部分时间,他则从事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拼命写作;1793年,77岁高龄时,他发表了他那个时代最激烈的主要著作。

他命名此书为“政治正义质疑及其对一般道德和快乐上的影响”(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显然是一本论政府的书,它几乎包容了所有哲学上的问题,从认知到政治才具,止于讨论上帝的问题。他蔑视天堂和地狱的寓言为促进人民服从和帮助政府统治的诡计。<sup>⑩</sup>他贬斥公然宣誓接受官方信仰的39条款而私底下却弃置不顾的牧师们。<sup>⑪</sup>他拒斥自由意志,但意志如作为一种不同的官能看待的话就另作别论;他视意志仅是刺激、情境或欲望的意识反应之一个抽象字汇。<sup>⑫</sup>由于行为决定于遗传、个别经验和目前的环境,我们不应当以愤怒或丑诋的行为去应付别人的错误行为,我们应当以矫正甚于刑罚的态度去改良我们的刑罚制度;不过,使用赞扬、谴责和处罚作为对未来诱惑的正确记忆是必要的。<sup>⑬</sup>

我们应当赞扬什么,和谴责什么呢?道德上的善,还是道德上的恶呢?而善是什么呢?步爱尔维修(1758年)和边沁之后,戈德温界定善为促进个人和团体的快乐,而他界定快乐为身体、心智和感觉上恒久的愉快。这种伦理学不是快乐论的或官能上的,因为它排列知性的快乐在那些感受之上。它不是自我主义的或自私自利的,因为它承认个人是团体的一部分;而团体的善是优于其组成之个体安全的;列于所有最高快乐之中的,便是个人从贡献给他的同辈们的快乐上所获得的那种快乐。我们的合群本能产生利他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可给予我们较任何感觉上或智性上的愉快更要敏锐和更要持久的一种愉快。<sup>⑭</sup>能仁慈就能快乐;不仁慈就会忧郁。“道德,人类快乐的学问,”是“约束个人于同类上去的原则,和计划劝导我们去塑造我们的行为走上最能有助于全体利益之路上去的诱因。”<sup>⑮</sup>

然则,正义就个人和团体而言,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快乐的行为准则。“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为团体或个人的安全。”由于个人期望如适合他的安全一样多的自由,“人类最所期望的状态,便是维持就个人之独立侵入最小的一般安全。”<sup>⑨</sup>因此,婚姻便不需要政府或宗教的批准了;两位成年人生活在一起的共同协议就足够了;而这种结合依据一造的愿望便可解散。<sup>⑩</sup>(这一句特别取悦雪莱)。

戈德温不喜欢政府,不论它们的形式和理论为何,它们事实上是少数人对多数的统治。他拒斥保守派认为大众是天生低贱和经常具有内在的残忍性,因此,必须用寓言、恐怖或力量来统治的看法。跟欧文一样,他认为大多数人的低贱是由于不适当的教育,狭窄的机会或环境上的挫折之故。<sup>⑪</sup>当骗钱的人因立法上的诡计或司法上的庇护而免于犯罪的刑法追诉之案件时有所闻时,他嘲笑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观念。<sup>⑫</sup>他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接受财产制度——和财产继承,<sup>⑬</sup>并反对政府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sup>⑭</sup>但是,他坚持私有财产应视为公共信托,<sup>⑮</sup>并警告称,财富集中会招致革命。<sup>⑯</sup>

不过,他没有革命的意趣。“直到人类的特质在基本上改变了,”任何对现存制度的强力抛弃,任何要重新分配财富的暴力意图,都会导致社会混乱,比它要除去的不平等带给共同幸福更多伤害。<sup>⑰</sup>“意见的革命是要获致较好的财富分配的仅有方法,”<sup>⑱</sup>而这要经由学校和文学的漫长和忍耐的教育过程。

但是,从国立的教育制度获得一般性教育是一种错误,因为这些将会成为引起战争的民族沙文主义,和目的在注入盲目服从的政府宣传的工具。<sup>⑲</sup>教育应留给私人去办理,应经常说出真相,并使使学生熟悉理性。“理性不是一种独立的原则”或技能,“并且也没有引起我们要行动的倾向;就实际的观点而言,它只是一种对不同感受的比照和区分。理性……是依照不同的激情”或冲动而设计的“相对价值,用来节制我们的行为的。”“道德非他,而是结果的一

种预测，”<sup>49</sup>包括对团体的结果在内。“因此，我们期待我们的社会状况改良，便是对理性的改良。”<sup>50</sup>

由教育到空想的路是悠长和艰辛的，但是人类在那条路上有了一些进步，而对它的更进一步没有可见的限制存在。这个目标是人道之充分地启迪，与理性和自由地行为之远见。无政府主义是遥远的理想，但是，经过许多世代，它却依然是一个理想，而人类的本性却需要某些政府形式。我们必须不断希望，在我们未来纯洁的子孙中，智能渐渐地进入有秩序的自由中去。

在戈德温身上必定有一道丰富的智能之泉，因为，在1794年中，在他的巨著《质疑》一书出版才一年，他出版了被许多人评为那个世代的杰出小说：Caleb Williams，该小说表现出“政府闯入社会各层面去的精神和性格。”作者在这本小说中加上他亲身体验的罗曼史：他娶了玛丽·吴史东克莱夫特(1797年)，收养了她自由恋爱的女儿范妮·殷莱(Fanny Imlay)，和玛丽过了一年充满刺激性友谊的生活。“我敬重她的智慧，”他说，“和她高贵的慷慨性格；仅仅温柔不能产生适合我们所经验到的愉快。”<sup>51</sup>我们已经知道，她于生下玛丽·戈德温·雪莱(Mary Godwin Shelley)后不久就死了。

1801年，他娶了玛丽·简·克莱尔蒙特夫人(Mrs. Mary Jane Clairmont)，她的女儿(由第一任丈夫所生)成为拜伦的情妇之一。戈德温和妻子藉出版书籍来支持他们的血统复杂的子女，其中一本是由查尔斯和玛丽·兰布(Charles and Mary Lamb)出版的《莎士比亚的故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在沃兹沃思和科尔里奇与他的友谊式微的影响下，戈德温过了一段艰苦的时光，而他也有般老年人的自然趋向保守主义的论调。而由自顾不暇的雪莱帮助了他；1833年，是历史的讽刺吧，他容忍了不得不邪恶的政府，使他成为“财政部的一位自由门房”，直到他死亡(1836年)，给了他一份足可裹腹的微薄年金。

### 第三节 马尔萨斯论人口

戈德温的《质疑》一书，激起了另一本比他的还要有名的书的印行。这种过程，因一位反对父亲的自由哲学的儿子之不寻常的反动而更推波助澜了。

丹尼尔·马尔萨斯(Daniel Malthus, 死于 1800 年)是一位稍微与众不同的人,是大卫·休谟和卢梭的朋友。对于文明,他怀着苏格兰人的怀疑论和瑞士人的悲观论。他亲自负起儿子的学前教育,并且相信托马斯·马尔萨斯将会是跟自己和戈德温一样的一位守法的激进人物。托马斯读完剑桥,并于 1797 年入国教会从事神职。当戈德温的书一问世(1793 年),父子两人就书的内容有过许多次有趣的辩论。托马斯没有他父亲那种对这本书的热情。他感到这种理性占上风的空想,将会不断地因简单的事实而变得毫无意义,已经简赅地宣布在传道书中了(the Book of Ecclesiastes):即当粮食的供应增加时,其好处不久将因人口的增加而抵消。地球的生产力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性欲却是无止境的,人口的倍数增加——因早婚、任意生育、婴儿和老年死亡率的降低——一定不久就消耗掉所增加的粮食。父亲却不接受这种计算,但是,他称赞用作争论的这种力量,而他要求儿子写出他的见解。托马斯照做了,结果便于 1798 年出版了《影响未来社会改良的人口原则》一文(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该文开始以一种道歉的口吻请文中所反驳的两位持乐观主义的作者息怒:

我不怀疑如戈德温和孔多塞(Condorcet)这些人的天赋……。我以非常愉快的心情读完他们论人类和社会的完美性的某些推论。我就他们提出的迷人远景感到温馨和喜悦。我恳切地希望着这样愉快的改善。但是,就我所了解,我在他们的方法上看到了巨大而难以克服的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就是我现在要阐释的目的,同时,我宣布决无要刷新朋友们的意见而沾沾自喜之意,只是没有事情比看到这些意见完全除去后可给予我较大快慰了。<sup>⑧</sup>

马尔萨斯有意将他的论辩用数学形式来表示。认识粮食供应每25年呈算术级数增加(从1到2到3到4等等的增加),人口,如不加阻止——每一对夫妻准许养活4个孩子——每25年就成几何级数增加(即从1增到2到4到8到16到32……)。照这种比例,“在2个世纪内,人口与生存方法的比例会是25:9的状态;在3个世纪中,就成4096:13的形态,而在2000年中,其差别就成了天文数字。”<sup>⑨</sup>人口何以没有如此激烈地增加的理由是因为人口在再生产上受到消极和积极两种抑制所限制之故。消极的抑制便是防患未然:因贫穷或其他原因而使婚姻期延长;“不道德”(vice, 马尔萨斯指此为婚姻外的性交)、“反自然的感情发泄”(同性恋、鸡奸等),和其他许多婚姻中或婚姻外的避孕方法。当这些消极因素不能维持人口与粮食供应的平衡时,自然和历史提供了早就已经在个人方面发生作用的积极抑制:杀婴、疾病、饥荒和战争,痛苦地使出生率和死亡率保持平衡。

从这种悲惨的分析上,马尔萨斯引出了惊人的结论。首先,提高工人的工资无用,因为如果工资增加了,工人就会提早结婚和生育子女;人口就会增加;人口的增加比粮食要快,贫穷就会恢复。同

样地,提高“贫穷救济的比率”(即照顾失业者的税收),将是对游手好闲和大家庭的一种刺激;人口将再度比物资倍数加速;购买者间的竞争会让出卖者提高他们逐渐减少的物质价钱;不久,穷人就又像以前一样的贫穷了。<sup>⑧</sup>

要彻底对戈德温诋毁,马尔萨斯继续考虑哲学的无政府主义的“梦想”。如果政府消失了,“每一个人就不得不用武力去保护他的小店,”就如当法律和秩序失调时,我们闩住门窗一般。“自私自利将占上风,争斗将永无宁日。”<sup>⑨</sup>婚媾的一切限制撤除了时,人口增加就会超过粮食生产,过剩的人口就会缩减每一个人的粮食分配量,美丽的理想就会崩溃在绝望的竞争、物价和工资的螺旋形上涨、不可避免的混乱和蔓延的悲惨之中。<sup>⑩</sup>政府应该维持,私有财产制应得到保护以鼓励生产和投资;私人的暴力应受到公力的扼制。历史应返回到其传统的公式上去:自然的产物由人类之本质来区分。

在这篇短论的补遗中,马尔萨斯要较前一篇文章更要清晰而严苛地主张防患未然的补救之道,而使得因自然和历史上所使用的灾害治疗法变得不需要。他提议停止贫穷救济,和放弃对自由企业的干涉;供需律应留给生产者和消费者,顾主和职员间的关系去运作。不鼓励早婚以维持生育率的降低。“我们的职责”是“不结婚,直到我们有能力抚养我们的孩子的美好远景时为止。”<sup>⑪</sup>总之,在婚前和婚后,人们必须要学到道德上的抑制。“在发情和……结婚间的这段中间期,必须……要在严格的贞节中渡过。”<sup>⑫</sup>在婚姻状态期间,就毋须任何方法或形式的避孕方法,如果这些或相同的规律不被遵守,我们就得让饥荒,流行性疾病或战争来定期缩减过剩的人口。

这篇《论人口》的短文被英国保守的百姓捧为神喻。国会和雇主们在抵制如罗伯特·欧文这些自由派人士要求以立法来缓和供需律上感到有了根据。威廉·庇特撤回了他已提出的扩大贫穷救

济的法案。<sup>⑧</sup>已经由政府采用来抗拒英国激进派的措施,因马尔萨斯的“这些空想贩子正在勾引简朴的人们走上悲惨的幻想”之主张而似乎得到了辩护。不列颠的厂商们,在他们的低工资政策有益于规律劳工和服从的信念上是加强了。李嘉图用马尔萨斯的理论作为他的“忧郁科学”之基础。(卡莱尔以此来命名经济学,是读过马尔萨斯之后)。至此,几乎每一种工业革命上的不幸事故可能都归咎于穷人的多产上去了。

自由派人士最先被马尔萨斯的短论弄得惊惶失措。戈德温费了20年的时间才草拟了他的答辩,然后,他的《关于人口,对马尔萨斯的答辩》一书(Of Population, an Answer to Malthus, 1824年),几乎是重复他的希望,同时抱怨马尔萨斯已经将进步的朋友转变成数以百计的反动派了。<sup>⑨</sup>威廉·黑兹利特是一个例外:在《时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 1824年)上一篇论马尔萨斯的短文中,他用尽一切尖酸刻薄的词句来攻击无情的神圣。他认为,植物的生产可望会超越妇女的生产。“一粒玉米其自我繁衍之速度甚至远超过人类。一蒲式耳的麦可种满一块地;那块地会提供20块其他土地种植的种籽。”<sup>⑩</sup>不久就到处呈现郁郁葱葱的一片景象。

后来的作者们,引述一系列的事实以平息马尔萨斯派的恐惧。在欧洲、中国和印度,自马尔萨斯后,人口已增加一倍有余;然而,他们的人民吃得却比以前要好,在美国,自1800年起,人口已增加好几倍;纵然仍有较低的人口比例要求粮食生产,农业生产比以前的任何时期都要适合,并且有大量的余粮供输出之用。与马尔萨斯对比起来,提高工资却不是带来生育率之增加,而是降低。问题不再是种籽或田野的缺乏,而是操纵城市和乡村的农工业机械之能源供应之短绌。

当然,对马尔萨斯的真正答辩是避孕——它的道德上容忍、广泛传播、较大功率和较低的花费、思想的俗化冲破了对生育控制的



神学上障碍。工业革命使儿童从他们曾经在农村中所担当的经济资产转变成因童工之日渐减少,教育花费高昂,和都市逐日拥挤时,而变成了城市中的经济上阻碍。知识之普及;男人和女人认识到那种改变的状况而不再需要大家庭了。纵使战争在目前要求供物质上破坏的技术发明,尤甚于大量年轻人布防在竞争的杀戮中。

所以,对马尔萨斯的答辩不来自戈德温的理论,而是“新马尔萨斯派”(Neo-Malthusians)及其生育控制的宣传。1822年,法兰西斯·普莱斯出版了《人口原则的图解和证据》(Illustrations and Proofs of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一书。他接受马尔萨斯的人口之增加较粮食供应迅速的原则。他同意限制是必要的,但不是用延宕婚姻的方法;最好是将避孕当作自然的盲目生产和战争的总歼灭之一种合法和相关道德的代用品。(他本人就生了15个孩子,其中5人死于童年时期),他自费印刷传单在伦敦散布,辩护生育控制;他并继续这一运动直至他83岁死时为止(1854年)。

马尔萨斯亲身体会了普莱斯的论点之压力。1824年,他投给《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一篇文章修正他的理论,撤销他吓人的数学比率,并重新强调人口过剩为争生存的一个因素,许多年后,查尔斯·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写下:

1838年10月中,于我开始我有系统的质疑后15个月,我偶然为了消遣而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Malthus on Population);并十分钦佩生存竞争之说…从对动物习惯之长期不断的观察上,这种论点立刻令我想到,在这种环境之下,比较适合者社会就维持下来,而不适合的就被毁灭。这种结果就是一个新品种的形成。至此,我终于抓住了一个值得去研究的理论了。

所以几乎经过了一个世代的进一步研究和思索之后,达尔文

出版了《物种原始》(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年)一书,是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观念的连锁修饰了“存在之伟大连锁”(The Chain of Ideas adorns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并构成了文明的历史。

#### 第四节 边沁论法律

边沁是一位比戈德温或马尔萨斯更要难对付的人物,因为戈德温提出一些引人入胜的观念,马尔萨斯则是一些令人困惑的恐惧;而杰里米·边沁撰述关于经济、高利贷、法律、正义和监狱等问题的文字——没有一种是十分有趣和迷人的;此外,他本人是一位隐居的巨人,孜孜不倦地学习,沉思难解的问题,发表得极少,事事主张改革,并高喊两个恶魔——逻辑和法律——的结合。然而,他的影响,在整整84年的岁月中,凌驾了他的时代,并推广至一个世纪之久。

他是一位富有律师的儿子,这位律师几乎用教育压扁了他。据说他在3岁时已读毕保罗·拉潘(Paul de Rapin)的八大卷《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并已开始学习拉丁文。(这种令人窒息的教学法由对边沁的训练而传给詹姆士·米尔,他用在儿子约翰的身上)。在威斯敏斯特小学时,边沁在写作希腊和拉丁诗上表现优异。在牛津时,他专攻逻辑学,于15岁时获得了学位。他继续到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去研究法律,但是,法律书籍的杂乱引起他的厌烦,他就决定,不论花多少代价,要将理性和秩序带进英国的法理学和立法中去。1763年12月中,年方15岁,他听到威廉·布莱克斯迪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对英国法律的颂赞;他惊讶不已,并受到这种只可能延迟立法改革而毫无疑问的阿谀所

挑逗,自那时起几乎直到他去世时为止,他就一直想到要将合理性、一贯性和人性带进英国法律中去。“我是,”他自问:“一位万事通的天才吗?我能有什么成就呢?所有尘世所追逐的一切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立法。我是一位立法方面的天才吗?我自己就能战栗疑惧地回答这个答案:‘是的。’”<sup>⑧</sup>这份怯生生的自负可能就是这种成就的泉源。

他带给他的任务一种现实的胸襟,誓言为秩序和理性尽瘁。他愤慨如义务、荣誉、权力这些压迫性的抽象观念;他喜欢把它们打入特殊的现实中去,并以一种持久的事实观点去检视各个部门。例如:权利是什么?它是“天赋”(natural)的吗?——是与生俱来的一些东西,如法国大革命的人类权利宣言所主张的一般吗?(the French Revolution's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或者,它仅是附属于公共善(public good)的一种个人自由呢?什么是平等?在数学的抽象概念之外有任何这类东西吗?能力、所有和权力的不平等是每一种有生命的事物不可避免的命运吗?什么是“常识”(Common sense)或“自然律”(natural law)呢?照边沁的意见,这一切抽象概念是大学、国会和法院中趾高气扬的“无聊东西”(nonsense on stilts)。<sup>⑨</sup>

我们也许会想象这样一位急躁的现实主义者在他那个时代和地方中流行的神学上做了些什么。在他以无私的眼光要看的科学、历史、经济、法律或政府的世界中,他发现传统的“神”毫无用处。<sup>⑩</sup>他对这些事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因为他感到英国国教相当理性,并且可成为有益之事物;但是,牧师却感到他的沉默仇视,并且十分公正地贬斥了他的功利主义为一种“无神的哲学”(godless philosophy)。<sup>⑪</sup>

他开始艰苦地贬斥布莱克斯迪为不列颠宪法的一位深文周纳的阿谀者。那种神秘实体在他看来好像是偶然事故,东补西缀和陈旧的产物之矛盾的调和,匆促的修正和瞬息即逝的灵感,没有逻辑

周延和原则做基础。所以(当美洲各殖民地忽视了那种移植来的君子协定时)边沁发表了如他在铁砧上放出的一颗火花一般的《浅论政府》(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1776年)一书——这是在1832年中赢得一半胜利之前,奋斗了有半个世纪之久的哲学上激进主义的第一击。

这位28岁大的挑战者,于赞扬布莱克斯迪“以学者和绅士的语气来教法理学”的同时,并责备他将宪法缩小至国王的权威之内的意见。一部健全的宪法应将政府的权力分配到它的各个部门中去,并便于它们的合作和共同的限制。指导立法者的原则不必是一位至高者的意志,而是受他们立法的那群人的“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一部制定法的正当试验便是针对那个目的之有用性。<sup>⑥</sup>此处,在这个著名的“有用性原则”(principle utility)中,便是边沁的立法和伦理学的根本。它是托马斯·杰佛逊在同一年发布的《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一篇令人惊奇的相关性产物;哲学和历史简捷地契合了;而基督教传统——边沁并不知情——温馨了这种联合。

这本小书是以较边沁后来的那些论著更要易于理解的一种体裁,和更要有吸引力的一种精神来写成的。他此时消磨了一部分时间在旅行上。1787年,他从苏俄送回英格兰一篇《保护高利贷》(Defence of Usury)——即利息的文章。他反对利息在神学上的责难;在经济学上就如政治学上一般,个人在社区善的可允许之范围内应当自由运用他自己的判断。边沁是一位自由派人物,但是,那个字汇在18世纪的了解上,其意如自由的防御者同义;他同意重农主义者和杰佛逊的国家应干涉个人的自由至最小限度为最好的说法。他是一位激进派——一位追溯本源的人;但是,他不赞成工业国有化。1787年中,也没有大工业供国有化。

从俄国回来时,边沁出版他的主要著作:《道德和立法之原则》(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1789年,他的出版物倾

向于革命的)。它是一本艰涩的书,书中满是硬梆梆的一百多个定义,不过,使得一般读者在结尾时产生相当混淆。但是,边沁正负起了一种石破天惊的任务:以自然伦理观来取代神学伦理观;将行为和法律的基础放在团体和国家的需要上,甚至放在一个执行者或一个阶级的意志上;并且,一方面将法律和行为从宗教敕令中,另一方面,从革命的梦想中解放出来。一个负起这样一种任务的人,成为一位偶然犯着作家的道德义务之原则的人是不待多言的。

道德和法律两者的新基础就是利用原则——对个人的行为、团体的习惯、人民的法律和人类的国际上合意的有用性。边沁就一切有机体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视为当然。他界定快乐为身体和心智的任何满足,痛苦为任何不满足。有用性就是产生快乐或避免痛苦的性质;愉快就是快乐的继续和持久。有用性不必完全是对个人的,他可能部分地域主要地是对家族、社群、国家或人类的。个体也许(透过他的社会本能),在将他的满足附属在他所属的团体中时,发现快乐——或避免痛苦。结果,除了其直接的目的外,一切行为和法律的最后目的和道德试验便是它所贡献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等级。“一旦我所知道的我最亲密的朋友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竞争时,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为人人,那么,人人也就为我。”<sup>⑧</sup>

边沁的确不佞称他的实用公式是原初性的。他以往常一般的坦诚宣称:他从普里斯特列的《论政府的第一原则》(Essay on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1768年)一文中找到的。他可能在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道德善与恶之质疑》(Enquiry Concerning Moral Good and Evil, 1725年)一文中找到的,该文界说好公民为一位促进“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的人;<sup>⑨</sup>或者,从贝卡里亚(Beccaria)的《犯罪与刑罚》(Trattato dei delitti e delle pene, 1764年)一文中,该文描写道德考验与目标为最大多数幸福原则之设计(la massima felicità divisa nel maggior numero);

或者,更清楚一点,从爱尔维修的《精神》(De l'Esprit, 1758年)一文中:“功利是一切人类德性的原则,和一切立法的基础……。一切法律应追随一个简明的原则,公众之功利——即:在同一政府之下的最大多数的功利。”<sup>④</sup>边沁仅就圣经上的告诫“爱你的邻居如爱自己”给予一种量的形变而已。<sup>⑤</sup>

他的成就是适用“最大幸福的原则”(他的最后定则)到英格兰的法律上去。他此时已有了一种清楚的道德命令,和藉以判断布道者的告诫、教师的训诰、政党的原则、立法者的法律和国王的敕令的一种试验了。法律不必承认如权利、自然、大众或神性这些神秘的实体;毋须从上帝到摩西到穆罕默德(Mohammed)到基督的启示;毋须为了复仇之故而惩罚。每一提案必须要回答谁因此而受益(Cui bono)这个问题?它将为了谁的好处而制订?——为一人、少数、许多、还是全体?法律必须自己去适应人类根深蒂固的本性和有限的才干,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它必须清楚而易懂,和认可实际的施行力,迅速审理,迅速司法判决以及正确和合乎人道的刑罚。对这些目标,边沁以他一生的最后几年,和他的书的最后十章来阐发。

同时,他应用他的测杖到当时的各个问题上去。他高揭重农学派的放任主义到工业和政治中去。一般而论,个人是他自己幸福的最好判断者,在社会实际状况的许可下,应以他自己的方法自由地去追求幸福;不过,社会应鼓励志愿结合,它的职员愿意放弃部分自由而为一个共同的理念而一起去奋斗的意志。从这些共同原则,边沁辩称,代议政府,连同它的各种错误和层出不穷的腐败,是最好的政府。

《道德和立法原则》一书,从它的风格,批判的精神,和强烈的世俗化之诸多困难上,受到比预期的还要广大的喝彩。它在国外受到的欢迎比在国内还要热烈。法兰西翻译了他的作品,并于1792年使他成为法国公民。欧陆各首都和大学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纷

纷和他通讯联系。在英格兰,保守党党员谴责功利主义为不爱国的、非基督教的和唯物主义的。有些作者怂恿说,许多行为——浪漫的或双亲的爱、自我牺牲、共同援助——不知不觉间涉及到自我满足上去。艺术家们依照它们的使用价值妨碍了在艺术品上的评断。但是,除了政府官员外,大家都一致同意,当矫装和虚伪撤除了时,利己是每一个政府的伦理和政策。

边沁依照他自己的哲学而生活着,并使得他的岁月无疑地十分有用。在《司法证据的原理》(Rationale of Judicial Evidence, 1825年)和其他著述中,他努力清理旧法律和新案例,并且在缓和传统刑罚学的过分野蛮上获得相当成就。他于1827年,79岁高龄时,开始制订英国法律,但是,在编完一卷而准备编第二卷时,死神攫走了他。他参预创立《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 1823年)作为一个自由派观念的机关之工作。他集合一批认识在这个坏脾气的的外表后面这颗仁慈心肠的门徒。迪蒙(Pierre-Etienne Dumont)是他在法兰西的使徒;本身就是一位杰出思想家的詹姆士·米尔编辑这位大师的手稿成可读的读物;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将这个使命从呆板的观念提升到人性的境界上去。

由边沁领导下,这批哲学的激进派为成年男性的选举权、秘密投票、自由贸易、公共卫生、监狱改良、司法清廉、贵族院的纯洁和国际法之发展而工作着。直到1860年,边沁哲学中的个人和自由倾向因素,一直由他的门徒们强调着;之后,社会主义潜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中,扭转这股改革的潮流朝着供政府利用的方向上去,成为打击公共病态的公共意志的一个机关。

临死之际,边沁困惑在使他的尸体供最大多数人充分使用的问题上。他指示,尸体应在他的朋友们面前解剖。这一点是做到了。然后,头盖骨填塞后涂上蜡,骷髅架穿上边沁灰黯的便服,直立着放入剑桥大学院的一具玻璃柜内,直到今天,这具骷髅依然直立在那里。

## 第六章 文学之转变

### 第一节 报 纸

如果法兰西执这一世纪的政治舞台之牛耳，英格兰则在文学上居于领导地位。除了夏多布利昂(Vicomte Franc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的散文外，法兰西还有什么可与沃兹沃思、科尔里奇、拜伦和雪莱比拟的呢？——还不包括基特(Keats)在内哩，他的杰作超越我们现在的范畴。紧接着伊利莎白一世之后(Elizabeth I)，这是英诗在4个世纪中最灿烂的一个时期。

纵使是信札也可能都是文学作品，因为拜伦和科尔里奇的信牍似乎比他们的诗篇更要受到我们这个时代赞赏。在那个时候，通常当收信者给付邮资时，他为他的邮票要求了实质或形式上的代价；但是，收到这群大家的一封信，可能是死后重生的一张护照哩。

无论如何，报纸不是文学。寻常每一份报纸是折成4页的一张纸；第1页和第4页刊登广告，第2页是政治新闻，包括前一天国会活动的一篇摘要。伦敦有好几家日报：主要有《泰晤士报》(The Times)，创立于1788年，约有5000订户；《快讯报》(The Courier)，1万订户；《晨报》，是民权派的机关报，有科尔里奇的特写“领袖



们”的方块专栏；和《咨询报》(The Examiner)，是如利·亨特(Leigh Hunt)这种自由派人士执笔的喉舌。郡或区(borough)的中心各有自己的一份，有时两份报纸，一份属于保守派的，一份则属于改革派。还有好几份周刊，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威廉·科贝特的《政治记录周刊》(The Political Register)。并且还有好几份有关政治、社会和文学评论的期刊。其中最有权威的是由法兰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rey)、亨利·布鲁厄姆和沙尼·史密斯(Sydney Smith)\* 于1802年创办，用以辩护进步观念的季刊《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和由约翰·默里(John Murray)、罗伯特·骚塞、和沃尔特·司各脱于1807年创办，用以辩护保守派使命的《四季评论》(Quarterly Review)。

报纸的权力是不列颠社会状况的一项杰出因素。它不再是如艾迪生(Addison)和斯蒂尔(Steele)优闲时代的一种文学媒介；它已变成了广告商的一个销售对象，和政治团体的一个机关。由于广告商依据销售数来给付广告费，编辑和发行人必须要权衡大众的意见，就经常牺牲了当权政党的观点；所以，报纸就去讽刺国王的那些饭桶王子们，纵使政府尽一切努力来维护他们也是枉然的。渐渐地，当19世纪中，报纸变成了一种工具；最后，变成了正在抬头的民主政治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

---

\* 悉尼·史密斯与击败拿破仑于阿克(Acre)的威廉·悉尼·史密斯爵士(Sir William Sidney Smith)并非同一人。

## 第二节 书

当中产阶级和阅读的群众增加时,书籍也增加了。出版业变成与卖书业分开的一种获利丰盈的独立行业。出版家们争取作家,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在文学沙龙中宴请他们。所以,约瑟夫·约翰逊宴请并出版了戈德温、佩因和布莱克及他们的作品;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Archibald Constable)清偿了沃尔特·司各脱的债务;托马斯·诺顿·朗曼(Thomas Norton Longman)则负责沃兹沃思的;约瑟夫·科特尔(Joseph Cottle)把科尔里奇和骚塞留在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的约翰·默里系住漫游的拜伦。同时,朗曼家族历史悠久的公司耗资 30 万英镑,出版钱伯斯(Chambers)的 39 卷新编《百科全书》(Cyclopoedia, 1819 年);而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连出 3 次新编——第 3 版,于 1788 年—1797 年出版,分 18 卷,第 4 版于 1810 年出版,计 20 卷,第 5 版于 1815 年,25 卷。

出版家付出大笔现款代替版税来收买稿件,倘使增印和增加销售时,并增加一些报酬;虽然如此,极少几位作家靠他们的笔杆生活的——托马斯·穆尔生活舒适,骚塞和黑兹利特惴惴不安,司各脱由巨富而又变成赤贫。出版家们使贵族成为文学的主雇很成功,但是,有些有钱人依然拒绝帮助;所以韦奇伍德家族补助科尔里奇,和雷斯莱·卡尔弗特(Raisley Calvert)遗赠 900 英镑给沃兹沃思。政府偶尔送给品行优良的作家们一笔谢礼金,和维持一位桂冠诗人 100 英镑的奖赏;为这笔收入,可望他即席赋诗以纪念三军的一次胜利,或一次皇族人员的诞生,婚配或死亡。

公众的阅读兴趣之成长因书价上涨而受到抑制,但是,却因图书俱乐部和借阅图书馆之设立而促进了。最好的借阅图书馆是爱西尼厄姆图书馆(The Athenaeum)和兰沁图书馆(The Lyceum),都设立在利物浦,一间有8000卷藏书,另一间有1.1万卷。借书的人每年付费1到2.5金币(guineas),作为借阅架上任何图书的权利金。每一个市镇都有自己的借阅图书馆。当阅读从贵族普及到一般平民时,在趣味和标准上多少有些不同了。从古典传统到浪漫的感伤文学之转变,便是因这种普及化所带来的,和青年期的爱情从父母控制和财产约束上逐渐解放之故;以及一件爱情可以写出成百爱情故事的缘故。理查森(Richardson)的赚人眼泪的文章,是从菲尔丁(Fielding)健美情人们和斯莫利特(Smollett)的雄健冒险家们处得到根据的。

除了马修·“蒙克”·刘易斯(Matthew“Monk”Lewis)和他的恐怖室 Ambrosio, or The Monk(1795年)一书外,小说家中,妇女较占优势。在恐怖神秘派中,仅次于他的是安·拉德克利夫太太(Mrs. Ann Radcliffe),她最成功的一系列小说是《一位西西里人的罗曼史》(A Sicilian Romance, 1790年),《森林罗曼史》(The Romance of the Forest, 1791年)和《乌陶福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Udolpho, 1794年)三书。通常,一般英国读者称这些书为罗曼史(romance,取自法文字roman,意指一则故事),而小说(Novel)这个字则用在寻常生活里自然情况中发生的较长篇虚构故事,如菲尔丁和简·奥斯汀的小说便是;司各脱的“伟佛莱小说集”(Waverley Novels)连串起这些定义。在罗曼蒂克的虚构故事中,女作家们自然就要出类拔萃了。弗兰西丝·伯尼,在20岁时,就以Evelina(1778年)一书崛起文坛,接下去出版了Cecilia(1782年),Camilla(1796年)和“漫游者”(The Wanderer, 1814年)几本光芒熠熠的小说,她死后(1840年),她的日记(Diary, 1842年)又迷惑了另外一世代之久。

甚至更要有名气的是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 她的《雷克冷堡》(Castle Rackrent, 1800年)和《缺席者》(The Absentee, 1812年?), 就英国地主利用爱尔兰人的真实情形, 用虚构故事的形式作了十分有力的描写, 连英格兰都受到刺激而要减缓这些邪恶。只有她那个时代的一位女作家超越过她, 而那个女人同时也超越了所有的男作家。

### 第三节 简·奥斯汀

(公元 1775—1817 年)

她的一切冒险行为都是透过她的笔表现出来的, 纵使那样, 她需要的也不多, 因为她从优雅的日常生活中, 发现了充分的神圣事情, 除了像她自己一样的女人所受的教育和感受的而外。她的父亲是汉普希尔(Hampshire)史蒂文顿教区(Steventon Parish)的牧师。她出生在牧师宿舍中, 并且一直住到 26 岁。1809 年, 她的哥哥爱德华供给母亲和妹妹们在赵顿镇(Chawton)上的一个家。她住在那里一直到死时为止, 偶尔以探访她的兄弟们和在伦敦投一宿来变换她简单的日常生活方式。1817 年 5 月中, 她到温切斯特(Winchester)去接受医疗, 而在 7 月 18 日那天, 她就死在那里, 未婚, 享年 41 岁。

她以姊妹一般的爱情充实她的文学; 以她捕捉住生命中荒谬和隐藏的焦虑感和淡淡的讽刺, 和以平易的笔触来描绘它们; 以她对农村风光的享受, 以及乡下日子的优闲自持, 赋予她生命的悬宕气氛和意义。她有足够不喜欢伦敦的理由; 她以不愉快的笔调去描写伦敦, 只视它为脏乱、贫穷和优裕、腐化间的一条过道; 它是勾引

乡下女孩子堕落的一个地方。她感到英国生活较优雅的地方是在乡下稍微破落了的贵族区；在他们有家族规律的家庭中，和由安定所产生的丰富传统，以及恬静的生活内容中。在那种安详的气氛中，人们很难听到法国大革命的消息；拿破仑距离他们也很遥远，以致不能使人们放弃为舞会或一生去挑选一位合适的伴侣这种更迫切的事情而去想到他。宗教在那些家庭中有其地位，但是，只是维持下去而已，因为正在教区中逐渐猖獗的神秘诡辩已大为削弱它的恐怖感了。我们听到简·奥斯汀在她对不得不勉强在伦敦住上几个月的范妮·普赖斯(Fanny Price)同情的声音：

对失去一切春天中欢愉的范妮是不幸的……。她以前不知道植物的发芽和生长多么令她愉快。纵使时序无情，从她姑妈的花园中最温暖的一角看早开的花朵带来的美丽景色，和她姑丈的农场和茂密的森林中看树叶绽放，无论在身心两方面，她从那可爱的节令中，她获得何等令人兴奋的生气呀！<sup>①</sup>

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一个舒适的家，一座芬芳的花园，与一群活泼愉快的姐妹一次傍晚漫步，从一位赞扬和传播她的手稿的父亲处的一句鼓励——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弥漫了一种安详，健康和友善的清醒空气，并带给她从容不迫的读者，几乎很难在任何其他小说中找到的一份宁谧的满足感。她深知日子本身就是无穷的祝福。

所以她写了6本小说，耐性地等着它们不慌不忙地问世。1795年，20岁时，她写作第一本“感知与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的小说，但是，不能令她满意，就束之高阁。以后两年中，她用力写作《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一修再修后，寄到一位出版商那里，出版商以赚不了钱而退回了它。1798—1799年中，她

写作《诺桑格修道院》(Northanger Abbey); 理查德·克罗斯比(Richard Crosby)买了下来,但却任它搁在一边不予出版。接着是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因居住地改变而烦恼吧,也许是失望哩。1811年2月中,她开始写《曼斯菲尔德公园》(Mansfield Park);并在11月中,重写《理智与情感》,获得了印行。接着,在她生命的最后5年中,到达了成熟的丰收期:《傲慢与偏见》在1813年找到了出版商,《曼斯菲尔德公园》在1814年,《埃玛》(Emma), 1816年;并在1817年,她死后,《诺桑格修道院》也问世了,不久,《说服》(Persuasion)也与读者见面。

《傲慢与偏见》一开始是5姊妹,个个都准备且渴望着结婚。伯纳特太太(Mrs. Bennet)是一位神经质、大惊小怪的女人,她的晨祷和时刻所思念的是替她的那窝小姑娘找丈夫。伯纳特先生(Mr. Bennet)为了躲开他多嘴的老婆,就退居到书房中去,在那里不受到吵闹,他早已放弃要给5份土地,或英镑做嫁妆的问题。他只想撑持他的家庭到死亡时为止,之后,就由可敬的柯林特先生(Reverend Mr. Collins),邻近一个镇上尚未结婚的教区牧师继承。要是那五姊妹中的一人能够勾引住那位牧师该多好!

最年长和最可爱的简(Jane)则把目标放在富有而英俊的宾格莱(Mr. Bingley)先生身上;但是,他似乎偏爱另一位候选人,而简几乎抑制不住她的哀怨。伊利莎白,排行第二,不是因为脸蛋或身段而自负,而是因为她的独立、自信的个性;她处处为自己设想,并且不准备任人摆布;她阅读范围很广,任何男人如不具备广博的知识,在心智或慧黠上是难以与她一较长短的;她的作者坦诚地羡慕她。第三位姊妹玛丽,是最适于结婚的,对两个姊妹迟迟不结婚阻挡了她的路子十分懊恼。莉第亚(Lydia),老么,奇怪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在准许试探“性”的神秘之前,必须要等待这道奇妙的结婚公式。

这个家庭被柯林特先生计划前来访问一次的消息弄得喜气洋

洋起来。他是一位对自己的纯洁意识很自负的人,但是,也很小心地认同阶级区分和物质享受;作者在他的身上,赋予了较下级的国教牧师不自觉地陷身进去的阶级奴性的无情个性;这种讽刺似乎是极端的,但是,它却如断头台一样的清晰明快。

这位年轻的神职人员来了,他认为可爱的简是不可侵犯的,就向伊利莎白求婚,伊利莎白以拒绝他来斫伤这个家庭,因为不愿成为他完美无瑕囚禁品。感到五姊妹中排行第三,要想首先获得一位丈夫简直是一个笑话的玛丽,就定着眼睛,莞尔着专心注视这位命中注定的财产继承人,逗得他去向伯纳特先生和夫人要求和她结婚。

一切似乎很得体,但是,害怕变成老处女的莉第亚就和健壮的维克翰先生(Mr. Wickham)私奔了。整个家族因她的罪愆而蒙羞,避见所有的邻居。可敬的柯林特先生送了一封责备的信给伯纳特先生:“你女儿的死与这种丑事比起来,也是一件值得祝福的事……。谁还愿意使自己与这样的一个家族发生联系呢?”<sup>⑥</sup>伊利莎白以她难以令人接近的自负,勾引了有阶级偏见的戴西先生(Mr. Darcy)而挽救了全家;他以万贯财富放在她的脚边,迫使维克翰与莉第亚结婚以还她的清白;并且,这位女作家以十分熟练的神奇手法,使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甚至连宾格莱先生都发现他时常爱着简。

《曼斯菲尔德公园》结构更要完美:最后的结局在开始时就已预示了,几乎每一情节都是经过细心地安排好的。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不是傀儡,而是各有其自己生命的活人,并且正确地阐释了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的评述(这“应该是一切虚构故事的指针”):“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公园是托马斯·伯川爵士(Sir Thomas Bertram)风景优雅的领地,伯川爵士是一位比宾格莱先生更要热心的父亲。不过,他也犯了许多惊人的错误:耽迷于追求财富和荣誉,他让自己的长子在道德和生理上分裂,他准许女儿

延长她们在伦敦一个社团中的假期，那里一切乡村的道德成为取笑的话柄，而不是生活的资源。因为他的信用，他收养了谦和多感范妮·普赖斯——他太太的穷困侄女。他引以自慰的是他的次子埃德蒙(Edmund)。他献身于教会。从种种描述上看，都应该是一位未来的牧师；他是柯林特先生的翻版。用了几百页篇幅才使得艾德蒙认清，他对范妮的感情是超过兄长般的友爱的；但是，在它优闲的情节中，他们提升的感情，是古典小说中的一种愉快的浪漫气息。

纵使在她的“爱”的研究中，简·奥斯汀是，并且一直是一位古典派人物——一个永远杰出和理智永远清醒的人物。在乌陶伏派的神秘(Udolphan mysteries)和瓦波洛派的堡垒(Walpolian castles)对峙的这样一个世纪中，她一直是她那个时代的一位实际和理性的观察者。她的体裁如德赖登(Dryden)的一样纯洁；她的虔诚如教皇一样坚贞。她的范围狭窄，但她的探索是很深入的。她领悟到生命的基本期望便是征召个人去为全人类服务；政府的危机，权力的冲突，甚至要求社会正义的呼吁，并不如青年们不断地、不知不觉的努力着朝成熟的方向发挥，终止于牺牲的一种基础。她默默地接受人类神秘的两种——女性和男性的——希望；它的病根非她所能医治，它的目标非她所能了解。她从不大声疾呼；但是，只要生命的湍流所允许，我们都心甘情愿地去追随它；而我们可能被她的安静所俘虏。今天，英格兰几乎已找不到一个小村落了，但是，她却有一群崇拜者。



## 第四节 威廉·布莱克

(公元 1757—1827 年)

比简·奥斯汀早生 18 年,在她死后,还继续活了 10 年,威廉·布莱克跨越了转入浪漫主义的时期;他生活在神秘中,拒绝科学,怀疑上帝,崇拜基督,改变圣经,尽力模仿先知,并呼吁一种俗世圣哲的美丽幻想。

他是一位伦敦袜商的儿子。4 岁时,他看见上帝透过窗户注视着他而惊恐失色。稍后,他看到天使们在一棵树上拍着翅膀,和先知伊齐基尔(Ezekiel)在一处田野上漫游。<sup>①</sup>也许因为他的想像无端地与他的感觉混淆在一起,直到他 10 岁,他才被送到学校去就读;然后,进了斯特兰(Strand)地方的一所制图学校。15 岁时,他到雕刻师詹姆士·巴西尔(James Basire)处开始了为期 7 年的学徒生涯。他博览群书,其中包括如珀西(Percy)的《古英诗遗篇》(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和麦克弗森(Macpherson)的《奥锡恩》(Ossian)等这些浪漫气息的作品。他自己也学写诗,并且加以注释。22 岁时,他成为皇家学院的一名修习雕刻的学生,但是,他反抗雷诺仿古的命令;后来,“他悲叹他在约书亚爵士(Sir Joshua)和他所雇的那帮狡猾的歹徒的梦魔般统治下浪费了”他的“青春活力和天赋。”<sup>②</sup>不顾这一切,他发展他自己幻想的素描风格,并以他的水彩画和雕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他在性方面并不强烈;他有一次表示但愿“性能消失,乃至停止”的希望。<sup>③</sup>然而,25 岁时,他娶了凯萨琳·鲍彻(Catherine Boucher)。他时常用愤怒去折磨她,因异想而对她厌倦;但是,她深

知他的天赋，忠诚地照顾她直到他结束。他没有孩子，但爱和朋友的孩子们玩耍。1783年，约翰·弗拉克斯曼和马修斯牧师(The Reverend A. S. Mathews)偿付了布莱克自行印行的早期诗集之费用；当这些诗稿在1868年重印时，在他迟来的令名中，也分享了一份荣誉。其中一些，如无韵的狂想诗致《黄昏星》(To the Evening Star)，在英国的诗坛上升起了一个原始的音符。<sup>⑥</sup>

如任何一位有感受的人一般，他愤慨英格兰的财富集中和愈趋恶化的贫穷。他加入聚拢在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周围的托马斯·佩因、戈德温、玛丽·吴史东克莱夫特和其他激进派人士的行列；他们在一起喝烈性的法国启蒙酒(the strong wine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并高唱正义和平等。他的相貌合于讨厌任何强制的秩序之精神。他身材粗短，有一副“充满表情和朝气的高贵气质。他的头发是浅棕色的，卷曲而浓密，一绺绺头发，不是垂下来的，而像一朵朵火舌般竖起着，从一段距离外看过去，活像是放射出去的一般，配上他炯炯有神的眼睛和突出的前额，他的高贵和愉快的相貌，一定使得他的神情表现出真正令人好感的印象。”<sup>⑦</sup>

1784年，他在布劳特街(Broad Street)开了一间印刷所。他让他的弟弟罗伯特(Robert)充当助手。这是一种愉快的关系，因为彼此关怀着对方；但是，罗伯特短命早死，他1787年去世，加深了威廉身上忧郁的神情，和他思想中的神秘因素。他深信他曾见过罗伯特的灵魂，在断气的刹那间，冉冉升向天花板，“快乐地拍着双手。”<sup>⑧</sup>对罗伯特的鬼魂，他以文字和图案雕刻在一张盘子上。几乎布莱克的每一本书都是这么雕刻的，并且以几个先令到10个金币的价钱卖出去。因此，在他有生之年，他的读者群十分有限。

1789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杰作，19首《无邪歌》(Songs of Innocence)。很显然，他用“无邪”一字意指所收集关于基督青春期前的愉快传统是非常可信的，充分指引出了成长的经过；不过，当这些诗出版时，布莱克已32岁，我们从诗中体会出，那种经验早已是

在悼念无邪的死亡了。我们必须记诵他的名句，我们才能用来与他5年后《咏虎》的句子作一对照。

小羊儿，谁创造了你？  
你知道谁创造了你吗？  
给予你生命，让你吃饱肚子；  
在小溪边，芳草地上；  
给予你轻逸的衣裳；  
柔软的衣裳，细致，光洁；  
小羊儿，谁创造了你？  
你知道谁创造了你吗？

小羊儿，我来告诉你，  
小羊儿，我来告诉你；  
他和你同名，  
因为他自称是小羊儿；  
他是谦恭的，他是温和的；  
他是一个小孩，  
我是小孩，你是小羊儿，  
我们和他同名，  
小羊儿，上帝祝福你，  
小羊儿，上帝祝福你。

也许下面一首诗《黑小孩》(The Little Black Boy)还要优美一点，诗中一名黑孩子奇怪上帝为什么弄黑他的皮肤，并梦想着黑孩子和白孩子不受肤色的阻碍而在一起玩耍的时光。和后来的两首诗：《扫烟囱者》(The Chimney Sweeper)，想像一位天使下凡，将所有扫烟囱者从他们工作和睡觉用的满是污垢的工作服中解放出

来。《神圣的星期四》(Holy Thursday)以“那么,亲亲啊,免得你赶走你门口的天使,”的警句做结尾。

过了5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5年中,理想主义红遍天下(1791年);接着,就转入大屠杀和恐怖时期(1792—1794年)。1789年中,依据一份报告上指出,布莱克公然戴着革命的红帽子,加入佩因攻击英国教会的举动。由于混乱所带来的激动,他突然以民谣的体裁谱出《预言诗》(Prophecies),附和杰里迈亚(Jeremiah)和霍齐亚(Hosea)的一个充满原罪世界的预言式宣言。这些诗对愤慨于制造晦涩的那些人是不值得推荐的读物,但是,我们指出在《天堂和地狱的结合》(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一种斯韦登堡〔Swedenborg〕体裁的讽刺小品)中,布莱克使这些领域与无邪和经验平等。有些“地狱格言”(Proverbs from Hell)暗示一种一时的蔬食主义者——惠特曼式(Whitmanic)——弗洛伊德派(Freudian)——尼采派(Nitzschean)的激进主义:

每一种健康的食物毋须网罟或陷阱去捕捉……  
 最壮观的行为是在你面前安排另一次……  
 孔雀的壮观是上帝的荣耀……。  
 女人的赤裸是上帝的创作……。  
 保姆撒手不管,婴儿不久就谋杀在摇篮里…  
 上帝只在活人或人类身上着力,自古迄今,  
 神就在人类的胸膈中……  
 敬上帝即是敬重他在别人身上所赋予的天赋,  
 ……和爱护伟人的优点。羡慕或中伤伟人的那  
 些人憎恨上帝,因为没有其他的上帝。

在《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 1794年)中,诗人以怀疑和谴责的合唱反驳他的无邪之歌。

老虎,老虎,闪亮在  
夜晚的森林中,  
是什么不朽的手或眼,  
能制造你可怕的匀称美?

是什么臂力,什么技巧,  
能扭曲你的心肌?  
当你的心开始搏动时,  
多可怕的手,多可怕脚啊?

当星星掷下他们的矛,  
用泪水湿润天空时,  
他会笑着去看他的创作吗?  
造羊的祂,也造了你吗?

反之,在《无邪歌》中,一位“迷失小男孩”(A Little Boy Lost)得到上帝援救,带回了他家庭的欢乐,一首相关的《经验之歌》,却述说因为教士们知道一名男孩没有宗教信仰而被他们活活烧死的事。在《无邪》歌中,“神圣的星期四”描写圣保罗天主堂挤满活泼愉快的孩子正在唱圣诗,在《经验》中,“神圣的星期四”却问:

这是要看的一件神圣事情,  
在一个富庶,多产的地方,  
婴孩们面带惧色,  
以冰冷,吝啬的手来抚养么?  
那种颤抖的叫喊是歌么?  
能是一首快活之歌么?

如此多的可怜孩子啊！  
那是一块赤贫的土地。

反对这些邪恶的革命中，似乎不再是一种有效的治疗了；因为“铁腕敲碎了独裁者的头颅。却换来另一个独裁者。”<sup>⑥</sup>对暴乱的反抗失望之余，布莱克从他信仰的余烬中去找寻安慰。他此时把科学当作物质主义的侍婢，是有权者对付简朴者的工具，一般人都失去信仰，慧黠者反抗无知者了。“艺术是生命树；科学，是死亡树；上帝就是耶稣。”<sup>⑦</sup>

1818年后，布莱克很少写诗，读者也寥寥无几，他靠着他的艺术来维持生活。六十几岁时，他有时十分穷困，不得不替韦奇伍德的陶制厂去刻广告。1819年，他找到约翰·林内尔(John Linnell)为济助者，林内尔委托他为《约伯书》和但丁的《神曲》(Dante's Divine Comedy)作插图。他就在这最后的任务上工作，直到死神降临时才休止(1827年)。他的坟墓上没有竖立石碑，但是，整整一世纪后，才在那里竖立起一块牌子；1957年时，由雅各·爱泼斯坦爵士(Sir Jacob Epstein)雕塑的半身铜像放入威斯敏斯特的修道院中。

在他死时，朝浪漫主义的转变已完成了。在古典主义日正当中的时候，浪漫主义就已经怯生生地以汤姆森的《季节》(Seasons, 1730年)，柯林特(Collins)的《颂诗》(Odes, 1747年)，理查森的《克拉瑞莎哈罗》(Clarissa Harlowe, 1747年)，格雷的《乡下基地的哀诗》(Elegy, 1751年)，卢梭的《新埃洛漪丝》(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 1761年)，麦克弗森的 Fingal (1762年)，霍勒斯·沃波尔的《奥坦陶堡》(Castle of Otranto, 1764年)，珀西的《古英诗遗篇》(1768年)，苏格兰和日耳曼的民谣，查特顿(Chatterton)的《杰出伪造》(Remarkable Forgeries, 1769年)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Werther, 1774年)开始了。事实上，在每一时代，每一家

庭,每一少女和青年身上,都有一些浪漫气息;古典主义是一种不确定的建构规则,如奔腾在血液中的液体燃料般的冲动和激情上的严格限制。

接着法国大革命到来了,纵使是大革命的崩溃也都带来了解放。旧的法律和命令形式失去了威望和执行力;感觉、想像、期望在文字和行为中的旧有破坏力都自由了;年轻人开始自每一文学法则,每一道德禁令,每一严格的教义,每一法律束缚的国家之下燃放出诗和艺术的火花。1798年,沃兹沃思和科尔里奇一起为抒情民谣集(Lyrical Ballads)写诗和作序;伯恩斯(Burns)和司各脱在苏格兰唱出爱情、反叛和战争的歌声;拿破仑的军队以革命所能散布其梦想还要快的速度在崩溃。文学已成为在反叛中到处可听见的自由之声。人类的未来似乎从来没有如此开放,希望如此无限,或世界如此年轻过。

## 第七章 湖滨诗人

(公元 1770—1805 年)

### 第一节 环 境

我们在此处,将沃兹沃思,科尔里奇和骚塞不很恰当地放在同一章中,不是因为他们创立了一个学派——他们并没有如此;也不是因为他们在个性或作品上表现出任何共同的精神之故。科尔里奇的绝妙诗章表现出神秘,奇怪的人物和秘事,而沃兹沃思的散文诗完全叙述一般男、女、儿童和事物。科尔里奇的生和死都很浪漫——是一个有感受、幻想、希望和恐怖的动物;沃兹沃思除了在法兰西的一段浪漫时间,和 1798 年的一次叛乱宣言外,是一位如克拉布(Crabbe)一样古典和十足的保守派。至于骚塞,当他的诗有报酬时是浪漫的;他的散文是严肃的,并具有德赖登的诗气;他成熟的政治接近现状;他的婚姻生活稳定,慷慨的友谊十分平衡在情绪上、哲学上、财政上以及他曾一度梦想要与他在一起邀游的诗人朋友在萨斯奎汉纳(Susquehanna)海岸上组织理想社区的地理上。

这群人之构成一个学派,只是他们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迪斯垂克湖滨许多年的这种意识——这一片从肯德尔(Kendal)经过温得米尔(Windeumere)、安布尔塞德(Ambleside)、吕达尔瓦特(Rydal



Water)、格拉斯米尔(Grasmere)、得文瓦特(Derwentwater)和凯西克(Keswick)到科克第斯,雾濛濛,雨漫漫,山顶上笼罩着奥秘的层云,和银灰色的沼泽所构成的地球上最优雅风景区之故。山岭并不雄伟——最高峰只有3000英尺挺拔;温度十分宜人——那里几乎每天都下雨,但是雾水轻笼着山头,太阳几乎天天破雾而出,因为村落静谧,树叶常绿,露水点缀着浓密的花丛,如疯似癫的科尔里奇和稳重保守的沃兹沃思的精神回荡在丘陵间之故,那里久居的居民也带着变异不定的季节性格。沃兹沃思出生在那里的科克第斯,而死于格拉斯米尔;科尔里奇时而居住在那里的凯西克,而骚塞却住了40年;那里,在不同的时期中,曾有德、拉格比的阿诺德(Arnold of Rugby)和拉斯金逗留过;司各脱和雪莱,卡莱尔和基特都曾短期来到这里,去了解伊登(Eden)的情形,和追忆那里的一批桂冠诗人的当年盛况。

## 第二节 沃兹沃思

(公元1770—1797年)

他的母亲,娘家取名为安·库克森(Ann Cookson),是朋立司镇(Penrith)上一名亚麻布商的女儿。父亲约翰·沃兹沃思(John Wordsworth)是一位律师,充当詹姆士·劳瑟爵士(Sir James Lowther)的商业代理而发达。在他们科克茅斯的舒适家里,约翰和安抚养了5个孩子:理查德(Richard),成为一名事务律师,并综理诗人的财务;威廉和多萝西(William and Dorothy),是本节主要叙述的对象;约翰(John),走向海洋去求发展,并在一次沉船中遇难;和克利斯多夫(Christopher),成为一名学者,并升任为剑桥三

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院长。因为目前已不复记忆的一些理由,威廉直到晚他一年——1771年——的多萝西出生时才领洗;兄妹两人在同一天命名,犹如核准和祝福他俩终生不渝的爱情似的。

多萝西比他的任何一位兄弟,更要成为威廉的童年朋友。她分享他对环绕着他们周围的变幻莫测的自然之迷恋。他是敏锐而善感的,她却更是如此,很快就能抓住植物的形状和颜色、森林的生态和蒸发,层云懒散游移,和月亮洒落在湖面上的银色光辉。“她给了我眼睛,她给了我耳朵,”诗人是这样说他的妹妹的。她驯服他寻求追逐和厮杀的冲动,她却坚持他绝不应去伤害任何有生命的东西。<sup>①</sup>

当她7岁时,他们担负起了母亲逝世的哀伤。他们哀伤过度的父亲,拒绝续弦;他使自己淹没在工作中,把孩子送去与亲戚居住在一起。多萝西去到约克郡(Yorkshire)哈利法克斯(Halifax)的一位姑姑那里,此时,只能从威廉的假期中才能见到他。他在1779年中被送到靠近温得米尔湖的霍克斯黑德(Hawkshead)地方一所好学校去寄读,他在那里研究希腊和拉丁经典名著,并且,照他自己的说法,开始“呕吐诗章”了。

但是,附近的森林和碧水,在形成他的风格和特质上,似乎比书本扮演着更要大的角色。他善于应酬;他与其他的孩子一起参加年轻人的活动,有时在当地的客栈里吵闹一个晚上,有许多时候,他独自走进连绵的丘陵,或沿着依斯威特湖(Esthwaite Water)或温得米尔湖滨散步。有时,顾不了气候的变化,而喜欢上了它的阴晴变幻,他为大自然的景色而竟流连忘返,也了解侵入“低等”生命出没的处所时,可能带给青年们的恐惧;但是,他渐渐地体会到隐藏在植物生长中的精神,动物的嬉耍和挣扎,群山肃穆庄严的神情,和万花筒般苍穹的阴晴喜怒。这一切来自原野、森林、高山和层云的声音,似乎各自用自己的语言在诉说;太神秘和太微妙了,无

法用文字来形容；但是，他确实感到，他周围难以置信的繁多事物不是无助的机械，不过，上帝的形象比他祈祷的遥远、寂静、无形的自然神祇要更伟大、更接近。他养成了一种内心忧郁和外表崇慕的神情。

1783年，父亲突然间去世了。他毫无头绪的资产变成了耗时费日和花费不赀的诉讼，而詹姆士·劳瑟爵士欠他的4700镑债务，就如此长期拖延下去，每个孩子可分到相当于600镑的遗产，不够使他们继续去接受教育。<sup>⑧</sup>哥哥理查德却依然找到使威廉读完霍克斯黑德的学校之方法。

1787年10月，沃兹沃思升入剑桥，并进入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就读。他的一位叔伯辈的亲戚说服院长给予这位青年奖学金，冀望他能使自己准备去接受国教会中的圣职——因此停止成为他的亲戚们的一项财政上负担。不选择走上牧师职务的课程，他却读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专攻乔叟(Chaucer)、斯宾塞(Spenser)、莎士比亚和密尔顿——并且抗议一天两次强迫走进校园的礼拜堂；显然地，他的阅读抹杀了某些先天上的信仰。其中大部份必须留下来的，是因为他发现伏尔泰无聊平凡。

1790年7月中，他说服一名威尔士的同学(a Welsh Classmate)罗伯特·琼斯(Robert Jones)和他一起储蓄20英镑，并和他一同到欧陆去作一次徒步游历。他们前往科莫湖(Lake Como)，东向转入瑞士；基金不敷应用，就匆忙赶返英格兰，回到剑桥，及时平息了他们的经济资助者的盛怒。沃兹沃思藉着与住在靠近诺威奇的凤赛特牧师家(Fornset Rectory)的多萝西共渡圣诞假日，以弥补对她一年来的疏忽。“我们习惯在每个早晨大约散步两小时，”她写给简·波拉德(Jane Pollard)的信上说：“每个黄昏，我们大约在4点钟时走进花园……来回走着直到6点钟……。啊，简！当他和我在一起时，我从没有想到天凉的。”<sup>⑨</sup>她希望他会成为一位牧师，她愿意为他整理屋子。

当他自剑桥毕业时(1791年1月),他前往伦敦使许多希望成了泡影,“他在那里过了4个月默默无闻的生活,几乎使他终生不能忘怀。”<sup>④</sup>5月中,他与琼斯一起徒步游历遍威尔士;他们爬上斯诺登山(Mount Snowdon, 1350尺高)去看日出。11月27日那天,他独自一人再度越过法兰西。

大革命那时正呈现出最辉煌的局面:一部自由的宪法已经制订完成,《人权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一位在哲学上才开始摸索的血性青年,如何能抵制得住对正义和兄弟般情谊的那种呼唤呢?一位曾受到过世袭大君主头衔(指 Sir James Lowher)的人一些创作的穷学者,要他去指责那些如他在自传的《序言》(Prelude)中所说的那样,去谴责法国人委实是太困难一点了:

且请注意一个  
到目前为止人人站在平等  
地位上的共和国,我们都是  
诚诚恳恳的兄弟,如同在一团体中,  
学人和绅仕;甚且  
对来者亦无等第之分,  
财富和头衔,不如天赋,  
价值和勤勉般受到珍惜。<sup>⑤</sup>

到达法兰西后,他受到举国一致武装起来对付不伦瑞克的公爵(the Duke of Brunswick)镇压大革命的威胁,和如果巴黎抵抗公爵,他就把它化为焦土之热情所挑激。他与革命军的一位军官米开尔·戴·彪帕斯(Michel de Beaupuis)成为朋友,米开尔“因为出生好,属于贵族阶级”,但是,此时,感到有义务防卫法兰西抵抗侵略者。这种不分阶级的奉献,感动得沃兹沃思想到自己如何能在这一

使命中成为有用之人。但是,他感到自己太孱弱以致不能拿起武器,同时,也知道懂得法语太少,不能在民政或政治的岗位上服务。他就在奥尔良(Orleans)定居下来研究法语,就此困惑在一个女人的双唇上,不知所措地唧唧呀呀学拼音了。

他发现法语在给予他教导、同时也奉献了自己的善良热情的年轻妇人安纳泰·瓦隆(Annette Vallon)身上虽是十分妩媚,却也是十分多余。他除了将他的青春活力献给她外,别无其他可作为回报。他21岁,她25岁。当结果公开出来时,安纳泰认为她应得到一枚结婚戒指,但是,威廉却奇怪着:懂拉丁文多过法文的他,能够以一位丈夫的身份在法兰西生存下去吗?或者,身为异端天主教的她,能够在清教徒的英格兰生存吗?

1792年10月29日那天,他将她留在奥尔良,自己搬到了巴黎。在分开之前,他签了一份委托迪福尔先生(M. Dufour)代表他这位不在的父亲出席安纳泰即将出世的孩子的领洗礼。<sup>⑧</sup>孩子于12月15日出生,取名卡罗琳(Caroline)。

那个时候,巴黎的沃兹沃思正沉浸在大革命之中。他出席雅各宾党俱乐部(Jacobin Club,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激进共和党员的组织),参观立法会议(the Legislative Assembly),与稳健共和党员(the Girondins)交朋友。当时的热情冲激着他;他自感正处在震撼世界、创造历史事件的中心:

黎明时活着是一大乐事;  
无奈青年俊彦早升天国啊!<sup>⑨</sup>

然而,哥哥理查德的一封拒绝再予接济金钱、并坚持他立刻回英的信到达他的手里。因为大革命不给予他支持,他就西渡返回伦敦,设法化解冰冻三尺的家庭财政动脉。哥哥理查德仍然无动于衷。威廉·库克森舅舅(Uncle William Cookson),风赛特的牧师和

多萝西的监护人,曾作为修道士服务之前奏,而付出过这位目前眼看着要投入不中用的雅各宾党怀抱中去的年轻人教育费,却也勒紧了荷包和关闭了大门。

威廉十分伤心;他已经选择写诗为职业,并且感到,既然是一位缪司神(Muse)的神圣奉献者,有权得到兄弟、伯叔辈的支持生活费用。为了反抗起见,他就与经常到约翰逊书店的激进派人士维持联系,并且继续公开支持大革命。在他于1793年写成并发表的《写照》(Descriptive Sketches)一诗的最后50行中,他颂赞大革命不只解放一个国家,而是全人类;私底下,如他在遗著中所承认的,纵使“当成千上万的英国人被推翻覆灭,成为荒野饿殍”时,他也欣见法国人的胜利。<sup>⑥</sup>1793年2月1日那天,法兰西向英格兰宣战了;3月中,安纳泰求他回到她身边去的信到达沃兹沃思的手里,但是英伦海峡已禁止百姓横渡。他忘不了她,对她的思念燃烧着他的良心;我们会看到9年后他努力所作的一些弥补。在那几年当中,安纳泰变成了一位赤诚的保皇党人,而威廉也慢慢地发现了不列颠宪法的美德。

当保皇党员以恐怖的报复手段,把他所赞扬的稳健共和党员送上断头台时(1794年),他对大革命的信心就式微了。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对戈德温的《政治正义质疑》一书留下十分重要的印象;此文激励了他的激进主义,但是,此文提防依靠革命家们来从事改革。1795年中,他见到戈德温本人,并且深为着迷;在那一年中,他7度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的家中去拜访。纵然当他自己已变成一位狂热的保守派人士时,他仍然是戈德温的朋友,直到死神介入时为止(1836年)。

1795年,当雷斯莱·卡尔弗特遗赠给沃兹沃思900英镑时,是使他更趋向稳健的一个诱因。诗人毫不顾虑地借了300英镑遗赠给他的挥霍无度的朋友巴兹尔·蒙塔古(Basil Montagu),和200英镑给孟塔古的密友查尔斯·道格拉斯(Charles

Douglas)——两笔借款都以希望能给付10%的利息作抵押。沃兹沃思计算一年有50镑的利息(从来没有合理给付过)收入,加上其余的400镑,纵使再加上多萝西的20镑年金,仍然不够现实他的妹妹梦寐以求,使他俩生活在一起,经营最起码的充满诗情和爱的共同生活的一栋小茅屋。但是,就在那时,另一位朋友,布里斯托尔的约翰·平尼(John Pinney)提供给他们他在多塞特(Dorset)的一栋设备齐全而免费的雷斯塘小屋(Racedown Lodge)。所以,在1795年9月26日那天,沃兹沃思和多萝西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家,并且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1797年6月,过着十分幸福安乐的生活。

他那时年满25岁,身材中等,瘦小微佻;稀疏蓬松的头发披散在衣领和两耳的周围;乌黑忧郁的眼睛沿着一个好怀疑和略带侵略性的鼻子俯视着;他穿着粗条格子的裤子,宽松的咖啡色大衣作外套,一条黑色手帕充领带。他身体孱弱,在活力、精神和意志上却相当坚强;他健步如飞,超过他最健壮的朋友,用他自己的双手和斧头,砍伐或采集柴薪,他能使壁炉不断地冒着熊熊火焰。他如一位诗人一样的敏感,如一名女人一样的神经质;他患有头痛病,特别是当他要作诗的时候为然。他时常情绪不稳定,有臆想症的倾向,很容易感动得流泪;他有一度想到自杀<sup>①</sup>——不过,那是一种普遍性的匹夫之勇。他好学、自负、自我中心,对自己的超人性过敏具有信心,事事精通和(原谅无心的错误)道德上的优越感。但是,他在大自然的面前却十分谦卑,愿使自己成为她的仆人,并为启发人类而作为她的传声筒。

多萝西却与他相反:纤巧瘦弱,常在太阳下走路使面孔晒得呈褐色;毫不自私地专心——或自私地乐于——照顾她的哥哥,从不怀疑他的天才,使他们的住处保持得干净舒适,他生病时服侍他,以他所谓的“你那双大眼睛的逼人光芒”搜寻大自然中的美和神奇,<sup>②</sup>并且在她的日志上写下那些感悟作为她的回忆和他的使用。

她献出耳、手和眼睛；她从不（明白地）表示厌听他背诵他的诗篇，或抄写来随时朗诵。他却毫不保留地执爱着她，把她当做最亲密和要求最少的助手，是他自己最珍贵的另一面。

为了使他们的住处变成一个国家，和每年增加 50 镑的收入，他们负责照顾 3 岁大的巴兹尔，巴兹尔·蒙塔古的儿子；他们高兴见到他们的小小受监护人“由一个孱弱、营养不良的小把戏转变成一个健壮、可爱和无所畏惧的小男孩。”<sup>101</sup> 1797 年春，多萝西的朋友玛丽·哈奇森（Mary Hutchinson）由彭立斯（Penrith）前来和他们同住，直到 6 月 5 日为止。6 月 6 日那天，以他充沛活泼的方法，来回答沃兹沃思邀请的一位 25 岁的青年，满怀诗才，跳过门槛，冲向原野，投入威廉和多萝西·沃兹沃思的生活天地之中。他就是科尔里奇。

### 第三节 科尔里奇

（公元 1772—1794 年）

他是我们所结集的人物中最有趣的一人，在天才、妩媚、孱弱、观念和缺点上，也以他为最多。他在爱情和道德、文学和哲学上，从纯理想主义一直走到大纷乱的尽头。他所剽窃的作品之多不下于他的创作。没有一篇文字曾公平地描述过他。

塞缪尔·泰勒·科尔里奇生于 1772 年 10 月 21 日，是约翰·科尔里奇（John Coleridge）的第 10 个，也是最后一个儿子。约翰是小学校长，也是那时德文郡（Devonshire）奥特瑞镇（Ottery）圣·玛丽教堂（St. Mary）的教区牧师，一位高等数学家，古典学者和东方语文专家，《拉丁文法评注》（A Critical Latin Grammar）一书的



作者。后来用“S·T·C”3个字母来作为自己标志的儿子，却在这份学术遗产前碰壁了，但是，他几乎在每一段中放上一些拉丁或希腊的语尾而光大了这份遗产。

他后来回忆起3岁到7岁时：

我变得急躁、胆小，并且是一位饶舌者；男同学们不让我一起玩，并且经常折磨我，因此，孩子的嬉耍，我得不到乐趣，但是，不停地阅读……。6岁时，我已读过《贝利萨里乌斯》(Belisarius)、《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和《天方夜谭》(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我受到鬼影纠缠；……我变成一位梦想者，并且对一切体力活动都有一种厌倦感；我急躁、情绪不稳，……懒散……，所有的男孩子都恨我；——因为我能阅读和拼字，并有……记忆和理解，迫使我几乎早熟，每一位老妇人都宠我，同时也对我好奇。因此，我变得十分虚荣，……在我8岁以前，我已经是一个人物了。敏感、有创见、虚荣、懒散，深度感受，和对闯入我所理解的雷池一步的一切人深表轻蔑，便是我那时的特点。<sup>⑬</sup>

他所挚爱着的父亲之死(1779年)是对塞缪尔一次不能平服的打击。两年后，他被送到公共学校(Christ's Hospital)设在伦敦的一所慈善学校(charity school)去深造。食物很差，管理严厉；他后来说那种可耻的处罚，对于被家庭所忽视的小孩加倍严重。他们要他成为一位牧师；他却渴望成为一位皮鞋匠。1830年中(那时，他的记忆已经不可信赖了)，他说出了他所遭受的唯一的一次鞭打：

当我大约13岁时，我到一位皮鞋匠那里，求他收我做学徒。身为一位老实人，他立刻带我到鲍耶(Bowyer，

校长)那里,校长大为震怒,一拳把我打倒在地上,并且……问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十分渴望成为一位皮鞋匠,我痛恨成为一位牧师的想  
法。“何以如此?”他问——“因为,老实说吧,先生,”我回  
答说:“我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就为那点事,没有多少争  
执,鲍耶就打了我。<sup>⑩</sup>

显然地,他已经摘过一些禁果,也许是摘自王街(King Street)的巡回图书馆中的。那间图书馆,他后来以他不朽的文字描述过:

我读遍目录(中的每一本书),包括对开本的和其他的一切书籍,不管我是否了解,……冒着一切危险偷偷地弄到我每月有资格该有的两卷书。想想我在14岁时是个什么情形了;我的热情继续不辍。我的整个人是,对现实事物一概不顾,蹬在一个阳光普照的角落里,读书,读书,读书。<sup>⑪</sup>

当然,这里有些夸张。无论如何,他在他的家庭安排他成为剑桥耶稣学院的公费生(sizar)的公共学校里表现得十分出色(1791年)。他在那里研修高等数学,和最困难的希腊文。“我阅读平达尔(Pindar)的诗集,并且疯狂似地用希腊文作诗。……在休闲的时间,我翻译阿那克里翁(Anacreon)的作品……。我也学习拉小提琴。”<sup>⑫</sup>

科尔里奇毕竟就是科尔里奇,我们一定要斟酌这种夸张。无论如何,他忽略了健康,并且自1793年起一直患着风湿性热。他发现了用鸦片来解除痛苦。这是那时的一种通常的止痛剂,但科尔里奇却养成了习惯。他的学术研究缓慢下来了,他使自己对时事有较多的兴趣。不过,他透支了家里供给他的津贴,以致负债,在债主的催

逼之下,在躲开他们的绝望中,突然离开了剑桥,并于(1793年12月),投效正准备组织起来对抗法兰西的陆军。他的哥哥乔治(George)以40金币使塞缪尔从军队中解脱出来,并劝他重回剑桥。他设法于1794年毕业,但没有得到学位。这几乎困扰了他,就在同时,他已发现了空想。

他因此而丧失了宗教信仰;天堂和空想是希望之井中的补偿的桶子。法国大革命对他的挑激几乎正如对每一位英国的文人和穷青年的挑激如出一辙。1794年春,他在牛津的朋友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说,牛津的几位学生渴望改革不列颠的制度和习惯。艾伦报告说,一名学生非常杰出,已写下诗篇庆贺社会动乱。科尔里奇能否到牛津一趟,与这群学生见个面呢?1794年6月,科尔里奇到了。

## 第四节 骚 塞

(公元1774—1803年)

就这湖滨三人小组而言,罗伯特·骚塞是最糟糕的诗人,却是最好的人。他生于布里斯托尔,是一位呢绒商的儿子;但是,从那种商业环境里,他富有的姑妈伊利莎白·泰勒(Elizabeth Tyler)经常使得他受到巴斯的仕绅社会的熏陶。14岁时,他被送到伦敦有名的威斯敏斯特学校(The Westminster School),在那里,无疑是偷偷摸摸的,他阅读了伏尔泰、卢梭、吉本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并且写了一些叙事诗和反抗性的散文。他在校刊《苦修者》(The Flagellant)上撰文攻讦体罚的文章,触怒了感到被解除武备的校长。罗伯特在毕业前夕被开除了;不过,很幸运,他获准在

1792年12月进入牛津的拜里奥学院(Balliol College)。他在那里继续他的秘密活动——写了一首叙事诗,《圣女贞德》(Joan of Arc),他在诗中颂扬法国大革命。当科尔里奇到达时,他正在写作关于1381年的英国革命家威特·泰勒(Wat Tyler)的一部诗剧。

年长者发现这位较年轻的人在沉思,因为罗伯斯庇尔已经把最活跃的革命领袖——丹顿(Danton)和德穆兰(Desmoulins)——送上了断头台;人权(Rights of Man)会在竞相残杀中结束吗?科尔里奇安慰了他:他解释说,欧洲是颓废的,随着历史而一起衰退了;不过,每一两个礼拜,从骚塞的故乡布里斯托尔,有一艘船驶往辽阔、丰腴和实施共和政体的美洲大陆去。科尔里奇和骚塞何不组织一个身强体健的英国青少年男女团体,使他们结为夫妇,和他们一起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去,在萨斯奎汉纳清澈溪流的可爱两岸上建设一个自治区呢?所需要的全部便是每一男性应捐出125镑作为共同基金。每一对夫妇在这个区中的统治上应有平等的发言权,所以科尔里奇替它取名为万民同权政体(Pantisocracy)。

为筹措他们自己分担的费用,这两位创始人联合起来写了一出诗剧:《罗伯斯庇尔垮台记》(The Fall of Robespierre);脚本发行了,但没有销路。骚塞将《圣女贞德》一稿以50金币的代价买给布里斯托尔的科特尔。两位没有学位的毕业生在布里斯托尔讲学,赚到足够使骚塞实现提议的计划的资金;伊迪丝·弗里克(Edith Fricker)接受了他的婚议,他们结为连理(1795年11月14日)。伊迪丝的姊姊玛丽(Mary)已经接受了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vell)的婚议和万民同权政体的理想。此时,骚塞说,科尔里奇义不容辞和第三位妹妹萨拉(Sara)恋爱和结婚是最所期望的。

当伊利莎白·泰勒因他的卑微婚姻和危险的理想,以丧失了绅士风度为理由而放弃他时,骚塞便接受到里斯本(Lisbon)去访问的邀请,去陪伴在那里的英国使馆作牧师的叔伯。这趟旅行扩大了这位年轻学究的境界;他旅行西班牙和葡萄牙;当他回到英格兰

时(1796年5月),他发现他爱着英格兰,而万民同权政体的理想随着他的青春而一去不复返了。他研修法律,找到了作一名记者的工作,并有时间写出更多不朽的史诗,和一些有名的歌谣,如《布莱尼姆之战》(The Battle of Blenheim)便是。1803年中,怀着160英镑年俸,他在凯西克的格瑞塔厅(Greta Hall)定居下来,几乎不敢相信他就在那里渡尽他的余年。

## 第五节 科尔里奇

(公元1794—1797年)

他是介于神经质与犹豫不决之间的一位复杂人物。他爱上伦敦的玛丽·伊文思(Mary Evans),但是对维持她习惯的生活方式却畏缩不前;她喜欢他蓬勃充沛的神气,但是却对这种神气所能产生的权力缺乏信心,她掉头他去,而他就使自己去屈就容貌平淡而又贫穷的萨拉·弗里克,她能理家和生孩子,却不能刺激诗兴。

为了维持有希望的婚姻和逡巡不去的梦想,他在布里斯托尔发表更多讲演,入场费每人一先令(1795年1月至6月)。这些诉诸群众良心的(Conciones ad Populum)讲演彻头彻尾都是激进的:这些讲演贬斥国教(the Established Church)为富人的婢仆,除了庄园领“主”以外,根本就不知有主。它们谴责与法兰西的战争为一种镇压大革命的意图,并且与历史背道而驰。它们责骂恐怖时代(The Terror,法国大革命中1793年5月至1794年7月之间的时期)为一种对“庇特之战”(Pitt's War)的交响,并且贬抑“言论禁止令”(Gag Bills)为限制公众意志的政府高压手段。这些讲演吸收了少数热情的听众,但是,在这一连串讲演中,科尔里奇却与萨拉·

弗里克结婚了(1795年10月4日)。

同一个秋天,他初次遇到了沃兹沃思。威廉只比塞缪尔长两岁,但是,他却经历过大革命,现身见过这种幻想。他分担着这位年轻人的波旁(Bourbon)皇室复辟的恐惧,但是,他却对宾夕法尼亚提不起兴趣;理念的战场是在欧洲;至于萨斯奎汉纳的美丽希望,何不以英国景色宜人的湖滨来满足呢?科尔里奇只是半信半疑,不过,他却留心地注视着威廉,就这一点的举动,也许还从他那里学到如何去驾驭生命的激流。

他从书本和他所碰到的人处摘取的智慧做了许多笔记。他热切地博览群书,大约有关人类、动物、植物、科学、宗教、哲学、国家、文学、艺术等十几种领域。他具有为我们所知道的最饥渴、最有吸引力和最有记性的心智。他的记忆力是终他一生他吸取幻想、理念、片语、论点甚至是章节的贮藏所。他经常疏于提及,或有意忘却他资料的来源,并且经常心不在焉地将自己的要点与借用的事物混淆不清。最后,他的记忆负担,和难以清理的资料,对一个心智来说负担过重,以致混淆不清。这个记忆宝库几乎就在重重负担下崩溃了。

也许是要纾解他的记忆力之故吧,或者要养活太太,他想到编印和发行一本几乎全由他自己执笔的杂志的念头。他抓住他认识的每一个人,征召他的每一位听众,当做可能的订阅者,并到处散发的“创立说明书:人人都应知道真理,真理能使我们自由。1796年2月5日,星期五那天将出版每隔8日出版一本杂文的第一集(定价4辨士),名称为《守夜人》(The Watchman),由S·T·科尔里奇主笔,《对民众讲演》(Addresses to the People)一书的作者。”<sup>⑥</sup>在文集中,正如在讲演中一般;他讲演时如一位破斧沉舟的激进派人士,反对战争、奴隶制度、报禁,并特别反对残酷地转嫁给一般人的货物税。<sup>⑦</sup>但是他却不建议不论男女的成年人普选制度。“我应当在那些具有对理性容易动摇的心智的人士中大胆高谈政治的真

理；而决不对那些无知、贫穷，必须要在灼热的感情冲激下行动的大众。”<sup>69</sup>——科尔里奇发现用自己的笔每隔8天填满32页篇幅是很吃力的；渐渐地，需要仰仗并不经常所熟知的外来稿件了。一些仔细的读者就开始抗议。销路下跌，债台高筑。10期后，《守夜人》停刊了。

1796年9月1日那天，科尔里奇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他替小孩取名戴维·哈特利(David Hartley)，取用英国联想心理学的主角的名字。这是一张天真无邪的面孔，却是另一张需要喂饱的嘴巴。同时，他自己感到心脏和肺部有毛病，越来越依靠鸦片来纾解痛楚。当一位友善的自由主义者托马斯·普尔(Thomas Poole)，每年以7英镑的象征性租金，租给他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附近，靠近他在下斯托伊(Nether Stowey)自己家附近的一栋小屋时，他已濒临枯竭的边缘了。1796年12月31日，科尔里奇，萨拉和戴维搬了进去。萨拉把这栋小屋整理得舒适而且干净。“S·T·C”在紧邻的一个花园中工作，帮助照顾普尔的家禽和猪只，写些易记却不易卖钱的诗篇。

大约在这个时候，依然总是那末蓬勃，澎湃的记忆力，《库布拉坎》(Kubla Khan)一书的腹稿已蕴思成功了，并且大部份时间沉浸在奇异的梦幻中写作：

1797年夏天，作者当时健康欠佳，隐居在一栋介于波洛克(Porlock)和林顿(Linton)两地间的孤立农舍中……。一次微恙的结果，服了一帖镇定剂，由于药物作用的影响，他正在阅读……《珀切斯的朝圣》(Purchas's Pilgrimage)时就在椅子上睡着了：“库布拉坎正在此地指挥建造一座宫殿，和通到那里的一座富丽堂皇的花园。因此十里辽阔的肥沃土地围在一栋围墙里边了。”作者大约足足熟睡了3小时，至少对外在的感觉来说应当是如此，在

那个时间中,他有最动人的信心,他至少写了 200 到 300 行,……并无任何努力的意识和感觉。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对全部情形历历在目般清晰,就拿起笔、墨水和纸张,立即热烈地把当时记得的全部情形写了下来。

这篇著名的序被解释为一则寓言,科尔里奇用它来自欺,或欺骗别人去接受这个《库布拉坎》的纯真观念和简明的延续。不过,一位作者,每当于白天铸造了一些片语后,就会在梦中继续铸造下去并不是一件稀奇事;但是,这些佳句几乎经常当睡眠者醒来时就沉入潜意识中去了。也许,在科尔里奇的情形,鸦片不仅诱致作梦,同时也诱致幻想,而这段文章就是作梦的部份产物,无论如何,科尔里奇以他特殊的韵律技巧和押头韵,将珀切斯的散文转变成英语中最有吸引力的未完成作品之一。

在 1797 年中,在科尔里奇来说,也许比《库布拉坎》更重要的一件事,便是一封到雷斯塘(Racedown)去访问沃兹沃思兄妹的请柬。他辞别了萨拉和戴维,几乎步行完相隔两地的几里路程。他在 6 月 6 日那天遥见到目的地,激动地跑过原野奔往诗人哥哥的大门。当威廉和多萝西打开门和他们的心扉时,在这 3 人中的一个新里程又展开了,并且也是文学史上最有一次合作。

## 第六节 三人组合

(公元 1797—1798 年)

阿尔雷基当时的文采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尽管怀着暗痛和毒素,对于心智的活泼与趣反应敏捷。他的俊脸——善感



的嘴吧,挺秀的鼻子,一只灰色的眼睛散发着热情和好奇,蓬松的黑发卷曲在脖子和两耳上——使得他非常具有吸引力,特别对多萝西是如此。没有多久就使她以她羞答答的方式经常在威廉不知不觉间与他坠入爱河了。科尔里奇被她的娇小惊愕住了,然而,却也被她的默默同情心吸引到她的身边;这是一位愿意承受他一切错误的朋友,并且也愿意忽略他的懒散而去洞悉他的热烈感受、奇怪难解的幻想、动摇和迷惘的信心的朋友;一位诗人的可怕忧郁遗失在工厂和战争之中了。不过,就目前而言,他几乎看不到这位完全笼罩在她哥哥影响下的女孩子的怯生生的幽灵。

在此地,从这位态度沉着,面孔凝重,高额和沉思的双眼的人身上,他发现了真实和生动的诗人气质,对每一件事物和每一个灵魂的震动都有感受,避开经济上的大变动,默默地替他的远见和梦想发掘激情的字句当作他的毕生事业。那时——正在蕴思《古水手的艰辛》(The Ancient Mariner)一诗——的科尔里奇是两人中比较有名气的诗人,体会出这人的献身精神,羡慕他使自己完全献给诗的那份自由,因而奇怪一位妹妹是否不如一位太太那般体贴。“在他的身边,我感觉出自己的渺小,”于他来到后不久,他这么写着:“不过,我并不认为自己比我以前所想像的要差劲。威廉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唯一在任何时间中,和在所有优越的风格中,我感到自己不如的一个人。”<sup>⑩</sup>

就这样开始了互相激励的3个星期。各人把自己的诗朗诵给对方听。沃兹沃思朗诵得较多,科尔里奇讲了不少。“他的谈话,”多萝西写着:“充满了灵智和精神。然而,他是如此仁厚,如此温驯和愉快。他的眼睛……传播出他生动心智的每一种感情。”<sup>⑪</sup>

寻常,这样一种三位一体式的爱情3个礼拜后会冷却下来,但是,科尔里奇,不愿让它就此终止,恳求威廉和多萝西陪他回到下斯托伊,好让他对他们的殷勤招待给予一些回报。他们和他一起去了,期望能立刻回到雷斯塘;但是,朋友普尔,知道他们的租期不久

将届满,不可能继续下去,就替他们在距科尔里奇 4 里路程的阿福克斯顿(Alfoxden)找到一栋年租 23 镑,供应一切设备的漂亮村舍;威廉和多萝西在随后的 15 个月中,在那里过着舒适而有灵感的一段生活。

在那段愉快的日子中,在诗般境界间有过不计其数的漫步:有时是两个男人,有时是科尔里奇和多萝西,有时是 3 个人。有 3 种感受、观察和观念的交换;沃兹沃思鼓励科尔里奇让幻想作他的指引;科尔里奇则扩大沃兹沃思与哲学家们的结识,并挑激他写作一首史诗。几年后,在《序言》一诗中,沃兹沃思提到他的浪流的朋友时以“当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在普西(Poesy)的狂野中胡闹时,那是我们每日愉快精神之一部份”来形容。<sup>④</sup>多萝西是他们的纽带和催化剂;她用她赞叹和热烈的倾听去激发他们,以她的敏锐和浮沉的悟性去挑逗他们,并且如他们的精神上的新新娘般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科尔里奇说,他们是具有一个灵魂的 3 个躯体。<sup>⑤</sup>

沃兹沃思和科尔里奇两人该仔细去看一看多萝西于 1798 年 1 月 20 日在阿福克斯顿开始写的日志。他们一定会受到日志第 2 页上的一行字:“那震荡在夏日空气中,倾听无声却有声的甲虫的嗡嗡声”而该有所感动吧。但是,萨拉·科尔里奇的感触可从 2 月 3 日到 12 日的日记中窥见其端倪:

2 月 3 日:与科尔里奇在丘陵间散步……。

2 月 4 日:与科尔里奇走了一大半通向斯托威的路  
……。

2 月 5 日:与科尔里奇走到斯托威。

2 月 11 日:与科尔里奇在斯托威附近散步……。

2 月 12 日:独自走到斯托威。与科尔里奇在傍晚时  
一起回来。<sup>⑥</sup>

萨拉对这一段有变动可能性的罗曼史并不愉快；它好像是天真无邪的，但是，何处是终点呢？

## 第七节 抒情民谣

(公元 1798 年)

1798 年 1 月中，另一个刺激来到科尔里奇的身边：乔塞亚和托马斯·韦奇伍德(Josiah and Thomas Wedgwood)——是制陶业享誉欧洲的乔塞亚·韦奇伍德(1730—1795 年)的儿子和继承人——供给这位身无分文的诗人年俸 150 英镑(约美金 3750 元)，条件为让他专心在诗和哲学上。科尔里奇在 1 月 17 日的信中表示欢迎这笔赠赐，并且在创作的狂喜中，立刻着手完成了《古水手的艰辛》。

有了这份意想不到的收获，他向沃兹沃思提议，他们应将新写的诗集成册，定会让他们赚到足够使他们到德国去游历的资金。他希望在德国待一年，使他学到足够的语言和文化，而能让他阅读和了解自康德到歌德的德国在欧洲哲学方面，无疑已取得领导之地位，而在文学方面至少可与英法匹敌的那些名著的原文。沃兹沃思对德国并不热心，但是法国和北意大利正控制在大革命之下。他接受了科尔里奇的计划。

1798 年 4 月中，他们邀请布里斯托尔的出版商科特尔前来聆听他们的新作。他来了，听过后，以 30 镑代价要求这份版权。他也希望一并印上两位作者的名字，但是，科尔里奇拒绝了。“沃兹沃思的名字，”他对科特尔说：“倒没什么，而我的则臭气冲天。”<sup>②</sup>

18 年后，科尔里奇解释了这次合作的背后理论：

我的努力应是对人物和超自然的人格,或至少是罗曼蒂克的;沃兹沃思先生,从另一方面着手,则要求自己每天事物的奇疑,和对超自然激起相同的感受,藉以唤起对懒散习惯的注意力,和指导它向在我们面前的可爱和奇妙处进行作为他的目标……是同意了。用这种观点,我写出了《古水手的艰辛》一诗,并且除了其他作品外,准备写《黑少年》(The Dark Ladie)和 Christabel 两诗,在这两首诗中,我就更接近实现我的理想了。<sup>④</sup>

也许这种理论是于诗已写成后才形成的。第一版序文上沃兹沃思是这么解释的:

本集中的大部份作品可视为是一些尝试。它们主要是用一种要证明中、下阶层中的语言究竟能适应到诗意的目的到何种程度的观点来写的。读者们习惯于许多近代作者们的俗丽和空洞的词藻,如果他们读完这本书的话,也许就经常要与奇怪和呆滞的感受挣扎了;他们就要去查阅诗韵,同时会引起他们要问,以什么标准,这些尝试竟使用了那种名称。这些读者们……不应斫伤诗韵这个孤僻的字,一个含意值得争论的字,以抗拒他的感激正是所期望的……。

具有优越判断力的读者们,也许不欣赏这些作品所形成的形成……。因此就不得不向他们表明,希望避免目前所盛行的错误,作者有时降低了身份;有许多表达太熟稔和不够高尚。读者与老作家们的接触越多,……他们对这种形式的诗的抱怨就越少是可以理解的。<sup>⑤</sup>

俗事干涉了他们的诗：阿福克斯顿房子的主人通知沃兹沃思兄妹，他们的租期到1798年6月30日到期，不能再续约。6月25日那天，威廉和多萝西前往布里斯托尔去与科特尔磋商。7月10日，他们乘渡船过了塞文河（the River Severn），步行10里到达威尔士的丁德修道院（Tintern Abbey）。靠近这片“十分幽美的废墟”，在回到布里斯托尔的路上，沃兹沃思构思了作为《抒情民谣集》（Lyrical Ballads）结尾的这首诗的初稿。

这本小册子于1798年10月4日出版，19天后，两位不署名的作者已前往德国。书名很妥贴：科尔里奇的主要贡献是古代英国名谣的演变——以歌谣来述说故事；沃兹沃思的大部份作品是以英国农夫们单音节的语言表达纯朴生活的简单抒情诗。这本书以《古水手的艰辛》一诗作开始；这首诗占了117页篇幅中的17页；这是最长的一首诗，也许也是最好的一首诗；不过，英格兰只是慢慢地才认识到这一点，而沃兹沃思却从未作如此想过。

《艰辛》一诗的确有许多错误，但是，在这些错误中，我们不必强调这则故事的荒谬；科尔里奇已走进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神秘和想像的境界，和庄严的事情也许从细微的事故中源源不断地渗出来。他必须依靠想像，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海上，<sup>②</sup>同时他必须从游记书籍上借用海洋术语和意态。不过，他却抓住了古代传统的神秘神韵，古代民谣的活泼韵律；和古代水手将我们和他几乎一同带到这首诗的终结。当然，这是英语中最伟大的抒情诗之一。

沃兹沃思的贡献是他从朴素的人物发现智慧的典型例子。其中某些诗如《白痴男孩》（The Idiot Boy）和《西蒙·李》（Simon Lee）受到批评家们嘲讽；但是，我们岂能不给一位母亲对她智力薄弱的孩子之悉心爱护一点同情么？（那首悟性诗中的一行说出“青青草——你几乎听到它在成长的讯息”<sup>③</sup>，岂不就是得自多萝西的吗？）然而，于徘徊在他的乡村风格上一阵子后，沃兹沃思以沉思性的“丁德修道院上几里处偶成的几行”作为该书的结论。他在这首

诗中,对于他对自然和上帝(斯宾诺莎〔Spinoza〕的《神或自然》(Deus sive Natura)为同一的感受,给予了崇高的表达,不仅透过成长的神奇,同时也透过那些可怕的,和(对人类的近视)似乎就是特纳(Turner)当时正在绘画中膜拜的毁灭性力量。对于他在森林和原野中的漫游,在宁静的湖滨的徜徉,和在大石块上的隼刻,对来自上千的生命形式,甚至想像中的无生气世界的呐喊和私语——

对他们,我也许归功于……那份愉快的神态,  
其中的神秘负担,  
这个不智的世界中,  
一切沉重的担子,  
减轻了……  
当以一只和谐,深喜的  
眼睛凝视时,  
我们洞悉到事物之生命。<sup>29</sup>

接着,他提升到 he 最优美的信仰之表白上去:

我们学到  
注视自然,不仅在思虑未周的  
青年时期,但听  
宁谧、忧伤的人性乐章,  
既不刺耳,更不嘎嘎,虽然宏壮的声音  
洗炼而低沉。我感到  
戛然升胜的喜悦  
侵扰我之存在:一种幽远胧昧之  
庄严意识,  
它深居在落日的余晖,

浩瀚的大洋，清新的空气，  
 蓝天、和人类的心智中；  
 一种波动和一种精神，迫使  
 每一种有思想之事物，思想之标的，  
 且也透过每一种事物。因此，我依旧  
 是芳草，森林和高山之爱好者；  
 并且……认识在自然和意识的语言中，  
 我心灵的守护者的指引，和我道德形象之灵魂。<sup>⑩</sup>

多萝西也到达了这种具有医治、统一作用的信念，并且发现它并不与她的基督教信仰矛盾。在赞美诗的结尾，沃兹沃思增加了一首赞美诗，作为对他妹妹的心灵之颂赞，并且要求她维持到最后：

我们愉快的信仰，我们注视的一切  
 充满着祝福。因此，且让月光  
 在你独自散步时披在你的身上；  
 且让含湿的山风轻狂地  
 抚弄你吧；……而几年后，  
 当原野的狂喜熟透，而变成  
 清醒的喜悦时，当你的心  
 能成为包容一切可爱事物的殿堂时，  
 你的记忆便成为一切甜蜜声音和  
 和谐的停留所……。<sup>⑪</sup>

《抒情民谣集》没有受到广大的欢迎。“它们没有普受喜爱，”科尔里奇夫人——一位对她丈夫的缪司神有值得原谅的妒意的妻子报告。书评家们忙于揭露《古水手》一诗松散的起承转合处，和沃兹沃思的自然神祇的疏远感情，没有一人似乎认识到《古水手》一诗

将为一切文集中要收录的一篇文章,不过,有些人注意到了《丁德修道院》(Tintern Abbey)一诗的虔敬泛神论。这本小书两年中卖了500册,科尔里奇将这些出卖归功于一位从《艰辛》一诗而认为一本海洋歌集的水手。沃兹沃思则将滞销归责于收容《古水手》一诗之故。

1799年中,当科尔里奇在德国时,沃兹沃思准备出《民谣集》的第2版。6月24日,他写信给科特尔:“从我所收集的资料上看,《古水手》一诗好像是全卷的一个瑕疵。(这也许是真的。)……如果这一卷要印第2版时,我愿在这首诗的篇幅上换上较适合大众口味的一些小诗。”<sup>⑧</sup>《水手》一诗在第2版时仍然留下来了,却附加了由沃兹沃思写的一个承认其缺点,却也指出其优点的(松懈?)的注解。

这一版(1801年1月)增加了由沃兹沃思写的一首新的诗Michael——以无韵诗的形式,悠闲地述说一位84岁的牧羊人,忠于工作,坚守道德,爱护他的村庄,和他的儿子,儿子迁入城市,却变成了一位放荡不羁的堕落者的故事。由沃兹沃思写的一篇新序详细地宣布目前已成了名句的他对诗的理论:任何标的物或观念,如果产生感受并赋有意义,就能产生诗;任何形式或语言,如能传播这种感受和意义,都可能成为诗。“诗是强烈感受的不断发泄;其最初起源来自在宁静中蕴蓄的情绪”;<sup>⑨</sup>艺术家自己在他将感情赋予形式之前,就需要控制他的感情。不过,这种感情不限于有文学修养的人或少数才智之士;它们可能也出现在不文的农夫和学者或上流社会人士身上;也许在比较朴素的人物的纯洁和清澈的思虑中。这种表达也不需要一种特殊的诗的字汇或风格;最好的风格是最简朴的,最美的字也是用夸张或修饰最少的字。较理想的,诗人应用一般人的语言来表达;不过,纵是深奥的字,如果能传达感受和道德力,就可说是诗的。

因为,最后,在每一种艺术中所陈示的是道德的要素。如果艺



术不是在寻求较能接受的一种清澄的、健康的或崇高的思想,那么我们自己的声音或形式之技巧又有什么用呢?“对某一种程度来说,一位大诗人应该去改正人类的感受,……使得这种感受更要稳健、纯洁和恒久,一言以蔽之,对自然更能共鸣——即要恒化自然和事物的伟大精神。他应当偶而在人前和他们的四周摸索追寻。”<sup>⑥</sup>理想的诗人、画家或雕刻家,是一位在艺术中赋以智慧的哲学家,透过形式来表达意义。

这篇序言在历史上扮演着一种任务,因为它有助于去终止幻想的语言,阶级偏见,对古典的参考,和时常散见于英国奥古斯都(Augustan)时代的诗和演讲中的神话装饰。它宣布了感受的权利,和在大多数非罗曼蒂克的形式中给予了对罗曼史的另一款欢迎。沃兹沃思本人在思想和规则上便具有古典的模式和神韵;当科尔里奇带来感情和想像时,他却提供了回忆的宁静面。这是一次优异的合作。

## 第八节 流浪的学人

(公元 1798—1799 年)

来不及看到他的书的出版;当乔塞亚·韦奇伍德又赠给科尔里奇一笔额外的赠赐,以及沃兹沃思的哥哥理查德给了他一笔津贴后,两位诗人和多萝西于 1798 年 9 月 15 日,从雅茅斯(Yarmouth)向汉堡(Hamburg)扬帆了,他们在那里访问过老诗人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后,就彼此分手了,科尔里奇到格丁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去研究,沃兹沃思和多萝西乘了一辆马车到哈茨山(Hartz Mountains)山麓的戈斯拉尔(Goslar)的

“自由帝国城”(the “Free Imperial City”)去。在那里,因寒冷的气候以致改变了原先的计划,沃兹沃思兄妹就待了4月之久。他们在街道上漫步,烧壁炉,写诗或抄诗。使自己沉浸在回忆中的沃兹沃思开始写作《序言》的第1卷,他的自传体叙事诗。接着,突然间发现他们如何思念着英格兰时,他们就于1799年寒冷的2月23日那天,徒步走到格丁根(Göttingen)向科尔里奇辞行,接着就渡过波浪汹涌的北海(North Sea)匆匆赶回雅茅斯,并回到蒂斯河(Tees)上的苏克邦(Sockburn),玛丽·哈奇森静静地守候在那里等着威廉和她结婚。

同时,在格丁根的科尔里奇尽一切本事要变成一位德国人。他学会了德语,并且对德国哲学产生浓厚兴趣。发现对唯物主义的心理学没有心智解释时,他放弃了哈特利的机械观念联想论,而采用康德的唯心论和主张自然和心智为上帝的两种面相的谢林(Schelling)之神学。他听或读了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论《莎士比亚》的演讲,作了许多笔记作为他自己后来讲演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时的资料。陶醉在观念和抽象之中,他失去了他原有的感受和想像的第六感,并且弃诗而去研究哲学。“我身上的诗人气质死亡了,”他写着:“我已经忘记如何去弄诗韵。”<sup>⑥</sup>他变成将德国哲学移到英格兰去的传人。

1799年7月中,他离开德国,回到下斯托伊。但是,离开太太1年竟不惯于负起一家之主的 responsability了;萨拉·科尔里奇不再是一个充满罗曼史的人了,因最近死去的第二个孩子,使夫妻两人的感情也暗淡下来。10月中,由于不能安静下来,他就到北方去看住在苏克邦的沃兹沃思。那次访问时,他握着玛丽的妹妹,萨拉·哈奇森(Sara Hutchinson)的手良久不放;某种神秘的感觉从这位女人身上传入男人的身上,科尔里奇就纵身跳入了他第三度不愉快的爱河中去。这位了解他对男人的责任的萨拉给了他感情,不过仅此而已。经过两年来并无收获的追求后,他自认失败,写下一首感人的

颂诗：《颓丧》(Dejection)，几乎是他诗才的最后一滴灵光的显现。

他伴同沃兹沃思徒步游历迪斯垂克湖，各人在找寻一个住处。在凯西克，他认为已找到了一处，但是，《晨报》提供的一份差事却使他去了伦敦。同时，沃兹沃思租了格拉斯米尔南方13里处的一栋村舍。他就回到苏克邦，征得多萝西对搬家的同意，于1799年12月17日那天，兄妹两人又开始了他们的长途跋涉，大部份是步行，从苏克邦去到格拉斯米尔，走了许多英里冰封和不平的路。12月21日那天，他们在沃兹沃思叫做“镇居”(Town's End)和后来被称为鸽居(Dove Cottage)的地方筑起了炉床。他们在那里渡过了一生中最艰辛和最愉快的几年。

## 第九节 格拉斯米尔的田园生活

(公元1800—1803年)

自1800年5月14日到1803年1月16日，多萝西保存了她的格拉斯米尔日志(Grasmere Journal)。从那150页的日志上，我们可看到和感受到先是兄妹两人，后来，一段短暂的时间，是兄、妹、和太太3人的每日生活情形，格拉斯米尔的气候不适于健康：几乎每天不是下雨就是飘雪，而冬天的寒冷——甚至加上雪——在6、7月份还会出现。<sup>⑧</sup>阳光普照的日子是令人狂喜的，偶尔露面的月亮是形状古怪的。小屋则在壁炉和火炉中加木炭来取暖，但是，多萝西记着：有时“我却因寒冷而无法入眠。”他们冷静地对付这种气候，感激春天和寻常的霏霏细雨；“雨丝十分轻盈、柔美”的句子不断地出现在日志中。“格拉斯米尔有时看起来竟如此幽美，我的心几乎都溶化掉了。”<sup>⑨</sup>

独自或有伴，他们作了无数次散步，有时到 1 英里外的安布尔塞德(Ambleside)去寄信；而自科尔里奇定居在凯西克后，有时是半天的游程到那里去。沃兹沃思似乎对他的妹妹——新娘很满意，称她：

我寂寞地散步时的亲密伴侣  
我的希望。我的快乐，我的妹妹，我的朋友  
纵然理性能知较亲密的思想  
有东西仍然要更为甜蜜一点，或者，  
在爱的心中，一个更为亲密的名字。

晚至 1802 年(他结婚的这一年)，他称她为“我的爱。”<sup>⑨</sup>她以称呼他为“甜哥哥”而满足。<sup>⑩</sup>

她此时有 40 镑的收入，他则有 70 镑；(加上他从出版物上的点滴收入)，这一笔相当于 140 镑(约等于美金 3500 元?)的金钱，是他们的每年收入。他们有一两名仆人，因为贫穷很普遍，许多失去配偶的妇女都愿意以工作来换取食宿。诗人和他的妹妹穿着朴素；多萝西通常穿着她自己做的衣裳，甚至鞋子也是自制的；<sup>⑪</sup>威廉穿着农夫的服装，或由朋友送给他的破衣服。<sup>⑫</sup>但他们培植了一个蔬菜园，有时到湖里去捉鱼。尤有甚者，日志上记载着：“我做果子馅饼和派，”<sup>⑬</sup>“面包和派，”<sup>⑭</sup>“派和饼。”<sup>⑮</sup>威廉真是口福不浅。

但他也工作。每天总有部份时间他用来作诗，通常都是在他独自一人散步时，回来时他就一行行口述给多萝西听。他也劈柴；在菜园中挖掘和种植；“威廉清理出一条需要的小径，”<sup>⑯</sup>——此即穿过雪地通到门外厕所的。此外，多萝西还酿造麦酒，<sup>⑰</sup>和“我们借了一些空瓶子来装甜酒。”<sup>⑱</sup>尽管有着这许多蔬菜，威廉患着痔疾，<sup>⑲</sup>并且(自 1805 年起)视力衰退，还患着失眠症；有无数个晚上，多萝西必须用读诗来帮助他入睡。<sup>⑳</sup>

那段狄奥克里塔式的日子(Theocritus),因突然间到来的金钱和婚姻而扰乱了。1802年5月24日那天,朗斯代尔(Lonsdale)的伯爵詹姆士·劳瑟爵士过世了,将他的财产和爵位留给他的侄子威廉·劳瑟爵士(Sir William Lowther),他则安排了偿还由詹姆士爵士所欠的金钱给老约翰·沃兹沃思的各继承人。很明显的,4000英镑财产就在几个孩子中平分了。虽然威廉和多萝西的应得分直到1803年才给付,威廉感到他的合理的期望保证了他们,最后他就向玛丽·哈奇森提出了婚议。

但是对安纳泰·瓦隆的记忆在他的良心上发炎。在他要求玛丽嫁给他之前,他不应该与安纳泰弄清楚关系吗?1802年7月9日那天,他与多萝西乘马车离开格拉斯米尔,再步行到玛丽目前在伽珞山(Gallow Hill)的家。7月26日那天,他们搭马车离开伽珞山前往伦敦。从韦斯敏斯特桥(Westminster Bridge)上,在晨光微曦中,看到这座瑰丽的城市而惊得目瞪口呆的沃兹沃思,作了一首令人回味的14行诗——《地球不能再表达更壮丽的景色了》(Earth has not anything to show more fair)。<sup>⑧</sup>他们继续前往多佛(Dover),搭乘邮船渡过英伦海峡,于7月31日那天,发现安纳泰和她9岁的女免卡罗琳在加来等候他们。

我们不知道他们获得什么协议;我们只知道,14年后卡罗琳出嫁时,当时正在得意的沃兹沃思给了她30英镑(约美金750元)的年金。4个人在加来停留了4周,十分和谐地一起在海边散步。沃兹沃思作了另一首优美的14行诗“这是一个美丽的黄昏,安宁而自由,圣洁的时光安详得如一位修女身上的装饰、文风不动”——结尾是对卡罗琳的祝祷。8月29日,沃兹沃思前往多佛,然后伦敦。显然他不急着要赶路,因为直到9月24日;兄妹俩人才回到伽珞山。

1802年10月4日,威廉和玛丽结成连理。没有嫁妆赠送给这位新娘子,因为她的亲戚们并不赞成玛丽嫁给“一位流浪汉”。<sup>⑨</sup>才

于近来在日志中写到威廉时用“我的心上人”来称呼的多萝西，不敢信任自己能参加这次婚礼。“她的感受几乎到达了难以抑制的程度。”<sup>⑧</sup>她冲上楼梯，“木然地”躺在那里，直到萨拉·哈奇森招呼她说：“他们”从教堂“回来”了时为止。“这，”她在那天午后的日志上写着，“迫使我从床上爬起来，我不知怎的，我走得……出乎我意料的迅速，直到我遇到我心上的威廉，倒入他怀里时为止。他和约翰·哈钦森引导我走进屋子，我依偎在那里欢迎我亲爱的玛丽。”

同一天，乘着二辆轻便马车。诗人，他的太太和妹妹开始了到格拉斯米尔的长途旅程。多萝西渐渐地使自己去适应这个3人的家庭，并且不久把玛丽当做一位姊姊和心腹朋友般爱着她。此外，玛丽也将自己每年20镑的收入带给这个家庭使用。当劳瑟的付款最后到来时，使得这个家庭过着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威廉变成一位热情的爱国者，加入格拉斯米尔的志愿队，从事防卫英格兰以抵抗拿破仑的任务。

格拉斯米尔的田园诗，是沃兹沃思最纯洁的抒情中的一部分（如《致蝴蝶》〔To a Butterfly〕一诗便是）；《致密尔顿》的雄劲十四行诗，颂诗《决断和独立》（Resolution and Independence），责备自己的忧郁寡欢；和（1803年和1806年间）他所有作品中最有名的——得自《童年回忆的不朽之暗示》（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 Early Childhood）。很少有一种哲学式的狂想有如此优美的表达的。

关于他模糊的视力，则记载在一则晦涩的笔记上：“不管我转向何处，在晚上或白天，我曾经见过的事物，我目前已不复看清楚。”我以此作为日渐消失我们青年时期理想境界的一种标志——“荣耀和梦想，此时在何方？”——他奇怪，我们在出生时来自天国的那些无凭无据的奇迹般记忆岂不照亮我们的童年，却随着我们的长大而消失了么：

我们的出生如梦；  
与我们一起诞生的灵魂，我们的生命之星  
飘忽无定，  
来自远方；  
绝非完全如遗  
亦非完全裸露，曳着荣耀的云簇，我们  
来自上帝，他是我们的家  
在我们幼年，天空不是高卧在我们头上么！  
蜗居的阴影开始紧裹茁壮的孩子，  
但我们注视到光，每当光泻下来时，  
我欢欣雀跃起来，……  
毕竟，成人悟到光的消逝，  
消失在平常一天的光亮中。  
因此，诗人喜呼孩子为  
你，卓越的哲人，谨慎守住  
你遗产……你，  
你的不朽沉思犹如白天……

但是，纵使是我们成年人，对那失去的地平线都有一些朦胧的意  
识——

人的无端疑惧  
无声息地在宇宙间游移……  
我们的灵魂有那不朽之海的状貌  
它带我们到此处，  
亦能在瞬息间带向彼方，  
看到孩子们在海岸上嬉耍，  
听澎湃的海水一阵紧一阵的冲激声。

这是神性化的人类学：孩子，依旧是一种动物，雀跃在其动物的动作、四肢和自由自在之中；反抗任何束缚、禁止和限制；内心上渴望如动物般的自在，和在田野、森林、海洋或天空中活动；渐渐地，当孩子长大成人，青年屈服于文明时，就惆怅那些已失去的自由了。不过，沃兹沃思却没有一点这种现象；他追忆毕达哥拉斯，冀望从他身上找到一些回到他童年信仰上去的桥梁。年事渐增的人寻找他感受的事物当作他的生命。

## 第十节 爱情、劳动、鸦片

(公元 1800—1810 年)

1800年4月，完成了《晨报》指定的任务，科尔里奇来到格拉斯米尔与沃兹沃思一家人盘桓了3周。多萝西告诉他，她替他和他的家在距凯西克3英里之遥，叫做格瑞塔厅(Greta Hall)的一栋大房子中找到一个舒适的安息所。科尔里奇在炎热的夏天去看了这个地方，发现一间房子，是一个藏书500卷的图书室，其中许多是他所喜欢的书籍，就热心地签妥了租约。1800年8月中，他带着太太萨拉和儿子哈特利从下斯托伊到达他们的新居。9月14日那天，萨拉在那里生了另一名男婴，他们利用附近湖泊和溪流的名字，替他取名德温特(Derwent)。不久，冬天宣泄了他们的错误：寒冷和阴雨加重了科尔里奇气喘和风湿热的倾向，和她的亲戚们的地理上阻隔加深了他太太的忧郁症，况且丈夫神驰的身心时常使她孑然一人独处呢。

他经常留下她而独自跋涉从凯西克到格拉斯米尔的33英里



路去享受与沃兹沃思聊天的刺激,和多萝西深情的关注;而沃兹沃思和多萝西步行到北边去充实科尔里奇的生活却是十分稀少的。1800年11月中,萨拉·哈奇森从伽路山来到鸽居,与玛丽、威廉和多萝西徘徊数月;科尔里奇就在那里重续对她的追求。以不假思索的残酷愚昧语气,他对太太招认他对另一位萨拉的爱情,求她准许他同时爱她们俩人。日复一日,她渐渐地用心在对孩子的照顾上,而他则沉醉在思考和书本上。

他设法完成民谣故事 Christabel,这则民谣他已在1797?年中就开始写作;但是,他提不起写作的狂热,就把它搁置下来。司各脱和拜伦对该民谣的草稿早已赞不绝口,也许还从它的主题,格律和语态中摄取了一些暗示;最后(1816年),在拜伦的敦促下,默里即行出版了这则民谣。这是一位风姿绰约的佳丽令人难忘的遗物。

在格瑞塔厅住了一年,健康和基金都已枯竭的科尔里奇感到他不能再在湖沼地区熬过另一个冬天。他很高兴接到加入《晨报》当一位社论撰写者的邀请。1801年10月6日,他到格拉斯米尔去辞行;9日那天,多萝西和玛丽送他回格瑞塔厅;10日,他即赴伦敦。而玛丽和多萝西则走回格拉斯米尔。多萝西在她的日志中写着:“C·因远行而过了愉快的一天……我却忧郁满怀,不能谈天,不过,最后我由低泣来纾解心怀——威廉说,闷声不响的哭泣。并不如此。噢!有多少,多少理由,我要对他如此渴念啊!”

到达伦敦,科尔里奇努力写“领袖们”这个专栏,在这个专栏中,他日渐趋向强烈的保守观念,与半自由的民权党的主要机关报之《晨报》的政策——反对部长制,倾向财产制相得益彰。他谴责奴隶制和“腐烂的区”组织(区循例送保王党员入国会),抨击政府拒绝拿破仑的和平建议(1800年),以一位政治家和一名凡夫的尺度无情地解析首相几乎毁掉了庇特。不过,他辩护私有财产是井然有序的社会以外之进步的必要基础,并辩称使“各人的权力与他的财产成正比”的那种政府为最好的政府。<sup>⑨</sup>他勤奋、努力地写着;在他

待在《晨报》的那段时间，报纸的发行量急速上升。<sup>⑧</sup>但是，那年的勤奋工作，致使他的健康崩溃。当他回到格瑞塔厅时（1802年），他身心两方面都已疲惫不堪——身体有病，丈夫视同路人，情人弃他而去，意志已成为鸦片的奴隶。

他早在1791年就已吸食鸦片，时年19岁。<sup>⑨</sup>他用它来镇静紧张，缓和痛楚，导致睡眠，阻滞——或隐藏——心脏和肺部的衰退，也许是要使自己向失败认命吧。当睡虫终于到来时，却带来了一连串恐怖的梦，他在《睡眠苦》（*The Pains of Sleep*；1803年）一诗中曾暗示过此事：

一簇簇

恐怖的幽灵折磨着我；

……欲望和憎恶奇怪地混合着，

在原野上，可恨的物体兀然屹立；

狂怒的情绪，疯狂的嘶号！

毕竟可耻，恐怖啊！<sup>⑩</sup>

他的笔记本上记着一个想像中的月球上民族，“事实上，除了他们用屁股来吃食物，和肛门长在嘴里外，其他一切都与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完全相同；……他们几乎不能接吻。”<sup>⑪</sup>跟我们大部份人一样，他做可怕的梦，但是，在他的情形，都十分生动，有时他在梦中的嘶喊吵醒全家人。<sup>⑫</sup>

也许是因为他的虚弱和药物吧，虽然有时混淆着他的思想和耗弱的意志，在他的面前打开了接近于正常心智的领悟和想像的领域和远景。无论如何，他的知识范围在同时代中无出其右者，关于这一点，沃兹沃思也远落在后边。他使自己在沃兹沃思前很卑微，但沃兹沃思除了他的诗以外绝少谈别的事情，而科尔里奇的谈话，纵使在他衰化时，都具有使卡莱尔留下印象的知识范围、生动

和兴趣的一面,甚至还能使斯塔埃尔夫人肃然起敬。沃兹沃思使他敬畏的地方是这位长他两岁的人的集中的目标和稳定的意志;科尔里奇则越来越被希望取代意志,和想像取代现实了。

他惊奇于他的谦卑,但是却非常自觉,发觉自己(但在这一点上,跟沃兹沃思和我们一样)对各种主题都有兴趣,并且暗自以此而自负。他关心他的诚恳,他的严肃的道德律,和他对金钱或名誉的冷淡;但是,他渴望荣誉,乐不自胜地剥削。<sup>⑧</sup>借钱即忘,不照顾太太和孩子,让他的朋友去支持他们。也许鸦片耗弱了他的性机能,以致使他误幻想为房事之履行。

1804年4月中,为了让地中海的空气和阳光缓和他的气喘和风湿热,他从沃兹沃思处接受了100镑的借款,<sup>⑨</sup>便扬帆前往马耳他岛(Malta),当时不列颠帝国的一处举足轻重,正处在争执中的堡。他随身带了一盎斯的原质鸦片和九盎斯的鸦片烟酊。在航程中,5月13日那天,他在笔记中写下一则绝望的祷文:

噢,敬爱的主! 予我灵魂以力量,澈底通过一次煎熬——要是我登上马耳他——纵然恐怖重重,度过自由自在的一个月……。我志良,宅心仁厚,不可能心怀不轨,但是啊! 我却十分虚弱——自婴儿时以迄于今——我活到了此刻! 宽恕我,宽恕我,天上的父和上帝啊!<sup>⑩</sup>

几乎整整一年,他似乎恢复了自制。7月中,他被任命为马耳他总督亚历山大·鲍尔(Alexander Ball)的私人秘书,并于1805年1月中,晋升到更要负责的事务秘书的位置上。他努力工作,表现了惊人的判断和适当的能力。接着,于服务一年后,他因筋疲力竭,重又靠鸦片来维持了。他离开马耳他,游历西西里和意大利,再返回英格兰(1806年)。到那个时候,他比以前更要依仗鸦片,并且用白兰地阻止鸦片的催眠作用。

1806年10月26日。他与沃兹沃思一家在肯德尔的一家客栈中碰面。“从未，”多萝西在那天的日志中写着：“令我感到在初见他时那样的震惊的”；胖得竟“连他的眼睛都消失”在他臃肿的脸上，只有瞬间的微光表现了以前“他脸上的圣洁表情。”<sup>⑧</sup>他继续前往凯西克，要求与太太分居。她却拒绝了。他离开了她，带了6岁的儿子德温特。他将韦奇伍德的年金移转给太太<sup>⑨</sup>，但是，乔塞亚·韦奇伍德于1813年撤消了他这一部份的应享份。自1803年起，就住在格瑞塔厅的骚塞，负起照顾了他嫂子的责任。科尔里奇则由他的烟友德以匿名方式寄去的100镑赠赐，和他于1808年、1809年和1810年中在皇家科学院中的讲演渡过了这次危机。

在那一年中，伟大的友谊结束了。它的基础是对诗的共同灵感；当科尔里奇身上的诗泉自1800年起因体力耗弱，鸦片的催眠作用，婚姻离散和受到哲学的蛊惑而枯竭时就停止了。沃兹沃思藉建议科尔里奇他的天赋较偏向于散文来鼓励他改变。科尔里奇因得知沃兹沃思家的3个人提醒萨拉·哈奇森不要让他得寸进尺而深为不快。1809年5月31日的一封信中，当沃兹沃思警告普尔不要使自己过份牵涉在科尔里奇的一份新杂志《朋友》(The Friend, 1809—1810年)时，分歧竟变成了一道深深的裂痕。“身为科尔里奇最亲近和最有交情的朋友之一——”沃兹沃思写着：

我把它当做我深思熟虑的意见般寄给你，这个意见是根据几年来越来越加重的证据，而形成的，即科尔里奇既不愿也不能执行对自己、家庭或人类有重要利益之任何事件。既不是他的天才也不是他的天赋，如果他们是的，更不是他广博的知识，会使他利用任何事情；他们统统因他的知识和道德结构之狂乱而挫败了。事实上，他没有任何类型的心智之自由意志，且也没有在任何义务或道德感的约束之下作为之能力。<sup>⑩</sup>

这是很无情和极端的，但是，沃兹沃思已在几周前的一封信中告诉科尔里奇大部份情形了。<sup>⑤</sup>根据科尔里奇的说法，当巴兹尔·蒙塔古告诉他，沃兹沃思曾告诫他不要让科尔里奇和他同住，因为科尔里奇，由于酗酒和其他种种劣行，使他自己在格拉斯米尔成为“一个滋事者”时<sup>⑥</sup>，事情就弄得更糟糕了。沃兹沃思稍后（1812年）向科尔里奇保证，蒙塔古误引他的话。科尔里奇佯装接受这种解释，但是，破镜不能重圆，这件历史性的友谊就此沉寂了。

## 第十一节 哲学家科尔里奇

（公元 1808—1817 年）

也许我们夸张了科尔里奇的消沉；我们不得不指出，1808年和1815年之间，他在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的皇家科学院所发表的讲演，多少因思想和表达的混淆而受到伤害，不过，却留给如查尔斯·拉姆、拜伦爵士、塞缪尔·罗杰斯、托马斯·穆尔和利·亨特这般听众一些印象；好像是因为某些自然形成的团体精神之鼓励，这些人和其他的文士都来支持他们受伤了的伙伴。在朋友圈中拥有十数位英、德两国知名人士的亨利·克拉布·罗宾逊（Henry Crabb Robinson）描述在伦敦的第三次讲演为“优异，十分德国味道”。“在第四次中，”他报告称：“处理主题的方式是完全德国式的，同时，对于为数不多的听众是太抽象了一点。”<sup>⑦</sup>科尔里奇对事实，观念和偏见的累积过于丰富，以致不能让他深入到他宣布的主题上去；他涉及过广，不过非常刺激。以一句“天使长，略有微疵”<sup>⑧</sup>的名言来概述他的查尔斯·拉姆结论称，“稍稍触及他的天才而不让

它扰乱我们的宁静已足够了。”<sup>99</sup>

1815年—1817年间,当科尔里奇再度面临崩溃的边缘时,他将他晚年的结论倾注入文字中。在《生命论》(Theory of Life, 1815年)一书中,他表现了对科学,特别是他与汉弗莱·戴维的友谊中所获得的化学之惊人知识;不过,他拒绝以物理化学的词汇去解释心智的一切尝试。他称“达尔文的……人类由猩猩进化而来的理论为荒谬之至。”<sup>100</sup>

在《政治家手册》(The Statesman's Manual, 1816年)一书中,他提出《圣经》为“政治思想和预见的最佳指引”的意见:

史家发现伟大的事件,纵然是世界商业关系中的最重要改变,……他们的起源并不在于政治家们的结合,或是商人的实际内省上,而是在毫无利害关系的理论家之密室中,在遁世的天才之异见中……。基督教世界中的一切划时代的变革,宗教的兴替,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关国家之民政、社会内部习惯之转变,都与形而上学的系统之兴替互相一致。<sup>101</sup>

〔他也许想到了基督、哥白尼(Copernicus)、古滕贝格腾堡(Gutenberg)、牛顿、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之结果了。〕对于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因素作了公平的摘述后,科尔里奇结论称,民视并不等于天视;百姓在情绪激动中思考,并不能作为权力信赖之依据;<sup>102</sup>而改革的最佳路径是经由一个受过教育和拥有财产的少数人的良知和作为。<sup>103</sup>一般来说,在政治上跟其他任何方面都一样,正当行为的最佳指引就是《圣经》,因为这本《圣经》包容了历史和哲学上的一切真理在内。“对于劳动大众,《圣经》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是不需要的,”并且“也不是普遍所欲求的……。除了你……身为在较高级的社会阶级中行动的人们,”也应该了解历史、哲学、和神学。

对虚伪政治才干的解毒剂便是历史,作为“现在对过去,和我们自己的世纪之事件之有选择的同化习惯与对以前的那些事件的对照。”<sup>⑧</sup>《俗人谈经论道》(A Lay Sermon, 1817年)一书,继续向“中上阶级”提出这种请求作为健全改革的最佳媒介,和作为对批判“革命派的诡辩家和煽动者”的守护者。<sup>⑨</sup>但是,该书承认某些通行的邪恶;如国债任意膨胀,农民陷于赤贫,工厂中的童工;科尔里奇指出“接踵在我们后期前所未有的繁荣之后的愚昧,无耻和浪费;商场中的愚昧作风和愚昧的投机情绪,以及无数夸张的愚行和淫秽之事。”他悲叹新商业经济对周期性膨胀和萧条,导致崩溃和普遍不景气所应负的责任。<sup>⑩</sup>

他建议一些基本的改革。“我们的厂商应同意制订章程。”<sup>⑪</sup>特别对童工尤应然。国家应承认其为“积极的目标者有:1. 使得每一个人的求生之方法更为容易。2. 保障每一成员有改良其自己之状况和他的子孙的状况之希望。3. 发展对他的人性为必要不可少之那些职能;即对他的理性和道德形象。”<sup>⑫</sup>他呼吁在每一职业中有一个领导者的组织从哲学的远景中去研究社会问题,和对社区提供建议;以及“国教应受到国家的资助。”<sup>⑬</sup>

科尔里奇以没有纯洁的世俗智慧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因而应让给神学家去作为来结束他的《俗人谈经论道》一书;只有一种超自然的宗教和一种由上帝赋予的道德规范才能抑制人类的先天食欲。<sup>⑭</sup>邪恶与生俱来,“唯独……人类的知识”是“不适于恢复意志健全这个功能的。”<sup>⑮</sup>他呼吁回返宗教上去的谦卑意识,和充分信仰基督为赎回人类的罪恶而牺牲的上帝。<sup>⑯</sup>

1815年至1816年间,科尔里奇写下或命人听写了一些“《我的文学生命和意见的草稿》”供准备中的一本自传之用的。两卷书就没有完成过,科尔里奇于1817年以《文学家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之名发表了这些草稿,现在是我们研究科尔里奇在哲学和文学上的思想之最易获得的资料。想到其中大部资料是正当他

沉溺在鸦片上，他债台高筑和他没有能力供应儿子们的教育的消沉时期写成时，它看起来却特别觉得有连贯性和清晰性。

他开始摒弃了一度令他着迷的联想心理学；他拒斥每一种思想都是机械感觉之产物的主张；他那时主张，这些仅给予我们自我——记忆，比照和绵延的人格——陶铸成为创造性想像，有目的思想和有意识的行为的原料而已。我们的一切经验，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都记录在记忆中，记忆变成储藏所，心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从那里引出作为解说目前之经验和解析目前之选择的材料。当然，在此点上，科尔里奇是追随康德的。他就此点完全承认他的负欠。“大名鼎鼎的哥尼斯堡的哲人(the illustrious sage of Königsberg)之著作，较任何其他的作品，顷刻间鼓舞和锻炼了我的了解。”<sup>⑥</sup>

科尔里奇从康德进入费希特(Fichte)当作直接所认知的唯一实体之自我升华，经过黑格尔(Hegel)的自然和自我之对照和联合，而入于谢林视为一个实体之两面的自然对心智的从属关系；不过，在这种关系中，自然是潜意识的行动，而心智是有意识的行动，并且在有意识的天才之创造上使其达到了最高的表达。科尔里奇自由地借用谢林的观念，却经常忘却提及他的资料来源；<sup>⑦</sup>不过，他承认了他的总负欠，并补充说：“如果我能使我的国人了解谢林的这种体系成功的话，对我是一件快慰和光荣至极的事。”<sup>⑧</sup>

《传记》一书的最后11章，提出作为想像的产物之文学的哲学讨论。他区别幻想和想像间之不同；幻想是空想，在想像中如一位善泳者一般；想像(科尔里奇用大写字母开始)，如一本小说的情节，一本书的组织，一件艺术品的制成，或科学熔铸的哲学体系一般，是将部分有意识的联合到一个新的整体中去的情形。这种观念变成为对任何诗、书、绘画、交响乐、雕像和建筑之了解和批评；作品究竟距结构——将相关部分交织成一件协调和有意义之整体——的过或不及之处有多远呢？科尔里奇在那几页中为文学和艺术



术中的浪漫运动提出了一种哲学上的基础。

他以对沃兹沃思的诗的哲学和实际,作一种严峻的批评来完成他这部复杂的《传记》。生命的最高哲学从最简朴人物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中发现是真的吗?这些人的语言是诗的最上层的媒介吗?诗与散文之间没有基本的不同吗?就这些观点,这位诗人就变得大异其趣了。不过,他以称颂这位格拉斯米尔的圣人自密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诗人的崇高礼敬作为结束。<sup>⑥</sup>

## 第十二节 沃兹沃思的巅峰期

(公元 1804—1814 年)

经过几度流浪后,沃兹沃思的家人从鸽居迁移(1808年)到靠近阿伦岸(Allan Bank)的一栋大房子中去居住。诗人在这里以一位庭园设计师的身份整修那里的风景,用盛开在格拉斯米尔雨中的树木花草种植在这栋房子的四周。1813年中,这个家庭最后又搬到在格拉斯米尔南边1英里处,安布尔塞德的李达尔山(Rydal Moutn)边一处纯朴的产业上。他们此时已很富有,雇了几名仆人,和一些有头有脸的朋友来往。在那一年中,由朗斯代尔爵士(Lord Lonsdale 安排,任命沃兹沃思为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 County)的印记检验员(distributor of Stamps);这个职务一直保持到1842年,每年带给诗人200镑的额外收入。没有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他在庭园中消磨的时间就更多了,使得这个庭园成为迄今依旧的迪鹃花和其他植物的乐园。从它二楼的窗口,他能一览无遗2英里外李达尔湖(Rydal Water)上令人心旷神怡的风光。

同时,他完成了自1798年开始的《序言》(1805年);“每一

天，”多萝西记着，他自早晨散步回来“带给我们”这首诗的“许多乐事。”<sup>⑧</sup>她和萨拉·哈奇森就不停地忙着听写，沃兹沃思已学会创作无韵诗。他以《一位诗人的心智成长》(The Growth of a Poet's Mind)作为这首逸情叙事诗的副题；该诗有意要作为一部心智的自传，作为详细阐述在那种成长中获致的哲学意味《远足》(The Excursion)一诗的一篇导言而着手写的。他因不断将他的记忆述说给科尔里奇听而造成了意外清新的记忆。他因这首诗的浅薄个人主义而遗憾，他承认，这是“一个人如此喋喋不休谈论自己的一种前所未曾有过的事。”<sup>⑨</sup>也许因为那种理由，在他有生之年，就没有发表这首诗。

如果少许尝试，还是可以容忍的。最令他愉快的便是他的童年(卷一和卷二)，独自在林间漫步，而他认为当他听到动物的私语，树林的沙沙声，甚至在石块声和丘陵的共鸣中，听到一种若隐若现，和无处不在的上帝的声音时的那种感受的情景了。因此，当他

兀自站在突出的高处，  
 在黎明微曦之前……  
 经常在那种时光，这份宁静  
 就会爬满我的灵魂，肉眼  
 浑然忘掉一切；而我之所见  
 犹如我自己的幻化，一场梦，  
 心智上的一种期待……  
 此刻，我见到  
 幸福如浩瀚海洋般在我四周蔓延……  
 难以名状的喜悦  
 我体认到存在的情操延展在  
 一切蠕动着和静止着的上面，

为思想和知识以外，为人眼  
 所不能见，而存于心灵上面的；  
 一切跑跳，和叫与唱上面，  
 或振动的愉快气氛上面；在浪涛下，  
 对！浪涛中，和壮阔雄浑的水中。倘使  
 以这种与人间和天上每一创造之形像交心，犹如  
 朝着非创造者……一般，  
 过份传达了其所感受  
 之狂喜时，毋惊奇！

（此处也许是一个缺点或一种退化；最后一行暗示了创造与其造物之间的一种实体上分歧；我们设定在沃兹沃思身上的上帝和自然的泛神论见解，就同斯宾诺莎身上的一样，是一体的）。

在《剑桥》（卷三）中，他有时加入学生时的嬉耍或胡闹，但是，他受到大学生生活的鲁莽和粗浅行为的搅扰；他在英国古典名著中，或在剑桥的划船中获得了更多的乐趣。在《假期中》（卷四），他回到早期的习惯上，在家庭的餐桌上用膳，抑或在他习惯了的床上

那张矮床，我曾在上面卧听风声怒吼，  
 雨声滴答；我经常  
 在夏夜醒卧着注视  
 沉浸在我们茅舍附近一株挺拔桦树——  
 叶子间的晶莹月亮……  
 当黑沉沉摇曳的树峰前后舞动，  
 她随着每一次吹拂的微风晃动时  
 我定着双眼凝视她

在科克茅斯,他带着他的老狗一起散步,狗任他大声吟哦,却并不因此认为他“脑子有问题”。

啊!用得着我,亲爱的朋友,我  
的心已满到边缘了么!我不立誓,  
但誓言却为我而立,……我应当是……  
一个献身的精灵。

正可说是为诗而活着的了。

偷渡英伦海峡也是一大快事(卷六),感到大革命中法兰西的狂喜,阿尔卑斯(Alps)的雄伟,然后,回程时,看看叫做伦敦的“恐怖人群密集的地方”,和老伯克(old Burke)在国会中赞扬传统道德,以及“极度蔑视推翻暴发户的理论;注视在沃克斯霍尔(Vauxhall)嬉耍或在圣保罗教堂(St. Paul's)膜拜的人群;看或聆听移动的人潮,混杂的人种、面孔、旗子和讲演,车辆的碰撞,娼妓的笑面,小贩的叫卖声,卖花女的低吟,街头吟唱者的抒情小夜曲,把艺术勾勒在石板上的粉笔画,“骑在骆驼背上的一对古怪的猴子”这一切,诗人感受到如在森林中的一样敏锐,但他却一点也不喜欢,就逃到(卷八)比较宁静的地方去,那里,投身在自然的怀抱中,能教给他了解和宽恕。

接着再度到法兰西(卷九),那里,古老的专制和以往的忧伤似乎都得到认可,并且也尊重叛乱,纵使是一位英国人,都能体会到它的狂喜(卷九)。

岂是几处偏爱地点,  
而是充满着期望之远景……的全地球。  
有那一种理想的情操未唤醒

未曾想到的愉悦呢？

从这种狂喜的顶点，法兰西跌进了罪恶的渊藪，而沃兹沃思则唱着：

但是，目前，轮到他们成为压迫者  
 法国人变更一场自卫的战争  
 为一场征服的战争，已失去  
 他们当初斗争的目标。

慢慢地，意兴阑珊的诗人将他的《序曲》带入结尾（卷十四），呼唤他的朋友（从马耳他）回来，加入从战争和革命中争回人类的努力，以便去爱自然和人类。他不满意他的诗，<sup>⑨</sup>知道绿洲周围仍有辽阔的沙漠。他确信已看到散文和诗之间几无分野之处，他也经常在无韵诗中毫不含混地将它们混淆着使用。他曾经使“在宁静中记忆的感情”作为诗的基本要素，但是，用 14 篇章而镇定下来的一种感情就变成一种难以排拒的催眠曲。一般来说，一首叙事诗的特性，据说是一种伟大或崇高的行为；而思想太隐秘不能叙述出来。纵然如此，《序曲》留给果断的读者一种健康与真实的感受。沃兹沃思有时用幼稚得如童谣一般的韵律，却以森林和原野的清醒气氛清醒了我们，而使得我们如庄严肃穆的山丘般，默默地忍受暴风雨的吹袭而依然屹立着。

于 1798 年首途赴德之前，沃兹沃思已经开始在写《隐遁者》（The Recluse）了，其理论为只有了解生命并且从生命上退缩的人，才能公平地判断生命。科尔里奇敦促他将此诗发展成他抱持的哲学之一种充分和最终的指陈。科尔里奇更具体地建议：“我希望你愿意写一首无韵诗，写给那些因法国大革命彻底失败之结果，而放弃为人类改革之一切希望，因而就去追求几乎为享乐而自私自

利的人的。”<sup>60</sup>他们同意文学的高峰应是哲学和诗的愉快结合。

经过仔细思考之下，沃兹沃思感到他尚未准备要迎接这种挑战。他对准备成为他的心智发展史的《序言》已作了相当进步；未完成此诗之前，他如何能写出他的观点呢？他将《隐遁者》搁在一边，继续去完成《序言》。接着，他发现他的体力和信心在消逝，并且一度精力充沛的科尔里奇从他生命中隐去了一度刺激着他的活灵感。在这种精力枯竭而生活惬意的条件下，他写了《远足》一诗。

该诗起初很好，似描写——显然取材自遭到放弃的《隐遁者》的——曾经由流浪者(The Wanderer)住过的颓败村舍为开始。这位酷肖沃兹沃思的流浪者引导这位旅人到遗世孤处者的身边，他则述说他如何失去了宗教信仰，变成对文明生厌，和退入山中的宁静气氛中的。流浪者提出宗教为对绝望的唯一治疗方法，知识即幸福；但是，知识增加我们的权力，甚于我们的快乐。接着，他引导到主管教堂的牧师那里，他提出他的农民信徒的朴素信仰、和家庭团结，要比哲学家意图以复杂的知识论点取代古老的智慧为聪明。流浪者哀叹虚骄的城市生活，和邪恶的工业革命；他辩护普及教育，并预言它的“繁荣结果”。不过，牧师的最后预言，吟咏了对一位人神的一首赞美歌。

为《隐遁者》一部分的这首《远足诗》，于1814年出版，一册定价2金币。（作为它的序文的《序言》则直到1850年才印行。）沃兹沃思要求他的邻居克拉克森家族(the Clarksons)协助在“富有而喜欢教育性图书”的贵格派朋友中销售；他在不借给任何能买得起一本的人的谅解上，给了小说家查尔斯·劳埃德(Charles Lloyd)一册。他拒绝借一册给一位认为以2金币卖“作品的一部份”为价钱过高的富孀。<sup>61</sup>发行8个月后，总共只卖掉300册。

评论的意见好坏参半，杰弗里爵士于1814年11月的《爱丁堡评论》上，以一句不祥的开头语：“此诗决不畅销”一句来非难这首诗。黑兹利特于“对自然的描述和启示性的反射两者为令人舒畅的

篇章”来赞扬后，发现这首诗就整体来说“过长和太过堆砌”，重复“相同的结论，显得太刻板、无味。”<sup>⑧</sup>会誉此诗为一篇杰作的科尔里奇，在《远足》中看到了“冗长、重复和一连串逆旋，而不是进步、和思想”。<sup>⑨</sup>不过，科尔里奇在后来的“桌边漫谈”(Table Talk)中赞扬卷一和卷二《荒凉的村舍》(The Deserted Cottage)为“人类最美丽的诗篇之一”<sup>⑩</sup>雪莱不喜欢《远足》一诗，因为它揭示沃兹沃思以一位自然泛神论者而向上帝的正统观念投降的意念；但是基特在这首诗中发现了许多灵感，总而言之，认定沃兹沃思的才华在拜伦之上。<sup>⑪</sup>时间同意基特的看法。

### 第十三节 高门圣哲

(公元 1816—1834 年)

1816年4月，43岁的年纪，接近身心崩溃的科尔里奇，成为伦敦高门(Highgate)的詹姆士·吉尔曼博士(Dr. James Gillman)的一位病人。科尔里奇那时一天要消耗一品特的鸦片烟酊。骚塞大约在这个时候描写他“胖得有半栋房子大”；他的身体松弛而佝偻了；他的脸色苍白，浑圆而缺乏生气；呼吸短促，双手颤抖得几乎不能举杯到嘴边。<sup>⑫</sup>他有一批如拉姆、德和克拉布·罗宾逊等忠心的朋友，但是他绝少去看几乎仰赖抚恤或赠赐来维生的太太或孩子，并且失去了对生命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许是这位年轻的医生曾听过拜伦和沃尔特·司各脱称誉这位身心憔悴的人为英格兰文学上最伟大的人物吧；<sup>⑬</sup>无论如何，他认为只有不断和职业性的监护和照顾，才能挽救科尔里奇。得到太太的同意，吉尔曼博士就将科尔里奇带回家去，供他营养、款待、安慰和治疗，直到他死时为止。

科尔里奇的心智得原是惊人的。医生对这位病人的渊博知识、丰富观念和出色的谈吐大为讶异，他打开了通往这位“斫伤了的大天使”很少用非常清晰或逻辑秩序，却毫不含糊地以慧黠、热诚和真诚而漫谈的一群老少人物圈子去的门户。这些谈话的片断，保存在依然火花闪烁的如《桌边漫谈》一类作品中，“每一个人生来就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派或柏拉图派的人物。”“我们要么有一颗不朽的灵魂，要么就没有。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是禽兽；也许是第一等聪明的禽兽，但是，无疑依旧是禽兽。”<sup>⑨</sup>

他不满足于跻身在第一等聪明的禽兽之中。当他将要死去时，他从宗教中寻找安慰，似乎要使他的交易成功似的，几乎投入作为英国稳定和道德支柱的最正统的国教中去；他满怀希望地冀图永恒化生命：Esto Perpetua。他的《论教会和国家的宪法》(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1830年)一文认它们为国家统一的两种互为辅佐的形式，彼此相辅相成。<sup>⑩</sup>他(和沃兹沃思)反对不列颠天主教的政治上解放；理由为天主教会的成长会因爱国心和宗教之间发展的忠顺之冲突而危及国家。

他接受了对老年人很自然的保守主义之全部利益。1818年；他曾支持罗伯特·欧文和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严格限制童工的运动，但是，1831年中，他反对要击败保王党在国会中占优势的《改革法案》(the Reform Bill)。他不支持消除西印度的奴隶制度。<sup>⑪</sup>比绝大多数哲学家更要研究和支持科学的他，拒斥进化的观念，偏向于“我在圣经中找到的历史。”<sup>⑫</sup>最后，他那广博和深远的学识向病体和意志屈服，他竟成为一位对政治或信仰中的每一改革都十分恐惧的人了。

他缺乏在他的作品中达到的建设性统一的持久耐性。在《文学家传记》中(1817年)，他宣布要写一部文学巨构(Opus Magnum)——《哲学》(The Logosophia)——那就是科学、哲学和宗教的总述、顶点和调和——的意图；但是，能让他贡献于那份事



业上去的体力和心灵却因勤劳、混乱和隐晦造成了一堆混杂的碎片。通往这样一种情况的便是德所曾形容的“最广博，……精锐和最能理解……为人类中所仅有的”心智。<sup>⑩</sup>

1834年7月，科尔里奇开始向生命告别。“我濒临垂死的边缘，但却没有迅速解脱的期望……。胡克(Hooker)希望活到写完他的《宗教政体》(Ecclesiastical Polity)一书——就我自己来说，我冀望生命和体力能让我完成我的《哲学》(Philosophy)一书。因为，诚如上帝听到我的祷告的，我心中始终在筹算的便是想扩大它的名字之荣耀；换句话说，那与促进人类的幸福是同一件事。但是，如上帝别有用意，那末，就依它的意志吧。”<sup>⑪</sup>科尔里奇死于1834年7月25日，享年62岁。沃兹沃思听到“他所知的人中最不平凡的人”之逝世而深为震惊；最要好的朋友拉姆说：“他的伟大和可爱的鬼魂时常萦绕在我身边。”<sup>⑫</sup>

#### 第十四节 论遗世独立派

查尔斯·拉姆(Charles Lamb)是少数几位激进派人士中的一人，他们的主要著作使他们于1815年后得到这种地位；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中，却丝丝入扣地可列入湖滨诗人的生活圈子中。拉姆是科尔里奇的一批伦敦朋友中最亲密的一位。他们在孩子时代的公共学校中时就已彼此相知。那时，拉姆的不可救药的口吃使他被摒于学业上的荣耀之外。他在14岁时离开学校去自谋生路；17岁时，他成为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House)的一名会计；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50岁退休领到一笔赡养金时为止。

在他的祖先中有癫狂的血统；他自己在一家疗养院中消磨过

6个星期(1795—1796年);1796年中,他的姊姊玛丽·兰布在发狂中杀死了他们的母亲。有好几次,玛丽被幽禁起来,但是,大部分时间,放弃结婚的拉姆使她和自己住在一起,直到他死亡时为止。她复原得相当满意,能和他合作撰写《莎士比亚的故事》一书。他自己唯一的作品是《埃利亚散记》(the Essays of Elia, 1820—1825年),该书的活泼风格,朴素的文字和艺术手法表现出它是在那个不十分幽雅的时代中一本最可爱的作品。

1797年6月中,依旧震惊在前年的悲剧中时,他接到科尔里奇希望他到下斯托伊去访问的一封邀请函。既然是一位口吃者,当他发现自己身处在两位口若悬河的诗人——科尔里奇和沃兹沃思——之前,几乎不敢开口说话。5年后,他和姊姊访问住在格瑞塔厅的科尔里奇。“他以无比的殷勤来招待我们。”<sup>⑧</sup>虽然,终其一生,他一直是一个怀疑论者,拉姆绝不允许科尔里奇的神学观点干扰到足可抵消每一种挫折的感情和敬仰。

国家人像画廊(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收藏了一幅由他的朋友威廉·黑兹利特,当时最活跃和尖刻的文学批评家,所作的拉姆的人像画。黑兹利特于1798年时访问过科尔里奇,1803年再度到格瑞塔厅去访问,在第二次时,沃兹沃思也在场,这3个人就在一起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威廉·佩利最近以设计的观点作过正面的辩护;黑兹利特则持反对立场;沃兹沃思采取中立,主张上帝不是存在于宇宙之外而从外面来指导宇宙的,而是内在于宇宙之中,为宇宙之生命和心智。在那次访问时,黑兹利特因勾引一名女生而遭致邻居们的盛怒。害怕被捕或甚至更糟的不测事故,他就逃到格拉斯米尔,沃兹沃思供他过了一宿,次日一早,给了他一笔足付到伦敦去的马车费的车钱。

当科尔里奇和华次华斯转而反对大革命,并以热烈的诗篇贬斥拿破仑时,黑兹利特鄙视他们为反叛者,并从拿破仑的观点写了四大卷的《拿破仑的一世》(Life of Napoleon Buonaparte, 1828—

1830年)出版。同时,他以论伊莉莎白时代的戏剧的演讲(1820年),和《时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 1825年)一书,刻划同时代人物形象,使自己成为一位评论家的楷模;沃兹沃思不欣赏该画对文学中农民学派的讽刺性攻击。<sup>⑩</sup>

这位上了岁数的诗人较喜欢托马斯·德昆西,德对他一直赞扬备至。托马斯本来就是一位天才,他于1821年以《一位英国鸦片烟鬼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一书来促请不列颠的注意。年幼时就是一位天才儿童,15岁时就能讲述希腊古典著作,因学校的进度太过缓慢就从学校和牛津出走,他一定因自己喜欢《抒情民谣集》上不假矫饰的朴素,连自己都有些意外。1803年5月,他写给沃兹沃思如下一封也许改变这位孤独诗人的头脑的信:

在寻求你的友谊上,我没有比(我想是如此)每一位读过而体会到《抒情民谣集》的人与我有同感以外的其他别的目的,自从这个世界开始混乱以来,我能从其他八、九位诗人的作品中找寻到的全部喜悦,也比不上这两部迷人的诗卷单独所给予我的那样多;——你的大名将在我身上永远与这些美丽的自然风光连系在一起……。我有什么权利要求成为如你所处的那样一个放射出如此灿烂,如此庄严的天才光芒的一个社群的一名伙伴呢?

他补充说,沃兹沃思永远找到任何一位“每当有机会增加你的利益和愉快时,随时准备——纵使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的”人了。

沃兹沃思的回答是感谢式的一类体裁。“我的友谊”,他写着:“我无权给予;这是没有人能创造的一份秉赋……。一种健全的友谊是随着时间和情境而成长的;友谊如一朵野花,当时机适宜时就会含苞待放,当不适宜时,追寻也是徒劳无益的。”他设法打消这位

年轻人经常连系的要求：“我是世界上最懒散而不懂得写信的一个人。”但他加上一句：“我的确喜欢在格拉斯米尔见到你。”<sup>⑩</sup>

尽管他的这份热诚，德于接到这份邀请时，已经过了3年的时间了。那时，遥见到沃兹沃思的茅舍时，他的勇气消失了，就如寓言上的朝圣者快抵达罗马时，竟自形惭秽而掉头回去一般。但是，到1807年岁暮，在布里斯托尔，科尔里奇接受了护送科尔里奇夫人和孩子回凯西克的提议。在旅途上，她和他一起到鸽居去逗留了一回，此时，如布朗宁(Browning)不久见到雪莱的心情一般，德昆西终于看到了平易近人的沃兹沃思。“如一道闪电一般，我看到这位瘦高个子隐然出现了，他伸出手，以最恳挚的欢迎表情来接待我。”<sup>⑪</sup>

## 第十五节 骚 塞

(公元1803—1843年)

同时，在格瑞塔厅和伦敦，骚塞用他勤奋却平淡无奇的文笔，维持太太伊迪丝，5个女儿(出生于1804和1812年之间)，和一位10岁时死于1816年的十分宠爱的儿子的生活。于科尔里奇去了马耳他之后，骚塞负起了照顾科尔里奇夫人和她的孩子的责任，甚至沃兹沃思有时也仰仗他：当威廉的弟弟约翰在海上失踪(1805年)的消息使得格拉斯米尔的一家人笼罩在愁雾中时，沃兹沃思就写了一封信给骚塞，求他前去帮助他安慰多萝西和玛丽。他去了，而“他是如此温柔、慈蔼，”多萝西写着：“我立刻爱上了他；他和我们一起忧伤地流着泪，因为那种原因，我想我会永远爱着他的。”<sup>⑫</sup>

虑荣心使他迷失了一个短时期；他一首接一首写作叙事时，首

首都失败；时间就是一首叙事诗。他使自己屈就去写作散文，却较有所获。1807年，他出版《英格兰书简》：作者是曼纽·阿瓦瑞兹·爱斯皮拉·唐(Letters from England; by Don Manuel Alvarez Espriella)，让这位想像中的西班牙人，强烈地对童工和不列颠工厂中其他的情况痛责一番。如：

我大胆地去了解关于以这种古怪的态度训练起来的这些人的道德，却发现……将这么多男女集拢在一起的结果；对宗教和道德上最普通的原理竟毫无所悉。他们在这种环境影响之下，其成为堕落和颓废的人是一定无法避免的；男人酗酒，女人淫荡，不论他们赚到的工资有多高，他们太过浪费，不懂得储蓄起来供不时之需；虽然教区不再如孩子一般地去照顾他们了，教区仍须因他们的生活方式，早衰或年老而诱发的疾病而要照顾他们。<sup>⑩</sup>

这位英国经济的贵族式政治论者的结论为：“在商业上，甚至过于在战争上，人和兽两者全被视为机器，一点都不后悔地作为牺牲品。”<sup>⑪</sup>

骚塞不久发现他不能靠他的笔来维持生活，更不能养活他的妻女，特别是在战时，除非他采取还要保守的立场。这种改变因一年(1807年)160镑的政府赡养费，和经常在保王党的《四季评论》上投稿的邀请而进行得很顺利。1813年，他因出版《纳尔逊的一生》(The Life of Nelson)——一本依靠勤奋的研究而清晰、生动的虚构小说，并且以朴素、清醒和流畅的18世纪体裁来写作，尽管作者因喜欢他的英雄人物和国家，而充满着作者个人的过多偏见，却是一本能令读者一口气读下去的书，他使自己提高到一位作家和一位爱国者的地位。纳尔逊与埃玛·汉密尔顿(Emma Hamilton)的十几年私情则压缩成一段文字来带过去。

当骚塞藉接受英格兰的桂冠诗人的地位以贬低诗的威望时，拜伦、雪莱和黑兹利特都哀伤了。当庇特（于 1790 年）将这项头衔给予一位身份低微的治安推事亨利·派伊（Henry Pye）时，这种荣誉就已经在下降了。于派伊死后（1813 年），政府就将这个位置赠给沃尔特·司各脱，他拒绝接受，却推荐骚塞为这种头衔之应得人。骚塞接受了，同时获得了每年赡养费增高到 300 英镑的报酬。有资格取得这份荣誉的沃兹沃思，漂亮地说：“骚塞有一大群家小要养活。”<sup>⑩</sup>

后来辱骂骚塞不名誉和健忘的拜伦，在 1813 年 9 月份与他在荷兰官见一次面后，说了他很多好话：“我见到的人中相貌美好的吟游诗人。”<sup>⑪</sup>对托马斯·穆尔：“有那位诗人的头颅和双肩，我一定会写出他的沙弗（Sapphics）诗体。他的确是看一眼就叫人喜欢的人，一个有天赋的人……。他的态度温和……。他的散文完美。”<sup>⑫</sup>但是，骚塞那种讨好有钱或有势的人的明显焦躁，使得拜伦于 1818 年就跟他公然作对。当一个叛乱团体弄到骚塞的激进戏剧 *Wat Tyler*（他写于 1794 年，未印行）的稿本，并于 1817 年高高兴兴地出版时，最无情的攻击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骚塞退回到格瑞塔厅，他的书房和太太的身边。他曾不止一次地接近疯狂的边缘；1834 年，她的心智错乱，1837 年，她终于死了。骚塞自己于 1834 年放弃了这场战斗，接着，几乎在一致的同意，和他自己的提议下，沃兹沃思被举为桂冠诗人。

## 第十六节 沃兹沃思的独白

（公元 1815—1850 年）

诗是属于年轻人的，沃兹沃思，活了 80 岁，死时仍如 1807 年

当他 37 岁写 *The White Doe of Rylstone* 一诗时的一位诗人。那时，沃尔特·司各脱已出版《最后一位吟游诗人的叙事诗》(*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 1805 年)；沃兹沃思羡慕它的流畅风格，就使用这种风格来写自己的叙事诗——一首当伊莉莎白一世在位第 12 年时，关于北英格兰宗教战争的叙事民谣。几乎整个家庭——父亲和 8 个儿子——在一次社会运动中全部殉难的故事。埃米莉，仅存的一位妹妹，就在哀伤中渡过了她的余生；一只白雌兔每日来安慰她，并且每个安息日陪伴她到博尔顿(Bolton)教堂墓地上去凭吊小弟弟的墓园。当埃米莉死时，白雌兔继续独自从里史东走到博尔顿从事每周的访问，静静地躺在墓边，直到教堂内的安息日礼拜做完，然后安安静静地行经树林和溪流，回到里史东的窝里。这是一则以幽雅、哀怨的语气表达出来的传说。

这是沃兹沃思艺术的最后胜利。除了他在轻微的感触下吟咏的一些十四行诗外，他不再作诗了。看上去 50 岁光景，他全身每一寸都像一位哲人，身材修长，风度翩翩，身上裹着御寒的棉袍，额头微秃，头发蓬松，微低着头，双眼深沉作沉思状，就如一个见过雪莱和拜伦自婴孩、进入狂喜而到达死亡过程的人，此时安静地等待着他自己的死期，深信他会留下此空幻的感情或讽刺的韵律要更为永久的一个纪念碑在人间。

他有他德行上的一些瑕疵，因为它过于个人主义之故。“密尔顿是他最伟大的偶像，”黑兹利特写着：“他有时竟拿自己和他相比。”<sup>⑧</sup>他视赞扬为当然之事，对批评怒不可歇。他爱引述自己的诗句，诚如 1833 年拜访他的埃默·森(Emerson)顽皮地指出的一般；但是，他于 1815 年的一篇前言中曾说过，他的诗要大声朗诵才够味；事实上，它们是能唱也能诵的，一首抒情诗应有七弦琴伴奏才行。

当然，当岁月增加时，他变得很保守；这是一项年岁的特权——也许是一项义务吧；如果拜伦和雪莱未能认清这一点，也许是

因为他们死于青年时的精神分裂之故。法国大革命从宪政到解体的衰退给了沃兹沃思作某些行动的藉口，而工业革命的残忍似乎证明他的某些健全美丽的事物，已经因工厂的劳动者取代了健壮的自由民的地位，而从英格兰消逝了的感受。1805年以后，由于赠赐或购买，他变成了几处低微的产业的所有人；而身为一名地主，他容易同情视土地上的“孳息”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凝合土的看法。因此，他反对革命运动作为工厂主削减谷类价格的一种计划，各劳动者的工资，藉取消提高进口税，干扰外国谷类进口的“谷类法”来弥补。

他曾经一度是一位戈德温的仰慕者，此时，以个人只能透过对传统、资产和法律的尊敬所维持的一个社区联合体才能生存的理由，而反对戈德温的自由个人主义了。1815年后，他支持政府的一切压制手段，被烙上一位自由运动背叛者的烙印。他坚持立场，并以他对这个世纪的最后诊断来反驳：“这个世界藉政治改革、政治救济、政治万灵药作为从邪恶中解救出来的口号正趋向疯狂，同时，这种伟大的邪恶——文明、束缚、悲惨——深植人心，除了道德和宗教没有东西能除去它们。”<sup>⑩</sup>

因此，他呼吁英国百姓支持国教。他将一些英国史编织入47首《圣职者十四行诗》(Ecclesiastical Sonnets, 1821年)中，这些诗让我们记起一些已经被遗忘了的英雄人物，有时我们对它们的优美韵律感到讶异。依照亨利·克拉布·罗宾逊的说法，“沃兹沃思说过，如果需要，他愿为防卫国教而不惜洒出自己的热血。他并不因为有人引述他以前说过，他不知道他曾经进过自己国内的教堂的话来嘲笑他而使他感到狼狈。”<sup>⑪</sup>

当他周围的爱情世界开始倒塌时，我们的确没有找到他从宗教中去寻求慰藉的证据。1829年中，多萝西患了严重的结石症，使她的健康和精神就长此衰弱下去。久治不愈损害了她的神经系统；1835年后，她的两腿瘫痪，除了早期的一些事物，和她依然能背诵



的她哥哥的诗以外,她的记忆力也衰退了。兹后 20 年,她在家中变成一个一无用处却很安静的病人,静静地坐在靠近壁炉的椅子上,耐性地等着死神的召唤。1835 年,萨拉·哈奇森去世,留下沃兹沃思和太太玛丽两人照顾妹妹和他的孩子们。1837 年,他依旧有足够的毅力与无处不在的罗宾逊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旅行 6 个月。在巴黎,他重逢了安纳泰·瓦隆,和此时已结婚的女儿卡罗琳。

他死于 1850 年 4 月 23 日,葬在格拉斯米尔的教堂墓地他的邻居中间。多萝西又拖延了 5 年多,由将近失明的玛丽耐性地照顾着。玛丽死于 1859 年,享年 89 岁,一生忠于家务。在沃兹沃思身上,一定有一种比他的诗更要伟大的东西,使他争取到这些女人历久不衰的爱情。他们和如她们一般的数百万家庭中的类似情形,也应该作为整个英格兰的一部分来记忆的。

## 第八章 反叛的诗人<sup>\*</sup>

(公元 1788—1824 年)

### 第一节 褪色的污点

(公元 1066—1809 年)

要了解拜伦,我们就得要了解如间歇热一般,在他的血管中流动着的他的祖先的某些详细的历史和个性。那血液的某些因子,就如他的名字一般,也许来自法兰西,那里有好几位拜伦是历史上的人物;拜伦自己就曾在《唐胡安》(Don Juan 第十首,第 36 行)一书中,很自负地提到一位推定的祖先,雷道伏斯·戴·布伦(Radulfus de Burun),曾随“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来到英格兰。12 世纪时,布伦家(Buruns)变成了拜伦家(Byrons)。一名约翰·拜伦爵士(Sir John Byron)在亨利八世麾下表现十分出色,当修道院解散时,国王就将该修道院(约建于 1170 年)和“我们诺丁汉郡境内……之前修道院和纽斯台小修道院(the Priory of Newstede)”的土地转移给他,作为一份名义上的总报酬。<sup>①</sup>一系列有从男

---

\* 本章取材自 Leslie Marchand's 《拜伦一世》(3V., New York: Knopf, 1957), 一部公正的学术性杰作。

爵爵位的拜伦家族此后在英国史上扮演着轻微的角色,支持斯图尔特朝诸王(the Stuart kings),追随查尔斯二世放逐到国外,被没收纽斯台的修道院(Newstead Abbey),于复辟(the Restoration)时又重新收回。

诗人的伯叔祖威廉·拜伦爵士五世(1722—1798年),英俊、鲁莽,曾服役于海军;因为在修道院中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赢得“缺德爵士”(Wicked Lord)的浑名;挥霍掉大半家财;在酒馆的一间黑房中一次临时决斗中杀死了他的亲戚威廉·查沃斯(William Choworth);依谋杀罪被送进伦敦塔(the Tower);受到上院的审判(1765年);宣判为“谋杀罪无据,过失杀人罪成立”;隐居在修道院内,在那里过着隐晦的隔离生活,一直到死。

他的弟弟约翰·拜伦(John Byron)成为一名海军少尉之候补军官,遇到过海难,并出版了一本《故事书》(Narrative),他的孙子就将海难的生动情景从《故事书》中搬进《唐胡安》里边去。既为海豚号舰(the Dolphin)的司令官,约翰环航过地球1周。最后,他就退休在西英格兰的一个家中,他在那里以“海上大情人”(the Nautical Lover)享誉,因为他在每一个港口有一位太太或一名情妇。

他的长子,也是诗人的父亲,约翰·拜伦上尉(Captain John Byron),在他短命的35年生涯中,充满了许多罪孽,被称呼为“疯人贾克”(Mad Jack)。从美洲殖民地服役回来后,他在伦敦消磨了一段时间,使他的情妇们替他还债。1778年中,他借卡马森郡的侯爵夫人(the Marchioness of Carmarthen)一起私奔;她的侯爵丈夫和她离了婚,拜伦上尉娶了她,并享受了她的收入。她替他生了3个孩子,其中一位奥古斯塔·利(Angusta Leigh)成了诗人同父异母的姊姊,有时兼做情妇。

1784年,前卡马森夫人去世。一年后,这位神采飞扬的嫖夫妻了一位20岁却有2.3万英镑财富的苏格兰女子——盖特郡的凯瑟琳·高塘(Catherine Gordon of Gight),面貌平庸,却十分自负,

拥有一个可追溯到苏格兰的詹姆士一世(James I of Scotland)的家谱。当她身怀着诗人时,她也给了他另一系列杰出、狂热的遗传:祖先为法国人,个性暴躁,出过强盗、谋杀者、和封建地主等祖先。这位母亲本人就是一位敢爱敢恨的复杂人物。这些性情她发挥在丈夫身上,丈夫挥霍光了她的资产,然后遗弃了她;之后,就发挥在她唯一的儿子身上,她用感情来纵容他,用管教来刺伤他,用如“跛脚小子”这种浑号来贬低他。蔡尔德·哈罗德(Childe Harold)(即拜伦)说:“我应该知道从这样一粒种籽上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了。”<sup>⑥</sup>

乔治·高登·拜伦于1788年1月22日生于伦敦。他的右脚于出生时因脚底内弯,脚跟上抽而成残废。这种残废可以藉着每天运动这只脚而治愈;但是母亲却既没有这份耐性也没有做这样一种工作的毅力,那样做对孩子来说似乎是残忍无比的;医生们也没有推荐这种方法的打算。到8岁时,这只变形的脚是让孩子在一只设计来平衡和减少变形的小鞋子外面套一只寻常的鞋子来改良的。在日常生活和运动上,他的脚变得很灵活,但是,他在起居室中行走时,就难免没有对他的跛脚的痛楚意识。青年时期,对任何提到他的残废时,他都会光火。这就养成了他尖锐的感觉和暴躁的脾气;不过,这也许就刺激他去追求各种胜利——在游泳、求爱和作诗上——那样也许分散对他的残废的注意了。

1789年,母亲带着孩子搬到阿伯丁(Aberdeen)去住。一年后,她的丈夫逃到了法国,他于1791年在放淫和赤贫的状况下死在那里,只留下她财产的极小部分,拜伦夫人却尽到给予儿子适于成为一位爵爷之教育的最大义务。<sup>⑦</sup>当他6岁时,她喜不自胜地向他述说:“既为一名好孩子,跑跳行走就要跟其他孩子一样。”7岁时,他入阿伯丁小学(Aberdeen Grammar School),他在那里打好了拉丁文的基础。接受更高一层的教育,并在希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旅行过许多次后,他在拉丁和希腊文学上的造诣十分高深,只有一位

在经典古籍上有素养的学者,才能了解出现在《唐胡安》上的游戏文字之引文和历史上的暗示。拜伦认为历史——净化的民族主义和神话——才是有关人类的唯一真理;雪莱则忽视历史,只是结合在与历史无关的理想上。

1798年,拜伦的伯叔祖“缺德爵士”死于纽斯台,留给这位10岁大的小男孩他的从男爵头衔、修道院、3200英亩田地和一大堆债务。这是一笔很大的遗产,只有足够的收入留下来才能使这位寡妇从阿伯丁搬到修道院去,在那里过着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她把孩子送到杜尔维琪(Dulwich)的一所学校去就读,于1801年时,送到距伦敦12英里的哈罗镇(Harrow)上一所著名的私立“公”学去就读。他在那里抗拒通常由高年级学生要求低年级学生的“任意驱策”的差使;而当他自己成为一位高年级的学生时,就使用一种十分客气的方法去“任意驱策”别人。他是一名惹是生非的学生,破坏纪律,爱恶作剧,忽视指定的功课;但是他读了不少课外读物,经常是一些好书,包括培根(Bacon)、洛克(Lock)、休谟和贝克莱(Berkeley)的著作。显然地,他失去了宗教信仰,因为一位同学称他为一位“要命的无神论者”(a Damned atheist)。<sup>④</sup>

17岁时,他进了剑桥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oge, Cambridge)。他在那里住着价钱很贵的宿舍,仆人好几名,豢养了一只狗和一只熊作为室友。他光顾当地的妓女院和医院,偶尔从伦敦寻找更优异的服务。在布赖顿(Brighton)的一次假期(1808年),他带着一名矫装成男孩子的女子;但是,以相当公正的态度,他在剑桥发展如他所描写的一般,与一位英俊青年的“一种虽然纯洁,却是狂热的爱情和激情的关系。”<sup>⑤</sup>并且,以他的财富、慷慨和妩媚,他维持了几次持久的友谊;最要好的是与约翰·卡姆·霍布豪斯(John Cam Hobhouse)的,几乎长他2岁的霍布豪斯,对于拜伦经常目无法纪的生活,提供了一些短暂的感召和关注。因为这位青年诗人,似乎有意要以一位学验未丰、没有信仰、道德上无拘无束

的态度去自毁之故。

1807年6月,年方19岁,他出版了一卷诗集——《安逸的时间》:作者:乔治·高登·拜伦爵士,一位二流诗人(Hours of Idleness by George Gordon, Lord Byron, a Minor)。他到伦敦去替这本诗集安排有利的评论。1808年元月份的《爱丁堡评论》以讽刺的口吻评论书名是一种伪托,署名为一种藉口、用来欢迎这本诗集;这位青年贵胄,为什么不等到一段适当的时间,发表一些成熟的作品呢?

他于1809年元月22日到达成年。他偿还了一些较为迫切的债务,同时因赌博而招致了更多债务。他取得在上院的席次,并且因新进人员没有发言权而受到许多苦痛;但是,3天后,他在《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上(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撰写了一篇依照几乎可与波普(Pope)的Dunciad比美的巧妙、苛评的文字,猛轰对他的书的批评者。他嘲笑感伤的浪漫运动(不久,他却成了浪漫运动的一名领袖和一尊神),呼吁回到英国的奥古斯都时期(England's Augustan Age;英史,指Anne女王时代而言)的雄浑和古典风格上去:

你们应相信密尔顿、德赖登、波基;  
你们不应揭槩沃兹沃思、科尔里奇、骚塞……。  
我们从霍勒斯处知道:“荷马有时睡着了”;  
我们感到,没有他,沃兹沃思有时醒着。<sup>⑥</sup>

不久,取得剑桥的文学硕士学位后,就去与拳击家为友,练习击剑,并在伦敦的夜生活中学会了另一门课程后,他和霍布豪斯于1809年7月2日向里斯本扬帆,指向东方而去。

## 第二节 欧陆大旅行时期之拜伦

(公元 1809—1811 年)

这不是传统性的大旅行：英格兰在战争状态中，而拿破仑控制了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和意大利，所以拜伦将两年的旅行之大部分时间消磨在阿尔巴尼亚(Albania)、希腊和土耳其，对他的政治观点，对女人和婚姻的看法，和他的死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留下 1.3 万英镑的债务在身后，带了 4 名仆人和他一起同行。他发现里斯本荒凉得超过半岛战役(The Peninsular War, 1804—1814 年的英、法战争)所带来的景象；每一位居民似乎都带着仇视的眼光，拜伦随时带着两支手枪在身边。他们这一伙人骑马到塞维尔和加的斯(Seville and Cádiz)游历，从那里，乘着一艘英国的木造快速帆船到直布罗陀(Gibraltar, 他在那里除了他习惯的随从威廉·弗莱彻——William Fletcher——外，留下他的其他仆人)，并且继续向马耳他出发。(1809 年 9 月 1 日至 18 日)，他在那里与斯宾塞·史密斯太太(Mrs. Spenser Smith)热恋起来，并且十分明显到使得一名不列颠的上尉评议他的性急。拜伦送给他一份挑战书，并加上一句豪语说：“因为我搭乘的船必须要在第一次风向转变时就要扬帆，我们间的这档事安排得愈快愈好。明晨 6 时是最好的时辰。”上尉送给他致歉的信。

9 月 19 日那天，拜伦和霍布豪斯乘着双桅船蜘蛛号(Spider)离开马耳他。1 星期的航行，把他们带到帕特拉斯(Patras, 希腊的一个海港)。他们在那里上岸片刻，只是踏上希腊的土地罢了；但是，当天傍晚，他们重新登上蜘蛛号，继续前行，经迈索隆吉翁

(Missolonghi)和百尼洛比的依瑟卡(Penelope's Ithaca)两城市,在靠近毁灭安东尼(Anthony)和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的亚克兴(Actium)附近的普雷韦扎港(Preveza)下船。他们从那里骑马北上经艾比鲁斯(Epirus)进入阿尔巴尼亚境内,恐怖的土耳其人阿里巴夏(Ali Pasha)从阿尔巴尼亚的首都以恐怖方式统治着阿尔巴尼亚和艾比鲁斯。他明智地给予拜伦适于一位不列颠贵族的一切荣誉;因为(他告诉这位诗人)从他的一只小手和一对耳朵上,他知道他定是一位贵族出生。

10月23日,拜伦和同伴就往回走,27日,他们到达艾比鲁斯的首都雅尼纳(Janina)。他在那里开始将他的旅行印象记录在一本自传体的《蔡尔德·哈罗德的朝圣之旅》(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书中。11月3日,这一行人朝南方走,经过现在的爱陶里亚(Aetolia),(在巴夏的命令下)由一队每个人都精于谋杀和抢劫的阿尔巴尼亚的佣兵护送。他们爱上了他们的新主子,部分是因为他似乎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之故。当拜伦染上一种热病时,他们威胁着如果他的病人死了,就要杀掉医生;这名医生给吓跑了,而拜伦也康复了。11月21日,这一行人乘船自迈索隆吉翁驶往帕特拉斯;在那里,在一队新护送人的护送下,他们骑马经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和阿提卡(Attica),参观了德尔斐(Delphi)和底比斯(Thebes)两座古城,于1809年圣诞节那天进入雅典(Athens)。

那一天,对这两位朝圣者来说,一定是忧喜参半的一天。远古的庄严和近代的腐朽之种种证据,以及一个一度曾自负,而目前由威武而退缩到阿谀的民族,显然地低声下气去接受土耳其人的统治,满足于商业贸易和当日的闲谈,虽可乐了霍布豪斯,却令拜伦促额;拜伦实现了独立的精神和这个民族的骄傲。诗人使蔡尔德·哈罗德大呼反抗,并思索他如何能帮助这个伟大民族的后人重获自由。

无论如何,他们的女人美丽动人,具有乌黑挑逗的眸子和柔顺



的风姿。拜伦和霍布豪斯住在寡妇马克里(Macri)的家里,由她服侍,她有3个女儿,每个都未满15岁。这位年轻的放荡客懂得在她们无知中乐不自胜的爱抚动作。显然地,12岁的特雷莎(Theresa)教给他一句调子优美的欢迎词:“我生命中的生命,我爱你”(Zoé mou sas agapo)。围绕着这句温馨的片语,他写出了他的一首传世歌:“雅典的少女啊!今夕我们别离,给我吧,啊!给回我的一颗心啊!”

1810年1月19日,拜伦与霍布豪斯,和一名仆人、一名向导、两名马夫,出发去访问希腊最令人鼓舞的景色。这趟旅程耗时4天,但是,结果证明不虚此行:他们看到耸起在柯隆那角(Sunium Promontorium, Cape Colonna)上,象征过去英雄事迹的纪念海神(Poseidon)的一所庙宇的遗存列柱,他们告诉水手们,他们已经看到了希腊。拜伦作了“咏希腊岛”(The Isle of Greece)一诗,后来插入了《唐胡安》诗集第三篇中,就是纪念这份残缺美,和远处平静如镜的爱琴海(Aegean)的。从柯隆那角到马拉松(Marathon)只是一天的骑程,在那里诗人思绪汹涌,不久就写下如后引之名句:

群山俯视马拉松村,  
马拉松村俯视爱琴海;  
独自在那里沉思一小时,  
我依稀觉得希腊自由如昔;  
因为站立在波斯人的坟墓上  
我不以为自己是一名奴隶。

3月5日,拜伦和霍布豪斯从雅典搭乘一艘英籍船 The Py-lades 号前往士麦那城(Smyrna,爱琴海上土耳其境内的一城市)。被迫在那里等候了1个月,诗人完成了《蔡尔德·哈罗德的朝圣之旅》的第2篇。到以弗所(Ephesus)小游3日,发现了三教——希

腊、基督教和穆罕默德——颠峰时期的一座城市之废墟。“三教之衰朽”，霍布豪斯感慨系之：“在那里呈现出一种光景。”<sup>⑦</sup>

4月11日，他们搭乘木造帆船 The Salsette 号前往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逆风和外交上的阻扰，使得这艘船在亚洲的达达尼尔市 (Dardanelles) 停泊了两星期。拜伦和霍布豪斯漫游了屈鲁特平原 (the Troad plain)，希望那里埋葬着荷马的肠骨；可惜士利曼 (Heinrich Schliemann) 尚未诞生。4月15日，拜伦和一名英国海军军官威廉·艾肯海德中尉 (Lieutenant William Ekenhead) 自行渡过海峡到欧洲这边的海伦斯邦 (Hellespont)，然后游回对岸去；但是强烈的海流和冰凉的海水对他们太不适宜了。5月3日，他们再度尝试，从欧洲这边的土耳其色斯托斯市 (Sestos) 游到小亚细亚上的阿拜多斯市 (Abydos)；艾肯海德以65分钟游完全程，拜伦为70分钟。在那一点上，海峡只有1英里宽，但是海流却迫使这两位近代的林特 (Leander，希腊神话中海乐 Hero 的情人。每晚从阿拜多斯游到海伦斯邦和她厮守在一起，当他于某一晚上淹死了时，海乐就投海而死) 游了4英里多路程。<sup>⑧</sup>

这几名游客于5月12日抵达君士坦丁堡，瞻仰了回教的清真寺，就于7月14日离开了。17日那天，他们的船停泊在凯奥斯岛 (the island of of Keos) 上的济亚港中 (in the harbor of Zea)；他们在那里分手；霍布豪斯继续朝伦敦走，拜伦和弗莱彻改搭小船前往帕特拉斯。他们再从陆路到雅典。拜伦在那里重新又开始他长期来所探索的女性间的不同处；他夸称被他的爱情所俘掳的人数，染患淋病的次数，并以郁郁不乐作为人生观。11月26日，他写信给霍布豪斯说：“我现在已看到了世界……。我已尝遍形形色色的乐趣；……我已无所求了，也许开始要考虑从那种境遇中走出来的最适当的路子了……。但愿我能找到一些苏格拉底的毒胡萝卜。”<sup>⑨</sup> 1811年元月中，他在阿克洛波里斯 (Acropolis) 的山脚边上的圣芳济派修道院中 (Capuchin monastery) 替自己和仆人们找了几间房

间，梦想着修道院的安静生活。

4月22日，他最后一次离开雅典，在马耳他逗留了一月，接着就回到英格兰。他于离开英格兰2年又12天后，于7月14日那天又重回到她的怀抱。正当忙碌于重新在伦敦的接触时，他接到母亲逝世的消息，享年46岁。他匆忙赶返纽斯台修道院，在她的尸体旁守了一个晚上。当一位婢女恳求他回房去休息时，他拒绝了，并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个朋友，而她却去了！”他在为死于1808年11月，而被埋葬在修道院的花园地窖中的纽芬兰种狗波茨瓦(Boatswain)写的铭铭中说过同样的话：

竖起这一堆石头纪念一位朋友的遗骸：  
我就只有一个朋友，他就躺在这里。

1811年8月中，拜伦立了一份遗嘱，由他的堂兄弟乔治·拜伦(George Byron)继承修道院，指定了仆人们的遗赠物，和直接走到他的埋葬处：“我渴望我的躯体也被埋葬在纽斯台花园的地窖中，不举行任何葬仪，除了我的名字和岁数外，墓碑上不写铭刻；我那忠犬不得从这座地窖中移走是我的遗嘱。”<sup>⑩</sup>安排完了他的后事后，他又开始去征服伦敦了。

### 第三节 伦敦之狮时期的拜伦

(公元1811—1814年)

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结交了许多朋友，因为他在气宇和风采上具有吸引力；谈吐迷人，文学和历史知识广博，并且对朋友之忠诚

甚于对情妇。他住在圣·詹姆斯街(St. James's Street)8号的豪华套房里,他在那里接待过托马斯·穆尔,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塞缪尔·罗杰斯和霍布豪斯……等人;而他们也报之以欢迎之诚。透过罗杰斯和穆尔两人,他进入荷兰宫的名流群中。他在那里碰到了理查德·谢里登,他正准备从政治界中退出来,但词锋却依然犀利如昔。“当他说话时,”拜伦回忆说:“我们屏息倾听,从下午6点直到凌晨1点钟,连哈欠都不打一个……。好家伙!他常很快地就烂醉如泥。送他回家几乎就成了我的义务。”<sup>⑨</sup>

在这些民权派人士主张的刺激下,拜伦就在自己的诺丁汉郡举起“路特派”反抗纺织工业的旗帜。1812年2月20日,下院通过了一件宣告将任何被捕之反抗者处死的法案,于2月27日那天,拜伦起立发言反对。他以优异的英文预先写好了他的讲稿,他开始以一种作处女演说所期望的谨慎声调说话。他承认有些工人犯破坏大量财产之毁损罪;被捣毁的机器,从长远来看,也许是国家经济的一项利益;但是,同时,厂商们使长期辛勤工作而获得一技之长的成千上万工人驱出工厂,突然间使他们一无去处,以致无法养活家小;他们目前贫无立锥之地,而靠救济维持生活,他们的绝望和痛苦从他们的暴乱中可以窥知。当讲演继续下去时,这位年轻的演讲者,因攻击战争为英国工人中前所未有的忧伤之源而失去了立场。上院的贵族们蹙额了,因而通过了这件法案。4月21日,拜伦二度演说,指责不列颠在爱尔兰的统治,并呼吁大不列颠帝国彻底解放天主教徒;贵族们赞扬他的雄辩,却驳回了他的请求,并贬斥他为一位政治上的无知者,对他的党无用。

他放弃了政治,决定用诗来辩护他的主张。于他发表处女讲演后12天,《蔡尔德·哈罗德的朝圣之旅》的前二篇就公开发表了。几乎是空前的成功——第1版(500本)在3天内销售一空——鼓励了作者信心,他已找到了较辩论演说更要持久的一种媒介。此时,他作了得意洋洋的评论:“我一早醒来,发现自己已名满天

下。”<sup>⑧</sup>纵使是他在《爱丁堡评论》上的旧仇家都赞扬他，感激之余，他送了一封道歉信给杰弗里，为他在《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上对他的刺伤道歉。

此时，几乎每一家庭都欢迎他；几乎每一位出色的女主人都邀约他；有上打的妇女，倾慕他的俊秀面孔，徘徊在他的左右，希望用她们的各种媚态，捕捉住这只幼狮。她们不因他登徒子的声名而吓走，而他的贵族头衔对那些不知道他负债累累的人似乎是一项珍贵的奖品。他享受着她们的注视，她们神秘焕发的容光早就使他神魂颠倒了。“在女人们前面，”他说：“有一些东西令我软酥酥的——一些奇怪的印象，纵使没有与她们在恋爱中也是如此——我无法说明这些事，对于性实在没有什么高论。”<sup>⑨</sup>纵然他长于怀疑，他却一而再地拜倒在每一个健美的女人所对于每一个健美的男人的磁力之前。

他最早征服者中的一人是卡罗琳·蓝伯夫人(Lady Caroline Lamb, 1785—1828年)。贝斯区(Bessborough)第三代伯爵的掌珠，她于20岁时嫁了墨尔本侯爵和夫人(Lord and Lady Melbourne)的次子威廉·拉姆(Willeam Lamb)。于读完了《蔡尔德·哈罗德的朝圣之旅》后，她决定要见见这位作者；但是，当一见到他时，她就以“认识他为一位危险人物”吓得立刻掉头而去。这种拒绝竟刺激了他；当她们重逢时，“他恳求我准他看我。”他去了。她比他长3岁，早已作了母亲；但是她刻意装扮了一番，她是一笔巨大财富的女继承人。他又去了，以后几乎每日都去。忙于自己业务的丈夫，把他当做英国的意大利式大情人般来接待他。她对他越来越着迷；公开或打扮成一名书僮模样去到他的房间中；她写给他热情洋溢的情书。有一个时候，他的情绪随她的而变动，直到他提议和她私奔时为止；<sup>⑩</sup>但是，当她的母亲和丈夫带她到爱尔兰去时(1812年9月)，他就知难而退，不久就与奥克斯福德夫人(Lady Oxford)鱼雁往返起来了。

在这些兴奋的事情中,拜伦仍锲而不舍地写出一系列有关东方的冒险、暴乱和爱情故事的优美诗篇。它们不佯装为伟大的作品;它们是罗曼蒂克的想像,是诗人在阿尔巴尼亚、艾比鲁斯和希腊旅行中的回声,它们不要求作者和读者花工夫去思考,而销售得十分良好。1813年3月首先出版 *The Giaour* 1卷;不久,12月中,出版《阿拜多斯的新娘》(*The Bride of Abydos*),这1卷1个月中就售完6000册;更要好的是(1814年元月)出版的 *The Corsair* 1卷,这1卷在出书之日就卖掉1万本,打破了其他各卷之纪录;然后是(1815年)拉娜(*Lara*)和(1816年)《柯林特之围》(*The Siege of Corinth*)。出版商结算收入,送给拜伦一份版税,自负为一位贵族的拜伦,拒收对他的诗的一切支付。

纵然当他筹思这些目无法纪的故事时,作者却也厌倦起他的无法无天的生活了。直到他耗尽他的健康、享受的特权和基金,而不可能追逐女人时为止。他和霍布豪斯曾立誓避免结婚而去成为精神和肉体的一名囚徒;此时,他怀疑婚姻不一定是一项阻止欲望的方法,如不节制欲望,非但可能扰乱个人,并且还会扰乱社会自身。他感到,他也许为了稳定和宁静或为了比他破落的修道院可能提供的更要有保障的收入而终于放弃了自由。

安娜贝拉·米尔班克(*Annabella Milbanke*)似乎符合他的所有要求。她美丽、有教养,并且是一笔殷实财富的独生女。当他于1812年3月25日,在她的姑妈墨尔本夫人的家里初次邂逅她时,他就已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的容貌娇小而女性化,却不很端正。她有可能想像得到的细腻皮肤。她的身材和她的高度十分配合,她具有朴素谦和的态度,……十分令我欣赏。”<sup>⑨</sup>他没有和她说话,因为各人都等着对方先抬起话头之故。但是,她也很有兴趣,因为在她的日记和信中,她花了一些时间来分析他的个性:“精神矍烁,……不做作,爱恨形于色……。热诚而独立……。据说,他是一位不信神的人,而我认为,那也许是由于他的心智之通常特性之故。

他的诗(《蔡尔德·哈罗德的朝圣之旅》)足可证明他能有崇高的感受,但是,他却贬抑自己的善良个性。”<sup>19</sup>这是一种颇有领悟的措辞;也许在她认为设法从他的感觉中挽救这个善感的人,释去他的羞怯感,同时附带地,从那些因他的狼藉声名而发狂的妇女中俘掳这只伦敦的幼狮,虽然危险,却是何等有趣呢!

数月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期间,卡罗琳·蓝伯夫人仍然主宰着这局面。接着,那种热情因爱尔兰海峡而冷却了;而于1812年9月13日,拜伦写给墨尔本夫人一封在他生命中打开一个致命方向的怪信:“我发现,我竟一直并且至死不渝,爱着……一个我从来没有谈过很多话,却时常出现在我眼前的人;……要不是这档(蓝伯)事件介入,我是冀望要娶的一个人……我指的这个女人是米尔班克小姐……。我从没见过一个我如此尊敬的女人了。”<sup>20</sup>喜不自胜的墨尔本夫人告诉了她的侄女关于拜伦的自由,并问她愿否考虑这一提议。10月12日,米尔班克小姐寄了一封回信给大名鼎鼎的塔莱朗:

相信他决不是令我在家庭生活中愉快的那种强烈感情的目标,从任何角度,纵使是间接的,肯定他目前的印象,我就会错估了他。从我对他行为的有限度观察上看,我很容易相信你有利于他的强烈见证,我更愿意将此归因于我自己感受的缺点甚于他的个性,我不准备回报他的依恋。我因这种陈述给予人的痛苦而十分遗憾外,我不得不将我们的未来交给他去作判断。除了不情愿欺骗他的恐惧外,我是没有理由从一位令我感到荣幸并教导我如此多理性的乐趣的知己前退却的。<sup>21</sup>

对这位有学养而诚实的女士没有感到任何迫切需要的拜伦,对这种拒绝处之泰然,并且首先就在奥克斯福德伯爵夫人,接着是

弗兰西斯·韦伯斯特夫人(Lady Frances Webster),并且同时从他的同父异母的姊姊奥古斯塔·利的怀里找到了安慰。生于1783年,她比她同父异母的弟弟长5岁。她目前(1813年)已与她的大表哥,乔治·利上校(Colonel George Leigh)结婚6年,且已生了3个孩子。就在这个关键上,她从她剑桥郡的六里厝(Six Mile Bottom, Cambridgeshire)的家来到伦敦,要求拜伦给予因她的丈夫长期在赛马上输钱而导致的困难上予以帮助。拜伦不可能给他很多,因为他的收入不稳定,但是他以热诚的谈话来取悦她,并且发现她是一个女人。

她当时已30岁;并没有如巴尔扎克所赞扬的女性的妩媚,因为她缺乏知识背景和爽朗的个性;但是,她亲切、随和,也许对她弟弟的声名有一点敬畏,愿意给他她所能给予的一切。她和他的长期分隔,加上丈夫的忽视,使得她在情绪上很轻松。率然抛弃了不符合他年轻理性的试验之任何道德禁忌的拜伦,奇怪他为什么不能如法老们一般和他的姊姊发生交媾。后来的发展指出,他不久就与奥古斯塔·阿达发生了性关系。<sup>④</sup>1813年8月,他想带她一起去地中海航行。<sup>⑤</sup>那个计划失败了,但是,1月中,他带她到纽斯台的修道院去。1814年4月15日,当奥古斯塔生下一女婴时,拜伦写信给墨尔本夫人说:“如果它是一只短尾猿,那一定是我的不是了”;这孩子梅度瑞·利(Medora Leigh)自己相信是他的女儿。<sup>⑥</sup>5月中,他送给奥古斯塔3000镑去清偿她丈夫的债务。7月中,他和她在墨斯廷斯(Hastings)。8月中,他带她到他的修道院。

当他与他的同父异母姊姊的感情愈陷愈深时,米尔班克小姐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他,信上日渐加浓的诚挚促使他在1813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写下:

昨天,安娜贝拉寄来一封动人的信,我回了她一封。  
我们间是一段何等古怪的处境和友谊啊!——两方面都



没有一丝爱情的火花。……她是一位非常不平凡的女人，一点没有娇生惯养的习惯，在一位女继承人——一位20岁的女孩子——自己就是一位女贵族——一位独生女，经常有着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位女学者的身上，是很奇怪的。她是一位女诗人——一位数学家，一位形而上学者，而且，十分仁慈，慷慨和温柔，毫不装腔作势。任何人有她的学识，和她十分之一的幸福都会掉头而去了。<sup>④</sup>

似乎她读过这篇惊人的赞辞似的，她在1814年的信件变得更加温柔了，使他相信，她心中坦荡，要求他的照片，并且以“挚诚地”字样来签名。陶醉在她的温情洋溢的书信中，他于8月10日写给她：“我自认识你迄今一直爱着你。”她回答说她正因为陶醉在哲学、诗和历史中，不适宜于结婚。<sup>⑤</sup>对于这种挑逗的反应，他于9月9日，如在棋赛中一般，心平气和地向她提出第二度的求婚。如果她再度拒绝，他计划和霍布豪斯一起到意大利去。她接受了。

他接近了命运的转折点：一方面害怕他会失去他已习惯了的友谊、性和观念上的自由；一方面希望婚姻能将他从纠缠不清的危险和可耻的联盟中解救出来。他对朋友们解释说：“当然，我一定要改正，彻底地改正……。她是如此善良的一个人。”而对他的未婚妻则说：“但愿我能变好……。我愿成为你喜欢要我成为的那种人。”<sup>⑥</sup>她虔诚地接受了她的任务。大约于1814年10月4日，她写给埃米莉·米尔纳(Emily Milner)的信上说：

拜伦爵士的真正个性，不必要到广漠的世界中去寻找，只询问最接近他的那些人就可以了——他曾安慰过的那些不幸的人，他祝福过的穷人，和他曾是他们最好的主人的依附他的人们。就他的消沉意志，我担心近两年来，我回答得太多了。我有一份宁静深沉的安全感——对

上帝和人类的一份信心。<sup>⑤</sup>

当拜伦要前往在西翰姆(Seaham, 靠近窦尔翰; Durham)的安娜贝拉家, 向她提议结婚的时间到来时, 他的勇气消沉了。他滞留在奥古斯塔·阿达的家里, 在那里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未婚妻, 要解除婚约。奥古斯塔·阿达劝他毁去这封信, 接受结婚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约束。<sup>⑥</sup>10月29日, 他和霍布豪斯继续前往西翰姆, 霍布豪斯在日记中记着: “情人从来就很少不是性急的。”新郎发现新娘的家族很热诚, 他以最佳的风度去取悦他们, 1815年1月2日, 就带她踏上了结婚礼堂。

#### 第四节 婚姻试验时期的拜伦

(公元1815—1816年)

婚礼完毕后, 在一个阴暗的冬日, 他们乘马车前往窦尔翰近郊的霍那比邸第(Halnaby Hall)去渡蜜月。他此时快要满27岁, 她正好23岁。他过了8年多不责任和几乎是杂交的生活, 并且几乎不曾有过有爱情的交媾。根据穆尔的报告上说, 他在拜伦的回忆录中见到(1824年时毁掉), 这位丈夫等不及到晚上就开始他们的圆房了; 他“在他们结婚当天的晚餐前, 就让拜伦夫人躺到沙发上。”<sup>⑦</sup>晚餐后, 如果我们信任他的记忆的话, 他问她是否愿意和他睡在同一张床上, 并且补充说: “我痛恨和任何女人睡在一起, 不过, 如果你作此选择, 你有此权利。”<sup>⑧</sup>他与她共宿, 但是, 他后来告诉霍布豪斯, 在那个新婚的初夜, “他突然有一阵落寞孤凄的感觉, 就离开了他的床。”次日, (太太声称) “他冷漠地和我相对, 懊丧地

说：“此时已太迟了；已经做了的，不能再挽回了。”<sup>④</sup>奥古斯塔·利的一封信递到了他的手里；他读给安娜贝拉听信上的称呼：“最亲爱的，顶尖的和绝妙的人。”<sup>⑤</sup>依照太太的记忆，她抱怨说：“如果我早两年嫁给他，我就会免除他可能令他终生不能宽恕自己的那档事了。他说他要告诉我，但是，那是另一个人的秘密……。我问……。如果——（奥古斯塔·阿达）知道了。他显得很害怕。”<sup>⑥</sup>不过，安娜贝拉在这个时候似乎不怀疑奥古斯塔·阿达。

在霍那比邸第3周后，这对新婚夫妇回到西翰姆与米尔班克家人住在一起。拜伦自我适应，与每一个人，包括太太在内，都相处得很融洽。这样过了6周后，他开始渴望起伦敦的刺激生活和朋友们的欢笑了。安娜贝拉同意了。在伦敦，他们安顿在毕卡第莱高地（Piccadilly Terrace）13号的豪华套房内。在他们到达的当天，霍布豪斯来看他们，拜伦恢复了他的风趣和幽默。“有10天时间”，他的太太回忆着：“他比我所曾见过的还要慈祥。”<sup>⑦</sup>也许是为了感激，或是害怕寂寞之故吧，她邀请奥古斯塔·阿达·阿黛和他们共渡一些时间。奥古斯塔·阿达·阿黛于1815年4月中前来，一直逗留到6月。6月20日，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美国的西班牙文学史家，拜访这个新家，对拜伦的行为提出了一篇十分友善的报告。在那次机会上，安娜贝拉的一位叔伯带着拿破仑在滑铁卢被击败的消息，愉快地走进来。“我对此深感抱歉。”拜伦说。

他重新拾起写诗的工作。1815年4月，他和两位犹太作曲家一起出版了《希伯来歌谣集》（Hebrew Melodies），由他们两人作曲，他填词。这本合作集子，尽管定价很高，不久卖掉了1万册。默里就诗篇单独出了一个单行本，销路也很不错。10月中，拜伦完成了《柯林特之围》诗集；拜伦夫人替印刷商誊清了一份抄本。“安娜贝拉，”拜伦告诉布莱辛顿夫人（Lady Blessington）：“具有我从未见过可与之匹敌的一种自制力……。这种自制力在我身上产生了一种相反的效果。”<sup>⑧</sup>

他就易怒的脾气有些遗憾。他卖掉了纽斯台的修道院，他和太太住进昂贵的公寓，并且在生活上十分奢侈豪华；这笔买卖相当失败；拜伦发现自己受到包围。1815年11月，一名执行官进入公寓，查封了一些家具，并威胁着直到拜伦付清账单，不然就要在那里过夜。拜伦感到，安娜贝拉的富有父母，应该对这个新家的花费慷慨地赠予才是。

他的忧愁甚至连他的温柔气质都感染上了忧郁的神气。“如果有任何女人能使我对婚姻持久下去，”他告诉太太：“那就最好了。”然而，“我相信你会继续爱着我，直到我打你时为止。”当她表示出他会知道爱她的希望和信心时，他却重复着说：“目前已太迟了。如果你两年前嫁我……但是，毁掉我将要得到的一切是我的命运。”<sup>⑧</sup>于获得在 the Drury Lane 剧团的管理委员会的一个位置后，他与谢里登和其他人士常在一起痛饮作乐，并且还和一名女演员同床共枕。<sup>⑨</sup>安娜贝拉请求奥古斯塔·阿达再度前来，协助她来制服他；奥古斯塔·阿达·阿黛（于1815年11月15日）来了，痛责弟弟，却发现自己与安娜贝拉一样成了他暴怒下的牺牲者。“奥古斯塔·阿达十分怜悯她的弟妹。”<sup>⑩</sup>

在那几个艰苦的月份里，拜伦夫人正好身怀六甲。1815年12月10日，她生下一女婴，取名奥古斯塔·阿达(Augusta Ada)——后来，就仅称阿黛。拜伦高兴了，显得很钟爱这个婴孩，自然也就很喜欢母亲了。“我的太太，”他在那个月中告诉霍布豪斯：“是完美的典型——是最好的有生命动物。但是，记住我所说的——毋结婚。”<sup>⑪</sup>阿黛生下后不久，他又依然如故了。在一次发怒时，他将一只自他童年起就戴着的珍贵手表丢入壁炉中，然后用火钳把它捣碎。<sup>⑫</sup>1816年1月3日，依照安娜贝拉向她父亲的说明，拜伦走进她的房间中，以“十分褻渎的口气”大谈他和剧团里女人们的丑事。1月8日，她邀请马修·贝利博士(Dr. Matthew Baillie)诊察拜伦的精神状态；他来了，观察这位受到管束的诗人，却婉辞提出意见。

显然地，拜伦同意安娜贝拉应该带了孩子一起住在她母亲米尔班克夫人，娘家姓氏为尼尔(Lady Mil Bankenee Noel)的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柯比市的(Kirkby)尼尔宅邸上一段日子。15日一早，当拜伦还在熟睡中时，她就带了阿黛离开了。在沃本市(Woburn)，她停下来寄了一封奇怪、却也是令人心动的忠告短函：

亲爱的 B：孩子十分健康，是旅客中最健康的一个。我希望你如意，并记住我的祈祷和劝告。不要将自己置于可怕的写诗这一行上——也不要喝酒——更不要自弃于不法和胡作非为上去。虽然，我不由自主地写信给你，愿我能在柯比听到你的佳音。阿黛爱你，还有我。

Pip<sup>®</sup>到了柯比，她再度写信，幽默而热情地告诉他，她的父母期待着见到他。同一天，她也写信给奥古斯塔·阿达·阿黛(她仍然和拜伦在一起)，信中附上米尔班克夫人建议她应该用三夸特水冲淡拜伦的鸦片烟酊。

慢慢地，然后是原原本本地，安娜贝拉告诉父母，从她的观点看，拜伦是如何对待她的。惊骇之余，他们坚持她和丈夫分居。米尔班克夫人匆匆赶到伦敦，与曾观察过拜伦行为的一名医务检察员磋商；如果她能取得拜伦精神病的证据，这桩婚事就可毋须拜伦的同意而撤销。检察员报告称，他看不出这位诗人的精神病症状；不过，却听到一些神经崩溃的说法，如当拜伦在对埃德蒙·基恩的表演狂热喝彩时爆发痉挛症等等。安娜贝拉写了一封信提醒母亲，不要将奥古斯塔·利牵涉在这件事情中，因为奥古斯塔·阿达是“我最信赖的朋友……。我十分耽心许多人也许就会认为她是分居的原因，那是一种残酷不义之举。”<sup>④</sup>

1816年2月2日，安娜贝拉的父亲，拉尔夫·米尔班克爵士

(Sir Ralph Milbanke), 写给拜伦合意离异的建议。诗人礼貌地回信说, 他找不出为什么最会写给他亲亲蜜蜜信的太太突然间 180 度大转变的理由。他写信给安娜贝拉, 问她是否在自由意志之下同意她父亲的行为。她被他的信感动得“痛苦莫名”, 但是她的双亲不让她回信。奥古斯塔·阿达也写了希望重新考虑的请求; 对这封信安娜贝拉回了: “我只是唤起拜伦爵士他声称对这种婚姻生活难以克服的心智上, 和自结婚之时起, 他曾经表示过因发现婚姻无法支持, 而还他自由的渴望和决定。”<sup>⑩</sup>

1月12日, 霍布豪斯去看拜伦。一路上, 他听到伦敦社会上和文学圈中流传的一些街谈巷议, 暗示拜伦对太太残忍和不忠。下面引述霍布豪斯那天日记上的几个片断:

见到 L(指莱)夫人和乔治·B(拜伦, 诗人的堂兄弟), 从他们那里得知我所害怕的事却完全是事实, B 确曾犯下专横——残忍——暴怒——和忽视, 甚至如告诉太太他和另一位女人同居——……锁上门——拿出手枪……种种事情真正伤害到她的罪恶, 她(拜伦夫人)似乎相信他的确有罪——但是, 他们要离异——何故要说他是疯了昵……? 当我听到这些事情时, L 夫人走出来说, 她的弟弟在房间内哭得很伤心——可怜、可怜的伙伴……。

我目前认为告诉拜伦我已改变我的意见……是我的义务。当我告诉他, 我那天在街上听到的一切时, 他愕然了——他已听到他被指责为残忍, 酗酒和不忠于妻子了——我让他知道更多我在早晨时所听到的一切——他懊恼得无以名状——说他被毁掉了, 并且准备自杀……。有时则说: “不过, 他曾一度爱过我”, 有时则说, 他高兴除掉这样一个女人——他说, 如果我到国外去, 他就立刻离

婚。<sup>②</sup>

大约这个时候,拜伦接到一张他为自己和太太买马车的 2000 镑账单。他身边只有 150 镑现款,无法偿还这笔债务;然而,以他那种不瞻前顾后的慷慨个性,大约在 1816 年 2 月 16 日,他送了 100 镑给科尔里奇。

2 月 22 日,安娜贝拉来到伦敦,给了斯蒂芬·勒欣顿博士(Dr. Stephen Lushington)依他的判断足够供离婚开支的一笔钱。在那一周中,街谈巷议提到利夫人,并谴责拜伦的鸡奸行为。他领略到进一步拒绝合议分居会遭致判决分居的结果,那样奥古斯塔·阿达·阿黛就无可避免地被毁掉了。3 月 9 日,他同意了,并且放弃每年带给这一对夫妇 1000 镑收入的他太太财产上的一切权利;她同意每年以这笔总数的一半付给他。她公开承诺与奥古斯塔·阿达·阿黛重续友谊,并且她也维持那种承诺。她没有寻求离婚。

分居后不久,他赋了一首诗——“愿您平安,纵使成永诀——仍愿您平安”——并且送给了她。一群朋友——霍布豪斯、斯克罗普·戴维斯(Scrope Davies)、利·亨特、塞缪尔·罗吉斯、霍兰爵士(Lord Holland)、本杰明·康斯坦特(Benjamin Constant)——到他的套房去劝他忘记这段不幸的婚姻。一名不速之客,戈德温的继女克莱尔·克莱尔蒙特(Claire Clairmont),带来了一位旗鼓相当的诗人珀西·雪莱的赞美,并且献出自己作为他创伤的镇痛剂。他接受了她的奉献,也打开了一连串的忧伤。1816 年 4 月 25 日,带着 3 名仆人和 1 名私人医生,他向奥斯坦(Ostend)扬帆而去,从此就没有再见过英格兰。

## 第五节 雪莱的青年时期

(公元 1792—1811 年)

珀西因为祖父比希·雪莱爵士(Sir Bysshe Shelley)“对三位太太处置得十分得体”而大加赞赏；尤有甚者，“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他将一切希望都建立在泡影上。”<sup>①</sup>比希爵士的不寻常的“教”名取自他祖母的侍婢之名字。他有一长串的家谱，(如拜伦一样)他的谱系可追溯到诺曼征服者上去；在那样卓越的门第中，一名雪莱因支持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而被吊死，另一位则因为密谋杀害伊莉莎白一世。比希爵士与第二位太太私奔，埋掉了她而了事，又与第三位太太私奔，她是菲利普·悉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的后裔。她的财产扩大了丈夫的产权，并且于 1806 年协助他取得从男爵爵位。他活到 83 岁，使得他的子孙们十分烦恼。他的长子是蒂莫西·雪莱(Timothy Shelley)，读完牛津进入国会，他在国会中隶属于温和自由的民权派。1791 年，他娶了伊莉莎白·皮尔福为妻(Elizabeth Pilfold)——一位风华绝代，脾气暴躁，和信奉不可知论的女人<sup>②</sup>这一切都重现在她的长子身上。

珀西·比希·雪莱于 1792 年 8 月 4 日，生于以菲尔德市(Field Place)闻名的家族产业上——靠近萨塞克斯(Sussex)荷善的一栋宽敞的家宅邸第中。以后接连生了 4 个妹妹，最后又生了 1 个弟弟。珀西完全在妹妹群中长大；他也许从她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温柔、兴奋和想像的习惯，并且身为长兄，他养成了一种强烈的感情。

在伊顿小学时，他从替旧生服义服劳动上使自尊心遭到伤害



的痛楚。除了划船外,他避免大部分运动;要命的,他支从来没有学会游泳。他不久在拉丁文上有优异表现,并且因帮助他们的功课,将欺负他的学生变成了朋友。他的课外读物包括许多神秘和恐怖故事,但他也赞赏留克利希阿斯的“回返自然”(Lucretius' *De rerum natura*)一书的唯物主义,普林尼的《博物史》(Pliny's *Natural History*)的科学,孔多塞的《心智进化一览表大纲》(Condorcet's *Sketch of a Tableau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的乐观主义,和戈德温的《政治正义质疑》之哲学的虚无主义。这本书,也后来写着:“把我的心智带向新奇和更要广阔的观点上去;它确实影响了我的个性;我从熟读此书,变成了一个更聪明、更善良的人……我认为我有义务去履行。”<sup>⑥</sup>

假期中,他在16岁时就和时常到菲尔德市来玩的表妹哈丽雅特·格罗夫(Harriet Grove)恋爱了。他们开始鱼雁往返,结果促使他们于1809年相互保证永世忠诚不渝。但是,他向她坦白承认他对上帝的怀疑,她将他的不可知论的信拿给她的父亲看,他就劝她放弃珀西。当1811年1月中,哈丽雅特移情别恋威廉·赫利尔(Wiliam Helyer)时,雪莱写给他的朋友托马斯·杰弗逊·霍格(Thomas Jefferson Hogg)一封值得拜伦的最勇敢之英雄们称道的信:“她不再是我的了,她如一位自然神教信徒般憎恨我,就如她原先的面貌一般。啊!基督徒,当我原谅了你最后、最严厉的虐待时,愿上帝(果真有上帝的话)轰掉我!……自杀是不对吗?昨晚我伴着一支上了膛的手枪和一些毒药一起睡觉,但是,却没有死。”<sup>⑦</sup>

同时(1810年),他从伊顿小学进入牛津的大学院。除了一两个试探性的晚上外,他避免那里对大多数学生认为步入成人期所必须的课程之性的尝试。<sup>⑧</sup>他时常聆听研究生们的讲演,他们在拉丁文和希腊文上只比他略胜一筹;他不久就能作拉丁诗了,他从来不忘怀埃斯库罗斯(Aeschylus)。他的宿舍内散乱地堆置着书籍和稿本,和业余科学的胡言乱语;在一次实验中,他几乎炸掉他的房

间。他信任科学能重造世界和人类。他不关心历史，和接受伏尔泰和吉本历史主要是人类罪行和愚蠢之记录的铭言；不过，他很喜欢读这两位怀疑大师的作品。他认为他从留克利希阿斯及《哲学》(Philosophes)一书中已找到了对宇宙之谜的答案了：宇宙是遵照必须的律则之一组原子的舞台。接着他发现了斯宾诺莎，并解释他为一位认物质和精神为一种神圣实有之两面的一元之二元论者——一切物质中具有一种似精神的东西，一切精神的外面都有一种如物质的东西围裹着。他贪婪地阅读。

他的同班同学霍格描述他为“随时一卷在手；在餐桌边，在床上，特别是走路时……不但在牛津……在大街上，而且是在伦敦最拥挤的通衢大道上……都在阅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贪婪地阅读的一双眼睛了。”<sup>①</sup>如果不是一边吃一边读的话，吃饭似乎对他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如果只想让观念的吸收少分心的话，最简单的食物就是最好的食物。他尚未成为一位蔬食主义者，不过，一只口袋里装着面包，另一只口袋里葡萄干，对他似乎是一顿相当美好的食物了。不过，他爱吃甜食，喜欢在姜饼面包上加蜜，和在白开水中掺点酒进去。<sup>②</sup>

在牛津的日子，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高个、瘦长的身材，满脑袋紧张，理论和论点，衣着随便，头发蓬松；衬衫没有硬领，在喉咙处敞开着；面孔几乎娟秀得有些女性化；一双眼很晶莹但游移不定；态度迟呆却很礼貌。他具有诗人的气质，每一根神经末梢都很过敏，感觉新奇，易于接受混乱的观念，但对历史极端讨厌。他有诗人的道德规范；自然地，着重个人自由，疑忌社会制约。霍格报告说，当他们在雪莱的房间中的那些晚上，彼此读诗和哲学给对方听，诋毁法律和教义，交换一些意见直到凌晨2点钟，并且经常获得一致同意的一点意见即没有上帝，真是太奇妙了。

在那个主题上，这两个年轻的叛徒，同意一次他们定名为《无神论之必要》(The Necessity of Atheism)的合作。那个词汇为当时

的文明社会所排斥的；怀疑主义的仕绅们自称为自然神论者，相对地称上帝为一种不可知的精神，其生命和精神承自自然。雪莱自己后来就得到这种观点；但是，出于年轻人的勇气和不计后果之故，这两位作者自称为无神论者并对禁忌的一种挑激和唤起注意。这篇文章的论点是，既不是我们的感觉，也不是理性，更不是历史，显示有一位上帝之存在。感觉只显示物质依照法则在运动。理性拒斥一位造物主从无中创造出宇宙的理念。历史提不出神圣行为的例子，也没有一位神人在地球上出现过。两位作者没有署上他们的名字，但是，在书名页上，题上：“由于证据不足，一位无神论者。”

1811年2月9日的牛津大学城《前锋杂志》(The Oxford University and City Herald)刊登了这本小册子的一则广告。小册子在2月13日出现，雪莱立刻将这本小册子的一些本子放在一家牛津书店的橱窗中或柜台上。约翰·沃克牧师(The Reverend John Walker)，新学院(New College)研究员，看到了这种陈列品，就要求书商毁去他所有的这些本子；这些本子就悉数毁掉了。同时，雪莱将这本小册子送给许多主教，和数位大学的重要人物。<sup>⑧</sup>其中一人将这本小册子带给大学院的院长和研究员。这群人于3月25日召唤雪莱到他们面前。他去了，给他看了这本小册子，问他是不是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他拒绝回答，并提出了思想和出版自由的请求。他受到翌日一早离开牛津的警告。听到此讯，霍格供认自己是作者之一，要求相同的处分；求仁得仁。中午时，一份学院的公报披露了雪莱和霍格“因为在回答一些问题上倔强顽抗”已勒令停学。私底下，院长托人带讯给雪莱，如果在这样匆促中离校有困难，申请宽延数日应予照准。这对短筒未受到注意。3月26日，雪莱和霍格自负地坐在两轮马车的顶上前往伦敦去了。

## 第六节 雪莱的私奔(一)

(公元 1811—1812 年)

他们住在波兰街(Poland Street)15号的套房里。雪莱的父亲,因为国会的一次会议而适在伦敦,去到他们住的地方,要求他们放弃他们的观点。发现雪莱不为所动,他就命雪莱如摆脱一位邪恶的影响者般摆脱霍格,回到家里去,留在那里“受我指定的绅士的管束,倾听他的教导和指示。”雪莱拒绝了。父亲在愤怒和绝望中离去。他了解雪莱的才干,希望他接受国会中的一个光荣的位置。霍格则到约克去学习法律。不久,雪莱的钱用罄了。当时在伦敦的克拉珀姆区(Clapham district)的芬宁太太的学校(Mrs. Fenning's School)读书的妹妹们将私房钱送给他用。5月中,父亲软下来了,同意每年津贴他 200 英镑。

他的妹妹在克拉珀姆的同学当中,16岁的哈丽雅特·韦斯特布鲁克(Harriet Westbrook),是格罗夫诺广场(Grosvenor Square)一家酒馆的殷实主人的女儿。当她遇到珀西时,她对他的门第,流畅的语言,研究的范围,他引人入胜的观点讶异不已。她不久就同意上帝已经死了,法律是多余的累赘。她以激动的心情读着他借给她的这些反叛的书籍,和从来不曾听说过基督的那种奇妙文明的翻译之经典名著。她邀请他到家里去。“我消磨大部份时间在韦斯特布鲁克小姐的家里”,雪莱于 1811 年 5 月写给霍格:“她正在阅读伏尔泰的《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sup>⑥</sup>当她的同学们发现她的奇怪朋友是一位无神论者时,她们就把她当作散发出地狱气味一般来抵制她。当他和她通讯的证据被抓到时,她就被

开除了。

8月初旬,雪莱向霍格报告称:“她的父亲全力以迫使她到学校去的最恐怖方法来虐待她。她征求我的忠告:我回答她抵抗;同时,我试图修正韦斯特布鲁克(Westbrook)先生的虚荣!在我忠告的结果下,她投入我的保护之下。”<sup>④</sup>后来他回忆这种结果时说:“她显然地倾心于我了,并且害怕我对她不倾心……。避免进一步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我答应我和她的命运接合为一体。”<sup>⑤</sup>显然地,他提议一种自由恋爱式的结合;她拒绝了;他提议结婚,她同意了。她的父亲不答应。8月25日,小俩口私奔了,乘了一辆二轮马车到爱丁堡,在那里的苏格兰教会仪式下结为夫妻(1811年8月28日)。她的父亲屈服在既成事实之下,给予她每年200镑的年金。她的姊姊埃莉萨(Eliza)来到约克郡和她同住,(雪莱自认在实际事务上一窍不通),负责处理这个新家庭的财务。“埃莉萨,”他报告称:“为了安全之故,将我们的公共钱财放在一些洞里,或她衣服的角落里”,并且“当我们需要时就挖出来。”<sup>⑥</sup>在埃莉萨的主持下,雪莱并不十分快乐,但是,却享受着哈丽雅特的温柔和体贴。“我的妻子,”他后来写信给戈德温说:“是我思想和感受的合伙人。”<sup>⑦</sup>

当雪莱前往伦敦去安抚他的父亲时,哈丽雅特和埃莉萨就呆在约克郡,霍格住在她们附近。雪莱先生于听到这段私奔的消息时,就停止了他的津贴;现在他又重新给予这笔津贴,不过,告诉儿子从此不准进入家门。回到了约克,雪莱发现他可敬的朋友霍格企图勾引哈丽雅特。她对丈夫没有提起这档事,但是,霍格坦白供认,并得到了宽恕,就离开了。11月中,这3个人前往凯西克,雪莱在那里结识了骚塞。“这里,”骚塞写着(1812年1月4日):“是一个在我的身上发生如我的影子一般作为的人。他正是1794年时的我……。我告诉他,我们间的不同是他才19岁,而我37岁。”<sup>⑧</sup>雪莱发现骚塞温和慷慨,并且以愉快的心情读着这位长者的诗。几天后,他写着:“我此时不认为骚塞如我过去所认为的那样崇高了。在他

的家里见他……他表现得煦煦温和……是不得不承认的。他毕竟被这个世界腐蚀，被习俗感染了；当我想到他以往的风采时就使我心情不宁。”<sup>⑥</sup>

他在阅读戈德温的《政治正义后疑》一书时发现了一些安慰。当他知道这位一度名满英伦的哲学家目前生活贫困落魄时，他写给他一封表示崇拜的信：

我已将你的名字记在过往伟人的名单中。我深感遗憾你的过去光荣从我们这个地球上消逝了。结果不然。你依然在人间，并且，我坚信，正在筹划人类的福利。我正进入人类运作的舞台上，但是，我的感受和我的理性却与你已往的种种心心相印……。我正当年轻；我勤奋地在哲学和真理中摸索……。当我到伦敦时，我会去找你。我深信我献给你的友谊不会使你认为是毫无价值可言的。

再见。我热诚地等着你的回信。<sup>⑦</sup>

戈德温的回信遗失了；但是，我们从他 1812 年 3 月份的信上，也许能判断出它的要旨：“就我能对你个性之洞悉上看，我想像它是一种非常可爱性质之集合体，不是全无半点瑕疵的。从这一源头——你依然年轻，并且，在某些基本观点上，你并不充分领悟到你是如此的——这些缺点就在运作，并且时常是主要的缺点。”他劝告雪莱不要发表各种激烈的感情，如果他发表一些东西时，不要印上他的名字。“做这种（发表和签署）的一个人的生命将是一连串的撤消。”<sup>⑧</sup>

雪莱因为保存一些稿本，或一些私自印行的作品——他的第一本重要的作品《马伯仙后》(Queen Mab)——早就已经实施这种限制了。“这本书是我在 18 岁时写的——我敢说是在一种激烈的情绪下写的——但是……不准备要出版的。”<sup>⑨</sup>1810 年，他依然对

法国的哲学充满着热情；他用伏尔泰的愤怒名言“可耻的不名誉！”(Écrasez l'infame)来序他的诗集；他从伏尔纳(Volney)的《毁灭，帝国革命沉思录》(1791年)上借用了许多观念。

这首诗的开头，是侍婢杨莎(Ianthe)睡着了。在梦中，仙后马伯从天上来到她身边，带她飞上星星，要求她从那种景致上，默察地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个接一个帝国——埃及、巴美拉(Palmyra)、犹太(Judea)、希腊、罗马……直到现在，一一在她面前出现，仙后勾勒出一位国王(显然是摄政王子)的形象，他是“最贪婪者的一位奴隶。”<sup>⑧</sup>她奇怪没有一个当他享乐宴饮时却忍饥挨饿的受害人“举起手来把他从王座上推下来”，她补充上一句目前已出名的结语说：

有德

之人不命令，也不服从。

权力，像一场荒凉的瘟疫

污染它所碰到的一切东西。<sup>⑨</sup>

仙后也不喜欢商业和亚当·史密斯：“人类的和谐和愉快屈服于国家的财富”；“一切东西都可出售，甚至爱情。”<sup>⑩</sup>她描述一位无神论者被焚死的事；这件事吓着了杨莎；仙后向她保证“世上没有上帝”来安慰她。<sup>⑪</sup>阿哈秀鲁斯(Ahasuerus)，流浪的犹太人，进来了，严责创世纪的上帝，因一位女人的不智举动，数千年来惩罚几十亿男人、女人和小孩。<sup>⑫</sup>(拜伦也许在此处替他的《该隐》(Cain)一诗找到一些暗示，雪莱曾送给他私自印行的一册)最后，仙后描述一幅绮丽的远景：爱情不受法律约束，监狱空空，并且亦无此必要，妓女成了历史的陈迹，死亡没有痛苦。然后，她叫杨莎返回地球，去传播博爱的福音，和对胜利不变的信心，杨莎苏醒过来。——尽管它有少年人的思想，和有时有些夸张的体裁，它是一首很有气魄的

诗；无论如何，对一个 18 岁的孩子来说，是一首了不起的作品。得到诗人的同意，当《马伯仙后》于 1821 年发表时，英格兰的激进派人士当做他们的悲叹和梦想一般来欢迎它。不出 20 年，由盗印的图书公司共出版了 14 版。<sup>⑥</sup>

在爱尔兰逗留的时期（1812 年 2 月—3 月），他在那里以大公无私的气概，同时为天主教和新教的运动而工作之后，雪莱和哈丽雅特就去到威尔士。受到那里贫穷的压迫，他们去伦敦替威尔士的慈善机构筹募基金。他利用此一机会去向戈德温表达了敬意，戈德温和他甚为相投，两家之间此后就经常你来我往。于再度回到爱尔兰和威尔士作了短期访问后；这小俩口就定居在伦敦。1814 年 3 月 24 日，为了保障他们可能有的儿子和继承人的合法地位，他们在那里又重新结婚，这一次是依照国教仪式举行的。前一些时候，当她生日那天，他对她朗诵一首诗重新表明他的誓言：

哈丽雅特！且让死神解消一切人间的纽带；  
但是，我们的岂是人间世的！……  
道德和爱情；永不变的刚毅，  
自由，奉献和纯洁！  
我将神圣的生命献给你。<sup>⑦</sup>

## 第七节 雪莱的私奔（二）

（公元 1812—1816 年）

他的整个流浪生涯中，雪莱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赚取自己



的生活所需的。也许是他接受了沃兹沃思的“一位许身于诗国的诗人，应当从可能窒息他自液中的诗才的劳动或其他关怀中解脱出来”的观点吧。他看不出在他的共和国之下，权利平等的宣传和他努力取得他的祖父遗赠给他父亲的财富上，他的应有份之间有什么矛盾之处。他靠销售“遗产继承状”(post-obits)给放贷者来增加父亲给予的年金收入；所以，1813年时，他以可望获得的2000英镑的遗产继承来质押600英镑的现款。

放贷者也许因为他孱弱的身体和不断发作的疾病受到鼓励吧。他身体左侧经常痛楚(他的第二位太太报告)“使得他的神经变得极其过敏，以致使得他的生命观不同于那些沐浴在健康意识中的人们。在态度上十分文雅和坚忍，他却忍受着莫大的过敏感，或者可说是兴奋，而他忍受的毅力几乎经常是在一种紧张状态上。”<sup>⑧</sup>

他认为他可以用素食来缓和他的痛楚。他的这一希望从约翰·牛顿(John Newton)的《回返自然》(Return to Nature)，或《素食摄生法辩护状》(Defence of a Vegetable Regimen, 1811年)描写的实验证实他的看法。1812年时，他和哈丽雅特是公认的素食者。1813年，他对她所称的所谓“毕达哥拉斯制”异常热心，<sup>⑨</sup>他在《马伯仙后》一诗的注中插入了对每一读者的一个请求：

由于那是我们人类的希望中所珍视之故，我请求那些爱好愉快和真理的人对素食作一次公正的尝试！……不管这种实验在那里实试，采用素食和白开水的，在身体和心智上的病痛没有不减轻的。衰弱的机能慢慢地转变成力气，疾病变成壮健。<sup>⑩</sup>

在《自然饮食的辩护》(Vindication of Natural Diet, 1813年)中，他追溯人类的邪恶冲动，和大多数战争到肉食上去，并且请求

由商业和工业再回返到农业上去：

就饮食的自然制而论，我们不应当从印度输入香料，从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或麦地拉(Madeira)……输入酒类。在这一伟大改革中，应当采取领导立场的国家精神，应渐渐地转变为农业社会；商业和随之而来的一切邪恶、自私和腐化应慢慢地式微；只有更多的自然习惯才能产生更为温文的风度。<sup>①</sup>

环境上一连串奇怪的连锁事件导致他由素食主义而至于使他的第一次婚姻的破裂。由于他对约翰·牛顿的赞赏，他邂逅了牛顿的嫂嫂约翰·博因顿太太(Mrs. John Boynton)，一位素食者，共和主义者，尽管她满头白发，却风姿绰约并具有用两种语言来作文雅谈天的能力。1813年6月，哈丽雅特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婴，雪莱替她取名为杨莎(Ianthe)；那年夏天，他和她们母女以及大姨子埃莉萨，搬到距伦敦30英里的一处风景明媚的布拉克内尔(Bracknell)。之后不久，博因顿太太也在那里弄了一栋房子，在她的周围聚拢了一批法国移民和英国的激进派人士，他们对政府和饮食的观点取悦了雪莱。他就经常留下哈丽雅特、杨莎和埃莉萨在一起，而到博因顿太太，她的朋友和她已婚的女儿群中去分享乐趣了。

他和太太的关系上起了几次阴影。他似乎在她的知识成长上感到某种程度的迟滞；她越来越贯注在孩子的身上，对政治漠不关心；不过，她已养成过舒适生活和穿漂亮服饰的喜好；部分是为了她之故，他买了一辆昂贵的马车。正在这个紧要关头(1813年5月26日)他接到了父亲的通知，除非他撤消他的无神论，并向牛津他就读的学院院长道歉，他就不让他继承遗产，并停止了一切经济上援助。指望着成年时(1813年8月4日)一笔为数不贖的遗赠，雪莱已将未来的收益作抵押而订立了债务契约。哈丽雅特和埃莉萨

很痛苦,显然认为巴黎未尚不是一个适当的去处。雪莱拒绝取消自己的主张,并继续光顾博因顿太太的聚会。戈德温送讯说,他正面临被债权人逮捕的命运,并且暗示他十分希望援助。1814年6月中,哈丽雅特和孩子搬到巴斯。明显地,指望丈夫不久到那里和她团聚。雪莱却去到伦敦,在舰队街(Fleet Street)租了一间房间,设法替戈德温筹款,并且几乎每日到这位哲学家在斯堪纳街(Skinner Street)的家中晚餐。他在那里邂逅了玛丽·戈德温。

她就是17年前因生育她而丧生的有才气却命运多舛的女权辩护人所生的孩子。玛丽的青春气息、灵敏的头脑,苍白而有思想的面孔,和她对雪莱毫不掩饰的崇拜,对这位只有21岁大的孩子诗人是太过份了。又一次受到怜悯和欲望的交织。他经常听到玛丽·吴史来克莱夫特和她的不平凡的书;眼前就是她的亲生女儿,她在严厉的后母管束下并不愉快,就经常独自一人坐在她母亲的墓旁。此时——雪莱感到——以她的敏感和智慧的双重遗传,具有比哈丽雅特更要敏锐的一个头脑和精神。不出一星期,他已处在他前未曾体验过的苦闷之中了。7月6日那天,他向戈德温提出向他女儿求婚的事。这位惊愕的哲学家责备他的新手为“放荡”,禁止他进入这栋房子,并将玛丽置于她后母的管束之下。<sup>②</sup>

之后不久,托马斯·洛夫·皮科克(Thomas Love Peacock)发现诗人在他的舰队街的房间中近乎精神错乱。“在他的要求下,当我从乡下来拜访他时……,无论我从故事或历史中所曾读到的,没有一种描写可以比我所发现他当时的情形更要可怕、狂乱、颠三倒四……和激动了。他的两眼满布血丝,他的头发和衣着凌乱。他抓起一瓶鸦片烟酊,并且说:‘我从来不曾离开过这个。’”<sup>③</sup>

纵然阻碍重重,雪莱安排和玛丽在她母亲的墓旁见面。他告诉她哈丽雅特与一位瑞安先生(Mr. Ryan)曾对他不忠诚过,以减少她的抗拒。<sup>④</sup>他继续好几次否认哈丽雅特目前抚养的孩子是合法的(后来他声称是他的孩子)。她否认他的指责;雪莱的朋友皮科

克、霍格、特里劳尼(Trelawny)和他的出版商胡卡姆(Hookham)替她撑腰；戈德温后来驳斥此事。<sup>⑨</sup>

雪莱写信给(仍然在巴斯)的哈丽雅特,要求她到伦敦来。她(于1814年7月14日)来了,住在她父亲的家里。诗人到那里去探望她,发现她病得叫人耽忧。他求她让他分居;她拒绝了。回到他的房间中时,他写给她一封热情的信,装出一些假惺惺的慈悲心肠:

我最亲爱的朋友:

诚因为我们间的谈话已使我筋疲力竭,并约定明天12时再和你见面,我仍然抑制不住而写信给你。

你的保证令我安详而更加愉快……。

就这一点,亲爱的哈丽雅特,从我内心深处,我在感激你。这也许是我所接受的许多祝福中最伟大的一次了,而依旧注定要投入你的怀抱中去。我焦急地盼望着黎明的曙光,以深挚而难以表达的憎恨注视着我自己的形象。我生活在来自你而从来没有欺骗的安慰和愉快的希望之中。

我重复(相信我,因为我是真诚的)一遍,我和你的柔情没有受到创伤:我想像这一次的经验获得甚至更要深厚和更要持久的感情,这一次的经验对异想天开或无情就较以前更少暴露了。我们的关系并不是感情和冲动的一种。友谊是它的根基,在这一根基上,它扩大了,也成长了。你从来没有用你的全部感情来填塞我的心胸,并不是对我的污蔑……。

我不更像是一位朋友吗?啊,何止是一位哥哥,你的孩子的父亲,他是我们俩的亲骨肉……啊!

如果你在我见到你之前,要到银行去提款,胡卡姆会

给你支票的。

再见了。带着我的小宝贝。我会因你之故一定永远爱她。

永远爱着你的

P·B·雪莱<sup>⑧</sup>

哈丽雅特于1814年11月20日写给凯瑟琳·纽金特(Catherine Nugent)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自己的说明：

……玛丽下决心要勾引他……。她以谈论她的母亲来加强他的想像，并且每天和他一起到她母亲的坟边，直到有一天，她告诉他，她爱他爱得要死……。为什么(玛丽问)我们不能够住在一起呢？我做他的妹妹，她做他的妻子呢？他蠢得竟相信这是可能的，就要求当时住在巴斯的我回来。你也许会猜得到在这种情形公开时我有何种感受了。之后，我整整躺了两星期。我不能替自己做些什么。他恳求我活下去……。我在你身边，敬爱的朋友，等待着另一个孩子降生到这个悲伤的世界中来。下月，我快要分娩时。他却不在我身边。

H·雪莱<sup>⑨</sup>

戈德温在1814年8月27日给约翰·泰勒(John Taylor)的一封信中说了一些详情：

我对他(雪莱)信任备至；我知道他易变的高洁情操；他是一个有妇之夫，与太太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已有3年

……。6月26日,星期日,他陪玛丽和她的妹妹简·克莱尔蒙特(Jane Clairmont)到玛丽母亲的坟上去……。似乎在那里勾引她,对我不忠实,并遗弃发妻……的激烈念头在他身上发作。7月6日,星期三……。他疯狂地对我泄露他的计划,并征求我的同意。我告诫他,……当时效果良好,他答应放弃他的放荡的爱情……。他们俩人欺瞒了我。27日晚上,玛丽和她的妹妹从家里逃走了;次晨,我找到一封信,告诉我他们干了些什么。<sup>⑨</sup>

简·克莱尔蒙特是玛丽唯一的一位异父异母的妹妹,是戈德温的第二任太太与前夫所生的女儿。起初取名为克拉拉·玛丽·雅姆(Clara Mary Jane),她较喜欢叫她克拉拉,稍后就变成了克莱尔(Clare)或克莱瑞(Claire)。生于1798年4月27日,此时她才年满16岁,正当及笄之年。有天赋并且慷慨,善感而自负,在一位忧心忡忡而易怒的母亲的权威,知过份负担、濒于破产边缘而吝于给她父爱的继父之下,她感到焦躁不安。她恳求玛丽和雪莱带她和他们同行。他们答应了,于1814年7月28日,这三个人从伦敦逃到多佛,然后,再到法兰西。

8月20日,这群游客到达卢塞恩(Lucerne)。在那里雪莱没有发现给他的信,也没有从伦敦汇钱来。他口袋里只剩下28镑。他悲戚地告诉他的同志,他必须赶回伦敦,解决他的财务问题。一番舟车劳顿,他们匆匆北赶,于1814年9月13日,他们又回到伦敦。此后20个月,躲躲藏藏以避开债主,同时到处借钱以养活自己,玛丽、克莱尔,和依旧拒绝见他,却欢迎汇去现款的戈德温。同时,哈丽雅特生下第二个孩子查尔斯(Charles);玛丽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威廉(william);而克莱尔则跳上了拜伦的床。最后,诗人的祖父去世,留给雪莱的父亲,当时的蒂莫西·雪莱爵士价值8万镑的财产。雪莱此时已是法定继承人,不过,他的父亲并不如此想。他提

出放弃他的权利,以交换终身享有每年 1000 英镑的年金;这种要求是同意了;雪莱保证每年 200 镑给哈丽雅特。1816 年 5 月 4 日,玛丽、威廉和克莱尔再度前往多佛和法兰西。9 天前,拜伦已“踢去他脚上的英格兰的灰尘了”。

## 第八节 拜伦和雪莱的瑞士假期

(公元 1816 年)

两位诗人分别选择瑞士(Switzerland)作为他们的避风港,日内瓦(Geneva)作为他们的行动中心。雪莱的一伙人于 5 月 15 日到达,寄宿在郊区塞奇龙(Sécheron)。拜伦和他的随从们则住在奥斯坦(Ostend)的一辆他花去 500 英镑,依照拿破仑曾使用过,并在热纳普(Genappe)俘获,作为滑铁卢战役战利品一部分的轿式大马车为模型而订造的豪华轿式大马车里;车内有一张床,一间书房和餐厅的各种设备。拜伦对战场和战场上的遗物作了一次特别的巡礼;也许是在布鲁塞尔的那晚,写成《蔡尔德·哈罗德的朝圣之旅》的第 3 篇中特别值得记忆的第 21 到第 28 各节。

后来在 5 月 25 日那天,他住进安格勒特大饭店(Hotel d'Angleterre),位于日内瓦中心之北方 1 英里处。旅馆登记员要求他写上他的年龄;他写了“100 岁”。克莱尔·克莱尔蒙特,于到达后正急切地要登记时,发现了这件事,就送给他一张便条,同情他的岁数,同时建议有一次约会。5 月 27 日,他在汽船登陆处邂逅了雪莱、玛丽和克莱尔;这是两位诗人的初次会面。拜伦已读过《马伯仙后》一诗,赞赏它的诗意,但就它的政治观点却礼貌地保持缄默;期望一位 24 岁的青年了解贵族政治的功效是太过份了——虽然

他们也许同意继承的权宜措施这一点上。最后，雪莱承认在诗艺上拜伦是他的前辈。

7月4日；雪莱在日内瓦湖(The Lake Geneva)南岸，距日内瓦2英里处的孟泰雷格莱市(Montallégre)租了一栋房子。7月7日，拜伦租下步行10分钟就到雪莱处的迪奥达第别墅(the Villa Diodati)。他们联合起来租了一艘小帆船，这两家时常一起在日内瓦湖上扬帆；或者在迪奥达第别墅作彻夜畅谈。6月14日那天，拜伦建议每人写一则鬼故事。他们尝试了；除了19岁的玛丽写出了19世纪的名著之一——《弗兰肯斯坦》，又名《近代的普罗米修斯》(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外，其余的人都坦认失败；该小说于1818年出版，有雪莱写的一篇序文。除了许许多多优点外，该书揭露了直到目前仍聚讼纷纭的两个问题：科学能创造生命吗？和科学能保持其创造善与恶的权力吗？

拜伦也建议他和雪莱乘着他们的小船作一次环湖之游，在历史上名胜处泊岸参观，特别是那几处因卢梭的《朱莉，新埃洛漪丝》一书而扬名的胜迹。雪莱同意了，虽然他仍然没有学会游泳。他们于6月22日，带着两名船夫出发，费了两天的时间到达(萨伏衣 Savoy, 公国内的)梅里叶(Meillerie)。他们徘徊在小说中受到朱里放逐的圣——普劳克斯(Saint-Preux)可能在石块上刻着她名字的地方。接着他们再度航行，两位诗人遭遇到一阵骤然而起的暴风雨；一个接一个的巨浪冲上船头进入舱内，几乎使船倾覆。拜伦后来回忆到这一情景时写着：“我脱下外套，使他也脱下了他的，并且抓住一支桨，告诉他，我认为……当我抓住他时，如果他不挣扎的话，我可以拯救他……。他以非常冷淡的语气回答说，他没有要被救的念头；我有足够自救的时间，并恳求不要麻烦我。”<sup>⑩</sup>

暴风雨停息了，诗人们上岸去息休，次晨一早，他们游历希永(Chillon)和受到洛桑公爵(the Duke of Lausanne)囚禁(1530—1536年)法兰西斯·戴·波内瓦(François de Bonnevard)的堡垒。



在克莱伦斯市(Clarens)——雪莱手中拿着卢梭的小说作为指引——两位诗人走遍作为法国浪漫主义的一处圣地而成名的这一地方。6月27日,他们在洛桑的奥基港(Ouchy, Port of Lausanne)停泊;那晚上,拜伦写了《希永的囚徒》一诗(The Prisoner of Chillon),并且草拟了《蔡尔德·哈罗德》诗中有关卢梭的各节。6月28日,两位诗人访问了吉本曾写出《罗马帝国兴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洛桑公爵的家。7月1日,两位流浪者回到孟泰雪格莱(Montallégre)和迪奥达第(Diodati)。以后两星期中,拜伦写作《蔡尔德·哈罗德的朝圣之旅》的第3篇,克莱尔·克莱尔蒙特替他誉写,直到此时,仍然认为是她一生中几次愉快时光之一。

不幸的际遇如影随形,是她的命运。她对拜伦的公然挚爱引起瑞士的物议到伤害这份挚爱的程度;物议指控说,两位诗人和两姊妹过着杂交的生活。有些好想像的人称拜伦和雪莱为魔鬼的化身;一位在瑞士旅行的英国女士当见到拜伦在斯塔埃尔夫人的科匹特沙龙(Mme. de Staël's Coppet salon)出现时竟晕了过去。<sup>⑥</sup>也许这种物议与拜伦决定终止与克莱尔的关系有关连。他要求雪莱不要再让她到迪奥达第别墅去。此时正怀着拜伦的孩子才3个月身孕的克莱尔请求准她作最后一次访问,却也被劝阻止了。

7月24日,雪莱带着克莱尔和玛丽到萨伏衣的沙莫尼克斯(Chamonix)去作一次旅行。他们在那天未能而于次日达成到墨一戴—格雷斯(Mer-de-Glace)的意图。返回瑞士后,他们停留在孟吞弗斯(Montenvers)的一座查托斯修道院内(Chartreuse monastery)。他在游客签名簿上因受到较他之前的虔诚访客的签名所恼怒——用希腊文写下:“我是一位人类的热爱者,一位民主党人,并且是一位无神论者(Eimi philanthropos demokratikos t'atheos te)。”<sup>⑦</sup>之后不久,当拜伦在同一地方停留时,他划去了无神论者(athos)一字,深怕此字在英格兰被用来对付雪莱。果如所

料。<sup>⑧</sup>

8月29日,雪莱、玛丽和克莱尔返回英格兰。拜伦交给雪莱《希永的囚徒》和《蔡尔德·哈罗德的朝圣之旅》的第3、第4两篇草稿,送给出版商约翰·默里。雪莱自己,忙于照顾玛丽和克莱尔,只带回去《对智慧美的礼赞》(Hymn to Intellectual Beauty)和《勃朗峰》:写于查蒙尼谷中的几行(即沙莫尼克斯)(Mount Blanc: Written in the Vale of Chamouni (Chamonix))颂歌。这首颂歌几乎与蜿蜒着的山坡流泻到墨一戴一格雷斯的冰溪同样莫测高深。雪莱发现他的印象既多而又杂乱,他不能给予任何清楚的表达;有时,他认为巍然耸立的山峰正发着沃兹沃思的自然神(Wordsworth's Nature God)的呼声,他跌回到全人类审判前的一阵无比冷漠的死寂感上去了。

《对智慧美的礼赞》也表示出受到沃兹沃思的一些影响,但是雪莱的《不朽之讽示》不久就消失了。他奇怪世界上为什么有黑暗与光明,邪恶和善良的对比。他梦想人类也许尚未受到广漠深邃的唯美意识所拯救,以及在思想和功业与肉体 and 形象上对美的追求之故:

我誓言,奉献我的力量  
给你和你的——我岂没有信守誓言?  
……却没有快乐缀上我的眉梢  
岂不与你将世界从黑暗奴役  
中释放出来有关么?  
你啊!永恒的爱啊,  
请给予这些字不能表达的意义吧。<sup>⑨</sup>

最后,沃兹沃思、拜伦和雪莱,要从自然中找到一位仁慈的朋友的意图,却在大自然的宁谧之前失败了。沃兹沃思向国教屈服;拜伦

和雪莱则绝望以终。

## 第九节 拜伦在威尼斯衰朽

(公元 1816—1818 年)

1816 年 9 月中,霍布豪斯从英格兰前来,与拜伦一起作了一次瑞士的阿尔卑斯山的扩大游历。10 月中,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他们在米兰(Milan)受到适当的接待;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尊敬拜伦为英格兰最伟大的当代诗人,并感激他明显的厌恶奥地利统治伦巴底(Lombardy)的态度。他在拉斯卡拉剧院(La Scala)租了一间包厢。司汤达(Stendhal)在那里见到他,欣喜若狂地描写他:“我被他的一双眼睛慑住了……。在我一生中,我从没有见过更要漂亮或更要富于表情的任何事物了。纵然在今天,如果我想到一位伟大的画师应给予一位天才的表情时,这颗高傲的头颅立刻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永远忘不了他脸上的神圣表情;它表现了权力和天才的肃默神情。”<sup>⑥</sup>

诗人和朋友于 1816 年 11 月 16 日到达威尼斯。霍布豪斯为了匆匆参观就离开了他,不久就去了罗马;拜伦则在圣马可广场(the Piazza San Marco)附近的一条边街上租了出租的房间,并且勾引了房东的太太玛丽安娜·塞加蒂(Marianna Segati)做情妇。纵然如此,他仍找出时间完成了《曼弗雷德》(Manfred)一诗,并(于 1818 年 9 月)开始写《唐胡安》诗稿,在这部诗中,从忧郁、浪漫、和任性的沉思写到嬉闹、幽默和现实的讽刺。

当然,曼弗雷德又是拜伦的化身,此时,乔装为一位住在一座哥德式堡垒里的一位忧郁的厌世者了。感到“缠绕着我灵魂上的一

阵强烈诅咒”，并反覆沉思着他的种种原罪，他从阿尔卑斯山上的兽窝中召唤来一群巫婆，并向她们要求一件礼物——遗忘。她们回答称，遗忘只与死亡同来。他爬上少女峰(Jungfrau：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峰，在瑞士南方)，并在一棵如闪电般的松树中看到了他自己的象征——“濒临一块顽石旁的一根光亮树干，给人有一种快要腐朽的感受。”他有意从一座峭壁上下跳寻死，一名猎户阻止了他，领他到山上的一间茅舍去，奉上一杯温暖的酒，并且询问他绝望的理由。把这杯酒当做血液的曼弗雷德以被认为是一种近亲相奸的坦白的文字来回答：

我说这是血液啊！这纯洁温暖的溪流  
流动在我祖先的血管里，和我们的，  
当我们在年轻时，有我们的心思，  
当我们不应爱时，却彼此深爱着；  
血液流走了；但依然升起，  
染红层云，断绝我的天堂路。

他羡慕猎户的自由和健壮的生命临危益厉，却朴质无华；希望

愉快的晚景和一座宁静的坟墓，  
绿草皮上放着十字架和花环  
以子孙的爱作为谀铭；  
这一点我已看见——然后，我看进内部——  
它已无关紧要——我的灵魂早已灼伤。

他给了猎户金子后，就走了。利用他不熟悉的科学，他召唤爱斯台特(Astarte)，他从她的身上看到了被禁止去爱的人儿。他祈求她原谅他——“爱斯台特，我的爱，对我说话啊！”——是拜伦式

感情和情操高度奔放的一种方式。如格烈弗游记中的卢加纳基人的大逆不道罪一般，他被谴责为不朽，并认为这是最可能的刑罚；他乞求她，用她的神秘力量，赐给他一份死亡的礼物。她安慰他说：“曼弗雷德，明天结束你的世俗生命。”一名随侍的女巫赞扬他的勇气：“他操纵着自己，痛苦地克服他的意志。若果他和我们在一起，他将是一个了不起的精灵。”在拜伦的作品中，密尔顿的撒旦又可见到在这里出现了。——对于在次日黄昏时，准备将他争回到基督怀抱中去的修道院长，曼弗雷德回答为时太晚了，并且加上：

这是地球上  
生命的一种程序，在青年时期却  
已衰老，未到中年已如枯木，  
并无如战死的暴力。

当曼弗雷德朝他的最后集合点出发时，修道院院长哀叹道：

是这么一个高贵的畜生；他  
有形成光荣元素的善良  
架构之一切元精；  
若果经过悉心地揉合。

好像要挑激这个世界去思索，对它最难以洞悉的怀疑此时已坦然招认了似的，拜伦把《曼弗雷德》送到英格兰，而默里于1817年6月16日出版了它。一周后，伦敦一家报纸的一篇评论呼吁停止对拜伦的一切同情，他“已将曼弗雷德着上他自己的个性特征……。曼弗雷德已自逐于社会之外，对一位放逐者我们的同情还有什么根据呢？已就违反最大叛乱罪中之一罪了。他已犯下近亲相奸罪哩！”<sup>②</sup>

1817年4月17日,拜伦离开威尼斯与在罗马的霍布豪斯盘桓1月。他因参观各地的博物院而耽误了他的行脚,但是,他看到了古罗马的大堆遗迹,并游览了庞贝(Pompeii)古城:“我成为废墟中的一件毁物,”蔡尔德·哈罗德说。<sup>⑤</sup>5月28日,他回到了威尼斯。

12月中,于多次尝试后,他成功地将纽斯台修道院及其土地买了9.45万英镑;他通知他在伦敦的银行家道格拉斯·金奈尔德(Douglas Kinnaird),清偿诗人的一切债务,并从剩余的款子中每年汇给他3300英镑;除了这笔收入外,他此时同意收受他的诗集的应得报酬。荷包充足了,他买下大运河(the Grand Canal)上豪华的Mocenigo宫。他和14位仆人,2只猴子,2头大型猛犬,和1名新交的情妇——玛加丽塔·柯尼(Margarita Cogni),当地一位银行家的漂亮太太——住在里面。他不是一夫一妻制的信徒;他自吹在威尼斯有过200名情妇。<sup>⑥</sup>1817年1月20日,他告诉金奈尔德称:“晚上我有时出去,总是恣纵在情欲中”;1818年5月9日,他写给这位银行家:“我拥有一个妓女世界。”<sup>⑦</sup>到仲夏时,他已不复有两年前由司汤达所描述的神圣了;他已发胖,头发转成灰色,看起来要比他的30岁年纪苍老一点。当雪莱和拜伦再度重逢时,发现他这副模样,惊讶不已。

## 第十节 雪莱家长

(公元1816—1818年)

1816年9月8日,雪莱、玛丽,他们的孩子威廉,孩子的瑞士籍保姆埃利泽·福吉(Elise Foggi)、和克莱尔·克莱尔蒙特一行

抵达英格兰。除了雪莱外，其他的人都去到巴斯；他赶到伦敦，期望在那里收到父亲汇来的500英镑汇款。一无所有；他就不能履行给予绝望的岳父300英镑的承诺。戈德温大怒；雪莱逃到在巴斯的不法配偶身边。

在那里，于9月26日和10月3日，玛丽接到同母异父的姊姊范妮·戈德温措词温和的两封信。1794年出生于法国，范妮是船长殷莱和玛丽·吴史东克莱夫特的私生女。戈德温娶她的母亲时，她就由戈德温收养。尽管他很和蔼，她在他的第二任妻子克莱尔蒙特太太照顾下并不快乐，她的信表示一颗温驯的灵魂，勇敢地背负起不幸的命运，不责备任何人，却怯生生地渴望着愉快。玛丽曾对她有过姊妹的情谊；但是，自从玛丽和克莱尔随着雪莱去后，范妮就失去了应付后母的保护了。当这对私奔者返回英格兰时，他们不稳定的经济状况没有勇气让他们邀请范妮和他们同住。10月12日，雪莱带给玛丽和克莱尔关于范妮去到斯旺西(Swansea)，独自隐居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用鸦片烟自杀的消息。

复仇三女神(the Furies)对雪莱毫不怜悯。在返回英格兰的路途上，他曾问起他仍然受到法律上束缚的太太的情况。他得悉她住在她父亲那里，并且每年有400英镑的固定收入。11月中，他想去看她，但是，消息传来，她已失踪了。1816年12月12日，《泰晤士报》上报道说，她的遗体在两天前从海德公园(Hyde Park)内的塞班丁湖(the Serpentine Lake)中发现了。

渴望着获得他由哈丽雅特所生的孩子——女儿杨莎和儿子查尔斯之监护权，雪莱匆忙办完他与玛丽间婚姻的合法化手续(1816年12月30日)。他要求抚养孩子的请求，在大法官厅经过3个月的拖延后，玛丽向他保证，她会“非常愉快地接受那两个心肝宝贝”——哈丽雅特的孩子——由她来悉心照顾的责任。但是哈丽雅特的父亲和姊姊则以雪莱是一位信誓旦旦的无神论者，和遗弃发妻，而与一名未婚妇人私奔，而不顾合法婚姻为理由来抗议雪莱的

申请；这一种人，他们辩称，不可能以适合英格兰生活方式的态度来抚养孩子长大的。法庭不准许从神学观点来论辩，但承认其他的理由，决定驳回雪莱的请求（1817年3月）。不过，法庭批准他有选择养父母的权利，他同意每年付出120镑作为他们的生活费。

当她丈夫在伦敦缠讼时，玛丽则照顾才只19岁的克莱尔，她（于1817年1月12日）生下一女，取名为阿莱格拉（Allegra）。自从离开瑞士，克莱尔给拜伦的信都没回音，不过，雪莱的倒是有回信的。想到拜伦决不会知道孩子的出生时，令这位母亲悲痛欲绝。雪莱请求拜伦的指示，特别小心强调阿莱格拉的漂亮。拜伦同意照顾并抚养这个孩子，要是她带到他那里去的话。玛丽因生产她的第二个取名为克拉拉·艾弗瑞娜（Clara Everina）的孩子（1817年9月）使事情弄杂了。母亲和孩子都身体孱弱；不久，大人们一致同意，这个家庭所需要的是意大利的温暖气候、天空和果实。1818年3月11日，他们横渡至法兰西，乘着 *Mal-de-mér* 马车，开始长途跋涉到米兰去。

在那里，雪莱送给拜伦一封邀请信，要他来看阿莱格拉。耽心这一行可能导致与克莱尔旧情复燃，拜伦拒绝了；他反而建议，她的保姆应带孩子到威尼斯去，如果收养计划证明为满意，孩子的母亲从此就可以随时去探访阿莱格拉。克莱尔勉强同意了。拜伦发现小女孩十分可爱而逗人喜欢，他带她进入他的宫中；但是阿莱格拉被他豢养的动物和妾侍们吓住了，拜伦不久请理查德·霍普纳（Richard Hoppner），不列颠的领事，和他的太太带孩子到他们的家去抚养。

听到这一消息，雪莱和克莱尔（留下玛丽和孩子们在卢卡“Lucca”）去到威尼斯，发现阿莱格拉受到合理的照料。拜伦热诚地接待雪莱，带他乘平底船到丽道（Lido），并且邀请他和他的全家，以及克莱尔和阿莱格拉，随心所欲地待在拜伦在依斯特的卡珀西尼（I Cappuccini, at Este）别墅中居住。玛丽带了孩子从卢卡赶来，



但是克拉拉·艾弗瑞娜在路上病了，死于威尼斯（1818年9月24日）。10月29日，逗留了1月后，他们辞别了阿莱格拉，前往南方的罗马去了。

## 第十一节 雪莱的巅峰时期

（公元1819—1821年）

在他抵达罗马（1819年）与他和拜伦在比萨（Pisa）重逢（1821年）之间，雪莱生命中的伟大事情就是他的诗。以前曾闪过过高洁的火花，如《马伯仙后》一诗中随时所见到的，以及如稍后在《奥济曼第阿斯》（Ozymandias, 1817年）一诗——一首思想精简和有惊人力量的十四行诗中所表现的。《尤金尼亚山丘中偶拾》（Lines Written in the Euganean Hills, 1818年）一诗就缺乏集中的思想和精雕细琢的格律，和《接近那不勒斯时沮丧中偶拾》（Lines Written in Dejection near Naples, 1818年）一诗，太顾影自怜，得不到安慰；一个人是不应当轻露他的忧愁的。但是，此时，在短短的3年中，出版了《自由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诗集：有《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致云雀》（To a Skylark）和《云》（The Cloud）诸诗，以及 Epipsychidion 和 Adonais 等诗集。我们不提及诗集 The Cenci（1819年），在这一集中，雪莱虽有些成就，却想以一则近亲相奸和谋杀的阴沉恐怖政事与约翰·伟伯斯特（John Webster）和其他的伊莉莎白时代的雅各宾派的戏剧家们争雄。

依照作者的序言，《自由的普罗米修斯》一诗是于1820年在罗马、卡拉卡拉的（Caracalla）巴哲斯（Baths）上面写成的。他以 The Cenci 一诗集来向伊莉莎白时代挑战；现在，他更鼓舞起勃勃雄心。

向希腊的诗人们挑衅了。在《不自由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戏剧中,埃斯库罗斯已揭示这位“先知”为一位背叛的泰坦神(Titan),因为泄露给人类太多有关智慧树的知识,被用铁链拴在高加索境内的一块石头上。依照传说,在这部戏曲失传的部份中,宙斯(Zeus)动了怜悯之心,就把普罗米修斯从石块和受了圣神之命令不断去啄这位英雄的肝,好像在怀疑一位背叛者的信心似的鹰那里释放出来。雪莱的“抒情诗剧”(他以此来称呼它)描写宙斯为一位顽固的旧式波旁皇族(Bourbon),就人类的不幸和地球的越轨应负其所应负之责任;普罗米修斯以一位牛津大学肄业生的那种热诚来摧毁他,并召唤了一些主教来为上帝送葬。接着,泰坦神哀叹不幸的灾祸时咒道:“我愿没有一种有生命的事物遭受到痛苦。”<sup>⑥</sup>他回到了他所选择的任务上去——将智慧和爱情带给全人类。欢欣的地球之灵向他欢呼:“就智慧和仁慈来说,你更像上帝。”<sup>⑦</sup>

整个第一幕,台词清晰动人,随侍诸神的唱词宏亮有力,间或点缀着精美的隐喻和抑扬顿挫的优美调子。但是,台词,不管是有神论或无神论的,并不是诗的精华;当台词引起听众过份的混乱时,颂歌就显得可厌,而抒情诗失去它们的诱惑力;无止境的美就变成无聊。许许多多雪莱的诗,虽感情澎湃却缺乏宁静感。当我们读下去时,我们意识到这些诗中的一些弱点,哀伤太多,鼓舞太少;太多感伤和缠绵的情态和句子(“我如瞬息即逝的朝露”,地球之灵说。)<sup>⑧</sup>这是用来雕饰一首抒情诗,却减缓一出戏剧的风格的一——顾名思义,戏剧应随动作而运动;一首“抒情诗剧”在语词上就是一种矛盾。

对照之下,《西风颂》(1819年)一诗令我们跃跃欲动,因为它的动人情感简炼成72行诗句。在这首诗中,雪莱的丰富韵律不产生重叠之现象;情态层叠,但是围绕着一个观念——即我们讨厌的冬天过后,接着就是百花齐放的春天。这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隐喻

不断出现在雪莱的诗中；当他的希望和梦想的世界眼看着在经验开始之前毁于一旦时，它支持着他。他祈祷着，他的理念如风前的飘零落叶般下坠时，也许透过“他的诗的活泼魔力”而保存和流传下去。结果就是这样。

那首快要臻于炉火纯青之境的《颂诗》，（雪莱告诉我们）是正好有一天，“在靠近佛罗伦斯（Florence）的阿诺（Arno）附近的一个森林中，当时正好有一阵大狂风……蒸发掉倾盆而下的秋雨时，构想并写成的”。<sup>④</sup>他为什么要离开罗马呢？部份是因为他想要使自己隔离起来，部份是因为他想要避开不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是一位不正经的无神论者的英国游客们之故。更清楚一点，是他和玛丽感伤他们只有4年生命的孩子威廉之死亡（1819年6月7日）。父母两人对于9个月中连续失去两个孩子的事，就从没有完全复原过来。虽然，雪莱只有27岁，他的棕发间却已呈现灰发。

于将威廉在罗马的英国公墓下葬后，这家人就此迁至来亨（Livorno，即英语上所称的Leghorn）。徘徊在那里的一座花园中，每当他走近时，见到群鸟惊惶飞散的情形，如任何一位诗人一般，雪莱就感到神伤。有一只鸟，当它起飞时的婉转鸣声，特别令他神往。回到房里，他以值得回味的六步格韵，填了《致云雀》的第一节。那些活泼的诗句丝丝符合韵律，每一行都有温馨的感受和具体的思想。

1819年10月2日，雪莱一家迁到佛罗伦斯，玛丽在那里生下她的第三个孩子，立刻取名为珀西（Percy）。在佛罗伦斯，克莱尔·克莱尔蒙特找到了一个女管家的职位，终于，解除了雪莱对她照顾的责任。1820年10月29日，他们全家住进比萨 Tre Palazzi 大饭店，他也许在那里经历了一生中最奇怪的冒险事业。

尽管他经常病痛缠身，他对性的敏感度却毫不逊色；当他发现一位女人，不仅漂亮，并且身世不幸时，对他就有加倍的吸引力。伊密莉亚·维维亚尼（Emilia Viviani）是一位家世很好人家的女孩，

在强制之下，被送进比萨附近的一座女修道院中去保护她的贞操，直到替她找到一位有钱的适合丈夫时为止。雪莱、玛丽，有时还有克莱尔，一起去看她，三个人都被她古典的容貌，谦和的态度和充满自信的纯朴所迷住了。诗人把她理想化了起来，使她成为他白日梦中的目标，并且写进了 *Epipsychidion* (致一颗可贵的灵魂?) 中，该诗于 1821 年用笔名发表的。有一些绝妙的句子：

我绝未想过，在我死前，看到  
这般完美的青春美人。伊密莉，  
我爱你；这世界没有什么藉口  
隐藏那份出自它的卑微爱情。  
我们俩人原自同母所生的一对孪生兄妹啊！  
也许，我的心灵借给另一个人，  
可能是她和你的一位妹妹的束缚  
将两束光融汇成一道永恒么！  
然而，如果一为合法，另一为真，  
这些名字，这般亲爱，不须污染，诚如原初，  
我离你多么遥远。啊，我！  
我非你；我是你的一部分。

因此，狂喜得难以自制

情人，妹妹！安琪儿！命运之御者  
在无垠而没有星光的路途上！啊，太迟了  
我的爱！啊！太快受到我膜拜  
在不朽的原野上  
我的灵应当最先膜拜你  
在一个神圣的地方呈显一份神圣。

很清楚,这位 28 岁的青年是处在一种偏向理想化的状况中;我们的法律和道德的确不能节制我们的腺脏;如果一个人是一位天才或是一位诗人,他一定从行为或艺术中去寻找发泄和纾解。在这一情形上,病况就会被震荡在荒谬和优异间的一首诗的治愈或赎救中了:

这一天到了,你将与我同飞……。  
一艘船此时正浮沉在港中  
一阵风正吹过山之眉

带他们到蔚蓝的爱琴海中的一座岛上;

这是一座存在于天国、空气、地球与海中间的小岛,  
摇曳着,悬在澄碧的宁静中……  
这座小岛和房子是我的,我立誓  
你成为这孤寂中的女主人

在那里,她是他的爱人,而他是她的

我们的呼吸交融,我们的胸紧贴  
我们的脉搏相和;我们的唇  
用语言以外的其他雄辩,腐蚀  
燃烧在中间的灵魂,沸腾  
在我们最内层细胞的来源,  
我们生命深处的源泉,混淆  
成感情的晶莹……  
我喘息,我下沉,我颤抖,我瘫痪!®

这可能就是“真正的雪莱吗？”可怜的玛丽，专心在她的宝贝珀西和自己的梦想上，有一度没有见到这些冗长的陈述。当这种异象消逝了；伊密莉亚出嫁了，（根据玛丽的说法）使得她的丈夫成为“一个恶魔”；<sup>⑧</sup>雪莱后悔他的调子优美的罪过，而玛丽以母性的理解力去滋润他的孤寂。

当他听到基特过世时（1821年2月23日），他却又写出更好的诗篇。他也许不太关心 *Endymion* 一诗，但是，《四季评论》以“野蛮的批评”来欢迎基特的毕生努力十分令他震怒，他召唤他们共同的缪司神鼓舞他写出一阙得体的挽歌。6月11日，他写信给他在伦敦的出版商：“*Adonais* 一诗已完成，你不久就可收到它。它为了迎合读者，绝少雕砌，但是，也许是我作品中最完美的一首了。”<sup>⑨</sup>他选择了近来拜伦在《蔡尔德·哈罗德的朝圣之旅》中使用，而更为优美的诗韵中最难之斯宾塞派（Spenserian）的章节，作为该诗的格式；他以一位雕刻家为朋友刻一座纪念碑的全付精神来写这首《安魂曲》；但是，严格的格律之要求，使得这55节诗产生了稍为从容一点就可以隐藏起来的一种雕琢的气氛。主题太快假定一篇评论杀死了基特，而哀悼者却问：“该隐的诅咒，燃烧在戳穿你天真的胸膛之人的头脑中么？”<sup>⑩</sup>但是验尸的结果，显示基特死于严重的肺结核。在最后一节中，雪莱欢迎自己的死亡，作为与这位不朽的死者的一种重聚的祝福：

一个活着，景物已全非；  
天堂的光世世永照，地球的阴影消逝；  
生命，如一个虹彩的玻璃圆顶，  
缀满白色的永恒光彩  
直到死神踏它成碎片——死亡  
倘使你愿意与你所寻找的同在！……

为何踌躇，为何掉头，为何萎缩，我的心啊？  
你的希望先你而去；从此地的种种事情上，  
它们分开了；你此时该走了吧！……  
这是 Adonais 的呼唤！啊！快去吧  
不再让生命分开死神能组合在一起的……。  
我来自漆黑、恐怖、遥远之处；  
同时，在天堂的最内层处化为灰烬  
Adonais 的灵魂，如一颗星，  
永恒居处的一缕烽烟。⑥

基特也许用他忘不了的几行诗来应和：

死了似乎较以前更充实  
午夜时无痛地停止生命，当你将你灵魂流向国外时，  
就是那样一种狂喜感。⑦

## 第十二节 拜伦的爱情与革命

(公元 1818—1821 年)

在他们的最后一次聚晤中，雪莱留下了许多有关拜伦的记忆——他的优雅风度，坦诚谈吐，慷慨的神态——和他与陪伴他的女人和娼妓下流杂交的显然满足感。“与他有染的意大利女人也许是月光底下最可卑的女人了……。拜伦与这群女人中最下等的一类，他的舟子从街上招呼来的一类很熟悉。他准许父母们为他们的女

儿和他谈价钱……。但是，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我认为他的泱泱大度便是证明。”<sup>⑨</sup>拜伦十分清楚他所抛弃的英国道德和风尚；英国的法律已不保护他，而他也拒斥英国的法律。他曾在1819年告诉一位朋友：“我对我在威尼斯所过的生活已经厌倦，很高兴能抛弃掉它。”<sup>⑩</sup>在特雷莎·圭乔利(Teresa Guiccioli)的协助、耐性和真诚下，他成功了。

他们于1819年4月，于她从罗马到威尼斯去访问时初次相遇。她时年19岁，娇小、可爱、虚荣，受过修道院的教育，心地善良，有感情。她的丈夫，亚历山德罗斯·奎乔利伯爵(Count Alessandro Guiccioli)，55岁，已结过两次婚，并且经常专心在事业上。当时的意大利上层阶级正流行一位妇人可有一位绅士仆从(a cavaliere servente)追随左右，经常在她周围赞美、取悦或护送她，获得亲她手作为补偿之机会——倘使他们能够谨慎，而丈夫又心有旁骛或厌倦时，还可有其他进一步行为的一个时期。有时会碰到一次决斗的危险，但是，有时丈夫会感激这种帮助，知趣地让出他的时间来。所以，这位女伯爵感到自由自在地就投入这位面孔俊美，谈话风趣和妩媚的跛脚英国人的怀中去了。或者照她后来的说法：

他高贵，漂亮的容貌、声调、风度，他身上上千的妩媚，使他如此不同，如此超越了我迄今为止所遇见的任何一个人，他不留给我最深厚的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自那晚起，在我留在威尼斯的往后这段期间，我们天天见面。<sup>⑪</sup>

那些无忧无虑的欢乐日子，当伯爵带特雷莎回到拉韦那(Ravenna)去时就终止了。拜伦给了她一些许诺。如1819年4月22日所记的：“我向你保证，你是我最后的激情。在我认识你之前，我感到对许多女人有兴趣，但从来没有只对一个女人过。现在，我



爱你；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女人值得我去爱了。”就我们所知，他信守了诺言。

6月1日，坐着他的“全副拿破仑式装备的车子”，他离开威尼斯前往拉韦那，成为一位追寻但丁遗物的游客。特雷莎欢迎他；伯爵也很满意；拜伦写信给朋友说：“他们在这里使爱情滋长、暗杀绝迹。”<sup>⑧</sup>他获准带泰瑞莎到（威尼斯南方7英里处）的拉米雷（La Mira）去，他在那里有一栋别墅；在那里，韵事更不受到阻止，甚至连特雷莎的痔疾都不能阻止。<sup>⑨</sup>阿莱格拉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使得这个团体令人欣羨。汤姆·穆尔翩然来临，此时从拜伦处接到《我的生命与冒险》（My Life and Adventure）的稿本，该稿于作者死后引起了一阵很大的骚动。

拜伦从拉米雷带特雷莎到威尼斯，她在那里和他一起住在 Mocenigo 宫。她的父亲在那里找到了她，并且——禁止拜伦同行——带她回到拉韦那。到达时，泰瑞莎就一病不起，伯爵匆忙又把她的情人请回来。拜伦来了（1819年12月24日），于流浪了一些日子后，就以一位付房租的房客身份，住进伯爵的宫殿的三楼上。他带到他的新居中去的有两只猫、六只狗、一只獾、一只秃鹰、一只温驯的乌鸦、一只猴子和一只狐狸。在这样复杂的生活中，他写了许多《唐胡安》诗篇，一些韵文，和在威尼斯共和国不能上演的戏剧，一出更值得上演的关于沙大那派路斯（Sardanapalus）的戏剧，并且，于1821年7月中，《该隐：一桩奇谭》（Cain: A Mystery）一稿，使得他的名字在英国造成憎恨。

一开始就出现亚当和夏娃，该隐和他的妹妹而又是太太的阿达（Adah），阿贝尔和他的妹妹而又是太太的齐拉（Zillah），正在准备对耶和华（Jehovah）奉献的牺牲和祈祷。该隐问了他的父母一些拜伦在学校时就已很迷惘的问题：上帝为什么要发明死？如果夏娃吃了智慧果，上帝为什么将这棵禁果树种在伊登园（the Garden of Eden）中如此明显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期望智识的欲望说成是一

种原罪呢？在处罚夏娃那一小点的贪吃上，万能的神为什么命令所有的活物以操劳作为他们的生命，死亡作为他们的命运呢？什么是死呢？（没有人曾见过）。当其余的人去干这一天的活时，该隐不屑地留下来在沉思。罗西弗（Lucifer；掌闪电者）出现了，如在密尔顿的诗中一般，控制了全场，自负地自称为

敢注视全能大独裁的  
永恒面孔，而告诉他——  
他的邪恶，并不算好的那些  
人中之一人。

阿达回来，央求该隐到田里去和他的亲戚们一起工作；他已经疏忽他当天应该作的工作；她替他做了这份工作。此时，她邀请他和她做爱一小时，然后休息。罗西弗以描写做爱为一种再生的诱惑来嘲笑她，并且预言，未来的辛苦、动乱、生老和病死所要肆虐的无所大众，归根究底，都是因为她的子宫……。该隐和阿贝尔准备他们的祭坛去了；阿贝尔奉上他初生的羊；该隐则奉上水果，但是，祈祷时，又再度问起为什么全能的神准许邪恶存在。阿贝尔供献的羊消失在直升入天国的熊熊火焰中……。该隐的祭坛被一阵狂风吹垮，将果子散落满地。愤怒中，他想毁掉阿贝尔的祭坛。阿贝尔抵抗；该隐打他；阿贝尔死了。亚当责骂夏娃为原罪之主要源泉；夏娃咒该隐；阿达替他求情：“不要骂他，母亲，他是我的哥哥、我的未婚夫。”亚当命该隐离开他们，不准再回来；阿达陪该隐放逐。由于阿贝尔无嗣，一切人类（拜伦结论）都是该隐的子孙，都遗传着发泄暴乱、谋杀和战争等神秘本能的特性。

该隐一诗有时似乎是一篇一个没有读过《传道书》（Ecclesiastes）的无神论的学童的一种蔑视上帝的散文；不过，有时这出戏剧几乎具有密尔顿式的力量。沃尔特·司各脱，是《怪谭》这出戏剧

受题献之人，称赞这一作品；而瞬间迷失了他的奥林匹克景色的歌德则说：“它的优美是我们不可能在世界上找到第二本可与它比拟的。”<sup>⑧</sup>在英格兰，出版遭受到一阵激烈的批评和恐怖……此处好像是另一个该隐，不，是一名可怕的谋杀者——抹杀了已经维系了近一千世代的信仰。默里警告拜伦，他因他的作品而读者正在急速下降。

对该隐的忠实妻子阿达的描写，给了拜伦个性上另一个温驯因素的证明；但是，他对阿莱格拉和她母亲的处置却显示了较为冷酷的一面。这个一度快乐的孩子，此时已4岁，由于与父母分居的距离而落落寡欢，她感到霍普纳夫妇渐渐对她厌倦。拜伦派人去接她到拉韦那；不过，他不想要她和他同住，而他在宫中的总管的不快神色几乎已表现出来了。一再寻思后，他就将她（于1821年3月1日）送进距罗马12英里路的巴尼亚卡瓦洛（Bagnacavallo）的一座女修道院中去。他认为，她在那里可以有人陪伴，不会妨碍他的行动，并且可以接受一些教育。这是一座天主教的修道院，也并不令他烦厌；相反的，他感到意大利是一个就是在通奸中的女人都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地方，一个女孩子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没有宗教信仰是一种悲剧。毕竟，如果一个人一定要成为一名基督徒，最好就诚心诚意，接受使徒的教义，望弥撒和了争诸圣的行谊，而成为一名天主教徒。“这是我的愿望，”他于1821年4月3日写着：“阿莱格拉应成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我认为那是最好的信仰。”<sup>⑨</sup>当阿莱格拉准备要结婚时，他愿意给她4000英镑的财产，她在找一位丈夫上就没有困难了。

这是拜伦的权宜措施，但是，当这消息传到克莱尔·克莱尔蒙特时，她激动地抗议，要求雪莱将这孩子带回到她的身边去。雪莱就去到拉韦那，看看阿莱格拉是如何被安排的。他于1821年8月6日到达那里，受到拜伦热诚的接待。他写给太太的信上说：“拜伦爵士健康良好，看到我甚为愉快。他已……完全康复，过着与威尼

斯时截然不同的生活。”<sup>⑧</sup>拜伦告诉他，政治状况不久迫使他要迁到佛罗伦斯或比萨去；他会带阿莱格拉和他同行，她就会接近她的母亲了。雪莱对此很满意，就将注意力转到更要直接影响他的一些事情上去了。

他得知阿莱格拉的护士埃莉泽(Elise, 他于1821年就被解雇)告诉霍普纳夫妇，他与阿莱格拉的母亲曾发生过秘密的性关系；克莱尔在佛罗伦斯曾生过他的孩子，他立即把孩子送到弃婴收容所中；而且，雪莱和克莱尔曾无耻地对待玛丽，他甚至打过她，使她快快不乐。这位受惊的诗人立刻写信给玛丽(8月7日)，要她写信给霍普纳夫妇，公开指责这些荒唐的杜撰；玛丽照办了，但是，先把信送给雪莱求得他的同意；他将信给拜伦看，显然要藉助他将信交给霍普纳。雪莱发现拜伦知道这些谣言，并且显然相信这些谣言时而感到失望了。这份珍贵的友谊开始冷淡，当拜伦从拉韦那迁到比萨，而将阿莱格拉留在女修道院中时，其冷淡就更趋严重。

这种改变是混合爱情和革命之结果。1820年7月，特雷莎的父亲——鲁杰罗·甘巴伯爵(Count Ruggero Gamba)，从居里(Curia)的教廷获得她与丈夫分居的同意状，并且以她与父母同住为条件，由丈夫支付她一笔定期赡养费。她立刻搬走了；而仍然住在奎乔利宫廷的拜伦，就变成了甘巴家的一位常客。他很高兴发现甘巴和他的儿子彼得罗(Pietro)是策划推翻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教皇在中部意大利的统治，和波旁家族在那不勒斯对两个西西里王国——即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统治的一个秘密组织卡宝纳利(Carbonari)的领袖，拜伦在《但丁的预言》(The Prophecy of Dante, 1819年)中曾经大声呼吁意大利人起来使自己从哈布斯堡(Hapsburg)或波旁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820年，奥地利密探怀疑他出钱购买军火交给卡宝纳利组织；并在拉韦那贴出暗杀他的悬赏令。<sup>⑨</sup>1821年2月24日，卡宝纳利的起义失败，其领袖们从奥地利，教皇或波旁王朝统治的意大利地区逃走。甘巴伯爵和他的

儿子逃到比萨；在拜伦的劝告下，特雷莎不久也和他们会面。1821年11月1日，拜伦也到了那里，就定居在阿诺的 Casa Lanfranchi 里边，雪莱早已替他在那里租下了豪华的套房。现在，他们的友谊要接受最后的试炼了。

### 第十三节 对 照

两位诗人此时都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年长的这一位仍然有一些《唐胡安》的章节要写；这些诗在其与英格兰的敌视上是十分辛辣的，纵合一位具有高卢人风味的人都能发现它们不太温和。《审判的意像》(The Vision of Judgment, 1821年10月)也是一首无情的讽刺诗，但是，骚塞先出版的《审判的意像》(A Vision of Judgment, 1821年4月)因称拜伦为英国诗坛上的“撒旦”派领袖而激起了反驳；拜伦用趣味和技巧来歼灭他。在这些最后的作品中，他已从浪漫自怜的《蔡尔德·哈罗德的朝圣之旅》的忧郁中抽身而出，而朝更古典的理性姿态和幽默上去判断所有——但是仍未见有谦和的态度。他的书信——特别是给默里的那些——表现一种较成熟的情操，因为那些信中，他的尖锐的词锋已由严格的自我节制而有所缓和，犹如他已发现了谦和打开了通向智慧的大门一般。

关于他的诗他是谦冲的。“在知识阶层上，我决不将诗或诗人排列于较高的层阶上。这也许看起来有点像装模作样，但这是我的真正意见……。我较喜欢行动的天才——战争、参议院，甚或是科学——甚于那些做白日梦者的一切投机取巧的作为。”<sup>⑧</sup>他赞扬雪莱为一位人物，但是，却认为他的诗是幼稚的狂想。他渴望着被评断

为一位人物犹过于一位诗人。他对自己的形象有一种痛苦的意识。他较喜欢骑着马去散步，因为他的左脚会分散对他俊脸的注意力。就营养来说，他的一生是介于尽量吃胖和减食使消瘦间的一种循环；所以，在1806年中，他5英尺8英寸半高的身材重194磅；到1812年时，他瘦到137磅；1818年时，他又胖到202磅。他对他在性方面的成就很自负，并将这方面的数字报告送给他的朋友们。他是一位性情中人；时常发脾气或失去自制。他的智力超群却不稳定；“当拜伦思考的当儿，”歌德说：“他是一个孩子。”<sup>⑩</sup>

在宗教上，他开始时像一位加尔文派教徒；在《蔡尔德·哈罗德的朝圣之旅》中，他以旧派新教徒的精神说教皇制就像“巴比伦(Babylon)的娼妓”。<sup>⑪</sup>二十几岁时，他读哲学，如斯宾诺莎一样，较喜欢休谟，并且宣称：“我不否认任何事物，但对每一件事都怀疑。”<sup>⑫</sup>1811年中，他写信给一位劝诱改宗的朋友说：“我对你的不朽没有什么可做的”；10年后，他写着：“就灵魂不朽，对我来说，是不容怀疑的。”<sup>⑬</sup>在意大利时，他和那里的气候和人民交织成一片，开始去思考天主教的一切了；当祈祷的钟声响起来时，他渴望着分享此时笼罩着全国每一个人的那份宁静气氛；“我时常希望，我要是一名天生的天主教徒多好。”<sup>⑭</sup>直到最后(1823年)，如在童年时一般，他大谈宿命和上帝。<sup>⑮</sup>

在青春期中，失去了他的宗教信仰，在文学或哲学中，找不到道德的系留处，他就没有了足以供他抵抗刺激的感受、情绪或欲望的支点。他的自由自在和灵活的智力，找到了屈从的理由，或他的脾气没有时间给予理由展示社会抑制的智慧。显然地，他抑制了他同性恋的倾向，用温暖和忠诚的友谊来满足它们；但是，他屈服于他姊姊的妩媚，而在《蔡尔德·哈罗德的朝圣之旅》中，他大胆地说出他爱着：

一只柔酥酥的乳房

它对他的约束力；其纽带之坚强  
甚于教堂对他的以往一切的联系。<sup>⑭</sup>

因为逾越了英国社会所准许的恣纵，或不能以优雅的态度隐藏这一切行为，因而遭到英国社会的指斥，他就向不列颠的“伪善”和“伪善的口吻”宣战。他讥讽上层阶级为“由两个有权的部落——厌烦者和受厌烦者——所形成的。”他谴责工厂所有主对劳工的利用；有时，他呼吁采取革命手段：

“上帝拯救国王吧！”以及诸王，  
如果他不拯救，我怀疑人类是否还愿长此下去。  
我想我听到一只小鸟在唱  
人民渐渐地更会坚强。……  
而民众  
最后都厌于模仿约伯……。  
我欣然说，“呸”，  
我岂会不领悟到，革命  
才能将这个地球从污烟瘴气中挽救出来。<sup>⑮</sup>

不过，再思之下，他对民主政治不感到有什么吸引力。他不信任群众，害怕革命曾带来比国王或国会还要糟糕的独裁制度。他看到由一个出生贵族血统的人来统治的一些德性，并且渴望着一个清静、理性、有训练和有能力的贵族政治出现。他从来不忘记自己就是一位爵爷；他不久就抑制了任何平等地位的主张；他知道在社会关系上，距离可以增加观念上的吸引力。

他对拿破仑的观点随着事物而改变了。直到波拿巴自行加冕为皇帝，并且以各种头衔来尊荣自己时为止，拜伦认他为一个国王和群众间最杰出的折衷。纵合有那些小丑的玩意，和那些对西班牙

和俄国有问题的侵略行为，拜伦为拿破仑祈祷打赢欧陆上各王室的联盟。他鄙视这位被打败的皇帝不自杀而是禅位的举动；但是，当拿破仑从埃尔巴(Elba)回来时，诗人复为他对抗联盟的胜利而祈祷。6年后，听到拿破仑死的消息时，他喟叹道：“他的覆亡是我脑袋上的重重一击。自那个时期起，我们是笨蛋的奴才。”

他是错误和德性的一种不可理解的混合。他在愤怒时，可以为粗鄙和残酷的事；通常他彬彬有礼，能体谅也能慷慨。他对贫困中的朋友毫不介意地施舍；对罗伯特·达拉斯(Robert Dallas)，他转移给他价值1000英镑的版权，另外1000英镑，使得法兰西斯·霍奇森(Francis Hodgson)免于破产的噩运。整整4年几乎每日见到他的特雷莎·圭乔利。在900余页的篇幅中，她描写他为一位真正的天使。<sup>⑩</sup>他远比科尔里奇更要像一位“受折磨的大天使”，他的肉体有遗传上的缺点，以胆大妄为和多产的诗篇来阐明和求得补偿，并且以强烈的反抗思想，致令老歌德称他为“我们这个世纪中最伟大的‘文学’奇才。”<sup>⑪</sup>

对照之下，雪莱是历史性片语所指陈的“无效的天使”。不完全是无效的；谁能说由他的魔咒式诗篇所散布的叶子，没有埋下成为宗教上容忍，妇女解放，科学在科技和哲学上的胜利，参政权的扩大，和使得19世纪成为一个“奇妙世纪”的国会之改革的种籽呢？

他实在是一位人类的天使。他具有一个身体，为屈服于生理上的需要，至少搞了两次私奔；更不必说到他与伊密莉亚·维维亚尼的韵事了。他的身体瘦弱、有病，背部经常痛楚。当然，对于外在和内在的刺激，他之出乎寻常的敏感，甚至过于拜伦。回忆一下他给克莱尔·克莱尔蒙特的信(1821年1月6日)：“你问我从那里寻找到我的乐趣。风、光、空气、和一朵花的范芳就能影响我不能自己的情绪。”

跟我们一样，他特别喜欢自己。他向戈德温坦白(1812年1月28日)：“我的自我中心似乎是无止境的。”<sup>⑫</sup>在接受玛丽·戈德温，



和要求太太哈丽雅特退居到一位妹妹一事上,他如任何其他的凡夫俗子一样喜欢他的欲望,并且在解释哈丽雅特在哲学和观念上不及玛丽与他契合时,更使他自己表白无遗。他对自己的诗是谦逊的,自认不及拜伦。在友谊上,他终生忠诚并能体谅别人。拜伦在向默里报告雪莱的死讯时写着:“你残酷地误解了雪莱,他无疑地是我所相知的人中最善良和最不自私的一个人。我从来不曾遇到过一个人在比较之下而不是一只禽兽的。”<sup>⑩</sup>霍格报告说:“这位诗人性情易变,常忘记约会和承诺,不管在什么时间和地点,经常会进入沉思的状况。”<sup>⑪</sup>一般人都认为他不务实际,但是他不很容易在金钱事务上受骗,在没有一番长期的挣扎后,他是不愿放弃遗产继承权的。

他过份紧张,以致不能成为一位很理性的思想者,太缺乏幽默感,以致不怀疑自己的观念。他经常的诱惑就是他的想像力;比起他为逃避现实而沉迷在白日梦中的理想国(Elysian Fields)之种种可以理喻的改革来,现实似乎是太可怕和太粗鄙了。他主张不要国王、律师和教士;在一个仍然以狩猎占优势的社会上,却改宗为素食主义者,并且将性爱从一切法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从人类的本质或人类生理的过去事实上,对这一切看不到有任何障碍存在。“雪莱相信,”他的可爱遗孀说:“只要人类不愿有邪恶存在,邪恶就不存在……。这一观念,他以炽烈的热情……激赏着。”<sup>⑫</sup>除了理想化希腊外,他几乎忽视了历史,就是对希腊,他也忽视了奴隶制之存在。

因为我们忘了死亡不曾允许他成熟,所以我们就夸张了雪莱的简朴。因为他们的早凋,拜伦和雪莱就成了我们的浪漫诗人,是英国浪漫运动的神;若他们活到60岁,他们也许就会变成保守的人民,也许在历史上就要比他们在浪漫时期中死去,所为他们争得的地位要略差一筹。

事实上,到28岁时,雪莱早已冷静到一种相当谦和的地位了。

1820年,他写了一篇名为《改革的哲学观点》(A Philosophical View of Reform)的相当有份量的文章,该文于一年后发表。“诗人和哲人,”他宣布:“是世界上不认其为存在而存在的立法家。”<sup>⑮</sup>诗人们,因为他们的想像,在许多荒谬中,想像蕴酿了新观念,可及时刺激起人们去实验和精研;哲人们,因为他们带给社会问题冷静的理性习惯和经年的参悟。就如拜伦和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类一般,雪莱因英格兰工厂中工人的状况,和马尔萨斯控制人口增加而任工资由供需律来调节——即由失业的人数去竞争少数工作机会——的残酷方法而激怒了。<sup>⑯</sup>他因为新教和天主教未能适用基督精神到贫富的关系上而公然指斥这两种宗教。<sup>⑰</sup>他提议用征收富人重税的方法来终止国债之年息所加于一般大众之沉重税赋负担。<sup>⑱</sup>他指出1689年到1819年间,人口的增加已改变了有投票权者和无投票权者间的比例,使得国会的选举操纵在极少数人的手里,实际上,人民更本就没有参政权。<sup>⑲</sup>他宽恕根深蒂固的贵族政治,因根植于法律和时间上之缘故,(也许着眼于未来的雪莱家族之故吧),他认可财富的温和移转手段;但是,他鄙视日趋兴起的工厂主,商人和财阀们的金元政治。<sup>⑳</sup>他唾弃马基亚维利政府免于道德约束的主张:“政治只有根据道德的原则而作为时才是健全的。事实上,它们是国家的道德。”<sup>㉑</sup>他主张“由一个国民会议来治理的一个共和国”,但是,如他的导师戈德温一般,反对暴乱的革命。<sup>㉒</sup>他辩护法国大革命,赞扬拿破仑执政(Napoleon Consul),唾弃拿破仑皇帝,悲欢法国在滑铁卢的失败。

雪莱的《诗辩》(Defence of Poetry),写于1821年,直到1840年,一直找不到一位出版商。这位自我放逐的诗人,在此处扬弃了哲人,宣扬诗人们才是“世界上最高的立法者。”<sup>㉓</sup>他曾在《自由的普罗米修斯》的序言里表达了这种温和的意见:“我们这个世代的伟大作家们,我们有理由认为,是一些对我们的社会状况无法想像的改变,或凝固这种社会状况的意见之辩护人和先驱。心智上的云

层正在放出它所聚拢的闪电，而制度和意见间的平衡目前正在回复，或有待于回复。”<sup>⑭</sup>现在，他加上：“我们自己的是在知识成就上的一个值得记忆的世纪，我们居住在这些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和戈德温）和诗人（歌德、席勒〔Schiller〕、沃兹沃思、科尔里奇、拜伦、雪莱）等人的中间，可说超越自最近一次为文明和宗教自由之全国性斗争的任何一人之成就之上的。”（1642年）<sup>⑮</sup>

比较起来，雪莱低估了科学开始担当重铸观念和制度的任务。他反对让科学进步，科学只是改良我们的工具，摧毁考虑到我们的目标的文学和哲学的发展。<sup>⑯</sup>所以，“不能减轻的计算功能的运作”，进一步增加了少数狡猾之徒的富裕，并且也增加了财富和权力的集中。<sup>⑰</sup>

雪莱的不满于他第二任岳父的经济波及到了戈德温的哲学上去了。重新发现了柏拉图时（他翻译过 Symposium 和 Ion 两篇文章），他对精神的解释从自然的观点进入到本质和生命的观点上去。他此时已怀疑理性的无所不能，并对无神论失去了热诚。当他快接近 30 岁时，他不再攻击超自然信仰；此时，他认为，十分像年轻时的沃兹沃思，本质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内在灵魂的外在形象。那里也许还有一种不朽的类型之存在；到他死时，在个人身上的这股精力，变成永不消灭的另一个形象。<sup>⑱</sup>

## 第十四节 比萨诗篇

（公元 1821—1822 年）

当拜伦到达比萨时，他几乎忘却他的性史，不过，如在《唐胡安》里海第插曲中偶然理想化的记忆则为一种例外，在比萨时，特

雷莎·圭乔利与拜伦住在一起,但是,其亲昵程度已不如从前;他大部分时间则消磨在他的朋友和雪莱的朋友们中间。他每周为他们安排了聚餐、讨论,十分怡然自得。雪莱也出席,在论辩中,他礼貌但却很坚定地坚守立场,但是,在开始喝烈酒之前,就溜之大吉。特雷莎为了充实她宁静的生活,就与玛丽·雪莱成为朋友,并阅读历史以维持与玛丽的智识兴趣。拜伦不赞成莎特雷的阅读,较赞成女子应以貌胜于智的观念。

他几乎已忘却阿莱格拉。她的母亲恳求玛丽·雪莱到佛罗伦斯去,加入她到拉韦那的计划,去诱拐女儿,带她到更适宜的气候和更扩大的生活领域中去。雪莱拒斥这种计划。接着传来消息说,在1822年4月20日,5岁的阿莱格拉在修道院中死于疟疾。这桩事在雪莱与拜伦间的友谊变成冷淡上占了一些份量。在这一年初春时,他写信给利·亨特说:“拜伦爵士个性中的特殊僻性使得我发现我与他的亲密友谊……令我无法容忍。我的至友,因此,我要向你坦诚吐露我的衷曲。”<sup>⑭</sup>

他设法隐藏他的不快,他曾劝拜伦邀请韩特来比萨编一份新杂志《自由》(The Liberal),这是拜伦和雪莱计划用来抵制保守的《四季评论》的。拜伦送给破产的韩特250英镑;韩特和家人从伦敦搭船,希望于1822年7月1日到达来亨(Leghorn)。雪莱答应去接他。

表面上,那重要一年的前6个月是两位诗人的一段愉快的时光。他们几乎每天一同骑马出去,在一个手枪俱乐部比赛打靶;雪莱几乎与拜伦的枪法不相上下。“我的健康,”他写信给皮科克说:“较前稍佳;我的忧虑稍微减轻;不过,无以弥补阮囊的羞涩,然而,它正日趋枯竭,十分像它的主人,更似乎像福图内特斯(Fortunatus)的荷包,时常空空的,却也不完全囊空如洗。”<sup>⑮</sup>1月中,拜伦的岳母去世,(尽管他与太太分居)留给他的财产每年可带给他3000英镑的额外收入。有了钱,他就在来亨替自己订造一艘

宽敞的游艇,指定约翰·特里劳尼为游艇艇长,命名该艇为玻利瓦尔(Bolivar)以纪念南美的革命家,并且邀请雪莱和他的新知爱德华·威廉姆斯(Edward Williams)和托马斯·梅德温(Thomas Medwin)和他一起以及甘巴家人在夏天来临时作一次海上旅行。雪莱和威廉斯共有一艘84英尺长,8英尺宽,以80镑代价建造的小帆船。特里劳尼命名它为唐胡安(Don Juan),玛丽替它改名为艾丽儿(Ariel)。④

期待着一次夏日航行,拜伦订下靠近来亨的迪普别墅(the Villa Dupuy)。雪莱和威廉斯则为他们的家人在距来亨北边40英里处,斯佩齐亚湾(the Bay of Spezia)沿岸租下靠近莱里奇(Lerici)的Casa Magni。1822年4月26日,雪莱家和威廉斯将他们的家人迁到Casa Magni等待着他们的帆船交货。

## 第十五节 雪莱的祭物

(公元1822年)

只有某些具有诗人的恍惚神情的人,才会选择这样寂寞的一个地方,或这样荒凉的一个环境作为渡假之去处。Casa Magni大得足可容纳两家的人,但是,它设备不齐,快接近破落的边缘。它三面受森林包围,正面则临大海,海浪有时直拍大门。“狂风于我们初到时欢呼我们,”玛丽·雪莱后来回忆着,而“土人们则比这个地方还要狂野。如果我们搁浅在南海中的一座岛屿上,我们也不会比这里更感到自己已远离在文明和幸福之外的。”⑤

5月12日,艾丽儿从热那亚(Genoa)到达。曾在海军中服役过的威廉姆斯,和仍然不能游泳的雪莱十分喜欢这艘帆船,有许多个

中午或黄昏沿着海岸扬帆。雪莱从来不曾如此愉快或如此健康过。有时，女人们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玛丽又怀孕了，并经常有病，同时因为她的丈夫不愿让她看到她父亲诉苦的信而怏怏不快。<sup>⑭</sup>

在家中或在船上时，雪莱写着他的最后一首诗《生命的胜利》(The Triumph of Life)，该诗在他最后一次航行时删减至 544 行。诗中没有一丝胜利的气氛，因为描述半数不同的人物类型，全都失败和腐朽，匆匆走向死亡。在 82 行上，卢梭的鬼魂冉冉升起，说明文明的愚昧；他指出历史上的名人——柏拉图、凯撒(Caesar)、康斯坦丁(Constantine)、伏尔泰和拿破仑——都同样疯狂地去追求财富或权力；并且建议，作为唯一的逃避之途的，便是回返到朴素和自然的生命上去。未到 30 岁，于 1822 年 6 月 18 日想到要自杀之后，雪莱写信给特里劳尼说

假如你遇见任何科学方面的人物，能制造氢氰酸(Prussic acid)，或烈性查仁油基，而你如果愿意替我弄到小量这种东西，我将感激不尽，没齿难忘……。我愿为此药物付出任何代价……。我不必告诉你目前我没有自杀的念头，但是，我坦白承认，掌握进入永恒安息处所之金匙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sup>⑮</sup>

也许是要协助他罹病的太太，雪莱从佛罗伦斯请来克莱尔·克莱尔蒙特，在 Casa Magni 消磨一个夏天。她于 6 月初到来，正好帮助玛丽渡过一次几乎送命的小产。6 月 22 日，雪莱，正濒临神经崩溃的边缘，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恶梦，使得他尖叫着从自己的房间跑到玛丽的房间去。

7 月 1 日，利·亨特和家人已到达热那亚的消息传到他们那里，并正准备搭乘当地的一艘客船离开热那亚到在来亨的拜伦那里去。急于要欢迎他的忠诚朋友，减轻拜伦对他的接待，和增强他

的伙伴对他们的新杂志日趋冷却的兴趣，雪莱决定立刻和威廉姆斯乘着他们的艾丽儿到来亨去。玛丽有出乱子的预感。“我两次三番叫雪莱回来……。当他走远去时，我失声痛哭。”<sup>⑧</sup>

艾丽儿于7月1日中午离开 Casa Magni，当晚9时安全抵达来亨。雪莱兴高彩烈地欢迎韩特；但是，当得知突斯坎(Tuscan)当局下令甘巴家立即离开他们的辖区时不禁又沮丧了，而拜伦，决定要追随特雷莎，正计划不久离开来亨，到在热那亚的她那边去。不过，拜伦同意尊重他与韩特的合约，并且让韩特家人占住他在比萨的 Casa Lanfranchi 套房。雪莱陪他们到比萨，见到他们安顿了后，于7月7日再回到来亨。

7月8日，星期一，他整个上午花在为 Casa Magni 的家人采购上。威廉姆斯督促他快一点，以便乘着当时正吹向莱里奇的顺风扬帆。玻利瓦尔的游艇船长罗伯茨(Roberts)预测那天中午有一阵暴风雨，劝告他们迟一天启航；威廉姆斯督促立刻开船；雪莱同意了；大约那天中午一点半时，艾丽儿载着雪莱、威廉姆斯和一名年轻的水手查尔斯·维维安(Charles Vivian)从来亨启航。

约莫当晚6时30分钟的光景，一阵挟带着雷、风和雨的暴风雨，降到斯佩齐亚湾，数百艘船匆匆入港。在 Casa Magni，暴风雨十分严重，三位妇人焦急地守候着，以两位丈夫会在来亨等暴风雨过后再回来的结论来安慰自己。然而，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过去了。“那些时刻的真正痛苦，”玛丽后来写着：“超越最有想像力的人历来所描写的一切虚构故事之上。我们的孤居，附近村落居民的野蛮本质，和我们直接所面临的狂涛怒海，结合起来带给我们每天在企盼的生活上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sup>⑨</sup>星期五，接到了韩特寄给雪莱的一封信，其中几行带给等待中的妇人们恐怖的消息：“请告诉我们，你们是如何到家的，据他们说，你们于星期一启航后遇到了坏天气。我们心急如焚。”简·威廉斯和玛丽坐了一天车赶到比萨。午夜时，她们到达 Casa Lanfranchi，发现拜伦和亨特都在，并且

证实雪莱和威廉斯于星期一离开来亨。他们坐了整夜车子，于7月13日，星期六凌晨2点钟到达来亨。在那里，特里劳尼和罗伯茨企图以艾丽儿可能被吹向科西嘉(Corsica)或埃尔巴来安抚她们。拜伦命罗伯茨利用玻利瓦尔去搜索来亨到莱里奇间的海面和沿途海岸。特里劳尼则陪同玛丽和珍沿着海岸线就失踪人们的遗物或消息作了一次无用的搜查。他留在 Casa Magni 陪着哀伤的妇人们直到7月18日，然后离开作进一步的查访。7月19日，他回到她们那里，尽量以平静的语气，向她们说出，她们的丈夫之尸首于7月17、18两日已被冲上维亚雷焦(Viareggio)附近的海岸。(约莫于7月30日，查尔斯·维维安支离破碎的遗体在北方4英里处找到，并且就埋葬在岸上)。他带了玛丽和简去到比萨，拜伦提供她们住 Casa Lanfranchi 中的豪华套房，但是，她们住进附近的公寓。玛丽写给一位朋友说：“拜伦爵士对我十分好，时常和古西奥里一起来看我们。”<sup>⑩</sup>

尸体已经被土人埋入沙中。突斯坎法律禁止这种掩埋的尸体掘出来或再掩埋；但是，特里劳尼知道雪莱太太希望雪莱的遗体埋葬在罗马他们的儿子威廉的遗体旁边。他说服突斯坎当局准许挖掘，条件为遗体当场在岸上焚化掉。这些尸体已经残破得几乎不能辨认；但是，在一件外套的一只口袋里找到了一卷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作品，在另一只口袋中找到了一卷基特的诗。<sup>⑪</sup>

8月15日，拜伦、亨特和特里劳尼，以及一名检疫官和一位英国官员，森莱队长(Captain Shenley)，如一队兵士一般站在焚化威廉斯遗体的旁边。次日，在埃尔巴对面的一个地点，雪莱的遗体挖掘出来，并且在拜伦、亨特、特里劳尼和一些附近村民面前焚化。特里劳尼把香、酒和油丢进熊熊的火中，并念着咒文把这些灰撒给“他膜拜的神只。”<sup>⑫</sup>拜伦不能忍受到这种场面的结束，就入水朝玻利瓦尔号游艇游去。3小时后，除了一颗心外，几乎整个身体都已化作灰烬。特里劳尼不愿灼伤一只手，从火中抓出这颗心，装了骨



灰的一口棺材带到了罗马，下葬在古老的新教徒公墓附近，埋着孩子威廉遗体的一座新公墓内。雪莱的心由特里劳尼交给亨特，再由亨特交给玛丽。在她于1851年死时，这颗心的灰烬发现在她的Adonais诗册中。

## 第十六节 拜伦的转变

(公元1882—1824年)

1822年9月，拜伦和甘巴家从比萨迁到阿尔巴洛(Albaro)，热那亚的一个效区。自从离开英格兰，他就身体、心智和心情所作的数度变迁已使他厌烦了，他甚至开始对特雷莎的无止境的爱也厌烦。他的犀利眼睛和不屑的神情已撇去了生命的薄纱，很明显地，已不留下一点激起他对理想或奉献的真实感。他是最出名的当代诗人，但是，他并不对他的诗自负；《蔡尔德·哈罗德》的悲欢现在似乎缺乏男子气，而《唐胡安》的慧黠嘲讽使得作者和读者赤裸在一个幻灭的世界中。“一个人，”他目前感到：“应该为人类做些诗以外的事情。”<sup>⑧</sup>在热那亚，他问他的医生，“那一种毒药最好和最快？”<sup>⑨</sup>

希腊提供他一个赎罪的死亡机会。希腊于1465年臣服于土耳其，并且在外人统治下昏沉了。拜伦在《蔡尔德·哈罗德的朝圣之旅》中(2节,73—84行)曾呼吁她起来反抗：“受压迫的人们！岂不知道要解放自己必须揭竿而起吗？”希腊已于1821年反抗了，但是，她没有武器，没有钱，没有统一的领导；她向她曾传播其丰富遗产的各国呼吁援助。她已派遣一个委员会到伦敦筹募基金；该委员会派出代表到热那亚，向拜伦提出挑衅，希望利用他的部份财富，

以扩大他曾鼓舞过的革命。1823年4月7日,他告诉密使们,他随时听候希腊临时政府的召唤。

他是转变了。他此时行动起来了。嘲笑的态度屈服于专诚的奉献;诗韵搁置在一旁;罗曼史从韵律中转变而成果断的决心。于替亨特家,特别是特雷莎留下部分基金后,他将剩余的财产悉数奉献给希腊革命。他通知他在伦敦的代理人卖掉可以变成钱的他在英格兰的每一样东西,并将所卖的钱送给他。他以半价买掉玻利瓦尔游艇,并且租了一艘英国船赫克勒斯号(the Hercules),载他、彼得罗·甘巴和特里劳尼,一些大炮和弹药,以及一些可供1000人用上两年的医药用品到希腊去。特雷莎·圭乔利拼命留他和她在一起;他感激地婉拒了她,并且得知她和她的父母已获准重返拉韦那的家而感到安慰。他告诉布莱辛顿夫人:“我有一种我将要死在希腊的预感。我希望死亡发生在战斗中,因为对一个十分悲惨的生命,那是一种最好的结束。”<sup>⑩</sup>

1823年7月16日,赫克勒斯号驶离热那亚前往希腊。经过气死人的耽搁后,船终于(在8月3日)在伊奥尼亚群岛(the Ionian Islands)中最大的亚各斯托良岛(Argostólion)上的凯法利尼亚港(the Port of Cephalonia)停泊了。这里距希腊仍然还有50海里远,但是,拜伦在那里逗留几个月有点不耐烦了;他希望加入在美索郎基(Missolonghi)最具鼓舞的希腊领袖们中间去;但是,马尔科·波查里斯(Morco Bozzaris)在行动中遭到杀害,美索郎基在土耳其人手中,而土耳其战舰控制了所有通向希腊本土的西边通路。12月初,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王子(Prince Alexandros Mavrokordatos)收回美索朗基,29日那天,拜伦离开了凯法利尼亚。莱塞斯泰·斯坦厄普上校(Colonel Leicester Stanhope),在英格兰筹募支助革命基金之希腊委员会的代理人,在美索郎基写着:“所有的人期待着拜伦爵士的到来,就如他们等待救世主降临一般。”<sup>⑪</sup>经过数度冒险和迟延后,这位年轻的救星于1824年1月4

日抵达美索朗基，从王子和追求美景的人民处接受了一次盛大的欢迎。

马夫罗科扎托斯委任他支付费用、粮秣的任务，并统率一支由600 苏利奥特斯人(Suliotés)——一半希腊，一半阿尔巴尼亚血统的好战野蛮人——组成的队伍。他们的相貌鼓舞不起他的兴趣，并且他知道希腊革命家们，在政治情操高过军事情操的领袖们领导下，分裂成许多敌对的派系。不过，他很高兴受命一个积极的任务，并迫不及待地分配了援助品；单单对马夫罗科扎托斯一人，他一周给予2000 英镑以维持美索朗基人的粮食和士气。同时，他住在镇北靠近海岸的一栋别墅里，“是我历来所见的，”特里劳尼说：“最阴森沼泽的边缘上。”苏利奥特斯人毫无纪律而且好作乱，渴望得到他的钱甚于他的领导才干；这位少年英雄要战斗的希望必须要等到纪律和士气恢复之后才行。不善于等待的特里劳尼到别的地方去找寻冒险的机会了。只有彼得罗·甘巴留在拜伦身边，当他看到他在炎热、忧郁和满是毒气的空气下倒下去时，焦急地照顾着他。

2月15日，拜访斯坦厄普上校时，拜伦突然间面色苍白，倒在地上，痉挛着，不省人事，并口吐白沫。他恢复了神智，就被带回到别墅去。医生们聚集在他身边，用水蛭来替他放血。当水蛭取出时，流血却不立刻停止，拜伦因失血过多而晕倒了。2月18日，他的苏利奥特斯人的队伍又暴动了，威吓着要侵入他的别墅，杀尽每一个在那里的外国人。他从床上起来，安抚他们，但是，他要领导他们去对抗在莱潘托(Lepanto)的土耳其人的希望却衰退了，随之而去的是他多彩多姿的英雄式死亡的梦想。从奥古斯塔·利寄来的一封信，附着他女儿阿黛的一张照片和安娜贝拉对孩子的习惯和脾气的描写，带给他一点安慰。顷刻间他的两眼闪着光辉。一切寻常的事都抛诸脑后了。

4月9日，他和彼得罗骑马外出。他们回去时碰到一阵倾盆大雨，拜伦在那晚上就得了寒热病。11日那天，他的热病恶化；他走

向床边,感到有气无力,发现他已不久于人世了。在弥留的最后十天中,有时他想到了宗教,但是,“说真的,”他指出:“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知道什么是该信的,什么是不该信的同时很困难。诱使我顽固地死去的理由之多,犹如要我而今而后活得如一位自由思想者的不相上下。”<sup>④</sup>他的主治医生朱力阿斯·米林根博士(Dr. Julius Millingen)记录着:

怀着无尽的歉意,我必须写出来,虽然,当他在弥留状态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枕边,我绝没有听到他提起过什么宗教,甚至连一点语丝都没有。有一瞬间,我听到他说:“我要恳求怜悯吗?”经过一段长时间沉默后,他补充说:“算了,算了,绝不示弱!到死要做一位大丈夫。”

同一位医生引述他的话说:“不要把我的躯体送到英格兰去。让我的骨头在这里腐朽,葬我在第一个转角上,不要铺张或做些无聊的事。”<sup>⑤</sup>

4月15日,另一次痉挛后,他准许医生们再为他放血。他们放出了两磅血,两小时后,再放一次。他死于1824年4月19日。这次极不必要的验尸显示了尿毒症——血液中积储了应当从尿中排出去的毒素。没有梅毒现象,但是,不断放血和强烈泻药是致死的最后原因倒留下不少证据。脑子是历来所记录下来的最大者之一——710克,超过常人的界限。<sup>⑥</sup>也许历年来性欲过度,和暴饮暴食与毫无节制的禁食交错相循,虚弱了身体上抗拒紧张、焦虑和沼气的的能力。

直到5月14日,死亡的消息才抵达伦敦。霍布豪斯将这噩耗带给奥古斯塔·利;两人都瘫痪了。霍布豪斯接着转到拜伦的秘密回忆录的问题上,穆尔已经把这些备忘录以2000金币的代价卖给

默里了，他不顾他的首席顾问威廉·吉福德(William Gifford)的警告，有意要拿到报馆去发表，(据霍布豪斯的话说)这些备忘录“如果发表了，最适合于婊子阅读，却使拜伦爵士蒙上永远洗不清的污名”。<sup>⑤</sup>默里和霍布豪斯提议毁掉这些稿本；穆尔抗议，但是，同意让莱太太来决定；她说要烧掉；就照办了。穆尔归还默里 2000 金币。

拜伦的老仆人弗莱彻坚称他的主人在死前刹那间，曾表示要葬在英格兰的意愿。希腊当局和民众抗议，但是，他们毕竟以尸体在抹上香料前取出部份内脏而满足了。保存在 180 加仑酒精中的尸体于 6 月 29 日运抵伦敦。向威斯敏斯特教堂当局提出让尸体葬在那里的诗人角(Poets' Corner)的一项请求，却遭到了拒绝。7 月 9、10 两天，准许群众瞻仰棺材中的遗容；群众很踊跃，名流却极少；但是，一些高官准许他们的空马车参加 7 月 12 日至 15 日将尸体从伦敦运至诺丁汉去的行列。克莱尔·克莱尔蒙特和玛丽·雪莱从窗口见到送葬的行列经过。再前进一程，灵车经过一辆载着卡罗琳·蓝伯的敞篷马车，她的丈夫，骑在前头，知道死者的名字，但是，直到几天后，才告诉他的太太。7 月 16 日，诗人才被葬在靠近纽斯台修道院的一座村庄胡克诺尔托卡德(Hucknall Torkard)教区教堂，他祖先的墓窖中，靠近他母亲的身边。

## 第十七节 生存者

在拜伦的一生中曾扮演过一个角色的那群人，大部份活到历史的下一个纪元之中。最快过世的是彼得罗·甘巴；于护送了他的英雄的尸体到伦敦后，他重返希腊，忠心耿耿地仍献身于革命，并

于1827年在那里死于热病。卡罗琳夫人当听到她的丈夫告诉她拜伦的尸体曾从她身旁经过时,就生病了;她曾在—本小说 *Glenarvon* (1816年)中讽刺过他,但是,这时她说:“我非常遗憾,我曾说过不敬他的话。”<sup>⑭</sup>她比他多活不到4年就死了。——依照拜伦的遗嘱,奥古斯塔·阿黛继承他留下来的全部遗产(大约10万镑之谱);大部份用来清偿她丈夫和儿子的赌债,于1852年死于贫穷。<sup>⑮</sup>——拜伦夫人一直到死,为这个先天上的邪恶断送了她婚姻的人保持着几许温馨;“只要我活着,”她写着:“我主要的困难也许是不要太怀念他。”<sup>⑯</sup>“每当我说完了毕竟在那个胸中还有一个较善良自我在,……是他永远在侮蔑,却决不能毁掉的一切时,我岂能不相信吗?”<sup>⑰</sup>她们的女儿阿黛,当她在成长时拜伦曾许下愿望,嫁给洛夫莱斯伯爵第二,在赛马上输了一笔财产,由她的母亲解救了她的经济上困扰,但由于失去了希望和健康,和他父亲一样,活了36年就死了(1852年);拜伦夫人,藉各种社会服务来填补她的孤寂生命,死于1860年。

约翰·卡姆·霍布豪斯以激进派姿态进入国会,晋升至国防大臣(1832—1833年),获颁从男爵爵位,死于1869年,享年83岁。特雷莎·圭乔利,于拜伦死后,重返丈夫身边,但是,不久又第二度分居了。她与拜伦的跛脚朋友亨利·福克斯(Henry Fox)和拜伦的崇拜者、法国诗人拉马丁(Lamartine)有过短暂的韵事。她在姿色逐渐衰褪时,以47岁的年纪,又嫁给了多金而和蔼的布瓦西侯爵(Marquis de Boissy),他(依照一则略带偏见的英国笑话)得意洋洋地介绍她为“贱内,拜伦的前情妇。”当侯爵去世时,她接受招魂术,与拜伦和她亡夫的灵魂聊天,并且报告称:“他们现在住在一起,成了最好的朋友。”<sup>⑱</sup>她死于1873年,享年72岁,写过几本书把拜伦描写为一位几无瑕疵的天才和绅士。克莱尔·克莱尔蒙特死于1879年,享年81岁,至死怀着拜伦为“具有虚荣、愚蠢和各种可怕的弱点,是历来聚合在一人身上所仅见之一人”的看法。<sup>⑲</sup>

玛丽·雪莱，尽管受了此一创伤，对阿尔贝(Albé,拜伦的那伙人替他取的浑号)保留了一种较好的印象；当她得知他的死讯时，她写着：“阿尔贝——可爱、无情、迷样的阿尔贝——离开了这个荒凉的世界了！愿上苍赐我早死！”<sup>⑧</sup>她将27年余生的大半生命消磨在以爱和关心去编辑亡夫的著作，和一本她自己写的十分流畅的作品。

利·亨特，当几乎每一位批评者贬斥雪莱的诗为一位不成熟的青年的不成熟作品时，敢挺身赞扬雪莱的人；一直忠于他青年期的激进主义，写过不利于拜伦的回忆录，活到1859年。托马斯·杰弗逊·霍格，于忘却了各种所醉心追求的事物后，娶了威廉姆斯的遗孀简，和她共渡过他35年的余生。二流作家中最杰出的要算爱德华·约翰·特里劳尼了，他在比萨进入雪莱的生命中，当时两人都30初度。雪莱已近终点，特里劳尼却还有五十九年好活。但是，这位“游侠，……黝黑、英俊和留着胡髭”(亨特以此来描写他)，已经冒过许多险，到过许我国家，他的回忆从来就不会使他的新知厌烦过。虽然拜伦使他成为马和玻利瓦尔游艇的主事人，而使这位好动的人学到大部分爱情的是这个“态度和蔼，嘴上无髭的孩子”——雪莱。见到拜伦安然抵达而蜷伏在美索朗基后，他就去追求自己的命运，期望死于希腊的独立运动中。他眼见希腊解放了，又拾起他浪迹天涯的本事，活到1881年，葬于他于1822年购置在罗马的英国公墓中靠近雪莱遗灰的坟墓中。

## 第九章 英格兰的邻邦

(公元 1789—1815 年)

### 第一节 苏格兰人

自 1707 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时起,他们在不列颠的统治下,享受着岛内的迁移和贸易的自由,但是,却从未因在一个遥远的国会下院中,苏格兰的 180 万人只有 45 名代表,对抗 513 名代表 1016.4 万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而和政府和谐地相处过。就苏格兰的代表人数,15 名是由每一个自治区中总数 1,220 位选举人选择的成员所组成之自治和腐化的镇议会指定的。余下的 30 名代表则由农村郡县,依据限于有势力的地主之参政权而选出的;所以有 1.4 万居民的比特郡(the County of Bute)有 21 位选举人,<sup>①</sup>全部郡县共有 2405 位选举人。大部份成功的候选人都由有势力的旧贵族和大地主所选出。1748 年时,封建制度已在苏格兰绝迹,但是,贫穷却依旧,由于贪婪和不平等是人类的天性。渐渐地,如英格兰一样,苏格兰接受代表政府制,是可能建立在一个爱好传统,却太困扰在日常需要,以致不能获得在全国性问题上,作明智的抉择所需之知识和经验的民族中最好之政府组织。

宗教组织则要强于国家。安息日是膜拜和悔罪的一天;牧师讲



亚当的堕落,人类的邪恶和上帝的报复;聚会所在教义和道德上的要求要比他们非国教的牧师们严厉。大卫·迪恩斯(David Deans)在《密特劳西人的心》(The Heart of Midlothian)一书中证实,一个去跳舞的女孩将被打入地狱去。<sup>②</sup>

不过,苏格兰在许多方面超前于英格兰。她有国立公立学校的组织;每一教区要求设立一所学校,男童和女童一起在那里接受阅读和算术训练。因为这一训令,父母们于每季要替每一学生付出两先令;另外两先令学生才得学习拉丁文。穷人家的孩子则由教区来给付,当教区太分散不能让学生聚集在一起时,一位旅行教师轮流把一些课程带到各地区去。教师职务是严格地属于该教区的牧师的,并且有协助传播可怕的神学之职责;因为年长者们发现,加尔文教义是在每一个人身上设置一名治安官的一种便宜措施。有相当可观数量的大胆人士,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一世代就已酝酿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一直继续下去,虽有一些受到抑制,却一直进入拿破仑世纪中。

苏格兰对其设于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 创于1410年),格拉斯哥(Glasgow, 1451年),阿伯丁(Aberdeen, 1494年)和爱丁堡(Edinburgh, 1583年)的各大学而感到自负。这些大学自认在许多方面优于牛津和剑桥,一些近代的学者承认这种自许;<sup>③</sup>在医学教育上,爱丁堡大学是这方面的翘楚。<sup>④</sup>《爱丁堡评论》,创于1802年,一致同意是大不列颠最卓越的期刊,而勇敢的自由主义律师托马斯·厄斯金(Thomas Erskine, 1750—1832年)在伦敦律师界几乎压倒群侪。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压制思想自由的时间到来时——特别是当思想自由偏爱于法国大革命时——没有一位英国的法学界人士可与苏格兰人匹敌的。另外,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知识界继续偏向于曾保护过大卫·休谟、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詹姆士·博斯韦尔、罗伯特·伯恩和亚当·史密斯等人的自由。据说,不仅是学生,甚且连整个爱丁堡的知识分子,在

杜格尔德·斯图尔德(Dugald Stewart)讲哲学时,可见到他们都在作笔记。

斯图尔特今天在苏格兰以外几乎已被遗忘了;但是,在爱丁堡,最堂皇的许多纪念碑之一便是一座设立来纪念他的小型古典庙宇。他追随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研究休漠可怀疑的结论和大卫·哈特利的机械心理学到常识的探究上去。<sup>⑨</sup>他拒斥形而上学为一种探测心智本质的心智之虚荣意图。(只有明希豪森从男爵——Baron Munchausen——才能藉他的靴带将自己拉起来)。斯图尔特提议以耐性和精确去观察心智的过程,不假借心智自我说明的归纳心理学来取代形而上学。斯图尔特是一个有机智而品格高超的人,他就机智、幻想和诗的功能提出了精确的说明。(他的国家仍然是情歌的一个源泉,一些令我们的青年喜爱的温柔调子就来自苏格兰的河岸和斜坡)。

詹姆士·米尔——虽然他用教育过份凿伤了他的儿子——是一位善良而博学的人。父亲是一位鞋匠,他在爱丁堡大学争得希腊文方面的荣誉。毕业后,他去到伦敦,从事危险的新闻工作,结了婚,并育下一子,他替儿子取了个他的国会议员朋友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uart)的名字。1806年和1818年之间,他写了一本《英属印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内容生动,批评失策之处殊为独到,促使在印度的政府作了重大的改革。

同时(1808年),他遇到杰里米·边沁,热心地接受了道德和政治习惯和观念应依照它们促进人类快乐的能力作判断的功利主义的设计。在精力和理念的驱策下,米尔自任为了解不列颠的边沁之使徒。他替《大英百科全书》(一份苏格兰人的企业)第4(1810年)、第5(1815年)、第6(1820年)各版再版时选述——《论政府》、《法理学》、《监狱改革》、《教育》和《新闻自由》等论述,赢得广大的发行和影响。这些短论,加上他在《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投稿,在导致1832年选举法修正案(the Reform Act of 1832)的运动上汇成

一股巨流。在这种风气之下，不列颠的激进派就从全面革命转向由一个政府基于广大的参政权和功利哲学的进步改革了。在《政治经济之要素》(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1年)一书中，米尔反对让人口成长超过资本之成长，同时提议对“自然增值”课税——即土地价值之不劳而获之增值。在《人类心智现象之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 1829年)中，他寻求解释经由观念之联合的一切心智上运作。而于1835年，即他死前一年，他发表了《论麦金托什文集》(A Fragment on Mackintosh)。

詹姆士·麦金托什爵士继续苏格兰人的英格兰教育。在阿伯丁和爱丁堡大学获得了思想的工具后，他迁移到伦敦(1788年)。不久，他对于群众起义攻占巴斯底狱的消息震惊不已；1790年，他愤怒艾德孟·伯克在《法国大革命的反响》(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文上的仇视态度；1791年，他以《高卢人的民主政治辩护》(Vindiciae Gallicae)一文来答复那种历史性的诽谤。这位26岁的哲学家，从这大激变的早期阶段中，看到了人道主义哲学的崇高呼声和成果；同时，受到威胁的君主政体并不如伯克所设想的是受试炼的传统之智慧和经验，而是随意的制度，不能预见的事情和杂凑事物的杂乱残渣。

现存于世界上的每一个政府(美利坚合众国除外)都是偶然地形成的……。当然就不能认为这些偶然的政府应凌驾于经过思维的作为……之上。人类学到不必去容忍理性所不敬重的古代，对理性要行为的新奇事物不必畏缩，此其时矣！人类的权力……藉生产改良政府的艺术，和增加人类的一般愉快，应当在历史上揭示一个新世纪的开始，此亦其时矣。<sup>④</sup>

当大革命从哲学家们的理念中衰退至恐怖人物的混乱独裁上去时，麦金托什修正了他的法则，使自己调整到侵犯他的社会力上去。他的《自然法和国际法》(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ions, 1799年)的讲演，以一种讨好伯克的方法，讨论社会组织如何产生——在个人的发展上——行动的习惯，和获得一切人类内在状况的良知上判断；所以一个受文明熏陶的成年人不仅是自然，同时也是营养的一种产物。——在最后几年中，麦金陶希从最初的研究和文献中，写了一册《英格兰革命史话》(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in England, 1832年)。

我们从这些例证上可以判断，苏格兰的文明在18世纪转入19世纪时，不是依赖于其过去的光荣上的。农业欣欣向荣，特别是在低地地区。那里纺织机也很忙碌，罗伯特·欧文正打开了人类合作的新远景。格拉斯哥自负于它的科学家们，而爱丁堡则律师、医生和牧师们成为时代的先锋。在艺术方面，亨利·雷伯恩爵士(Sir Henry Raeburn)的人像画使他成为苏格兰的雷诺。在文学方面，博斯韦尔出版了(1791年)精神旺盛的快乐源泉《塞缪尔·约翰逊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而在特威德河(the Tweed)上阿伯茨福特(Abbotsford)沉思着古代敌人，哼着轻快的调子和写作闻名世界的小说以偿付自己部分债务的，是大名鼎鼎的司各脱和他们中的绅士。

沃尔特·司各脱在脾性上是非常适合于成为不列颠文学浪漫潮流中的一位领袖的，因为他喜欢自认为苏格兰边界上酋长的后裔，他们的争执和战争提供他在童年时吸收民谣的鼓舞性事物。不过，他的直接祖先是一名爱丁堡的律师和爱丁堡大学药学教授的女儿。他于1771年出生在那里，兄弟姐妹共12人，其中6人，如那时的习惯一般，都夭折了。在他18个月大时，他患上流行性的小儿麻痹症，致使他的右脚永远地跛了。类似拜伦的残废也许帮助了司各脱与这位年轻的诗人，在道德和信仰上维持了一种牢不可破的

友谊。

在爱丁堡的旧学院(Old College)研修5年后,司各脱在父亲的手下开始5年法律学徒的生涯,1792年,他经准许成为苏格兰律师公会的一名律师。他与夏洛特·沙尔庞捷(Charlotte Charpentier)的婚姻(1797年)和得自他父亲的一笔遗产(1799年),给了他一笔可贵的收入。他参加社交应酬,结交了许多有势力的朋友,透过他们,于1806年,他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的一名职员。薪水和亲戚们的一些遗赠使得他疏懒,不久,终于完全放弃了他的法律事务,而专心于他的文学嗜好。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遇到了罗伯特·伯恩斯,一位托马斯·珀西的《古英诗遗篇》的爱好者,并且熟悉戈特弗里德·毕尔格(Gottfried Bürger)的抒情诗。特别是Lenore一首——重燃起司各特青年时期对古代不列颠民谣的兴趣。1802—1803年中,他出版了三大卷《苏格兰边界的吟游诗》(The Minstrelsy of the Scottish Border)。在这些生动故事的刺激下,他亲自尝试创作,并于1805年,他发行了《最后一位吟游诗人的叙事诗》一书。它的销数是不列颠诗的年鉴上的一个里程碑。当他于1807年去到伦敦时,他发现自己成了沙龙中的宠儿。他决定以文学为职业,并且几乎变成了事业,同时,拿他的时间和金钱,开始在写作、绘画和出版上作一次危险的投资。

在科尔里奇的Christabel之押韵八音节对句中,他替他的苏格兰传说和历史中的摄人心神的爱情和战争、神秘和超自然的浪漫故事找到了一个便捷的媒介。他利用这个新领域创作了Marmion(1808年),《湖滨夫人》(The Lady of the Lake,1810年)、Rokeby(1813年)和The Lord of the Isles(1815年)。他不求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写了去娱乐一般大众的嗜好,不是去娱乐毕竟已厌烦叙事诗和六音步诗的缪司神的。他的读者们屏息静气地从武士到仙女到英雄式的争斗一直追随着他;他们热情地唱着如下述

这种没腔没调的歌词：“噢，年轻的 Lochinvar 从西方走过来了，一路行经的广漠边界上，他的神驹是第一等的。”<sup>①</sup>接着，1813年中，拜伦出版了 *The Giaour* 和《阿拜多斯的新娘》两卷诗集，和 1814年的 *The Corsair* 和《拉娜》两卷。司各脱看到他的读者离开边界而向往东方的神秘和绝望的厌世上；他认识到这位纽斯台修道院的年轻爵士在诗韵和空间上都要胜过阿伯茨福特的地主；于 1814年，以《伟佛莱》一书，他从诗转到散文的领域中去，并开采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是最适当的一个时机。1802年时，他投资到詹姆士·巴兰坦 (James Ballantyne)——在凯尔索 (Kelso) 的一位印刷业者——的印刷业务上，将他的印刷厂迁移到爱丁堡；1805年，他成了詹姆士和约翰·巴兰坦 (John Ballantyne) 的印刷和出版公司的一位隐名合伙人。自此而后，他安排他的作品，不管由谁出版，都让巴兰坦印刷厂印刷。用他赚来的钱和利润，司各脱于 1811年购下 (靠近梅尔罗斯 Melrose) 的阿伯茨福特的地产，扩大它的 110 英亩的产业到 1,200 英亩，并且在旧农舍的地址上，盖起设备豪华和装潢富丽的一座城堡；它目前是苏格兰名胜之一。但是，在 1813年时，这家巴兰坦公司濒临破产边缘，部分原因是由于出版司各脱的各种图书上的亏本之故，他以向富有的朋友举债和他的作品的收入，亲自负起免于巴兰坦家破产的厄运。到 1817年时，这家公司是挽救过来了，而司各脱也成了文学史上小说名家之一。

《伟佛莱》一书于 1814年用笔名出版，赚了约 2000 镑之谱——其中大部分收入不久就花在阿伯茨福特的地产上。司各脱隐去他的作者身份，感到一位大学的职员写小说卖钱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他的文笔在写散文上的快捷几乎不亚于在诗上的成就。他在 6 星期内写了 *Guy Mannering* (1815年) 一书；1816年中，写了《古物商》(*The Antiquary*)；1816—1819年间 (以《我的地主的故事》：*Tales of My Landlord* 这个通称)，他呈给读者一系列令人神

往的苏格兰风景的风光——Old Mortality，《密特劳西人的心》，《拉墨摩耳的新娘》(The Bride of Lammermoor)和《孟特洛诗的传说》(The Legend of Montrose)；从其中之一册上赚了另一笔可贵的收入。司各脱经常到苏格兰、英格兰各地和邻近的岛屿上去游历；他自称为一位古物商甚于一位小说家；他能给予他的故事一种地方色彩和方言气味，颇能逗他的苏格兰读者的喜欢。Ivanhoe，《修道院》(The Monastery)和《方丈室》(The Abbot)——全部完成于1820年——以中世纪的英格兰作为它们的背景，不完全如苏格兰故事中的情节般那么写实。1825年，司各脱冒险到中世纪的东方去，而在《护身符》(The Talisman)一书中，他以十分阿谀的笔触来勾勒萨拉丁(Saladin)的形象，致使虔诚的苏格兰人开始怀疑到作者正统思想的纯正度。当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被问到，最先动摇她基督教信仰的是什么时，她回答说：“沃尔特·司各脱。”<sup>⑥</sup>

我们那群在青年时期激赏过这套《伟佛莱》小说集的人，现在太热衷于近代的思潮，以致在今天不能再去欣赏它们了；但是，纵使匆匆地读其中的一本——就说是《密特劳西人的心》吧——会使我们重新意识到，历十年的时间，每年能创作这样一本书的人，一定是他那个时代的奇人之一。我们了解他在阿伯茨福特扮演封建从男爵的角色(他于1820年被授予武士爵位)。不过，仍与所有善良和纯朴的人见面；那个世纪鼎鼎大名的作家——从爱丁堡享誉到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那里普希金[Pushkin]敬仰他)，但是，当听到自己被比拟为莎士比亚时，乐得心花怒放。他的诗和小说是浪漫运动中的有力因素，虽然他只有少许浪漫主义的幻想。他参与过重振中世纪方法的兴趣；然而，他请求苏格兰人放弃他们过去暴乱的封建理想，去使自己适应慢慢地使两个民族融合为一的联合王国的统治。在他年老时，他许身于不列颠宪法上承认的保王党的爱国运动。

同时,他的印刷业者,巴兰坦家族,和他的出版者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双双都濒临破产的边缘。1826年,他们将剩余财产交给法庭,沃尔特爵士,身为合伙人,就成为巴兰坦家债务的负责人。此时,欧洲终于知道《伟佛莱》小说集的作者阿伯茨福特的爵士。法庭准他保留他的家和少许几英亩田,和他在爱丁堡大学职员薪俸,但是,他的其他一切资产全部被没收。然而他仍能过着舒服的生活,他继续一本接一本写小说,希望用他赚来的钱抵销他的债务。1827年,他出版了一本力作《拿破仑的一生》(The Life of Napoleon),一名才智之士称这本书为“十大卷的亵渎”。该书几乎剥夺了这位科西嘉人的每一种德行,但是,却博得不列颠人的喜悦,也稍微抵偿了作者的部分债务。

他剩余作品的性质反映了他的草率和不安。1830—1831年间,他患了几次中风。恢复之后,政府指定了一艘木造快速帆船载他到地中海的阳光下作一次航行;但是,新发作的中风使他瘫痪,人们匆忙将他送回家去,好让他死在他所爱的阿伯茨福特(1832年)。另一位出版商,罗伯特·卡德尔(Robert Cadell)接过了他遗留下来的债务(7000镑)和版权,并且从这一行动上赚了一笔钱,因为沃尔特·司各脱的小说直到世纪末一直脍炙人口。沃兹沃思认他为“他那一世代的最伟大的人物。”<sup>④</sup>

## 第二节 爱尔兰人

爱尔兰在1800年时大约有455万人,其中有315万人是罗马天主教徒,50万人是圣公会教徒,和90万人(主要在阿尔斯特:Ulster)属于其他各种小教派。天主教徒于1793年给予了投票权,于是成了大部分文职位置上的合格人选;但是,他们仍然受阻于最



高职务、司法职务和爱尔兰的国会之外；结果，天主教徒只准在新教徒的候选人中选择人选来统制天主教的爱尔兰。国王或大臣们指派一位新教徒总督作为全爱尔兰的首席行政官，并准他领导整个官僚组织——并且在相当的范围内，还包括爱尔兰的国会——结果贿赂、分脏和鬻爵之风盛行。<sup>④</sup>

直到 1793 年，爱尔兰的全部土地由不列颠或爱尔兰新教徒所拥有。1793 年后，少数天主教徒获准可购买土地；其余的是耕种小块土地的佃农或是农地或工厂中的劳工阶级。租金和什一税都以严峻的手段征收，结果绝大部分爱尔兰农民过着毫无希望的贫苦生活。他们太穷和太缺乏刺激，以致买不起在不列颠使农村产品大量增加的新机器；爱尔兰的农业一成不变。“最大的地主都住在英格兰，他们不劳而获从爱尔兰搜刮他们所能得到的。”<sup>⑤</sup>在都柏林工厂区中，贫穷甚至比土地上还要糟糕。爱尔兰的工业因阻止棉花进口的高额关税，和除了亚麻布外，在大范围上阻止爱尔兰成品与帝国内的不列颠成品竞争的商事规则所限制。<sup>⑥</sup>雪莱在 1812 年看过都柏林工厂工人的状况后写道：“直到目前，我对人类悲惨的情况所知诚为有限。”<sup>⑦</sup>

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其他的人口一样，都要付出什一税去支持爱尔兰的国教教会；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还藉自愿奉献，以维持他们的天主教教士，他们从前的财富都被剥夺精光。罗马教会自然地会支持爱尔兰人的独立运动，结果就赢得天主教民众忠诚爱戴。此地的社会反叛者通常是一位信仰上的保守者；如托马斯·穆尔这种自由主义者；虽然，他们也许与如拜伦这种怀疑论者是朋友，却从来就不公开地脱离他们的天主教正统过。

在 18 世纪后半叶，领导反抗爱尔兰之利用的是一位新教徒。亨利·格拉顿与另外两位爱尔兰人——伯克和谢里登——属于同一教派；他相信雄辩理性的权威。以此种武器，他成就了一些虽然有限却极有意义的胜利：取消《宣誓条例》(the Test Act)，该条例

要求申请加入国教为成为国会会员资格的先决条件；撤除在爱尔兰贸易上较具有窒息性的限制，和承认（如他别具匠心地叙述的）只有英格兰的国王，在爱尔兰国会的同意下，才能替爱尔兰立法——即，爱尔兰的法案不再需要获得大不列颠国会的批准。不过，当格拉顿设法为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争取到爱尔兰国会的全部合法资格时，他却倒下去了；爱尔兰依旧是一个受新教政府统治着的天主教国家。

西奥博尔德·沃尔夫·托恩(Theobald Wolfe Tone, 1763—1798年)接下了这场战斗。如格拉顿一般，是都柏林三一学院的一名毕业生，他到伦敦去修习法律。返回后，他协助筹组联合爱尔兰人社(the Society of United Irishmen, 1791年)，该社之目的是在使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追求社会和政治改革上共同合作。付出了全部感情和精力去推动这一工作，东尼安排了一次天主教会议，其行动纲要吓得爱尔兰的国会通过了1793年的《救济法案》(the Relief Act of 1793)——即爱尔兰天主教徒享有参政权。

东尼并未得到满足。1794年，他与威廉·杰克逊(William Jackson)进行磋商，威廉·杰克逊秘密地代表当时领导着法国与不列颠作战的公安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杰克逊受到侦查并逮捕；东尼逃至美国，再转到法兰西。他在那里说服委员会的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批准法国人入侵爱尔兰的计划。拉扎尔·奥什将军(General Lazare Hoche)受命指挥，使东尼成为一名高级副官，于1796年，统率46艘战舰和14万大军向爱尔兰扬帆。这支远征军在英国海岸不远处遇到一场暴风雨，几乎全军覆没。东尼幸存，带了一支少数人员组成的远征军队伍要去协助爱尔兰。这支队伍被不列颠俘掳。东尼被判处绞刑，但是，他在监狱中割断喉咙而逃过了套索之灾(1798年11月)。

同时，爱尔兰人对英国统治的愤怒演变成全面反叛。不列颠首相庇特，有意用安抚的方法去平息这种运动。他准许波特兰公爵

(the Duke of Portland)、内务大臣(包括爱尔兰事务在内),任命坦率承认同情爱尔兰人的费兹威廉伯爵第二、威廉·菲茨威廉(William Wentworth, second Earl Fitzwilliam)为爱尔兰总督。在3个月的任期中(1795年1月至3月),对天主教徒作了庇特认为比明智的措施还要多的让步,他被撤职了,而爱尔兰人的抵抗变成了公开的战争。有一个时期,爱尔兰的新教徒加入天主教徒一起攻击外人统治;但是,在阿尔斯特,新教徒占大多数,因害怕叛乱成功会将阿尔斯特置于天主教的统治之下,他们不久改变合作为反对。1795年9月,阿尔斯特的新教徒组织了奥伦治社(the Orange Society),加入黎明童子会(the "Peep-of-a-Day Boys")焚烧和捣毁天主教徒的住宅和教堂;好几百天主教徒恐惧大屠杀而逃离了阿尔斯特。越来越多的新教徒脱离了联合爱尔兰人社。剩下来的天主教徒拿起武器,控制了几个郡,进而攻击在都柏林的政府城堡。在爱尔兰国会中的格拉顿,想藉提议给予天主教徒进入国会的资格以求得和平;这一提案因牵连到(天主教徒此时已有投票权)将爱尔兰国会提早转变成一个天主教的权力而遭到绝大多数议员的驳回。不列颠的将军要求并且也得到了援军,就宣布戒严法;接连好几个星期,这座一度熙来攘往的首教变成了仇恨和杀戮的一座地狱。计算尸体的结果,证明胜利在政府这一边;迨至1798年秋时,叛乱已经被压制。

庇特知道镇压不是解决的方法,而在爱尔兰受到压抑的不满情绪已变成不列颠的一个致命危险。迨至1800年时,英格兰已经与法国开战7年,在战争期间,她因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大混乱而占了上风。不过,现在,拿破仑带给法国秩序和她的军队的声威;他正在建造一支舰队,不久,就会向不列颠的海上控制挑衅。一个心怀叛意的爱尔兰经常蠢动在叛乱边缘上,每日诱惑着拿破仑率领大军横渡英伦海峡,并且——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徒——组织起大部分爱尔兰成为威胁到不列颠侧翼的一支敌对武力。庇特感到,一

定要找出一些方法使爱尔兰人民与不列颠联合起来,受制于一个国会和国王的统御之下。如果这一点要做到的话,庇特提议给予爱尔兰以及所有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成年男性天主教徒全部参政权——投票权和担任公职的资格。准许天主教进入在伦敦的联合国会;并供给背叛的牧师、天主教教士和国教的牧师政府薪水。<sup>49</sup>在这一安排下,宗教就不可能变成一种革命的动乱原因,而是国家统一和大众满足的一支力量。

这一具有政治家风范的计划,早于拿破仑与天主教教会之谅解前一年提出,却遭到一阵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怀疑这是爱尔兰继续受英格兰统治的一种伪装;爱尔兰的新教徒抗议它将置他们于胜利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统治之下——也许就是报复和土地征收;而爱尔兰国会则不愿意消失。庇特希望,与英格兰联合的结果——包括在帝国各地的自由通商——最后就如与苏格兰的和谐一般,有益于爱尔兰的经济和重新团结爱尔兰为一个整体。爱尔兰的大多数天主教徒也许会受到不列颠绝大多数新教徒的干扰和控制。藉着大量使用金钱,闲差使和贵族头衔,<sup>50</sup>以及爱尔兰商人的支持,爱尔兰国会终于被说服而投票决定解体(1800年8月1日)。自此时起,直到1921年止,爱尔兰受制于不列颠国会,它有4位神职和28位世俗贵族在上院,和100位议员在下院中代表爱尔兰在那里行使职权。

庇特的显著成功却因不能得到国王同意他的设计而暗淡下去。当他提议实施在新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联合王国”中完全解放天主教徒的政治上束缚时,乔治三世基于他的加冕曾宣誓限制他只保护英格兰国教之理由而拒绝同意。当庇特对他施压力时,国王的精神错乱又有复发的迹象显示。庇特屈服了,同时,感到受了伤害,就辞去了首相的职务(1801年2月3日)。天主教的解放运动就此搁置一旁,一直等到1829年始再提起。

大部分爱尔兰的领袖们结论谓,他们受到欺骗,庇特从来没有

要履行他的承诺之意图。抵抗联合王国的实际兼并暴动又重新燃起。1803年,罗伯特·埃米特(Robert Emmet)领导了一次孤独的叛乱,使他成为爱尔兰历史和歌谣中最受爱戴的人物之一。他生于都柏林(1778年),是总督的一位私人医生的最小一个儿子。身为三一学院的一名学生,当他撤除了毕业生名册中的名字以抗议官方审判他们的政治观点时,他是以荣誉资格即将毕业的一位毕业生。他加入联合爱尔兰人会社,他的长兄托马斯(Thomas)是最高会议的秘书。托马斯劝告他不许用革命的非常手段,但是,罗伯特去了法国,寻找接近拿破仑的机会,请求另一次法国人入侵爱尔兰。不能说服拿破仑,埃米特重返都柏林,搜集武器并征募同志,计划对都柏林堡来一次袭击。当他知道政府已发现他的阴谋,并已下令逮捕他时,他组织了一支160人的临时队伍,就朝堡垒开拔去了。在路上,他们碰到了爱尔兰的首席法官基尔瓦登爵士(Lord Kilwarden),这群激动且无法约束的暴民当场杀死了他和他的侄子。意识到他的努力此时一定败露时,埃米特逃亡了,并且暂时躲藏在威克洛山中(Wicklow Mountains)。他冒着被发现的危险,尽量靠近他的未婚妻萨拉·柯伦(Sarah Curran)的家附近;天主教运动的新教徒辩护者,约翰·菲尔波特·柯伦(John Philpot Curran)的女儿。罗伯特经发现、逮捕,到判叛国罪而处决了。他向陪审团的演说是爱尔兰雄辩的古典作品之一:

我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只有一个请求:沉默就是慈悲。不要替我写谀铭;因为知道我动机的人此时就不敢为它们辩护,不要让偏见或无知中伤它们。让它们和我安安静静地安息吧,我的墓不必作任何铭记,我的记忆任它们遗忘掉,直到另一个时代,另一批人能对我的个性赋予公正时为止。当我的国家在并世诸国中独立时,那时,唯有到那时,再写出我的谀铭吧。<sup>⑨</sup>

## 第十章 庇特、纳尔逊和拿破仑

(公元 1789—1812 年)

### 第一节 庇特和大革命

威廉·庇特二世于 1783 年担任财政大臣和财政部的第一大  
臣。聚敛和支配王国内金钱的人便是不列颠群岛的大臣和联合政  
府的保护者。

他几乎享有一个不列颠人所能享有的每一种好处。他出生于  
一个卓越的家庭,吸收世界政治,稳定的财政和他卓越的父亲,占  
丹伯爵(the Earl of Chatham)的谈吐和随从的良好风度。他接受最  
好的家庭教育,大部份直接得自他父亲本人。他 21 岁进入国会,于  
24 岁时负起英格兰的政务。他以他的矜持、博学、和逻辑、甚于他  
的辩才、稳重和锐利的眼光、公共财政的知识和操纵术压倒了他的  
对方。他阅读并敬重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  
tions),他接受史密斯的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的哲学。身为一名贵  
族,他却支持繁荣中的商业和工业的中产阶级在国会和政策上有  
更充实的代表权之要求;用他们的流动财富,他与拿破仑作战,而  
贵族阶级则以他们在不动产土地上的财富、提供意见、外交术和议  
定书。他设置一个还债基金以偿还国债,直到战事花去可能征收到

的每一先令时为止；国债则渐有减少。虽然他利用“中产阶级的腐化”帮助他爬起来，他在终止中产阶级腐化上却很有气魄，但是徒然无功。他支持毁谤案子由法官移转给陪审团去审理的措施——即他保护新闻业揭发官员的不检行为。他支持威尔伯福斯长期反对奴隶贩卖的运动。拿破仑击败他，并瓦解他的精神，但是，击败拿破仑的是他重新改组，经营和鼓励下的不列颠。

不列颠国王几乎与法国的执政一样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乔治三世除了解放天主教徒的政策外，几乎每一件事都听从庇特的忠谏；但是，这位老迈的国王随时都会精神错乱——他在1788—1789年时，精神错乱过；当精神错乱时，威尔士王子总是徜徉在王座的附近——王子是民权党的偶像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朋友，他只有在嗜酒如命这一点上与庇特一致。有一度乔治三世进入弥留状态（1787年）；他还是复原了；但是却仍孱弱和优柔寡断；自此而后，通常政务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悉交由庇特去治理。

当这位年轻的政治家执掌政权时，英格兰正开始从美洲殖民地的混乱战争中复苏。不列颠在军事上面临了一个虽接近破产却胜利的法国，一个在查尔斯三世(Charles III)统治下正在繁荣和启蒙的西班牙，和在凯瑟琳二世统治下扩展领土，正组织强大的陆军，并吞半个波兰，而计划平分介于苏俄与约瑟夫二世(Joseph II)间的土耳其欧洲的俄国，此时似乎是一蹶不振了。目前，英格兰的安全有赖于两个条件：她的海上控制，和在欧陆上的政治力量之制衡。如果对方在这种制衡上占优势，它只要关闭不列颠物资的大陆市场，就可摆布英格兰。约瑟夫二世之死(1790年)缓和了东边的威胁；凯瑟琳犹豫不决；当法国大革命宣布要让所有君主政体完成立宪，否则就摧毁它们时，庇特正要从国际事务转入内政上去之际。日复一日，惊人的消息从海峡那边传播过来：巴士底狱被巴黎市民捣毁；封建权利受到抑制；教会财产被一个没有信仰的政府充公；一大群女人拥进凡尔赛宫，并且迫使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

妮特(Marie Antoinette)回来住在巴黎,置于民众监督之下。

起先,庇特并不如他的上层阶级朋友们一般惊惶失措。毕竟,英格兰早已有了一部宪法,是法国名流们所称颂和羡慕的。法国的一阵骚动毋宁是值得感激的:当法国秩序大乱,再重组它的政治制度时,英格兰正可以和平地解决她的内部问题。<sup>①</sup>当贵族阶级颤抖时,不列颠的知识份子——戈德温、沃兹沃思、科尔里奇、骚塞、考珀和伯恩斯——却欢欣了。1789年11月4日,一个纪念1688年光荣革命的学社在一名功利主义的传播者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的鼓励下成立,它送给在巴黎的国民会议一份贺词,表达希望他们“给予法国的这种光荣典范能鼓励其他国家主张天赋人权”的理想。<sup>②</sup>这份贺词由该学会的主席,斯坦厄普第三、威廉·庇特的连襟所署名的。普莱斯的贺词,以小册子在全英格兰流传,几乎呼吁立刻革命:

起来吧,爱好自由的朋友,为自由辩护的作家们!时代是光明的。你的努力不会白费。试看,各王国,在你的告诫下,从昏睡中苏醒了,挣脱掉他们的枷锁,并且向他们的压迫者要求正义了!试看,你点燃的火把——于解放了美洲后——闪耀到了法国,在那里汇成熊熊火焰,使极权专制变成灰烬,并温暖和照亮了欧洲!颤抖吧!你们这群世界上的压迫者!听着,你们这群奴隶政府和奴隶阶级制度的支持者!……你们现在不能再将这个世界压制在黑暗之中了……。恢复人类的权利,同意改正糜烂……在他们与你同归于尽之前。<sup>③</sup>

这是艾德孟·伯克所不能忍受的。他不再是在国会前为美洲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呼吁的那位激烈的演说者了;他此时已60岁,他已将自已约束在一大批产业上,并已重新恢复了他青年时期



的信仰。1790年2月9日,他在下院中开始了一场辩论,也结束了他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友谊:

我们目前的危险……来自无政府状态:一个危险正领导着经由对一种成功的错认和暴力的赞扬,而进入对过份非理性、不节制、剥夺人权、充公财产、掠夺、残忍、血腥和独裁式民主政治的模仿。在宗教方面,危险不再来自褊狭而来自无神论——一种污秽、反自然的邪恶,一个人类的一切尊严和安慰的敌人——似乎在法国,经过漫长的一个时期,浸浸乎变成一个派阀,得到颂扬,几乎获到效忠。<sup>④</sup>

1790年11月中,伯克发表他的《法国大革命的反响》一书。他以“致巴黎一位绅士”的书信方式来写的——一封365页的长信。他公然驳斥普莱斯博士和纪念大革命学会:他感到,牧师们应该留心他们的业务,即宣布基督教的德行,而不是政治改革;德行抵于物质的心,便是人类本质邪恶之趋势;改革只改变邪恶的表面形式,因为它们影响不到人类本质中的改变。普选是利用蒙骗的一种诈欺;数赞成或反对的人数不会影响到权力的分配和决定。社会秩序对个人安全是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可自由地去违反他所不喜欢的任何法律,社会就不能存在。贵族政体是可欲的,因为它让一个国家受治于有训练和精选的人物;君主政体是好的,因为它有助于秩序和自由去调和困难中给予心理上的统一和历史上的延续。

于这次历史性的公然驳斥后两个月,伯克发表了《致法国国民会议一会员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France)。在这封信中——更要详细的是在《致一位贵族的一封信中》(A Letter to a Noble Lord, 1796年)——他提出了保

守主义的哲学基础。没有个人,不管如何卓越和博学,能在有生之年获得保证他生下来就那些复杂、精致和持久而由经验中具体化的传统,和就社群、国家或种族于所谓历史这座大实验室中试验过几千年,而当作决定的知识和智慧的。“如果一切道德义务之践履,和社会之各种基础,所赖以维持的都能对每一个人说明其理由并示范其所由形成之原因”,那么文明就不可能产生了。<sup>⑤</sup>所以,宗教对于知识浅薄,而陶醉在他的自由主义的理性中的青年们就难以用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直到他有了不少人类本质的体验,并见过原始本能的力量,他将不会感激宗教在帮助社会控制人类先天的个人主义上之贡献的。“如果我们于抛开了……曾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一大渊源之基督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原始性(完全是我们的本能反应),……我们就会耽忧……某些粗暴、恶毒和早期的迷信就会取代宗教的地位。”<sup>⑥</sup>同样的,对一个理性未周而羡慕他邻居的货物的年轻人解释,一个有异常能力的人不必经过长期而花费的训练去获得一种社会上有用的技巧,或刺激他去践履这种技巧也是困难的,除非准许他保留他所赚到的部分当做他孩子们的礼物。进一步来说,人类社会不仅是人群在空间上的一种联合——它也是人群在时间上的一种连续,即死者、生存者或未出生者,世世代代血肉的延续。那种延续在我们中间根植之深,甚于我们在地球上某一部份的联合,它可以随着越过边界的移民而持续下去。这一点如何能对满怀个人野心和一知半解的自傲感,和厚颜无耻地随时准备要断裂家族纽带,或道德束缚的孩子们说清楚呢?

伯克替一个垂死中的世界所作的挽歌却得到不列颠的保守派领袖们以感激和愉快的心情欢迎着;具有成熟判断的人们视这三本出版物为一份对社会和政治哲学的卓越贡献。科尔里奇在他的最后几年中,对它们的热爱,犹如他一度对大革命的狂喜一般。“我想像不出,”他在1820年时写着:“有那一个时间,或那一种事物状态,在伯克的作品中,没有不予以最高评价……。我不能增加或删

除其中任何一个字。”<sup>77</sup>

其中有两个英国人起而为大革命辩护：詹姆士·麦金托什爵士以《高卢人的民主政治辩护》和托马斯·佩恩以《人权》(The Rights of Man)两书，均于1791年出版。大革命当时才只两周年，但是，它已完成了它的基础工作——给予法国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终止了封建特权，确立了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征收教会财富以挽救濒临崩溃的国家；大革命的过度摧毁尚未到来。在这种环境下，麦金托什可能回答伯克说，大革命是对一个不公正和无能的政府的合法抗议。佩恩可能辩称，没有传统应当忍受而否认其他一切改革之努力的，大革命所主张的权利是一个近代国家的正当宪章。

但是，佩恩还不止于此哩。他要求由共和政体来取代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严峻地征收累进所得税以重新分配集中的财富，并且用此所得税以扫除失业和贫穷，和普及儿童教育，与老年人的抚恤金。他用卢梭的词汇重述了人类的权利：

一、人生而自由、平等，至死不渝。因此，民事上的区别，只能以公共利用才可成立。

二、一切政治上联合之目的，是在保存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便是自由权、财产权、安宁权和抗拒压迫权。

三、国家是一切主权的必要来源：任何个人，或任何组织，非经国家明白表示，无任何权威可言。<sup>⑧</sup>

《人权》一书在几星期中就销了5万册；这也许指出1791年时，英格兰激进运动的势力了。带着激进派思想的学会勃兴：如宪政咨询学社(the 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伦敦联谊社(The Corresponding Society of London)、苏格兰人民之友(The Scottish Friends of the People)和纪念大革命学社。有些学社寄给

法国大革命致敬文；其中两个学社协助分送佩恩的书。

庇特已观察到，并且也很困惑。私底下，对佩恩的书他留下印象：“佩恩不是傻瓜，”他对他的侄女说：“他也许是对的；但是，如果我照他所要的去做的，我在明天时就有数千盗匪在手边，而伦敦已成为焦土了。”他发布缉拿佩恩的一道命令；佩恩逃到法国；他受到缺席审判，并宣判为叛国罪（1792年12月）。

英国有许多理由不随法国一起闹革命。他们在1642年就有过法国那种1789年的大革命。他们在法国人之前就有过知识分子的暴动：自然神论腐蚀正统信仰早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前已发生过，并且到1726年，伏尔泰来到英格兰，已经涵允在不列颠的镇静之中了。卫理会运动使某些不满现状者转变成虔诚的信徒。国教教会相当自由，并且没有弄到足以令俗人羡慕和仇视的财富。封建制已经不存在；也没有封建税可言；大部分农民拥有它所耕种的土地。中产阶级已进入国会，在国策上极力发言；首相时常支持它的要求。工人们受到雇主和立法者们的虐待，有些已起而暴动，但是，军队还可以用来镇压他们，而司法官吊死了他们的领袖。当英、法开战时，爱国情操转变阶级仇恨为民族主义的狂热。大革命转变成改革，并且弥漫至整个19世纪。

同时，法国大革命已从立法而演变成九月大屠杀惨案；它的军队已在瓦尔米(Valmy, 1792年9月20日)击败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而大革命的热情已蔓延到莱茵河上的日耳曼。美因茨(Mainz)和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的市民，已经抛弃封建统治，并已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同时害怕支持君主制的军队之入侵和惩罚，已派出密使到法国要求保护。经过一场辩论后，法国政府（于1792年11月19日）发布了最有革命性的一道敕令：

国民议会，在全法国人的名义下，宣布敝国政府愿将友爱和援助给予所有希望恢复他们自由的民族，并责成

执行机构通知各将领必要之命令，俾援助并防卫将要或可能因为自由之故而受到骚扰之民族和市民。<sup>⑩</sup>

这种鲁莽而慷慨的宣布使得每一个欧洲的君主政体跃跃欲动。大不列颠政府因法国军队进入比利时，和法国要求荷兰开放须尔德河(The River Scheldt)给一切贸易之用，更是吃惊不少，这条可航行的河流，有270英里长，发源自法国东部，蜿蜒流经比利时〔紧临安特卫普(Antwerp)〕而进入荷兰境内，分成两条支流，流入北海。荷兰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648年)之准许，除了她自己选择者外，已关闭两条支流供一切贸易之用，因此就厚于不列颠而薄于比利时；所以，安特卫普呈萧条状态，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则欣欣向荣。1792年11月27日，法国政府知会英格兰关于其迫使须尔德河出口开放的决议。庇特答覆称，不列颠受1788年的条约约束，负有保护荷兰免于任何外力攻击之义务。又有进者，由于莱茵河也经过荷兰境内的支流流入北海，由法国控制荷兰意谓法国人控制莱茵河的出入口，因此，也就控制了不列颠从莱茵河抵达中部日耳曼的贸易。1792年12月31日，不列颠政府通知法国：

英格兰绝不会同意任法国逞其所欲——并且假不实之自然权利为藉口，自称为唯一的审判者——擅自弄弄撤销权，取销经神圣的条约所确立，并受各列强同意保护之欧洲政治体系。敝国政府坚持已奉行一世纪以上之格言，亦决不忽视法国，以直接或间接之方法，自命为低地国家(the Low Countries, 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之主权者，或欧洲权利或自由之总仲裁人。<sup>⑪</sup>

1793年1月21日，法国政府砍了路易十六的头颅。于23日

这条消息传抵伦敦，乔治三世震惊，之后不久，大多数英国人民亦惴惴不安。于1月24日，不列颠政府命令法国大使肖夫兰侯爵（Marquis Francois—Bernard de Chauvelin）离开英国。2月1日，法国就对英、荷两国宣战。

乔治三世欢迎这场战争，相信战争会团结这个国家，庇特耽忧这场战争，但是，却付出了他的全部精力。他召开导致第一次联盟（1793年）的谘商；由不列颠、葡萄牙、西班牙、萨丁尼亚、那不勒斯、奥地利、普鲁士和苏俄参加。他向王国内的每一阶级和团体附征重税，并一再地赠送补助品给他的盟国。他紧抓法律以对付任何防卫法国或大革命的宣传。他中止新闻自由，并（于1794年）停止保障每一被逮捕之人尽早审判或迅速释放的人身保护令状（the Habeus Corpas Act）；政治疑犯此时可以拘留而不审判。（法国亦同）于一次有一块石头朝国王丢去的反战示威后，《聚众骚动法》（the Seditious Meetings Act, 1796年）禁止除了在政府批准和控制之下的50人以上之聚会。批评不列颠宪法者就得放逐到澳大利亚洲的植物湾（Australia's Botany Bay）7年。卓越的激进人士——约翰·霍勒斯·图克，语言学者；约翰·泰尔伏（John Thelwall），科尔里奇早期的朋友；鞋匠托马斯·哈迪（Thomas Hardy），伦敦通讯社的创办人——都受到被控叛国罪之审判（1794年5月），由托马斯·厄斯金辩护，并全部获得释放。

这些审判，当不列颠的上层阶级发现自己在花费不费的美洲殖民地叛乱后，不久就面临另一次革命时，正泄露了他们所感受到的痛苦。有千年之久的国王和贵族的世界似乎即将崩溃，受到农民焚毁封建堡垒和地契；城市民众囚禁皇族并割下几百贵族的脑袋。这种种情况，许多不列颠人感到，是无神论的法国哲学家们，和他们的英国模仿者：戈德温和佩恩的影响之结果。现在，在任何时间之内，无神论的法国军队就会攻占荷兰和莱茵省；不出一两年，他们也许要侵犯英格兰。只有1500万人口和没有一支常备军的不列

颠,如何能在战争中击败有 2800 万人口,和一支胜利成果累累的军队的法国呢?

庇特全部了然于心,但是,他想到金钱犹甚于人;人可以用钱来收买,如果不能在英格兰买到,那末,在奥地利、普鲁士和苏俄买到;英格兰有钱,来自每天的商业、工业、土地、殖民地、借贷,每一种消费物资,各种收入上的税赋。这些岁入可装备一小支抵抗未必会发生的侵略军队;它们可维持不列颠的工厂忙碌;她的报纸之爱国情操和她的漫画家们是首屈一指的;他们可以支付由由于金钱而人口众多的盟国提供之新军的餉糈。总而言之,他们可以建造、装备大量舰只,足够的军备,去控制海洋,封锁每一个法国港口,截获在海上的任何一艘法国船只;兼并任何法国殖民地入不列颠帝国之版图。每一个月中,海军在巨型舰只之建造、训练有素而无与伦比的海员上日渐在茁壮。它培养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司令中之一人。

## 第二节 纳尔逊

(公元 1758—1804 年)

纳尔逊家族(Nelsons)最初是尼尔森家族(Nielsens),属于盎格鲁维金种的东支(East Anglian Viking stock);也许霍雷肖(Horatio)具有航海的血统吧。他生于 1758 年 9 月 29 日,临海的诺福克郡(Norfolk)的伯纳姆索普地方(Burnham Thorpe)。他的父亲是教区牧师。他的母亲是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的亲戚。他的哥哥莫里斯·萨克林船长(Captain Maurice Suckling)于 1770 年任命为预料与西班牙战争的英王陛下 Raisonnable 号战舰

的舰长。霍雷肖在 12 岁时，恳求并获准在他的手底下服务；兹后，这名男孩的学校就是海洋。

他的身体并不健壮；他时常生病；但是，他决定抓住每一个教育、发展和荣誉的机会。他在不同的任务下在不同的船只上服务，不断冒着生命危险；按部就班地擢升，20 岁时，成为木造双帆船 Hinchinbrook 号的船长。他虚荣却也很能干，从不怀疑他有朝一日到达权力和名誉的顶峰。他无条件地服从他的上司，他们与不吝啬地奖励他的部属；但是，他为不列颠先奉献了一只臂膀，接着是一只眼睛，最后是他的生命，而他的高傲就如他的高傲地耸立起来的纪念碑。

对眼睛所能及和手所能触摸的事物都很敏感，他随时准备匍匐在美丽、优雅和温婉的女人脚边。以阿尔伯玛号(The Albermarle)船长的身份，于 1782 年在魁北克(Quebec)省时，他几乎不顾他的事业而要离开职务，回到城里去向前晚上给予他温暖的一位女人求婚；一名果断的朋友阻止了他，叫他回到他的任务和命运上去。<sup>①</sup>1787 年，担任巡洋舰 Boreas 的舰长，他赋闲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安提瓜岛上(Antigua)，娶了弗兰西斯·纳尔逊夫人(Mrs. Frances Nisbet)，一位有一个富有的叔伯的漂亮年轻寡妇。他带她回到英格兰，安置她在一处不大却很舒适的宅邸上，并和她在乡下消磨了一段愉快恩爱的时光。当与法国的战争不能避免时，他被任命为(1793 年) Agamemnon 号舰长——海军高效率舰只之一——奉命加入胡德爵士(Lord Hood)的地中海舰队，并顺便携带一件通知给威廉·汉密尔顿爵士(Sir William Hamilton)，驻那不勒斯朝廷的不列颠公使。他送了这件通知，却邂逅了汉密尔顿夫人。

阿美·李虹(Amy Lyon)，1761 年生于威尔士的一家铁匠店，年轻时曾用她的肉体来赚取面包，并且在她 19 岁时已生下两个私生子。在那一年，她成了沃里克伯爵(the Earl of Warwick)的二公子查尔斯·格雷维尔(Honorable Charles Greville)的情妇。他重新



替她取名艾玛·哈特(Emma Hart),教给她成为一名贵夫人的艺术——唱歌、跳舞、弹大键琴,拥容地入室,应对和倒茶。当他除了她的灵魂以外,重新装扮了她的一举一动时,就带她去见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他画过她30幅人像。当格雷维尔有一个机会娶一位女继承人时,他必须替他的漂亮情妇找另一张床;她此时已学会爱他了。所幸,他的叔伯威廉·汉密尔顿爵士,一位无嗣的鳏夫,当时适在英国。他富有,是乔治三世的一位义兄弟,英国科学院的一名评议员,赫格莱那作品(Herculanea)和古典艺术的一名杰出收藏家。他发现埃玛合他心意,同意将她从侄子手中接过去。返回那不勒斯后,他寄给艾玛一封到那不勒斯的邀请信,由她母亲陪同,到那里完成她的音乐教育。她接受了,了解查尔斯·格雷维尔不久就会跟她而去。结果他没有去。

威廉爵士给了她和她的母亲在不列颠使馆中的四间房子。他以奢侈的享受和老练的赞美来安慰她;他替她安排音乐和意大利语的课程;他毫无怨言地付她的女帽费用。她写给格雷维尔思念的信件,恳求他前往;他吩咐她“听从威廉爵士”;他的信稀少了,简短了,终于没有了。她变成威廉爵士的情妇,因为她喜欢爱情仅次于奢侈的生活。此外,她举止谦和、谨慎,布施慈善,成了修女、国王和王后的知交。她坐下来供拉斐尔·门斯(Raphael Mengs)、安杰莉卡·考夫曼(Angelica Kauffmann)和维热勒布伦夫人(Mme. Vigée-Lebrun)画她的肖像。喜欢上了她,威廉爵士就娶了她做妻子(1791年)。当法国对英格兰宣战时,她变成一位积极而热情的爱国者,努力使那不勒斯维持与英格兰的联盟关系。

1794年夏天,纳尔逊奉命封锁卡尔维(Calvi),当时掌握在法国人手中的一个科西嘉海港。他攻下了这座碉堡,但是,当战斗期间,一粒子弹落在他的身旁,四散飞扬的沙土进入他的左眼。伤势复原如初,但是,眼睛从此就失明。

那次胜利在整个事件中不算什么,因为以后两年中的战事极

不利于英格兰。拿破仑进入意大利，驱散萨丁尼亚和奥地利的联军，迫使萨丁尼亚、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离开第一次联盟国，并接受与法国的和平条件。1796年10月，西班牙因不列颠在西印度上的行动激怒了，对英格兰宣战。以西班牙的舰队加入法国人在地中海的活动，地中海对不列颠就不安全。1797年2月14日，一支由15艘军舰组成的不列颠舰队，在当时的地中海舰队司令海军上将约翰·杰维斯爵士(Admiral Sir John Jervis)率领下，在葡萄牙海岸西南站，圣·温森角(Cape St. Vincent)外30海里处，遭遇到27艘船舶组成的西班牙舰队的拦截。纳尔逊正坐镇英王陛下的战舰船长号(H. M. S. Captain)，指挥这艘战舰及其他船舶直扑敌方舰队的后卫，并亲自率领人员登上敌舰，俘获了圣·约瑟夫号(the San Josef)和圣·尼古拉斯号(the San Nicolas)。这批西班牙军舰，装备窳劣，操作不善，炮手训练不精，一艘接一艘地投降，让英国打了一场十分漂亮的胜仗，杰维斯被封为圣·温森侯爵，而纳尔逊授予了巴斯武士的爵位。不列颠海军再度称霸地中海。

1797年7月，纳尔逊——此时为一名海军少将——被派去攻夺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之一上的圣克鲁斯城(Santa Cruz)。因为是保障他们与美洲贸易上的要冲，这城受到西班牙人顽强地防守着。这一战役遭到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加上风浪恶劣，使得不列颠的登陆船艇几乎不可能迫近；有些撞碎在岩石上，有些被西班牙的巨炮轰碎；这次突击失败。纳尔逊自己也右肘中弹；这只手臂无可奈何地被锯掉了，而纳尔逊被送回家去，在他太太的照顾下疗养。

他每次想到海军总部会将他列入——只有一只手臂和一只眼睛——永久残废者名单时，他就会烦恼。他恳求一项新的任务。1798年4月中，他受命为英王陛下战舰前锋号(H. M. S. Vanguard)的海军少将，加入圣·温森爵士巡行在直布罗陀附近海面的舰队中。5月2日那天，他受命指挥防线上的3艘战舰和5艘木

造双帆船,在土伦外面监视,拿破仑利用那里的海港碉堡做掩护,正在准备一次秘密的远征行动。5月20日那天,纳尔逊的小舰队被一场暴风雨吹打得破损不堪,不得不退至直布罗陀去从事整修。当这批战舰重新回去监视时,纳尔逊得知,这支法国小舰队,在天黑的掩护下,已经驶离土伦(Toulon),朝东方驶去,目的地不详。他即开始追踪,根据不实的线索花了不少冤枉时间,粮精罄尽,暂避入巴勒莫港(Palermo)补充粮秣和整顿他的舰队。这就让他透过汉密尔顿夫人的调解与那不勒斯政府交涉,使得与法国处在和平状态中的那不勒斯政府对于这种破坏中立的举动犹豫不决。

他的战舰又恢复正常,纳尔逊重新率领了它们去搜寻拿破仑的舰队。他终于在亚历山大港附近的阿布刻岛(Abukir)找到。此时,他再度冒了各种危险。1798年7月31日晚上,他命令他的军官们将全部舰只部署妥当预备黎明时的海战。“到明天这个时刻,”他说:“我要得到一项贵族的爵位,否则便是威斯敏斯特的教堂墓地”。一位英雄的最后归宿。<sup>49</sup>在战斗中,他如往常一样身先士卒。一块炮弹的破片击中他的前额;他被拖至甲板下面准备捐躯,但是,伤势不严重,不久,纳尔逊头上裹着绷带,又回到甲板上,守在那里直到不列颠大获全胜时为止。

当危险的“小班长”显然已冒起来了时,庇特又与苏俄、土耳其、奥地利、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组成了第二次的联盟。那不勒斯的皇后玛丽亚·卡罗来纳(Maria Carolina),是被送上断头台的玛丽·安托瓦妮特的妹妹,高兴看到她的混乱王国再度结合在哈布斯堡王朝和天主教教会的这一边,与她忧闷的国王斐迪南四世(Ferdinand IV)准备为纳尔逊胜利回来的残破舰队来一次盛大的欢迎,舰队于1798年9月22日停泊在那不勒斯港中。汉密尔顿夫人,于见到这位负伤的司令时,冲向前去欢迎他,昏厥在他的怀里。<sup>50</sup>她和丈夫带他到沙萨广场上的使馆(The Palazzo Sassa),并尽量使他安适。埃玛毫不掩饰她的迷念,这位饥渴的英雄在她的微笑

和照顾下对她倾心了。他40岁，她37岁；她不再令人神魂颠倒，但是，她近在咫尺，并且已成为他生命中仅次于战争的谄媚贯注到这位英国人的头脑中去。威廉爵士，此时已届58岁之年，并已床头金尽，只沉醉在艺术和政治上，聪明地接受这种态势，也许还有松口气的感受呢。到1799年春天，纳尔逊已付过大部分埃玛的费用。不列颠海军总司令部，于投票决定给予他最高荣誉和一大笔赏金，并准许他适当地休息后，吩咐他去支援其他的海军司令；他以留下来保护那不勒斯阻止正在蔓延的革命之重要理由做藉口而推诿了。

1799年下半年，汉密尔顿则由阿瑟·拉热(Arthur Paget)接替不列颠驻那不勒斯公使的职务。1800年4月24日，威廉爵士和埃玛离开那不勒斯前往来亨，他们在那里与纳尔逊会合；自此后，他们从陆路到不列颠海峡，再渡过海峡到英格兰。全伦敦市庆祝他，但是舆论谴责他钉住另一个人的太太之不当。纳尔逊夫人前来使丈夫改邪归正，并要求他自动离开埃玛；当他拒绝时，她离开了他。1801年1月30日，埃玛在威廉爵士的宅邸生了一名女婴，替她取名霍雷希亚·纳尔逊·汤普森(Horatia·Nelson Thompson)，意指为“纳尔逊种下”的结晶。在那个月中，纳尔逊，当时已晋升为海军副总司令，出发去接任他的次一任务——攻夺或摧毁丹麦舰队；我们在那里见到他的表现。他回来后，正当《亚眠和约》(the Peace of Amiens)期间，他住在萨里(Surrey)的墨顿的(Merton)宅邸上，汉密尔顿一家成了他的上宾。1803年4月6日，威廉爵士去世，死在他太太怀里，同时却也执着纳尔逊的一只手。之后，以每年800英镑的遗产继承，她就和纳尔逊住在墨顿，直到他受到召唤去追求他伟大的胜利和死亡时为止。

### 第三节 特拉法尔加角

(公元 1805 年)

当庇特辞卸他的首相职务时(1801年2月3日),他决定支持他的朋友亨利·阿丁顿(Henry Addington)作为他的继承人的任命。阿丁顿具有庇特的厌战倾向。他指出战争得不到国人的拥护,特别以出口商为最;他看出奥地利在马伦戈(Marengo)兵败后,如何蓄意要解散第二次联盟的意图;他看出将金钱支助这样优柔寡断的盟邦是毫无意义的浪费;他决定当面子能保全时立刻终止这场战争。1802年3月27日,他的代表与拿破仑签订了《亚眠和约》。有14个月之久,炮声沉寂了;但是,拿破仑在意大利和瑞士扩张他的权力,而英格兰拒绝放弃马耳他,终止了这段宁静的日子,对垒又于1803年5月20日恢复。阿丁顿委派纳尔逊指挥并筹组一支舰队,它的任务十分简单:侦出法国舰队的主力,就地歼灭至片甲不留。同时,拿破仑在布洛涅(Boulogne)、加来、敦克尔克(Dunkirk)和奥斯坦的广大一片军营、海港和军火库补充人员和物资,并建造数百艘船只准备载他的军团渡过英伦海峡去征服英格兰。阿丁顿挣扎着应付这次挑衅,但是,他犹豫不决,不能指挥,同时,国内的防御组织呈混乱现象。当他的党支持他的人数从270人降到107人时,他表示愿意辞职;于1804年5月10日,庇特就二度拜相。

他立刻开始与俄国、瑞典和奥地利组成第三次联盟(1805年),并给予他们从提高25%的税收中所得来的金钱补助。拿破仑便命令他的海峡雄狮班师回法,以给予奥地利另一次教训做为反

应；并且下令给他的海军副总司令皮耶·戴·维尔纳夫(Pierre de Villeneuve)，要他准备法国海军最精良的战舰，去对付纳尔逊，以一战结束不列颠的海上控制权。

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the Victory)上有 703 人，平均年龄 22 岁；有些十二、三岁，少数几人只 10 岁。大约有半数是由强制征募来的；许多是被判决到海军去服刑事判决罪的囚犯。他们的薪资极低，但是，依据他们的驻地和行为，他们可分到从截获来的船舶或仓库中得来的现金。上岸离去的绝少，因害怕脱舰罪；为迎合这些人的需要，一船船的妓女带到船上去；在布勒斯特(Brest)，某一清晨，有 309 个女人和 307 个男人一起在水中载浮载泳。<sup>⑧</sup>这批征兵经过严格的训练后，学会使自己去适应他们的环境，通常就他们的工作和勇气感到自责。据说，纳尔逊颇孚众望，因为他决不处罚，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却也先表示出显然的歉意；因为他知道一名海员的辛苦，并且他在战略或指挥上也很少有失误的；因为他亲冒敌人的炮火之危险；因为他要使他的人员相信，他们决不背弃他或英格兰，并且也决不会失败。这就是纳尔逊奇迹，使得这批受刑的人爱他。<sup>⑨</sup>

1803 年 7 月 8 日，他的 11 艘战舰驶入地中海上宽阔的土伦港，维尔纳夫和他的舰队受到要塞内护航的大炮掩护。法国海军司令稍后接到拿破仑的新命令：撤离土伦，往直布罗陀突围，航向西印度群岛，与在那里的另一支法国小舰队会合，攻击在那里遭遇到的任何不列颠武力。当纳尔逊的舰队驶至一个萨丁尼亚港口的水面上时，维尔纳夫逃离土伦(1805 年 3 月 30 日)，全速驶向美洲。纳尔逊稍后追赶他，于 6 月 4 日抵达巴巴多斯(Barbados)。听到这一消息，维尔纳夫回头驶入大西洋，与 14 艘由西班牙船舶组成的小舰队，在海军司令弗德里科·德·格拉维纳(Admiral Federico de Gravina)统率下，在科伦纳(Corunna)实施联合作战。

拿破仑的修正命令又要他驶向北方，加入另一支法国在布勒

斯特的舰队,企图在纳尔逊从西印度群岛回来前,攫夺到英伦海峡的控制权。但是,维尔纳夫的战舰,于他们在加勒比海巡弋后,已不具备面对战斗的条件。8月13日那天,他率领了他的扩弃后的舰队,全速驶向南方装备精良,防御严密的加的斯港,开始在那里重整战舰和人员。8月下旬,一支由海军副总司令卡思伯特·柯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统率的不列颠小舰队负责监视维尔纳夫的任务。纳尔逊于完成来回横渡大西洋的壮举后,认为他和他的人员也需要整编和休息,他奉准和他的情妇在墨顿徘徊几星期。9月28日,他和他的舰队和柯林伍德一起在加的斯外的海域上,不耐烦地等着法国舰队出来一战。

拿破仑又改变了他的训令;维尔纳夫驶离加的斯,设法避开不列颠舰队,前去与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合作加强法国对那不勒斯的控制。10月19日和20日,这位颇不情愿的海军司令率领他的33艘战舰离开加的斯,前往直布罗陀,20日那天,纳尔逊看见了它们,立刻命令他的27艘船只备战。他于当夜开始,翌日早晨完成的一封信写给汉密尔顿夫人的信上说:

我至爱的埃玛,我胸中的亲爱朋友,讯号告诉我们,敌方的联合舰队正在驶出港来。海面平静无浪,所以我没有要在明天前见到它们的希望。愿战神赐我万事成功,我愿我的名字对我爱得超过我自己生命的你和霍雷肖永远温馨甜蜜……愿万能的上帝赐我们战胜这批家伙,使我们获得和平。<sup>①</sup>

在战斗当天的日记上,他写着:

……愿伟大的主……赐予我的国家,并为了全欧洲的福泽,一次伟大、光荣的胜利,愿没有任何失误污损这

次胜利；并愿人性接踵着胜利成为不列颠舰队的主要特征。至于我自己……我献上我的生命给造我的上帝；愿他的祝福使我忠诚地为我的国家服务。我将自己和托付我去防卫的正义交给他。阿门！阿门！阿门！<sup>⑨</sup>

敌方的舰队于 1805 年 10 月 21 日，在加的斯南方不远处的西班牙海岸上特拉法尔加角外海遇上了。维尔纳夫从他的旗舰 *Bucentaure* 号上发出讯号给他的战舰，形成南北向一线纵队，左舷对准驶近的敌舰；当这批战舰发现自己是两列纵队朝东北向前进的不列颠武力的目标时，他才勉强地完成了这一部署。上午 11 时 35 分，纳尔逊从他的旗舰上发出一道有名的：“英格兰期望人人尽忠职守”的讯号火速传给他的舰队。11 时 50 分，海军上将柯林伍德指挥着 15 艘战舰，命令他的旗舰皇家主权号（the *Royal Sovereign*），直接朝海军司令格雷维那的第一艘和第二艘巨型战舰 *The Santa Ana* 和 *the Fonugewo* 之间的缺口驶过去率先攻击。藉着这一行动，他的人员就处在两艘西班牙战舰的舷侧开火的位置上，而它们却无法还击——那时的战舰前后只设计少数炮位，甚或没有设置。不列颠的炮手还有一个额外的有利情势：他们可以用燧石发火装置点燃大炮（手枪的燧石装置设置燧石在扳机上击出火花）；这种方法比法国人用火柴来引燃大炮的方法要快上两倍；火力因战舰的晃动而更为集中。<sup>⑩</sup>柯林伍德的小舰队的其他舰只依照他的方法穿过敌舰防线，然后散开，集中攻击格雷维那的舰队；他们的士气因之低落。在这一战线的北端，法国战舰勇敢地抵抗纳尔逊愤怒的攻击；有些士兵当他们死去时高呼“皇帝万岁！”然而，就如在阿布刻一样，不列颠水手在驾驶术和射击上卓越的训练和技术打了胜仗。

但是，当一名射手从 *Redoubtable* 的中桅上朝纳尔逊射出致命的一击时，胜负却已经很分明了。这位海军上将不仅如往常一样身



先士卒；由于拒绝取下挂在他胸前的英格兰颁赠给他的功绩勋章，他冒了更大的危险。弹头穿进他的胸部，碎裂了他的脊椎骨。他的忠诚助手托马斯·马斯特曼·哈迪上尉(Captain Thomas Masterman Hardy)背他进入甲板下面的安全处所；贝蒂医官(Dr. Beatty)证实纳尔逊自信只有几小时生命的确信。他神智继续清醒了四小时，足够他知道他的舰队已打了一场大胜仗，敌舰 19 艘投降，不列颠的则全部没有投降。他的最后遗言仅是：“照顾我心爱的汉密尔顿夫人，哈迪；照顾可怜的汉密尔顿夫人。”接着，“吻我，哈迪。此刻我很满足。感谢主，我完成了我的任务。”<sup>⑨</sup>

全部纳尔逊的战舰，在纳尔逊临死时的命令下停航，躲过了他预见到的飓风，并及时低达英国，让它们的水手享受举国庆贺他们胜利的盛会。这位英雄的尸体，泡在白兰地酒中延长腐烂的时间，直立在一口棺材里运到英格兰，接受了记忆中最盛大的葬仪。哈迪上尉交给汉密尔顿夫人她死去的情人的诀别信。她当做她唯一的慰藉般珍藏着它。在信尾上他写着：

啊，忧愁悲痛的埃玛，  
啊，光荣愉快的纳尔逊。

他的遗嘱将他的全部财产和政府的酬劳留给他的太太，不包括在墨顿的房子，房子由埃玛·汉密尔顿保留。耽忧这一点——加上来自她丈夫的年金——不能让她过着舒适的生活，他在战斗当天，在遗嘱上加了一条附录：“我留下埃玛·汉密尔顿夫人，作为国王和国家的一项遗产，愿他们给予她充份的供应，以维持她那种身份的生活”；在他垂死的几小时里，据司各脱报告，他要求他的国家也应该照顾“我的女儿霍雷肖”。<sup>⑩</sup>国王和国家漠视这些要求。埃玛于 1813 年因债务被捕，不久即释放，逃到法国躲开她的债权人。她于 1815 年 1 月 20 日在贫困中死于加来。

海军司令格雷维那，于一次光荣的抵抗后，乘着他的旗舰逃至西班牙，但是负伤过重，不出数月即死了。维尔纳夫的指挥并不明智，却战斗得十分勇敢，如纳尔逊一般身先士卒，毫不瞻前顾后；他只于他的人员几乎全部阵亡后投降。他被带到英格兰，就释放了，回到法国去。不愿见到拿破仑，他于1806年4月22日在雷恩(Rennes)的一家旅馆中自杀。他的最后一封信向他的太太请求原谅他的遗弃，并感谢命运，他没有留下子嗣去“背负他的姓氏。”<sup>⑥</sup>

特拉法尔加是历史上“决定性战斗”之一。它决定了不列颠一个世纪之久的霸权。它终止了拿破仑将法国从不列颠舰队沿着她的海岸封锁线上解放出来的机会。它迫使他放弃侵入英格兰的念头。这意思是他在陆上的战斗花费愈来愈昂贵、愈昂贵却愈战斗。他想以在奥斯德立兹(Austerlitz 1805年12月2日)大胜来消除特拉法尔加的耻辱，但是，这一战却导致耶拿(Jean)、埃劳(Eylau)、弗里德兰(Friedland)、韦格勒姆(Wagram)、博罗季诺(Borodino)、莱比锡(Leipzig)和滑铁卢诸役。海权占了上风。

纵然如此，熬受过上百次危机而欣见特拉法尔加胜利的庇特，同意拿破仑之奥斯德立兹可媲美之说，同时也抵销了纳尔逊大捷的想法。经受内政和外交上一连串危机的折磨后，他从伦敦隐退至巴斯去休养调息。他在那里接到居于联盟国枢纽地位的奥地利再度崩溃的消息。这一震惊给了已经被白兰地加倍销蚀的病体致命的一击。1806年1月9日，他被带回到他在帕特尼(Putney)的家中。在那栋房子里，于1806年1月23日，以47岁的年纪，几乎在他成年后的几月中，就担任大不列颠的首相之后逝世了。在那19年中，他协助指引了他的国家迈上工业、商业和海上霸业，并且娴熟地改良了她的财政制度；但是，他却既不能抑制法国的大革命，也没有阻扼拿破仑的霸权在欧洲危险的扩张。对英格兰十分珍惜的欧陆权力平衡就此消失，辛苦地压制下去的国内言论、集会和新闻自由，因战争延续了12年，而仍见不到熄战的讯息而不耐烦了。

## 第四节 英格兰世纪

(公元 1806—1812 年)

篇幅不允许我们详述继承庇特的四位部长的职务。除了福克斯的一年任期外,他们的精力发泄在个人和党派的问题上、多过政治才干和政策上,而他们在国际上的总和则每况愈下:由繁荣降至贫穷,由进取而变为延宕。

短命的“人才内阁”(1806—1807年)则由当时任外交部长之职务的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的努力安排与法国谋和而辉煌起来。他的变幻不定的一生,可由一位勤奋的自由主义者,和他接受法国大革命,甚至拿破仑的古怪历史之能力上表露出来。很不幸,当他掌权时,他的体力和智能已因不知节制的饮食消耗殆尽。他送信给塔莱朗(1806年2月16日),一名不列颠的爱国志士带着暗杀拿破仑的计划到外交部;并补充说,这名笨蛋正受到密切监视,就漂亮地打开了谈判的途径。皇帝感激这种姿态,但是,他因战胜奥地利而意气昂扬,而不列颠也因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的胜利而志得意满,因此双方都不愿作筹备和平所需要之让步。福克斯以向国会提议终止奴隶贩卖上的成就较为卓著;由威尔伯福斯和其他上百位人士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这种措施变成了法律(1807年3月)。到那个时候,福克斯却已去世了,享年57岁。不列颠的政治陷入一片混乱。

不过,对于波特兰公爵威廉·凯文第希·彭汀克内阁(1807—1809年)的主脑人物们,这决不是一句公正的话。乔治·坎宁,外务大臣,派遣一支舰队去轰炸哥本哈根(1807年);罗伯特·史都

华·卡斯尔雷子爵(Robert Conning, Viscount Castlereagh),国防部长,派遣一支亲率的远征军,意图攻占安特卫普(1809年)。这两位大臣,才干和感情旗鼓相当,彼此对各人的主管业务交相指责,决斗了一场,结果坎宁受到轻伤。在内忧外患交相夹攻之下,波特兰内阁总辞了。

斯宾塞·珀西瓦尔(Spencer Perceval)出任首相时(1809—1812年)亲眼见到了不列颠到达19世纪最低潮、和痛苦折磨的双重不幸。迨至1810年秋,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已完全伤害到不列颠的工业和商业,以致数以千万计的不列颠人失业,几百万人濒临饥饿的边缘。混乱引起革命暴动;路特派的织工们开始于1811年中捣碎机器了。1810年中,不列颠对北欧的输出赚了770万英镑;<sup>⑨</sup>1811年中,他们只赚150万英镑。1811年中,英格兰与美洲有第二度战争的趋势;因为她输出至美国的部分费用自1810年的1130万英镑,降至1811年187万英镑。同时,每一个不列颠人的税赋不断在升高,直至1814年时,他们的负担威胁到不列颠的财政制度,和她在海外的通货信用之崩溃。饥饿的不列颠人呼吁降低国外进口谷类的进口税;农业区的不列颠人反对这样一种动议,免得它削减了他们的生产品之价格;拿破仑以出售出口执照给法国的谷类生产者来缓和英格兰的叫喊(1810—1811年);他需要现金供他作战的战费。当拿破仑的大军于1812年向苏俄推进时,英格兰知道,如拿破仑胜利意指加强关闭欧陆上所有港口以对抗不列颠的物资,和拿破仑更严密控制大陆对不列颠的运输,全英格兰正注视着、也耽忧着。

乔治三世为例外。他因最后一次陷入聋、盲和精神错乱状态中而已不关心这些事务。他最疼爱的女儿阿米莉亚之死(1810年)是最后的一次打击,使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全部中断;目前,他完全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中,那里没有叛乱的殖民地,没有福克斯这种角色任部长,没有粗鲁、嗜杀的拿破仑。他一定在这种状况中找到

了某种满足,因为他的健康改善了;他多活了十多年,在较 1810—1812 年还要糟糕的战后不景气期间,过着优游惬意的生活,语无伦次地纵情谈个没完。他的声望因他的疾病而提高。他受饥挨饿的百姓怜悯他,同时也带着几分古老的神秘奇怪着:岂不是上帝安排他精神不正常而令他摆脱俗务的么!

1812 年 5 月 11 日,在下院的休息室中,首相珀西瓦尔被一名破产的经纪人约翰·贝林厄姆(Johu Bellingham)射死,贝林厄姆感到他的商业是因政府的政策而毁灭的。6 月中,利物浦伯爵组织了一个新的内阁,由于策略和环境的奇迹使然吧,这个内阁延续到 1827 年。在同一个 6 月中,美国向英格兰宣战,而拿破仑的 50 万大军越过尼敏(Niemen)进入苏俄。

第三部  
**拿破仑与欧陆**



## 第一章 伊比利亚半岛\*

### 第一节 葡萄牙

(公元 1789—1808 年)

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到葡萄牙时，葡萄牙人正在努力恢复中世纪时的太平社会。在此以前，庞巴尔侯爵 (Marques de Pombal) 曾费尽心机，采取激烈的手段，图使葡萄牙在文化、法治方面，能与路易十五的法国与查理三世的西班牙并驾齐驱。比利牛斯山脉阻挡了法国与半岛间思想的交流；而另一方面因为西班牙一再意图吞并其兄弟之邦，也使得西班牙的思想无法传入葡萄牙。在两国境内的宗教裁判所，也好像是耸立皇宫门口的狮子一般，对任何怀疑古老教义的思想，都怒目而视，加以排斥。葡萄牙的基层民众也是维护旧社会的。他们思想简单，大多目不识丁，例如农民、工匠、商人、士兵等。他们盲目地接受世代相传的信仰；宗教的传奇抚慰着他们的痛苦，宗教的奇迹激起了他们

---

\* 古希腊人以此名称呼伊比鲁斯河 (the River Iberus)，即埃布罗河 (Ebro) 流域，后来并用以涵盖整个西班牙、葡萄牙半岛。



的敬畏，而宗教的仪式感动了他们的心灵。社会的上层人士是典型封建宗主和习俗的代表，他们也是葡萄牙的大地主；最后是那位怯弱的玛丽亚皇后（Maria Francisca）和她的儿子约翰。约翰初为监国，后来登基为王。他们两人都忠诚地保护教会，因为他们认为教会是维护道德、社会秩序和君权神授说不可或缺的支柱。

不过，在这些维护旧信仰的哨兵群中仍潜伏了少数的异端人士；他们大都是学者、兄弟会会员、科学家、诗人、商人、少数官员，甚至有二三个贵族。他们已经厌倦了旧社会的束缚，暗自心仪哲学的思想；他们也对代议政体、自由贸易、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的理想向往不已。他们渴望加入世界心智的潮流。

法国大革命的消息虽然迟迟地传入了葡萄牙，但仍使这群小心翼翼的异端人士、这些民众、显贵和宗教法官大吃一惊，张口结舌；对他们来说，这不啻是一振奋人心或恐怖绝伦的启示。有些冒失的人居然公开庆祝，如葡萄牙的兄弟会会所即欢欣赞扬此一大事，葡萄牙驻巴黎大使（他可能读过卢梭或是听说过米拉波），对法国国民会议大加颂扬，葡萄牙外交大臣还容许官方公报对攻占巴士底狱一事致贺忱，法国书商也在葡萄牙公开出售《1791年革命宪法》一书。<sup>①</sup>

但是，当1792年巴黎暴动推翻了路易十六以后，玛丽亚皇后也兔死狐悲，感到自己的大位岌岌可危，于是让位其子。这位未来的约翰六世把愤怒的箭头指向了葡萄牙的自由主义分子。他希望警察首长对所有兄弟会会员、知名外侨、提倡革新政治的作家，均加以严密监视、逮捕或驱逐。自由人士的领袖——席尔瓦（Francisco da Silva）被捕入狱；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都被驱出宫廷；当代葡萄牙诗坛的泰斗——博卡热（Manuel du Bocage, 1765—1805年）因为写了一首反对专制的十四行诗，也在1797年锒铛入狱。他在狱中翻译奥维德（Ovid）和维吉尔（Virgil）的作品以谋生。<sup>②</sup>1793

年，法政府处决路易十六一事激怒了葡萄牙，于是她随着西班牙加入了对抗法国的圣战，并且派了一支小舰队加入英国在地中海的海军。1795年，西班牙单独与法国媾和，葡萄牙要求以类似的条件和解，但法国认为葡萄牙只是英国殖民地和属国，因此拒绝了谈和的要求。两国从此纷争不息，葡萄牙也拒绝加入拿破仑大陆封锁的联盟。拿破仑征服半个欧洲后，终于将战矛指向这个小小的国度。

在葡萄牙的军事、政治情况背后，是其不稳的经济结构。与西班牙一样，葡萄牙的财经全都依赖由其殖民地运入贵重金属来维持。他们用这些金银珠宝，而不是用本国的产品来偿付进口货物的开支，来装饰皇上的宝座，来增加富人的财富、来购买奴隶和奢侈品。当时中产阶级尚未兴起，尚无人利用进步的农业技术和科技来开发自然资源。海权转移到英国手中后，葡萄牙必须逃避英国海军或是与英政府妥协来获取黄金。可是西班牙不惜与英一战，并且倾全国财力建立了一支在任何方面——除了士气和训练——均为第一流的海军。后来西班牙在很不情愿地与法海军合并后，在特拉法加惨遭大败，从此只好依靠法国的保护。而葡萄牙为了免于被法国和西班牙吞并，只好依赖英国的保护，葡萄牙各大据点立刻充斥着具有企业精神的英国人，他们到处开设和经营工厂，英国货也成为葡萄牙进口贸易的大宗，而英国人也开始喝着葡国波尔图（Oporto）（“港口”）来的葡萄酒。

这种情况惹火了拿破仑，也挑起了他的野心。葡萄牙与英国贸易，将使拿破仑禁止英货进入大陆市场，以逼迫英国求和的计划完全落空，于是他有了征服葡萄牙的借口。同时，征服了葡萄牙，更能约束西班牙遵守法国的政策；再说，臣服的西班牙又可给拿破仑家人另一个可以坐上的王位。因此，正如我们所知的，拿破仑便游说西班牙与法国共同入侵葡萄牙，葡国王室逃到英舰上逃往巴西。1807年11月30日，朱诺将军率领法西联军没有遇到

任何抵抗便进入了里斯本。葡国自由派人士纷纷涌进新政府，他们希望拿破仑能合并葡萄牙，并为他们制定代表制政体的新宪。朱诺表面上听从他们，私底下却嘲笑他们的主张。1808年2月1日他宣称：“伯拉乾札（Braganza）王朝已经崩溃”，然后，他自己也越发像个国王了。<sup>③</sup>

## 第二节 西班牙

（公元1808年）

这时，西班牙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甘愿故步自封。这是个醉心神教的国家，人民蜂涌前往庄严巍峨的大教堂，或不辞千里参拜神龛。教士与日俱增，人民追求着上帝赦免的慰藉，或敬畏着宗教法庭的惩罚。当圣体的庄严行列行经街道，人民纷纷长跪膜拜。总而言之，西班牙是个信仰虔诚的国度。信仰把上帝带入了每个家庭，信仰管教了子女，维护了贞操，并给予人们在人生——这累赘的考验历程——结束之时升入天堂的希望。在西班牙，即使再过一代，博罗（George Borrow）仍然发现：“此地一般的民众极为愚昧无知”；至少在莱昂（Léon）这种地方，“店铺中仍旧出售着镇压撒旦和魔鬼、灾祸的印好的符咒，而且生意还很兴旺呢！”<sup>④</sup>拿破仑虽然和教会订立了协定，但他的思想却是受过启蒙运动洗礼的，因此他也说过：“比起俄国，西班牙农民接受的欧洲文明更为贫乏。”<sup>⑤</sup>可是，如拜伦告诉我们的：西班牙农民却是“如高贵的公爵一般地洋洋自得哩”。<sup>⑥</sup>

教育几乎只限于中产阶级和贵族人士。识字代表着一种特殊的身份。甚至一般绅士也很少有读书的。其实统治阶层并不信任

出版和文字。<sup>②</sup>不管如何，以西班牙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论，也不需要受过教育的大众。固然有些商业城市如加地斯（Cádiz）、塞维利亚（Seville）已十分繁荣，甚至1809年时拜伦还认为加地斯“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sup>③</sup>有些工业中心也已经崛起。托莱多（Toledo）仍以出产刀剑闻名于世。<sup>④</sup>可是国境内崇山峻岭遍布，因此只有1/3的土地可以利用来耕种获利。道路和运河稀少，维护困难且不善。地方和省级税目繁多，阻挠贸易甚巨。因此国内谷物自产还不如输入便宜。<sup>⑤</sup>西班牙农民为贫瘠的土地所囿制，因此他们宁愿悠闲终日，自得其乐，也不愿冒险去辛苦耕种。城镇的居民则认为与其终年劳苦尚不得温饱，不如走私以图暴利。税收的负担较诸收入只有一天比一天重。日渐庞大的官方机构，无孔不入的警方，腐败的中央政府都在巧立名目，征收税金，给西班牙加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西班牙虽然面临着这些困难，但是国家元气仍然不曾损伤。斐迪南（Ferdinand）、伊萨贝拉（Isabella）、菲力普二世（Philip II）与贝拉斯克斯（Velásquez）、缪利罗（Murillo）一脉相传的传统，以及西班牙在美洲及远东帝国的广布与潜在的财力仍然支撑着国本。西班牙的艺术成就仍然可与意大利与荷兰并驾齐驱。比利亚努埃瓦（Juan de Villanueva）和他的继承人、助手正开始在马德里建造普拉多博物馆（Museo del Prado），以收藏绘画和雕刻的国宝。在这里收藏的伟大作品中包括当代大师戈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1828年）\* 惊心动魄的杰作。他将战争的血腥和野蛮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爱西班牙，可是他讨厌她的国王。在洛佩斯（Vicente López y portañá）所作的戈雅画像里，后

---

\* 参阅《卢梭与法国大革命》（译本见32册第三章）我本来以为那卷是《世界文明史》的最后一卷，因为已介绍了戈雅和歌德的一生。当然，这两人的后半生应该属于拿破仑时代。他们两人自始至终都是崇拜拿破仑的。

人仍可清楚看出这位艺术巨匠坚毅而忧郁的气质。

西班牙文学，在天主教学术和启蒙运动双重的影响下，一直蓬勃发展，直到内乱外侮消耗了国家的元气才衰颓。一位耶稣会会士马斯德（Juan Francisco de Masdeu）在1783至1805年间，断断续续出版了《西班牙文明史》（Historia crítica de España y de la cultura española）。这本书引经据典，交织文化史和一般史实成一体，完成了完整连贯的文明史。<sup>①</sup>勒洛朗特（Juan Antonio Llorente）曾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1789年至1801年间的总书记。1809年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任命他将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写成历史。他为了安全，特意在巴黎以法文写作。查理三世（Charles III）时代散文和诗歌花团锦簇的盛世在他死后并没有完全消逝。霍维利亚诺斯（Gaspar Melchor de Jovellanos, 1744—1811年）仍然是自由主义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喉舌。莫拉丁恩（Leandro Fernández, de Moratin, 1780—1828年）也仍然以喜剧称霸舞台，因而赢得了“西班牙莫里哀”的头衔。在自由战争（1808—1814年）期间，坎塔纳（Manuel José Quintana）、加列戈神父（Juan Nicasio Gallego）也写出了大量慷慨激昂的诗歌来鼓吹革命，抵御法人的入侵。

大多数的知名作家都倾心于法国政治和思想的自由主义色彩，这种风气直到两国敌对才改观。他们和兄弟会会员一样都已经被“法国化”了。他们哀悼西班牙一度生机所寄的国家议会如今在王权压制下雄风不再。他们为大革命欢呼喝采，他们喜欢拿破仑，以为他将刺激西班牙由封建贵族、中世纪教会和无能政府的桎梏中自求解放。听吧！一位西班牙大史家正以雄浑有力的歌声唱出了这垂死王朝的挽歌：

“1808年，正当波旁王朝步向灭亡之时，西班牙的政治社会情势可以综述如下：贵族，尤其是宫廷人士，对

国王已无敬意；政治腐败不堪，徒为个人恩怨、利害关系所左右；上层阶级毫无体国之心，只以私欲为念；一般民众尚对斐迪南王子（Ferdinand）存着一丝期望，其实此人心胸狭窄，一切表现均为虚伪矫诈；而知识分子都受到《百科全书》学者及法国大革命重大的影响。”<sup>103</sup>

在前面关于拿破仑的章节里已描述了西班牙王朝崩溃的经过。查理四世（1788—1808年）纵容皇后吕萨（Maria Luisa）和她的情夫戈代伊（Godoy）干涉朝政并独揽大权。太子斐迪南设法逼迫查理禅位，接着戈代伊派和斐迪南派间起了内战，马德里近郊立刻一片混乱。拿破仑乘这一混乱的时机，想把西班牙置于法国统治之下，并将西班牙划入大陆封锁范围内。于是他派缪拉率军进入西班牙，名为维持秩序。1808年3月23日缪拉进入马德里，并在5月2日这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平定了民众的起义。同时，拿破仑邀请查理四世和斐迪南共同到法国邻近西班牙的巴约讷（Bayonne）和他会面。他一方面恐吓太子将王位还给父王，一方面又劝父亲让位给拿破仑任命的人选。拿破仑将承认天主教为西班牙的国教，并加以保护。然后，拿破仑要求其兄约瑟夫波拿巴前来接任西班牙王位。约瑟夫·波拿巴满心不愿地来了，他接过了拿破仑制定的宪法，满足了西班牙自由人士大部分的要求，但他也要求他们必须和已受节制的教会和平相处。波拿巴悲哀地登上大位，拿破仑则高兴地带着吞并西班牙的喜悦回到了巴黎。

他忽略了西班牙民众和威灵顿（Wellington）。

### 第三节 亚瑟·卫尔斯利

(公元 1769—1807 年)

1809 年以前，他并不叫威灵顿，1798 年以前，他和美以美教派 (Methodism) 的创始人同名，叫卫斯里，可是他和这个教派毫无渊源。他在 1769 年 5 月 1 日 (在拿破仑出生前 105 天) 生于都柏林 (Dublin)，为加略·卫斯里 (Garret Wesley) 第五子。父亲为莫灵顿 (Mornington) 首任伯爵，在爱尔兰首府北方拥有一片产业，12 岁那年，他进入伊东中学就读，可是经过了“不光采的三年”以后，<sup>①</sup>被召回家中。我们也找不到事实证明当时他运动比读书高明多少。他自己都否认他说过：“滑铁卢 (Waterloo) 战役是在伊东的运动场上打赢的”这句名言其实不知出于何人。<sup>②</sup>在家庭教师的教导下，他稍有进步，但他母亲仍然难过的说：“对我们亚瑟这笨儿子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sup>③</sup>所以她干脆把他送到军中。17 岁那年，他进入了在翁热 (Angers) 的皇家骑兵学校。在这里，贵族子弟除了学习数学和一点点人文知识外，大部分课程是骑术和剑术，预备他们将来做个军官。

他逐渐崭露头角，然后，也许是透过家庭背景或是金钱的收买吧，他获得了爱尔兰副总督侍从武官的职位，并代表特利姆 (Trim) 地区进入爱尔兰下院。1799 年他升任陆军中校，并在约克公爵 (The Duke of York) 进攻法兰德斯 (Flanders) 一役中，统率三团军队。这次不幸打了败仗，他回来以后，对战争、征途的泥泞、贵族将领的无能十分厌恶，忽然兴起了弃武从文的念头。他其实喜爱小提琴甚于军旅生涯。接着他生了很久的病，连他的哥

哥莫灵顿都认为他无望，对他不存期望。<sup>⑥</sup>不过，26岁那年，霍普纳（John Hoppner）为他所作的画像里，可以看得出他像位诗人，也和诗人拜伦一般英俊。他也像拜伦一样，曾经向一位贵妇人求婚，遭到了拒绝而从此到处逢场作戏。1796年他前往印度，在其兄理查麾下任上校职。理查当时已是威尔斯利侯爵，为马德拉斯（Madras）省省长，后来又担任过孟加拉（Bengal）省省长。他曾经为大英帝国开拓征服了一些印度的属地，威灵顿（这位未来的公爵当时把自己的名字拼作 Wellesley）在这些战役中也赢得了一些战功，获利颇丰，1804年因此受封为爵士。回到英国后，他在英国国会取得一个席位，并再度向帕克南（Cathey Pakenham）小姐求婚，1806年她同意了。可是两人婚后生活并不美满，最后终于领悟到两人应分开生活。她为他生了两个儿子。

他继续步步高升，如今他不再是凭借财势来买官了。他已经以思考严密、表现卓越为人所知。庇特（Pitt）死前不久曾特别提出他，认为此人“做任何事情前，都会提出所有可能的阻碍。但是一旦从事，就毫不推三阻四，一定全力以赴。”<sup>⑦</sup>1807年，他在波特兰公爵（The Duke of Portland）爱尔兰总督任内担任他的首相。1808年他被晋升为陆军中将。6月间，他即奉命率领1.35万人将朱诺（Junot）及法军赶出葡萄牙。

8月1日，他率领大军在距里斯本北方100英里的摩德古湾（Mondego Bay）登陆。在这里他获得了5000名葡萄牙联军的增援，并接到作战大臣的通知，告诉他1.5万名的援军已经启程，不过58岁的达尔林普尔（Sir Hew Dalrymple）也将随着来接替联军的统率大权。可是威灵顿已经拟定了战略，同时他不喜欢听人使唤。于是他决定不再等候这1.5万名援军，便径自率领着1.85万名兵士向着北方攻去，想与朱诺作一决战，来决定他俩人的命运。法军因为久驻京城，沉迷于欢乐，军容不整，而朱诺竟贸然率领1.3万名兵士出京迎接英军的挑战，结果在里斯本附近的维梅鲁



(Vimeiro) (1808年8月21日)大败，伤亡惨重。这一战役结束后，达尔林普尔才赶到葡萄牙。他接掌了统帅权，停止追击，并于9月3日和朱诺签定了《辛特拉条约》(Convention of Cintra)。根据这一条约，朱诺率占领葡萄牙所有城镇的法军向投降英军，而英军则同意法军残余部队可不受阻挠安全撤退。对志愿返回法国的法军，英军并同意供给交通船舶。威灵顿觉得：英军仅以一次战役就恢复了葡萄牙的自由，即使英军稍作礼让，也值得了。因此他在条约上签了字。

事后华滋华斯 (Wordsworth) 和拜伦都难得地异口同声反对这个“最愚蠢不过的举动”。因为这些获释的法军，只要能够走路，不久又将征召入伍与英国及其盟国作战。威灵顿因此被召回英国接受调查庭的质询。他倒不见得为回国受质询而难过，因为他一直不喜欢受达尔林普尔的管辖。同时，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他讨厌战争。即使他日后已战功彪炳时，他还是说：“相信我！只要经过一天的战争，你就会向上帝祷告，别让你再去打一个钟头的仗！”<sup>⑥</sup>调查庭似乎相信了他的说法，即：《辛特拉条约》由于劝阻了法军作进一步的抵抗，挽救了成千英军和盟军的生命。然后他回到了爱尔兰，等待着另一次更好的时机来报效国家和建立他的英名。

#### 第四节 半岛战争：三

(公元1808—1812年)

西班牙国王波拿巴眼前困难重重。他努力在一小撮自由分子外，争取更广泛的支持。自由派人士赞成把富有教会的财产没收，

但约瑟夫·波拿巴早已因为他没有信仰的名声受尽阻挠，他知道，打击教会的每一个措施，如今只会更进一步燃起对他外族统治的反抗。被拿破仑击溃的西班牙军队现在又重整旗鼓，零星聚合，虽然军容不整，但是士气高昂。在秋收春耕之间，农民反抗异族的游击战也间歇不断。而法军驻地散布西班牙全境，疲于奔命；法军各将领争功邀宠，彼此不和，在巴黎的拿破仑根本无法统一协调西班牙的战略。据马克思（Marx）说，拿破仑到现在才发现：“西班牙即使亡国了，社会上仍充满了民族的精神，每一角落都汹涌着反抗的怒潮……西班牙并没有抵抗的中心，但也可以说到处都是抗敌的中心。”<sup>⑧</sup>法军一主力于拜伦（Bailén）大败后，一部分主要的西班牙贵族也加入了革命，因此把民众对他们的怨恨转移到侵略者的身上。由于教会积极地支持抵抗，抵抗运动已没有自由主义的色彩了。相反地，由于抗敌的胜利，反而巩固了教会和宗教裁判所的势力。<sup>⑨</sup>不过，省级的军政权中仍有一些自由主义人士，他们派遣了代表参加在加地斯的全国议会，参与了拟定宪法的过程。如今伊比利半岛上抗敌运动四起，到处弥漫着希望和虔诚的气氛。此时，波拿巴正怀念着昔日在那不勒斯的日子，拿破仑正在苦战奥地利，而威灵顿——一位具有新派思想的人物——正准备由英伦再度南下，为西班牙回到中世纪助一臂之力。

摩尔爵士（Sir John Moore）在逝世于科蓝那（Corunna）（1809年1月16日）时，曾劝谏英政府不要再费尽心力保卫葡萄牙。他认为法人迟早要执行拿破仑的命令，将葡萄牙成为法国的属国。再说，英国如何能运输和补给足够的大军来和驻西班牙10万名能征惯战的法军一决雌雄呢？可是在爱尔兰的威灵顿如今却静极思动，急待有所表现。他告诉战争大臣：只要让他独力统率2至3万英军，不受干扰，再加上当地的援军，他便能保住葡萄牙抵挡10万以下法军的攻击。<sup>⑩</sup>英国政府相信了他的话，于是1809年4月2日他率领2.5万名英军抵达里斯本。他后来形容这批英军是一群

“地上的残渣、……一伙坏蛋、……一些只为有酒喝而从军、除了用鞭子无法管束的乌合之众”。<sup>②</sup>可是他们在面临杀敌或被杀的选择时，却都能奋不顾身，拼死一战。

苏尔特元帅 (Marshal Soult) 已料到了英军的入侵，他已率领 2.3 万名法军——一群终日酗酒没有文化程度的可怜家伙——沿海岸直下波尔图 (Oporto)，而同时另一支法军在维克多元帅 (Marshal Victor) 率领下，也由西面沿着塔古斯 (The Tagus) 河来攻。威灵顿曾经详细研究过拿破仑的战略，他决定在法军二元帅会师进攻英军据点里斯本之前，就先发制人进攻苏尔特。于是他率领 2.5 万名英军和由贝利弗德 (William Carr Beresford，未来的贝利弗德子爵) 率领的 1.5 万名葡军，赶到杜罗河 (River Douro) 波尔图的对岸，1809 年 5 月 12 日他渡河袭击苏尔特后方。法军措手不及，仓皇后退，共损失了 6000 人马及所有的大炮。威灵顿并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他必须赶往南面阻止维克多的进攻。可是，维克多已经得到了苏军大败的消息，退回塔拉韦拉 (Talavera)，在当地会合约瑟夫·波拿巴的援军。法军现共计 4.6 万人，而与法军对峙的威灵顿军包括 2.3 万名英军和 2.6 万名葡军。1809 年 7 月 28 日，两军于塔拉韦拉展开了激战。葡军不久即不支逃出生战场，威灵顿则奋战不懈，屡次击退法军的攻势，最后维克多损失了 7000 人及 17 门大炮后无功而退，英军也损失了 5000 人，但是守住了阵地。英政府为嘉奖威灵顿身先士卒，特别封他为威灵顿子爵。

不过，战争大臣对他的支持却逐渐减弱了。1809 年拿破仑于瓦格拉姆 (Wagram) 大捷，1809 年 3 月他又和奥地利公主结婚，结束了英奥的联盟，俄国这时还是法国的盟国。在此形势下，法国在西班牙又多出了 13.8 万名的兵力。同时，马塞纳元帅 (Marshal André Masséna) 统率着 6.5 万名大军，正准备出师西班牙，下定决心要攻克葡萄牙。英国政府因此通知威灵顿，一旦法军入侵

西班牙，他可以撤军回国，而不致遭受处罚。<sup>②</sup>

这是威灵顿一生事业的重要关键，固然上级准许他自行撤退，可是无论如何，这将是他人记录上的污点，除非他将来再立下大功来洗雪这次失败，但是未来是不可预期和依靠的呀！于是他决定以全部人马，一生的事业，甚至个人的生命再孤注一掷。他命令全军在里斯本北方由塔古斯河经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到海岸构筑一条 25 英里长的碉堡防线，等待法军的进攻。马塞纳先攻克了西班牙重镇罗德里城（Ciudad Rodrigo）开始了征葡之役。然后他率领着 6 万人马，越过边境进入葡萄牙。1810 年 9 月 17 日，威灵顿率领 5.2 万名联军（英军、葡军、西军）在布塞古（Bussaco）（科因布拉〔Coimbra〕的北方）与马塞纳接触。在此役中威灵顿损失 1250 人，而马塞纳损失 4000 人。不过威灵顿知道他不能和马塞纳一样，等待援军，因此他撤退至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一路命令实行坚壁清野战术，等待马塞纳大军粮食完尽，师老无功而退。这一战略果然奏效。1811 年 3 月 5 日，马塞纳内领着饥饿疲惫的大军回到西班牙，并将统帅权让给了麦尔蒙（Auguste Marmont）。

威灵顿的大军经过一个冬天的训练和休憩后，采取了先机进攻西班牙。1812 年 7 月 22 日，他率领 5 万人马进攻麦尔蒙驻扎萨拉曼卡（Salamanca）附近的 4.8 万名法军。在此一大战里，法军伤亡 1.4 万，联军损失 4700，麦尔蒙不支撤退。本来 7 月 21 日时西班牙王波拿巴已率领 1.5 万名兵士离开马德里前来增援麦尔蒙，在途中得知麦尔蒙大败的消息后，不敢再回到京城，直接便奔向瓦伦西亚（Valencia）与叙谢元帅（Marshal Suchet）的法军主力会合。宫中文武百官及 1000 名“法国化”的西班牙人都都狼狈地跟随他。8 月 12 日威灵顿进入马德里，当地民众对拿破仑宪法一直不存好感，因此见了英军都雀跃不已。威灵顿后来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正在一群欣喜若狂的人民当中。但愿上帝能一直这

么保佑着我，让我能为西班牙争取独立。”<sup>②</sup>

然而，上帝在此刻却忽然拿不定主意了。麦尔蒙依靠着布尔戈斯（Burgos）的坚固防线整军经武。威灵顿前往将他团团围住，约瑟夫·波拿巴由瓦雷讷西亚率9万大军前来解围。威灵顿因此不敌，于1812年10月18日沿萨拉曼卡（Salamanca）和罗德里城撤退，沿途损失了6000名士兵。约瑟夫·波拿巴再度进了马德里，民众都郁郁不乐，但是中产人士十分高兴。这时，拿破仑正在莫斯科冒着刺骨的寒冷，苦战不已。西班牙，正如欧洲的其他地区，都在等待着这场以大陆命运为赌注的结果。

## 第五节 结 果

即使在这半岛战争的停顿期间，也可以看出一些结果来了。从地理的观点而言，最重要的结果是：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国力日衰，南美的殖民地纷纷脱离这两个国家而独立，开始了她们独立光耀的历史。而在塔古斯河以南的西班牙境内，也已没有法军踪迹。在军事方面，威灵顿已证明了法军无法占领葡萄牙的想法，他们甚至连保全西班牙都有问题，否则便要冒着失去莱茵（Rhine）河以东征土的危險。就半岛战争对社会的影响而言，民众的抵抗虽然群龙无首，但是农民和教会显然已居于领导地位。在政治方面，地方上的军人政权重新取回了旧日部分自治的权力。每一政权都自组军队、铸造货币，各行其是。有些地区甚且单独与英国媾和。更具意义的是：各地方政权都派遣代表参加全国议会，来草拟新西班牙的新宪法。

全国议会自从法军入侵后，流亡各地，第一次集会是在1810年

在莱昂岛 (Isla de León)。法军撤退后，议会迁到了加地斯。1812年3月19日于当地颁布了以自由主义为宗的宪法。由于大部分的代表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第十二条条文特别宣称：“西班牙的宗教将永远是由使徒传递的罗马天主教。政府将以明智公正的法律加以保护，并禁止任何其他宗教。”不过，宪法废止了宗教裁判法庭，并对宗教社团的数目加以限制。在其他方面，议会都以中产阶级184名代表的意见为依归。这些人大多自称“自由主义人士”，这是史上第一次有人使用这个名词来表示个人政治的倾向。在他们的领导下，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并不逊色于1791年的法国宪法。

此一宪法，承认了王室中的地位，并尊奉当时流浪国外的斐迪南七世 (Ferdinand VII) 为正统的王位继承人。不过，宪法规定：国家的主权属于全民，并由人民选出的代表行使主权，换言之，主权并非国王的财产。国王为宪政君主，必须遵守法律。同时，国王无论增添法律条文或缔结条约，都必须取得国家议会的同意。国会为一院制。新议会的成员每两年由全国成年男子选出。选举共分三个阶段：教区、地区、行省。全国法律划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司法机构应独立于议会和国会之外。此一宪法并明令废止刑求、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言论及出版文字如非涉及宗教禁忌，享有绝对的自由。此一宪法并规定未开垦公地应分配与穷人。

在当时西班牙的情势下，在宗教传统下，能制定此一宪法诚属不易。此一宪法思想开明前进，看样子西班牙现在已经进入19世纪了。

## 第二章 意大利及其征服者

(公元 1789—1813 年)

### 第一节 1789 年的意大利地图

在这个时期里，意大利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片战场。全国因地域偏见，语言不同，变得四分五裂，根本无力团结一致，抵御外侮。而那不勒斯以北，由于得天独厚，阳光普照，土地肥沃，由阿尔卑斯山或亚平宁山 (Apennines) 蜿蜒而下的溪流贯穿全境，也因此使此一区域成为外族税吏覬覦的“福土”，他们终年你争我夺，烽火不息。

1713 年《乌特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 将米兰、曼图亚 (Mantua)、那不勒斯、撒丁及他们的附属地区划归查理六世；从此，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族 (Hapsburg) 所统治，或在其势力笼罩之下。半岛西北部的萨伏依 (Savoy)、皮德蒙特则由撒丁岛国王统治。1734 年以那不勒斯和巴勒摩为中心的两西西里王国在一位老练的战士和国王统治下，即在后来西班牙的查理三世手中，转移成为波旁皇族 (Bourbons) 的领土。在他就任西班牙王以前，他将那不勒斯地区赏与其子斐迪南四世。斐迪南四世娶了奥国公主卡罗利娜 (Maria Corolina) 为妻。斐迪南事

事受皇后控制，因此那不勒斯又落入了奥国的势力范围：1780年，女皇帝特雷莎（Maria Theresa）死后，她的儿子统治着伦巴底（Lombardy）、托斯卡纳（Tuscany）摩德拿（Modena）等地。她的几个女儿分别嫁给那不勒斯、帕尔马（Parma）的统治者，因此萨伏依和皮德蒙特、撒丁岛也成了奥国的保护国。这时，意大利的独立地区唯有威尼斯、卢卡（Lucca）及圣马力诺（San Marino）、热那亚等地。换句话说，意大利如今南北分别为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皇族和西班牙的波旁皇朝分割，教皇国横亘其中，幸亏两个王朝互相牵制，加上意大利人信仰虔诚，他们都把教皇看作意大利统一唯一的象征。由于这些因素，教皇国才能依旧属于教皇。

以当时的情势而论，奥地利治理意大利北部极具绩效。在伦巴底，封建宗主和教会团体和一般民众一样，必须缴纳赋税，他们的特权已被大大削减了。政府关闭了成百的修道院，将他们的收入转用于发展教育或救济贫困。1764年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的学术性巨作——《论犯罪与惩罚》（*Dei delitti e delle pene*）刺激了司法程序的改革，废除了刑求，使刑法更合乎人道。1765年至1790年间，在托斯卡纳这往日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的土地上，利奥波德大公（Grand Duke Leopold）建立了“可能是欧洲当代最好的政府”。<sup>①</sup>首府佛罗伦萨（Florence），在权力和思想变幻无常的波涛里，始终保持着文明堡垒的地位。

威尼斯——富足、腐化、美丽的威尼斯，如今（1789年）她主权国家的地位显然就要结束了。她的东部疆土早已被土耳其人吞并，不过她统治着阿尔卑斯山至帕多瓦（Padua）、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布雷西亚（Brescia）间的地区。名义上她是个共和国，实质上她是一个固步自封的贵族政体。当地政府不图振作，欺凌百姓，行政效率极差。威尼斯拥有基督教国家最精明的间谍，但却毫无国防可言。这个地区已成为欧洲的游乐场，供人取乐，唯



有凭着风情万种的女郎来安抚敌人。威尼斯北面为奥地利，西面为奥地利的属国伦巴底，只要法国一日不加以保护，威尼斯立刻就会被奥国吞噬。

教皇国位于托斯卡纳及波河（The Po）的南方。她的版图起自罗马涅（Romagna）、费拉拉（Ferrara）、波隆纳（Bologna）、拉温纳（Ravenna），然后向南到“边界”即靠近亚得里亚海（The Adriatic）的各城市如里米尼（Rimini）、安科纳（Ancona）、乌尔比诺（Urbino），然后越过亚平宁山脉，经过安布利亚（Umbria）的佩鲁贾（Perugia）、斯波莱托（Spoleto）、拉丁姆（Latium）的奥尔维耶托（Orvieto）及维泰博（Viterbo），最后止于罗马。这片历史悠久的版图是公元754年法兰克王丕平（Pepin）及公元774年查理曼大帝“赠送”给教皇的。在特兰托会议（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年）中，教皇又赢得另一场重大的胜利，正如俗世的国王统治诸侯一般，教皇获得了对各国主教的统御权，教廷统治着各地的教会，教廷也是中央集权的。

但是，不久由于科学的进步、哲学的侵略，教会在西欧领导阶层的支持逐渐减弱了，造成了教廷的危机，教皇的势力逐渐衰弱。教皇除了遭到新教君主的反对外，也遭到一些天主教国家君主，如奥国的约瑟夫二世，那不勒斯的斐迪南四世公开的反对。甚至在教皇各邦内，一小群怀疑宗教的人士也正悄悄地兴起，削减了人民对教会的向心力。1768年波拿巴二世写道：教廷“已经成为人人诅咒的对象。其国内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民生凋敝，内部的财政毫无系统，债信极差”。波拿巴是个不信仰宗教的人，他的观点或许有成见。可是1783年威尼斯大使也报告说：“教廷内政杂乱无章，教皇国正逐渐衰颓，威信一落千丈。”<sup>②</sup>不过人民虽然生活贫苦，夏日疾疫猖獗，可是教会对罗马人情欲的放纵、四旬斋节前的狂欢，倒是十分纵容。因此罗马人还可以勉强容忍。在意大利的艳阳下，连教士都松懈了。

在这存亡之秋的两任教皇都是信仰虔诚、品格高洁的人。庇护六世 (Pius VI, 在位期间 1775—1799 年) 虽然不辞艰苦前往奥地利, 仍然不能使约瑟夫服从教廷。他彬彬有礼, 风度翩翩, 却不能不使阿维农 (Avignon) 为法国吞并, 最后自己还成为阶下之囚, 死在督政府的监狱里。庇护七世 (在位期间: 1800—1823 年) 竭尽全力恢复了天主教在法国的地位, 可是后来也为拿破仑长期监禁, 最后终于以柔克刚战胜了下台的法皇 (1814 年)

位于教皇国南方的西班牙波旁皇族, 随着加艾大 (Gaeta)、卡普阿 (Capua)、卡塞塔 (Caserta)、那不勒斯、卡普里 (Capri)、索伦托 (Sorrento) 等城市的繁荣, 都变得富有了。可是意大利的繁荣也就到此为止。佩斯卡拉 (Pescara)、阿奎拉 (Aquila)、巴里 (Bari)、布林底希 (Brindisi)、塔兰托 (Taranto)、克罗托内 (Crotona) 均有古风, 令人怀想起麦罗 (Milo)、凯撒、弗里德里希二世 (Frederick II) (神圣罗马皇帝, 以博学闻名), 甚至令人想起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这位哲学家。但是在这些城市里, 骄阳炙人, 苛捐杂税繁多, 人民不堪其扰, 他们唯有在信仰中寻求慰藉。税吏由这里越过了海峡到西西里岛 (由雷焦卡拉布里亚 [Reggio di Calabria] 到对岸的墨西拿 [Messina])。这两个城市虽然贫困, 却保存着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汪达尔人 (Vandals)、回教徒、诺曼人、西班牙人的遗迹。最后税吏停留在巴勒摩。在这里他们用搜刮来的钱财侍奉着皇后嫔妃、巨商、盗贼、圣徒, 供应他们挥霍的所需。1759 年, 8 岁的斐迪南四世继承的便是这一片如画江山。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为一位俊美的运动健将。他喜爱运动和游乐, 不爱权力的重担, 政府大权因此都落入了皇后卡罗利娜的手中。

卡罗利娜在首相兼情夫阿克顿爵士 (Sir Acton) 的指导下, 使那不勒斯由亲西班牙转变为亲奥地利, 1791 年后又转变为亲英国。当时国内农民一贫如洗, 而封建贵族仍然搜刮不已, 宫廷、官

府及司法机构都腐败不堪，赋税极高，而且都落在下层阶级的身上。由于贫困，城市的民风鄙野，秩序混乱，盗贼横行，全靠众多的警察及精于制造奇迹、故弄玄虚的教士来遏阻他们。（在某一寺院里圣詹努爱利斯〔Saint Januarius〕的遗骨竟每年会流出血来。）如往日一般，教会对肉体的罪恶宽容有加。总之，这些是穷人唯一的奢侈享受了！在狂欢节时，第六戒——戒奸淫就好像是不该加于人性的约束似的。

政治腐败如斯，可是皇后居然还妄想赶上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Catherine I of Russia）。她羡慕她能有许多哲学家任其使唤，或拜倒膝下。因此她也聚养艺术家、学者和教授。可是她或许不知道，“比起任何意大利城市，那不勒斯当时有更多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sup>③</sup>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传来以后，他们许多人都对未来怀着默默的憧憬和希望。

## 第二节 意大利和法国大革命

在一小群散布四方的自由主义人士的鼓吹下，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对法国的重大变革已有了心理的准备。米兰的贝卡利亚和帕里尼（Parini），那不勒斯的塔努奇（Tanucci）、杰诺韦西（Genovesi）和菲兰杰利（Filangieri），西西里的卡拉乔利（Caraccioli）都曾经在散文、诗歌、法律和哲学方面阐扬新说。以理智和中庸为圭臬的法国国民大会如今所通过的一些议案，就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在托斯卡纳，连利奥波德大公都为革命欢呼，他认为这是全面改革欧洲可贵的先声。<sup>④</sup>

1796年，拿破仑以革命将领及继承人的姿态，冲进意大利，如

狂野的秋风，将撒丁岛和奥地利的军队扫出了皮德蒙特和伦巴底。当时几乎所有人民都夹道欢迎他。他们认为他是一位率领着法军来拯救意大利的意大利人。有一段时期，帕维亚（Pavia）、热那亚、维罗纳（Verona）虽有抵抗，他仍能够势如破竹，意大利各城市都好像是无条件赠送的礼物，纷纷落在他的手中。1797年7月和8月，他将米兰、摩德拿、雷焦艾米利亚（Reggio Emilia）、波隆纳及瑞士一小部分领土合并成为南阿尔卑斯共和国（Cisalpine Republic），并为这个共和国制定了类似法国革命时期的宪法。

他统治意大利北部早期自由主义的作风，的确安抚了渴望独立的人士。高官厚爵，虽有名无实，也驯服了地方的领袖。他们深知：在这群豺狼割据的欧洲大陆，不得不接受一位保护意大利的主人。而这位主人虽然有些苛捐杂税，虽然会掳掠一些艺术品，但他说得一口漂亮的意大利语，法律公正开明，不是比别人要好得多吗？可是法国革命政府反对教会的趋势以及以后压制教会的立法，却消除了意大利人的好感。对意大利民众而言，宗教比起这种压迫教士、有9月屠杀气息的政治自由要珍贵得多了。

1792年1月13日，法国一名外交官遭受罗马暴民攻击，伤势严重，次日即告不治。教皇庇护六世由于奥地利约瑟夫二世颁布“宗教容忍敕令”（The Edict of Toleration）（1781年）已受到了打击，如今又面临这一新危机。法国政府正大肆没收教会财产，并于1790年7月12日颁布“教士法令”（The 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庇护六世从小接受正统的思想，崇尚传统，因此他曾经指责法国大革命，他支持各国受到威胁的君主来镇压革命政府的行动。但是，1797年2月19日，在胜利的拿破仑威胁下，在《托伦蒂诺条约》（Peace of Tolentino）中，他被迫将法国境内教皇的属地阿维农和梅涅桑恩（Venaissin）割让给法国，又将费拉拉、波隆纳、拉温纳等城市割让给新兴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

1797年12月，一群罗马暴民杀害了法国迪富将军（General

Léonard Duphot)。当时贝尔捷将军 (General Louis Berthier) 继拿破仑 (当时在埃及) 统率意大利的法军, 他便利用了此一时机入侵罗马, 并建立了由法国统治的罗马共和国。庇护六世提出抗议, 反而被捕, 他仍然继续反抗, 结果被辗转递解, 1799年8月29日死在瓦朗斯 (Valence) 督政府的监狱里。对历史无知的人还以为教皇制度从此就结束了。<sup>⑤</sup>

这一情势给那不勒斯的斐迪南四世制造了三个机会: 第一考验阿克顿爵士组织的新军; 其次表现他对教会的忠诚; 最后, 他可以乘机取得教皇一块领土作为酬劳。这时纳尔逊正为汉密尔顿夫人 (Emma Hamilton) 神魂颠倒, 滞留那不勒斯, 乐不思蜀。他同意以海军登陆来享 (Leghorn) 助斐迪南一臂之力。斐迪南四世于是命令奥地利麦克将军 (General Karl Mack) 统率大军, 然后他随军轻易夺占了罗马 (1798年11月29日)。当地的法军早知道他们并非那不勒斯军的对手, 已迅速地撤出了罗马城。

当逃亡的主教在威尼斯选举新教皇时, 斐迪南的军队正在品评罗马的美女和艺术品, 却不料一位卓越的法军将领尚皮奥内 (Jean-Etienne Championnet) 正率领着新锐的法军由北方杀来。1798年12月15日, 在卡斯特拉那 (Castellana) 打败了麦克散漫的那不勒斯军, 麦克大败而逃, 法军乘胜追击, 直逼那不勒斯, 攻占了这座城市, 城中的知识分子都欣喜万分。法军于1798年12月15日在此成立了帕提侬共和国 (Parthenopean Republic)。斐迪南带着皇后, 汉密尔顿爵士带着他的情人逃到威尔逊停泊在巴勒摩港的旗舰上。

可是这个新共和国的寿命并不到5个月, 尚皮奥内及其主力不久奉命北上驱逐奥军, 1800年他战死在当地。鲁福大主教 (Cardinal Fabrizio Ruffo) 在英将富特 (Edward Foote) 的协助下, 又为斐迪南组成了新军。那不勒斯民众讨厌法军这些无神论者, 他们协助斐迪南再度占领了那不勒斯。法军在那不勒斯海军将领卡

拉乔洛 (Francesco Caracciolo) 的协助下, 躲藏在海港的两座碉堡里。鲁福及富特答应法军, 如果他们投降, 可以不受阻挠撤退回法国。法军同意了这一条件。但在能履行此一协定前, 纳尔逊舰队载送斐迪南王室一行, 已由巴勒摩抵达。纳尔逊接掌了统帅权, 他不顾主教的反对, 命令舰炮轰击法军堡垒。<sup>⑥</sup>法军只好无条件投降。卡拉乔洛正逃走之时被捕, 在为纳尔逊舰上一军事法庭草率审判后, 在旗舰拉密内尔瓦 (La Minerva) 上被吊死 (1799 年 6 月 29 日)。国王皇后复辟后, 大捕自由派人士, 并将他们的首脑人物一一处以极刑。

### 第三节 拿破仑治理下的意大利

(公元 1800—1812 年)

在从埃及回来的 9 个月中, 拿破仑一直努力使法国人民接受他对政治自由所下的定义: 定期举行其结果必然是赞成开明专制的公民投票。正当法国人已厌倦了自由和民主之时, 意大利人在奥地利复辟政权的统治下, 却正烦躁不安, 渴望民主和自由。那位原籍意大利的伟大法国人, 究竟什么时候会再回到意大利, 把奥地利踢出去, 并且给意大利一个自己的政府呢?

然而, 拿破仑执政一向工于心计, 他从容不迫, 因为周详的准备是他战略的首要原则。最后他终于来临时, 比起 1796 年的一击, 更是精彩: 他越过并直下阿尔卑斯山, 将奥军截成两段, 直取奥军主力后方, 然后缩小包围圈, 将奥军及统帅一一擒拿, 最后奥地利狼只好将威尼斯亚 (Venezia) 以西的意大利疆土都割给了高卢狐 (1801 年)。拿破仑将他的战利品变成了与 1797 年时类似的模样, 一为以米兰为首府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 一为热那亚

的利古里亚共和国 (Ligurian Republic), 成为两个由意大利人统治的法国保护国。教皇国这时仍可干扰, 因为拿破仑不再是反对天主教的异教徒, 他正在和教廷商议协定。1801年3月18日, 他又取得那不勒斯斐迪南四世的允诺, 禁止英国货物进入那不勒斯港, 纳尔逊这时正忙着攻打哥本哈根 (Copenhagen, 1801年4月2日), 见此情势也无可奈何。意大利在这些杰出的成就后面, 见到了一双巧妙的“意大利手腕”, 他们极为高兴。

然后, 这双手慢慢地抓紧了权力。1802年1月, 南阿尔卑斯共和国的454名代表集会于里昂 (Lyons), 通过了拿破仑拟订的新宪法。塔列朗 (Talleyrand) 经授意在会中提议选举拿破仑为此一新意大利共和国总统, 众代表也欣然同意。可是, 1804年拿破仑自封为法国皇帝后, 这一意大利总统的头衔又显得不太相称了。于是1805年5月26日, 拿破仑在米兰接过了旧日伦巴底王尊贵的王冠, 成为意大利 (北部) 王。他引入了《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 又以富有的省份来补助穷困的省份, 使人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他答应要使“我的意大利子民……成为全欧洲赋税最轻的人民。”他离开意大利时, 留下了他钟爱的养子尤金 (Eugène de Beauharnais), 以表达他对意大利的关怀, 并代表他行使政务。

在未来的8年里, 这个新王国 (主要是在伦巴底地区) 享有了民生乐利、政治昌明的局面。这段日子将是意大利人怀念的。政府并不想挂出民主的招牌, 拿破仑根本不相信民众有足够的力量去明智地选举他们的领袖或决定政策。他指示尤金应网罗经验丰富、能力卓越的行政人才。他们果然竭尽所能, 热心尽职。他们组织了极具绩效的官方机构, 他们从事规模广泛的公共工程, 修筑道路、运河、公园、住宅、学校。他们改进了环境卫生, 革新狱政及刑法。他们消除文盲, 鼓励音乐和艺术。而税收由1805年的8200万法郎至1812年提高至1.44亿法郎, 不过其中部分是由

于战费引起的通货膨胀，部分是由于将集中的财富再行分配，以增进公众的福利。

同时，法皇继续使意大利“拿破仑化”。1802年9月他将皮德蒙特并入法国。1805年6月，热那亚政府在他的诱惑下自动要求将利古里亚共和国并入法帝国。1805年9月，他吞并了帕尔马、皮亚琴察（Piacenza）、哥瓦斯他拉（Guastalla）等公国。1805年9月，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一役结束后，奥军几乎全军覆没。他又游说奥皇法兰西斯二世将威尼斯亚割让给尤金的新王国。1797年时拿破仑曾出卖了威尼斯，如今他补偿了这一不光荣的行为，威尼斯人都感激万分。1807年他访问该城时，全城通宵达旦狂欢庆祝。1808年5月，他占领了奥国属地治绩最佳的托斯卡纳大公国。拿破仑因其妹夫巴乔基（Bacciocchi）治理卢卡颇有贤名，特别命令他前来托斯尼。在他贤明宽大的政策下，佛罗伦萨成了文学艺术的港口，又回到了美第奇时代的盛况。

1806年3月30日，拿破仑宣布派其弟波拿巴为那不勒斯王，并派遣他率领法军去赶走桀骜不驯的斐迪南四世和他那专横跋扈的皇后。法皇似乎为这位温和的波拿巴留下了最困难的任务，而且好像没有认真计算执行时的困难，便要评价他的成果。约瑟夫·波拿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他喜爱与知识分子为友，也喜欢略识诗书但又不因学问而减少了魅力的女人。<sup>④</sup>拿破仑觉得抱着这种生活态度的人永远不可能治理国家的。那么他为什么还派给他这样的任务呢？实在是因为拿破仑的王国比兄弟还多，同时他除了近亲外，又不信任任何人。

那不勒斯的中产阶级早已在封建制度下蠢蠢欲动，他们欣然接受了波拿巴王。可是一般老百姓视他为篡国贼和异端，不欢迎他的来临。波拿巴只得硬起心肠，采取严峻的手段来减少他们的抵抗。皇后已经将国库的所有财富带到西西里，一支英国舰队又封锁着各港口，杜绝了海上贸易。法军虽然战胜了，但待遇微薄，



军心动摇，波拿巴于是向他哥哥乞求一些周转的财源，拿破仑却要他命令那不勒斯为其自由付款。波拿巴最后向荷兰银行家商借了一笔款项，同时课征国民税金，无论贵族、平民、教士都必须纳税。他又将拿破仑最欣赏的财经专家罗德勒(Pierre-Louis Roederer)子爵由巴黎请来掌理财政，不久财政状况即告稳定。其他经验丰富的官员在王国各地区建立了免费的学校，在各省建立学院。政府废止了封建制度，将教会的土地收归国有，再售予农民及人数日增的中产阶级。同时，政府依照《拿破仑法典》，根据当地环境，稍作增减以制定法律。政府并整顿司法，简化繁琐的程序，改革狱政及刑法。<sup>⑨</sup>

1808年6月10日，正当约瑟夫·波拿巴已逐渐成功地赢得了民心，他却奉命坐上另一个更为艰险的王位——成为西班牙王。拿破仑如今再没有兄弟可用了，他只好任用了妹妹卡罗琳的丈夫缪拉为那不勒斯王。

缪拉主要以他炫耀夺目的衣着及勇猛善战的战绩闻名于世。但是我们也应该赞扬他重建那不勒斯政府的功劳。他除了没有耐性外，具备了农民所有的美德。他适合去从事磨炼筋骨的艰苦工作，而不适合诡诈的外交活动或极需深思远虑的政务。他虽偶尔逢场作戏，可是不失为一位忠实的丈夫。在他认为拿破仑行事已近疯狂前，他对这位专横的姐夫一直忠心耿耿。他抱怨拿破仑经济封锁政策破坏了那不勒斯的经济，我们可以了解他的苦衷何在。然而，也许正由于他急躁的个性，他的政府在短短4年的统治期间完成了许多大事。他们完成了税政的改革，成立了国家银行，偿付了政府的债务（大部分由出售教会财产来偿付），废止了国内的关税，建设重大的公共工程。约瑟夫·波拿巴和缪拉治理那不勒斯总共不及8年，但已经改变了那不勒斯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面貌，因此1815年斐迪南四世复辟后，几乎保留了所有法国人的革新措施。

最令缪拉得意的措施是他组织训练了6万人的大军，他希望以此武力统一意大利，成为第一位意大利国王。不料，1812年，他却毫不通融地被召回法国，加入了姐夫征俄的行列，远离了意大利的阳光，也远离了统一意大利的梦想。

#### 第四节 皇帝与教皇

拿破仑觉得他已采取了重大的步骤，使意大利由一地理名词转变为一个国家。他在北方成立了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在南方成立了那不勒斯王国，可是在他远征埃及时，奥地利人已经结束了1年前才成立的罗马共和国。教皇国又取回了历史悠久的古都及大部分的疆土。1800年3月13日，主教会议选出了新教皇庇护七世。如今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徒都仰望他来坚定地维护教皇“世上的权力和领土”。

拿破仑觉得庇护七世此人颇为通情达理，他愿意和巴黎协商政教关系，他为拿破仑称帝前来祝福。不过这些教皇国为公元754年由法兰克人之王丕平赠送给教皇史蒂芬（Pope Stephen）的。（有人说，这些领土并未真正由所谓《君士坦丁赠约》〔Donation of Constantine \*〕的正式文书赠送给教会。1774年查理曼大帝认可了“丕平的赠送”，可是他“干涉教皇国的政务”，而且“认为他自己是基督教国家的领袖，教皇必须听命于他，即使在宗教事务上，也要服从他”。<sup>④</sup>拿破仑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贯

---

\* 参阅《大英帝国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七章, 580页; 或《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卷中有关此项之记述。

彻大陆封锁政策，禁止英国货物的输入，来报复英国对法国的封锁。但是教廷却坚持对所有国家开放港埠通商。尤为甚者，教皇国是分割南北意大利的界线，而如今在他有生之年统一意大利已成为拿破仑的最大心愿。他曾告诉约瑟夫·波拿巴：“这是我首要固定的政纲。”为了配合此一政策，法军已于1799年占领安科纳，此为滨亚得里亚海的一战略港口，为控制南北交通要道之枢纽。1805年11月13日，正当拿破仑与奥地利、俄罗斯大战前夕，庇护七世在教廷人士怂恿下，一反常态，语气转趋强硬。他对拿破仑发出了挑战：“我们认为有权要求阁下退出安科纳，如果阁下拒绝，我们甚难与阁下政府保持良好友善之情谊。”<sup>⑥</sup>拿破仑于奥斯特里茨大战前夕在维也纳接到此一最后通牒，他对教皇利用这一时机甚为愤怒，因此也以牙还牙，以强硬的口吻答复教皇：“阁下固然是罗马之主，但我却是她的皇帝。”<sup>⑦</sup>像查理曼大帝一般地说了这些话以后，他像凯撒一般率军前进，在奥斯特里茨全面击溃了英奥两军。

一年之后（1806年11月12日），拿破仑于耶拿大败维也纳，他接着由柏林要求罗马将英国人逐出罗马，并要求教皇国加入“意大利邦联”。他说他无法容忍“在意大利王国和那不勒斯王国间”存在着“一些战时英军可能占领的城堡和港埠。它们将危及意大利各邦人民的安全”。<sup>⑧</sup>他限庇护于1807年2月前答复。庇护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且仍然让英国官员留在罗马。拿破仑由提尔西特（Tilsit）凯旋归来后，再度要求教皇将英国代表逐出罗马，教皇再度拒绝。8月30日拿破仑威胁将要夺占“边界”各邦，教皇大为惊恐，终于同意对英国关闭港埠。拿破仑进一步要求教皇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共同抵抗法国的敌人，庇护拒绝了此一要求。1808年1月10日，拿破仑命令梅奥里斯将军（General Miollis）——当时佛罗伦萨的法军统领——进军罗马。

从那天起，政教之间又兴起了一次历史性的冲突。2月2日，

梅奥里斯率军攻占奇维塔韦基亚港 (Civitavecchia)，次日进入罗马，包围了教皇宫殿及办公所在的基里纳尔山 (Quirinal)。从那时起一直到 1814 年 3 月，庇护成了法国的犯人。1808 年 4 月 2 日，拿破仑下令将教皇国“边界”各邦并入意大利王国，从此在意大利王国和那不勒斯王国间——在约瑟夫·波拿巴和尤金间——有了一条通行的走廊了。

一年过去了，其间拿破仑忙着处理西班牙的事务。1809 年 5 月 17 日，拿破仑再度占领维也纳，他由此地宣布将教皇国并入法帝国，并结束教皇世俗的权力。6 月 10 日教皇褫夺拿破仑的教籍。7 月 6 日，拉代将军 (General Radet) 率领了一些法军直趋教廷，命令教皇自行选择让位或放逐。庇护只携带着每日祈祷书及一具十字架，便随着他的捕快进入了一辆等待的马车，沿着意大利海岸经由热那亚至萨沃纳 (Savona)，在当地他被监禁，不过当局对他十分礼遇。1812 年 6 月，拿破仑公布了一绑架教皇至英的阴谋，又将教皇迁至枫丹白露 (Fontainebleau)。1813 年 2 月 13 日，教皇与拿破仑签定了新协议，3 月 24 日，他又宣告他的签名无效。他住在皇宫似的“牢”中，生活俭朴，甚至亲自缝补衬衫。<sup>⑧</sup>他在枫丹白露经过了 1812、1813 年的变局。1814 年 1 月 21 日，拿破仑本人也面临成为囚犯的命运，他于是又将教皇送回了萨沃纳。4 月，联军攻占巴黎，俘获拿破仑后，他们通知释放教皇。这时，庇护七世已因近年来心理和生理的折磨，形容憔悴。5 月 24 日他回到了罗马。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热烈欢迎他，赞美他。罗马的年轻人抢着为他换马，争夺替教皇驾车回基里纳尔山的殊荣。<sup>⑨</sup>

拿破仑的行政官员在治理教皇国的短暂期间，靠着当地自由人士的协助，费尽苦心，迅速有力地改变了当地经济和政治的景象。他们结束了封建制度、宗教裁判所。他们关闭了 500 所宗教机构，让 5858 名神父、修女得到了并不自在的自由。他们黜除了贪官污吏，引进了主计制度。他们修建并保护道路，盗匪因此几

乎绝迹。他们清理市街，装设路灯。他们疏浚了罗马市东南部的庞廷沼地 (Pontine Marshes)，并加以开垦。他们宣布信仰自由，犹太人可由犹太区自由迁出，兄弟会会所也蓬勃发展。医院大量增加，他们革新了狱政，成立学校，并充实学校人员，又在佩鲁贾 (Perugia) 增设了新的大学。他们继续挖掘古物的工作，并任命卡诺瓦 (Canova) 管理放置这些古物的博物馆。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征收赋税之严紧，也是罗马人未曾经历过的，罗马壮丁都必须入伍服役，商人对限制与英贸易则时有怨言。大多数民众则不满法人骤然改变了传统的体制，也因为听了法人对待教皇的传闻愤恨法人。如今连无神论者也开始敬爱这位教皇了。“民众如今怀着悔恨的心情，怀念着往日教皇温和及纵容的统治”。<sup>⑩</sup>

拿破仑这么一位精明的君主，居然会犯了囚禁教皇的错失，实在令人愕然。他与教皇订立协同，教皇亲来加冕，这些事实在已大大地帮助了拿破仑，使他和全欧洲的天主教徒建立了友谊，甚至欧洲所有的君主都可能正式承认他的地位。但是他后来对待教皇的方式疏远了所有的天主教徒及许多新教徒。拿破仑想拿教皇作他的政治工具，结果反而加强了教皇的威望。法国天主教教会一向是“高卢化”的，即反对教会的，如今也对教皇表示尊敬和效忠了。前任教皇曾因政治压力，将耶稣会会士驱出，1814年温和但坚定的庇护七世又恢复了耶稣会。那年，教皇已重新取回了世俗的权力。由于成为囚徒的教皇始终默默抵抗、毫不妥协的毅力，教皇的精神号召力量也增强了。拿破仑在两次下台期间也曾承认低估了教皇：“我一直以为他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过分了些，我错了，我看得不清楚！”<sup>⑪</sup>可是庇护七世从不曾低估拿破仑，他对拿破仑的许多作为表示钦佩。当他前日的狱吏如今成为阶下囚时，他表现了温柔敦厚的胸怀。拿破仑的母亲曾向教皇指称英人在圣赫勒拿岛虐待其子，庇护为此还请求孙沙尔维枢机主教 (Cardinal Consalvi) 为这位下台的仇人斡旋。<sup>⑫</sup>教皇比皇帝多活了

两年，他死于1823年，神志恍惚濒危时，仍喃喃念着：“萨沃纳，枫丹白露。”<sup>④</sup>

## 第五节 战争之后

战争是历史戏剧的火光道具，在他们的背后是男女间的爱和恨，人民生计的艰苦冒险，科学、文学、艺术的成功和失败以及对信仰的无限渴望。

意大利人也许不是负责的爱人，但他们勤奋努力地繁衍种族，使这块金色半岛上布满了他们的同类，因此战争的功用之一便是削减孳生不息的群众。教会认为无后之罪更甚于通奸，因为教会要以人多势众来解除异端的武装。教会因此对着爱神微笑，它并不会为狂欢节的放纵披上清教徒的外衣。意大利女人几乎个个婚前都是处女之身，因为她们很早就结婚，同时婚前的家规十分严格。可是既然婚姻往往是财产的结合，结婚后一个女人可能还要去找一位中古骑士般的侍从或一位情夫，但她仍然会受人尊敬的。如果她有两名或三名情人，那么大家才会认为她是“稍微野了点”。不过以上这些都是拜伦说的，<sup>⑤</sup>他总认为每个女人都是容易到手的。也许他只是指威尼斯，因为那里爱神维纳斯似乎特别得意，但是斯汤达（Stendhal）在《帕尔马修道院》（*Chartreuse de Parme*）书中也是这般地描述米兰。

虽然米兰道德风气颓废，但在雷米萨夫人看来，当地的生活却是枯燥无味的。她觉得那里“简直毫无家庭生活可言，夫妻形同陌路人，妻子完全由情人来照顾。”<sup>⑥</sup>斯塔埃尔夫人一向在男人中也谈笑风生，不让须眉，可是不喜欢当地的男人，因为他们

独占了谈话的时间，而且他们的言语又是那么肤浅乏味。她认为：“意大利人懒得费心思考。”<sup>⑨</sup>不过意大利人可以提醒她，教会不喜欢“听得见的”思想。同时，大多数人和教皇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认为一个有大家一致服从的教义、又能由阿尔卑斯山那头引来财富的宗教，对意大利应该是最最有利的思想体系了。即使如此，仍然有少数私下怀抱自由思想的人，<sup>⑩</sup>也仍有相当可观的政治异端存在。阿尔弗耶里（Alfieri）在法国政府没收他财产前，对革命曾经写文章大加颂扬。而成百的意大利人也曾为巴士底狱的陷落鼓掌称庆。意大利也有男女并容的文社如克拉斯卡学社（Accademia dell' Arcadia），过去以博学闻名的克拉斯卡学社（Accademia della Crusca）1812年也再度成立。1800年时一位女子坦布罗尼（Clotilda Tambroni）甚且当了波隆纳大学的希腊文教授。

在意大利各大学，科学和医药的研究均蓬勃发展。1791年，波隆纳大学的卢吉（Luigi Galvani）（1737—1798年）证明，如果将青蛙腿部的肌肉与一块铁相连，再将其神经与一块铜片相接，将会产生电流使肌肉收缩。1795年，沃尔塔（Alessandro Volta，1745—1827年）在帕维亚大学发明了沃尔塔电池，即蓄电池。他的成就震惊了全欧洲。1801年拿破仑特别邀请他来到巴黎向研究院发表他的研究成果。11月7日，在一群包括拿破仑在内的听众面前，他宣读了论文——《论电流和电子流之同》。1807年罗兰多（Luigi Rolando）公开了他在脑解剖方面所作的划时代研究。“不用脑袋的”意大利为欧洲引来的革命比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更深远广泛。

意大利戏剧如今一蹶不振，因为意大利人自然而然地就会转声为歌，转戏剧为歌剧，民众因此都涌往歌剧院，观赏随兴喜剧（commedia dell' arte）风格的歌剧。思想稍微前进的人就去观赏如阿尔弗耶里所写的戏剧。他在剧中公开宣扬他对暴政的痛恨以及他对意大利由异族统治自求解放的渴望。他几乎所有的戏剧都是在法国革命前写成的，<sup>⑪</sup>可是他慷慨激昂的论文——《论暴政》

(Della tirannide) 是作于 1777 年，1778 年出版于法国巴登 (Baden)，最后 1800 年在意大利出版的。此文已成为意大利哲学和散文的经典之作。最后，1799 年，在他多灾多难人生的尾端，他写成了《反法人士》(Misogallo 一文呼吁意大利人民揭竿而起推翻所有的异族统治，统一全国。此为马志尼 (Mazzini)、加里波第 (Garibaldi) 意大利复国运动的先声。

意大利人天性外向热情奔放，他们的语言节奏优美如歌，个个具有音乐的天分，因此诗才横溢。在这短暂的年代里——即使将阿尔弗耶里归属在过去，莱奥帕尔迪 (Leopardi) 划归于未来——仍然有上百的诗人登上了诗坛的高峰。其中最得意的是蒙蒂 (Vincenzo Monti) (1754—1828 年)，他对任何有利可图的题目都会赋诗加以歌颂。1793 年《法国大革命一瞥》(La Bassevilliana) 一诗卫护宗教，反对法国大革命，因此赢得了教廷的欣赏。1806 年在《塞耶凡涅拉诗人》(Il bardo della Selva Nera) 一诗中他歌颂拿破仑解放意大利的功绩，因此这位征服者任命他为帕维亚大学教授。拿破仑下台后，他又发现了法人的缺点和奥人的优点，大加宣扬。不过经历这些抉择和变迁，他始终歌颂宇宙的美丽。1810 年他越过这些素材的领域翻译了《伊里亚德》史诗。他并不懂希腊文，只是将一散文译本写成诗歌而已，因此福斯科罗 (Ugo Foscolo) 称他是荷马译文的大翻译家。

福斯科罗 (1778—1827 年) 是个诗才卓越，但命运坎坷的人。他是个充满了七情六欲的诗人，找却不擅于逻辑思考。他耽于情欲，到处留情，到处流浪，思想变幻不定，最后终日缅怀往日而终。可是他自始至终语言造诣精到，显然他抛弃了韵律，视其为外表的饰物，他仍然极重视文体的完美性，他一生力求创造个人独特完美的语言音乐。

他生在两个世界当中——生在希腊和意大利中间伊奥尼亚群岛 (Ionian Island) 的桑特岛上 (Zante)，是希腊母胎里的一颗意



大利种子。在桑特岛住了 15 年以后，他前往威尼斯，他品评了这个动乱的城市的美景，爱上了威尼斯颓废没落的魅力，也因此对虎视眈眈的强邻奥地利产生了厌恶。当拿破仑如一阵狂涛由尼斯(Nice)来到曼图亚时，他欣喜若狂。他高歌颂扬这位阿科莱(Arcole)的英雄是解放者拿破仑。可是这位不顾原则的救星却将威尼斯交给了奥地利，福斯科罗写了一本小说——《奥提斯最后的几封信》(Le ultime lettere di Iacopo Ortis, 1798 年)，表达他对拿破仑的愤怒，——是一位威尼斯人维特给他一位朋友的最后几封信，他倾诉着自己一方面被情敌打败失去了爱人，一方面又因条顿巨人而失去了心爱的威尼斯。

当奥军再度出发进攻北意大利时，福斯科罗加入了法军在波隆纳、佛罗伦萨、米兰等地英勇作战。他并在拿破仑准备进攻英国的部队里担任上尉一职，这个计划失败了以后，福斯科罗弃刺刀而就笔墨。他回到了意大利，出版了他最好的著作——《墓石颂歌》(I sepolcri, 1807 年)。在这文体古雅、情感浪漫的 300 余页的创作里，他力陈墓碑的好处，因碑文能使我们追思和效法伟人，他称赞佛罗伦萨的桑塔克罗齐(Santa Croce)教堂妥善保存了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马基亚维里(Machiavelli)、伽利略(Galileo)的遗骨。他在书中问道：一个历史悠久，产生过无数思想巨擘、英雄豪杰的民族，一个产生过无数哲学、艺术和诗歌巨作的民族，怎么如今会甘心情愿地事奉异族的主人呢？他颂扬伟人遗风之不朽，认为这是国家民族精神的根源。

1814—1815 年，奥人又再度成为北意大利的主人。福斯科罗不愿接受奥人的统治，他宁愿流浪到瑞士，后来再到英国。他教书、写文章来维持生活，1827 年他穷困潦倒地死于英国。1871 年他的遗骨被运回佛罗伦萨埋葬在桑塔克罗齐教堂，葬在一个终于自由的意大利。

“在意大利”，拜伦曾说（他喜爱意大利），“一个人必须是个

情人、歌手、或懂得欣赏歌剧，否则他就什么都不是了”。意大利歌剧，尤其是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派歌剧，除了短期曾受到格卢克（Gluck）和莫扎特（Mozart）的挑战外，始终执欧洲乐坛之牛耳。现在再过几年（1815年）罗西尼（Rossini）引人入胜的旋律，狂风暴雨般的曲调，就要风靡全欧洲，甚至乐坛圣地维也纳也要为他疯狂。普契尼尼（Piccini）经过了在巴黎与格卢克争霸的几年后，回到了那不勒斯。他由于同情法国大革命而遭到软禁。拿破仑征服了意大利以后，他再度受邀请前往法国（1798年），不过两年后就逝世于法国。台赛罗（Paisiello）身兼作曲家和指挥家，他在圣彼得堡、维也纳、巴黎，在斐迪南、约瑟夫·波拿巴、缪拉统治下的那不勒斯，都曾享有盛名。奇马罗萨（Domenico Cimarosa）继萨列里（Antonio Salieri）为维也纳的乐团指挥，他在此地创作了他最有名的歌剧——“秘密的婚姻”（Il Matrimonio Segreto, 1792年）。1793年斐迪南召他回那不勒斯，担任乐团指挥。法军占领那不勒斯时，他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斐迪南复辟后，他判这位作曲家死刑，后经人关说，减轻为驱逐出境。奇马罗萨于是离开了那不勒斯去圣彼得堡，而途中在威尼斯去世（1801年）。当时，克莱门蒂（Muzio Clementi）正游历各京城，创作和演奏钢琴曲，并正在编写《弦歌进阶》（Gradus ad Parnassum, 1817年），以教导各地启蒙的年轻钢琴家。

帕格尼尼（Niccolò Paganini, 1782—1840年）1797年于日内瓦开始了他在管弦乐团中任小提琴手的漫长生涯。他热爱音乐，较诸任何由他所爱且、为他的音乐心动的情妇，他更忠于小提琴。他发掘了这种乐器的最大潜能，使小提琴技艺达到了前人未有的复杂变化。他创作了24首随想曲，其旋律展开之怪异风格往往使人瞠目结舌。巴乔基任命他为皮翁比诺（Piombino）的音乐总监（1805年）。可是他根本无法长留一处，他到处旅行演奏，乐团所过之处，观众和财富滚滚而来。1833年他终于定居巴黎。他曾以2万法郎

送给贫困潦倒的柏辽兹贝利奥兹 (Berlioz)，并鼓励他写成“赫洛德在意大利”(Harold in Italy)。帕格尼尼工作辛劳，又游乐毫无节制，体力日渐衰退。他决定离开这一人才济济、革命暗潮汹涌的大都会，离开这一喧哗的京城。1840年他逝世于尼斯，除了随想曲外，他留下了8首协奏曲及许多首奏鸣曲来考验后世小提琴家的才艺。小提琴的艺术直到今天才慢慢由他诡异的风格回到往日的路线。

## 第六节 卡诺瓦

(公元1757—1822年)

意大利艺术，尤其是建筑，曾一度名满全欧。想当年全欧都向教皇纳贡，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罗马、那不勒斯富足且独立。如今，意大利战乱连年，政争不息，已鲜有热心公益的人士来重振往日艺术的光辉了。不过，当地仍然建造了一些特殊的建筑。如1806—1833年米兰卡尼奥拉 (Luigi Cagnola) 的帕契拱门 (Arco della Pace)；1792年威尼斯萨尔瓦 (Antonio Selva) 的费尼斯剧院 (Teatro la Fenice)；1795年莫瑞里 (Cosimo Morelli) 在罗马所建的伯拉斯奇宫 (Palazzo Braschi) 及其典丽的阶梯；1810—1812年尼科利尼 (Antonio Niccolini) 在那不勒斯所建圣卡罗剧院 (Teatro San Carlo) 富丽堂皇的正面。这时期并无值得后人长忆的出色绘画。可是，赫库兰尼姆 (Herculaneum) 出土的艺术品影响了意大利雕塑家，他们抛弃了巴洛克 (baroque) 怪异的风格和洛可可 (rococo) 华丽的格调，转而追求古典雕塑的优雅气质和朴实的线条。其中雕刻大师卡诺瓦留传的作品直到今日仍令人叹为观止，其作品栩栩如生，令人永志不忘。

卡诺瓦生于威尼斯阿尔卑斯山脉下的波莎格诺 (Possagno)。父亲及祖父均为雕刻师，他们善于雕刻神坛及宗教纪念碑。1760年，其父去逝后，他的祖父将卡诺瓦带回家中，后来又引进工作室。这小孩工作的热忱引起了一位阿梭罗 (Arsolo) 贵族法里叶 (Falier) 的注意，法里叶于是出钱供卡诺瓦至威尼斯习艺，这位少年以第一座名作品——《奥弗厄斯和尤利黛丝》(Orpheus and Eurydice) 来回报法里叶。<sup>①</sup>1779年，他获得法里叶的同意前往罗马。在这艺术中心，他研习古代的艺术作品，并且逐渐赞同了文克尔曼 (Winckelmann) 对希腊艺术的见解，即希腊艺术企图透过完美的形体和线条来表现至美。从此他致力于复兴古典的风格。

他在威尼斯的朋友游说政府，在未来3年里，寄赠给卡诺瓦300 ducat 的年金。这笔赞助并未使卡诺瓦骄纵自大或改变路线。他毫不掩饰地摹仿古典作品，有时的成果甚至与古人不分轩輊。1800年他所作的“柏休尔斯” (Perseus) 和“拳击师” (The Pugilist) 一般被公认为现代创作中唯一可与世界古典名作共同陈列于梵蒂冈博物院 (Belvedere) 的两件作品。<sup>②</sup>他所作的《西斯尤斯杀人马怪》(Theseus Slaying the Centaur, 1805年) 为一座庞大的大理石雕刻群像，如今陈列在昔日的维也纳皇家花园里。如不是其肌肉、情感表现稍为夸张，极易误认为古代的作品。卡诺瓦性情温和，因此表达柔和的情感最为逼真，如柏林国家画廊的“希贝” (Hebe) 即为此中佳作。此一作品描绘宙斯和希拉 (Hera) 的女儿，青春的女神——希贝为众神斟酒的情景，生动地捕捉了女神温雅高贵的动态。

在1805年这丰收的一年里，卡诺瓦开始雕塑他最知名的作品——罗马波吉斯画廊 (Galleria Borghese) 的“维纳斯塑像” (Venus Victrix)。他说服了拿破仑的妹妹博尔热斯 (Pauline Borghese) 为这尊肉感的雕像作模特儿。她当时25岁，正在身材最为美好的巅峰。不过据说，<sup>③</sup>这位艺术家只以她的脸部为范本，至于雕像的衣

着和四肢是凭着自己的想像、梦境和记忆。他花费两年的时光完成了这个作品，然后公开供大众和同好评赏。大家都对这座雕像光彩焕发的美丽、楚楚动人的仪态赞赏不已。这不再只是抄袭古人的习作了，而是表现一位活在当代的女人，而且依她兄长的看法，一位当代最美的女人的雕像。卡诺瓦把她作为礼物呈献给后代的人们。

1802年拿破仑邀请卡诺瓦由罗马前来巴黎。教皇庇护七世刚刚与这位执政签署了协定，他也劝卡诺瓦前去巴黎，即使只为了做另一个征服法国的意大利人也值得。<sup>\*</sup> 他为拿破仑所作的几尊胸像里，最令人欣赏的一座是现在陈列于卡普当提伯（Cap d'Antibes）的拿破仑博物馆（Musée Napoléon）。这位年轻的军人呈现着哲学家沉思的神态。不过，奇怪的是，最为人所知的是一座全身塑像，卡诺瓦先以石膏塑成，回罗马以后再以一块卡拉拉（Carrara）大理石雕刻而成。1811年此雕像运往巴黎，并安置在罗浮宫。不过，拿破仑不喜欢这座雕像，因为在其右首的胜利天使像似乎正展翅从他身旁飞走，后来此像就被包装运走。1816年英国政府购得此一雕像，赠与威灵顿。如今这座11英尺高的拿破仑像矗立在威灵顿伦敦巨宅艾普斯里大厦（Apsley House）的楼梯口。卡诺瓦1810年又回到巴黎，为玛莉路意丝作一雕像，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但拿破仑在这位艺术家离去时，仍然赠与巨款用以修缮佛罗伦萨大教堂，并负担圣路加学院（St. Luke Academy）（艺术家习艺之处）的经费。拿破仑下台后，教皇任命卡诺瓦领导一委员会，负责将法国掳掠至巴黎的艺术品物归原主。

这时，他已是意大利雕刻界的领袖，欧洲也只有年高德劭的乌东（Houdon）（1741—1828年）声名超过他。拜伦一向喜欢意大利超过法国，曾经说过：“欧洲、全世界，只能有一位卡诺瓦。”<sup>⑥</sup>

---

\* 第一位是来自意大利的法国人拿破仑。

并且，他说：“卡诺瓦已入伟人之林。”<sup>⑨</sup>他正和大卫（David, Jacques-Louis）的情况一样，靠着当时兴起的古典主义的浪潮，而取得了艺术界的领导地位。两人也都受过拿破仑的支助。可是欧洲不可能长久以模仿古人而自满，不久便兴起了浪漫主义，色彩和情感逐渐战胜了线条和形式。卡诺瓦的声名逐渐消逝了。

在此尚值得一提而与本文有关联的是：卡诺瓦是个好人。他谦恭有礼，信仰虔诚，乐善好施，他并且没有同行相嫉的通病，能够欣赏别的艺术家的优点，这些是有口皆碑的。因为他工作辛劳，罗马污浊的空气和雕刻大纪念碑的工作都损伤了他的身体。1812年他离开罗马，回到故乡波莎格诺，想过着安静的生活，呼吸清新的空气。1822年10月13日，他逝世于故乡，时年64岁，当时全意大利同声哀悼。

## 第七节 再见吧！意大利

在这段时期里，法人在意大利的功过总和究竟是多少呢？法国人在大革命时，愤慨激昂地振臂高呼，以本身的毅力和行动争取了自由。他们因此为这个久经外族统治、民族意识麻痹、不思振作的意大利树立了榜样，也激励了意大利人。法国人改变和冲击了政府和人民的旧有关系。法人带来了《拿破仑法典》，此法典虽然严苛，但明确清晰，因此促进了统一，安定了社会，并在一群长久为阶级分隔、对法律漠视的人民里建立了法律的平等。拿破仑和手下的行政官员切实改进和疏通了政治的管道，提高了行政效率。他们从事大批公共工程，美化市容，开辟大路和公园，清除街道，疏浚运河和沼泽，建立学校，结束宗教裁判所，鼓励农

业、工业、科学、文学与艺术。新政府保护人民的宗教，但不容许宗教再镇压异端，而且宗教团体也必须为国家财经贡献税金；不过，不信宗教的拿破仑也曾拨款完成米兰大教堂。政府同时又全面改革和简化法律程度，禁止刑求，拉丁文也不再是法庭规定的语言了。在此期间（1789—1813年），约瑟夫·波拿巴和缪拉在那不勒斯，尤金在米兰均福泽广照，如果他们是意大利人，必然早已赢得人民的爱戴。

这安康景象的反面是征兵、课税及技巧高明的搜刮行为……拿破仑肃清盗匪，但他自己却大肆掠夺艺术品。他眼光高明，可能即使在遍地都是艺术珍品的意大利也很难找到这么懂得欣赏艺术的人。其次，征兵。在拿破仑看来，这是维护这一新国家内部秩序和抵御外侮最合理公平的办法。他曾经说：“意大利人应该牢记：武力是国家的支柱。因此，在城市里懒散悠闲的青年现在应该不要再害怕战争的劳苦和危险了。”其实，意大利人本来会接受征兵这必需的不幸的，可是意大利的壮丁发现：他们四处奔波，只为了保护拿破仑或法国的利益。<sup>⑨</sup>1803年6000名意大利士兵被调往英伦海峡，预备参与可能的英伦之役。后来，法国人又把8万意人从阳光普照的故乡拖出来，去体会俄国的平原、积雪等风光和与哥萨克骑兵打仗。

纳税是爱国的表现，这句话意大利人也不会同意。因为意大利人辛劳的成果不仅用于保卫、治理和美化意大利，还要用来协助拿破仑应付庞大不稳的帝国经费。拿破仑一方面命令尤金“窃取”意大利的钱财，一方面又希望他赢得民心。在这小小的王国里，在1805至1812年间，税收由8200万法郎涨到1.44亿法郎。而大陆封锁政策又剥夺了意大利工业的英国市场，否则意大利人还能勉强地忍受这些税收。同时，进出口关税只对法国有利，更使意大利在与德、法贸易中大为不利。

所以，甚至在奥地利人回来以前，意大利就已厌倦了拿破仑

的保护。他们觉得：不但艺术杰作被搜刮，而且生产的财富也大量流入法国，只为了拿破仑可以侵略英国和征服俄国。这不是他们的诗人期望的结果。他们承认教皇的官吏贪赃枉法，但他们更不喜欢法国官吏对待庇护七世的粗暴态度，他们也因为拿破仑下令监禁庇护七世而不悦。最后他们甚至对仁慈的尤金都失去了好感，因为拿破仑许多不得人心的命令是透过他来执行的。因此，来比锡之役后，拿破仑败象初露（1813年），意人已不愿再支持尤金去援救拿破仑。如今，依赖异族的武力和政府解救意大利的努力失败了，唯有等待本国的文学、政治家、武力来统一全国，争取意大利的自由。

拿破仑虽有诸多失算之处，但他早已料到治理意大利的这些困难。在1805年——即他加冕为意大利王的这一年——他曾对列纳说：

“法国和意大利的联合只是短暂的现象，不过，为了让意大利各邦习惯生活在共同的法律下，也必须这么做。热那亚人、皮德蒙特人、威尼斯人、米兰人、托斯卡纳人、罗马人、那不勒斯人，他们彼此都勾心斗角……当然，罗马由历史上的意义看来，应该是意大利的首都，要使罗马成为意大利的首都，必须限制教皇的权力，只许他管理宗教的事务。我现在还不能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以后我要深入研究……所有的小国都会习惯同样的法律，当习俗和举止一致以后，敌意消除以后，才有统一的意大利。不过这应该还要有20年的时光吧！到那时谁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呢？”<sup>⑥</sup>

我们不能每件事都相信布列纳，不过拉斯卡斯(Las Cases)也曾引证拿破仑在圣赫勒拿说过同样的话：“我已在意大利人的心中



树立了颠扑不破的原则，即意大利早晚要完成复兴的使命。”  
意大利终于完成了使命。

## 第三章 奥地利

(公元 1780—1812 年)

### 第一节 开明的专制君主

(公元 1780—1792 年)

1789 年的时候，奥地利是欧洲一泱泱大国，以其历史、文化和国力傲视群雄，当时奥地利帝国幅员广大，面积远超过奥地利本土。她的国名本来的意思是“南风”(Auster)，这个字正好表达出条顿民族强壮的体魄和善良温和的天性。他们很懂得生活的艺术，同时，他们也和意大利人一样，热爱音乐。他们原是塞耶特人的一支，耶稣降世前不久为罗马人征服。虽然事隔 2000 年，他们似乎仍然保存着一些塞耶特人活泼的个性和慧黠。他们在文多博纳(Vindobona)建造了罗马文明的前哨来抵御入侵的野蛮民族，这个城市就是后来的 Wien，也就是今日的维也纳。在这里，公元前 170 年，罗马的哲学家皇帝马尔库斯(Marcus Aurelius)，在发放智慧的火花之间，逐退了马尔科曼尼人(The Marcomanni)。在这里，查理曼大帝设定了帝国的东疆。在这里，公元 955 年，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建立了东王国以抵御马札儿人(The Magyars)。在这里，1278 年，哈布斯堡皇族的鲁道夫(Rudolf)建立

了他的帝国，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1918年。这时，哈布斯堡皇族统治下的奥地利已将邻近的叙利亚（Styria）、肯宁西亚（Carinthia）、卡尼奥拉（Carniola）、蒂罗尔（Tirol）、波希米亚（Bohemia）（亦即捷克〔Czechoslovakia〕）、川西威尼亚（Transylvania）（亦即罗马尼亚〔Romania〕）、匈牙利、波兰的加里西亚（Galicia）伦巴底及西班牙的属地比利时划入版图。当拿破仑在1797年初敲维也纳大门时，当时欧洲人所知道的奥地利帝国就是这样—一个分散四方的国土。

在特雷莎（Maria Theresa）统治期间，哈布斯堡王朝达到了巅峰状况。这位个性顽固不凡的女族长与当时君主国的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大帝鼎足三分，各自称雄一方。她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狡诈手段的欺骗下，失去了西里西亚（Silesia）。从此以后，她率领人民及盟军和他缠斗不休。在这场斗争结束之后，她还在有生之年把16个儿女中的5位放上了王位：约瑟夫·波拿巴在维也纳、利奥波德在托斯卡纳、阿马利亚（Maria Amalia）在帕尔马、卡罗利娜在那不勒斯、安托瓦尼特（Marie Antoinette）在法国。她很不情愿地将奥国交给了长子，因为她对他反对传统的态度和从事的改革，一向不太放心，而且她有先见之明，她相信人民对她的爱戴坚定不移，他们喜欢旧有的制度，如果他们传统的信仰和生活有所变动的話，他们断然不能适应。

约瑟夫·波拿巴果然遇到了一些令他手足无措的问题，他母亲的判断似乎得到了证明。他从1765年到1780年与其母共同主政，后来又亲自当政10多年。他解放农奴而使贵族大为震惊，他与伏尔泰（Voltaire）的哲学“眉来眼去”；他容许新教徒信仰自由；他找庇护六世的麻烦，这些行动也使势力日增的天主教徒感到愕然，文武百官也都不支持他。因此，他在晚年时不得不承认几件事：第一，农民由于突然不受贵族的束缚，他们反而糟蹋了自由的权利；第二，他已经瓦解了经济；第三，他造成了匈牙利和比

利时上层社会的叛变。这种情况甚至已威胁到帝国本身的生存。他用意甚佳，可惜他缺乏可行的具体方案，只是颁布了无数空洞的法令来治理帝国。弗里德里希大帝批评他道：“他第一步还没踏出去就想跨出第二步。”<sup>①</sup>他死时（1790年2月20日）对此次改革操之过急十分悔恨，同时也为保守人士故步自封、抗拒革新的举动而感到遗憾。

他的弟弟利奥波德具有和他一样的理想，但做事从容不迫，个性稳健。他被任命为托斯卡纳大公时才18岁，但他已经知道小心翼翼地使用大权，他网罗意大利贤明之士（贝卡利亚即为其中之一）。他们熟悉公国的民情和国家的潜力。借着这些人才的协助，他的政府成为欧洲各国的模范。所以在他哥哥去逝，他登基为王时，他已有25年治国的经验了。他删除了约瑟夫·波拿巴时代的一些法令，同时也缓和了一些改革的政策。但是，他深知：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有责任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准和生活水准，因此继续从事革新。波拿巴普未经思考地贸然进攻土耳其，他将那些部队召回，而且稍稍地动用了这批武力，便说服比利时回到了奥地利的怀抱。他承认匈牙利国会和宪法具有和奥地利平等的地位，因而安抚了匈牙利的贵族。他把波希米亚古代帝王的王冠还给布拉格，来取悦波希米亚人。他还接受邀请，在圣维塔大教堂（St. Vitus' Cathedral）加冕。他了解：一个政府的体制和本质只要能维持，皇冠并不是最重要的。

同时，他不愿依从流亡的法国贵族和欧洲诸王的要求，与法国革命政府作战。他虽然同情他妹妹安托瓦尼特的处境，但是他担心与法交战将使他失去尚未驯服的比利时。然而当路易十六和皇后安托瓦尼特逃亡到瓦雷内（Varennes）被发现，带回巴黎，又过着恐怖的日子时，利奥波德终于忍耐不住向友邦提出大家联合控制法国情势的建议。普鲁士的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与利奥波德在庇耳尼茨（Pillnitz）会面，并且共同发表宣言（1791

年8月27日)，威胁着将干涉法国的革命。可是不久路易十六却接受了革命宪法（9月13日），而使得他们两人大为难堪。但是混乱仍然有增无已，并且再度威胁到国王、皇后的生命。

他于是命令奥地利全军动员，法国国民会议要求他解释动员的原因。但是在这项要求到达以前，利奥波德就驾崩了。（1792年3月1日）他的儿子，也就是继承人——法兰西斯二世，年方24岁，他拒绝了法国的最后通牒。4月20日，法国向奥地利宣战。

## 第二节 法兰西斯二世

上面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一向都依据法国的说法。可是，奥地利的看法如何？他们会有什么感觉呢？当时，他们听说公主（她的美丽曾使得柏克（Burke）为她舌灿莲花）被巴黎人骂是“奥地利人”；巴黎的暴民等于是把她软禁在杜伊勒里宫（Tuileries），后来国民大会又废除她皇后的头衔，还把她监禁起来。他们也听到了9月大屠杀的故事，还听说皇后所爱的朗巴勒公主（Princess de Lamballe），头被砍掉放在枪尖上，在皇后面前展示通过。他们听说她头发全白，被放在死囚车上，通过高声辱骂的群众，开往断头台处死。由于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奥地利人无需激励即已热血沸腾，纷纷聚集在年轻的皇帝的领导下，和那些法国的刽子手作战。法兰西斯是个心地和善但才智平庸的皇帝，他所选的将领也都是无能的庸才，因此，战事节节失利，奥国领土不断丧失，最后还将京城沦于敌手，任他们摆布。不过，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这些败绩反而使奥国人民更加敬爱他。他的子民认为他是上帝派来的真命天子，是经罗马教皇祝福，并且世袭相传的

正统君王。他们相信，他将能保护奥国人民，抵御入侵的野蛮人，有一天他也一定能击败那个科西嘉的魔王。法兰西斯二世废止了伯父和父亲所制定的每一项自由主义的法案，他又恢复了封建税和徭役制度，他反对任何由独裁走向宪政的措施。他的行动会一度使人不满。不过，当他在奥斯特里茨和普勒斯堡（Pressburg）战役后再度回到了敌人一度蹂躏掠夺的首都，人民已忘记了他一切不得人望的措施。他们夹道迎接他，赞美他，对他效忠。<sup>②</sup>在这以后多事的8年里，奥国人民只见到恶人的胜利，只见到他们上帝指派的国王屈辱地被敌人欺侮；可是，他们相信，天道不远，有一天，他必定会向奥国的敌人报仇，恢复昔日的权势和荣耀。

### 第三节 梅特涅

辅佐法兰西斯二世，而使奥国达到全盛时期的功臣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Lothar von Metternich）。他于1773年5月15日生于莱茵河畔的科不伦茨（Coblenz）。他是梅特涅王子（Prince Franz Georg Karl von Metternich）的长子，他的父亲为奥国派驻特里尔、美因茨、科隆大选侯兼大主教宫中的代表。这个孩子名字中的前两个字即取自这些神职君主的名字。而梅特涅不管是在年轻时迷恋伏尔泰的日子里或在做宰相后纵横捭阖的岁月中，都是个忠心虔诚的教徒。他名字中的Lothar使人想起17世纪的欧洲曾经有过一位同名的古人统治过特里尔。有时候他在名字里加上“威涅堡柏林丹”（Winneburg Beilstein），两个字表示他家8世纪以来祖传的产业。梅特涅的家面积广达75平方英里，因此使他有资格在名字里加上von（贵族符号）这个尊贵的介系词。生长在这样

的家庭里，他显然不会赞成革命或领导革命的。

他从一位家庭教师那里接受了适合他身分的启蒙教育。这位教师引导他接触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sup>⑤</sup>后来他进入斯特拉斯堡大学，不久，巴士底狱事件也在这里引起了一些余波，于是他转到美因茨大学学习财产和判例的科学、法律。1794年法国政府认为科隆是法逃亡贵族的大本营而占领了这座城市，梅特涅家中所有的产业几乎都被“国有化”。全家只好逃难到舒适的维也纳。这时身材魁梧、文质彬彬的梅特涅开始追求考尼茨（Eleonore von Kaunitz）小姐，并赢得了她的芳心。她就是那位曾使奥国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波旁王朝通婚的政治家的孙女。梅特涅从他的新娘子那里学到了闪烁其词、假仁假义的外交手腕。不久他就能胜任狡诈掠夺的外交工作了。

1801年他28岁时被任命为萨克森（Saxony）的首相。在这里他邂逅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他在今后30年里成为梅特涅的顾问和发言人。他为梅特涅“保持现状的革命”的说法提供了最动听的说词。这时梅特涅为了依随旧时代的习惯，也找了一位情妇，即巴格拉季翁（Bagration）。她才18岁，是我们后面提到的一位俄国将军的女儿。1802年她为他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获得了他发妻的接纳。<sup>⑥</sup>1803年，当局因满意他的表现，提升他到柏林奥使馆任职。他在这3年里曾遇见了沙皇亚历山大，并和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段关系维持到他们共同推翻拿破仑为止。奥斯特里茨战役后，拿破仑希望奥国派遣一位考尼茨家人出使法国，当时的外交部长施塔迪翁伯爵（Count Philipp von Stadion）将此一职务委派梅特涅。1806年8月2日，这位33岁的考尼茨女婿到达巴黎。当时，拿破仑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推翻他的人吧！

从此以后，在战与和之间，梅特涅和拿破仑展开了一场9年的斗智，最后这位外交官和将军合作打了胜仗。为了在拿破仑炯炯逼人的眼神下稍作喘息，同时也是觉得自己名门闺秀的发妻言

语无味，貌不惊人，他勾搭上了当时巴黎市长的夫人洛尔朱诺（Laure Junot），不过，他并没有忘记来此的目的，他必须负责洞悉拿破仑的心意，探知他的目标，并且尽其所能转变法国的方针为奥地利所用。拿破仑和梅特涅惺惺相惜，都十分钦佩对方。1806年梅特涅写信给根茨，称拿破仑为“欧洲唯一果断实际的人物。”<sup>⑨</sup>拿破仑也发现此人心智敏锐，不逊于自己。同时，梅特涅也仔细观察塔列朗（当时法国的外交大臣）而受益匪浅。

他在巴黎度过了大约3年的大使生涯。他曾暗暗怀着欣喜，看着法国大军陷在西班牙。他曾意图隐瞒奥国重整军备的事实，可是为拿破仑识破。1809年5月25日他离开巴黎，前往随侍在前线的法兰西斯二世，他们共同目睹了奥军在瓦格拉姆（Wagram）的败绩。施塔迪翁伯爵因战场失利，引咎辞去了相位，法兰西斯于是将此一职位给予梅特涅。1809年10月8日，他开始了39年漫长的宰相和外交大臣的生涯。当时他才36岁。

1801年1月，朱诺将军在妻子的书桌里发现了几封梅特涅的情书。他差点把她勒死，并且发誓要向这位神气的大臣挑战，在美因茨决斗一场。后来还是拿破仑把将军及夫人派去西班牙才结束了这场风波。这件绯闻并没有影响到梅特涅的声名、婚姻以及在奥国政府的地位。他后来还安排拿破仑与奥国公主玛莉路意丝之间的婚事。他听说这次法奥突然恢复亲善激怒了俄国，十分高兴。他也注意到，在对立的欧洲大国间，紧张的情势正不断地扩张。于是他盼望着，计划着，在法俄鹬蚌相争时，奥国能重获失土，重新恢复往日在列强杀伐声中奥国保有的崇高地位。



## 第四节 维也纳

在战争的城墙后面住的是爱好和平、和蔼可亲的维也纳人。这里是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奇人、缪拉维亚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俄国人的大熔炉。城中共有 19 万人，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他们信仰虔诚，不时前往史蒂芬大教堂（St. Stephen's Church）膜拜威尼斯的守护圣徒。此地街道大多狭窄，但也有几条宽广平整的林荫大道。一连串庄严的建筑汇集在宫殿似的施恩布卢宫（Schonbrunn），在这里住着皇室，政府的重要机构也集中此地。“蓝色”多瑙河挟带着全城的繁华与欢乐缓缓流过。沿岸的草地（Prater）公园是市民驾驶马车兜风和漫步的好地方。在城门外的维也纳森林，林木葱郁，花草芬芳，小鸟的歌声鸣啭欢迎着爱好田园之乐的人们。

总之，维也纳人是柔顺老实的民族。他们不像巴黎人。后者不管有没有革命，生活得总是较为浮躁，他们厌恶婚姻生活，仇恨贵族，猜疑他们的国王，甚至怀疑上帝。维也纳也有贵族，但他们在宫中跳舞和作乐。他们尊重老百姓，一点儿也不势利眼。虽然在拿破仑实干的战士面前，他们不堪一击，但他们慷慨赴死。中上阶级的人士因供应军需品，借款给被封建制度弄穷的贵族或给屡战屡败的政府，因而致富。他们才真正有强烈的阶级观念。

劳工阶级也已渐渐形成。1810 年时，维也纳周围约有 100 多家工厂，大约雇用了 2700 名男女工人。他们的工资足以温饱而无虞。<sup>①</sup>早在 1811 年时，就有人抱怨炼油厂和化学工厂造成了空气污染。<sup>②</sup>商业正欣欣向荣，维也纳邻近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

港，同时多瑙河直通黑海，沿岸城市众多（包括布达佩斯〔Budapest〕），成为维也纳的广大腹地。1806年后，由于拿破仑禁止英国货物进入大陆，并且控制了意大利，奥国工商业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许多家庭因而失业，一贫如洗。

财政主要被犹太人控制。农业和大部分的工业都操纵在他们手里，因此他们成了理财专家。有些犹太银行家家宅之壮观几可与艾什泰哈齐家族相抗衡，有些甚且与国王成为挚友，还有的被尊为国家的救星。约瑟夫·波拿巴二世为表扬几位爱国的犹太银行家，特别赐给他们爵位。这位国王特别喜欢到金融巨子阿恩施泰因（Nathan Von Arnstein）家中做客，因为他喜欢和这位银行家美丽的妻子讨论文学和音乐，她就是多才多艺、谈吐高雅的阿恩施泰因（Fanny Itzig）。她在维也纳的沙龙，一度名闻遐迩。<sup>⑧</sup>

政府大权操纵在贵族手中。他们能力平庸而操守不正。边沁（Jeremy Bentham）在1817年7月7日的一封信中，曾为“奥国的政治道德已荡然无存”一事感叹，而且他也为找不出一个“好人”而绝望。无论在军中或政府机关，平民都不可能擢升至主管的地位，因此军人和公务员没有冲劲，不想卖力或冒险以求升官。基层的士兵都是无所事事只好从军的，或者是中签而征召入伍的，不然便是强迫服役的乞丐、激进份子和罪犯。<sup>⑨</sup>相对地，每个法国军人都有可能爬到统帅的地位，甚且有机会封爵成为贵族。相形之下，难怪奥军屡次和法军对阵，都溃不成军了。

军队、警察和教会维持着维也纳的治安。哈布斯堡皇朝仍然反对宗教改革，他们忠于天主教，并且仰赖那些训练精良的教士来检查出版物及培养基督徒子女君权神授的信仰；他们并以信仰的希望来抚慰穷苦受难的人。当时在史蒂芬教堂（Stefanskirche）和卡尔大教堂（Karlskirche）里，歌声悠扬，香烟袅袅，会众共同祈祷，人们在弥撒中提升了性灵，他们这些仪式涤荡人心的效果，也正是新教徒巴赫和不信仰宗教的贝多芬在音乐里追求的境界。

宗教的游行队伍定期地在街边演戏，以唤醒民众对殉道者和圣徒的记忆和纪念维也纳大慈大悲的圣母。天主教虽带来了恐怖的地狱景象以约束人心，它虽然呈现了圣徒受难的惨状，但这个宗教抚慰人心的效果，却也是不逊于其他宗教的。

教会负责中、小学教育。维也纳、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和因斯布鲁克（Innsbruck）等地的大学都由博学的耶稣会会士担任教职。政府控制出版界十分严苛，所有提倡伏尔泰思想的文字都被挡驾在国界或城门口外，因此维也纳很少有异端人士。特雷莎曾经企图消灭兄弟会，但有些会员幸免此难，不过他们不再激烈地反对教会干政，因此即使虔诚的天主教徒也能接受他们的思想。他们也不再鼓吹激烈的社会改革，如今连皇上都愿支持他们的理想。因此虔诚的天主教徒莫扎特同时也是兄弟会会员，连约瑟夫·波拿巴二世也加入了这个秘密组织。另一较为急进的秘密社团，前耶稣会士魏斯豪普（Adam Weishaupt）1776年创立的先觉会（The Illuminati）也得以幸存，不过已是日薄西山了。利奥波德二世时，又沿袭他母亲的先例，禁止秘密结社。

教会教导人民忠于国家、行善行仁、遵守社会规范、节制情欲，颇具成效：1804年斯塔埃尔夫人曾报导说：“你找不到一个乞丐，慈善机构的组织健全，行善不遗余力，由任何一件事，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信仰虔诚的贤明政府。”<sup>⑧</sup>男女关系在平民中还算保守，但上层阶级却放肆多了，男人皆有情妇，女人皆有情夫。塞耶（Thayer）告诉我们，贝多芬对“当时维也纳的一种普遍现象，即与未婚女子同居，俨然夫妻”表示看不顺眼。<sup>⑨</sup>不过，一般家庭气氛和谐，父母仍能够维持着他们的权威。人们举止文雅，并没有革命的意图。因此贝多芬1794年8月2日写道：“我相信，奥国人只要有黑啤酒喝，有香肠吃，他们绝对不会造反的！”<sup>⑩</sup>

典型的维也纳人喜欢消遣作乐，而不爱从事改革。只要身有分文，他们一定及时行乐，他会去看罗杰（Niklos Roger）这位

“烧不着的西班牙人”。<sup>⑨</sup>如果钱再多些，他便去玩撞球或保龄球，维也纳市内市郊咖啡屋林立，如今咖啡已与啤酒相颉颃成为大家喜爱的饮料。这些是穷人爱去的地方。上层阶级的人士则去花园洋房式样的啤酒屋，阔老爷也可以在赌场里撒下大把的钞票。他们也可以去参加化装舞会，例如到可以容纳数百对共舞的方堡大厅 (Redoutensaal)。甚至在斯特劳斯 (Johann Strauss, 1804—1849 年) 以前，维也纳的男女就与舞结了解之缘了。保守而优雅的米纽爱舞 (Minuet) 已为华尔兹取代。男士们可与另一半拥舞，带着她转个痛快，享受其中刺激的乐趣，由此种旋转的动作因而产生了“Waltz”的舞名。教会表示不满，可是又原谅了人们。

## 第五节 艺术

维也纳剧院林立，从富丽堂皇、专演古典戏剧的舞台到在临时舞台上收 2 便士的独幕剧的小剧场，应有尽有。最古老的定期剧场是卡特涅梭尔剧场 (Kartnerthor)，为市政厅于 1708 年所建。剧作家兼演员斯特尼斯基 (Joseph Anton Stranitsky, 死于 1726 年)，以意大利的阿伦奇诺 (Arlecchino, 即英国剧中 Harlequin) 此一丑角为蓝本，塑造了汉斯佛斯特 (Hanswurst) 这个嘻嘻哈哈的小丑，借着他，日耳曼人见到了自己可笑的怪癖。1776 年约瑟夫·波拿巴二世大力支助伯格剧场 (Burgtheater)，使这古典式正面的建筑里演出了古今最杰出的戏剧。不过，最豪华的戏院当数希卡内德 (Johann Emanuel Schikaneder) 1793 年建的维也纳剧场 (Theater-an-der-Wien)。此人曾为莫扎特的“魔笛” (Magic Flute) (1791 年) 作词，并担任剧中柏柏杰诺 (Papageno) 这个角

色的演出。他利用了当代各种所知的机械装置，来配合演出。剧中景色之壮观，即使真实的事物相形之下也大为逊色，因此常使观众叹为观止。贝多芬的《费德罗》(Fidelio)一剧即在此剧院首次公演，更为许卡涅德耳增添了不少光彩。

在维也纳，当时只有一种艺术的成就和光彩可与戏剧相颉颃。它不是建筑，因为自1789年后，奥国巴洛克式建筑已步入下坡。它也不是文学，因为教会加重了诗才双翼的负担，使它无法任意翱翔，葛利里帕契耳(Grillparzer, 1795—1872年)的时代也还没有降临。斯塔埃尔夫人报导说：在维也纳，“人们不大读书”，<sup>⑥</sup>就好像今天有些城市一样，每天的报纸就足以满足他们文学的需求。《维也纳报》(Wiener Zeitung)及《维也纳杂志》(Wiener Zeitschrift)都是一流的。

不用说，维也纳首屈一指的艺术成就是音乐。在奥国和日耳曼，家庭即是文明的源泉和城堡，对他们而言，音乐与其说是职业音乐家借以维生的技能，毋宁说是家庭业余的消遣和艺术。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士家中都有乐器，有些还能随时组成四重奏。偶尔人们必须订票去听一场音乐会，不过公开演奏大多不收门票的。虽然如此，维也纳音乐家仍多如过江之鲫，由于僧多粥少，大都潦倒不堪。

他们究竟如何能活下去呢？多半是接受邀请到私人家中去演奏，或是将曲子呈献给富有的贵族、教士或商人（有的是预先谈好了酬劳）。也幸亏两个世纪来，爱好音乐、演奏音乐、赞助音乐已成为哈布斯堡皇族的传统，因此音乐才能在维也纳发扬光大。约瑟夫二世、利奥波德二世都始终热心地推动和鼓励音乐。鲁道夫大公(Archduke Rudolf)(1788—1831年)既是贝多芬的学生也是他的保护人。艾什泰哈齐家族世代也鼓励音乐。我们曾经见到：约瑟夫王子(Miklós József Esterhazy, 1714—1790年)请海登担任艾什泰哈齐宫(匈牙利的凡尔塞宫)管弦乐团的指挥，曾

达 30 年之久。他的孙子米可罗·尼可劳斯·艾什泰哈齐王子 (Miklós Nicolaus Esterhazy, 1765—1833 年) 则聘请贝多芬为他家的管弦乐团作曲, 利希诺夫斯基 (Karl Lichnowsky) 王子不仅支持贝多芬作曲, 还成为他的好友, 有一段时间还请他住进宫中。波希米亚世家的罗布可维兹王子 (Jose Fran Lobkowitz) 与鲁道夫大公、金斯基 (Kinsky) 公爵共同支持贝多芬作曲直到他与世长辞为止。此外, 我们还得加上司维坦男爵 (Gottfried van Swieten) (1734—1803 年), 他不仅给予音乐家经济上的援助, 更重要的是: 他费尽心思, 为音乐家找工作或寻求津贴。例如: 他介绍海登进入伦敦的社交圈, 他接受贝多芬呈献的第一乐章。他在维也纳组织由 25 位贵族人士组成的音乐协会, 以沟通作曲家、出版家和听众间的感情。可以说, 部分是由于这些人的努力, 历史上最不得人缘的作曲家贝多芬才能冲破难关成为 19 世纪的乐坛泰斗。

## 第四章 贝多芬

(公元 1770—1827 年)

### 第一节 在波恩度过的少年时代

(公元 1770—1792 年)

贝多芬在 1770 年 12 月 16 日出生；其时，波恩是科隆 (Cologne) 选侯 (身兼诸侯——总主教之职) 的所在地。科隆是莱茵河西岸公国之一，在拿破仑在其地“世俗化”以前，为天主教总主教所治理。他们热爱世俗活动，经常资助有才华的艺术家。波恩有 9560 人，其中绝大多数都仰赖选侯的产业为生。贝多芬的祖父，在选侯的唱诗班作低音歌手；父亲约翰·范·贝多芬 (Johann van Beethoven) 是唱诗班的男中音。贝多芬这支家族是接近卢万 (Louvain) 村庄的荷兰后裔。荷兰字 van 意指本源地，并不像德文 von 或法文 de 表示有爵位封号和财产的贵族阶级。祖父和父亲都有酗酒习惯，因此，贝多芬多多少少也承袭了这种习惯。

1766 年，约翰·范·贝多芬娶年轻的寡妇玛利亚·马格达里那·克宛莉许·乐恩 (Maria Magdalena Keverich Laym) 为妻；她是埃仑布赖特斯泰因 (Ehrensbreitstein) 地方一位厨师的女儿。玛利亚在当了母亲之后，由于温柔慈祥和怡然自得的态度，极为那

举世闻名的儿子所喜爱。她生了7个孩子，4个在幼年即夭折，长大成人的，只有路德维希(Ludwig)、卡斯帕·卡尔(Caspar Karl, 1774—1815年)、尼古劳斯·约翰(Nikolaus Johann, 1776—1848年)。

贝多芬父亲的唯一收入，是任“选侯宫廷男中音”所得的300弗罗林(flurin)，全家住在波恩的贫民区内。年轻的贝多芬所住的环境和他所接触的团体，自然无法把他造就成上流的绅士；最后，贝多芬依旧是粗野而具有叛逆性格的孩子。贝多芬父亲为了要使儿子成为神童，以改善家庭状况；或威胁、或利诱这4岁大的男孩，每天（偶尔在晚上）花许多时间练习键盘琴或小提琴。显而易见，这个男孩对音乐并无内在自发的欲望，<sup>①</sup>因而，他父亲督责甚严，经常使贝多芬默默的饮泣。日复一日，虽然折磨依旧，但男孩已渐渐喜爱这使他受过无数痛苦时刻的艺术。1778年3月26日，8岁的贝多芬和另一学生在一公开的音乐会上演奏，此次演奏所得的报酬数目不详。总之，他父亲受此鼓励，即聘请教师指导贝多芬，使贝多芬能更上层楼，得窥音乐的堂奥。

除此以外，贝多芬几乎未受过正式教育。我们已知贝多芬入学时，学了够用的拉丁文，信函中间杂以拉丁文的幽默笔触，读来令人兴趣盎然。贝多芬无师自通了法文（当时的世界语），且能以法文清晰地写作。不管任何语言，他都未学会正确的拼字；同时也很少为标点符号的用法烦心过。贝多芬阅读涉猎的范围，自司各脱(Scott)的小说至波斯的诗文这一类有益的书藉，且随手抄录优美隽永的小品文。仅有的娱乐在手指上，他深爱即席演奏；在此技巧上，只有阿卜特·福格勒(Abt Vogler)能和他媲美。

1784年，玛利亚·特雷莎(Maria Theresa)的幼子——马克西米连·弗兰茨(Maximilian Francis)受任为科隆选侯，定居波恩。马克西米连生性仁慈，酷爱美食与音乐，遂成为“欧洲最肥胖的人”；<sup>②</sup>同时组成了有31件乐器的管弦乐团。14岁的贝多芬在合奏



中弹奏中提琴，列名为“宫廷乐团副风琴手”，年薪150古尔登(gulden)。③1785年，选侯接到报告，描述贝多芬为“才能卓越，……行为良善恬静，生活困苦”。④

虽有种种迹象显示贝多芬在性方面的放纵，\*但这年轻人良好的品行与渐露的才气，使他获得选侯的允许与赞助而游学维也纳学习作曲。抵达不久，即为莫扎特(Mozart)接待，莫扎特聆赏他演奏，给了适度的赞赏，使贝多芬大失所望。显然莫扎特认为他所弹奏的乐曲，早就一再的预习过。贝多芬疑心莫扎特有这种想法，要求莫扎特在钢琴上为他弹出变奏的主题。莫扎特对这青年想像力的丰富与弹奏时的稳健无误，极为讶异，对他友人说：“留意这孩子，总有一天他会成为全世界众所瞩目的中心”；⑤这故事已是家喻户晓了。莫扎特似乎给贝多芬上了几课，由于莫扎特父亲利奥波德(Leopold)1787年5月28日的去世，与贝多芬母亲溘死的消息传来，即中止他们两人昙花一现的关系。路德维希匆忙赶回波恩，当他母亲过世时，他正侍疾床侧(7月17日)。

贝多芬父亲的男中音嗓子倒了很久，写信给选侯诉说他已一贫如洗，希望选侯能施以援助，结果未能如愿；倒是家中在唱诗班的另一歌手解了困境。1788年教伊里诺·范·布罗伊宁(Eleonore von Breuning)和他的弟弟布罗伊宁(Lorenz)弹奏钢琴，以增加家庭收入。这两兄弟有教养的富孀母亲，接待年轻教师与她孩子一视同仁；如此滋生的友谊，稍微能把贝多芬个性上的棱角锉平。

---

\* 贝多芬死后尸体解剖，发现有许多内脏疾病；《格罗佛的音乐和音乐家这字典》(Grove's Dictionary Music and Musicians)叙述为：“很可能是早年所染梅毒病的结果。”贝多芬传记中最出类拔萃的作家柴伊尔(Thayer)说法较为文雅：“贝多芬逾越了完全贞洁的法则，共有的惩罚自不能免。”⑥这件事目前仍是争执不休。

仁慈的伯爵斐迪南·冯·瓦尔德斯坦 (Ferdinand von Waldstein, 1762—1823年) 是音乐家, 也是选侯的密友。瓦尔德斯坦是贝多芬家庭的一大助力, 当他得知贝多芬的穷困时, 不时接济金钱, 却伪装选侯所赠。过了不久, 贝多芬献给他一首钢琴奏鸣曲 (作品 53 号 C 大调), 上题伯爵的名字。

贝多芬目前需要比以往更多的援助, 因他那意志消沉的父亲, 整日耽于饮酒, 一度为公众唾弃被捕, 费尽了万难才营救出来。1789年, 贝多芬还未满 19 岁, 即成为法定的家长, 承担起照顾两位弟弟的责任。

11 月 20 日, 选侯下令免除约翰·范·贝多芬的职务, 他 200 莱克斯梭勒 (Reichsthaler) 的年薪之半, 照样付给他, 另一半付给他的长子。贝多芬在选侯的管弦乐团中仍续任首席钢琴手与次席风琴手, 以赚取微薄的收入。

1790 年, 胜利的浪潮席卷伦敦, 法兰士·约瑟·海登 (Franz Joseph Haydn) 在回维也纳的途中, 驻足波恩; 贝多芬呈给他近作清唱剧, 极得海登的赏识。也许选侯也风闻其事, 所以有人提议准贝多芬至维也纳数月, 师事海登, 此期间仍支领原来任选侯音乐家的薪金, 即蒙选侯的首肯。此恩赐很可能是冯·瓦尔德斯坦伯爵为贝多芬争取到的。瓦尔德斯坦在贝多芬的纪念册上留下了临别赠言: “亲爱的贝多芬, 为了实现你长久所珍视的愿望, 在旅游维也纳时, 守护莫扎特的精灵正哀哀的哭泣, 悲悼她挚爱的亡故。……你要不懈的努力, 务必要从海登的手中, 把莫扎特的精神接了过来。你的朋友瓦尔德斯坦敬上。”

贝多芬在 1792 年 11 月 1 日离开了波恩, 父亲、家庭与朋友。法国革命之师占领了波恩, 选侯流亡美因茨。终其生贝多芬未再见到波恩一面。

## 第二节 进步与悲剧

(公元 1792—1802 年)

贝多芬初抵维也纳，发现维也纳四处音乐家充斥，全为了赞助人、听众与出版商而勾心斗角。每位新人的到来，都引起他们的侧目。这位来自波恩的青年，并无任何的优点能消除他人的疑惧。贝多芬矮小结实、肤色深黑（恩顿·伊斯特黑奇〔Anton Esterházy〕称他为摩尔人〔Moor〕），脸有麻子，上下前齿交互重叠、鼻阔而扁、眼睛深陷具挑拨性、头颅像颗“子弹”，戴顶假发，姓氏前且冠以 van 字，贝多芬生就一付不讨人喜欢的样子；不论是公众或他竞争的对手，都不欣赏他的仪表。非常稀罕的，贝多芬在此地连位知己朋友都没有。

不久，贝多芬父亲过世的消息传来（1792 年 12 月 8 日），这样一来，贝多芬平分父亲微薄的年金就发生了问题，他请求选侯继续此项年金，选侯却以加发双倍的年金以为答复；又告诉贝多芬说：“为了他两位弟弟的学业，他另外可获得 3 升的谷物……。”（其时卡尔和约翰已移居维也纳）。<sup>⑨</sup>贝多芬感激之余，即作了些决定。1793 年 5 月 22 日，贝多芬在朋友的纪念册上，引用席勒（Schiller）的戏剧“唐·卡洛斯”（Don Carlos）中的话：“我并不邪恶——我的错误只是血气方刚——依然年轻是我的罪恶。……即使狂野不驯的感情可能导使我心入歧途，但我的心仍是善良的”。贝多芬决心“尽可能的行善，热爱自由甚于其他，纵使在帝王面前，也不否认真理。”<sup>⑩</sup>

贝多芬尽量克制花费至最低的限度，就以 1792 年 12 月份来

说：房租 14 弗罗林（合美金 35 元）、钢琴租金 6 弗罗林，“每餐 12 克莱泽（Kreuzer）”（合美金 6 分）、“三餐带酒需 6.21 弗罗林”（约值美金 16.25），在另一备忘录上记载贝多芬不时付与海登 2 个格罗宣（Groschen）（美金几分）；显然地，海登授课仅要求极少的报酬。有时学生谦恭的接受指正，但当课程继续下去时，海登越来越无法接受离经叛道的贝多芬——全不按正统的法则作曲。1793 年末，贝多芬离开了年事已高的教师，每周 3 次到约翰·乔·阿尔布雷希特（Johann Georg Albrechts-berger）那儿学对位法（阿尔布雷希特贝格尔为人师的声望高过作曲家的名气）；同时贝多芬每周也 3 次向伊葛涅·舒本柴（Ignaz Schuppanzigh）学拉小提琴。1795 年里，贝多芬觉得要布雷史柏格已无法再教他什么，即申请入维也纳歌剧院指挥萨列里的门下，学习声乐作曲。萨列里对贫寒学生向不收费，贝多芬因而免费受业。这 4 位教师与贝多芬格格不入，认为贝多芬是位极难教的弟子，经常有泉涌不绝的观念，痛恨他所学拘泥形式的音乐理论。我们能想像得到，当“音乐之父海登（Papa Haydn）”听到贝多芬乐曲所呈现出不规则与嘹亮的声音后，不寒而栗的样子。

虽然，或许由于贝多芬不从流俗，到了 1794 年，贝多芬的演奏已为他博得维也纳最令人感兴趣的钢琴家之名声。其时，钢琴已赢得与大键琴颀颀的战役；1768 年，约翰·克利斯倾·巴赫开始在英格兰独奏钢琴；莫扎特采用钢琴；海登在 1780 年也继踵前人；由于钢琴在强弱音之间，和断音、延音之间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适应性，克莱门蒂特地为钢琴作了协奏曲。贝多芬淋漓尽致的使用钢琴与他本身的能力（特别在他的即兴曲上），没有任何刊印的符号能阻碍贝多芬的风格。贝多芬不绝如缕的观念，变幻无常的狂想、林林总总的处理方式与困难，都是永无休止的。<sup>①</sup>

要当一位钢琴家，首先要得到音乐赞助人的青睐。在司维坦男爵家中的晚间音乐会中，节目结束后，主人挽留贝多芬，敦请

他另外演奏巴赫的遁走曲作为晚间的祝福。<sup>⑨</sup>卡尔·利希诺夫斯基（Prince Karl Lichnowsky）公爵——维也纳首屈一指的业余音乐家，非常器重贝多芬，因而固定邀请贝多芬参加他每周礼拜五的音乐会，偶尔款纳贝多芬留宿，贝多芬因无法适应公爵的进餐时刻，宁愿住进附近的旅馆。贝多芬有爵位的赞助人中最热心的是罗布可维兹公爵，他是优异的小提琴家，几乎花所有的收入在音乐和音乐家上，多年来偶有齟齬，仍一直帮助贝多芬。贝多芬要受同等看待的要求，也被愉快的采纳。帮助过贝多芬的贵族，他们的夫人欣赏贝多芬傲岸的独立，借书信的往返求教于贝多芬；在信上接受斥责，也允许这贫穷的单身汉在信上的调情。<sup>⑩</sup>她们的丈夫收受贝多芬的献乐，亦适当的回报他。

截至目前为止，贝多芬的名气仅止于钢琴师，声名已远播布拉格和柏林。1796年里，他以钢琴大师的身份访问此二地，访问期间他也作曲。1795年10月21日，贝多芬出版作品的第一号是《三首三重奏》；约翰·格雷默（Johann Cramer）在演奏过后宣布，“在我们失去了莫扎特以后，他就是来慰抚我们的人。”<sup>⑪</sup>为赞扬所鼓舞，贝多芬在笔记上写着：“鼓起勇气来！即使身体有缺陷，我的精神仍支配一切。……这一年须决心成为技巧高超的人，所有的事都需要完成。”<sup>⑫</sup>

1797年，从未谋面的拿破仑首先闯入贝多芬的生活。这位年轻的将军，把奥地利人自伦巴底（Lombardy）逐出，率领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后，即兵临维也纳城。奥国首府如惊弓之鸟，尽其所能以枪炮和赞美诗仓促作成防卫。海登于是写下奥国的国歌——“法兰西斯皇帝，我们善慈的法兰西斯皇帝万岁”；贝多芬为另一首战歌配乐——“我们是伟大的日耳曼人民”。这些士气高昂的歌曲，后来证明是抵得上若干军团的，可惜并未感动拿破仑，奥国终于获得屈辱性的和平。

一年后，贝纳多特（Bernadotte）将军至维也纳就任新法国大

使，在阳台上升起法国革命军的三色旗，使市民大受震撼。坦白表示过共和观念的贝多芬，公开宣布他对波拿巴（Bonaparte）的仰慕，人们经常可见到贝多芬为法国大使所款待。<sup>④</sup>总愿贝多芬作曲向拿破仑致敬的，显然是伯纳多特的主意。<sup>⑤</sup>

为了企求更亲密职务的任命，路德维希在1799年把第13号作品《悲怆奏鸣曲》（Grande Sonate Pathétique）献给利希诺夫斯基公爵，以答谢他所接受或冀望的恩赐。公爵给贝多芬600古尔登由他自由支配，“直到适当的任用你以前”以为答复。<sup>⑥</sup>这首奏鸣曲开端是简单的，犹自莫扎特一脉相承的谦逊而来，然后继续进行至艰深与复杂错综的部分，如与《钢琴奏鸣曲》（Hammerklavier Sonatas）或《热情奏鸣曲》（Appassionata）几乎挑衅性的庞杂与剧力比较起来，它的后面部分似乎也是朴实无华的。1800年的《第一交响曲》和1801年的升C小调《月光奏鸣曲》（Moonlight Sonata）更为容易；对弹奏者的眼手言，应可游刃有余。这首著名的《月光奏鸣曲》曲名，并非贝多芬所取，贝多芬称之为《幻想奏鸣曲》（Sonata quasi Fantasia）。他并无意使这首曲成为一首情歌，事实上，这首曲是献给女伯爵茱莉亚·圭恰尔（Giulia Guicciardi）的；她是贝多芬幻想曲中可望而不可及的女神，但是幻想曲却为另一场合所作，与女神风马牛不相及。<sup>⑦</sup>

音乐史上，最奇特与引人注目的文件之一是在1802年所发见，此文件即秘密的《海灵根斯塔特遗书》（Heiligenstadt Testament）——生前并无人知，在贝多芬死后才在文件中找到——唯有透过与贝多芬特性的率直对照，才可理解。贝多芬年轻时拥有许多使人愉悦的特质——心境愉快，富幽默感，喜爱研究，乐于助人。很多贝多芬的波恩朋友，诸如：老师克里斯倾·哥特罗·尼夫（Christian Gottlob Neefe），学生伊里诺·范·布罗伊宁，资助人瓦尔德斯坦伯爵，即使在贝多芬对生命越来越感到悲痛时，热爱他之情依然未减。然而在维也纳，贝多芬疏远了一个又一个

的朋友，几乎到完全孤独的地步；但当他们一听到贝多芬垂死的消息，全回到他身边，各尽所能来减轻他的痛苦。

贝多芬早期的环境，使他烙上难以磨灭的创伤。他决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那艰苦而焦虑的贫困；或眼见他父亲自安于失败与酗酒时所感到的屈辱。经年累月的悲哀，使贝多芬因酒引起的健忘症更为严重。在维也纳，贝多芬的身材（5英尺5英寸）意味着睿智，但却无幸运的面貌；头发浓厚且蓬乱竖直。浓密的胡须长到凹陷的眼眶，有时在刮脸以前已长到半英寸长。1819年贝多芬叫道：“天啊！当一个人有像我这样不幸的脸孔时，那是多么痛苦的事！”<sup>⑧</sup>

身体上的缺陷，就可能是日后成就的激励，但在维也纳最初几年，缺陷使他心灰意冷，不注重服饰、身体、居室与举止。1801年4月22日，他写到：“我是不整洁的人，或许我拥有惟一天才的特质是我的东西并不总是排列得井然有序。”贝多芬的收入够请佣人，但时隔不久就和佣人争吵，所以很少佣人待得久。贝多芬对地位低的人唐突粗率，对高贵的人时亦逢迎，但常表示出骄傲甚至傲慢无礼的态度。在批评他的对手时不留情面，而回报的，自然是他们一致的厌恶。贝多芬对学生很严格，对有些学生授课分文不取。<sup>⑨</sup>

贝多芬是厌世者；认为每一个人根本上都是卑贱的，可是又天真的原谅那令人头痛的侄子卡尔；喜爱貌美的学生。贝多芬对大自然怀着一份无法对人类表达出的情感，他常抑郁寡欢，不管有没有酒，也常有一阵的欢乐。贝多芬时有刻薄的幽默感（如信函14、22、25、30号所示）<sup>⑩</sup>，遇有机会则语涉双关，也取些得罪朋友的绰号，要他开怀大笑比淡淡的微笑还容易。

在烦忧的岁月中，因生活痛苦，贝多芬试着从这世界隐退。在1801年6月29日的信中，贝多芬对年轻时的朋友法兰士·威格勒（Franz Wegeler）说：

“最近三年来，我的听力越来越弱，可能是由于我的腹部所引起，甚至在我离开波恩时，腹部即不适，在维也纳更是每况愈下，屡为腹泻所苦，而极度的缺乏活力，使我痛楚不堪。……这就是到去年秋天为止我的情况。有时我觉得沮丧。我必须承认，我过的是悲惨的生活。几乎有两年不涉足社交场合，正因我发觉我无法对人们说：我是聋子。如我的职业是另一种，我可能会正视我的缺陷，但对我现在的职业来说，它是可怕的灾难。只有上帝知道我的后果为何，我咒诅过我的造物主和我的存在。……请你不要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人，甚至对洛尔尚(Lorchen)即伊里诺·范·布罗伊宁，也不要透露。”

贝多芬在1802年有几个月在哥丁根(Göttingen)的小村庄海利格斯塔特(Heiligenstadt)度过，显然他希望自硫磺浴获益。贝多芬在附近的森林中漫步时，看见不远处有牧羊人吹着笛子，因贝多芬听不到笛音，而顿悟只有管弦乐这样大的乐音，才能让他听到。其时，除了演奏和作曲外，他也指挥。那牧羊人吹奏出贝多芬无法谛听的笛音，这件事所隐含的意义，使他大为绝望。贝多芬回房。在1802年10月6日写出了为人熟知的《海灵根斯塔特遗书》——一种精神的意志与生命的辩解。

虽然贝多芬冠上“给我的弟弟卡尔和——贝多芬”，他仍小心翼翼的把文件藏好以避免他人的耳目。以下节录文件重要的几行：

“啊！你们认为，且说我是恶毒、冥顽不灵，或是厌世的，这是多么大的误解，你们不知我表面上如此的秘密原因。孩提时代始，我的心智即近于温柔良善的情感，甚至热切的想完成伟大的功业，但是6年来，我是无望



了，为冷酷的医生所激怒，……最后不得不正视宿疾的进展。……生来具有热情活泼的性情，甚至对社会的变迁敏感。很早我就强迫孤立自己，在孤独中生活，有时我设法忘掉这些事情，但失聪的经验使我伤心欲绝。我不能告诉别人说话大声点，或请他们大声喊叫，因我是聋子。我如何能承认，在我身上应比别人更完美的感官，竟然有缺陷。我无法说出，因此，当我应和你们兴高采烈的周旋时，你们反而看到我迟疑却步。原谅我！当别人站在我身边，倾听远处的长笛音时，我却一无所闻，那真是莫大的耻辱！这件事带我入绝望的边缘，此外我想结束我的生命——支持我的只有艺术。啊！离开尘世似乎不可能，除非我已谱出所有我感觉出的乐曲时。上帝！你透视我内在灵魂，你应知道人类之爱与行善之念，是在我心深处。有朝一日，你们读到我所写的，你们知道错怪我了。……我的弟弟卡尔和——，当我死时如施米德医生 (Dr. Schmid) 仍在人世，以我的名义陈述我的病情，且附上此文件和病历，如果可能的话，这世界在我死后，会体谅我的苦处。同时，我宣布你们两人是我所值无几的财产继承人。我但愿你们生活更好，没有我所具有的忧虑。推荐德行给你们的孩子，只有德行而非金钱，才可获致幸福。这是我自身的经验，亦只有德行在我悲哀时支撑我，我并未以自杀中止我的生命，除了艺术外，亦应归功于德行。永别了！要彼此相亲相爱，在我加速朝向死亡前进时，我很高兴。”

在边缘空白处，贝多芬写着：“在我死后，才可阅读与执行”。<sup>②</sup>

它不是自杀的便条，是揉合了无望与果决。贝多芬接受并超

越他的艰苦，除了他自己，贝多芬带给世人所有在他自身内寂然无声的音乐。就在此时——1802年12月在海利格斯塔特，贝多芬作出D大调第二交响曲，曲中全无怨尤哀伤的音符。在他内心独白后一年，作出第三交响曲《英雄》（The Eroica）而进入他第二个最具创造性的时期。

### 第三节 英雄的岁月

（公元1803—1809年）

博学的音乐学家们划分贝多芬的创作生涯为三时期：1792—1802年，1803—1816年，1817—1824年。此种分野，很值得怀疑。在第一时期，贝多芬的作品暂时有莫扎特和海顿简单而静穆的风格；第二时期，贝多芬对演奏者在拍子、灵巧和力度上更为苛求。他探究轻柔与剧烈气氛的对比，纵情于变奏的创作与即兴的技巧上，这些均循着起首与展开的法则。贝多芬更易奏鸣曲和交响曲的性别；把原来女性化的纤美伤感，转变为男性的刚强果决。贝多芬仿佛要表现这种转变，把小步舞曲置于第三乐章上，伴着诙谐曲欢乐跳跃的音符，以嘲弄命运。贝多芬发现音乐能抚慰所遭遇的不幸；他孜孜不倦于音乐的创作，使他肉体的死亡，只是永恒生命偶然的插曲而已。“当我演奏和作曲时，我的痛苦……很少能妨碍我。”<sup>④</sup>贝多芬不再能以耳朵听到自己的曲调，但以音乐家不可思议的能力，把想像中的乐音转变为点与线的墨迹，而自刊印的曲谱上，用眼睛悄无声息的听出了音乐。

几乎所有此时期的作品都是古典的，在后代的管弦乐的曲目上都可找到。在1803年，为小提琴家乔治·布里奇沃特（George Bridgetower）所作的47号作品《克罗伊特尔奏鸣曲》（Kreutzer

Sonata), 是题献给巴黎音乐学校小提琴教师鲁道夫·克罗伊特尔 (Rodolphe Kreutzer) 的。克罗伊策认为这首曲子与他的风格相左, 似乎从未公开演奏过。

贝多芬认为交响曲中, 在 1803—1804 年谱成的《英雄》,<sup>⑧</sup> 是他最得意的作品。这首曲原先是献给拿破仑, 世人大半都知道这故事。纵然贝多芬有贵族朋友, 且明智的献乐给他们, 但贝多芬终其生, 依然是坚定不移的拥护共和政体。他对波拿巴在 1799—1800 年僭取法国政权与立宪, 大为喝采, 认为责任政治指日可待。然而在 1802 年, 拿破仑与教会签了协定, 此时贝多芬已萌悔意, 他写着: “每一件事又回复到昔日的轨迹。”<sup>⑨</sup> 至于对拿破仑的献乐, 让目击此事的斐迪南·里兹来说这故事:

“在作这首交响曲时, 贝多芬心中只有拿破仑; 当时拿破仑是第一执政, 极为贝多芬所推崇, 喻他为罗马最伟大的执政官。我和几位贝多芬的知友, 看到桌上《英雄》乐谱的手稿, 在扉页的最上方有波拿巴 (Buonaparte) 的字样, 最下方写着鲁伊基·范·贝多芬 (Luigi van Beethoven), 此外别无文字。……我是第一个带给他拿破仑称帝的消息, 结果贝多芬勃然大怒叫道: “这么说来, 他也跟一般人没有两样, 现在他必会蹂躏着所有的人权以满足野心, 他将凌驾其他人而成为暴君。” 贝多芬走向桌子, 拿着乐谱扉页的上半, 一撕两半丢到地上。首页改写过, 交响曲更名为《英雄交响曲》(Sinfonia eroica)。<sup>⑩</sup>

当这首交响曲出版时, 名称是《英雄交响曲, 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sup>⑪</sup>

1805 年 4 月 7 日在维也纳剧院 (Theater-ander-Wien) 首次公

演此曲，不顾听觉的缺陷，贝多芬亲自指挥演奏。贝多芬指挥的风格与他的性格相契合——激动、苛求、“夸张”。在最弱音的时候，身子整个伏了下来，为桌子所遮掩；当乐音逐渐增强时，缓缓起身，不停的打着拍子，直到最强音的时候跳了起来，好像希望漂浮在云端。”<sup>⑧</sup>这首交响曲被抨击为“奇特激烈的转调，……可厌的开始”与过于冗长。批评家建议贝多芬回复到早期简朴的风格；<sup>⑨</sup>贝多芬畏缩退避，继而愤愤不平，企图更正此种说法。

贝多芬向命运另下赌注，他试图染指歌剧。1805年11月20日，贝多芬指挥公演了《莉儿诺》(Le-onore)的首度公演，但拿破仑军队已在11月13日攻克维也纳，法兰西斯皇帝和朝中显贵，仓皇遁走，人民也无闲情逸致来欣赏歌剧。公演时虽在寥寥落落的观众中，传来法国军官疏落的掌声，还是失败了。有人告诉贝多芬，歌剧太冗长，编排又笨拙，贝多芬修正删剪后，再度于1806年3月29日推出，再次失利。8年后，维也纳国会议员汇集此城，歌剧更名为《费黛里奥》(Fidelio)作第三度的尝试，结果仅获有限的成功。贝多芬所作的乐曲，是适合于比声乐还有更大弹性或音域的乐器，然而歌手急于打破新的樊篱，却唱不出高昂的乐节，最后他们群起反对贝多芬。这出歌剧偶尔在今日上演，舞台的两侧书有作曲者的名字。贝多芬对这句歌剧所作的修正，如今已成为绝响了。

从艰苦而又未获得报酬的经验中，贝多芬作出一首又一首的杰作。1805年里，贝多芬作出作品五十八号G大调第四号钢琴协奏曲，大为音乐鉴赏家所眷爱，仅次于第五号协奏曲。他以作品五十七号F小调奏鸣曲庆祝1806年，其后此曲命名为“热情奏鸣曲”，另外增加三首四重奏（作品五十九号）题献给驻维也纳的苏俄大使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伯爵(Count Andreas Razumovsky)。1807年3月，贝多芬的朋友或许为安慰他歌剧的失利，为他举办慈善音乐会。音乐会中他指挥一号、二号、三号交

响曲和近作作品六十号降B大调第四号交响曲。我们不能得知听众如何能忍受一次聆听这么多的交响曲。

1806年，米可罗·尼可劳斯·艾什泰哈齐公爵委托贝多芬为他夫人受洗日作首弥撒曲。贝多芬在1807年9月13日到伊斯特黑奇在匈牙利艾森斯泰特的别墅，弹奏作品八十六号C大调弥撒曲。曲终时，公爵问他：“我亲爱的贝多芬，这回你又作出了什么？”贝多芬在解释这问题时，明显的表示出不满的样子，而在邀请期届之前，离开了别墅。

贝多芬有两首目前是举世皆知的交响曲：C小调第五号交响曲和F大调第六或“田园交响曲”，因而使1808年这一年声名大噪。几年来，似乎这两首曲的创作同时进行，但气氛的经营却大异其趣；第五号交响曲是沉思默认，而第六号交响曲却是欢愉喜悦的。这两首交响曲在1808年12月22日适时地在一起首次公演。经常重复的演奏，即使对资深的音乐爱好者而言，也会使吸引力大为减少，我们不再为“命运敲打着门”或鸟鸣于林而感动。也许我们喜悦的凋逝，意味着音乐教育的缺乏，致无法欣赏音乐的雅趣，诸如：主题对比和展开的逻辑法则；对位法的谐和一致；相异乐器演奏时的针锋相对；管乐器和弦乐器的相互呼应；乐章的气氛经营；全曲的方向和结构等等，都无法领略。人类的心智可以不同的方式去塑造——有的以感情，有的以理念。就黑格尔(Hegel)言，要了解贝多芬就如同贝多芬(或任何人)要了解黑格尔一样的不易。

1808—1809年，贝多芬谱出作品七十三号降E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亦即为人熟知的“皇帝”(Emperor)协奏曲。在所有作品中，这首是最动人与最华美不朽的，令人百听不厌。曲中的活泼灿烂、洋溢欢乐的创作，永无休止的感觉与喜悦的泉源，在使我们有种难以言宣的感动。在这协奏曲中，一个人自明显的灾祸中，胜利的站起来，写出较《第九交响曲》嘹亮的合唱，有更具

信服力的欢乐颂。

或许“皇帝协奏曲”和“田园交响曲”的欢乐气息，反映贝多芬日渐好转的境遇。1804年鲁道夫大公聘他为钢琴教师，教授法兰西斯皇帝的幼子，两人的友谊于焉开始。鲁道夫经常协助这位越来越谨慎的共和主义者。1808年，威斯特伐里亚（Westphalia）国杰罗姆·波拿巴（Jérôme Bonaparte）曲意逢迎贝多芬，请他担任卡塞尔（Cassel）皇家唱诗班和管弦乐队的指挥；贝多芬同意年俸600金币就任斯职。明显的，贝多芬对他日益失聪的耳朵仍寄予厚望。朋友听到贝多芬和卡塞尔的磋商，提出抗议，认为不忠于维也纳。贝多芬回答说，他在维也纳辛劳了16年，还得不到一个有保障的职位。1809年2月26日，大公送给贝多芬正式的协议，载明贝多芬依然留在维也纳，保证年薪有4000弗罗林；其中鲁道夫付1500，罗布可维兹公爵付700，金斯基伯爵付1800，除此之外，贝多芬可保有其他所赚来的钱。贝多芬接受这条件，留在维也纳。在1809这年中，“音乐之父”海登辞世，贝多芬因而承继了海登的冠冕。

#### 第四节 情 人

贝多芬在经济略有基础后，又恢复了对妻子的追寻。贝多芬在性的方面很热情，也许他有不同的慰藉途径。<sup>⑥</sup>很久以来他就觉得需要位终生伴侣，根据贝多芬的朋友威格勒的说法，他在波恩“总是在恋爱之中”。1801年，贝多芬向威格勒提起“一位可人的女孩，她爱我，我也爱她。”这位女孩通常认为是指贝多芬17岁的学生茱莉亚·圭恰尔女伯爵，可是她嫁给了加伦贝格（Gallen-

berg)伯爵。1805年,贝多芬满怀希望的追求孀居的约瑟芬·范·戴姆(Josephine von Deym)女伯爵,贝多芬寄给她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此信中我郑重的允诺,短时间内,我将站在你面前,对我自己和你都是值得的。只有你,才能使这事有价值——我指的是,借着你的爱建立我的幸福。……哦!挚爱的约瑟芬!我对其他女孩不感兴趣,只有你,你的一切和你个人的特质——约束了我所有的感觉——所有我情绪的力量——对你……你使我希望,你的心永远为我跳动——我的心仅能——停止——为你跳动——当——它不再跳动时。”<sup>⑩</sup>

显然,这位夫人别有怀抱:两年后贝多芬请求见她一面,却未获得回音。

1807年3月,贝多芬对玛利·比葛夫人(Mme. Marie Bigot)大献殷勤,结果她的丈夫提出抗议。贝多芬写封致歉函,信上的称呼为“亲爱的玛利,亲爱的比葛”,并说道:“我主要的原则之一,是决不与他人的妻子,牵连着除了友谊以外的关系。”<sup>⑪</sup>

1809年3月14日,贝多芬可能在弗赖堡(Freiburg)写信给格列倾斯坦男爵(Baron von Gleichenstein)说:

“现在你可助我找位妻子,确实你可能在夫——找到位漂亮的女子,也许她有时对我的和声发出了叹息。……如你真的找到,请预先通知我——但她必须是迷人的,因我不能爱不美的女孩,否则我宁愿爱我自己。”<sup>⑫</sup>

这封信好像是贝多芬所开的玩笑之一。

贝多芬和特雷莎·马尔法蒂(Therese Malfatti)的恋情是更为正经的，她是著名医生的女儿，也是贝多芬的学生。1810年5月8日，贝多芬写信给特雷莎，就内容看来，俨然是她的心上人。5月2日贝多芬十万火急地通知在科不伦茨的威格勒，到波恩找出并送来贝多芬的洗礼证书，因“我听说我实际上比现在的年龄还大。”威格勒照办之后，贝多芬并未致谢。7月里，史蒂芬斯·范·布罗伊宁(Stephan Von Breuning)写信给威格勒说：“我相信他的婚姻计划是触了礁，所以虽然麻烦了你，但他也不热心的觉得有谢你的必要。”到贝多芬40岁，他认定生在1772年，而受洗证书却载他的出生年为1770年。

在贝多芬过世后，有3封信在上锁的抽屉发现，这些情书缠绵热情，在历史上极负盛名。3封信都没寄出，信上未书收信人、年月、地址，到现在仍是秘密未解。首封信日期为“7月6日清晨”，谈到贝多芬兴奋的三日之游——从维也纳赶到匈牙利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会晤一位女孩，以下是一些片断：

“我的安琪儿，我的一切，我自己。……除了因牺牲，因不苛求样样事物，我们的爱是否能天长地久的永远不渝——你不完全属于我而我不完全属于你；你能改变现状吗？天啊！看大自然的美景，以命中注定的事来安慰你自己——爱是苛求每样事物。……不久我们就要见面。……我心有千言万语要对你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意犹未尽，毕竟言语并非万能——快活起来——依然是我真正唯一的宝贝，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你忠实的鲁德维希

第二封信是短了一点，日期是“7月6号，礼拜一，黄昏”。结尾是“上帝！这样的接近，又这样的遥远！我们的爱是否真正是



天国的华夏，坚定一如苍穹”。第三封信：

虽然我躺在床上，我的思绪飞向了您，我不朽的挚爱，有时我高兴，有时悲凄，等待着想知道是否命运在垂听我们，只有完全和您在一起，我才能活得下去，否则我根本不想活——我决定离开您外出远游，直到我飞回您的臂弯说我真正是回到了家，我将思念您的灵魂升华至精神之域。……啊！上帝！为什么要和所爱的人离别，而我在维也纳维恩的生活是悲惨的——您的爱顿时使我成为最欢乐和最不欢乐的人，就我的年龄来说，我需要安谧静谧的生活。……平静下来，只有冷静考虑我们的存在，才能获得共同生活的目的——平静——爱我——今天——昨天——我含泪的渴望您——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啊！继续爱我——不要冤枉您所爱的L

永远是你的，永远是我的，永远互相属于彼此。<sup>⑥</sup>

她是谁？无人知悉。权威专家的说法也莫衷一是。主要症结是无法在哥西迪亚·葛伦伯和特雷莎·冯·布伦斯维希两位女伯爵中认出是那一位，舍此之外，其他人都不必考虑。显然这位夫人是已婚的，果真如此，贝多芬在追求她的时候，淡忘了他向比葛所承认的高尚原则。然而，这些信并未寄出，没有人受到伤害，唯一受益的，可能是音乐而已。

## 第五节 贝多芬和歌德

(公元 1809—1812 年)

1809 年里，奥地利和法兰西战端重启，5 月法国人炮轰维也纳城，宫中廷臣和贵族走避一空，贝多芬躲在地窖内避难。维也纳城终于臣服，战胜者向平民征年收入的什一之税，富人收税 1/3。贝多芬付了税后，在隔了一段安全的距离，向巡弋的高卢 (Gaul) 人挥动他的拳头叫道：“假如我是将军，了解战略如我在作曲方面所认识的对位法那样清楚，我一定会给你们好看的！”<sup>⑥</sup>

在 1809 年到 1815 年，贝多芬的精神相当的愉快，几年来，贝多芬多次走访富商亦为艺术和音乐的资助人法兰士·布伦塔诺 (Franz Brentano)，法兰士不时贷款给贝多芬，助他度过难关，法兰士的妻子安东妮 (Antonie) 卧病在床，此期间，不仅一次贝多芬静悄悄走进来，弹奏着钢琴，以他自己的语言和安东妮交谈，然后不留一言的离去。有一次也是这样的场合，贝多芬弹着琴，忽然有双手按在肩头上，使他大为诧异，转过头，贝多芬看到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孩 (其时正 25 岁)，双眸由于聆听他的演奏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或可说由于听到贝多芬自己谱曲而唱出歌德歌颂意大利著名的抒情诗《你熟悉此地否》(Kennst du das Land)。她是伊莉莎白——“白蒂娜”——布伦塔诺 (Elisabeth-“Bettina”-Brentano)，是法兰士和日耳曼成名作家克里蒙兹·布伦塔诺 (Clemens Brentano) 的妹妹，日后白蒂娜也写出许多风靡一时的著作，不着痕迹的将传记和杜撰之事揉合在一起，她是我们刚刚谈到的故事，和以后在法兰士家中的舞会所发生插曲的权威。白蒂

娜听到贝多芬与人交谈不仅深刻而且非常优雅，有条不紊，虽然有时可在信札上见到，但是一般均认为他不具有此种特质。1810年5月28日，她热心的写信给歌德提到贝多芬，白蒂娜认识歌德，不仅是她和歌德在法兰克福（Frankfurt）的家人相处和睦的关系，而且由于白蒂娜探视过在魏玛（Weimar）的歌德，以下是著名信中的节录：

“当我看到我向你提到的他，我浑然忘却了整个世界。……我现在希望告诉你的也就是贝多芬，他使我遗忘了世界和你。……他高视阔步的走在人类文化的前端，我们能够赶得上吗？我很怀疑，但假如他可活到……在他的灵魂中，这一切的事物充分发展时，……那么，他的确会以天国知识之钥，置于我们手上……”

他自己说过：“当我睡眠时，我必会叹息，因我所见的是和我的宗教信仰背道而驰，我蔑视这世界，这世界不知音乐是比酒和哲学有更高的启示；酒在我创作历程上可激发灵感，而我是罗马酒神（Bacchus），我为人类榨出荣耀的美酒，使他在精神上醺然欲醉……我不担心我的音乐——它能永垂不朽。凡能了解我音乐的人，必能免于他人所受的悲惨痛苦。……音乐是智识和感官生活的媒介，我愿和歌德谈论此事他能了解我吗？……而歌德提到我；……告诉他听听我的交响曲，他会说我所说的，关于音乐是步入更高智识世界的精神入口，是对的。”

白蒂娜告诉歌德贝多芬采飞扬的样子而补充道：“即刻复信让我高兴，这样贝多芬也知道你欣赏他。”歌德在1810年6月6日复信到：

“我心爱的孩子，你的来信很令我高兴，你煞费苦心的为我描绘出在成就与奋斗上一个伟大而完美的本性。……我不否认我了解你迫不及待的叙述，相反的，我宁愿承认我的本性，和你多方面描述中可认出的本性相契合；也许常人认为必有矛盾，但是一个人拥有如此优异的能力，平凡的门外汉应予尊敬。……代向贝多芬致意，告诉贝多芬，为了和他结识，我可牺牲一切。……你也可说动他一游卡尔斯巴德 (Karlsbad)，那里我几乎每年都去，而且又有最多的空闲聆听高见和向他讨教。”<sup>⑧</sup>

贝多芬不能到卡尔斯巴德，1812年7月里，这两位当代无出其右的艺术家，在特普里兹 (Teplitz) 不期而遇。歌德拜访贝多芬的寓所，在他写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他对贝多芬的初步印象：“我还没有见到比贝多芬更具活力、诚挚和自我中心的艺术家，我非常了解他对世界的态度是多么的不凡。”<sup>⑨</sup>在7月21和23日，歌德和贝多芬共度晚上时光，歌德写道：“贝多芬欣悦地演奏着。”在他们并肩散步中，有个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

整个宫廷的王公显贵，包括皇后和公爵朝他们走来，贝多芬说道：“挽住我的手臂，他们一定会让路给我们，并不是我们要让路给他们。”歌德不以为然，当时的情景使他甚为尴尬。他放开贝多芬的手，脱帽站在一旁，而贝多芬交叉着双臂，笔直的朝公爵走去，仅微微的侧了下帽子，而公爵站开让路给贝多芬，且都愉快的向贝多芬打招呼。走过去之后，贝多芬站住脚步伫候歌德。歌德在这群人经过时，向他们鞠躬。贝多芬说道：“我等候你是因为我敬重你，你值得尊敬，但你也未免太有礼了。”<sup>⑩</sup>

这是白蒂娜所写关于贝多芬的记载，她又说：“此后贝多芬跑到我们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我们没有看到关于歌德的记载，或许我们也应该对下面的故事存疑，因说法人言言殊，即歌德和贝多芬谈话当时，歌德因路人向他们致敬而中断交谈，感到不胜其烦，贝多芬告诉他说：“阁下不要为他们烦心，也许他们是向我致敬的。”<sup>90</sup>

这些故事听起来是暧昧可疑的，但这两位天才摘述他们的会面，使这两个故事亦有其可信之处。8月9日，贝多芬写信给莱比锡（Leipzig）的出版商布赖特科普夫和哈特尔（Breitkopf and Hartel）说道：“歌德心仪宫廷的气氛，甚于成为一位诗人。”9月2日，歌德写信给卡尔·策尔特（Karl Zelter）说道：

“我在特普里兹结识了贝多芬，他的才华令我惊异，不幸的是他具有狂放不羁的性格，他不完全错在误认这世界是可憎的，而在无法以他的态度使这世界更为舒适宜人。他是可怒的，也是可悯的。因他的听觉已离他而去，听觉影响他本质中音乐的部分，也许较社会的部分为小。他注重简洁的本性，可能因听觉的丧失而更为苛求。”<sup>91</sup>

## 第六节 最后的胜利

（公元1811—1824年）

不论贝多芬到什么地方，总是不断的作曲。1811年，他的第九十七号作品（降B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定稿。贝

多芬题献给鲁道夫大公，《大公三重奏》之名即本此。这首三重奏是贝多芬作品中最灿烂、清晰与无瑕的作品之一，很少人为它的丰富内容所困惑，结构形式几乎是庄严优美。贝多芬最后一次登台演奏是在1814年3月里，以钢琴弹出这首古典作品。因贝多芬耳聋日趋严重，所以手脚无法配合音乐的意念；最强的音节完全淹没弦乐器的声音，而最弱音节却又悄不可闻。

1812年5月里，拿破仑在俄境集结50万大军作困兽之斗时，贝多芬第7号交响曲正付梓。虽然这首曲很少为人演奏，现在似乎较第五和第六交响曲更受人欢迎。曲中有忧郁的挽歌，为逝去的伟迹与幻灭的希望低回不已；有对往日钟爱恋人的款款深情，也有为了解与和平的探索寻觅。它的送葬进行曲是对拿破仑在莫斯科的惨败无心谱成的《1812年序曲》。1813年12月8日首度公演日，是与拿破仑势力在日耳曼和西班牙瓦解的同时。这首交响曲热烈的被接受，有段时期令这位垂老悲观的贝多芬大为振奋。就他说来，继续完成的杰作，必有如济慈（Keats）在希腊的《陶瓮歌》所写的“无调的小曲”一般。

第八交响曲脱稿于1812年10月里。在1814年2月27日首度演奏，观众反映不很热烈；此时，作曲者已松弛下来，准备游乐一番；它与一国的命运，每日系在战争的成败上的心境不一致。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高高兴兴的演奏洋溢欢乐的谐谑曲，曲中一再出现的停顿，显然在奚落最新发明的节拍器。

贝多芬作品中最成功的，要算是《维多利亚战役》（Die Schlacht von Vittoria）；1813年12月8日在维也纳献演以庆祝威灵顿在西班牙大败法军的战役。奥国首府屡次为所向无敌的拿破仑所屈辱，这消息带给他们迟来的满足感。现在贝多芬首次在他选择的城市崭露头角，有人说这音乐几乎不应得到成功的；战争是恶（Die Schlacht war Schlecht）。此乐曲的乐旨和成功，使贝多芬名扬于1814年维也纳国会的显要。作曲者利用机会为自己举办

慈善音乐会，亦情有可原。皇宫因胜利而装饰的富丽堂皇，贝多芬得到许可使用宽敞的大厅，他以私人名义邀请国会贵族，有6000人参加，因而贝多芬得以藏匿实际的收入，以为他未来和侄子生活的保障。

1815年11月11日，贝多芬弟弟卡尔过世，留下微不足道的财产给路德维希，指定他与遗孀为8岁大男孩的共同监护人；从1815年到1826年，贝多芬不断的在信中或在法院里为了对卡尔行动、教育、灵魂的控制，而与守寡的特雷莎进行冷酷无情的竞争。

特雷莎曾陪嫁一些嫁妆和一栋房子，后来因自甘堕落与他人私通；她向丈夫承认，而卡尔也宽宥了她。但贝多芬永不原谅，认定她不适合再养育卡尔，我们亦不必深究这长期疲惫的争执与可鄙的细节。1826年，卡尔在母亲和叔叔之间左右为难，一度企图自杀未果。贝多芬是爱之深、责之切；但最后仍自认失败，卡尔恢复自由身后即从军去了，他自己自然能照顾得了自己。

就在1817这一年，贝多芬步入创作生涯的最后时期。长久以来，贝多芬在政治上是位革命家，现在他公开抨击音乐古典的形式，乐意接受音乐中浪漫主义的运动；并不赋予奏鸣曲与交响曲严谨的结构，使情绪和个人的表达，更为奔放自由，不受过时规则的约束。

这种狂放不羁的精神，在法国借着卢梭(Rousseau)和大革命表现出，日耳曼假手狂飚运动(Sturm und Drang)，在年轻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Werthers Leiden)、席勒的《强盗》(Die Rauber)、蒂克(Tieck)和诺瓦里斯(Novalis)的诗篇，士雷盖尔(Schlegels)的散文、费希特(Fichte)和谢林(Schelling)的哲学中俯拾皆是。这种精神初传至贝多芬，而在他自然的诉诸情绪和个人尊严的主张上，寻到沃土。在艺术上，如在政治上一样，古老的法则、习俗和约束全部崩溃，结果使个人毅然脱离旧则规、约

束、形式的羁绊，而可自由自在的表达出自己的感情和愿望。

贝多芬讥讽平民为驴子，贵族为骗子，他们的习俗和繁琐礼节，对于艺术的创作是毫不相干。贝多芬拒绝追随前人的窠臼，甚至如创造过悦耳动听的巴赫、汉德尔（Handel）、海登、莫扎特、格卢克所创的乐型。贝多芬自己革命，甚至作他自己的暴君，作出《欢乐颂》（Ode to Joy），而以这首曲子作为预期死亡时的独立宣告。

在贝多芬创作的第二和第三时期，三首钢琴奏鸣曲是过渡的桥梁，这三首奏鸣曲曲名本身即是叛逆。因为厌烦意大利人在语言和音乐所得上凌驾他国，不豫的日耳曼提议在音乐符号和乐器上使用德文以代替意大利文，如此一来，庄严优美的钢琴，应舍弃表示强弱音的钢琴字 Pianoforte，而易名为 Hammerklavier，因钢琴音调是由小琴捶敲击琴弦而发音的。贝多芬立即接受这观念，在 1817 年元月 13 日写信给乐器制造商西格猛·斯坦纳（Sigmund Steiner）说：“以 Hammerklavier 代替 Pianoforte——可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件事。”<sup>⑩</sup>

钢琴奏鸣曲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第二首，即作品一〇六号降 B 大调“钢琴与槌子奏鸣曲”（Grosse Sonata für das Hammerklavier），完成于 1818—1819 年。贝多芬告诉柴尼（Czerny）说这首是他自诩为钢琴曲作品中最得意的一首，贝多芬的说法也一再为后代的钢琴家所证实。曲中似乎对老年、疾病和孤疾表达出逆来顺受的悒郁气氛，实际上，这首钢琴奏鸣曲是艺术克服沮丧的一大胜利。

为了进一步却除消沉感，贝多芬写下了第九交响曲。在 1818 年贝多芬开始构思交响曲的同时，也着手作“弥撒曲”（Missa solemnis）。“弥撒曲”是为了鲁道夫大公升任奥尔米茨（Olmütz）总主教，在就职典礼上演奏的。“弥撒曲”在 1823 年首度完稿，但已是就职典礼后的第 3 年了。



贝多芬急于增加储蓄，以在迟暮之年得能生活无虞且能遗赠给侄子卡尔，就想出售《弥撒曲》在出版前预约的复本，他向欧洲各国王室申请，要求自每份复本上取费50金币。<sup>④</sup>应允之复信姗姗来迟，在1825年底，已有10国答允：俄罗斯、普鲁士、法兰西、萨克森、托斯卡纳的统治者，哥利辛（Golitsyn）和腊济维尔（Radziwill）亲王和法兰克福的卡西里亚（Caecilia）协会。

“弥撒曲”一般人认为它长时期的孕育和结束形式的奇特交换，实有其可取之处。偶尔对神祇的亵渎，中断贝多芬一向有的天主教信仰，在这首曲中却无迹可寻。礼拜仪式的每一时刻均以谐和的音乐诠释，垂死的人绝望的祈祷也都清晰可闻，乐谱手稿上的信条，系出自贝多芬的手笔，开端写着：“至高无上的上帝，上帝决不遗弃我。”<sup>⑤</sup>音乐强而有力，似与基督教徒谦逊的表现不合。乐曲的每一部分洋溢着虔诚专注之情与整曲中持续不变的庄严神圣感，使《弥撒曲》成为伟大而有瑕疵的灵魂，向渺不可知的上帝，作最终与适切的奉献。

1824年2月里，贝多芬完成了第九交响曲，曲中贝多芬力图表达出最终的哲学——愉悦的接受个人的命运——打破所有古典规则的束缚；这位急躁的音乐帝王以他自负的能力，牺牲了古老尊奉的定则，推崇新崛起的自由之神而为之狂喜不已。祭坛一座座的倾圮，主题犹如大厦的石柱应是耀眼触目，但除了深奥难以索解的观念外，主题全都隐没不现；乐句似是过度的突出与反复，偶尔有轻柔或静谧的时刻，也为突如其来的强音所掩盖，犹如对一个狂乱与冷淡的世界盛怒般。一位权威的学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曲中丰富的内涵显然令人困惑：“形式却是异乎寻常的简单，精致的细节似乎使人目眩神迷，其实它纯粹是精心构思直至合理的结尾，某些观念一如形式本身一样的简单和自然。”<sup>⑥</sup>

也许这位作曲家审慎地放弃了传统的努力，而赋予永久形式于人类美或隐晦不明的旨趣上。贝多芬坦承放弃这个念头，而邀

游嬉戏于无边的想像中，尽情利用艺术的富源，最后他又重拾回年轻时敏锐的挑战能力，而将席勒的《欢乐颂》融会入音乐中，此颂歌非仅止于欢乐而已，而且还是反对专制残暴的喜悦战争——

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君王对抗，  
即使以财富与鲜血为代价！  
除高贵的德行外，冠冕一文不值，  
说言欺世者全须处死！

贝多芬在创作巅峰的经典之作，现在已经完成，他渴望有机会呈献在世人面前，但是此时，罗西尼在1823年里，已使奥地利人如醉如痴，维出纳的听众却倾心于意大利的旋律，所以当地经理人没人敢孤注一掷的把两首困难的曲子如“弥撒曲”与“合唱交响曲”（Choral Symphony）择期公演。

柏林有位戏剧演出人愿意演出这两曲，贝多芬正要同意之时，由利希诺斯夫基家族为首的爱乐团体，听到维也纳最杰出的作曲家，不得不到敌国的首府公演最富盛名的近作时，大为恐慌，同意贝多芬可在卡特涅梭尔剧院（Karntnerthor）演奏。经过艰苦的交涉，音乐会终于在1824年5月7日于座无虚席的剧院演出，节目为：一首序曲“献堂乐”（The Consecration of the House），《弥撒曲》的四部分，压轴的是“第九交响曲”，在日耳曼合唱团洪亮的歌声中结束。合唱团歌手因唱不出所指定的高音符，而略去不唱。《弥撒曲》庄严肃穆的为观众所接受，而《交响曲》却反应热烈，全场欢声雷动，历久不衰。贝多芬本是背对听众站在舞台上，听不到喝采声，只有转过身来才看到听众的反应。<sup>⑥</sup>

## 第七节 剧 终

(公元 1824—1827 年)

贝多芬因音乐会收入的 2200 费罗林中，仅分到 420 费罗林，而和辛得勒 (Schindler) 发生口角，贝多芬指责他们欺骗他，结果辛得勒等人都离开了贝多芬。现在除了侄子偶尔探视贝多芬外，他是完全孤独了，就在这段岁月中，贝多芬写下了 16 首四重奏中的最后 5 首。

1823 年哥利辛公爵愿付给贝多芬所要求的报酬，只要题献给他 1 至 3 首四重奏。贝多芬同意每首代价为 50 德克 (Ducat)。作品一二七号、一三〇、一三二号三首和作品一三一号、一三五号为贝多芬最后的四重奏，由于不可思议的奇特气氛而享誉乐坛。贝多芬在作品一三〇号写下了较为简单的终曲，在 1826 年私下演奏，除了演奏者发觉第四乐章无法胜任外，公认是能取悦听众。被抵制的乐章即是目前的作品一三三号《伟大的遁走曲》(Grosse Fugue)，有位研究贝多芬的学者大胆的诠释为能表达出作曲者最后的哲学：生活与现实是由不可分割的对立物善与恶、喜悦与悲伤、健康与疾病、出生与死亡所组成，而智慧则是贯穿其中无法避免的生命本质。5 首四重奏中，最为人赞赏而贝多芬也视为最出色的是：作品一三一号升 C 小调四重奏，完成于 1826 年 8 月 7 日。有人说：“神秘的幻想，最完美地被表达。”<sup>⑥</sup> 近日再度聆赏听来似乎是女巫悠悲号哭泣，或是受到致命伤的动物所发出的哀怜呻吟声。作品一三五号是五首四重奏中的最后一首，在最后乐章中表达了一句箴言：必然是这样的吗？回答为：必然是这样的！

1826 年 12 月 2 日，贝多芬为剧烈咳嗽所苦，要求请医生来看

病。有两位曾为他治过病的医生拒绝前来，<sup>④</sup>结果请来了瓦鲁曲医生 (Dr. Wawruch) 诊断后证实为肺炎。贝多芬终于卧病在床，他的弟弟约翰来探望他，侄子卡尔则带着他的祝福投身军旅，元月 11 日瓦鲁曲医生与马法提医生 (Dr. Malfatti) 会诊，瓦鲁曲开了冷冻混合饮料的处方来帮助病人入睡。贝多芬很喜欢加点酒类在饮料中而且常“滥用处方”。<sup>⑤</sup>水肿和黄疸病慢慢恶化，尿液不能排出必须自体内导出，贝多芬已动了两次手术来导出体内液体而把自己比喻为“间歇泉”。

贝多芬决心不动用银行存款 (总数有 1 万费罗林)，那是他为卡尔所藏匿的。而对着急速增加的支出，贝多芬在 1827 年 3 月 6 日写信给伦敦的乔治·斯马特 (Sir George Smart) 爵士：

“我会有怎样的结果？在我恢复所失去的力量，和能再度笔耕前，我靠什么过活？……我求你尽可能的说动爱乐协会实现以前为我举办慈善音乐会的决议，我没有气力再多说一句话了。”<sup>⑥</sup>

爱乐协会赠给贝多芬 100 镑，作为音乐会收入的预付金。

3 月 16 日，几位医生都认为贝多芬不久于人世了。医生和约翰请贝多芬同意召来一位牧师。他说：“我渴望请来。”贝多芬已全然忘怀曾和上帝抗争过。他在 3 月 14 日信中，表示已准备接受“上帝以他非凡的智慧”所颁布的旨意。<sup>⑦</sup>3 月 23 日，贝多芬以驯服的态度接受了最后的圣礼仪式。他的弟弟后来报导这临终的人向他说：“我很感激这最终的圣事。”<sup>⑧</sup>就在仪式过后不久，贝多芬向辛得勒说道：“Comoedia finita est”，显然他所指的是生命本身而非宗教仪式，<sup>⑨</sup>这句成语是在古典的罗马剧场使用，以宣布戏剧的结束。

贝多芬受过 3 个月的痛苦后，终于在 1824 年 3 月 26 日辞世。

在他安息前片刻，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房间，紧接着雷声轰隆。贝多芬为雷声惊醒，举起右臂对着风暴挥动紧握的拳头。不久，他的痛苦止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临终的姿势所代表的含意。

验尸报告揭露了使贝多芬生活和脾气阴郁的内脏疾病：肝染病而萎缩，耳朵听道为脂肪堵塞，听觉神经退化。“他常埋怨在头部，消化器官，腹部与黄疸病所引起的痛楚，这些痛楚和许多信札所表现的深沉沮丧，都是由于肝与消化器官同时发炎引起”。<sup>④</sup>或许贝多芬热衷散步与户外空气，缓和了这些疾病，且给了他一生中最无痛楚的时辰。

贝多芬的丧礼有3万人参加，扶柩者中有钢琴家胡梅尔(Hummel)，小提琴家克罗伊特尔；舒伯特(Schubert)、柴尼、葛利里帕契耳等，杂在擎火炬的人中。墓碑上仅镌刻着贝多芬的名字和他诞生与安息的日期。

## 第五章 日耳曼与拿破仑

(公元 1786—1811 年)

### 第一节 神圣罗马帝国

(公元 1800 年)

普鲁士的爱国者，也是伟大历史家的特赖契凯 (Heinrich Von Treitschke) 认为：“自从路德的时代以来，日耳曼从没有像现在 (1800 年) 这样，在欧洲占据了如此一个显赫的地位，我们的国家拥有当代伟大的英雄和诗人。”我们可能将胜利的弗里德里希 (Frederick) 列于败灭的拿破仑之下，但是无疑地，歌德和席勒，从爱丁堡 (Edinburgh) 到罗马之间，在诗和散文上闪耀了无与伦比的光辉；而日耳曼的哲学家，从康德 (Kant) 经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到叔本华 (Schopenhauer)，慑服了从伦敦到圣彼得堡的欧洲人心灵。这是日耳曼的第二次文艺复兴。

假如国家的定义是一群人生活在共同的政府和法律之下的话，那么，日耳曼就像 16 世纪的意大利一样，并不是一个国家。1800 年的日耳曼是一个大约有 250 “国”的松散连结，每一“国”各有它自己的法律和税收，很多“国”都有它们自己的军队、币制、宗教、风俗和服装，有些“国”所讲的方言甚至连半个日

耳曼世界都无法了解。不过，他们所写的文字却是相同的，这使得它们的作家潜在地拥有 1/3 欧洲大陆的读者。

附带地，我们应该注意到，就如同文艺复兴中的意大利，这些个别国家相关的独立允许一种不定型的多样性，一种刺激性的竞争，一种人格、实验和思想的自由，而这些在一个大国的中央集权化的国都中，可能早已为这密结团块的重量所压碎。日耳曼的这些依然如此深具魅力、绝无仅有的古老城市，如果也和法国诸城对巴黎的关系一样的话，不是早就失去它们的生动性和个性了眩吗？而且假如日耳曼的所有这些地区组成了一个联合国家的话，那么这个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欧洲核心国，不早就无可抗衡地占领了全欧洲了吗？

只有在一点上，日耳曼诸国的独立才受到限制：他们全是“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一分子，神圣罗马帝国在公元 800 年始于教皇加冕为皇帝的查理曼（Charlemagne）——即为日耳曼人所熟知，就像他们自己的法兰克·查理大帝（Frankish Karl der Grosse）一样。公元 1800 年，这个帝国对日耳曼诸国有了个令人目眩的改变。最显著的是九个选举皇帝的“选帝国”（electoralstate）：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Bavaria）、萨克森、不伦瑞克——吕内堡（Brunswick-Lüneburg）、科隆、美因茨、汉诺威（Hanover）和特里尔（Trier 或 Treves）。其次是 27 个由天主教高级教士所统治的“圣国”（spiritual land），仿佛是千年前濒临灭亡时的西罗马帝国（Roman Empire of the West）中主教统治城市的复活：萨尔茨堡（Salzburg）（莫扎特烦躁之处）的总主教管辖区，明斯特（Münster）、列日（Liège）、维尔茨堡（Würzburg）、班贝格（Bamberg）、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帕德博恩（Paderborn）、奥格斯堡（Augsburg）、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福尔达（Fulda）、施派尔（Speyer）、雷根斯堡（Regensburg 或 Ratisbon）、康施坦茨（Constance）、沃尔姆斯（Worms）、

吕贝克 (Lübeck) ……的主教辖区。让王侯统治 27 国，包括黑森—卡塞尔 (Hesse-Cassel)、黑森—达姆施塔特 (Hesse-Darmstadt)、荷尔斯泰因 (Holstein)、符腾堡 (Württemberg) (包含斯图加特) [Stuttgart]、萨克森—魏玛 (Sachsen-〔Saxe-〕 Weimar) (与歌德)、萨克森—哥塔 (Sachsen-Gotha) (与其“启蒙暴君”) Ernest、不伦瑞克—伏分标特 [Braunschweig- (Brunswick-) Wolfenbüttel] 巴登 (Baden)、(包含巴登—巴登 [Baden-Baden]、卡尔斯鲁厄 [Karlsruhe]) ……在内。50 座城市是帝国直辖城市 (Reichstädte)，是自治的帝国自由城市：汉堡 (Hamburg)、科隆、(Cologne)、美因河之法兰克福 (Frankfurt-am-Main)、不来梅 (Bremen)、沃尔姆斯、施佩耶尔、纽伦堡 (Nuremberg 或 Nürnberg)、乌耳姆 (Ulm) ……。选帝侯、“帝国骑士” (Imperial Knight) 以及其他代表，在他们皇帝的召集下，从这些地区或日耳曼的其他区域来到雷根斯堡参加帝国议会。1792 年，选帝侯选了奥地利的法兰西斯二世 (Francis II) 来领导神圣罗马帝国，并且以一种奢华的仪式来加冕他，吸引了日耳曼各地的著名人士来到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他成了这个历时久远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

1800 年，这个曾经一度是感人且慈善的机构几乎完全失去了它的效能和用途。它是封建制度的遗迹；每一部分由一采邑领主所统治，而臣属于一中央权力；而中央权力由于分子国在人口、财富、世俗主义和军事力量上的成长而削弱。这个“神圣”王国的宗教统一因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和 1756—1763 年的七年战争而结束；1800 年，北日耳曼是新教，南日耳曼是天主教，而两日耳曼对法国的启蒙和莱辛 (Lessing) 时代的开化已失去部分的热诚。而当宗教衰微时，由于教条政治或社会的因素，逐渐兴起的民族主义必定团结一个社会以对抗其组成分子离心的利己主义。

由普鲁士所领导的新教北日耳曼和由奥地利所领导的天主教南日耳曼的分裂导致了可悲的结果：未能在 1805 年的奥斯特里茨



或1806年的耶拿（Jena）团结一致地抵抗拿破仑。在这些打击之前，奥地利对帝国议会早已不加理会，其他各国纷纷起而效之。<sup>②</sup>1788年，100位合格的王侯会员中仅有14位、50位合格的城主会员中仅有8位服从帝国议会的召唤；<sup>③</sup>决议成了不可能。在坎波佛米欧（Campoformio，1797年）和吕内维尔（Lunéville，1801年）的条约中，拿破仑强迫奥地利承认法国在莱茵河左（或两）岸的统治权；神圣罗马帝国的如此一个富饶地区包括施派尔、曼海姆（Mannheim）、沃尔姆斯、美因茨、宾根（Bingen）、特里尔、科布伦茨、亚琛（Aachen）、波恩和科隆在内——就转移于法国的统治之下。1801年的神圣罗马帝国，正如伏尔泰所言（亦为一般所接受）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没有一个重要分子国承认它的权威，或教皇的权威；在这些混乱中，某种新形式的纪律和协调必须被计划、接受、或强迫接受。拿破仑接受了这个挑战。

## 第二节 莱茵邦联

（公元1806年）

这条伟大的河流有时视为珍藏着建筑上瑰宝之奇伟景致和历史性记忆的一道画廊。而且也是经济上的一天然恩赐：灌溉丰饶的土壤，将每个城市与其他12个在文化上和产品贸易上相匹敌的城市连结起来。当商业和工业在河两岸生长时，封建制度在此就失去了它的效用和尖牙。但是在这流畅的繁荣中，四项问题恶化了：统治阶层中享乐主义盛行、官僚政治的腐败、分裂性的财富集中、以及军事崩溃而招致征服者。

开拓莱茵诸国新组织道路的是法国和奥地利两国：答应以新

的财产来补偿那些由于奥地利承认法国在莱茵河左岸统治权而丧失他们土地的日耳曼著名人士。这些失去产业者要求复产的喧闹使得法国和奥地利在拉施泰特 (Rastatt) 召开了集会 (1797 年 12 月 16 日)。有些不相干的王侯建议教会的主权应该“世俗化”——用易解的言辞来说，那就是从统治中的主教转移到失去产业的俗人手中。由于难以一致，集会乃提议将此事移至下次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会议中再作讨论。但却一直搁置着，直到拿破仑从埃及回来，在法国掌握政权，在马伦戈 (Marengo) 打败奥地利，和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订立条约，由此，在 1803 年 2 月 25 日，一个帝国会议的代表团发出了一项法令，一致同意命名为“帝国委员主要决断” (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草草地重改西日耳曼的地图和统治方式。几乎所有统治中的主教都失去了产业。普鲁士平静地接受教会统治的减少；奥地利虽曾哀伤，但却无能为力。

新的统治者了解到奥地利不可能、也不会愿意给他们军事保护；而且他们（多半为天主教徒）也不期望普鲁士新教徒的保护。于是一个接一个地，这些重划的国家转向了武力至上且正式天主教徒的拿破仑。1805 年 12 月 30 日，美因茨的总主教选侯达尔伯格 (Karl Theodor von Dalberg) 在慕尼黑 (Munich) 见了刚从奥斯特里茨打胜仗归来的拿破仑，邀请他接受这些重新组织过的公侯国的领导权。这位忙碌的国王花了半年的时间来作决定。他认为：以法国一个国家若擅取 1/3 日耳曼为保护国，将会再度尖锐英国和俄国的敌对，而且招致其余国家的仇视。1806 年 7 月 12 日，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拿骚 (Nassau)、贝格 (Berg) 和许多其他国家联合组成莱茵邦联 (Rheinbund)；8 月 1 日拿破仑同意将其纳为保护国。虽然主要组成分子国在内政上保留独立自主权，但在外交政策上，她们则同意服从他的判断，并且设置坚强的军事力量供其支配。<sup>④</sup>她们通知法兰西

斯二世 (Francis II) 和帝国议会，声明她们不再为其会员国。8月6日，弗兰茨二世正式宣布神圣罗马帝国解散，且放弃帝国的称呼，而保留奥地利皇帝；哈布斯堡皇族 (The Hapsburgs) 的光辉消失了，而一位新的查理曼——从法国来的统治者——就在西日耳曼滥施威权了。

邦联赋予重大的利益，然后要求相等的利润。它带来了《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 (包括封建税和教会十一税的废止在内)、宗教礼拜的自由、法律之前平等、法国地方行政长官的管理体制——集于中央但却有能、一个较诸从前更难贿赂、训练有素的司法部，这个结构的主要缺陷是在其仰仗外力，且只有在这外国的保护比其国内的牺牲更形重要时才能继续延持下去。1809年，当拿破仑要日耳曼子弟前去和奥地利战斗时，保护国显得不自然了；1812年，当他驱使成千上万的日耳曼子弟前去和苏联战斗，且要求庞大的军费支持时，保护国似乎是贪图小利而蒙受大害了；1813年当邦联日耳曼人被征召前去和普鲁士日耳曼人战斗时，邦联只不过是等待一次法国的重大逆转，然后将这整个脆弱的建筑物放在这位筋疲力尽的科西嘉岛人的头上罢了。

此时，拿破仑对法国的新边境安排了一个双层安全保障，这对他来说，是一项胜利。莱茵河的西区已并入法国，而东岸的富庶地区 (甚至延伸至易北河 [the Elbe]) 现在也与法国有联系，且依赖她。1813年，虽然在拿破仑的来比锡战役失败之后，邦联瓦解了，但它却留给了俾斯麦 (Bismarck) 一个纪念，而拿破仑的意大利统一也留给了马志尼、加里波第和加富尔 (Cavour) 一个启示。

### 第三节 拿破仑的日耳曼诸省

科隆的北方有两个地区，虽为莱茵邦联之分子，但却经由战争而完完全全属于拿破仑，而为他或他的亲戚所统治：贝格大公国是他的妹夫缪拉（Toachim Murat），而威斯特伐里亚（Westphalia）王国则是他的弟弟杰伦。当缪拉擢升到那不勒斯（1808年）时，拿破仑借由行政长官来统治全国。年复一年地，他介绍法国的管理法、税法和法律。已经萎缩的封建制度结束了，直到这个地区成为繁荣的采矿和冶金中心为止，工业和商业都有发展。

威斯特伐利里更是变化多端，领土更大。她的西端是克莱费斯（Cleves）公国（始为亨利第八〔Henry VIII〕第四任妻子封地）；由此向东伸展经过明斯特、希尔德斯海姆、不伦瑞克和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到马格德堡（Magdeburg）；经过帕得博恩到卡塞尔（首府），和穿过鲁尔河（Ruhr）、埃姆斯河（Ems）和利珀河（Lippe）到萨勒河（Saale）和易北河。

杰罗姆在1807年登上王位，当时年仅23岁，对享乐较诸权力更有兴趣。拿破仑希望责任能使他成熟和稳定，就寄给他一些写实但却人道的卓越之劝告书信，可是这被财政榨取所阻遏，杰罗姆发觉在收入上很难满足他哥哥的要求、以及他自己奢侈的宫廷和生活方式的享受。即使如此，在拿破仑征服的创造时期中，他在提倡改革上和拿破仑合作的非常有效。拿破仑的格言之一说道：“人们无权决定未来；只有法律决定国家的命运。”<sup>⑧</sup>因此他给了威斯特伐里亚一部法典，有效且相当诚实的管理、宗教自由、有能

的司法部、陪审团体制、法律前平等、相同的税制以及定期审查所有政府部门的体制。

一个国家的议会是由一有限的投票所选出；100位代表中的15位选自商人和制造业者之中，15位则自著名学者和其他知名人士之中选出。这个会议无权立法，但却能批评由国家议会（Council of State）对立法所提出的议案，而它的劝告经常是被接纳的。

基本的改革是经济上的。封建制度结束了。自由企业开放其所有领域给任何有雄心的人。道路和水道都加以保养和改善；内部通行税取消了；度量衡全王国统一。1809年3月24日的法令规定每一自治村需对其穷人负责，命令其供给他们工作和粮食。<sup>④</sup>于是纳税者抱怨了。

文明的威斯特伐里亚是日耳曼诸国中最进步的一国。早在福尔达的修道院图书馆以古典手稿来培育文艺复兴之前及其后，它就已经培养了理智的生活；希尔德斯海姆已有莱布尼兹（Leibniz），而 Wolfenbüttel 有莱辛。现在杰罗姆国王有他的图书馆员——亦即条顿族（Teuton）哲学的创始者——格林（Jacob Grimm）。1807年，在拿破仑的邀请下，缪勒（Johannes von Müller）——当代历史学泰斗放弃了他在柏林的皇家史料编纂官的职位，而来到威斯特伐里亚当国务卿以及国家教育的总监（1808—1809年）。威斯特伐里亚在当时有五所大学，经由杰罗姆重整为三：哥丁根（Göttingen）、哈勒（Halle）和马堡（Marburg）。其中之二声名响彻全欧；我们看到柯勒律治（Coleridge）直接从 Nether Stowey 到哥丁根，一年后，为日耳曼思想迷得晕陶陶地回到了英国。

与这些恩赐相对的，有项严重的罪恶：课税和征兵。拿破仑要求他的每一个属国给予他的政府、他的一天比一天更加奢侈的宫廷和他的军队的消费一项充实的奉献。他的论据非常简单：假如奥地利或其他反动的力量打败或者罢免他的话，那么他曾经带给他们的这些恩赐就会被夺去。基于同样的理由，在他保护下的

诸国有和法国共同分担：为军事训练提供健儿，以及必要的话，牺牲生命的义务。直到1813年，杰罗姆的臣民刚毅地忍受了下来；毕竟，木柄皮鞭（译注：俄国昔日刑具之一种）是未知的，而晋升是依据功绩，任何一位士兵都可能成为一位军官，甚至一位元帅。但是，在1813年，威斯特伐里亚送了8000名年轻子弟到西班牙，1.6万名到俄国以供拿破仑使用；而从西班牙生还的只有800名，从俄国生还的只有2000名。

威斯特伐里亚的东北方是汉诺威选侯的领地。1714年，它的选侯膺任为英国国王乔治一世（George I），而汉诺威就成了英国的一个属国。而当时的选侯是乔治三世（George III），他使它成为大不列颠辖下的一个爱国心的焦点；因此他让汉诺威的一些大地主统治这个省分，“那是为了日耳曼中最独占的贵族政治的利益。所有有价值的地位……全由贵族垄断，……他们小心地不让课税的重担落在自己的头上，”而让公民和农民奉献大部分。”封建制度复活了，而为几乎是一种家庭中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所缓和，当地的政府诚实无欺。<sup>⑤</sup>

1803年，由于英国重燃战火，拿破仑命令他的军队和行政官控制汉诺威，防备英军的可能登陆，并排拒所有英货的进口。法军遭遇了少许的抵抗。1807年，忙于处理更大事务的拿破仑，就将汉诺威附属于威斯特伐里亚，而置于杰罗姆国王负担颇重的策略之中。汉诺威人祈祷重回英国的怀抱。

和汉诺威相反地，汉撒同盟的城市（Hanseatic cities）——汉堡、不来梅、吕贝克——却是繁荣和骄傲的安息所。同盟本身很久以前便不存在了，但是在法国控制下的安特卫普（Antwerp）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衰落，使得他们多数的贸易转移到了汉堡。位于易北河河口的这个城市——1800年自夸其拥有11.5万人口——似乎是专为海上贸易和进口货物的迅速再装载而设计的。它由商人和资本家的首脑所统理，但由于某种程度的技巧和

公平，使得他们的垄断令人能够忍受。拿破仑渴望：将这些商业城市纳诸其统治之下，禁止它们卖买英国输入品，而且借着他们的贷款去帮助他负担军费。他派遣布列纳和其他人去阻止英货流入汉堡；贪婪的前国务卿因全然漠视而致富。终于，拿破仑将这大城市置于其统治之下（1801年），但却大为市民所恼，以致他们组织秘密社团去暗杀他，并且日复一日地图谋他的灭亡。

#### 第四节 萨克森

威斯特伐里亚的东方以及普鲁士的南方是一日耳曼国家，它的市民称它为 Sachsen，法国人称它为 Saxe，它曾经一度从波希米亚伸展到波罗的海，在大不列颠，它曾遗留下不同的 -sexes 的名字，最近遭到七年战争的破坏，但如今却是一个扩展到易北河的左右两岸，从路德的维腾贝格（Wittenberg）到德累斯顿（Dresden）——日耳曼的巴黎——的繁荣的选侯领地。

在选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三世（Frederick Augustus III，1768—1806年）和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一世（Frederick Augustus I，1806—1827年）的长时期统治下，加上如母亲般滋养它的易北河的恩赐，这个国家很快就恢复了它的繁荣。德累斯顿再次地浸入它的洛可可式建筑，它的宽广的大道和美观的桥梁，它的 Sistine Madonna（译注：意大利皮亚琴察的 San Sisto 教堂中拉斐尔〔Raphael〕画的圣母像。现在德累斯顿的皇家美术馆）以及 Meissen 陶器的欢乐中。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虽然不是位出色的政治家，却深思熟虑地治理它的王国，小心翼翼地使用他的税收，偿还国债以及在弗赖贝格（Freiberg）发展了一所著名的 Mines 学

校。德累斯顿的对手——莱比锡，重新开始它一年一度的书籍展览会，在这儿，从欧洲各处而来的出版者提供他们最新的出版物，而日耳曼昌盛的文学就引导了理智的行列。

“公正者”(The Just)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加入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控制法国革命的阵营，而分担了 1792 年在 Valmy 的挫折。他的堂弟路易十六的受刑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但是他很乐意地参加了 1795 年与法国的和谈。当拿破仑大权在握时，弗里德里希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而拿破仑则尊他为受他的人民爱戴的一位开明专制君主。然而，在 1806 年，当拿破仑的军队逼近耶拿时，弗里德里希就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地位：拿破仑警告他别让普鲁士军队通过萨克森；而普鲁士坚持，且入侵；结果选侯投降，而且让他少数的军队加入普军的阵容。胜利的拿破仑相当仁慈地和弗里德里希谈判：要求 2500 万法郎的赠款，命令他改称为萨克森王，让他当华沙 (Warsaw) 大公国的首脑，而强迫普鲁士割让斯普里河 (River Spree) 西岸的科特巴圈 (Circle of Cottbus) 给萨克森。北方和东方处于波兰之间，西方是威斯特伐亚利，南方则为萨克森，普鲁士于是被所有向拿破仑宣誓的国家所包围。普鲁士之必步日耳曼其他国家的后尘而臣属于拿破仑的法国，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 第五节 普鲁士：弗里德里希的遗产

(公元 1786—1787 年)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去世时，普鲁士王国是由勃兰登堡 (Brandenburg) 选侯领地，西里西亚 (Silesia) 和更远的波美拉尼



亚 (Pomerania) 公国, 东普鲁士诸省——包括哥尼斯德 (Konigsberg)、弗里德兰 (Friedland) 和梅梅尔 (Memel) ——和 1772 年从波兰得来的西普鲁士, 以及数个在西日耳曼的被包领土, 包括东弗里德兰、明斯特和埃森 (Essen) ——等所组成。在弗里德里希死后, 普鲁士又增加了: 波兰第二次瓜分 (1792 年) 中的托伦 (Thorn) 和但泽 (Danzig) 地区, 波兰第三次瓜分 (1795 年) 中的华沙和波兰心脏区, (1791) 年的安斯巴赫 (Ansbach)、拜罗伊特 (Bayreuth) 和 Mansfeld, 1797 年瑞士 (Switzerland) 的纽沙特 (Neuchatel) 等地。当拿破仑解除普鲁士这项兼并的任务时, 普鲁士似乎下定决心要吞并全部的北日耳曼了。

使这个普鲁士势力的扩张成为可能的人就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Frederick William I), 除了训练他的儿子和他的人民要沉默地忍受痛苦之外, 还留给了他基督教国家中最好的军队, 以及一个由普及教育、普遍课税和普遍兵役紧密组成的国家; 普鲁士成为适合一位好战国王的胃口一道佳肴。全欧、全日耳曼、全普鲁士当看到这位食人的君王, 他专制、高傲的贵族军官以及他身高 6 英尺的高大步兵时, 全都战栗了。“别长高,” 一位母亲警告他的儿子说, “否则你将征召入伍。”<sup>⑧</sup>

对于这样的军队和国家, 弗里德里希大帝加进一项为伏尔泰所尖锐化的个人天才和植根于他的遗传因子中的禁欲主义。他将普鲁士由一个只堪与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相匹敌的小王国变为一个足与日耳曼世界中的奥地利相抗衡的国家, 且为阻挡多产的斯拉夫族 (Slav) 再度抵达他们易北河旧有边界的持续压力的最强屏障。对内, 他建立了一个以正直闻名的司法部, 一个逐步取代贵族以为国家官吏的行政官组织。他开创言论、出版和礼拜的自由, 且在他的保护之下, “日耳曼的学校制度取代了教士教育极深的精神呆滞。”<sup>⑨</sup> 是在他时代的一个能哄骗伏尔泰、教导拿破仑的男人。“伟大的弗里德里希”, 1797 年拿破仑说道, “是一位我乐意在

任何事上，在战争上、在行政上商谈的英雄；我曾研习他军中生活的戒条，他日常的书信是我的哲学课程。”<sup>⑩</sup>

在他的成就中有若干的缺陷。在他的战役中，他抽不出时间来使普鲁士的封建制度到达莱茵河流域诸国所曾到达的更加人文的水准，而且他的战事使得他的人民处于一种贫穷和筋疲力竭的境况，在他死后普鲁士的衰微，这是该负部份责任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 (Frederick William I) (在位期间：1786—1797年)，和他无子的叔父趣味相反，他喜好女人和艺术更甚于统治和战事。他以一位情妇来补充他的第一任太太，她为他生了5个小孩；他和他的太太在1769年离婚，另和 Friederike Louise of Hesse-Darmstadt 结婚，她为他生了7个小孩；而在这次的婚姻期间，他说服了他的宫廷牧师让他和平民女子 Julie von Voss 缔结鸳盟 (1789年)，她两年后去世，然后是 Sophie Donhoff 女伯爵 (1790年)，她为他生了1个儿子。他抽时间去拉大提琴，欢迎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访问，创立一所音乐学院和一所国家剧院。他负担经费并颁布了包含许多宽大要素的新法典。作了一项宗教改革，他准许他最喜爱的革新理性论者<sup>⑪</sup> Johann von Wollner 发布一项宗教令，结束宗教信仰自由，且创立一种检查制度，它驱逐了许多柏林的作家。

他的对外政策采取防御措施。他不愿继续他前任者的攻击姿态；他藐视百年来的先例，企图和奥地利建立友谊以为朝向日耳曼和谐和安全的一主要步骤。他不喜欢法国大革命，满足于君主政体 (他的人民亦复如此)，他派遣部份军队参加了在 Valmy 所打的败仗 (1792年)；但是他很高兴带回那些生还者去为他在波兰的第二次瓜分中出力。1795年，他与法国签订《巴塞尔和约》(Peace of Basel)，它使他得以在第三次瓜分中自由地取得华沙。

姑不论他的学识，他使得他的国家在财富和势力上衰微。早在1789年，米拉波在长住柏林之后，预言写道：“普鲁士君主政

体的结构使得它不能应付任何的灾难。”<sup>⑧</sup>陆军的纪律日趋松弛且骄慢无礼；官僚政治已因腐化和阴谋而不振；国家的财政是一片混乱，且近乎破产。<sup>⑨</sup>“唯有战争尖锐的证明，才能暴露出这个一切活动因旧有声威的魔力而麻痹的隐蔽时代的内部腐败。”<sup>⑩</sup>

## 第六节 普鲁士的崩溃

(公元 1797—1807 年)

多情的国王去世了，而照顾这个病态国家的重担就落在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ederick William III) 的肩上，历经拿破仑、梅特涅，他将其继续维持至 1840 年。他意志薄弱，感情温和，因之他能延续如此长久的时间，众人皆感讶异。他有着一个好公民所应发展或从事的一切美德：合作、正义、仁慈、谦和，忠于婚姻和热爱和平。他解放在皇室所有地上的农奴。1793 年，他和露易丝 (Luise [Louise] of Mecklenburg-Strelitz) 结婚，她年方 17，美丽，具有热烈的爱国心，不久就成了全国的偶像；她依然是欢乐的主要泉源，但他却似乎将所有的灾难引入其中。

这个新世纪，带给了他一个接一个的危机。1803 年，法国攫取了汉诺威，它的中立性曾为普鲁士所保证；于是陆军的年轻军官们喧嚣着，即使不发生战争，也要与法国绝交；但弗里德里希·威廉保持他的和平。法军闭锁了威悉河 (The Weser) 和易北河的河口，伤害了普鲁士的贸易；但弗里德里希主张忍耐。露易丝皇后恳求战争；穿着印有她名字的军服，骑在马背上游行，在未曾败北的陆军中燃起火焰；路易士·斐迪南王子 (Prince Louis Ferdinand)，国王的表兄，渴望一个表现他勇气的机会；年迈的不

伦瑞克公爵提议领导普理士陆军；布吕歇尔将军（General Blücher）——滑铁卢的未来英雄，支持他；弗里德里希·威廉默默地对抗他们。1805年，奥地利向拿破仑挑战，寻求普鲁士的帮助；但是国王不愿。

但当法军在前往奥斯特里茨的途中，穿过普鲁士的拜罗伊特时，弗里德里希·威廉的耐心消失了。他邀请俄国的亚历山大在波茨坦（Potsdam）开会；在那儿，他们宣誓，就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坟墓处，并肩抵抗拿破仑，帮助奥地利。亚历山大的军队进军南方，不幸败北，正当普鲁士的军队动员时，战争结束了，亚历山大在逃回俄国的途中。拿破仑给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个宽大且折衷的和约（1805年12月15日；1806年2月15日）；普鲁士割让纽沙特、Cleves、安斯巴赫给法国，但以接收汉诺威作为报答。为了渴望这垂涎已久的奖品，弗里德里希·威廉同意所有普鲁士港口对英货的封锁，且和法国签订一攻守同盟。英国乃向普鲁士宣战。

向 Nemesis（译注：希腊神话中司复仇的女神）挑战，拿破仑开始组织莱茵邦联——它包围西日耳曼地区中若干普鲁士省分。得到拿破仑秘密地将汉诺威呈献给英国的消息，弗里德里希·威廉和苏联订立一秘密同盟（1806年7月）以防御法国。8月1日，拿破仑将整个西日耳曼纳入其保护之下。8月9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动员他的一部分军队；9月4日，他重新打开普鲁士港口对英货的贸易；9月13日，他命令他的军队进入萨克森。由于萨克森军队的加入，在不伦瑞克公爵的领导下，他的将官统率20万士兵。因认为这是两个条约和一个同盟的违反而狂怒的拿破仑，命令他业已驻扎在日耳曼的军队集中在同盟国的前方和侧翼。他本身则匆匆赶至前方，在同一天，即1806年10月14日，指挥耶拿和奥尔施泰特（Auerstedt）二地对普鲁士人和萨克森的歼灭战。

这个事迹，从法国方面来看，已如上述；从普鲁士方面来看，

即是她历史中最黑暗的悲剧之一。弗里德里希·威廉和他的政府、家属一齐逃入东普鲁士，并尝试从梅梅尔统治。拿破仑，则从柏林的国王宫室中对大陆发号施令，并宣布“封锁大陆”(Continental Blockade)。他的军队将普人赶出波兰，在弗里德兰打败俄人，而护送拿破仑至 Tilsit，在那儿他和亚历山大签订和约。于是，弗里德里希·威廉获悉铁定的条件，藉此，普鲁士的继续生存将被允许。必须割让易北河西岸的所有普鲁士土地给法国，并将三次瓜分中普鲁士的所有窃取地区归还波兰。必须接受并支付法国士兵在普鲁士的占领，直到完全付清 1.6 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为止。由于 1807 年 7 月 9 日签订的这个条约之故，普鲁士失去了她前所拥有土地的 49%，以及前所拥有的 775 万人口中的 525 万。在 1806—1808 年之间的这几年中，占领部队的费用和赔款的支付耗去了普鲁士的全部收入。<sup>⑨</sup>凝视着这个遭破坏的国家，部分的日耳曼人预言道：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再在日耳曼历史中重演。

## 第七节 普鲁士的再生

(公元 1807—1812 年)

在日耳曼人的特性中有一坚强的核心——由于几世纪来处于外族和好战民族之间的艰苦生存而变得坚固——它能骄傲地忍受失败，而伺机反击。当时就有像施泰因 (Stein) 和哈登堡 (Hardenberg)，沙恩霍斯特 (Scharnhorst) 和 (格奈森瑙 (Gneisenau) 诸人从无时无刻在思索如何拯救普鲁士。那些上百万在旧奴隶制度束缚下绝望的农奴——假如他们从屈辱的负荷中获得解放，且被欢迎加入在土地上或城市中的自由企业的话，他们对普鲁士的经

济可能会倾注些怎样的活力呢？而那些现在处于：从一中央的遥远国都中统治着这个国家、轻视商业的贵族控制下无精打采的城市——在自由的激励和试验下，他们在工业、商业和财政上，可能发展些怎样的鼓舞进取精神呢？革命的法国已经解放它的农奴，而且繁荣了，但是它仍将这些城市置于巴黎的政治保护下；为什么不先在暗中对征服者下手，而解放农奴和城市呢？

施泰因的海利希·腓利德利希·卡尔男爵（Freiherr Heinrich Karl vom und zum Stein）就这么想，施泰因是他家族的祖城，位于拉恩河（the River Lahn）上，此河在科布伦茨北方注入莱茵河。他不是位男爵，而是个自由人（译注：Freiherr 直译则为“自由人”之意），属于帝国骑士，宣誓保卫他的所有地和王国。他并非出生在施泰因（1757年10月26日），而是在附近的拿骚，父亲是美因茨选侯的御前大臣。16岁进入哥丁根大学的法律政治学院攻读。在那儿，他研读孟德斯鸠（Montesquieu），像他一样钦慕英国宪法，且决心成名。他在 Wetzlar 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庭以及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进行法律见习。

1780年，他进入普鲁士文职部门，担任威斯特伐里亚制造品和矿坑的管理工作。1796年，他已赢得沿莱茵河所有普鲁士省分的经济管理的一主要地位。他的工作能力和他建议的成功使得他在1804年奉召前往柏林当国家的贸易部长，在一个月之内，他受命援助财政部。当拿破仑已在耶拿粉碎普鲁士陆军的消息传到首都时，施泰因成功地将普鲁士财政部的文件转移到梅梅尔；而由于这些财源，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得以负担他流亡政府的经费。或许是战争的刺激和种种的不幸尖锐化了国王和他的部长的脾气；1807年1月3日，国王以施泰因“为一倔强、无礼、顽固和不服从的官吏，他恃才而骄，……依情绪和个人的憎恶和怨恨而行动”而罢免他。施泰因回到他在拿骚的家。6个月之后，在听到拿破仑推荐施泰因为一行政官时，国王把内政部长的职位赠给了

他。

这是一个最能让易怒的“自由人”推进适合于解放普鲁士人民改革精力的正确职位。1807年10月4日，他就任新职；而10月9日，他已为国王准备了数百万的农民以及数以百计的普鲁士自由主义者长久以来所祈求的宣言。第一条十分适度地宣布“我们诸国的每一位居民”有权去购买和拥有土地；但是这个权利到目前为止一直拒予农民。第二条允许任何一位普鲁士人从事任何合法的工业或商业；因此，就像在拿破仑统治下一样，事业开放给任何家系的有才能者，阶级障碍从经济上除去。第十条禁止任何更加重农奴制度；而第十二条则宣称“从圣马丁节（译注：11月11日）开始，在我们全部的国家中，终止一切农奴身份。……将只有自由人。”<sup>①</sup>许多贵族反抗此敕令，而在1811年之前，它一直未曾彻底地执行。

1808年整年当中，施泰因和他的自由主义同志辛苦地将普鲁士从俱有几乎是无限权力的封建男爵或退休的军官或税务长官的统治中解放。1808年11月19日，国王，也是位情愿的改革者，发布一项“市政法令”，据此，城市将由当地议会所选出的自己的官吏来统治；但是大城市不在此例，其市长，由国王指派议会所选出的三人中之一人担任。健全的地方政治生命于焉开始，终于成熟了日耳曼杰出卓越的市政管理。

在重建普鲁士的工作上，施泰因并不孤独。沙恩霍斯特（1755—1813年）、August Neithardt von Gneisenau 伯爵（1760—1813年）以及哈登堡亲王（1750—1822年）一块儿辛勤地重建普鲁士陆军，利用种种策略以逃避拿破仑的规限。这项工作的进展可由施泰因在1808年8月15日写给一普鲁士军官的信中看出，此信落入法军之手，且被刊登在9月8日的《导报》(Moniteur)上。其中的部分是这样说的：

“愤怒在日耳曼人心中日渐高涨；我们必须培养它，并感动人民。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和黑森、威斯特伐里亚联系，而且我们应为必定发生的事件做准备；我们应该寻求和有活力、友好的人们保持关系，因之，我们能使这样的人民和其他人接触。……西班牙诸事留下一鲜明印象；它们证明了我们早已应该怀疑之事。这些消息如果审慎地散布开来，将会有用，我们认为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将是决定欧洲命运的战争。”<sup>④</sup>

拿破仑，在即将为西班牙一主要战役而离去时，下令弗里德里希·威廉开革施泰因。国王，仍在梅梅尔，迟不听命，直到他被警告：法军将继续他们在普鲁士领土的占领直到他服从为止。1808年11月24日，施泰因再度被罢免；而在12月16日，拿破仑从马德里发布一道命令，将其放逐，没收他的所有财产，并下令只要他被发现在法军控制的任何地区，他将遭到逮捕。施泰因逃入波希米亚。

他对普鲁士的损失，因哈登堡的任命为国家大臣实际为首相——而获得补偿。他以前曾是政府的一员，重组过财政部，商议过1795年的和约，分担过1806年失败的责任，曾在拿破仑的坚持下被罢免过（1807年）。现在，他年60岁，当拿破仑温柔地全神贯注于他的新皇后时，哈登堡曾经说服国王首先召集一个贵族议会（1811年），然后（1812年）是具有谘询能力的国家代表议会，以为国王的针砭和激励，而将其移向君主立宪政体。作为一个法国“哲学”的崇拜者，哈登堡俗化教会财产，强调犹太人的公民平等（1812年3月11日），征收贵族的财产税和商人的利润税，结束同业公会妨碍的垄断，以及确立事业和贸易的自由。

普鲁士在1807—1812年之间的快速重建显示了日耳曼特性



中的一种丰富潜力。在敌对的法军眼下，在普鲁士最弱国王中之一的统理下；非贵族的施泰因和哈登堡着手重建一个被打败、占领和破产的国家，而在6年之中，将其提升为一强有力且值得自豪的国家，使其在1813年成为“解放战争”（War of Liberation）的当然领导者。每一阶层都努力地加入工作：贵族出来领导陆军，农民接受征召，商人献出他们大量的利润给国家，文人和学者向全日耳曼民族呼吁新闻、思想和礼拜的自由；1807年，在由法军管治警务的柏林，费希特发表了那些著名的《告日耳曼民族书》（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要求受训练的少数人引导普鲁士人民走向道德净化和国家更新。1808年6月，在哥尼斯德，某些大学教授组织了一个“道德和科学同盟”（Moral and Scientific Union），后来变成为著称的“道德同盟”，致力于普鲁士的解放。

其时，施泰因正徘徊在放逐、贫困以及无时无刻被捕或被杀的危殆当中。1812年5月，亚历山大一世邀请他加入圣彼德堡的帝国法院。他去了，在那儿，他和他的主人等待着拿破仑的到来。

## 第六章 日耳曼民族

(公元 1789—1812 年)

### 第一节 经济

1800 年的日耳曼人是一阶级意识的民族，接受阶级区分，将它当作是社会秩序与经济组织的制度；仅有极少数的人拥有非世袭的贵族头衔。“在日耳曼，”斯塔埃尔夫人记录道：“每一个人都保持他在社会中的阶层、身分，就好像那是他已确定的职位一样。”<sup>①</sup>在沿着莱茵河的地区以及大学毕业生中情况较好，但就大体而论，日耳曼是较诸法人更具耐力的民族。

法国大革命鼓舞了文学，但在工业上却影响轻微。日耳曼富于天然资源，但是封建制度的持续以及封建男爵的权力，使得中部和东部国家延缓了一种商业和制造业阶级的兴起，而此阶级若经由一自由和无阶级差别经济的刺激，将会以土壤中储藏丰富的煤和金属供给工业。贸易获助于富庶的诸河——莱茵河、威悉河、易北河、萨勒河、美因河、斯普累河、奥得河 (The Oder)；但是诸国的分裂使得道路短、少且坏，沿途还有强盗和封建通行税。贸易因同业公会的管理、高税以及地理上的各色各样的度量衡、币制和法律而受阻。

直到1807年，日耳曼的工业不得不遭到由最新机械所制造的英货的竞争；英国享有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中领先30年的利益，她禁止输出新工业技术或熟练的专技人员。<sup>②</sup>繁殖工业以供人们衣食与杀死人们的双面战神滋养了国家的经济；而1806年之后的“大陆封锁”，多多少少排拒英货，帮助了大陆工业的成长。采矿业和冶金术在西日耳曼，尤其是在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和埃森及其附近之处，发展了起来。1810年，在埃森，克虏伯（Friedrich Krupp, 1789—1826年）创始了金属制品的综合体，此举武装了百年的日耳曼。

尽管有这些人，但是企业家依然被贵族和国王认为是一潜在的奸商而遭受轻视，没有商人和制造业者被允许和贵族通婚，或购买一封建地产。金融業者——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犹太人或其他——虽被允许贷款于贵族或皇室，但当（1810年）他们建议：普鲁士仿照英国和法国以及设立一国家银行，以低利发行国家公债，因而此让一国家债务去帮助负担国家的经费时，国王和贵族一致认为：如此的一个程序将会置王国于银行家的掌握中。普鲁士拒绝由资本家的经纪人来控制国家，而宁可选择由一军事阶级和一普鲁士贵族政治来领导。

## 第二节 信仰者和怀疑者

普鲁士如同在三十年战争中一样，在宗教上依然分裂；弗里德里希大帝与奥地利、法国的多次战争为其延长的悲剧的重演。假如弗里德里希输了的话，新教徒可能已从普鲁士消失，就如同在1620年之后它从胡斯（Huss）的波希米亚消失一样。

在新教的北方，当新教牧师接管了天主教主教的财产时，他们就成了仰赖新教王侯的军事保护者，并承认他们是在他们领域中新教教会的领袖；因此，不可知论的弗里德里希就是普鲁士教会的领袖了。在天主教国家中——奥地利、波希米亚以及几乎所有的莱茵邦联——的主教，假如他们自身不是统治者的话，也需要同样的保护，因而陷入了政府权力的附属中；他们大多数不太注意教宗的公告，但是绝大多数却定期地在他们的布道上朗诵保护他们的政府当局法令；因此，在拿破仑保护下的日耳曼诸国的主教——不管是新教，或是天主教——在他们的布道上朗诵他的行政规则以及他的军事告示。<sup>④</sup>

此种教会的巨属产生了相异的——几乎是矛盾的——结果：虔信教派（Pietism）和理性主义。许多日耳曼家庭有一种较诸政策更强和较诸仪式更深的虔信传统；他们发觉在家庭祷告中较诸教士的雄辩或职业性的宗教信仰制度更富启示。他们越来越多地否定教会，而在秘密团体中，秘密而热诚地作祷告。甚至更热烈的是一群自豪的神秘论者，他们珍爱像 Jakob Bohme 等先知的圣传，主张或寻求：直接会晤上帝，体验业已解决人生中最深、最苦问题的启发。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忍受了数世纪宗教迫害的无言的英勇事迹，基督教联合兄弟派教徒（缪拉维亚派教徒）（Moravian Brotherhood）的不隐遁、不宣誓的修道士和修女，为天主教的波希米亚所逐，而散布在新教的日耳曼各处，深深地影响其宗教生活。斯塔埃尔夫人曾见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为他们婚前的守贞、财产的共享以及为他们每一个死去的人所选择的墓志铭：“他生于这样的一天，而在这样的一天，他回归他的祖国”<sup>④</sup>所感动。巴尔巴·尤利安内·冯·克吕德纳（1764—1824年）是斯塔埃尔夫人最喜爱的神秘论者，她献身于她们的宗派，她是如此深具魅力地宣道，以致普鲁士的露易丝皇后和俄国亚历山大沙皇——深受其影响，除了财产共享之外。

和神秘主义者正相反的是怀疑论者，他们已经吸入法国启蒙运动的气息。莱辛发掘且部分地出版了《匿名的残简》(Fragmente eines Ungenannten)一书(1774—1778年)而放任了日耳曼的开化。在此书中，Hermann Reimarus表示了他对《新约》四福音史实性的怀疑。当然，每一个时代都曾有过怀疑论者，但是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因此它的蔓延就被地狱之火和警察局所抑制。但是现在它已进入兄弟会会员和洛兹克鲁逊会会员(Rosicrucian)(译注：自称系17、18世纪流行的一秘密结社的会员，此秘密团体有各种秘传之知识与力量，并宣扬宗教之神秘教义)的分会、大学，甚至修道院里。1781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一书辩明了一种理性神学的困难，而在日耳曼的知识分子中引起骚动。在他之后30年当中，日耳曼哲学致力于摒拒或隐蔽康德怀疑的工作，而某些明敏的组织者如：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就获得了国际声誉。根据米拉波(在1786—1788年之间曾三度访问日耳曼)的记载，那时，几乎所有的普鲁士新教牧师都曾秘密地摆脱他们的正统信仰，进而认为耶稣是位宣称世界末日迫近的可爱神秘论者。1800年，一位草率的评论者叙说宗教在日耳曼已死，而“当一名基督徒已经不再是时尚了。”<sup>⑤</sup>Georg Lichtenberg(1742—1799年)预言道：“当所有对上帝的信仰就像对育婴室的精灵的信仰一样时，这一天将会来临。”<sup>⑥</sup>

诸如此类的记事都被情绪性地夸大了。宗教怀疑影响了少数的教授和一些二年级生，但是它几乎不曾感动日耳曼的群众。基督教的教条依然使人们的依赖感诉诸超感力，即使是知识分子也倾向于请求超自然的助力。新教的宗教集会以强力的赞美诗温暖了他们自己的心灵。天主教会依然给奇迹、神话、玄义、音乐和艺术提供一庇护所，为经年在哲学和性的风暴以及浅滩中作智力航行而精疲力竭的心灵提供一最终的港口；因此博学的学者如施

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多才的犹太人像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女儿,终于在圣母教堂(Mother Church)寻求温暖。信仰总是恢复,而怀疑依旧。

### 第三节 日耳曼的犹太人

信仰一定已经衰微,因为信仰自由成长了。当知识增长时,它溢出了教条所保存的无知栅栏。对一个受过教育的基督徒言,以一个18世纪前因政治因素而钉死于十字架的理由,而去憎恨一个现代的犹太人,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或许他曾在《圣马太福音》(Gospel of Saint Matthw)(21章第8节)中读过:一群为数众多的犹太人,当他们所挚爱的传道者在他死前的几天进入耶路撒冷(Jerusalem)时,是如何地以棕榈树叶铺满他所经过的道路。无论如何,奥地利的犹太人经由约瑟夫二世(Joseph I),莱茵河西部地区经由法国大革命或拿破仑,普鲁士则经由哈登堡解放。他们很高兴地走出犹太人居住区,成为有能力的工作者、忠诚的市民、热心的学者、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反闪族主义残存在未受教育者之间,但是在知识阶层之中,它失去了它的宗教气息,而必须以经济和智力的竞争,和以残留在挣扎的穷人当中的犹太习俗为生。

在歌德的法兰克福,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敌意特别强烈,而且持续更久,因为那儿支配的中产阶级感到犹太人在贸易和财政上竞争的活力。平静地生活在他们之间的是梅叶·阿姆歇·罗斯柴尔德德(Meyer Amschel Rothschild, 1743—1812年),他贷款予玩囊羞涩的王侯,如:黑森—卡塞尔的王子们,或作为英国代

理商之一，以资助被挑战的国王对抗拿破仑的方式而建立了史上最大的银行大厦。然而，拿破仑却在1810年由《拿破仑法典》保证坚持给予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完全的自由。<sup>⑦</sup>

马卡斯·赫兹（Marcus Herz, 1747—1803年）使得犹太的财政旺盛，成为科学和艺术的追求和赞助者的化身。他生在柏林，于1762年移居哥尼斯德，康德和其他的自由主义者曾劝当地的大学容纳犹太人。赫兹注册为一医学院的学生，但是他出席康德的课的次数几乎就和他出席医学的课一样地多，而他对哲学的强烈兴趣使得他成为康德最喜爱的学生。<sup>⑧</sup>医学院毕业后，他返回柏林，不久即不仅在医学而且在哲学的课上获致声名。他在医学上的演讲和示范吸引了一群卓越的听众，包括未来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他的生命因他和Henrietta de Lemos——她时代中最美的女人之一——的婚姻感到既高兴又悲哀。她使他的家成为堪称巴黎最好的沙龙。她热诚地款待其他的犹太美女，包括门德尔松的女儿杜洛丝亚·施莱格尔（Brendel——即后来的Dorothea——和Rachel Levin），外交官作家Varnhagen von Ense的未婚妻。犹太人和基督徒贵族群集在这三位美丽女神的周围，基督徒很高兴地发现她们并非徒俱外貌，而且兼有思想，更俱诱人的大胆。米拉波出席这些集会和马卡斯讨论政治，更常与Henrietta思考微妙错综的问题。她享受着基督徒贵族所奉献的赞赏，并与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发生“暧昧的关系”，然后是和哲学宣教师施莱尔马赫。其时，她鼓励杜洛丝亚——已和西蒙·维特（Simon Veit）结婚，并有两个小孩——离开她的丈夫和家，而与施莱格尔同居，起初当他的情妇，然后成为他妻子。

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这种自由混合产生了一种双层溶解的效果：它削弱了基督徒的信仰，因他们发现基督和他的十二使徒曾欲使他们的宗教成为一改革的犹太教，而忠于Temple（译注：犹

太人在古耶路撒冷所建立三庙宇中之第一座)和《摩西律法》(Mosaic Code);它削弱了犹太人的信仰,因他们知道忠于犹太教,在伙伴和地位的追求上,将会是个严重的障碍。在双方的阵营中,宗教信仰的衰微腐蚀了道德律法。

#### 第四节 道 德

律法建立在对一位善意和恐怖之神的信仰上,它援助每个谦下的哀诉,凝视每个人的行动和思想,不忘记任何事,并永不放弃判断、惩罚或宽恕的权利和威力,一位爱神和复仇之神,以它中世纪的方式,主宰着天堂和地狱。这个阴郁、或许是不可或缺的教条依然存于大众之中,而帮助了教士、普鲁士贵族、将军和家管理他们的信徒、农民、军队和家庭。周期性的战争、商业上的竞争以及家庭纪律的需要要求:青年服从和应用,女孩迷人的谦逊和家庭学艺,妻子耐心的奉献,丈夫和父亲严厉的控制能力等习性的形成。

一般的日耳曼人在根本上都是善良的,至少在酒店里;但是他们觉得在妻子、小孩、竞争者和佣人之前装出严肃的神情是明智的。他们工作认真,同时也如此要求在他们负责下的众人。他们尊崇传统为智慧的泉源以及权威的支柱;旧习俗使得他能以一种节省和舒适的思考的巧用来处理他们每天的工作和接触。他们视他的宗教为一种神圣的继承,而感激于它在养成他们孩子的礼仪、规律和平稳上的帮助。他们排斥混乱了法国的法国大革命和日耳曼青年的“狂飚运动”,而视之为对已成立的关系——此于家庭和国家的秩序和稳妥上为必需之物——之冒险的瓦解。他们虽



将其妻子和孩子置于从属地位，但在他们家常的方式中，他们可能是仁慈和情深的，而且他们毫无怨言地工作以照顾他们身心之所需。

无太多的抵抗，他们的妻子接受了这个地位，因为她们同意：在四周环绕着可能的敌军的一个不安全国度中的一个大家庭需求一只严厉和稳固的手。在家中，服从他们的丈夫和规律，她们被承认是指导的权威，而且几乎往往从她们的孩子处得到终生之爱的报酬。她们满足于当“孩子辩护的母亲”，<sup>⑧</sup>而在土壤的征服和种族的延续上鞠躬尽瘁。

但是尚有其他意见。1774年，Theodore von Hippel，先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8年，出版了《论婚姻》（On Marriage）一书，一位男性为女性的自由而辩护。他反对新娘服从的誓言；婚姻应该是一种合伙的关系，而不是从属。他要求女性的完全解放——不仅是选举，而且是可从政的资格；甚至首位；他指出当代的某些伟大女性统治者——瑞典的克里斯廷娜（Christina of Sweden）、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奥地利的玛丽亚·特雷莎。假如完全的解放不能于法律中制定，则“人权”（Right of Man）应该更诚实地称为“男人权”（Rights of Men）。<sup>⑨</sup>

日耳曼并没听从他，但是——在法国大革命和基本文学在日耳曼普及的刺激下——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突然出现了一群解放妇女，在人数上，只有我们这一代可比拟；在光辉上，唯有18世纪的法国可匹敌；然在恶行上，却无人能凌驾之。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运动，反应了中世纪的抒情诗人，理想化的女性不再是像戴密塔（Demeter）\* 的一位母亲，或是像玛利亚的少女，而是一拥有肉体美和活泼心智的令人醉狂的花束，带着些花边新闻而完成诱惑。我们已经指出，Henrietta Herz 和杜洛丝亚·门德尔松，

\* 希腊神话中，司农业、丰饶及保护婚姻之女神。

以及卡洛琳·米凯利斯 (Caroline Michaelis, 一位哥丁根东方语学者的女儿), 她是位革命寡妇, 嫁给施莱格尔 (August von Schlegel), 而后与他离异, 再与哲学家谢林结婚; 福尔斯特, 她对共和政体的热衷, 堪与其夫媲美, 离弃他而与一位萨克森外交家同居, 写了一篇政治小说——《沙达夫家庭》 (The Seldorf Family) 它在莱茵省引起了一阵骚动; “在智力上,” 洪堡写道, “她是那个时代中最卓越的女性之一。”<sup>①</sup> 拉歇尔·瓦恩哈根, 她的沙龙经常是柏林外交家和知识分子的出入场所。布伦塔诺, 我们看到她飞舞于贝多芬和歌德的四周。还有那些有教养、却不太革命的女性: 路易斯女公爵卡尔布、施泰因夫人, 较诸在魏玛 (Weimar) 的歌德更加明亮。

在日耳曼的一些较大的城市中, 这种妇女的解放自然伴随着一种道德约束的松弛。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国王, 在情妇方面, 已创新例, 但其继任的路易士·斐迪南王子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爱而结合的婚姻随着年轻人因醉心于爱情故事而弃绝财产的魔力的情形而增加。歌德, 在老化的过程中, 从魏玛斜视柏林上层梯次的欢乐生活, 但当他在卡尔斯巴德疗养地喝矿水时, 他采纳了新的道德律。那儿的妇女骄傲地展示着卡巴鲁斯和约瑟芬 1795 年于巴黎已开风气之先的新时尚。

政治上的不道德和性的松弛不相上下。贿赂成为外交上一种最令人喜爱的工具, 而一种渴望的贪污同样的润滑了天主教和新教国家的官僚政治。商业似乎较诸政治更为诚实; 中产阶级, 即使是和松弛的妇女结婚, 也远离沿着斯普累河的嬉乐。而其时, 无论如何, 大学正源源地将受过部分教育的青年之扰乱的新陈代谢注入日耳曼人的生活和道德中。

## 第五节 教 育

教育现在成为日耳曼首要关心之事与成就，其兴趣相等于因对拿破仑身心的反叛而引起的战争。费希特的《告日耳曼民族书》（1807年），<sup>①</sup>虽仅有极少数听众，它表示正在成长中的时代的坚信：在这些年，当快速的投降与民族的屈辱业已破坏日耳曼的精神时，唯有各阶层的教育改革方能使日耳曼步出享乐的追求而进入对国家需求的严肃奉献中。1809年，洪保（1767—1835年）被任命为普鲁士的教育部长。他有效地致力于他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日耳曼的教育体系开始了一番整修，不久就成为欧洲最好的了。来自12个国家的学生进入哥丁根、海德堡、耶拿和柏林诸大学中学习。教育推及各阶层，并在学科和目标上亦拓宽；虽然宗教被强调是品格的支柱，但是法学教师却使民族主义成为日耳曼学校的新宗教——完全如同拿破仑使其成为法国学校中的新神一样。

日耳曼的大学要求并接受一种精力充沛的测验，因为其中的多数正苦于通常发生在老年的疏忽。海德堡大学于1386年，科隆于1388年，爱尔福特于1379年，来比锡于1409年，罗斯托克（Rostok）于1419年，美因茨于1476年，蒂宾根（Tubingen）于1477年，而维腾贝格则于1502年创立。现今它们全都处于窘迫和贫困之中。哥尼斯德大学，创于1544年，因康德而享盛名，耶拿大学，创于1558年，因席勒、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施莱格尔兄弟以及诗人赫尔德林（Holderlin）而成为日耳曼的文化之都；那儿的教授会在欢迎法国大革命的程度，几乎和学生不相上下。哈

勒大学（1604年）在三种意义上，是“第一所近代的大学”：它宣示它本身思想和教学自由，而教授会亦不要求宗教纯正的信誓；它为科学和近代哲学腾出位置；且成为一个有创作能力的学问的中心以及一所科学研究的工厂。哥丁根大学，迟至1736年开始创立，但却于1800年成为“欧洲最伟大的大学”，<sup>⑨</sup>仅有荷兰的来登大学堪与比拟。“所有日耳曼的北部，”1804年正在那儿漫游的斯塔埃尔夫夫人说道，“充满着欧洲最有学问的大学。”<sup>⑩</sup>

洪堡，这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弗兰西斯·培根，是当代著名的解放心灵之一。虽出身贵族，然描述其为：“曾经是一种必要、但现在却是一种不必要的罪恶。”他依据历史的研究而下了如次的结论：几乎每一个制度，不管它已变成不完善或妨碍，它都曾经是仁善的。“是什么使得自由存在于中世纪？是采邑制度。是什么于野蛮人的世纪中保存了科学？是僧院制度。”<sup>⑪</sup>这是他24岁时所写的。一年之后（1792年），他以预言家的智慧判断法国于1791年所制定的新宪法；他以为，它包括了许多令人钦佩的建议，但是法国人民易激动又热情，所以将不可能实行它，且会把他们的国家转入混乱之中。一世代之后，和一位同类的语言学家漫游于来比锡的战场——1813年拿破仑曾于此处吃败仗，他叙述道：“王国和帝国，如我们此地所见，毁灭了；但是一首好诗却永远持续。”<sup>⑫</sup>可能他是想起了平德尔（Pindar），他曾经翻译过他那格外困难的希腊文诗。

作为一个外交家，他失败了，因为他过分为改革的观念所迷，以致不能使其自身专心于瞬息的政治之中。不惬意公家的活动领域，他退休于一种几乎是孤独的研究生活。他为哲学所迷，并从事文字——当它们由一国游往他国时——的冒险工作。他对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效用不抱信心，因为较佳的法律也将为人类不变的天性所破坏。于是，他下了如下的结论：对人类来说，最好的希望是倚靠在少数人的发展上，他们的社会奉献，对青年来说——

即使是沮丧的一代，将是一座灯塔。

因此，在 42 岁时，他走出他的隐退所，而出任教育部长；而在 1810 年，政府任命他创立柏林大学。在那儿，他成就了一项至今仍影响着欧洲以及美国大学的改变：教授的遴选并不太依据他们教学的能力，而主要是依据他们对科学上或学问上创作的研究的名声或志愿。柏林科学专科学校（创于 1711 年）、国家天文台、植物园、博物馆以及图书馆被合并于这所新大学。在这儿，来了哲学家费希特、神学家施莱尔马赫、法律学家萨维尼（Savigny）、以及古典学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 1759—1824 年），他的《关于荷马的绪言》（*Prolegomena ad Homerum*, 1795 年）一书以启发的意见惊吓了希腊主义者：“荷马”并不是一位诗人，而是歌者的继承人，逐步地拼凑成《伊里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在柏林大学，巴松·乔格·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1 年）讲演成为他先导的《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 1811—1832 年。他排斥李维（*Titus Livius Livy*）的前数章并非历史而是传奇，因而震惊了教育界。——以后，不仅在哲学方面，而且在古典学问、语言学、历史学各方面，日耳曼全都引导着世界。而它在科学上的至尊也已悄然来临。

## 第六节 科 学

在日耳曼，它曾因它与哲学几乎是连体的关联而受阻。在这段期间中的大部分时间，它被视为是哲学的一部分，和学问、历史学共同地，包括于“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一词之中。这

种与哲学的联合损害了科学，因为其时的日耳曼哲学乃是一种理论逻辑上的运用，它骄傲地高翔于经由实验的研究或证明之上。

在这个时代中，有二位格外地将科学的殊荣带给日耳曼的人，那就是：卡尔·腓特烈·高斯（Karl Friedrich Gauss, 1777—1855年）和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年）。高斯生于不伦瑞克的一家农舍，其父是一位园丁、砖匠兼运河工人，他不赞成教育，以为那是通往地狱的通行证。<sup>⑧</sup>虽然如此，卡尔的母亲注意到他对数字的喜爱和巧妙，于是俭省再俭省地送他进学校，而后进大学预科。在那儿，他在数学方面的神速进步导致其师为他谋得一次谒见不伦瑞克的 Charles William Ferdinand 公爵的机会；公爵深受感动，乃负担这男孩在不伦瑞克的 Collegium Carolinum 的3年课程的学费。因而，卡尔·腓特烈进入了哥丁根大学（1795年）。他在那儿度过一年之后，他的母亲由于完全无法了解她儿子的学业以及以数字和图解自娱的情形，于是请教一位老师：他儿子是否有卓越的希望。回答是：“他将成为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sup>⑨</sup>这位母亲去世之前，她可能已听过拉普拉斯（Laplace）的叙述：高斯业已证明了这个预言。现在其名与阿基米德（Archimedes）、牛顿（Newton）并列。<sup>⑩</sup>

我们不僭望去了解，更不解明——数字理论、虚数、二次残数、最小平方法、微积分——的这些发现，据此，高斯将数学由牛顿时代之物变换为一种几乎新的科学，它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的一个科学奇迹的工具。他对 Ceres（第一颗小行星，发现于1801年1月1日）轨道的观察，导致他有系统地陈述一决定行星轨道的新式、快速的方法。他从事将磁学和电学的理论置于数学基础上的研究。对所有相信：唯有能以数学术语叙述者方为科学的科学家来说，他是一项负担和天惠。

他本人就如同他的工作一样有趣。当他重整一项科学时，他依然是个谦逊的典范。他并不急于公布他的发现，因此直到他去

世之后，这些荣誉并未归于他。他接他年迈的母亲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在97岁的最后4年当中，她全盲了，他充当她的护士，而不允许任何人侍奉她。

这个时代的另一位日耳曼科学的英雄是威廉·洪堡的弟弟亚历山大。从哥丁根毕业之后，他进入在弗赖贝格(Freiberg)的矿业专科学校，因地下植物的研究而扬名。在拜罗伊特当矿业指导时，他发现地球磁力在岩石矿床上的效果，创设一所矿业学校，并改善工作环境。他跟瑞士的H. B. de Saussure学习山的构造，跟帕维亚的沃尔塔学习电的现象。1796年，偶然地，他开始了科学发现的漫长旅行(堪与达尔文的《小猎犬》[Beagle]媲美)，他的成果使得他成为，据当时的双关语所言，“欧洲仅次于拿破仑的最著名的人。”<sup>④</sup>

他和他的植物学家朋友邦普朗(Aimé Bonpland)从马赛(Marseille)起程，希望伴随在埃及的拿破仑；情势使得他们转向马德里(Madrid)，在那儿首相的意外赞助鼓励他们向南美洲的探测。他们于1799年启航，在特纳利夫岛(Tenerife)——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中最大的岛屿——作了一次6天的停留；在那儿，他们攀登上Peak山，而目击了一场流星雨，它导致洪堡研究这类现象的周期性。1800年，从委内瑞拉(Venezuela)的加拉加斯(Caracas)出发，他们花了4个月的时间研究沿着奥里诺科河(Orinoco)的热带草原及雨带森林的植物和动物的生活，直到他们到达这条河和亚马逊河(Amazon)两者的共同发源地为止。1801年，他们不辞辛劳地从卡特赫那(Cartagena) (哥伦比亚[Colombia]的一海港)穿过安地斯山(Andes)到波哥大(Bogotá)和基多(Quito)，而攀登上钦博拉索山(Mount Chimborazo)海拔1.8893万英尺，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保持了有36年之久。沿着太平洋的海岸旅行到利马(Lima)，洪堡测量了洋流的温度；现在它以他为名。他观察水星的运行。他对海鸟粪作一次化

学研究，了解它有当肥料的可能性，于是送一些这种海鸟粪到欧洲作进一步的分析；就这样开始了一项南美洲最富的输出品。这不屈不挠的研究者，在几乎到了智利（Chile）时，转向北方，在墨西哥（Mexico）待了一年，在美国待了一短暂时间，而于1804年，踏上欧洲的土地。这是历史上最丰硕的科学旅行之一。

洪堡在柏林几乎停留了3年，研究他们大批的笔记，而写下了他的《自然外观》（*Ansichten der Natur*, 1807年）。一年之后，他移往巴黎，以便接近科学的记录和援助；在那儿，他住了19年，享受着法国主要的博学之士的友谊，以及沙龙的生活和文学；他是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悦人的欧洲人”之一。他以一位地质学家的冷静目击通称为国家的兴衰的那些表面的骚动。他于1814年伴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到伦敦访问凯旋的国王们，不过主要，他是从事于发展旧科学或创造新科学。

他发现（1804年）地球的磁力强度从南北极到赤道渐次地减弱。他以某种岩石的火成岩起源、山的构造、火山的地理的分布状态等研究充实了地质学。他对支配大气骚动的原理提供了最早的线索，从而阐明了热带风暴的起源和方向。他作了气流和洋流的最佳研究。他是首先制定地理上的等温线——连结一年平均温度相同的地区，而无视于它们纬度的不同——者；绘图者惊奇地看到，在洪堡的地图上，伦敦——虽与拉布拉多（*Labrador*）一样地偏北——和辛辛那提（*Cincinnati*）——与里斯本一样的偏南有着相同的平均温度。他的《植物地理的试验》（*Essai sur la géographie des plantes*）一书开始了生物地理的科学——是对植物的分布受自然界的地理环境所影响的研究。这些以及其他上百的贡献，虽然外表谦逊，但其影响却是宽广且持久的，它们从1805—1834年以《洪堡和邦普朗于新大陆之赤道地区之航》（*Voyages de Humboldt et Bonpland aux régions équinoxiales du nouveau continent*）之名出版了30册。



终于，他在他的工作上耗尽了他的财产，于是他接受了一个有薪职务，当普鲁士宫廷的御前大臣（1827年）。不久在他的再教化之后，他于柏林发表公开的演讲——后来形成他的许多册《宇宙》（Kosmos）中的要旨（1845—1862年），它在欧洲人的眼界中，是最著名的书籍之一。序文以一个成熟心灵的谦逊态度说道：

“在一个活动生涯的晚期，我奉呈一项工作——它尚未确定的影像飘浮在我的脑海里已约有半世纪之久——给日耳曼人民。我经常以为它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但是每当我想放弃这项工作时，我又——虽然可能是有欠考虑——重新开始这项工作。……这引导我的主要推动力是，去理解自然物体的现象，它们一般的关系，以及表示自然是一为内在力量所牵动和鼓舞的伟大整体的热切的努力。”<sup>④</sup>

于1849年被译成英文时，该书几达2000页，包括了天文学、地质学以及地理学，而显示了一个充满着意想不到事物的、有生气的自然世界，但为数学的定律以及物理和化学的规律所支配。然而，这广布的景象并非由一无生命的机械所产生，而是由这与生俱来的无穷的活力、扩展和创作力的生命所产生的一巨大景色中之一物。

洪堡自身的活力是令人鼓舞的。他才刚定居在柏林，就接到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的一个邀请，请他带领一科学探险队前往中亚细亚（1829年）。花了半年的时间，收集气象的资料和研究山的构造，而且于途中，在乌拉尔山脉（The Urals）发现了钻石矿。回到了柏林，他利用他御前大臣的职位去改善教育制度，并援助艺术家和科学家。当他正从事《宇宙》第五册的写作时，死神降临了，享年90岁。普鲁士以国礼葬之。

## 第七节 艺 术

在日耳曼，时代对科学与艺术并不有利。当前或未来的战争消耗了热诚、激情与财富。私人赞助的艺术很少而且寥落。在来比锡、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尤其在德累斯顿与柏林的国家画廊展示着杰出的作品，但由拿破仑搜括到罗浮宫。

然而，在此骚乱中，日耳曼艺术产生了一些值得纪念的作品。巴黎在纷乱中雀跃时，柏林大胆地矗立了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兰厄姆（Karl Gotthard Langhans, 1732—1808年）以刻有凹槽的多丽斯（Doric）柱与沉重的山形墙设计之，似乎宣示了巴洛克与洛可可式之死亡；但这庄严的建筑主要显示了霍亨索伦省人（Hohenzollerns）的强权，以及他们不让敌人进入柏林之决心。而拿破仑于1806年，俄罗斯人于1945年进入。

雕刻的进展顺利。这是重要的古典艺术，依赖线条与（自古以来）避免色彩；它的精神不同于巴洛克的不规则与洛可可的多趣性。丹内克尔（Johann von Dannecker）为斯图加特博物院凿刻了一尊“莎孚”（Sappho）、以及加塔拉斯（Catullus）的“伴鸟的少女”（Girl with the Bird），为法兰克福的贝斯门（Bethmann）博物院雕了一尊“艾莉艾德妮”（Ariadne），为魏玛的图书馆刻了尊席勒的半身像。恰铎（Johann Gottfried Schadow, 1764—1850年）在罗马同卡诺瓦（Canova）学习后返回出生地柏林，1793年时，以一尊立于勃兰登堡门上由长着翅膀的胜利女神驾驭着4匹马牵拉的罗马二轮战车（Quadriga）雕像而吸引了全首都居民的注意。他为施特廷（Stettin）雕了一尊弗里德里希大帝站在战阵中，

以他的双眸火焚着敌军,但有两卷厚书在他脚下以证其为一作家;他的横笛被遗忘了。较柔和的是一对路意丝与弗雷德里克公主(Princesses Luise and Friederike)(1797年),半埋在绉摺的披肩里,手挽着手轻缓地走向忧乐。皇后以其美貌、狂热的爱国心以及其死亡激励了艺术家。根茨(Heinrich Gentz, 1766—1811年)献给她在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的一座阴郁的陵墓,在那安息之所,劳赫(Christian Rauch, 1777—1857年)为她雕了座匹配其躯体与灵魂的坟墓。

日耳曼的绘画依然受困于“贫血”,新古典主义企图活在赫库兰尼姆市(Herculaneum)与庞贝(Pompeii)市的余烬里,莱辛(Lessing)与文克尔曼(Winckelmann)的论说里,门格尔(Mengs)与大卫苍白的脸上,以及考夫曼(Angelica Kauffmann)与无数蒂惜贝因(Tischbeins)人的罗马幻想中。但那外来的漂染在日耳曼历史或特性上并无滋养之根;此时代的日耳曼画家摒弃新古典主义,重返基督教,超越宗教改革及其对艺术的敌视与漠不关心,而且——在英国的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s)以前很久——听从如瓦肯罗德(Wilhelm Wackenroder)与施莱格尔之召唤,在拉斐尔后朝向:以不疑信念的单纯与欢乐来作画、雕刻与作曲的中古艺术。因而崛起了以拿撒勒人(The Nazarenes)闻名于世画家学派。

绘画的领导人为奥韦尔贝克(Johann Friedrich Overbeck, 1789—1869年)。生于吕贝克,以老式商人家庭不屈的审慎与来自波罗的海之迷雾伴着他度过80年的岁月。他被送到维也纳学习艺术时,他发现那儿新古典主义的滋养满足不了他。1809年他与朋友普弗尔(Franz Pferr)建立“圣路加兄弟会”(Lucan Brotherhood),将艺术献给久已存在于迪尔(Albrecht Durer)时代(1471—1528年)的弥新信念来誓旨复兴艺术。1819年他们移民到罗马,试着研究佩鲁吉诺(Perugino)与其他15世纪的画家。

1811年加入科内利乌斯(Peter von Cornelius),稍后加入了菲力浦·伊法特(Philipp Veit)、高登豪斯(Wilhelm von Schadow-Godenhau)、与卡洛斐尔德(Julius Schnorr von Carolsfeld)。

他们在平西欧山(Monte Pincio)上的桑伊希多罗(San Isidoro)一个遗弃的修道院内像吃素的圣人一样度日。“我们过着真正隐居的生活,”奥韦尔贝克稍后回忆道:“早晨我们一齐工作;中午我们轮流准备午餐,内容不外是汤与布丁,或一些可口的蔬菜。”他们轮流互相问难。他们略过圣彼得大教堂,认为包含太多的“异端”艺术,宁愿到古老的教堂,到圣约翰拉特兰大圣堂(St. John Lateran)的修道院与圣保罗大教堂墙外。他们为研究西尼奥雷利(Signorelli)而旅行到奥尔维耶托,为杜西欧(Duccio)与马蒂尼(Simone Martini)而到西恩那(Sienna),且最重要的为研究安吉利可(Fra Angelico)到佛罗伦萨与费苏里(Fiesole)。他们决心避免人像的描绘、或任何为装饰目的之绘画,并且恢复拉斐尔时代以前绘画的目的为激励基督徒的虔诚及与基督教教条有关的爱国心。

他们特别的机会于1816年来到,其时在罗马的普鲁士执政官巴托尔迪(J. S. Bartholdy)委托他们以约瑟与门徒故事的壁画装饰他的别墅。“拿撒勒人”哀悼壁画取代了涂在帆布上的油画;如今他们研习化学以制造可使色彩耐久的表面;到目前为止他们已成功地使其壁画,从罗马移走,而装置在柏林国家画廊内,成为普鲁士首都最值得骄傲的财富之一。但老迈的歌德听到这些喜讯,指责它们为14世纪意大利风格的仿制品,正如新古典主义者模仿异端艺术一般。拿撒勒人忽视那批评,但在科学、学识、与哲学渐渐腐蚀远古的信念时悄悄地离开了布景。

## 第八节 音 乐

音乐在繁盛时是日耳曼的骄傲，凄凉时是她的安慰。1803年斯塔埃尔夫人抵达魏玛时，她发现音乐几乎成为受教育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许多城市有歌剧团体，并且自格卢克以来，他们努力逐渐不依赖意大利作品与抒情调。曼海姆与来比锡有驰名欧洲的管弦乐队。器乐崛起公开与歌剧颉颃。日耳曼有伟大的小提琴家如施波尔（Louis Spohr, 1784—1859年）、著名的钢琴家如胡梅尔（Johann Hummel, 1778—1837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国王大提琴弹得极好，因而参加了四重奏，有时加入管弦乐队，而斐迪南王子（Prince Louis Ferdinand）是个多才艺的钢琴家，只因他皇家的出身阻碍了与贝多芬及胡梅尔的匹敌。<sup>⑨</sup>

日耳曼亦有一音乐大师几乎可为任一种乐器的教师、作曲家与演奏家而驰名欧洲：即福格勒。他很早就赢得风琴家与钢琴家的令誉，小提琴无师自通，并发展出一崭新的指法体系，非常适合他纤长的手指。送往意大利跟着马蒂尼（Padre Martini）学习作曲时，他反抗一个又一个的老师，后来在宗教方面获得转变，而在罗马受到赞扬。返回日耳曼后，他在曼海姆创立一所音乐学校，然后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最后在斯德哥尔摩创立。他反对意大利教师教授艰难的作曲法，应允较迅速的完成。莫扎特与一些其他人当他是个江湖骗子，但稍后的考虑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不在其为一作曲家，而在其为教师、演奏家、风琴制造者、与男子汉。他以风琴家的身分旅游欧洲，风靡了无数的听众，赚取了无数的报酬，也改进了风琴。他改变了风琴演奏的形式，赢得了与

贝多芬在即兴演奏上的竞赛。<sup>⑧</sup>他是 12 位著名学生，包括韦贝尔 (Weber) 与迈尔贝尔 (Meyerbeer)，所尊崇的老师。他去世时，他们哀悼他好像他们失去了父亲一般。1814 年 5 月 13 日，韦贝尔写道：“6 日，我们深爱的大师福格勒突然被死神攫走。……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sup>⑨</sup>

卡尔·韦伯 (Carl Maria von Weber, 1786—1826 年) 是两度结婚的法兰安敦韦伯 (Franz Anton von Weber) 之众多子女中的一位。在安东的众多女儿与甥女中有两位出现在这些书卷中：阿洛茜亚 (Aloysia) 为莫扎特的初恋及著名的歌手，而康斯坦兹 (Constanze) 成为莫扎特的妻子。儿子韦贝尔 (Fritz) 与爱德蒙 (Edmund) 跟着海登学习，但卡尔显露不出多大的希望，使得韦贝尔告诉他：“卡尔，你可成为你喜欢的任一种人，但你绝成不了音乐家。”<sup>⑩</sup>卡尔喜欢绘画。但在弗兰蒋·安东指挥的大部由其子女组成的剧乐团之四处漫游中，卡尔在音乐上的教育由一位挚爱的教师霍伊施凯尔 (Joseph Heuschkel) 重新开始，在他教导下，这男孩很快发展出一种才能，震惊且报偿了他父亲。1800 年，时年 14 岁，卡尔开始作曲，且公开演奏。然而，匆匆行过一镇又一镇的刺激在卡尔的性格上产生了一些影响：他变得烦躁不安、神经兮兮、容易激动，而且善变。他为他的友人塞内菲尔德 (Aloys Senefelder) 所发明的石版印刷术所迷惑，因而有一阵子他疏忽了音乐创作，跟随父亲到萨克森的弗赖贝格从事商业规模的石版印刷。然后于 1803 年初期，他遇到福格勒，再度激起狂热，成为福格勒的学生，接受严格的学习与练习日课。福格勒对他的信心激励了他。如今他进展极速，因而在弗格勒的推荐下，充当布雷斯劳 (Breslau) 的音乐长 (Kapellmeister, 1804 年)。当时他年仅 17 岁，但他接受了，带着生病的父亲前往西里西亚首都。

这年轻人不适合这不仅需要多种的音乐才能，亦需娴熟处理各种性情男女的职位。他交到挚友也树立了宿仇。他花费过于热

狂，斥责不能胜任的人过于尖刻，并且饮酒过于卤莽。误以一杯硝酸当酒，在了解他在吞火以前，他喝了一部分。他的喉咙与声带受到永久性的损伤；他不再能唱歌，说话非常吃力。一年后他丧失了工作；他以授课来支撑他自己、父亲与一位姑母。他几乎丧失了勇气，就在那时符腾堡之欧根公爵（Duke Eugen of Wurttemberg）在西里西亚他的卡尔斯鲁厄（Schloss Karlsruhe）处给他们三人房子住（1806年）。但拿破仑的瓦解普鲁士之领土与财源毁灭了公爵，韦伯为了供养三人，不得不暂时忘却音乐，在斯图加特加充任符腾堡之路德维希公爵（Duke Ludwig of Wurttemberg）的秘书。这位公爵是位狂欢、放荡与不实的爵爷，卡尔在他的影响下堕落了。他对歌手兰恩（Margarethe Lang）生出热诚的爱慕，失去她时也失去了他的储蓄与健康。他被柏林的一个犹太家庭——贝尔（the Beers）家迈尔贝尔的双亲——自放荡中救出。婚姻使他清醒，但恢复不了他的健康。

在“解放战争”中，他为科尔纳（Karl Theodor Korner）的军歌配乐而赢得令誉。战争后他加入另一场运动——对抗意大利歌剧；他撰成“自由守护”（Der Freischutz, 1821年）当作独立宣言对抗巡回与胜利的罗西尼。它首次在1821年6月18日，滑铁庐一周年纪念日演出；在爱国心的羽翼上它被捧得很高；从来没有一出日耳曼歌剧如此成功过。此歌剧自《鬼故事》（Gespensterbuch）中撷取主题，与保护“自由射手”的仙子嬉戏；在那些格林日子中，日耳曼获得仙子很大的帮助；不久（1826年）门德尔松提供他“仲夏夜之梦”序曲。韦贝尔的歌剧标示了浪漫主义在日耳曼音乐上的胜利。

他希望以“尤里安丝”（Euryanthe）继续他的成功，此剧1823年在维也纳首演；但罗西尼刚刚征服维也纳，而韦伯较为精致的音乐缺乏诱惑力。此次失败，加上益形恶化的健康，使得他非常沮丧，以致于几乎两年未再作曲。后来查理士·肯布尔（Charles

Kemble)任柯文园剧院经理,提供他1000英镑帮助他编歌剧,并前来伦敦指导。韦贝尔热忱地在这工作上卖力,并勤勉地学习英文,因而在抵达伦敦时,他不仅能阅读,说得也很流利。在首演时(1825年5月28日)“奥伯伦”获得成功,为此这位欢乐的作家当天晚上描述给他的妻子:

“今晚我得到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功。……我进入乐园时,屋子爆出狂热的掌声,声震屋宇。帽子与手帕在空中挥舞。表演结束时,我被召往台前……一切都进行得极好;围绕着我的每一个人都很愉快。”<sup>⑥</sup>

但以后的演出并没那么受欢迎,1826年5月26日,一场为韦伯而举行的音乐会是一次可悲的失败。数日后这位沮丧又倦怠的作曲家卧病在床,遭到剧烈的肺结核打击;6月5日,他去世了,远离家乡与亲人。浪漫主义者英年早逝,因为40年中他们实活了70岁。

## 第九节 剧 院

几乎每一个日耳曼城市都有一间剧院,因为人们在白天受到事实的困扰,入夜后就要在想像中轻松一下。一些城市——曼海姆、汉堡、美因茨、法兰克福、魏玛、波恩、莱比锡、柏林——有定居的剧团;其他城市仰仗旅行剧团,并为偶尔的来访搭建临时舞台。曼海姆剧院在艺人与演出方面,柏林在接待与薪资方面,魏玛在古典戏剧艺术方面享有盛誉。



1789年魏玛有6200人，许多人从事公职与充任贵族从仆。有段时期镇民支持一剧团，但1790年时此剧团因营养不良而终。奥古斯都（Charles Augustus）接收此企业，使剧院成为朝廷的一部分，说服顾问官歌德经营，除主角外朝臣扮演各种角色；为此他们从飘荡的“明星”中引介一位男主角或女主角。因而伟大的伊芙兰特（Iffland）来到魏玛，而骄傲的施勒特尔（Korona Schroter，1751—1802年），她的声音、姿态与媚视几乎使歌德自施泰因（Charlotte von Stein）处分离。这位诗人—政治家—哲学家本身并非低劣的演员，如今对施勒特尔的伊菲琴妮亚（Iphigenia）扮演悲剧的奥雷斯蒂斯（Orestes），然后，即使在诙谐角色中，令人惊异地成功为一喜剧演员。<sup>⑥</sup>他以几乎近似演辩口吻之高卢的说话风格来训练演员；它具有单调的缺陷，但却有明晰的优点。公爵强烈地支持此方针，并恐吓要在公爵厢房中当场斥责任何发音的错误。

魏玛剧院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节目单，范围自索福克勒斯与德伦克（Terence）到莎士比亚、卡尔德隆（Calderón）、高乃依（Corneille）、拉辛、与伏尔泰，甚至到弗里德里希（Friedrich）与施莱格尔的当代戏剧，并以席勒的“沸腾之石”（Wallenstein，1798年）来达到值得夸耀的胜利。席勒来自耶拿，在魏玛定居，在歌德的怂恿下，成为剧团经理骨干的一员。如今（1800年）这小小的剧院使魏玛成为上千爱好戏剧的日耳曼人的目标。席勒死后（1805年），歌德对剧院失去了兴趣；公爵在他情妇怂恿下，坚持剧团以一条狗为明星演出戏剧插曲时，歌德辞去了他经理的职位，而魏玛剧院就此自历史消失了。

在此时代，两位演员主宰着日耳曼舞台。伊芙兰（1759—1814年）匹敌泰尔玛（Talma）的胜利，而德夫林特（Ludwig Devrient，1784—1832年）重演了基恩（Edmund Kean）的事业与悲剧。生于汉诺威，伊芙兰特18岁时不顾双亲的反对，离家加入在哥达

(Gotha) 的一个剧团。仅仅两年，他在曼海姆的一出席勒的“强盗”剧中担任主角。这急进的时期屈服于成功、与法国移民的同情上；他很快成为保守派的偶像。在一次涵盖大部分日耳曼之艰苦事业后，他接受歌德的邀请到了魏玛（1796年），并以中等阶级的喜剧取悦朝廷的观众；但他对悲剧的角色如“沸腾之石”或“李耳”（Lear）处理得不好。他编了几出剧，他的幽默与情感赢得大众的掌声。1798年他达到了他野心的目标——他被任命为柏林国家剧院的经理。

在他死前不久，他雇了一位演员德夫林特，他带给日耳曼舞台浪漫时期一切的感伤与悲剧。他的法国姓氏是他的胡格诺教徒遗产的一部分。他是一位柏林布商在两次婚姻中所生的3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在襁褓时，他母亲去世了，留下他不幸地处在人口众多的家庭中。他退隐入阴郁的孤独中，仅以其英俊的脸庞与乌黑的头发自慰。他自家庭与学校出走，但被捉回他父亲处。每次尝试着使他成为布商，但德夫林特令人气恼地证明其不能胜任，因而他被放任去追寻自己的喜好。1804年，时年20岁，他加入来比锡的一剧班，当一名小角色，自此角色中由于“明星”的生病，他突然被推入一个主要的角色。发现一个醉酒流浪汉的角色十分投合他的趣味时，他表演得极好，以致于他似乎命中注定要投身终身喜爱杯中物之流浪演员的事业中。最后，1809年在布雷斯劳，他不在“法斯塔夫”（Falstaff）剧中，却在席勒急进剧的“卡耳摩尔”（Karl Moor）剧中找到了自己。他倾注所有他所学得的人类罪恶、压抑、与怨恨入此角色中；他让强盗首领占有了他，并在身体的每一动作中、脸部表情的变化中、与愤怒双眸的闪烁中找到发泄；布雷斯劳从未见过如此鲜明或有力的角色；仅有基恩在伟大演员的时代中能够达到演戏艺术如此的高深处。只要请求，所有的悲剧角色都是德夫林特的。他扮演李耳王，完全耽溺于那智慧与疯狂的脆弱混合体，因而有一晚在演出途中崩溃了，必须送

他回家、或送到他喜爱的酒馆。

1814年伊芙兰，时年55岁，来到布雷斯劳，与德夫林特同台演出，感受到他的力量与技巧，要求他加入国家剧院。“值得你去的惟一地方是柏林。那地方我确切感觉到——很快就要真空了，它为你保留着。”<sup>⑨</sup>9月伊芙兰特去世；下一春季，德夫林特取代他的位置。在那儿，他尽情演戏，活在盛名与美酒中，与霍夫曼（E. T. A. Hoffmann）在剧院不远的酒馆中交换着故事，度过欢乐的时光。1828年，受到盛名之累，他接受挑战在维也纳演出。他神经崩溃的返回柏林。1832年12月30日去世，享年48岁。三位有天份的甥儿，都冠上他的名字，继续他的艺术直到世纪末。

## 第十节 戏剧家

在施莱格尔精巧的翻译莎士比亚后（1798年及其后），日耳曼舞台为伊利莎白时代的剧本提供了新居。当地戏剧家，在莱辛与克莱斯特（Kleist）之间，纷纷朝向中等阶级的共同喜好之事物；而他们受欢迎的成功消失在时光之瓦砾里。韦尔纳（Zacharias Werner）将神秘主义匆匆展现在舞台上。考塞卜（August von Kotzebue，1761—1819年）以他的戏剧取悦了一代，甚至在魏玛超过歌德与席勒；除了被暗杀之外，他如今成了一个褪淡的记忆。日耳曼人以怜悯之心怀念克莱斯特，并尊崇他的文笔。

1777年生于奥得河的法兰克福（Frankfurt-and-der-Oder），他在性情上、地理上近于斯拉夫族人。像个善良的日耳曼人一样，他在军中待了7年，但稍后却感伤那浪费了的年月。他在当地大学研习科学、文学与哲学，但在宗教与科学上丧失了信心。他向一

位将军之女求婚，却又颤栗于婚姻的念头。他前往巴黎，然后至瑞士，在那儿他幻想着买一座农场，且让四季之规律平静地为其杂念纷扰之不平稳之心灵来自娱。重返文学时，他写了一出但未完成的历史悲剧《吉斯卡尔》(Robert Guiskard)；1808年他在魏玛推出一出喜剧《破罐》(Der zerbrochene Krug)，此剧被后一代评为恒久的古典剧。在魏玛停留一阵子(1802—1803年)，他自仁慈老迈的不可知论者维兰德处赢得友善的激励；维隆德听了一些“吉斯卡尔”后，告诉这青年剧作家，他保留了“埃斯库卢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与莎士比亚的精神，”<sup>⑥</sup>且克莱斯特的天才注定要“在日耳曼戏剧发展上，填补甚至席勒与歌德亦未曾填补的空隙。”<sup>⑦</sup>这足够毁灭25岁的索福克勒斯。

他前往伦敦定居，感受到它的热狂，且无助地沉思着与日耳曼理想主义者哲学密不可分的怀疑主义：若我们对经由我们的理解方式来到我们意识的世界认识不多，我们绝发现不了真理。唯有一事可确定：哲学家、科学家、诗人、圣人、乞丐、疯子，所有的人很快命定归于尘土、或存于少数生者渐渐褪色的记忆中。克莱斯特丧失勇气面对、接受、与享乐即使不确切熟知的现实。他推断到他的天才是个幻觉，他的书稿全属虚无。在愤怒失望中，他烧毁了陪伴他的稿件，尝试着加入拿破仑在英伦海峡聚集的军队。1803年10月26日，他写信给他姊姊，对她他也许爱得过分：

“我即将告诉你的也许使你牺牲很大；但我必须，我必须去做。我再一次仔细想过，否决且烧毁我的作品；如今结局已来临。上天不给我名望，这世俗事物中最伟大的；就像个任性的孩子，在他之前我抛弃剩余的一切。我显不出自己值得你的友谊，而没有你的友谊我活不下去；我选择死亡。镇静点，尊贵的人啊！我将在美丽的死亡战争中死去。我已离开了此国的首都，浪迹到北海岸，我

将参加法国军队；军队很快就要对英国开战；我们的毁灭正潜藏在海的那一边。我欢欣壮丽之墓的远景。你，吾爱，将是我临终时之所思。”<sup>④</sup>

他计划在法国军队中成为一名日耳曼军人引起了怀疑。在普鲁士大使的坚持下，他被逐出法国。其后不久，法国对普鲁士宣战；1806年拿破仑摧毁了普鲁士军队，及几乎普鲁士之整个国家。克莱斯特在德累斯顿寻求庇护，但法国军火在那儿以嫌疑的间谍身份逮捕他；他在狱中度过6个月。返回德累斯顿时，他加入一个作家与艺术家的爱国团体，并与亚当缪勒（Adam Müller）合作编辑一份定期刊物，在其上他投了几篇他最好的论文。

1808年他写了一个悲剧剧本“潘丝席丽亚”（Penthesilea）。此剧女主角是个亚马逊女王，在赫脱（Hector）死后，加入特洛伊人在特洛伊对抗希腊人；她前去刺杀阿奇里斯（Achilles），为他所败，爱上了他，然后（根据亚马逊女族之法律，每个人必须在战场上征服她的爱人以证明自己）以一支箭刺穿阿奇里斯，纵狗群攻击他，并加入畜生中将他撕成数块，吮他的血，然后颓然死去。此剧是酒神热狂（Bacchic frenzy）的一个回响，此热狂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在“酒神之女伴”（The Bacchae）中提及——在尼采之前，不受希腊人强调之希腊神话与人物的一面。

无疑地，为拿破仑无情瓦解普鲁士所激起的愤怒，使得这位诗人离开他的悲伤，而成为呼唤日耳曼加入自由之役的众多呼声之一。1808年底他写出了剧本《赫曼的战门》（Die Hermannschlacht），借着叙及公元6年时阿尔米纽斯（Arminius）横扫罗马地区之胜利以求激励在与拿破仑明显无望的争斗中日耳曼人的勇气。再一次克莱斯特爱国心的热狂促使他神经过激：赫曼（Hermann）的妻子瑟内尔答（Thusnelda）引诱日耳曼将军凡梯第尔（Ventidius）与她约会，然后导引他到野熊致命的拥抱中。

1809—1810年是克莱斯特天才的巅峰期。他的诗剧《海洛波隆的凯塞玲》(Das Kathchen von Heibronn)在汉堡、维也纳、与格拉茨(Graz)上演获得成功;1810年他刊行的两册短篇故事显示他也许是歌德时代中最优秀的散文作家。其后他的精神衰退了,也许由于他健康的崩溃。某种奇特的痛苦缘分引他与一位不治的女病人弗葛尔(Henriette Vogel)结交,最后并谈起恋爱。他写给她的信显露了在疯狂边缘的心灵。“我的吉蒂(Jette),我的一切,我的城堡,牧场,我生命的总额,我的婚礼,我儿的洗礼,我的悲剧,我的名誉,我的护守天使,我的知识天使与爱的天使!”她回答道,若他爱她,应杀她。“1811年11月21日,在旺塞(Wansee)河堤边,靠近波茨坦,他枪杀她的要害,然后自杀。

在他浪漫派之耽溺于感情在不受控制的强度中、在想像力中、以及在风格的辉煌中达到了最高峰。他似乎有时候具有法国风格远甚于日耳曼风俗,反对歌德,而与波德莱尔(Baudelaire)、或更与兰波(Rimbaud)称兄道弟。他几乎证实了歌德无情的见解:“古典派是健康的,浪漫派是病态的。”让我们睁眼瞧瞧。

## 第七章 日耳曼文学

(公元 1789—1815 年)

### 第一节 革命与反响

拿破仑时代的日耳曼文学被青年反叛的天性、狂飙运动的持久浪潮、英国浪漫派诗与里查森 (Richardson) 小说的回响、莱辛与稍后歌德的古典传统、美国殖民地的成功叛变、法国启蒙时代的异端、尤其是法国革命的每日冲击、以及末期时拿破仑崛起与没落的戏剧所影响。许多受过教育的日耳曼人阅读——一些法文——伏尔泰、狄德罗 (Diderot) 与卢梭的作品，而较少数的人感受爱尔维修 (Helvétius)、霍尔巴赫 (d'Holbach)、与拉梅特里 (La Mettrie) 的刺激。法国哲学有助于结交统治者如：弗里德里希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奥地利约瑟夫二世 (Joseph II of Austria)、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公爵 (Duke Charles William Ferdinand of Brunswick)、萨克森—魏玛之奥古斯都公爵 (Duke Charles Augustus of Saxe-Weimar)；只要透过这些人，那些作家就可在日耳曼文明上崭露头角了。法国大革命刚开始时似乎是启蒙时期哲学的合理发展：愉快地终结封建制度与阶级特权，活泼地昭告宇宙人权，振奋地解放语言、出版、崇敬、行为、与思想。这些理念

——许多在日耳曼独立地发展——以新闻的双翼或革命的军队渡过莱茵河，横扫欧洲心脏地区，甚至抵达遥远的哥尼斯德。

因此日耳曼心灵的陶冶者与日耳曼文学的创造者在最初三年欢迎法国大革命。兄弟会会员、洛兹克鲁逊会会员、骄傲的自称先觉者 (Illuminati)，欢呼它为他们长久迫切等待着的黄金时代之曙光。农夫策划反叛特里尔与施派尔市的封建贵族、“帝国骑士”、与主教团。<sup>①</sup>汉堡的中产阶级赞许大革命为一商人对抗自大的贵族的起义。克劳普斯多克 (Klopstock) 为一住在汉堡的年迈诗人，在自由节日朗读他的诗篇，并喜悦地在他的诗句间狂喊。学者、记者、诗人、与哲学家一致爆发出赞美歌来。沃斯 (Johann Voss)，荷马的译者；缪勒 (Johannes von Müller)，历史家；根茨，无任所外交官；赫尔德林 (Friedrich Hölderlin)，诗人；施莱尔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神学家；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家——全对大革命连祷歌颂。福尔斯特 (Georg Forster) (曾陪伴库克上尉 [Captain Cook] 环游世界) 写道：“看到哲学深植于脑中，实现于国内极感光彩。”<sup>②</sup>每一处，即使皇族显贵 (如亨利王子，弗里德里希大帝仅存之兄弟)、日耳曼人，忘形之余，也赞美革命的法国。在此忘形之时日耳曼文学，在长久蛰伏于宗教的争吵之后，将大革命归之于弗里德里希之胜利，于 30 年间 (1770—1800 年) 跃升为极富活力、多变与光辉，可与英法成熟的文学相颉颃。此速度惊人的复苏在唤起日耳曼摆脱法国之轭，且在政治、工业、科学、哲学上达到历史上最辉煌的世纪上，扮演了它的角色。

当然此欢乐的情绪不能持久。事件来自对杜伊勒里皇宫的攻击、9 月屠杀与恐怖、国王与皇后的监禁与处死。接着法国占领了日耳曼领土，不断的征集金钱与人员以付帝国之保护与散布自由的军费。一年接着一年日耳曼对大革命的热忱衰微了，护卫者 (除了康德) 一个接着一个转为觉醒的怀疑论者，一些人转为愤怒的敌人。



## 第二节 魏 玛

正当大革命与拿破仑骚扰的冲击下，在魏玛宫廷一群灿如明星的天才为日耳曼人的才智充当智识之锚。奥古斯都公爵本身即为善变的才能与情绪的混合体。一岁时就承袭公爵领地，18岁时（1775年）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他自家庭教师处获得一般教育，而自管理的责任、情人的任性、战争与狩猎的危险中得到更深的教导。不亚于他修习处所的是他母亲的沙龙。在那儿他遇到了诗人、将军、科学家、哲学家、神职人员、与实业家，还有一些最有教养但仍不脱女人味的日耳曼妇女，她们以机智与魅力增添她们远古的智慧，并计算那未曾以隐秘的爱情来慰藉的失去的日子。“啊，我们拥有女人！”里希特（Jean Paul Richter）报导道：“每件事在此皆成叛逆性的大胆；妇女已婚不具任何意义。”<sup>①</sup>

1772年女公爵（她本身即为可喜美德之典范）邀约学者、诗人、与小说家维兰德前来教导她的儿子奥古斯都与康士坦丁（Konstantin）。\* 他以谦逊与能力完成了他的责任，并留在魏玛直至去世。法国大革命来临时他50岁；他欢迎大革命，但在1789年10月的《宇宙宣言》（Cosmopolitan Address）中，他要求法国国民

---

\* 在此节中作证之四人——大部由于已故的古奇（George Gooch）渊博的《日耳曼与法国革命》（German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1966年）一书之帮助——已在《卢梭与大革命》（Rousseau and Revolution）一卷中谈过了；维兰德（1733—1813年）在553—576页内，赫尔德（1744—1803年）在567—569页与577—580页；席勒（1759—1805年）在569—575页与591—605页；歌德（1749—1832年）在555—628页。

会议防卫暴民统治：

“国家正遭逢自由的狂热，使得巴黎人——世上最有礼的人民——渴求贵族之血。……人民迟早会醒悟，它难道看不见它正被 1200 名渺小暴徒牵着鼻子走，而不是被一国之君统治着？……然而你们不会比我更深信贵国不该长久忍受如此恶政；政府最完善的形式该是行政、立法、司法的分权与均衡；每一人民拥有在秩序下共存的对自由不可废弃之权利；每人需依其收入比例缴税。”<sup>④</sup>

1791 年他写道：他从未料到他的政治正义的理想在路易十六身上几乎可实现。<sup>⑤</sup>1792 年 1 月处死君王之事使他转为反对大革命；恐怖时代使他生病。那年稍后他出版了《合于时宜的忠告》(Words in Season)，此书达成一些适度的结论：“应继续不断教诲，直到人们倾听，人类惟有更为理性与道德才能更为欢乐。……改革不应自法令而应自个人始。欢乐的条件在我们的掌握之中。”<sup>⑥</sup>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魏玛四人组的最后一位定居那儿，也是最先一位过世——赞扬大革命直至皇后上了断头台；之后他以大革命为人性理想残酷的流产而予以抛弃。在他最后几年中他恢复了希望；虽有其早发之痴呆，他感到，大革命标示了一种进步，仅次于当代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它结束了封建对人身的统属正如宗教改革结束了罗马教皇势力对人心的统治；如今世人不再重视出身与阶级；不论在何处出生，能力可自由发展创造。然而，此进步使欧洲牺牲极大，赫尔德尔很高兴此尝试发生在法国而不在他深爱着的日耳曼，在那儿人们不会很快激起热情与狂热，但那儿恬静的勤奋与涵容的学识将会以温柔但稳定的扩散之光引导青年人茁长。

席勒——为古典的三人所溺爱保护着的浪漫灵魂——在戏

剧、诗歌、历史、与哲学激奋的冒险后来到了魏玛（1795年）。浪漫于幻想，苦恼于敏感，他并不喜爱年轻时待过的符滕堡。他以尊崇卢梭，及撰写革命性的剧本来发抒抑郁。卡耳摩尔“强盗”（1791年）一剧中的英雄，抨击除了为马克思增添学识外，其他一无所有之此种热情之人来剥削人。更具革命性的是席勒的第三部剧“阴谋与爱情”（*Kabale und Liebe*）（1784年）；它揭露了不劳而获特权阶级的腐败、奢华、与凶猛的占享，赞扬日耳曼中产阶级稳定、容忍、与生产性的生活。他在大革命前之剧本中最好的一部“唐·卡洛斯”（1787年）中，时年28岁的席勒，对穷人的愤怒比对掌权有潜力的贵族较不感到兴趣；他借波莎侯爵（*Marquis Posa*）之口召唤菲力普二世为“他子民之父，”“让欢乐自你丰饶之羊角中流出，”“让人心在你广袤的帝国里成熟，在上千君王中，成为一位真正的君王。”<sup>⑦</sup>

自青年到中年，席勒自然而然从急进主义转向自由主义。他发现了古希腊，对它的剧作家留有极深刻的印象。他阅读康德，并以哲学晦涩其诗。1787年他拜访魏玛，被当地女子所激奋，而由维兰德与赫尔德安稳之。（歌德其时在意大利。）1788年他出版了《尼德兰叛乱史》（*Geschichte des Abfalls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并以历史验证其哲学。1789年在歌德向萨克森·魏玛公爵的推荐下，席勒被任命为耶拿的历史教授。那年10月他写给一位朋友：“为单独的国家而写是不足取的理想；对一位哲学家来说这样的藩篱难以容忍。……历史学家仅为在文明进展上具重要因素的国家而激奋。”<sup>⑧</sup>

大革命的消息抵达耶拿时，席勒正喜于中年增多的收入与见解、公众的接纳及容忍的了解。他与歌德的交往，越过12英里空间与10岁年龄之鸿沟，有助于诗人自歌德处留存了施政的散文与繁荣的保证，且有助于席勒了解人类天性在历史上改变得太少，而不能使政治革命为穷人谋福利。他同情1789年在凡尔赛被捕的国

王与皇后，1791年拘留在瓦雷讷（Varennes），1792年，自其监禁之皇宫被逐出。不久革命议会一致授给 Gilles 先生“法国公民”（citoyen français）的头衔。一周后9月的大屠杀宣示了武装群众的统治；12月路易十六付审。席勒开始写本小册为其辩护；在他完成之前，国王上了断头台。

歌德嗤笑他朋友政治信念的变迁，但他本身也远离其年轻时的确信。1775年被邀，时年26岁，离开法兰克福，定居魏玛，为奥古斯都公爵的常任诗人与好色的同伴，在此之前，他恣情地与各类妇女玩乐。以后12年中他吸收了政治与经济的实体，就此迅速茁长起来；《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年）一书的浪漫作者自枢密顾问身份上消失，他看到了欧洲历史上新的时代于1792年在瓦尔密（Valmy）成形。那年大革命无秩序的衰颓导引他下个结论，谓在接触哲学的“开明暴君”——与在受过教育与怀有善意的当地统治者如魏玛公爵——下的缓慢改革，将使人民之损失少于一次突然的推翻革命，在其间不定的社会秩序根基与习惯可能瓦解于激情与暴力的10年间。他的《威尼斯语录》（Venetian Epigrams）中之一文在1790年早期表示了他的恐慌：

“让我们的统治者及早自法国的不幸接纳警告吧；  
但，低阶层的人啊，你们应接纳更多的警告。  
伟人走向毁灭；但谁保护着人民  
当激狂的暴民成为我们的暴君时？”

他大为激赏拿破仑以夺取权力与订立宪法准许人民享有偶尔的平民决议，而不太干涉一果断、能干的政府来结束大革命的混乱。他欣赏这科西嘉人不因拿破仑1807年于爱尔福特谄媚的接待他而稍减；此次会面的报导大大增添了诗人——顾问的国际声望。

一些浪漫的颤栗留存于他发展中的鉴赏与品味之古典沉稳

下。《浮士德》(Faust)第一部(1808年)是个爱情故事与中古的“寓意剧”；而《选择的姻亲》(Elective Affinities)(1809年)似乎为新生代求偶乃因互相之吸引远甚于双亲的财力或法律的连系之不断上升之呼声而辩护。甚至已达70岁后，成为哲学家的顾问仍继续骚扰年轻女子。但他在意大利对古艺术的研习，在科学上不断滋长的兴趣，斯宾诺莎(Spinoza)之阅读，与日渐衰颓的体力造成了他不慌的判断与宽广的识见。此改变被记述入他的自传内(1811年)，此书非常客观地看待它的英雄。浪漫的日耳曼——为易感的瓦肯罗德与诺瓦里斯、爱好自由的施莱格尔、疯狂的赫尔德林、与安死者——自杀的克莱斯特所煽动——愤怒他对法国大革命不断增高的批评，而几乎没注意到他也曾指责统治阶层。在日耳曼解放战争期间，他发现怨恨拿破仑与法国极为困难。他解释给埃克曼(Eckermann)：

“我如何能，对我来说文化与野蛮各有其重要性，又受恩于它？有一段时期国仇一齐消失，在某种程度下，我人凌越众国之上，对邻国人民的祸福感同身受。”<sup>⑧</sup>

在日耳曼他那一代从未原谅他，也很少读他的著作。那一代对席勒评价在他之上，<sup>⑨</sup>且宁愿要考塞卜(Kotzebue)而非任择其一。<sup>⑩</sup>歌德之剧很少在魏玛上演，他的出版商悲叹他专集作品之奇差销路。然而一位英国人，拜伦爵士(Lord Byron)，1820年时将《法利哀洛》(Marino Faliero)献给他为“自伏尔泰死后迄今现存于欧洲的第一位文学人物。”<sup>⑪</sup>他难以忍受阅读康德，但他是当代最睿智的人。

### 第三节 文学背景

日耳曼从未如此忙碌于写作、印刷，与出版报纸、定期刊物、书籍。1796年，塞内菲尔德在慕尼黑，因在一块石头上刻划他母亲的洗衣表而偶然发现了一种以后称之为石版印刷术的方法；他发现不同颜色的字与图可在平坦的石块或金属版上被刻出或浮出（如镜中般反转），由此无数的复本可被印出。从此自戈雅与奇洛希治（Hiroshige）至柯里尔（Currier）与艾夫斯（Ives）及毕加索（Picasso）产生了无数的印刷品。

报纸非常繁多，小型，具党派性，且需经过检查。《大众日报》（Allgemeine Zeitung）1798年成立于蒂宾根，迁到斯图加特，然后到乌耳姆，再至奥格斯堡、慕尼黑，以逃避当地的警察。《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于1804年建立，有个较平稳的事业，先为爱国的天主教派，再转为拿破仑派。柏林、维也纳、来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在大革命前已有日报，今日仍在发刊。定期刊物极为丰富。我们注意到其中最优异的一份，《大众音乐日报》（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由布赖特科普夫与哈特尔之公司于来比锡自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之期间（1795—1849年）发行。最辉煌的为Athenäum杂志，1798年由即士雷盖尔兄弟成立。出版商有无数位。每年他们产品之展览使来比锡书展成为当年之文学盛事。

作家中之一特别阶级，精略地类别为政论家，以他们强有力的党派性兼渊博的讨论时代之基本问题而赢得广大的影响力。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 1764—1832年）欢呼巴士底狱

(Bastille) 的陷落, 但当他接触了洪堡之怀疑性的心灵后冷静了下来, 并阅读与翻译柏克的《法国大革命之反响》(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在普鲁士文职中崛起而在军事部中任一名顾问时, 他领导一文学运动以对抗人权、自由与平等、人民统治、出版自由等这些理念。他并不满足于拿破仑之压服大革命。他攻击拿破仑为一军事主义者, 他的征服摧毁了——根据大多数外交官的看法——欧洲之和平、秩序、与稳健所赖的势力之均衡。他遂成为敦促普鲁士王领导十字军对抗拿破仑的最富于雄辩的呼声, 而威廉三世 (Frederick William III) 踌躇时根茨便效命奥地利 (1802 年)。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征服奥地利人后, 根茨在波希米亚避难, 但 1809 年他返回维也纳, 推动新的战争对抗拿破仑。在维也纳的国会中, 他身为梅特涅的秘书与副官, 并支持他粉碎每一个自由发展的战后外交。他一直又老又病的活过 1830 年的叛乱, 并临死仍深信他为人类的利益贡献不小。

高瑞斯 (Joseph von Görres) 是更敏感的人物, 半意大利派, 且全凭感情, 几乎不适合充斥笔战之士的艰苦环境。生为天主教徒, 他脱离教会转而支持大革命。他有助于法国征服莱茵河左岸, 且赞扬拿破仑将神圣罗马帝国转变为莱茵邦联。他以“罗马自由了”之口号欢呼法国占领罗马。但法国军队之自大、法国行政官之勒索, 引起了年轻革命者之愤怒。1798 年他建立了一份脆弱的日报《红叶》(Das rothes Blatt), 为一共和主义者热爱大革命但不信任法军之呼声。他认清了拿破仑之攫夺法国政府乃大革命之终结、且拿破仑本身对权力之危险欲求。他成了家, 并暂时离开政治。当日耳曼发端解放之战时, 高瑞斯以一份报纸《莱茵河快报》(Rheinische Merkur) 加入此运动, 但拿破仑迁移后, 胜利者尽可能地加强政治上的复古时, 高瑞斯非常激烈地攻击他们, 使得他必须避难到瑞士, 在那儿他处在极端的贫困中。所有其他显赫人物也忽略了他, 在悲伤的悔恨中他重返天主教堂 (1824 年)。

巴伐利亚州的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 of Bavaria)在慕尼黑任命他为历史教授而使他自贫穷中奋起。在那儿他写了四部《基督之秘教》(Christliche Mystik)(1836—1843年),他以想像的学识抚慰他的白日,且以恶魔的景象加黑他的夜晚。他去世后34年,“高瑞斯集会”(Görres Gesellschaft)成立(1876年)以继续他在基督教堂历史上的探讨。

散文文学被浪漫派所把持,但一位作家躲开他们而为难定论与奇特的人物。里希特(Jean Paul Richter),1763年在拜罗伊特出生。他自祖父库恩(Johann Paul Kuhn)处取得圣名,直到1793年他仍不过是个单纯的日耳曼人。他的父亲是个教师与风琴家,在萨勒河旁的约迪兹(Joditz)为一间教堂的牧师。在那儿里希特度过了最初13年他再也不能恢复的欢乐生活;单纯的乡村地方透过一切经济上的忧虑与神学上的风暴显示了他的情绪。一家搬到Schwarzenbach时,在同样宁静的河边,他享有着邻居牧师的图书馆;牧师认识了这位男孩的潜能而非他的疑惑。里希特的父亲在那儿去世(1779年),留给无数的子女有限的口粮。20岁里希特进入来比锡的神学校;但他的攻读减弱了他的信仰;他不久退出,并委诸命运于赖以维生之鬻文。1783年他年20岁时出版作品,然后直至1789年再度出版,这两次出版了以同情增添尖苛机智之系列讽刺文。1793年他以“杰恩·保罗”(Jean Paul)之笔名——那是透过对卢梭的挚爱而取的——出版《不可见的小屋》(Die unsichtbare Loge)一书。这本书取悦了少数的读者,后由于他伤感的小说《荷斯培卢》(Hesperus)(1795年)而增加了读者。卡尔布(Charlotte von Kalb)乃席勒之友,邀请这位正崛起的作家到魏玛,且很喜欢他而成了他的情人。<sup>⑨</sup>在那儿他开始了四部的小说泰坦(Titan)(1800—1803年),书中的真正英雄为法国大革命。

在革命初成形的几年中他热切地为它辩护,但指责马拉(Marat)以暴徒统治腐化它,并赞扬科尔代(Charlotte Corday)为



另一位贞德 (Jeanne d'Arc)。他欢迎拿破仑之攫取权力为秩序必要之恢复；他不自禁地钦羨这位 30 岁的青年，他仅以钢铁的意志与雷射的眼光压制他部属高岸的身躯。8 年后里希特非常乐意看到全欧洲为此人所合并，他可将一座大陆纳在他的脑海与手心中，并自柏林与莫斯科为法国立法。但在内心中杰恩·保罗仍保留为一共和主义者，在每一次军事胜利中察觉到另一次战争之种子。他怜悯被征召的青年与哀伤的家属，并辩称道：“只有人民才应决定战争，因只有他们采摘它痛苦之果实。”他以最锐利之箭之一射向出卖军队给外国君王的统治者。他要求免于审查的权利，要求政府外的权力应直率地显露政府之阙失与探索进步之可能性。<sup>19</sup>

1801 年，时 38 岁，杰恩·保罗娶了位太太，1804 年他在拜罗伊特定居下来。经过一些生活上的体验后，他写了本有关教育的书——《拉维那》(Levana)，为主张自由教学的名著之一。他刊出一连串的小说与论文，其中一些由卡莱尔 (Carlyle) 赞赏地译出。他写实讽刺与浪漫情感之混合使他赢得了比歌德或席勒更多的读者大众。他死于 1825 年，留下关于灵魂不朽的未完成之论文；在他那时代已直接探讨此事情。

他为日耳曼首要作家之一，他的声望直至 19 世纪依然存在；它在那儿消逝后便流传到美洲，在那儿朗费罗 (Longfellow) 是他的狂热者之一。即使在日耳曼，几乎没有任何人在今日仍读他的作品，但几乎每个日耳曼人都记得他著名的隽语，指向日耳曼哲学，并比此书更精简地总结拿破仑之时代：“上帝给予英国海上的帝国，给予法国陆上的帝国，而给予日耳曼空的帝国。”<sup>20</sup>

其他两位小说家赢得广大的读者。霍夫曼 (1776—1822 年)——他在 1813 年时迷于莫扎特，将 “Wilhelm” 改为 “Amadeus”——是日耳曼人中最不凡与多艺者之一：他绘画、作曲与指挥、上演一场歌剧“女水神”(Undine)、制定法律、撰写神秘与浪漫之故事——激发了奥芬巴赫 (Jacques Offenbach) 的《霍夫曼故事集》

(Tales of Hoffmann, 1881年)。在生活上,即使不在学问上,独特的是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 1781—1838年)。生为法国贵族,他自大革命中逃开,在日耳曼接受大部分的学校教育,投入普鲁士军团,并参与耶拿之战。1813年,萦绕于在解放战争中他没有祖国与他分裂的忠诚,他写了一篇寓言《比德史雷米勒的寓言》(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为一个人出卖他的影子给撒旦的奇异故事。以一个成名的植物学家身分他伴随考塞卜作环游世界的科学之旅(1815—1818年);他在一度出名的《环游世界》(Reise um die Welt)中记录了他的发现。他将余生分别花在充任柏林植物园园主与写浪漫诗上。海涅(Heinrich Heine)赞扬这些诗,而舒曼将沙米索之诗序《男女之恋情》(Frauenliebe und-leben)编成乐曲。

诗人成群,许多诗人仍为日耳曼人所珍视,但他们具有音乐与情感的字句很难转到另一语言、地方,或时代上。其中可悯的为赫尔德林(1770—1843年),他的诗感以其心智来说极为敏锐。送往蒂宾根研究神职时,他与黑格尔发展出一种富有激励性的友谊,黑格尔其时正对基督教发生怀疑。法国大革命之消息激起了这位年轻人人类欢乐的幻像。他阅读卢梭,作出一篇《自由颂》(Hymn to Liberty)一文,1792年,即该世纪行将结束前,他认为他看见了正义与高尚的美丽曙光。当战争爆发时,他致其姐妹的信中说:“请为法国人民——人权的斗士——祈祷吧!”当法国大革命在流血中遭到挫折时,他仍紧紧抱持着他的梦想说道:

“我爱人类——当然不是我们时常遇到的那种堕落、卑屈、游手好闲的人。我热爱人们伟大而美好的希望,甚至腐败的人也不例外。我热爱未来的人类。……我们活在一个万事万物均致力于改进的时代中。这些启蒙的种子,这些心中的愿望与朝向教育人类的努力,……将产

生丰硕的果实。这就是我的愿望与活动的神圣目标——播撒这些将会在另一代结果的种子。”

对于过去他亦怀抱着梦想。如他同时代的济慈一样，他热爱古希腊的英雄与神祇，并着手写一篇关于希腊一位革命家的散文史诗——《亥伯龙》(Hyperion)。他前往耶拿，拜费希特为师，学得敬佩康德，并参观彼时也正在希腊化的魏玛诸神。席勒为他找到担任卡尔布之子家庭教师的职位。1796年他在美因河的法兰克福银行家戈特哈德(J. F. Gotthard)家中找到待遇较优厚的家庭教师职位。银行家的妻子非常欣赏他的诗，不久，他即与她堕入爱河，但也因此被解雇并被迫离开该城。热恋的狂欢与放逐的结果导致他心理失常；然在此时(1799年)他写了《恩贝多克利之死》(Der Tod des Empedokles)，虽未完成，却列于诗的杰作中。历经数年，他到处流浪，为的是谋生并寻找文章的主题。他要求席勒推荐一个希腊文学的讲师职位，但席勒认为他太不稳定，不适于胜任教职。当在波尔多(Bordeaux)任家庭教师时，赫尔德林接到戈特哈德夫人去世的消息，马上抛下工作，离开法国赶回日耳曼。祖国的朋友发现他心理失常已病入膏肓，就加以照顾(1802年)。他一直活到1843年，而他的诗却久已为人所忘，甚至他自己，直到1890年才再受到大家的注意；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和乔治(Stefan George)对他喝采；目前鉴赏家将他列在仅次于歌德和席勒的地位。

尚有许多人创作诗歌。科尔纳(Christian Gottfried Körner)之子科尔纳(Karl Theodor Körner, 1791—1813年)曾帮过席勒不少忙，将自己、笔和剑均投入为脱离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他大声疾呼唤醒日耳曼人武装起来。1813年8月26日战死沙场。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 1769—1860年)在他91年的生涯中度过了三次革命。由于他在《历史的尝试》(Versuche einer Geschichte,

1803年)中以写实的笔法描述封建制度,波美拉尼亚的封建制度得以废除;接着因在《时代的精神》(Die Geist der Zeit, 1806年)一书中高呼反拿破仑口号,而被迫逃难到瑞典,走避耶拿的胜利者。1812年应施泰因之邀,到圣彼得堡协助激发俄国人民的士气,以抵挡法国人的入侵。1815年之后,他在普鲁士致力于打击保守派的反动,且曾短时遭监禁。1848年他被选为法兰克福国会议员。当那次革命也平息后,他将全付精力奉献于诗的创作。——天主教贵族艾只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 1788—1857年)曾写一些至今仍能感动我们的简易抒情诗,如《吾儿之死》(On the Death of My Child)。下面所写的,甚至对一位异国无神论者而言,也能感受到那种音乐、起共鸣、羡慕那种希望:

“远处敲着钟声;  
深夜迅即降临;  
灯火隐约燃着;  
你的小床已铺妥。  
唯野风不断地吹  
在房子四周怒吼;  
我们坐在屋内,孤零零,  
时听外面的风声。

仿佛是你,试图  
轻敲房门,  
好像是迷路的小孩  
倦然归来。

我们这群可怜的傻子!  
我们流浪,颤栗着

遗弃于黑暗中——

但你早已觅得归宿。”

#### 第四节 浪漫的狂喜

这段日耳曼全盛期的大多数出色作家，皆以呼吁自理性中解放直觉、自智慧中解放感情、自年龄中解放年轻、自家庭与国家中解放个人，而震撼当代。今日我们很少人读他们的作品，但在他们的时代里，这些都是火舌，公然向索然无味的哲学及在效用、习惯、禁忌、命令和法律方面限制自我发展之社会桎梏挑战。

此种反抗的原因起自任何有朝气的年轻人将父母、兄弟、姐妹、师长、讲道者、警察、文法家、论理学家、道德家所加诸于其身上的束缚与生俱来的愤懑。当代哲学家费希特不是已证明过，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本实体是他个人有意识的自我吗？倘若如此，除了其对个人之效用外，宇宙对我们均毫无意义可言，我们每人均可公正地参与批评所有的传统、禁制、法律或信条，并要它提出为何人应服从它的理由。一个人可能战战兢兢地屈服于神所发出或由披上神祇外衣的教士所发出或确认的诫条；但是，由狄德罗、达朗贝尔（Alembert）、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拉梅特里等人贬为非人性的宇宙法则之上帝，其现在的地位又如何呢？

此时，不但有值得夸耀并具解放性的启蒙思潮，又有大革命加入行列。阶级区分不见了；那些一度发布法令并逼人服从的领主现在皆拼命逃窜，是以阶级之间再也没有障碍，没有传统的妖

魔撑持法律；现在，每人皆有自由争取任何职位或权力，并可参加竞选公职，以试试自己的运气；事业之门为有才干、有力气的人大开。在过去的历史文明中，个人从未如此自由——可自由选择其职业、事业、配偶、宗教、政府和道德规范。如果宇宙仅有个体存在，则国家、军队、教会、大学不是特权阶级用来恐吓与控制、组织与瓦解、统治并课税、聚集并屠杀其余受教者的阴谋吗？在诸多束缚下，天才罕有成就。然而，一位天才不是抵得上一打教师、将军、主教、国王，或100名群众吗？

然而，在新近获得自由解放的人群中，许多敏感人士觉得，理智已为解决付出太高的代价。“理智”曾攻击旧式的宗教，旧式宗教充满着圣徒故事、芳香的仪式、动听的音乐、具调停功用的圣母马利亚、以及救世主基督；但“理智”也去掉了此一崇高幻想，代之以面色忧郁、寻求物质的芸芸众生，漫无目标地走上毁灭之路；但“理智”亦毁掉男女老幼每日与神接触的层面，代之以一幅只讲物质的男女众生，机械般地、愚蠢地日渐走向充满痛苦、堕落和永劫不复的死亡之谷的景象。虽然不为三段论法所容，但想像力亦有其权利在；我们把自己想成是控制物质的灵魂，而非机器操纵灵魂，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之事。感觉不但具有其权力，而且比智力更能探索至真理的境界；尽管贫穷、到处流浪、充满疑惑的卢梭也许比天资聪慧的伏尔泰具有更聪明的感受。

日耳曼人知道、也听过卢梭和伏尔泰两人的名字，但他们选择卢梭。他们读过《爱弥儿》(Émile)和《爱洛绮丝》(Héloïse)两部作品，但较不喜欢《哲学字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和《诚朴》两书。他们仿效莱辛(Lessing)，把浪漫派的莎士比亚捧得比古典派的拉辛还高；他们喜好《克拉瑞莎·哈啰》(Clarissa Harlowe)、《特丽丝特拉姆·山笛》(Tristram Shandy)和麦克佛生的《奥西恩》(Ossian)更甚于法国的“哲学家”(philosophes)和“艺术评论家”(salonnières)。他们拒绝布瓦洛(Boileau)为古典风

格法则所订下的规则。他们对于强调明了和中庸感到愤怒；这些与对东方世界和无限者的向往格格不入。

日耳曼的浪漫主义崇拜的是真理，但对于使人生蒙上阴影的“科学真理”却加以猜疑。克里蒙兹·布伦塔诺（1778—1842年）和艾奇姆·阿尼姆（Achim von Arnim, 1781—1831年）两人合著《幼童奇异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 1805—1808年）一书中的神话和寓言，极受好评，被格林兄弟（雅各·格林，1785—1863年，和威赫姆·格林，1786—1859年）收入其《保姆与侍婢》（Kinder-und Hausmärchen, 1812年）一书中，亦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些描述孩童时代能得全民族和个人之共鸣的诗作，乃是善良日耳曼人灵魂中的一部分，也许是其“潜意识”之自我的一部分。

假使想像力的遗产是继承自大革命前的中古时期之罗马天主教信条，那么浪漫的精神则可追溯至长满青苔的古老教堂、不可动摇之信念、以及建造那些古老教堂的工匠；可归功于那些使神进入人类日常生活，并使对人生厌倦的个人主义者与群体融合为一的祷告、圣诗与教堂钟声；也可归诸于那些其生活就是使基督教更成为一篇神圣史诗的圣徒；更可归功于使未婚少女睿智的天真以及已婚妇女对家庭、国家和民族之奉献神圣化的圣母玛利亚。这一切当然都是一种中古世纪之虔诚与惊怖、遭受迫害之异教徒与疑神疑鬼者两者的热烈混合；然而，这也是促使日耳曼浪漫派主义者的狂热能臻于高峰的原因，而且亦是使其中有些人，在筋疲力尽、悔恨交织之余，走到圣坛前，并投入教会怀抱的道理。

## 第五节 情感之声

日耳曼浪漫主义几乎影响了日耳曼生活的各方面：贝多芬、韦伯和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的音乐；霍夫曼和蒂克的小说；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施莱尔马赫的宗教和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门德尔松(Dorothea Mendelssohn)等人的改变宗教信仰。特别是领导日耳曼文学运动的5个人；而值得我们纪念的是那些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女子，她们绊住这几位文人或与他们分享喜悦与痛苦、充当其智慧的伴侣，他们的行为当时简直震惊了法兰克福至奥得河的保守妇女们。

此运动肇端时期的灼灼之星是瓦肯洛德(1773—1798年)，他身体羸弱、生性害羞、对现实与理性感到焦虑、却能自宗教中寻得慰藉、从艺术中得到喜悦。在他看来，艺术家的构想与运笔技巧具有神般的创造才能。他心仪达芬奇(Leonardo)、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迪尔……等人，因此透过其所写关于这些人的随笔来表达他的新宗教观。在哥丁根大学和埃兰根大学，他获得蒂克的支持；这位热心的同学为他朋友的著作试拟了一个有趣的书名：《一位爱好艺术的兄弟的呕心之作》(Herzensergiessungen eines Kunstliebenden Klosterbruders)。就凭此名，该书在1797年出版。瓦肯罗德讽刺莱辛的理性主义和文克尔曼的古典主义几乎有如嘲笑日耳曼中产阶级对艺术的喜悦无法彻底了解一般，他鼓励当代的艺术家与工匠以共同的美学家之名，恢复中世纪的兄弟之爱。瓦肯罗德在24岁时因染患伤寒去世。

他的朋友蒂克(1773—1853年)终其一生均从事于感情对理



智、想像对现实的冒险玩意儿。他与瓦肯罗德一起研究伊利莎白女皇时代的戏剧与中世纪艺术，并为巴士底狱的陷落而欢呼。异于瓦肯罗德的是他富有幽默感与对戏剧的鉴赏力；他认为生命就是许多神、国王、王后、主教、武士、城堡、大教堂和卑微的兵卒所玩的一种游戏。大学生涯结束后，他返回故乡柏林，并于1795—1796年出版了1本分3册的小说——《罗维利亚的故事》(Die Geschichte des Herrn William Lovell)，该书以里查森的书信形式写成，生动地详述一名青年，以基督教神学代替了基督教伦理后在性与智识方面的徘徊，他并根据费希特的知识论下结论说：如果自我是我们唯一确实认识的实体，则它应是道德的主宰与法律的教师。

“我思故万物在；我思故美德存。……其实，欲望是我们生存的大秘密。诗、艺术、甚至宗教，均是欲望的伪装。雕刻家之作品、诗人之文采、精心之作的绘画等不过是美感享受的入门。……”

我怜悯那些常对人类本性之邪恶喋喋不休的傻子。这些盲目的家伙，他们把祭品献给一位无能的神，而它的赠予却无法满足人类的心灵。……不，我已立誓献身于一位更高贵的神，天地万物在它之前屈服，它本身兼容各种感觉，它是狂喜、爱情、万事万物。……唯有在露易莎的怀抱里，我方了解爱情的真谛；如今我对艾美莉亚的记怀似乎已很朦胧，远在天际。”<sup>10</sup>

上面一席话较《卡拉马佐夫兄弟们》(The Brothers Karamazov, 1880年)早了85年，等于伊凡·卡拉马佐夫所说他死后可能出现的非道德世纪之可悲预言：“若无神的存在，一切皆可为所欲为了。”然而，罗维利亚在去世前还是回归了宗教；他解释说：

“最鲁莽的自由思想家，最后成为一位神的崇拜者。”<sup>19</sup>对罗维利亚而言，这真是及时的转变，因为在这次忏悔不久后，他就在这次决斗中丧生。

《罗维利亚的故事》一书是一位青年在成熟前获得解放的自夸。1797年他出版一本短篇小说《愚蠢的艾克哈特》(Der blonde Eckhart)，此书大获施莱格尔兄弟的赞赏。在他们的恳邀之下，他搬到当时的浪漫主义大本营——耶拿。然而，蒂克还是于1801年离此移居到奥得河的法兰克福(Frankfurt-am-Oder)一位朋友的家中。他一度曾献身于翻译伊利莎白女皇时代的戏剧；然后又以才气焕发的评论编纂与他同时代的诺瓦里斯和克莱斯特二人的作品。1825—1842年，他步莱辛的后尘，担任德累斯顿剧院(Dresden Theater)惹人嘲笑的剧评兼经理达17年之久；他在那里所写的坦率随笔替他制造了若干敌人，但也使他在日耳曼文艺批评界的地位，仅次于歌德与施莱格尔。1842年，从未听过有关《罗维利亚》一书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邀他至柏林；活得比《罗维利亚》一书久的蒂克欣然接受，余生并以一文学支柱的地位在普鲁士首都度过。

诺瓦里斯的寿命不足以使他从他年轻时代的思想清醒过来。就文学而言，出身贵族使他占了不明的优势：他的父亲是萨克森(Saxony)盐厂厂长，也是普鲁士内阁中的哈登堡亲王(Prince Karl von Hardenberg)的堂弟。诺瓦里斯诗人的真名为哈登堡(Freiherr Georg Friedrich Philipp von Hardenberg)；“诺瓦里斯”是他的笔名，却也是他13世纪的先人的真正名字。他的家族隶属于虔信派教徒的赫伦汉(Herrnhut)社区；他固守他们的强烈宗教倾向，但是到头来，他却寻求天主教与新教的调和，以为迈向欧洲一统的进阶。19岁那年，他进入耶拿大学就读，与蒂克、席勒、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等人交情深厚，并可能曾选过费希特的课，当时费希特的课程正自耶拿至魏玛闪烁着光芒。

在维滕贝格大学待了一年后，他即追随父亲在图林根(Thuringia)的阿恩施塔特(Arnstadt)地区从商。在格林根(Grünigen)附近邂逅了苏菲亚(Sophie von Kuhn)，遂为她的美貌与人格倾倒，并向她的双亲，表示要娶她为妻。1795年，他与苏菲亚正式订婚，当时她年仅14岁。不久，苏菲亚患了肝病的不治之症，虽然进行两次手术，却使她更加羸弱，1797年即与世长辞。诺瓦里斯从未自这位爱人过世的悲痛中痊愈。他最有名的诗集《夜之颂》(Hymnen an die Nacht, 1800年)即是对苏菲亚的忧郁追忆。1798年他与沙尔庞捷(Julie von Charpentier)订婚，然而这次订婚最后亦没结局；肺结核加上悲伤啃蚀了这位诗人的健康，1801年3月25日诺瓦里斯去世，年方28岁。

他过世后还有一部小说《海因利西传》(Heinrich von Ofterdingen) (1798—1800年)，强烈表白企盼宗教的宁静。他一度赞誉歌德的《威廉大师》(Wilhelm Meister)写实而健全地描述一个人的发展；现在他却斥之为将对世俗工作的无聊适应加以理想化了。他自己小说中的主角是一位历史人物，是《尼贝隆根之歌》(Nibelungenlied)的真正作者，一位致力追求蓝色花朵的加拉哈特(Galahad译注：亚瑟王传说中圆桌武士之一，因其忠洁与高贵而寻获圣盘)，蓝花象征通往无限领悟的死亡转变。海因利西说：“我渴望看到这朵蓝花，它时常深植我心中，使我胸中毫无其它杂念。”<sup>⑨</sup>一度在闻名的“欧洲的基督徒”(Christendom in Europe)随笔中，诺瓦里斯将中古时代理想化(甚至为宗教法庭辩护)为曾使欧洲实现旧梦——在一个宗教信仰下的政治统一。他认为由教会来抵抗唯物主义的科学和世俗哲学是明智之举；从此观点而言，启蒙运动对欧洲人而言是一种悲剧性的挫折。当死神向他招手时，诺瓦里斯舍弃了所有俗世的目的与欢乐，并梦到一个没有病痛与悲伤、爱心永不终止的来世。

## 第六节 施莱格尔兄弟

奥古斯特·施莱格尔(1767—1845年)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772—1829年)是一对杰出的兄弟:虽然两人在性情、意中人、学问及信念方面各自迥异,但最后在梵文与哲学方面却相一致。他们出生于汉诺威一位新教牧师家中,在思春期成了神学者,而于弱冠时变成异教徒。奥古斯特在哥丁根大学时,一方面因着迷维吉尔作品译者海涅(Christian Heyne)的讲演与人格而研究语言的转生,另一方面也着迷于莎士比亚作品译者兼民谣“雷诺”作者毕尔格(Gottfried Burger)对伊利莎白女皇时代的学问研究。<sup>⑤</sup>5年之后,弗里德里希也步其哥哥的后尘,进了哥丁根大学;他最初研读法律,后来徜徉于文学、艺术和哲学之间。他成熟得相当快,1796年在耶拿与其兄会合,两人并携手创立文艺协会,1798—1800年两年间,该协会是日耳曼浪漫运动的代言人与最高指导。诺瓦里斯与施莱尔马赫投稿;蒂克来加盟;费希特与谢林以其各自的哲学来助阵;而围绕在此生龙活虎圈外的是若干富有浪漫自由思潮的才女。

由于弗里德里希在取舍思想方面较他人敏捷,于是成为其伙伴的智慧先驱。1799年他发表一部小说《鲁辛德》(Lucinde),该书成为领导攻击陈旧教条与繁缚禁忌的一面红旗。就理论而言,该书(就像雪莱的《诗辩》[Defence of Poetry])为诗人有权做人生的诠释者与导师辩解。例如:诗人对追求财富的轻蔑有多明智?“此种不断的努力与奋斗永不休止的目的安在?勤奋和实利是死亡的守护神。”<sup>⑥</sup>他亦公开褒扬“喜悦与爱情的神圣福音”,亦即指没

有婚姻枷锁的爱情喜悦。1800年当弗里德里希企图拜访彼时在哥丁根大学执教的哥哥时，汉诺威当局立刻送一份令人为难的命令给该校校长说：“如果施莱格尔教授那位以作品有不道德倾向而声名狼藉的弟弟，到贵校的话，请不要准他停留片刻；如你能暗示他，尽快离开则不胜感激之至。”<sup>⑨</sup>

启发弗里德里希写成《鲁辛德》(Lucinde)一书的女子是卡洛琳·米凯利斯，生于1763年，1784年嫁给一位大学教授，但婚姻生活并不美满，直到他死后，方获得自由。此后若干年中她以才貌出众，过着愉快的寡居生活。当奥古斯特尚在哥丁根大学求学时，即与她坠入情网，并向她求婚。她以自己长他4岁为由，婉拒了他。1791年，奥古斯特到阿姆斯特丹担任家庭教师时，她开始经历了一连串的奇遇，其中之一是意外地怀孕了。她在美因茨加入一个革命组织，后来被捕，直到受父母保释，并到来比锡生产。不料在那里遇到了奥古斯特，他再度向她求婚，两人终于在1796年成婚，他收养了她的孩子，一家人迁居耶拿。

在耶拿，她所受的教育、她的活泼和伶俐谈话使她成为自由分子中最受欢迎的女主人。威廉·洪堡称赞她是他所遇见的最聪明女子。<sup>⑩</sup>歌德与赫尔德则专程自魏玛前来，与她一起吃饭，共渡欢愉时光。<sup>⑪</sup>而彼时与哥哥同住的弗里德里希也替换其兄，与她坠入爱河。他将她化为他小说中的鲁辛德，对她大加赞美，无法以言语表达对她的热情。此时，奥古斯特对她热情已减退至普通的体贴礼貌，故动身至柏林讲学(1801年)。在那儿他与和其丈夫离婚的苏菲亚·贝恩哈迪(Sophie Bernhardt)相恋，进而同居。当返回耶拿后，他发觉妻子卡洛琳迷恋着谢林，欣然同意与她仳离。卡洛琳于是再嫁给谢林(1804年)，并与他厮守至死(1809年)。谢林后来虽然再娶，多年后却仍然感受到卡洛琳对他的影响。“纵使她不是以真正的她对待我，我也要哀悼她，为这位已不在世的聪明绝顶的人物悲恸，这位具有男性活力与最敏锐智力的奇女子

兼备了最温柔、最女性化的爱心。”<sup>⑧</sup>

足以与卡洛琳媲美的是杜洛丝亚·施莱格尔，其娘家姓名为布蓝德尔·门德尔松（Brendel Mendelssohn）。为取悦她那位名气响亮的父亲，她于1783年嫁给银行家西蒙·维特。他们育有一子菲力浦·法伊特，后来成为杰出的画家。有了万贯钱财，她就对钱毫不在乎，遂投身于当时情形更不稳定的哲学界，并成为柏林的拉歇尔·瓦恩哈根（Rachel Varnhagen）沙龙的智识权威者。弗里德里希在那里与她邂逅，两人立即坠入情网；而醉心于理念的她亦发觉他在理念中摸索。他当时年仅25岁，而她已32岁；但这位善变的作家却为这位已过而立之年的妇女的万种风情魅力所倾倒。她并没有什么倾国倾城的美貌，但她对他智慧的钦佩却历久不衰，她能陪伴他渡过他的哲学与语言学的探索，对他一心一意，两人虽然争吵，但亦白头偕老。她的丈夫发觉自己已失去了她，遂于1798年与她离婚。此后她心满意足地与弗里德里希同居，并于1802年陪他到巴黎，并受洗，改名为杜洛丝亚，直到1804年才成为弗里德里希的合法妻子。

此时，弗里德里希之兄奥古斯特已成为欧洲大陆最著名的讲师，且在从事莎士比亚作品的伟大译述方面成就斐然，使这位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大文豪之名在日耳曼如在英国一般享有盛名。虽然奥古斯特被称为“日耳曼浪漫主义学派之父”，<sup>⑨</sup>但他却有许多古典的思想与个性：有条理、清晰、均衡、稳健和订定目标方循序渐进。他多年中在各城市发表的“论戏剧文学”的讲学，就表现这些古典特质而言，更是无人能出其右；他对莎士比亚的评论极富启发性，有时甚至俨然批评他心仪的诗人。1817年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写道：奥古斯特这些演说“是迄今对这些戏剧的最佳评论。……我们承认有点嫉妒……这些评论居然由一位外国评论家来说明了我们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信任。”<sup>⑩</sup>

1804年，正在日耳曼游历以寻找书题材的斯塔埃尔夫人以年

薪1.2万法郎说服了奥古斯特，陪她到科佩（Coppet）当她子女的家庭教师，并充当她的参考百科全书。后来，他曾与她游历意大利、法国和奥地利，再陪她返科佩，直到1811年瑞士当局始听命于拿破仑，命令他离开瑞士。此后，他前往维也纳，却意外地发现弟弟在该地讲述“中古时代是欧洲信仰与团结的黄金时代”。

维也纳是日耳曼的天主教首都，弗里德里希与杜洛丝亚早于1808年改信天主教。多年前她曾说：“这些圣者的画像与天主教音乐如此感动我，因而使我下定决心，如果我有朝一日信主，我定要信天主教。”<sup>⑨</sup>弗里德里希将自己的改信天主教归于对“艺术的偏好”；天主教在许多方面——鼓励想象力的发挥、感觉的表现、美感的追求——似乎是浪漫情操天生的盟友与必备之条件。而理性主义者，于遭受神秘的打击与人类的必死命运之羞辱后，已对推理感到厌倦。而对自我无安全感而生孤独的个人主义者，则转向教会去寻觅公共的避难所与慰藉所在。身为最聪明的理性主义者、最激烈的青年个人主义者与最鲁莽的叛徒的弗里德里希于是背弃了伏尔泰、路德与加尔文，转向中古欧洲与中古时代无所不能的教会。他为令人鼓舞的神话已为枯寂的科学替代而悲叹，并声称“所有现代艺术最贫乏的即是艺术家没有神话。”<sup>⑩</sup>

弗里德里希之所以更重视神话也许是受他研究印度文学与神话故事的影响。他研究印度神话故事始于1802年，地点在巴黎，当他写了一篇博学而富有发展性的论文《论印度人的语言与智慧》（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er）（1808年）时达于高峰，该篇论文亦参与了奠定印欧语言的比较语言学基础的工作。1811年当弗里德里希与其兄在维也纳作短暂聚首时，大概曾与其兄讨论过他一生中在这方面的研究。讨论的结果令奥古斯特回忆起与海涅在语言学方面的合作，遂重拾在这方面的研究；施莱格尔兄弟对梵文研究的合力贡献是他俩毕生中最充实与永恒的成果。

弗里德里希为自己在维也纳的文化与政治界中赢得相当的地位。他在奥国政府中获得一席秘书职位，并协助撰写反拿破仑的宣传文章，路德维希格大公（Archduke Karl Ludwig）即曾发布此文作为1809年的反拿破仑活动之一部分。1810年及1812年，他在维也纳发表有关欧洲历史与文学的出色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解说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学识，并对浪漫主义作有历史系统的分析。1820年他出任右翼的天主教刊物《康柯狄亚》（Concordia）的编辑；由于他在该刊中放弃了他以前在耶拿时所强烈维护的信念，导致他与兄长奥古斯特间永远的疏远。1828年他在德累斯顿发表最后系列的演讲，翌年即在该地过世。杜洛丝亚珍惜对他的追思，遂在思想与行动方面步其后尘，直至1839年去世为止。

奥古斯特较弗里德里希与杜洛丝亚夫妇长寿。1812年5月，他与斯塔埃尔夫人重逢，并带她经奥地利、俄国至圣彼得堡，再前往斯德哥尔摩。在那儿，透过斯塔埃尔夫人的影响力，他被任为瑞典王储伯纳多特的秘书，并与他在1813年对拿破仑战役中并肩作战。由于他的贡献，他被瑞典政府封为贵族。1814年，他在科佩与斯塔埃尔夫人重聚，此后一直伴着她，直到她逝世。此时，他对她已尽了相当的情分，于是在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担任文学教授（1818年）。他恢复研究梵文，创立一份梵文刊物，编辑并发行《梵天神曲》（Bhagavad-Gita）与《逻摩衍拏》（Ramayana）的原文，并为创立一套《印度文学丛书》（Indische Bibliothek）花了10年的苦工。他于1845年去世，享年七十有八，身后遗有他不辞辛苦将莎士比亚作品译成德文的珍藏，而他的许多演讲，使柯勒律治于研究日耳曼哲学中，在文学人物盛事与思想方面收获颇丰。他的一生真是多采多姿。





图45 William Blake: 雪莱,  
水彩画。(Bettmann 档案社)



图46 William Blake: 飞入埃及(1806), 水彩画。  
纽约,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Bettmann 档案社)



图41 P.Vandelyke-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95), 伦敦, 国家人像画廊。



图42 F.L.Chantrey-Robert Southey (1832), 伦敦, 国家人像画廊。



图 39 版四: Jane Austen.(Beckmann 档案处)



图 35 仿照 John Opie 的一幅西  
画作的石版画: 玛丽·史东克  
莱夫特(Bettmann 档案处)



图 36 Machse 所作一西集中的风  
刺画: William Goulwin, “可笑的  
哲学家”, (Bettmann 档案处)



图 31 William Sharp 仿照 George Remy 的一幅西画作的版画：佩恩(Bettmann 档案处)



图 32 素描：罗伯特·欧文 (Robert Owen)(Bettmann 档案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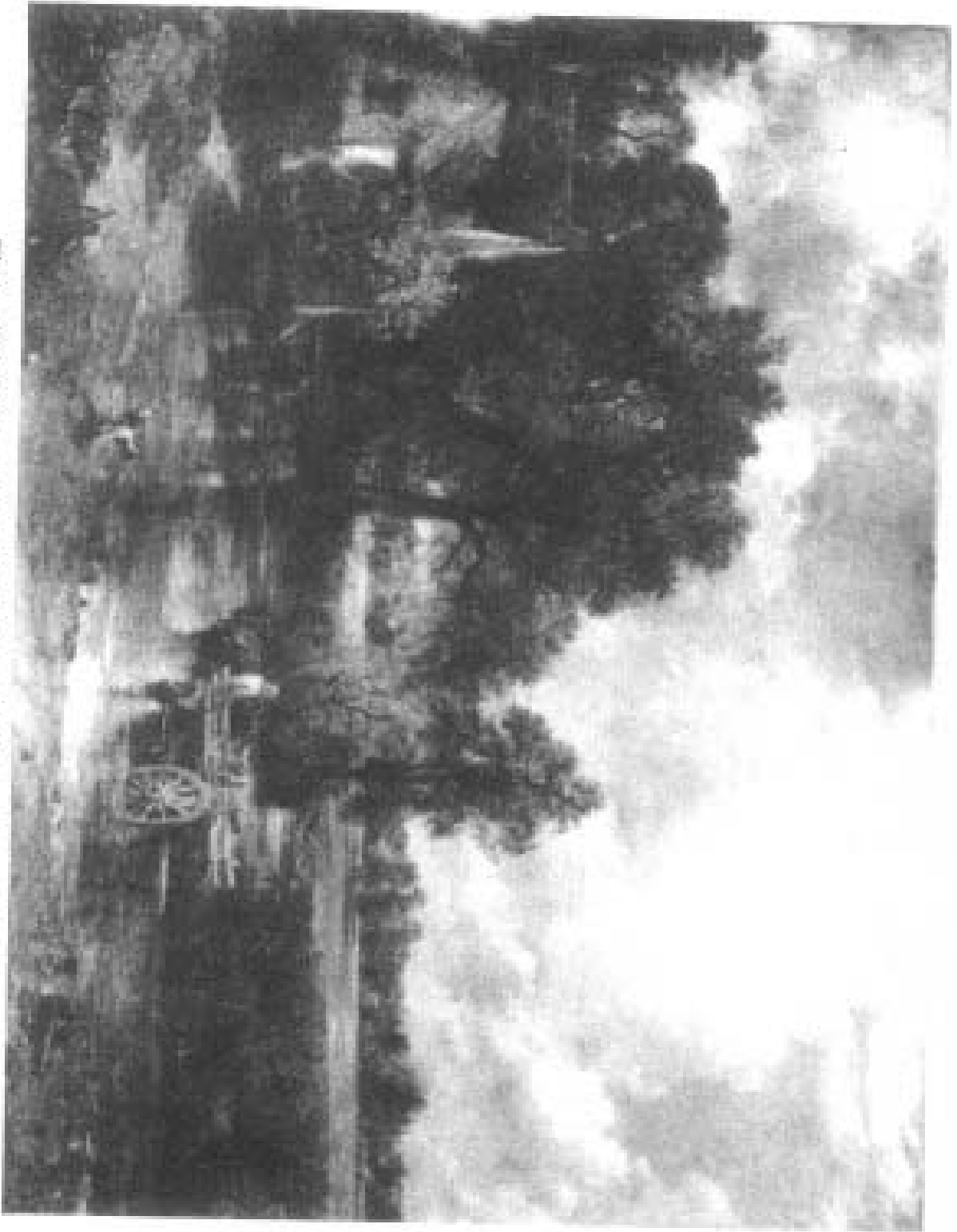


图 29 约翰·康斯坦布尔 John Constable 的《多利马农舍》(1824)，伦敦，国家画廊



EDMUND KEAN.

图 27 木刻画：饰演哈姆雷特的 Edmund Kean。(Bettmann 档案处)



图 25 新洲：李毓全一景(1907)。





图 22 S & vms Plaque-Georges-Léopold Cuvier 男爵。巴黎。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



图 23 版四: Jean-Baptiste de Lamarck (Bellmann 档案处)



图10 François G à rancière et carrier 人。巴黎  
Carnavale 博物馆。(Giraudeau 摄)



图17 Vigore-Lebrun: 饰装 Corinne 的斯塔尔夫人。日内瓦。艺术与历史博物馆所藏。(Nocker of Saussure 的礼物)



图 15 François Gérard: 身着加冕长袍的皇帝拿破仑一世(1805),  
德勒斯登博物馆。(Bettmann 档案处)



图 13 亨德里克·马尔姆森的书房。(国立齐赫·博物馆)



11 Antoine-Jean Gros 拿破仑于 Arcole 的桥上。巴黎卢浮宫  
(国立 Cliché 博物馆)



图6 Ary 所作的象牙小画像: Viscount Paul de Barras. 瓷成衣。(Calvet 博物馆)



图7 素描: George Jacques Danton, 1789年4月5日。(纽约社会图书馆)



图8 Jean-Antoine Houdon: 米拉波 (Mirabeau), 瓦尔塞博物馆 (国立 Cluck e 博物馆)



图1 Jacques-Louis David: 未完成的拿破仑肖像, 巴黎卢浮宫 (国立Cliché博物馆)



图2 仿照一版版照相刷作的版画, 凡尔赛宫 (Bettmann 档案处)



图4 版画：路易十六。  
(Bettmann 档案处)



图5 Chappel 仿照一幅画面作的版  
画：玛丽·安奈奈特。(Bettmann 档  
案处)



图9 Henry Colburn仿照François Gérard一幅1808年的画所作的版画：达雷航(1845)，(Bettmann 档案处)



图10 Boze: 马拉(Jean-Paul Marat)，(Bettmann 档案处)



图 12 François Gérard 的画室：约瑟芬皇后，巴黎 Malmaison 博物馆  
(国立 Cliché 博物馆)



图14 Jacques-Louis David: 拿破仑穿越阿尔卑斯山(1801), 巴黎, Malmaison 博物馆.(国立Cliché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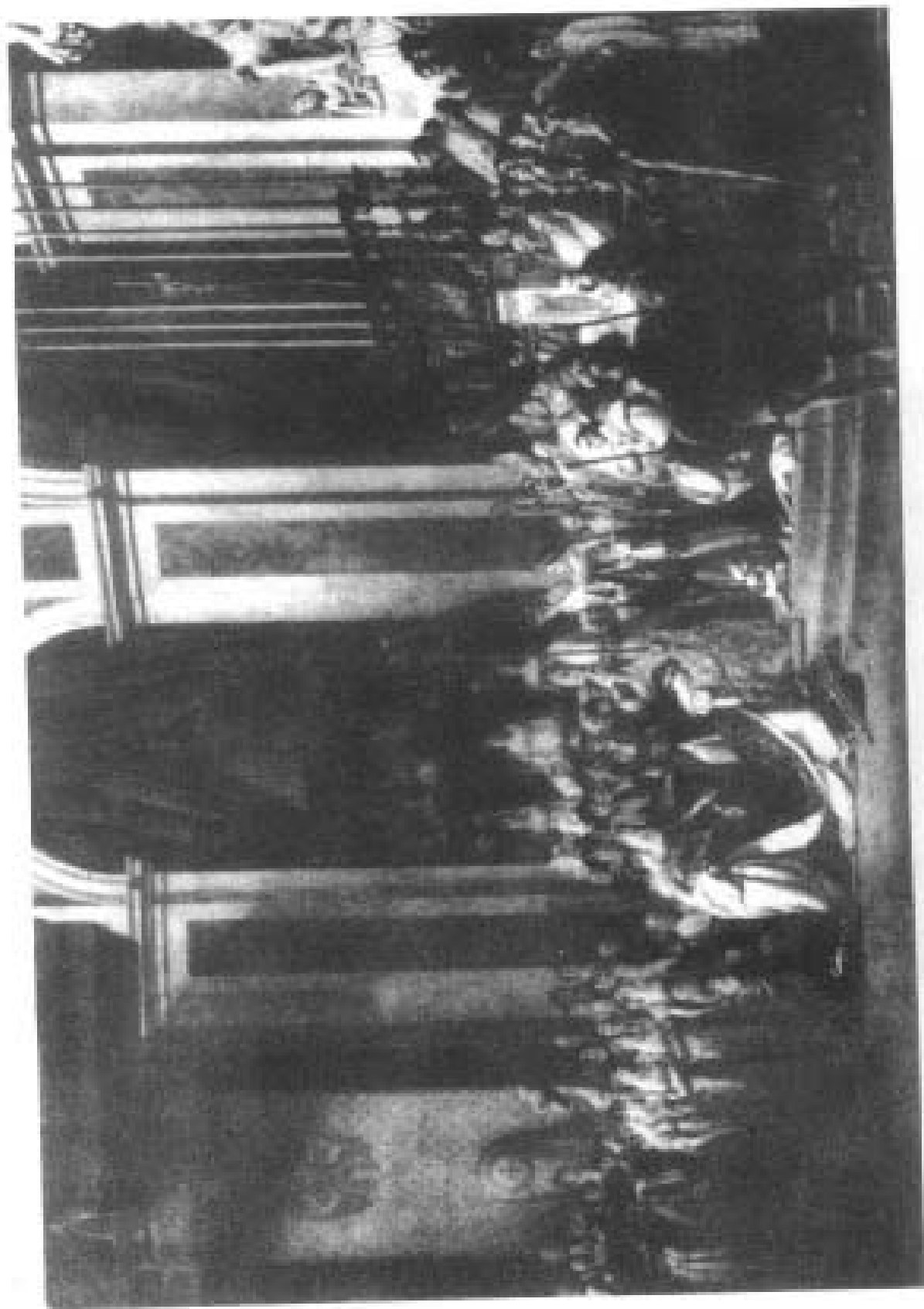


图 16 Jacques-Louis David: 拿破仑加冕典礼, 巴黎, 卢浮宫, (国立 Clliché 博物馆)



图 15 Gaspard-夏多布利昂(Fran çois-René de Clairambault)(1809),  
S.Malo 博物馆。(J.C.Phillipot 摄)



图20 Jacques-Louis David:  
自画像(1794年7月),巴黎,  
卢浮宫。(Beumann档案库)



图21 版画: François-Joseph  
Talmá, (纽约社会图书馆)



图 24 B.Metzger 所作的版画：巴黎，凯旋门。(Bellmann 档案处)





图 26. François Gérard: 玛丽 - 路易丝 (Marie-Louis) 皇后。  
巴黎 - 卢浮宫国家艺术博物馆



图 28 C.Martin 所作的素描：J.M.W.Turner，伦敦国家人像画廊



图 30 J.M.W. Turner: 加来防波堤。伦敦, 国家画廊。



图 33 达尔文画像。(纽约社会图书馆)



图 34 版画：德根路士。  
(Beitmann 档案处)



图 37 John Linnell 所作的版画：马  
尔萨斯(1830年)。(Bettmann 档案处)



图 38 J.Watts: 詹姆斯·瓦特。Millard  
Cox 收藏馆所藏(Bettmann 档案处)



图 40 William Allart Walter Scott 爵士(1832), 伦敦, 国家人像画廊。



图43 R. Westall: 拜伦爵士  
(1813)。伦敦。国家人像画  
廊。



图44 Thomas Landseer 仿照  
Benjamin R. Hayden 一幅 1808  
年的素描而作的版画：华茨华斯。  
(Bettmann 档案处)